滾滾遼河

紀剛 著

三民叢刊 144

滾滾遼河——目次

再版說明
出版說明
001 臨水溯源
——談「滾滾遼河」的去脈來龍
001 滾滾遼河
509 十年血淚一部書（代後記）

附錄

519 心靈的契合 王藍
523 歷史的證人 應未遲
525 評審的實例 仲父
527 紀剛的寫實小說《葬故人》 劉介民
535 海外感應 紀剛
541 三尊神與一堆人 紀剛
547 欣見冰封的故事解凍 尹生
551 抗戰時期東北地區的文學活動 紀剛
569 話說從頭 紀剛
589-590 民國三十年偽滿州國圖

01

我恥於訴說，我們這個行列是如何堅忍地投身戰鬥，與敵周旋。我厭於回答，有關我們地下工作的任何一項詢問。我們那些年那些人、那種種鐵的生活、火的情感、血的工作，不是為人當茶餘酒後談助做的。但，為了說明我與宛如、詩彥等人相識的經過，為了不負羅雷最後的付託，我又不能不把我們「覺覺團」的故事，從頭細說。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對中國加緊侵略，關東軍炮擊瀋陽北大營，一夜之間在我東北弄出個「滿洲國」來。那時候我們還小，不太懂得做亡國奴的痛苦。「七七」抗戰後，我們已就讀大學，一種自然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覺醒，使我們不忍坐視同胞及自身受異族統治之苦，有志的青年們都像雨後春筍般的，在敵偽各大專院校裡，紛紛地結成祕密團體，展開了「反滿抗日」的活動。

我們學校位於瀋陽大東關萬泉河的北岸，俗稱小河沿的地方。這萬泉河雖小，可是它的水流進渾河，由渾河而遼河，由遼河而流入渤海，再沿著黃海、東海、南海，與中國有名的珠江、長江、黃河的水，都一體相通了。

我們的校名卻因世局的變遷而數度更易：有時稱「奉天醫專」，有時稱「遼寧醫學院」，現在則受偽文教部的指令改稱「盛京醫科大學」了。不過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向重地名，如果說有位醫師是小河沿畢業的，國內國外都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同學了。大學的附屬醫院又名盛京施醫院，對男女病患分院收療，男院在東，女院在西，據說那是初創時期民智未開，不得不有此「男女大防」。現在風氣雖開，人們的心防依舊，只要有男學生多找幾次女護士，從好事者的眼角中都會溜出幾個問號。

防歸防，問歸問，十月初的一個傍晚，我又穿出院校分界牆的月亮門，通過連接兩院的小石橋，走到女院眼科病房的護理室，去找宛如。同時值班的另一位小姐，說要去量體溫立即走開。宛如也放下她正在抄寫的治療記錄，興奮而又急切地問：

「大哥！為什麼你要到哈爾濱精神病院去工作？我們都奇怪，你若有興趣研究精神病就留本院好了，何必跑去那麼遠？大哥，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常說一個人不應該忘記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立場，現在為什麼反想到日本人手下去做事？」

「你猜我是什麼意思呢？」

「我猜不到！我只覺得你這一次有些言行矛盾。當然啦，大哥是個聰明人，不會矛盾的，不過你走後就沒有人肯教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了，而且……我也希望知道大哥離開這裡的真正原因。」

「這個……」我遲疑著：「沒有什麼可說的，只是想換換環境。至於你們有事，今後可以找葛心竹葛大哥，他已決定留在外科，他會跟我一樣幫助你們……」

「葛大哥留在外科嗎？」

「已經內定了。」

「可是，葛大哥是葛大哥，你是你呀！」

說罷，她便用她那雙毛都都、水汪汪、溜明澈亮的大眼睛，又企慕又迷惑又責怪地注視著我。那是我一生所見最美麗最動人的一對眼睛，我的一位同班學友李庸，曾為迷戀這對眼睛成疾而死。他說，她用這對眼睛看你的時候，你不敢與她瞬息對視，可是她不看你的時候，仍像有強力磁鐵似地，吸著你的眼睛向她呆呆偷看。因此，我得到一個嚴厲的警惕：人若不能勝過一個誘惑，就應該遠離那個誘惑。所以很早很早，我便將我與宛如的關係，嚴格地禁足在某種界際上，除了必要，我不願與她做多餘的接觸。我承認我很怕見她那對攝魂奪魄的眼睛，更怕她有時向你投射出特殊的光芒。我這樣做，不單是為了保護我自己，更是為了保護我所身負的嚴肅工作。

我坐下以後，宛如一直客氣而又尊敬地站在護理辦公桌的那一方，使她正巧居高臨下。窗外夜幕深垂，顯得室內的燈光特別明亮，明亮得使人不敢抬頭仰望，何況還有宛如的一對眼睛！宛如現在輪值小夜班，小夜班是護士們最愉快的工作時間；白班事多人雜，大夜班睏倦欲睡，只有在小夜班時，做完了護理常規後，除了偶發事件，大部分餘暇可以閱讀小說，編織什物，更寫意的是還可以接待男友談心。我自己知道，我雖不是宛如的男友，但也有時利用這段時間來見宛如，或者與其他的女同志接頭。這也許給她們導致些流言，或者真在宛如的心扉上留下什麼幻影，但於我的工作

卻是很好的掩護。

我怕宛如問出更多的話不便回答，便從速告訴她：

「你先坐下，我今天來是要和你談談詩彥。你說她上次給你來信，曾提到我，而且希望和我再談談，我不知她的意思是——」

「是這樣的，我不是跟大哥說過嘛，詩彥是我從小的朋友，她什麼話都不瞞我，什麼事都跟我商量，可惜我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一點也幫不上她的忙。暑假你去泰城的時候，我曾把你的一切向她介紹，說你是如何偉大，有見地，肯幫助別人……大哥，你別笑，我說的是實話呀！所以，我就陪她去拜訪你一次。」

「嗯，以後呢？」

「當時你曾向我們說，青年人要面對現實，要解決問題，不可逃避！詩彥對你這句話記得特別清楚。因為她正有一個不幸的問題，就是她有個自己不願意的婚約，她無法跟她爸爸談，跟我談又沒有用，自從見你以後就很想跟你再談談，可是你不久就離開泰城了……真怪！和你接觸過的人，都對你有良好印象，也有一種特別的信心，大哥，你有什麼魔法嗎？」

「不要胡說！現在，我告訴你，你再給詩彥寫信時，就說她若有機會來瀋陽的話，我也很想和她談談。」

當我最後告辭時，宛如忽然神祕地悄聲對我說：

「大哥，你對詩彥的印象……很好吧？」

「真是見鬼！」我故意鄭重地：「我對誰不都是一樣？你不要誤會！」

回到大學宿舍，同學們還都在大飯廳裡上晚自修，心竹卻等在我的寢室中，暗暗地沒有開燈，一進門便聽他責斥地問：

「你小子跑到哪國去了？」

「醫院。」

「又去找孟宛如，溫你的宛如夢！」

聽口氣，似乎心竹正有問題，並不專是對我輕俏。我便即時問他：

「有事嗎？」

「是的！方才有個人來找我，」心竹壓低聲音說：「這個人叫任俠，是我哥哥在新京工大的同學，我哥哥被捕時他跑到關內去了，最近剛由後方回來。他找我有兩件事：一是問我要不要到後方去，因為那邊最缺乏醫生，去了一定貢獻很大。二是他回去的時候出國證有些困難，他想做個假的，求我設法幫他一點忙……」

「他是哪方面的人？」

「他說他是從西安戰幹團派來的。這次的任務是招訓淪陷區知識青年到後方參加抗戰。我答應他做假出國證事一定替他辦到；到後方去的事，我想跟你研究後再作決定。我的意思是乾脆就去，

不然，留在此地還能有什麼作為？難道我們要繼續做亡國奴，給日本鬼子做事？」

「這事要慎重考慮！」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我們是主張現地抗戰的。我們要在東北現地做抗敵工作，不希望有志青年去到後方。在後方少一人不算少，在敵後多一人就多有十倍百倍的價值。當然做地下工作的危險性，較去後方也要多十倍或百倍。面對我多年好友作此重大的人生抉擇，雖然受過多年工作熬煉的我，仍不免心神激動。因為這個問題正緊扣著我對他多年來一個情感上的暗結，平常我都有意迴避它，今天我不知該不該將它解開。

「這個，我想……」我仍在踟躕著。

「紀剛！」心竹鄭重而堅定地對我叫著：「我們本是無話不談的朋友，可是這些年我總覺得你一定有點什麼活動背著我。譬如說你並不像是真戀愛，可是你又常跟孟宛如這群女孩子們閒扯；你曾向嚴姐轉告我哥哥的消息，卻沒有直接跟我講。你既不講，我也就不便問。今天，任先生給我帶來機會，我很想邀你一同去後方，從軍也好，在民間醫院工作也好，一個人去實在太孤單！不然，你若有別的路線，請你告訴我，我可以重新考慮。這些年，從表面上看，你也許不以為我在想什麼，事實上，自我哥哥進去後，我沒有一天不在想：我應該做什麼？我應該怎樣做？因為醫學沒有畢業，所以未做決定。現在既然有機會能盡國民天職，能替哥哥復仇，我，我還能放棄嗎？」

「既然如此，我向你坦白好了！」

於是我暴露出我的工作背景以及與他哥哥間的一點內情。自然我先請他原諒，以前沒有向他說，並不是不相信他，怕他洩漏祕密，乃是我是否徵求他為同志一直在考慮，而按照組織的嚴格規定，凡是未吸收為同志的，對任何人都不可告知工作與組織。

說起來，人總是矛盾的，或許我自己有獨特的弱點。我從事現地抗敵工作已經四五年了，我仍有火一般的情感，但地下工作過的是鐵一般的冷酷生活，做的是鮮血淋頭的工作，時間久了，也偶有倦怠或逃避的念頭……

我常想：說什麼祖國祖國！革命救亡！現地抗戰！又說什麼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些神聖而漂亮的名詞，這些美好而使青年熱血沸騰的字眼兒，都是冷酷無情的釘子，一旦釘上我們……而且越釘越深！我們當然知道，這都是冷酷兇殘的敵人製造的冷酷時代所帶給我們的無情枷鎖。但誰會天生喜歡做這種工作？誰會甘心情願過這種生活？當我們年輕力旺的時候，誰不想追求青年人應有的學問、事業、愛情！因此，對於心竹，在理智道義方面，我應該早一點向他說明，使他也早一點參加工作，可是在友誼情感方面，我也想到「留下他吧！留下他吧！」

其實「留下他吧！」是心竹哥哥的話。那年暑假，組織大膽地在千山設立一個祕密訓練團，調訓東北各地區各部門的工作幹部。千山在遼陽縣南，萬笏聳秀，風景幽美，為東北最有名的旅遊勝地。一想起那次訓練，便使我回味不已，那種環境，那種情緒，給予我們幾十位團員無限的興奮與鼓舞。那時心竹的哥哥心超是長春地區青年部門的一位代表，在千山訓練團相見後彼此才知道。分

別時我曾和他討論到心竹的問題，他就說了那句話。當時我還不太同意他的主張，不久心超被捕，我才瞭解他說那話時的內心感觸。所以我對心竹略做結論地說：

「你想，伯母孀居，從小撫養你們弟兄二人，心超兄不忍讓你也一同犧牲，我怎能……」

「我哥哥說那話也不對！」心竹激動地：「要留就都留，不然，犧牲一個或兩個，對於老人家還不是一樣痛苦？」

「事實經過如此，討論無用。現在我已把話說明了，你是跟任先生到後方去呢，還是與我參加現地工作呢？還是由你自己決定吧！我已不便做個人的選擇了，我一切都要按工作的需要，聽組織的調遣。這次我到哈爾濱去的計劃，也是組織的意思。」

「哦，原來如此！」

「我參加工作這些年，已經過幾次風險，像你哥哥被捕一樣，我也可能隨時進去，所以你會了解這些年我對宛如不即不離的態度了。好在我去哈爾濱後，這種關係自然也就結束，不過在私人情誼上，我倒希望你能多照顧照顧她，方才在醫院時，我已經和她說過了……」

說罷，我長長吁出一口氣，好像滿腔淤塞，頓時清除，才感到說話太久，便從書架上取過熱水瓶，倒杯熱水來潤潤喉嚨。心竹也站起來，在地板上發出聲響地踱來踱去。趁我喝水住口的時候，對我說：

「你就是想照顧的太多，拖泥帶水！其實，我真奇怪……宛如究竟有什麼魔力？老李為她喪命，

你也……好啦！我們不談她，我還想多知道一點現地的工作。」

我也奇怪，宛如是個人見人愛的女孩子，在背地裡心竹也常向別人讚美她，為什麼老是對我說反話？現在我明白了，也許是他尊重我與宛如這點關係，所以不像別的同學那樣亂起鬨，也許他早已立志尋求工作，所以也不願接近女孩子，同時也有意地提醒我。

這夜，我竟失眠。

我本是個最能安枕的人，任何情況下我都能倒頭便睡。這在一二三〇事件時已經成了佳話，也幾乎鬧出笑話。千山訓練團後，我們的工作有飛躍的開展。當時敵人統率部曾有兩派不同的主張：陸軍主張北進。假如日蘇戰爭先起，戰線無疑地將落在我東北邊境，因此我們成立了準備動員委員會，爭取尚勇等十幾位偽軍團長及中上幹部，聯絡偽軍政部王強少將所祕密領導的真勇社，積極佈置，希能把握時機，展開軍事行動。我們也做了許多爆破、焚燒、散佈傳單標語等工作，配合醞釀，再加上個人衝動性的偶發抗敵事件相繼迭起，一時民氣蓬勃、社會風動。不料敵南進派政策獲逞，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七日偷襲珍珠港，發動敵所謂「大東亞聖戰」的太平洋戰爭。此種世局變化固然使中日戰爭匯合歐洲戰爭擴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中國垂四年之久的孤軍奮鬥有了勝負與共的盟邦戰友，但我們在東北從事現地抗戰的同志們，卻不無失望之感。因為戰爭雖擴大，戰線卻越發距我們遙遠，我們與政府的軍事接不上氣，我們也未得到有利的時機。這不僅使我們處心積慮的準備動員落了空，更要挺受敵偽特務機關為了安定「滿洲」內部，由對「渼猰」宣戰日起所展開的普遍

性多元性的檢舉。這次大逮捕，敵人稱為真星事件和一二三〇事件兩部分，我們合稱為一二三〇事件。在這次事件中，我們的組織也遭受破壞。我們是教會學校，英美籍教職員此時皆以「敵僑」身分被拘俘，方儀和鍾鳴兩位女同志也同時受逮。我們當時不知她們是因親「⿰犭美⿰犭英」關係，還是另有其他線索。負責人為了切斷火線保衛組織，緊急通知我們有關的同志到較安全的處所做暫時的掩避。危報頻傳，一宿數驚，那一夜我們竟奉令做三次遷移。我因為是初次應變，還不太認識地下鬥爭這種短兵相接的嚴重性，加之火氣十足，天地不怕，對於這種躲躲藏藏的應變措施，頗不以為然。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找個床頭便睡，不和他們去研討「問題」，撤走時還得他們把我撼醒。最後一處，他們乾脆不准我睡。

「不睡做什麼？」這些驚弓之鳥，我想。仍然坐著打盹。

「等消息吧！」有人說。

「就這樣等著？大眼瞪小眼？沒有意思！」似乎是羅雷。

「那麼，做個測字遊戲吧，測測今夜的命運如何！」

「愛睡覺的先說！」不知是哪一位提議。

「饒了他吧！」谷音的聲音。「我看牆上這個日曆，印著『滿洲國康德八年』這個康字不錯，大家就測測這個康字吧！」

「不錯！不錯！福壽康寧，是福不是禍！」有人接口念喜歌。

「這個字象不好，」仲直說話了。「你們看，這是逮捕的『逮』字沒有『走之兒』，卻躲在『广』形的房屋裡，我想大家應該到外面去躲躲，如果再呆在屋子裡，怕有被逮捕的危險！」

說來也巧，奉命善後的同志，因為晚走一步，竟真被追蹤而至的敵人捕去，其中就有谷音。

今晚，我無論如何也睡不著，越睡不著越想起許多事。我知道以前應變時能安然入睡，因那是外在的威脅；今天，我是失掉了內心的平靜。這半年來，為了維持內心的平靜，我著實是費了很大的定力。負責人本擬先派我到後方去受訓的，一因我擔負的工作無合適的接替人，又考慮到我即將畢業，在最後一個學期突然遠行容易惹人注意，所以改派仲直和羅雷前往。他們對學校一個稱病休學，一個說去平津探親，便祕密入關潛赴後方去了。不久，負責人又找我去對我說：

「我想要你畢業後，設法到哈爾濱去做事，以便加強北部的工作，你有困難沒有？」

「組織有此需要，我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民國三十一年冬初的事。我們學校畢業同學，大多數是留在教會醫院或開業，沒有人肯到「滿洲國」機關去做醫生。這時班裡同學都在分頭填寫志願書，有的申請留在校本部做研究，期望在學術上有所貢獻；有的希求施醫院中的職位，以便充實臨床經驗。這兩條路我都喜歡，以我在校的成績，我也可以任意選擇，但我卻拜託駐校的日本顧問吉田，向哈爾濱偽市立精神病院推薦。消息傳出，院校譁然！吉田顧問卻十分高興，除以顧問名義由大學當局出具公文外，還另外寫了一封私函。這件事進行的雖然順利，但我在處理社會關係上，在調整個人生活心理上，並非平靜無波，

毫無困難。尤其對於那些對我關心而又不是同志的人們，譬如宛如吧，我實在難於應對，像今天在醫院裡對她那樣的回答，連我自己都不滿意。

提到宛如，這也是我今夜失眠的主要原因。她是純女性，溫柔善良，可愛迷人，但她不適宜做工作上的同志，此時此地，自然也就不適宜做人生伴侶。可是一時又割不斷對她的關懷，若是仲直和羅雷仍在現地，或者谷音仍在外邊，遇到這種鬧心事總可以和他們叨嘰叨嘰，即使是受羅雷奚落幾句也是好的。我們幾個人的個性原是不同，仲直不愛講話也很少鬧情緒，鬧情緒而不說出來，也就無人知道。谷音和他相仿，同屬內向，方儀就是經他徵求加入組織的。方儀與鍾鳴雖受刑笞恐嚇，都因應對得體，經幾個月因禁生活後終獲釋放。谷音卻因洗脫不開被捕場所的人事關係，再加上文化界案件的牽連，雖保護了我們，自己卻留在獄中繼續受苦。

記得那天，我們舉行首次的劫後會議，我將與組織重新接頭所得知的案情向大家報告。據負責人說，真星事件發生於十二月中旬，由齊齊哈爾鐵路局的王姓職員開始株連，一二三〇事件則是於十二月三十日由長春財務職員養成所的陳某，擴大到其他大專院校。最初敵偽只是因太平洋戰起厲行鎮壓政策，對平時調查所得的「要視察人」加以拘禁，同時對生氣蓬勃的文化界做次整肅，不料輾轉追查發現了我們的龐大組織。這次事件太大太廣，歷時三四個月之久，有兩千多人入獄，我們吉、黑、哈、長、日本等地重要同志多人被捕，未蒙難的也身分暴露，遭受通緝。青年部門中，只有我們學校破壞最小，所以負責人特別問候我們，今後對我們也特別加以期待。

「怎能弄到這種樣子？簡直是開玩笑！」羅雷痛惜地表示不滿。經我再做詳細分析後，他又有些不耐煩地問：「今後要怎麼辦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聚會的主要目的，」我解釋著：「在組織那邊，我看過負責人最近對幹訓班所頒佈的一本《告全體學員書》，其中包括現地抗戰論與革命幹部論兩大部分。要大家在這次慘痛的教訓中有更徹底的覺悟，負起做革命幹部的責任，並強調抗戰建國現階段，我們一向主張的要在東北現地從事革命抗敵工作的理論與信念。另外由社長主編的《組織篇》、《宣傳篇》、《祕密篇》等工作方法與技術方面的幾本小冊子，也是主要教材。負責人還特別決定，現在要用化整為零的方式，重新整備組織。過去我們的組織，對同志統一稱為『東北抗戰機構』，這雖不是中央所建制的名稱，但這名稱有其鄭重性、全面性，可以增強工作的號召力和同志的信心。可惜在這次案件中已被敵人發覺，不便再用，所以負責人正式宣告解散這個機構。今後為加強對組織與同志的保衛，要一個一個分別成立小的抗戰團體，各有各的性質，各有各的名稱，如讀書會、研究社、俱樂部等；在工作上步調一致，組織上互不關聯；發生破綻時，限於一個單位，不引起敵人重視，也就不易累及整個組織。因此我們也要再擬一個團體名稱，原有同志可依個人意願決定是否再參加，願意的要重新宣誓。換句話說，大家還幹不幹，要我們再表示一次意見。」

「你想不幹嗎？」羅雷即時問我。

「我看大家的意思。」

「大家是什麼意思呢？」他又衝著仲直。

「這，不必研究了。」仲直沉靜地說：「我想我們中間只要有一個人肯說不幹，我們就都可以跟著不幹了。但誰能說這句話呢？只是谷音不在這裡，不知道他還幹不幹！昨天我與方儀見面，她們剛剛出來就要求繼續工作，她們都不想休息，我們還能不幹嗎？至於團體的名稱，也不必另擬了，仍用我們原來的覺覺團好了，也正好紀念谷音。」

原來我們學校是英國教會創立，「滿洲國」成立後由於英日尚有同盟關係，敵人勢力沒有立時進入學校裡來，多少有些租界地的氣息，至少在校內受不到日本教官和日本同學的無理欺凌，像其他敵偽公立大學那樣。因之大多數同學們也似乎沒有做亡國奴的感覺。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最缺乏刺激革命意識的小環境！但我們當初為何要發起祕密組織從事抗日活動？主要是因我們個人人格的自覺。我們覺得我們既是中國人，我們就應當做這種事。 國父曾說過「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的話。我們雖不敢以此自況，但我們可以盡自覺覺他的責任，所以經谷音同志的提議，我們就決定用「覺覺團」做名稱，後來我們全體參加「東北抗戰機構」，這個名稱就置而不用了。現在我們又以覺覺團名義繼續工作，繼續成長，而又承擔了重任！

我不否認我有其他青年同志所共有的毛病。工作需要理智，生活卻包含著感情。初識宛如時，我未嘗沒有英雄美人的浪漫構想，一二三〇事件卻驚醒了這幻夢。負責人曾說：「青年同志應加戒慎的，是在工作中鬧情感問題。」我們也逐漸認識到：跟非同志戀愛常常是工作的阻礙；在同志中

找對象，對工作有時也不太理想；最理想的工作人員是一切不談。我所擔負日趨重要的工作責任，自然能使我高度發揚理智、壓縮感情，只是還沒有能將它連根肅清。

當我與詩彥在泰城初次會面時，我立刻判定她比宛如堅強。她將是一名很可造就的婦女工作者，而且在直感中，她也比宛如更適於做人生的旅伴。只因那時我集中精力於瀋陽的工作，對詩彥見過也就放下，並未再詳詢她的細節。現在奉命加強北部工作，在我所計劃開展的工作對象中，也特別把詩彥列入。可是今天，聽宛如說詩彥還有婚姻問題等等，那麼，對於她，任何方面，我都不應設想了。

02

門診完了，我特地到尚智里去聯絡。尚智里是組織在瀋陽一座祕密機關的化名，地址在小西城門內，由伊正負責駐守。一般社會人士所知道的，那只是博智書局——一間普普通通生意不太興旺的小小書局而已。對於我們工作而言，那簡直可以稱做是革命聖地之一，因為組織的宣傳文字中心——東北通訊社和東北公論社即設於此。

我從書架中取出一本雜誌，一面翻閱一面察看書局內的情況。這時，書局內的顧客很少。伊正還坐在櫃臺後面看他那永遠看不完的百科大全，另一位扮做小夥計的惟亮同志，也正在用抹布揩拭書架上的灰塵。我鑑定了安全訊號正常，便閃身上樓，伊正也接著跟上來。

伊正是組織跟我們的聯絡人，以前都是他到校內找我，最近組織將尚智里對我開放，有事也來找他。我向他報告我向哈爾濱進行職業很順利；心竹決定參加覺覺團，請他規定時間代表組織前往監誓，在我去哈後，他可以繼我擔任聯絡。還有對任俠來找心竹的事曾詳加研究。伊正也交給我幾份新頒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抗戰建國時期現地工作大綱，共二十一條，是重新整備組織後劃階段的工作指針。本大綱在原則上提出十項工作要旨，且把「建樹革命風氣」僅次於「強固現地組

織」，列為第二項。在工作性質上列舉十大綱目，於組、訓、宣、調外，增闢文教、民運等綱，明示新的重點。在工作對象上仍劃分為：政治、協和會、軍事、警憲、紳商、交通、農民、工人、蒙旗等十二部門。惟在工作進行程序上更有嚴格規定，其內容亦各有不同。如：

十六、工作之進行程序，依其方式分為三個階段：

（一）祕密階段；（二）半公開階段；（三）公開階段。

隨東北內部工作之加強及抗戰軍事與聯合國攻勢之展開，各階段依次邁進之。

十七、祕密階段，不問工作之地區綱目，均須保守人事物地時之機密，限制組織之橫的關係，一切採用祕密方式。工作之重心在於建立點與線的基礎，發展抗戰團體，滲透敵偽機構，培植工作幹部，保育革命潛力，鼓吹敵愾情緒，擴展文教活動，加強心理作戰政治作戰，推行對敵偽之破壞消耗。

十八、點與線的基礎確立，反攻之前哨戰挺進東北，即為進入半公開階段。

十九、半公開階段依工作之地區綱目，分別其祕密與公開之限度。工作之重心在於建立面的基礎，確立各級組織，強化基層單位，扶植政府機關，準備軍事力量，擴大宣傳，鼓動風潮，加強對敵偽政治與經濟鬥爭。

二十、面的基礎確立，游擊戰發動，總反攻之軍事臨近東北，即為進入公開階段。

二十一、公開階段之工作，於軍事活動及收復之區域，採用公開方式；於敵人佔領區域，仍繼

續半公開之活動。工作之重心在於動員全體民眾，策應軍政工作，擴展戰鬥，驅逐倭寇，肅清漢奸及反動份子，實行復員，促進憲政，以達於東北完整收復，抗戰勝利，建國成功。

大綱序文有謂：「我東北於全國為邊陲，於邊陲為要塞。乃遺孽跋扈，強鄰猖獗，國魂不張，民運未啟，又復沉淪於倭寇鐵蹄之下，垂十年之久。吾人深知暴敵不足畏，強權不足懼。國家之存亡，民族之興衰，唯在吾人能否擇善固執，自強不息，一心一德，始終無間，以團結服務奮鬥犧牲之精神……」

這個大綱又是經惟亮同志製版，惟亮小小年紀，製版技術為眾同志所不及。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本是喜歡音樂的，可惜組織未給他準備鋼琴，他只有把手指的工夫全用在鋼板上。因此他用鐵筆所寫出的鋼板字，真像一篇交響樂章的音符，騰躍飛舞，閱讀時更加醒目動心。

工作交代完畢，時間尚早，我們又談些閒話。伊正燃起一支煙，也把煙和火遞給我，我們中間的空氣更輕鬆些。因此他問：

「你在婦女工作方面很有成績，聽說還有『婦女之友』的美稱，可否對這方面的心得，說給我聽聽。」

對於這個問題，倒真使我難於回答。

「見笑了，」我說：「我只是勉力而為罷了！如你所知，在我們十二部門工作對象中，我身為

讀書青年，自然要做本位工作；又因為我好寫點文章，與文化界人有些來往，所以也從事些文化部門的活動。至於婦女工作，不過是因利乘便：我們學校裡有女同學，醫院裡有護士，附近又是坤光女中，我就環境的自然條件做些活動是有的，成績還談不到。可是有些同學不明真象，因此就諷刺我，管我叫婦女之友。譬如男女同學間有什麼辦不通的事，便有人說：『讓婦女之友辦吧！』話裡的意思完全是調侃。」

「嗯，」伊正捺滅了煙蒂。「別的困難沒有嗎？」

「你是，指哪方面？」

「客觀的或主觀的。」

「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我是說當事人方面，別的小組曾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青年男女交往，總不免發生工作以外的麻煩，你如何擺脫或防止？」

「這個，當然是件麻煩，好在我還沒有碰到。我以為這是一個認識與訓練的問題，認識深刻可以避開這種困難，訓練成熟可以勝過這種困難。我們自己也曾討論過，結論是以革命者冷酷的熱情來馭導年輕人青春期的夢，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你想這是不是高調？」

「高調？我不敢說。不過這個論調確是很高！」

伊正同時報以淡漠的一笑。他那淡漠的笑使我有一種很特殊的感覺。他似乎什麼都了解，什麼

都知道，什麼也不贊成，什麼也不反對，因此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回到醫院，已超過午餐時間，我正想通過中央走廊向販賣部行去，忽聽後面有人叫道：

「大哥！大哥！」

毋庸思辨，那就是宛如的聲音。我駐足回頭，穿著本院特式制服的她像藍彩銀蝶般地自甬道中翩翩飛來，紮著蝴蝶結的兩條油黑髮辮在雪白的衣襟後面飄蕩著。

「大哥，」她略帶嬌喘地跑到我的面前說：「我報告給你一個好消息，今兒早晨我接到詩彥的信了。她說再過一個禮拜就帶她的小妹來我們醫院治眼睛，同時還要辦點別的事情，這一次她要在瀋陽呆上幾天，我們大家正好多玩玩，你們願意談也好談個夠！」

「辦點別的事情，什麼事情呢？」我倒注意那句話。

「她沒有說明，這是她的信，我要上班去了，你自己看吧！」

她遞給我一個淡紫色的信封，大眼睛調皮地一轉，滿面春風地向著眼科病室跳躍而去。望著她那輕盈滑去的背影和那微微顫動的臀波，我不禁無聲嘆道：「這孩子就是這般天真無邪！」同時心底也泛出一絲歉意。

她的朋友自家鄉來，她固然應該快樂，她把她的朋友介紹給我，似乎她也更感高興。她以這種態度對待我，儼然是親兄妹的關係，倒是我自己有時候誤會了她。我叔叔以前也在這個醫院做過事，

因為國聯調查團來瀋時，他同當時朋友向李頓爵士提供日本侵華資料惹出亂子後，便隱避到北方的泰城開設普濟醫院。不數年成了該處的名醫。我讀大學曾受他經濟上的支助，寒暑假期有時也到那裡去渡假，因此結識了詩彥的父親黎經理和宛如的爸爸孟長老等街面上的人。據叔叔說她們小的時候，都曾在她們屁股上打過針的，現在她們可都長大了……

一次，散禮拜時，在教堂門口，我叔叔引我拜見孟長老。慈祥長者便親切地說：「好了，我跟你叔叔說過幾次，你來的時候讓我看看你。沒有別的，我的宛如也到你那兒讀護校去了，我就那麼一個，沒兄沒弟的，跑到那麼遠叫我實在不放心。今後請你多多照顧。我跟你叔叔是不分彼此的，那就一切拜託了。」

真是有負長者之託。當時我只是把它當做一句社會應酬話，回校後並沒有主動去照顧她。有次我在後樓上助理主治醫師給幾位患者抽胸水、打氣胸，方脫下手術衣，甩掉口罩，走進光室去透透空氣。光室是為肺科患者做日光浴用的，離病室很近，可是別有洞天。這時正是患者上午臥床靜養時間，光室中沒有病人。透過大片大片的玻璃正可以與穹蒼推心置腹，舒展一下幾個月來冬蟄似的窒息。護理長鍾鳴忽然帶領著一個袖口上繡著一條紅槓的小護士來說：「這位就是紀大夫。」

鍾鳴下去後，這位小護士一時愣在那裡，接著突然激動地對我叫道：

「紀大哥，我是宛如，我爸爸幾次來信都叫我看你……」

初次見面就叫我大哥，叫得那麼自然，那麼甜！也就因她那樣對我坦誠的稱謂，使我不得不把

她視做妹妹，而別人也就真以為我們有些瓜葛的親屬關係了……

由於我的關係使宛如認識了許多大哥，由於宛如的關係也使我撿到許多妹妹，天知道，我這個大哥究竟是個什麼角色。

在販賣部裡，一面想起這一段往事，一面細讀詩彥的來信。那是一筆與宛如完全不同的字跡，剛毅、堅定，也十分秀麗；若字如其人，瀟灑的線條確如其表，內在的性格也是如此吧！這一餐本來十分簡陋，可是我吃得津津有味。

據負責人指示，任俠原是長春工大一位很活躍的同志，與心竹的哥哥心超同一小組，一二三〇事件後失掉聯繫，不知他逃向何方。現在聽說他從後方回來，感到十分高興。第一他高興的是懸念多少年的患難同志，畢竟有了平安的下落。更高興的是這位可稱得上漏網之魚的青年，在經過大打擊大流亡的苦難後，還有志節有勇氣重新冒險犯難地回到東北為國事奔走，與那些不離東北現地繼續為抗敵工作而奮鬥的同志們，同樣使他安慰；因為他看到了他的理想與實踐沒有落空。他派我代表向任俠表達他的關切與慰問；同時也轉告任俠，他離開現地久了，對敵偽的現時環境難免隔閡，一切都須謹慎注意。而我們對任俠雖盡力協助，但他既不在現地工作，也必須保持應有的祕密。

我與心竹約定在萬泉園中會見任俠。

萬泉園——俗稱小河沿公園，因萬泉河蜿蜒園中而得名。這座曾號稱瀋陽市民的第一遊樂場所，就在我們校區對面。九一八前，她擁有北平天橋的把戲，上海大世界的雜耍，南京夫子廟前的市囂

和秦淮河畔的畫舫……真可謂百藝雜陳，五光十采，盛極一時。九一八後，她就成了棄兒，敵偽不再垂青她，只注意發展日本人居住區的千代田公園和長沼湖，把萬泉園裡的奇花異草也移到那邊去栽植，遂使廣大的瀋陽市民在自然環境上也無處舒心……

我們剛入學的時候，小河沿還殘留些昔日的光輝，我們下課後常到那裡去散步，如同自己的校園一般。現在大部分的景象是河道淤塞，樓臺失修，衰草枯楊，獸死欄空了。

不！還有一隻黑瞎子關在假山前的舊鐵籠裡。我站在鐵籠子旁，欣賞這位狗熊大哥像冬烘先生似的在裡面踱著方步，一圈一圈周而復始。我在等待。這時節，初冬黃昏，冷風襲面，我們同學很少有雅興再到這裡來遊逛的了。

心竹伴著一位身材魁偉的青年，自橋那邊順著圯坷荒蕪的水泥路漫步而來，他們走過去了又轉回，第三次走近我時，那青年人留下，心竹繼續前行為我們在遠處巡風，天色也逐漸地暗了。

我與任俠接談約一刻鐘，我轉達負責人對他的關懷與勉勵，也請他向流亡到後方的其他同志致意，希望他們不要因抗戰軍事的低潮以及其他社會不良現象而灰心，隨時隨地要為家鄉的命運而努力，因為他們昔日的同志們仍在東北現地險惡的環境中艱苦地奮鬥著。

最後，我問明他預定再度入關的日期，告訴他一切料理妥當後，在起身前夕可以到心竹處取他所需用的「出國證」，同時也會贈助他一筆路費。

心竹送走任俠，在達爾罕王府門前會合後，我們一同回學校。

「任俠說，能不能早一點將出國證交給他……」心竹轉告我任俠的願望。

「不可以！」

「難道組織還不信任他嗎？」

「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問題，這是工作技術問題。」

我即時向心竹解釋。我們組織要求共信、互信、自信。我們同志更是生死與共、肝膽相照的關係，平時沒有不遵守紀律的。但一旦被捕了，他在什麼情況下被捕？案情輕重？就大有不同。若是案情重或有物證，便難於應付審訊。因為敵人既有明確判定，你雖堅絕不供，他們也必要問出結果而後已。這種情況下他們所施行的酷刑拷打，就不是一個同志憑藉革命精神所能勝過的；他自然不會什麼都說，但很難什麼都不說。反之，案情較輕，敵人沒有可資判明的資料，如能堅決否認，連挺幾次刑後，敵人就會放鬆，容易應付。所以我們平時要做好變時的準備，變時要講求應變的技術，案情輕的力求擺脫，案情重的亦應保持最小限度的破壞，必要時更應主動地作壯烈犧牲以維護組織與同志。負責人說：「我們最佳的保衛，乃在平時的保衛，即是使工作不出破綻。」也就是說，革命本身是一件有危險性的工作，我們不能因怕危險而不做，也不能因不怕危險而不講究技術。任俠的出國證是在他要走的時候才有用，如早交給他而引出麻煩，便不是最佳的保衛了。

「哦，哦……」心竹有所領悟地哼著。

「就連你與他的關係，也要約定清楚。如他遭敵偽跟蹤，而且發現他到學校裡找過你，一朝出事，你們中間的說法不符，你將如何脫卻關係？」

「好，下次再見他時，我一定和他弄清楚。」

「嚴姐的近況怎樣？」我問心竹。

這幾天，由於心竹參加工作，使我時時想起心超，想起心超就不能不想到嚴姐。

嚴姐是心超的未婚妻，但他們並沒舉行任何儀式，嚴格說起來，只能算是女朋友。當他倆定情的那年冬天，心超竟然被捕，於是她轉到遼陽育才女中去教書，開始她對他懸念與等待的生活。她常常到瀋陽來找心竹，因此我也認識她，也跟心竹同樣稱她嚴姐、嚴姐了。

嚴姐原不知心超的工作背景，也不知我與心超的特殊關係，所以見面時，我也只能以心竹的好友立場向她進言勸慰，當然這絲毫無補於她內心的悲傷。心超定讞後，一切都很好，求仁得仁，作為革命者，沒有比住在獄中更心安理得的了。惟一不安的是他對嚴姐那份深深的遺憾。十五年，說長不長，它只不過是花甲人生的四分之一，但由二十歲算起，它可是青春的全部。雖然沒有人相信「滿洲國」還能有十五年，當事人卻不能不往壞處去想。心超幾次自獄中帶出消息，託我轉告嚴姐「不要等了！不要等了！」這雖是私情，對於一個真實的人生而言，我覺得比工作上的責任更感受託之重。

我曾特地到遼陽去看她，她強做歡顏地歡迎我這偶然的來客。我們從高麗門側走上城牆頂上的

馬道，倚著圮堞頹垣俯眺城腳下的太子河，夕陽斜照，蒼茫中可以遙望到東京城的舊址。據說：那才是清朝真正的發祥地呢！

據說：先有遼陽，後有瀋陽……

據說：鐵打的遼陽，紙糊的瀋陽……

時代變了，日本人並沒有從這自古兵家必爭之地下手，炮火卻先落到瀋陽的北大營，溥儀雖再登九五，卻無力恢復他祖先的光榮……

我們不是郊遊懷古，我們只是利用這傍晚時的一點清靜。經過較長時間的一段沉默和三言五語的閒談，我終於說出我不得不說的話。

「嚴姐，我還有一點消息，是關於心超的。」

「什麼？心超？他——」她愕然。

「是的，是心超兄的。這消息是間接又間接的。我有一位朋友，在長春認識一位看守，是心超兄拜託那位看守帶出的消息，為了大家的安全，他們不願我說出他們的名字。但這消息是可靠的。」

「他好嗎？」

「一切都好，只是不放心你！」

「他應該放心的，他應該放心的……」她喃喃地自語著。

「他不是這個意思。他說十五年太長了，未來的日子還不知道有什麼變化。現在還不准接見，

不然，他會親自對你說，希望你，希望你不再等他。」

「什麼？不等他？」她茫然地向無邊的黃昏發問。然後又面向我：「紀先生，你說我能不等他？」

「我是個男人，我懂得男人某些心靈上的感覺，如果你如此的等下去，會更增加他精神上的痛苦。」

「你不是女人，所以你無法了解：你想我若不等他，我的精神會更加快樂？」

「這個，我不知道如何說，總之男性最大的痛苦，便是對不起無辜的女性。心超兄在獄中最煩心的兩件事：第一是對不起他的母親，但是母親生了他，有啥辦法；另一個便是對不起你。他說：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你也應該自由。」

「這些話請你別再說了，你以為女孩子的心可以像無頭郵包似的投來投去？我告訴你，我最不滿意的是他不該把他所作的工作向我隱蔽，我若早知道，也許事先會替他擔些心，在事件發生後，我就不會如此焦急難過了。」

「唉！」她吁嘆一聲，又繼續說：「過去的事不必提了，今天我只有原諒他了！」

「嚴姐，」我也滿懷悽楚地說：「心超兄的誠意，你應該多考慮。」

「好吧！紀先生，我考慮考慮，可是，你能否把我的意見轉達他？」

「假若是句否定的話，我就不必冒險傳達了。」

「否定？誰能否定誰呢？紀先生，你也許不知道，自從我認識心超，我就……」

接著她說了很多的話，像是對我訴說他們相交的經過，以求我對她現狀的了解；又像是做自我回憶式的追尋，以忘卻她此時利刃穿心的創痛。她都說了什麼，我已記憶不清，最使我難於忘懷的，是她那芙蓉桃李春風面，卻凝結了一層層秋天的霜，懸在睫毛間的淚珠兒，久久不肯落下，儼然一串串冬日屋簷下的冰滴。

她考慮了，也有了行動的表現。

一個月後，她寄給我一封信。信上說：

這個週末，我把心超的母親接到我這兒來住，從今以後，我們就住在一起了。現在，我們兩個受創傷的女人，正好相依為命；伯母既無法拿別人的兒子當自己的兒子，我就再自由，也找不到第二個心超。十五年、二十五年，都無所謂，只盼望心超能保重身體平安回來，也就對得起我們了！

這一對患難情侶的苦痛，深深地浸潤了我。一想起嚴姐冰凝霜結的面影，比李庸之死更冷縮了我對任何善良女孩子所滋生於心底的愛戀。

心竹宣誓後，使我對這個苦難的家庭更增加感情上的負擔。我既不能對心竹奪彼匹夫之志，則只有希望他不出事，讓他不出事，幫助他在工作上積極學習。我把現地抗戰論，以及幹訓教材中有關工作技術的小冊子，統統交給他；尤其對如何避免變局、應付變局的《應變篇》，希望他多多研究，牢牢記住。

03

物理學上有謂：一物所受的壓力越大，其反作用力亦越強。人類心理的欲望也是如此吧！

我很自滿，也很驚奇，我的自然的日趨成熟也日趨強烈的青春欲望，居然能在歷年工作折磨和日趨沉重的工作責任所熬煉成鋼的理智控制下，那麼平穩、那麼凝定、那麼守規矩！

詩彥果然來了，那一天落著小雪。正在落雪的天是溫和的，空氣也特別清新潔淨，只是落在地面上的雪花被車馬行人踐踏，溶和著地面上的塵土，把馬路弄得泥濘黏滑，人走在上面就要特別小心自己的腳步。

詩彥住在西華門外的中央大旅社，我與宛如一同去看她，一見面，她們就打成一團了。

「死詩彥，說來說來，現在才來，你可把大哥想壞了！」宛如一手拉著她的衣袖，一手指著她的鼻頭，向她數說。

「什麼？」我聽宛如如此調皮，太不像話。

詩彥望我一眼，即時反問她：「小宛如，你簡直是胡說！有你在旁誰能想我？」

「你別糟蹋我，你不信，你問問大哥。」宛如故意氣忿地對著我：「大哥，你說句老實話，你是不是說過你想她？」

「宛如，別說笑話，詩彥剛剛來……」

「你說呀，大哥，你是不是說過那句話？」

「宛如，我只是說我想見見她。」

「那還不是一樣？你說想見她和你想她，不都是一個想字！」宛如理直氣壯地。

「好啦！好啦！」詩彥說，「大哥是客人，我們還沒有請他坐哩！若是你一個人來跟我搗蛋，我非把你趕出去不可。大哥，請坐請坐。」

「我知道，你是歡迎大哥不歡迎我，可是，大哥不來我也不來，大哥不走我也不走，你趕吧！」

宛如說話又帶條尾巴，詩彥未再接腔，我也只好由她。

這個大旅社，在城中也算數一數二的了；可是和所有旅館一樣，房間並不太大，用具也古老簡單。我就近坐在牆邊沙發上，她倆分坐在床沿的兩端，床裡正睡著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那當然是詩彥的妹妹小蓉了。

大家都坐好，乍相逢時那種歡愉興奮的情緒也平靜下來。詩彥似乎比較成熟而設想周到，除了茶房送來的熱茶外，她還準備了兩盤糖果茶點放在茶几上，為的是歡迎我們。宛如取去花紙包裹的糖塊就吃，我隨手拿些瓜子，一面閒磕，一面傾聽。

「詩彥，」宛如問：「小蓉的眼睛怎的了？這樣遠你帶她來瀋陽治病？」

「沒有什麼，」詩彥不以為然地回答：「父親本來讓我帶她到哈爾濱去治，我說南滿的高墨泉和北滿的石崢嶸雖然同樣有名，可是石大夫我們不認識，不如到瀋陽來找你，你正在高大夫的眼科部上班，一切好有照應。」

「哎喲！你別捧我了；我只是個小護士，我有多大的光？要請高大夫親自給她治病，那你可得求紀大哥。」

「紀大哥，當然要求的。」

「其實這件事還用不到我，在病房裡自然得由宛如看顧，在門診和手術室，那就得請葛大哥照應，我想幫忙也伸不上手。」

「什麼？」詩彥還不認識心竹。「葛大哥是誰？」

「哎呀！葛大哥就是葛大哥，他是紀大哥最好的朋友，現在正在眼科上班，明天到醫院就見到了。」

「對了，」宛如又對詩彥說：「你來信說是還有別的事情，你也沒寫明，害得大哥問我我也說不清，我只好把你的信拿給他看——」

「宛如，你怎好把人家信拿給人家看？」

「人，都可以見面，信，看看有什麼關係？大哥，下次你把信還給我，就當你沒看。」

「我是說給你的信是隨便寫的，潦潦草草，怕大哥見笑！」

「好啦！到底你有什麼事情呀？」

一抹暗雲飄過詩彥的眉梢，羞澀從她的耳根升起，踟躕半晌，才感嘆的說：「不必談了！」

宛如沒有注意這些，竟調皮地：「你若不談，我就明白了，要不要我替你說出來？」說罷便湊到詩彥的耳邊小聲問了一句。

「你什麼都知道！」詩彥對她申斥著。

「我只是猜想嘛！大哥，快向詩彥道喜吧，我們都有喜酒吃啦。」

「你就貪圖吃喜酒，不知道人家有多難受。」

「你還是不願意？」

「我幾時願意過？」

宛如被搶白而沉默下來，室內空氣忽然滯悶。

我感到我應當說話：

「詩彥，結婚是大喜事，自然應該高興。不過關於你的處境，我只聽宛如說過一點，詳情不太了解，聽你方才的說法，好像仍大有問題。據我所知，我們這一代青年所遇到的婚姻問題，有的是觀念上的，有的是實際上的，不知你的是屬於那一方面？」

「兩方面都有：在觀念上，我反對；實際上，我也不喜歡。」

「如果只是觀念上的，我倒想勸勸你，我們是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我們都願意自己主宰自己的終身，可是偏偏老人家替我們先做了主；若是完全處在舊時代裡，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不滿意也只得忍受；但不幸我們又受過新潮流的洗禮，心中有了成見，總以為父母之命是舊式的，所以就不高興，越不高興就越覺得不合理想；其實想開了，也許煙消雲散，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所謂美滿的婚姻，主要是當事人兩方性格和志趣的適應。只要兩方當事人的性格相合、志趣相投，互相喜歡，雖然是舊式，仍是美滿的。因此你現在認為這宗婚事不理想，但結婚後，也可能很愉快如意。」

「你不知道，大哥，我就是討厭他！」

「這個——」她說不喜歡他，而且很堅決，我也就無話可說。詩彥卻續加說明：

「這些年來，我不同意結婚，他心裡一定明白，他是一個中學教員，也應該有所表示；可是他就不聲不響，一味在拖，你說他討厭不討厭？」

「事實上，拖延婚姻的，實在是你。」

「那，他也應該不同意我拖，提出解決呀！」

「這個，你要知道，像你這樣的對象也是很難再遇的。也許他只是在等待，等待你回心轉意；而且，時間對青年男人是比較有利的，可是對於你就不同。要想解決，還是由你這方面提出，才是辦法。」

「我跟我父母鬧過多次了。我母親做不了主，有時替我求求父親，有時幫父親勸我，沒有辦法

時就陪我一同哭。我父親有時候也很同情我，但他為了顏面不肯出頭。這次對方催娶甚急，父親給我一大筆錢，叫我到哈爾濱去備辦妝奩，順便帶小蓉看看眼睛。父親的意思是盡量在物質上使我滿足，以補我精神上的不快。我想來想去，還是應該再想辦法……大哥，我知道不應該麻煩你，但我總要找一個人商量商量，我又沒有別人可找……大哥，假若你也沒有辦法幫我想，那我只有回去背十字架了；但是我實在不甘心……」

面對這位少女痛苦的傾訴與無告的求援，頓使我百感紛陳。單純為了助她脫離不合理的婚約束縛，我也應該幫她出出主意。但她畢竟與我接觸太少，對我的認識不會太深，她卻把她的終身大事與我商量，使我不能不敏感而想到我在她心中所佔的地位。假若她另有目的，那就麻煩了！用戀愛做工作，用工作做愛情，都是組織的禁律。我必須開脫、了解、澄清。

「詩彥！」我很鄭重地說：「解除一個不合理的婚約，在現代中國，本是極簡單的事。可是我們現在是『滿洲國』人，滿洲國假王道復古政策，保守舊風習，不提倡新思想，所以現時社會對要求解除婚約的人，不太有利……」

「我要奮鬥，必要時也可以出走，我父親給我的錢，足夠我走到任何地方去！」

我說：

「出走是逃避，逃避雖是辦法，卻不是最好的辦法。假若你堅決要解決此事，還是想個辦法正面解決。」

當我與詩彥聚精會神研究辦法的時候，宛如不知如何插嘴，感到很無聊。她本身就是孩子氣盛，所以就斜依床上撫弄小蓉去了。小蓉的睡相真甜，我若不是與詩彥用心談事，也很想上前去逗弄一番。

逗弄撫摸，把小蓉弄醒了。這孩子也真聰明，看看詩彥，望望我，便對宛如說：

「孟姐姐，那是紀大哥吧？」

「嗯，你怎麼知道？」

「我姐姐說的。姐姐說到瀋陽來，能看到你，也能看到普濟醫院的紀大哥……可是我喜歡去哈爾濱，那兒有老毛子賣的巧克力糖，吃起來才有味道哪！」

第二天，我到眼科病房去看小蓉的時候，詩彥不在，宛如還在手術室裡加班，只有心竹坐在床頭櫃旁拉著小蓉小手和她談話。他們才是第一天見面哩，可是有說有笑，玩得十分熟習。不怪有的同學給心竹建議，說他適於做小兒科，不應該做外科的。我問詩彥哪裡去了，才知小蓉的病不過是輕砂眼和中度散光，在門診治療幾次，配個眼鏡，一個禮拜就可以回去，可是詩彥說住在旅館一切不便，堅持要她住院，小蓉喜歡新奇環境，覺得住院也很有趣。手續剛剛辦好，詩彥向他們說聲「拜託！」便趕上午的「急行列車」往安東去。據說三天五日才能回來。心竹不明底蘊，很不以為然地跟我說：

「這位詩彥也怪！千里迢迢帶小妹來看病，結果把小妹往醫院裡一放，自己倒滿不在乎地走了……」

我因為院裡院外的事都在忙，每天只能到病室裡照個面，結果照應小蓉的責任，除了宛如，大部分都由心竹擔當。

禮拜五晚飯時，心竹告訴我詩彥回來了，請我到旅社去看她，她仍住在老地方。

落雪後的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一個人冒著寒冷的晚風赴約會，分外覺得孤獨惶慄。說實在的，我需要單獨與詩彥會面一次，不知怎的，又有點恐懼單獨見她，我不曉得宛如是否已經去了。

詩彥像上次一樣地歡迎等待我，可是格外顯得興奮，眼珠兒放射瑩光，面頰上飛飄彩霞。小桌上擺著很多的茶食點心，除了堪與她容顏媲美的紅玉蘋果外，還有一大盤秋林洋行的俄式巧克力，不知是不是小蓉喜歡的那種。

「宛如沒有來？」

「她說她值小夜班，也許不來了，要來恐怕很晚。來不來不管她，現在讓我先向你報個好消息，你看該怎樣慶祝呢？」

「好消息？那要大大慶祝一番！」我一半驚奇一半會意。「經過如何，你且說說。」

「請你看看這個。」詩彥已抑制不住她胸中的快樂，急忙從旅行皮箱中取出一封信件。信封信紙都是安東中學的機關用箋，內容卻是男方父親所寫的退婚同意書。我也情不自禁地為她歡呼，同

時也瞬即恢復對她工作的設想。

我說：

「為了你此行的成功，為了你未來的幸福，我真想立即送你一點禮品以表示我的賀意，但我沒有準備；現在，先送給你一隻手吧！」

我伸出右手，詩彥接過握著，緊緊地握著，久久不放。跟女性握手，我是有經驗的：與一般女人握手，僅僅為了禮貌；與女同志握手，心情十分嚴肅；大都沒有感覺。但，詩彥的手，是多麼不同啊！

我搖搖頭，想把不同的感覺抖落。

「你冷嗎？」

詩彥注意到我的動作。她走過去，用手摸摸暖氣管，又道：「這旅館真壞，七八點鐘了，還不把暖氣開放；我也有點冷了哩！」

說冷就冷，當熱情暗潮被我鎮退後，更感到室內的冷意逼人。詩彥勸我到床頭的沙發上坐比較暖和，我沒有說什麼，卻都依了她。她取過床裡的毛毯將我的膝部掩覆，也把糖果盤端來放在我身旁，然後落坐。

「你也蓋一蓋吧。」我說。

我們開始平靜地談話。談談生活、思想，談談讀書、做人。我即時問她：

「你有這些勇敢的想法和個性，實在令人欽佩。你一定讀過很多有意義的書了。」

「泰城是個小地方，哪有什麼好書可讀？常看的還是『滿洲國』出版的報紙和雜誌，而且我讀的也很雜亂。」

「對你讀過的東西，能提出一點意見嗎？」

「我覺得季風的雜文，黑白分明，敢說敢寫，讀來痛快。呢喃萁的詩，感情豐富，篇篇都有愛國思想。《青年文化》裡的文章，有時很敢說話。新時代出版社的忠義叢刊，雖然都是歷史故事，可是都有現實感。可惜大抓人以後，這些有的已經停刊，有的已經改變內容，再沒有那種味道了！」

誠如其言，一二三〇事件前，「滿洲文壇」一度很有蓬勃奮發的氣象。其中有者為愛國作家的自然發抒，有者是經由組織的滲透活動。如季風即為組織中人，該時已奪得《大同報》副刊主編的職位，其方塊文字或文藝評論或人生鍼砭均風動一時；新時代出版社即由王覺同志所創立；而常在《作風月刊》上以呢喃萁筆名發表詩作的就是谷音。至於《青年文化》原名《青少年指導者》，本是偽滿協和會中央本部的機關誌，目的在灌輸「日滿親善」的協和思想，卻因張輔三、王天穆兩同志的打入，完全替我組織作了愛國抗敵的宣傳。可惜這些文化尖兵都和谷音同樣地進去了。不過他們的工作已有了成果，詩彥就該是其中的一個。

「以前你編寫過一個劇本，宛如曾拿給我看過，說是在校內公演很是動人，不知你對外有什麼作品發表？」詩彥轉而詢問我。

「有意義的，只有一篇，叫《出埃及外記》。」

「是不是登在《新滿洲》上？」

「是的。」

「我看過，我看過！那是描寫摩西領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很有鼓吹反滿抗日的嫌疑。我不知道是你，不然會替你擔心哩！你沒有受到影響？」

「當時，我是用化名投稿，沒寫真實姓名地址，不然是免不了麻煩的。」

「現在還有什麼大作？」

「已經不寫了。」

「怕出事？」

「有的人是為了怕，有的人認為空言無補實際。」

「怪不得現在的報紙雜誌都是一片灰白。」

「假如你願意讀，我可以替你找些關裡的刊物。不過，你可要保守祕密。」

「你不相信我？」

「我怕你不注意，當然相信你的。」

「能不能找到像《夜未央》那一類的書，那種書讀起來才夠刺激，可惜我只看到那一本。」

「那種屬於左傾的書，還是不讀的好。不然，如不加思辨地讀，是很容易偏激的。」

「那，你對《夜未央》有什麼批評？」

「我覺得作者太殘忍。雖然是在革命的時代，作者也不該安排安娜擔當發訊號的任務，讓她給她心愛的人——華西里舉起死亡的燈。因此也可看出蘇俄共產黨人的殘忍思想了。」

「可是，安娜是多麼勇敢啊！」

「若是你做安娜的話，你要舉那燈嗎？」

「我可要考慮考慮。」

「所以說，除去共產黨外，沒有人會做這樣安排。這是一種人性的冒險，也是一種工作上的賭博；革命工作不是這樣做的。」

「你若是華西里呢？」

「我不會是華西里，我若是的話，根本就不愛安娜。」

不知什麼時候，蓋覆在毛毯下兩人的雙足，為了尋求溫暖竟自動靠攏。詩彥俯曲前身，將附彎棲息在膝蓋部，用手掌遮持著前額……都是天氣太冷的緣故！我覺得我今天的言語足夠老成，心理卻停滯在年輕，年輕得沉溺於新奇的感覺中而不能自拔……我真不知我此時此際，到底在做什麼……

「大哥，」她仍低著頭，面前披散著長髮，一縷微弱而羞澀的聲音自喉際發出：「我今天的行為是不是不當啊？」

「只要心地坦白，就沒有什麼了。」

「人與人之間，有沒有純潔的友情呢？」

「有的。」

「有沒有限度呢？」

我沒有回答。我也不知如何回答。

我注視著她，急促而深長的呼吸使背部呈顯波動，她用力將黑黑的長髮甩向一旁，露出一側緋紅的項頸和發赤而灼熱的耳輪，偶爾偏過頭來望望我，深邃的瞳眸中閃爍著火花。我忽然說：「坐近些吧！」她也似乎中了催眠作用，緩緩地移動身軀。記得那一位同志曾經說過，從事革命工作的，愛一個人就是害一個人，所以一定要嚴格控制自己或否定自己。宛如的氣質太善良了，善良得近乎柔弱，我實不忍傷害她；所以與她接觸的時候，我加力控制我內心的衝動，也不製造任何促使我發展軌外行動的機會。但詩彥不同，她像是個受得起風吹雨打的孩子，因此在她面前，我就疏於對我自己的防範。我不知是否因宛如所激起但被我禁錮多年的情感猛虎，忽然掙脫索鍊而將詩彥吞噬呢？還是詩彥有更大的衝擊力，衝破我自遠古以來脫離太陽而冷卻凝縮堅實厚硬的大地殼，使我埋藏億萬年的地心之火突然噴射？我不知中了什麼邪魔，當她移近我的時候，竟用一隻手腕將她扣住，一種想在荒野裡奔馳的欲望，飢渴地驅使著我想去接近她那殷紅的、火熱的……

她沒有接受，也沒有脫走，只是她把臉緊緊地貼藏在我的胸前；是嬌羞？是抗拒？我不知道！我的自制力哪裡去了？我也不知道！

嘩啦啦——

有些糖果逃落地下。

這種聲音並不是巨響驚人，卻足以喚醒我的理智，收回我的靈魂。我是做什麼的呢？我真悔慚交加，想打自己一萬個嘴巴。我把那隻可咒詛的手臂高高舉起放在我的腦後，讓詩彥可以自由離開而不受外力約束，但她卻未想離開，噴火一般的呼吸，仍使我的胸膛感到高熱難抗。

我該如何是好呢……

我想起不久前對伊正所說的大話。

我要振作！

「詩彥，」我說：「我心地無他，請你給我寬恕。」

「不，大哥，」她喃喃地：「我還是有一點封建，請你原諒我……」

久久，我無顏說話。

她微微仰首，露出那雙燃燒著的眼睛，望望我，又輕輕閉上。嘴唇顫動地囁嚅著：

「大哥，我有點怕——」

夜將深，走廊中旅客的步履聲稀少了。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用極鎮靜而平和的聲音安慰她：

「不要怕，大哥保護你。」

嘭！嘭！嘭！

「誰？」我急速詢問，詩彥霍然起立。

嘭、嘭、嘭，叩門聲又響。

「進來！」我高聲說。

我以為是茶房或者是查店的巡警，但門開處進來的，卻是小宛如。

04

詩彥帶著勝利自由的歡愉回家去，我卻陷入深重的苦惱中。我不該在詩彥情感激動的時候，放鬆了我理智的煞車。那瞬間，來得太突然。我未曾想我們中間會有高潮的表現，但我個人竟愚蠢地表現了感情的高潮，午夜捫心，實感難以自處。

詩彥行前，我們曾利用醫師休息室開個小小歡送會，歡送小蓉病癒出院。小蓉又乖又懂事，小小人兒戴付眼鏡，那有趣的樣子實在討人喜歡！難怪心竹叫她女秀才。她住院期間，我們均未盡到應盡之責，只有他的照顧才使小蓉感到快樂而未孤單；所以在小蓉的心目中，真有大哥之情的只有心竹一人。對我，她當然仍有份天真的愛戴與尊敬，對我的生活小節也十分留心，譬如由心竹的閒談中，她就知道我所喜聽的唱片——「夢中人」。

歡送會中，有我這方面的幾個大哥，有宛如方面的幾位大姐。這是十二月初的事，月底聖誕節就到了，因此詩彥買了許多份豐盛的禮品，分贈這些大哥大姐們。她說她來的時候父親曾有囑咐，為小蓉的事一定要謝謝大家。她父親有否如此囑咐我不知道，我知道她帶來許多的錢無處花用倒是真的。宛如代表她忙著招呼大家吃喝，心竹坐在一角陪著小蓉玩耍，詩彥拿出一張新買的唱片放在

留聲機上播放。這是一支當時正流行的歌曲，大家都會唱，所以就都隨聲唱和：

沒有薔薇的春天，好似豎琴斷了絃；
活在沒有愛的人間，過一日好像過一年！
……

大家雖然唱和同聲，可能各人感觸不同。詩彥悄然走近我：

「我知道，這是你最愛聽的曲子。」

「誰說的？」

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卻另行說道：「大哥，我送的小禮品，大家都是一樣。本想多送你一些，可是……我知道你不重視這個……而且任何東西都不能代表我對你崇高的敬意，所以我想有機會時，再另行表示吧！」

心竹對於詩彥把小蓉放在醫院裡而自己遠走安東一事，最初本是有些不諒解的，後來經過幾日的盤桓接觸，加上得悉其中內情，反倒對她欣賞讚佩起來。詩彥走後，心竹不止一次地以她與宛如比較說：

「要交女朋友，就交這樣的！」

心竹為人坦誠，常是直話直說。他這樣說當然不能立時解釋為他愛詩彥，因為時間、關係都談不到，但無疑地，他對她頗有好感。

我自己呢？這些天，我一直在反覆檢討。說實在的，宛如、詩彥，這個時期正發射著濃烈的青春芳香，都是我渴求的、需要的。在性格方面，她們卻有顯著差異，一個溫柔活潑天真，一個勇敢穎慧刺激。假如我要戀愛，我將遇到魚與熊掌的問題，但我實際沒有困難，因我不必選擇。尤其現階段，我的責任是工作工作工作，必須選擇時，基於工作需要，我也許選擇後者，因為詩彥更有宛如所沒有的東西。我似乎曾經這樣想過，但我並沒有想到那樣快。可是那一幕我將如何解說？難道我真是……一切都不是！那只是我瞬間的失神，只是我疏於防範，都是因天氣太冷的緣故。詩彥呢？也只是一時的激情。她太快樂了，多年的枷鎖一旦解脫，她興奮、她激動，一時情不自禁，因此對我無禮的行為未予斥責。我確是如此嗎？詩彥也如此解釋嗎？宛如知道又作何感想呢？詩彥還說她有機會時想對我再另行表示，她將表示什麼呢？那我用激情二字來概括她當時的心理狀態，並不正確嗎？我迷惘，我悔恨。唉！我真是自掘陷阱且自投陷阱，我怕隨落潮而去，卻偏在海灘濯足。但人總是人，活人就不免有活人的感情。我是醫生，我了解，我不能也不該一味罪責我潛意識中的情感衝動。只是我對我感情運行的錯誤層次又不能不有無地自容的內疚。於是我寫信給她，我想彌補我的錯誤，我期望她在我以外更多追求那更大的人生意義。

第一封信。

第一封信很短。

第二封信：

前信那麼簡短，你以為我吝嗇筆墨嗎？你以為我沒有時間嗎？都不是的！主要的是有些話不能用文字表現出來，而此時此地亦不是一個紙上能暢所欲言的環境。這話你該懂得。

上次信中，我曾以沙漠中的苦行僧自況，最近我為自己身著禮服的畢業照片題了一首小詩，我已抄給宛如一份，現在也以另紙抄給你。

在這小詩裡我又自喻為荒原野馬，如與沙漠裡的苦行僧相對照時，不是矛盾嗎？不，一點也不！它們正有著內在的統一。我們都是青年人，我們都有渴望愛與自由的天性，野馬正是愛自由的象徵，苦行僧卻代表追求自由與愛的意志。我們活在此時此地，遭受現社會婚姻的、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種種壓迫，如不將現社會改造為理想的社會，我們就不會有理想的生活。所以你在來信中表示，婚姻問題解決後仍感到人生的極度空虛。你要知道，社會上任何問題都不是單獨存在，部分的解決不是全體的解決，你雖然掙脫了封建的枷鎖，卻未飛出時代的樊籠，苦惱之外還有苦惱，要想改造就要徹底改造。不過改造工作不是能徒憑幻想和熱情所能做到的，在實踐上必須要堅忍沉著貫徹始終地奮鬥著。一切有荒原野馬性格的青年人，欲使自己的豪情不被束縛、不受制限、要自由奔馳時，也必須除掉浮躁的衝動，散漫的行為，而以沙漠中苦行

僧的毅力，面向天竺國，一步一步走下去。這些話對於我適用，對於你也適用。在行為上，你已是一隻展翅高翔的蒼鷹，在心理上，我也願你學習學習修道女。要知道一個人不能滿足一個人，能令人滿足的是一個事業、一個理想，一個新生命、新信仰。

你說你對我所寫的那本《虹霓》很喜歡，尤其是對女主角留給那個大孩子那句話：「而今啊，是如此的時代，將愛一個人的心分散給大眾吧！」很欣賞。你問我有沒有真實的人物背景。說來很慚愧，那時我還沒有接觸廣大的社會，只能就近剪影。寫虹是個思想前進的女護士，寫霓是個尚未成熟的醫學生。他追她，而她早有意中人在前方。當她得知她意中人的噩耗時，便決心走向前方繼其遺志為其戰鬥的伙伴服務；為了擺脫霓而不辜負他的熱情，也同時給他開條道路。所以她又說：「為了愛的緣故，我已將青春的生命投入時代的洪流，假如你還能紀念我的話，請你也走入我們這人群裡來吧。」這故事純屬虛構，不過那句話我卻當做是覺醒後的人生格言。我們都知道，落雨後的天邊所張起的七彩虹霓，那霓起於虹而虹起於太陽，它們本身不過是極細微的水點。我們原也不過是太空中一粒塵埃，根本算不得什麼，可是一經時代的真光照耀，也就會多采多姿，給自然界平添無限的美景，給人間留下永恆的懷念。

願你也接受真光的照耀。

這封信我寫得十分吃力。以前我寫給別的女孩子常常是筆下汪洋。那些信的目的在鼓動風氣，

激勵思想，而且採用傳閱方式，內容可以大膽說教。這封信的目的在收斂熱情，為了逃避敵偽的郵件檢查，只能隱喻雙關。如改造代表革命，奮鬥代表抗敵，前方就是祖國等。總之，這裡再也找不到私人的情感，一切話都是為啟發她走上工作。

第三封信。

第三封信我沒有寫，因為還未曾得到詩彥的回音；可是伊正卻先送來負責人的條示：

據報鍾鳴同志將與特務結婚，希即查明內情；設法與之聯絡，對彼開誠互信，以堅定其維護組織之意志，而彼限於環境，著即停止工作。

看過這張條示，頓感此中的嚴重性。我燃起一支紙煙，順便燒去字條，卻燒不掉心頭的許多問號。一個女同志竟要與特務結婚，為什麼？為什麼？解鈴還得繫鈴人，組織命我出面結束，但這事將有什麼後果呢？

紙煙燃盡，紛煩的情緒也平靜下來。這可能是一個危險的訊號。地下工作是浸浴於危險中的工作，鐵的現實常常擊潰旖旎的夢憬，與奮繼以挫折，風波起於平地，當危險的訊號升起時，我們就自然戒備森嚴、專心一志、沉著應付了！鍾鳴事件能否肇成問題，我不能預想，但因詩彥所引起的混亂思維卻獲得了意外的澄清。不是嘛，我正擬工作一位女同志，卻先奉命停止一位女同志的工作，

這事由誰安排得這樣巧合？無論如何，我必須冷靜一段，我不知道我的信能否冷卻詩彥的熱情，我必須將我的熱情先行冷卻，不拘是那一方面的！

鍾鳴是我早期徵求的女同志之一。我寫《虹霓》時多少有些取型於她，但我並不是追求她的那個大孩子，因為是我引導她走入這人群裡來的。

當時我們對大專學生的工作，是採取種種形式的青年運動，特別提倡並運用學生課外社團活動。聖誕節的遊藝晚會我們更不能輕輕放過。我們把《虹霓》一劇對內公演，鍾鳴即出任女主角，我雖只在幕後導演，也曾引起她的朋友們對我的猜疑。她被捕出獄後，仍擔任後樓上病房的護理長。我們以覺覺團方式恢復工作時，組織曾限定對涉嫌被捕過的同志，停止一段工作。不過鍾鳴特別堅強，嫌疑又輕淡單純，所以經我向組織提出保證後，即准其繼續活動。只是採取更間接的聯絡方式，加重掩護。一天她忽然對我說：

「我們要不要吸收特務為同志？」

「當然要的。組織常常選派同志打入敵偽警憲機關，也有負特別任務的人開展這項工作。」

「我可以不可以擔當這類任務？」

「這個，」我思量著。「你有什麼工作對象嗎？」

「以前在後樓上有個病人，他雖在日本憲兵隊做事，可是思想很好，住院期間我們很談得來。據他說因他住院療養時間較長，上司便派他就近調查監視這個大學和醫院。他說他許多事都不向上

報告，就像上次我們演劇的事，他都裝做不知，所以把他吸收為同志，對工作不是更方便嗎？」

「我想起了，你是說那位患輕度肺結核的焦警尉嗎？我勸他可以出院，他偏要求多住幾天？」

「是的，就是他。」

「不必了！」我說：「我知道這個人對一般商民的行為並不好，有人說他很陰險。住院時受你護理，也許對你另有目的，要充做好人以獲你的好感。而且你怎知他沒有將演劇的事向上報告？」

「這件事他好像沒有撒謊，因為捕我們進去的是城內滿洲憲兵隊，審訊時只問我與我們護理主任的關係，問我為什麼親近英美人，一點也沒問演劇的事，可見他們沒有這種資料。快結案的時候，日本憲兵隊來覆審，正好焦警尉做翻譯，他問我都供些什麼，然後又詳細查閱有關我的案卷，便偷偷囑咐我不要再多說。」

「他為什麼這樣做？」

「我方才忘記告訴你，他原是我們一個遠親，以前不常跟我們來往。事後我又知道，我媽媽曾拜託過他。」

「這麼說，他確實是幫你個人的忙了。」

「是的，他向日本人說，我因為在職務上負責任，所以英國人才對我有好印象，若我們的主任是日本人，也一定因我盡忠職守而信任我重視我。我本身並無敵性，所以建議把我放了。最近我再仔細仔細考察他，覺得他也不失為一個好人，所以想與你研究研究，是否可以向他工作。你不認為

特務裡也有好人嗎？」

「當然，當然；但是你要小心表面的好人裡也有是特務的。我不是反對你的意見，只是不同意由你來做這種工作。」

「可是，我看過許多間諜小說，我覺得由女同志從事反間工作，確實是方便得多……」

「間諜是間諜，我們地下工作的本質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就是全民革命，所以政府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號召『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的全面抗戰。我們現地工作也是以廣大的東北同胞為對象，首先建立祕密組織，進而喚起民眾領導民眾，全面奮起與敵鬥爭。簡言之即是組織、宣傳、動員；和　國父當年領導辛亥革命所做的立黨、宣傳、起義，同其意義。這與間諜的活動迴然不同。我們更要對同志在工作裡培植健全革命人格，保存優良民族道德；我們不獎勵過浪漫生活有二重人格的女間諜；而且讓女同志從事某種間諜行為，犧牲也太大了。」

「為了工作不是什麼都可以犧牲嗎？」

「這固然是最高不易的原則，不過我們有許多犧牲的方式，也有許多達成任務的辦法。我們不願用女同志的青春做為工作的憑藉；而且敵偽警憲也想種種對策以圖破壞我們。現在他們已採用釣魚法——他們把許多嫌疑不重的同志放了，用他們做餌而暗中監視，如果我們再與他們聯絡，敵人就可以找到新線索。有時他們也偽裝為愛國份子與我們接近，假若我們再向他們工作，就更等於自投羅網了。」

「啊！」鍾鳴警悟地：「這，我一點也沒想到。」

「所以，」我繼續說：「我怕你工作不成，自己反倒吃虧，組織也遭受連累。」

「照目前情形來說，我並沒有向他洩露什麼，他也沒有利用我做什麼的意圖，我今天的提議只是我個人的構想，現在我知道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不過我認為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同意鍾鳴的判斷，但為安全計，鍾鳴也同意設法擺脫焦警尉，所以轉職到開原去。開原是瀋北的第二個大城，距瀋陽三百餘里。這樣焦警尉就不易與她糾纏，我自己自然也不便與之繼續聯絡，組織乃另派開原地區同志就近連繫。半年多過去了，竟然發生這樣的結局，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候我如再與鍾鳴接觸，須要避過眾人耳目。找女人最好憑藉女人，想來想去想到木莎。木莎為鍾鳴同班好友，比宛如高三級，論年紀我們相彷，不知怎的她總以大姐自居。年前曾奉派赴長春工作，最近剛調回施醫院。對鍾鳴的事，我想她比任何人知道的都多。很久不見了，劈頭就來了一句：

「大冷天，你不去看你那年輕的妹妹，跑來找我做什麼？」

我們相對坐下，她雖口中直言奚落我，手頭卻悠閒地編織毛圍巾。平時，我不免也反駁她一句：「你也不老嘛！」這時，我只有正正經經地說：

「我有件事情，想向你打聽——」

「我知道。」她似乎預知我的來意。

「那麼，請你告訴我。」

「你問吧！」她反而不即說明。

「就是鍾鳴的事，聽說她快結婚了，我有點不懂……」

「嗯，她沒有事先告訴你？」

「我們很久不見面了。」

「我以為她會早告訴你的，按著你們的感情。」

「我說過，我們很久不見面了。從你離開瀋陽後，她也轉職開原，這期間跟她跟你、我都沒有見過面。若論感情，木莎，你不該懷疑，大家還不都是一樣的朋友！」

「誰是你的朋友？」

「木莎，你何必矯情？憑著我們過去光明磊落的交往，憑著我們中間誠摯而嚴肅的關係，憑著我們今天能在此談論鍾鳴的問題，不拘你怎麼講，我們不能否認我們中間明坦的友誼關係。」

「明坦，友誼，關係，」她重複著這三個字眼兒，然後激動而稍顯憤慨地說：「告訴你吧，我一見你就生氣！我承認你還是個朋友，所以我向你進一言，今後你要檢討檢討對女孩子的關係……」

我未等她說完便截住她的話：「還是先談談鍾鳴的事吧，木莎，然後我用所有的時間，聽你的訓誡。」

「唉！我也知道不多。我剛回來，聽到這消息就跑去看她，我反對她做這事。她說我不明內情，

請我不要責難。你知道，她不像我，我是有話就說的人，她有苦都是向自己的肚子裡嚥。大概是她去年被捕時曾經得焦特務幫過忙，而焦又跟她家有點八桿子打不到的親戚，可是焦因此就常常到她家裡走動。據說鍾鳴討厭他才到開原去做事的，然而焦不死心，繼續在老太太跟前做工夫。她家環境本不好，這年頭買什麼都不方便，可是做特務的總有特別辦法，凡是她家所缺用的，焦特務就隨時送到，終於打動了老太太的心。」

「她自己到底願意不願意？」

「誰知道呢？唉！鍾鳴的婚姻也是問題，聽她母親說，以前常有人到她家裡介紹，她自己在外邊也有朋友，可是被捕出來後，大家都像怕什麼似地，都不來往了。她年紀越來越大，她自己不在乎，她媽媽卻替她著急。最主要的好像焦特務對她媽媽說，在日滿警憲機關的黑名單上，鍾鳴已經備了案，一朝時局不好就會再被捉去，一定要有人保護才行，所以她媽媽就答應焦特務的求婚。鍾鳴對媽媽一向孝順，對於此事，她似乎是含著眼淚未加反對。」

「嗯……」我想說句什麼，卻一時說不出來。

「哼！」木莎注視著我，忽然冷笑一聲，然後低下頭繼續編織她的毛線圍巾。我不知她是什麼意思，只聽她自言自語似地繼續對我說著：「她還說她也許沒有時間到醫院來看你了，讓我遇到你時，就說她很快樂，不必掛念她。唉，我不明白，你們本來是很好的，後來為什麼冷淡了呢？不然，她也許……」

木莎好像為了考慮說詞，一不小心，毛線團滑落了，向牆角處滾去；她本能地站起來走向牆角。這件事我似乎得到一個輪廓，實際仍很茫然。我默默地想，內中必定另有文章，鍾鳴不能告訴木莎，木莎自然也猜想不出；正如我與鍾鳴間的工作關係，她也想像不到一樣。

「你有什麼意見嗎？」木莎取回線團後，問我。

「我想，我應該看她一次，不過這個時候，也許不太方便了……」

「你和她還有什麼話說？」

「做為一個朋友，總該有些話的。」

「我勸你，別再打擾她了！」

「是的，我要慎重考慮考慮。」

我本想和她談話後再請她給我邀見鍾鳴一次，可是現在考慮到木莎是比較有成見的人，她會給我幫忙，卻不會完全照我的意思辦事，她也許為了關心而從中問東問西，可能使鍾鳴無法應付而節外生枝。這件事還是使令宛如為佳，宛如知道鍾鳴的住址，鍾鳴也明瞭我與宛如的關係，最合適的是宛如完全聽我的話，說一不二。因此我就打消拜託木莎代為訂約的意念。

「還有別的事嗎？」木莎見我久久不語。

「沒有了。現在我準備聽你的訓誡。」

「算了吧，不說也罷！」

「木莎，我是十分誠意的。」

「好吧，我說。我可是沒有壞意。以前你說你喜歡多認識朋友，大家既不討厭你，也就願意與你來往，但是時間長了，男女朋友間畢竟應該有個明確態度。你想，你處處點煙燎火，然後又木然無事，使人覺得是受你擺佈，受你奚落……我告訴你，對於女孩子，這是感情上最大的損失，你不能不負點責任。所以我勸你，從今以後要改變改變。」最初，她講這話本是審慎肅穆的，說著說著竟羼加些訕笑、譏誚，而且又加重憤慨。

「是的，」我點頭承認。有些內情木莎不知道，我也不便辯正。我說：「我可能有些錯誤，我需要改正。好在我即將離開瀋陽，這裡的一頁也就隨風而去；假若你也願忘掉我的話，偶然碰面時，你就裝作不認識，我絕不會向你打招呼。」

「怪不得大家都說你得了神經病，聽你方才說的話，真有些神經兮兮的了。」

「說實在的，木莎，患精神病的人是有福的，我雖不敢說天國是他的，至少這個世界的苦難、煩惱，都與他無緣了。」

「我不願再聽你的鬼話，我要明確告訴你，鍾鳴的事就算過去，宛如可是個好孩子，你不要再三心二意。」

05

青葉茶室的氣氛是高尚的，優雅的。它雖開設在瀋陽日本商埠地最繁華區的春日町上，坐在裡間的卡座中，卻一點也聽不到煩囂的市聲。古典音樂用低沉的音調播放著，繚繞飄入耳際使人有幽遠蒼涼超塵拔俗之感，但穿著洋裝的女侍們，在挺秀清新的儀態中，仍洋溢著日本姑娘的多禮與溫情。進來的客人們都輕步囁聲地選個座位，然後默默靜息或與朋友相互談話。談話的聲音習慣地低於音樂，彼此聽得清楚卻不擾攪鄰座的安寧，所以有很多滿洲醫大的學生為了應付考試，抱著書本跑到這裡來用功。我所以選擇這個地方等候鍾鳴是因我可以混充滿大學生，但滿大學生不認識我；而我的學校在東關，也絕少人走到這裡來坐。約定時間已到，鍾鳴還沒出現，是宛如說錯了時間地點？還是姓焦的在她家使她不得脫身？半點鐘過去了，我心中有些不安。我正考慮是否應該離去時，鍾鳴來了，腋下還挾著幾件紙包。我原是飲啜清茶的，我為她叫了一杯代用咖啡，並囑咐侍者多加一些糖，那個小女孩放下杯子用她的日語說句俏皮話兒：「這裡的咖啡不加糖也是甜的哪！」

「對不起，讓你久等了！」鍾鳴靜息一會低聲解釋著：「我跟媽媽說我來日本站買些東西，所以先到三中井去買以便向媽媽交差。另一方面假若被什麼人碰巧看見，也比較容易解說。本想快去

快來，誰知還是晚了……」

「這樣好！這樣最好！」

說實在的，我最欽佩鍾鳴處事時的設想周到，但我就不明白這次婚姻她是怎樣安排的。我先詢問些一般生活的情況，她如往昔一樣沉靜地回答。不容置疑地她心中隱藏著苦痛，她的眼光流露著忍受與掙扎。我不知怎樣來安慰她，我不知應該為她祝福抑或分擔她的痛苦，她既然沒有顯示軟弱，我再說鼓勵慰勉的話也屬多餘。但她曾是我革命同志，在她青春純潔的生命中，我曾燃起她為國家民族奉獻的火種，過去遭受打擊威脅，並沒有畏縮與消沉，而今天她竟將嫁給敵偽特務。固然她曾說過「特務裡也有好人」，但這種事不僅使組織震驚，擔心她正走向虎口；就連她自己也不被她在社會上的朋友所諒解。為什麼？我不願多猜想，我只有直截了當地問：

「不要問了，」話題轉到這上面，她卻抑悒不願回答。「別勉強我談這事吧！」

「記得從前研究過，我們曾經決定把焦先生擺脫的。」

「我是照你的意見做的。可是那些日子以前，他常常到我家來，我又有心將他當做工作對象，所以對他比較客氣，等到決定收起這種關係，卻不能明顯得罪他……尤其是中間還羼雜著我的母親……弄來弄去，弄到今天……」

「伯母強迫你嗎？」我想起木莎所說的話。

「媽媽總是愛我的！」

「焦先生威脅你嗎？」

「應該說沒有。」

「鍾鳴，」我忍不住激動地說：「我對你這件婚事的實情不明白，也不知是否出於你的本意。假如不是你的本意，也希望你把你心裡話說出來。趁著問題還有糾正的機會，我們尚可想其他的對策來補救。我願把我心裡的話告訴你，也希望你把你心裡話說出來。本來關於女同志的婚姻常常給組織增加困擾；在我們的社會裡，男同志有較多的方便，婚姻理想可以工作，婚姻不理想依舊可以工作；女同志就困難了，對方如非同志，只有暫時停止工作。好在來日方長，我們報效國家的機會仍多，現階段不做什麼也不必遺憾。我今天邀你相見，只希望瞭解你的現狀，並不著眼於工作；我所關心的仍是你的婚姻。我們是同志，我們也是彼此關心的朋友，你的婚姻所帶給你的苦樂，我敢說我也有份。這件事假如是你自己的意思，我要為你祝福，假如你是被迫，我願意伸出手來助你解脫。伯母方面，我想我們會有方法說她回心轉意；若是被焦先生所迫、所威脅，即使你願意如此犧牲，我也不忍心由你來堵塞這個決口。我可以想辦法，或是轉地隱藏，或是出走入關，我們有的是辦法，只要你說出實話。」

一口氣我說得這麼多這麼長，她沒有接言，只是靜靜地聽，潸潸地流淚，我的心頭也有無限酸楚。很久很久，她仍陷於深深的凝思，無疑地，她對我所提出的出走的建議，也在慎重地考慮。

「不用了，謝謝你的好意。」她在萬難中下了決定。「事實還不到那種程度，假若那樣做，問題會弄得更多。大體說來，焦先生還算可靠。假若他今天成為一個同志，一切都會很理想，可是自從

你上次向我提出警告後，我就再也不跟他多談國家民族等等問題，他倒是常常對我說他是中國人，雖然在日本憲兵隊任職，卻絕不做傷害中國的事。他到底如何？我不敢說！但請你相信我，什麼時候我都會愛護組織的，現在我雖不便工作，有必要時我想我會有些用處。這件婚事，最初可能是我自己的錯誤，現在也讓我自己來處理吧！只要你相信我是個可靠的同志，我就不會孤單軟弱……」

「你不會孤單，在精神上，不但我，就是所有認識你的同志，都會永久和你在一起！」

「好，讓我們再握握手吧！這隻手，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同志和朋友的手，它永遠不會改變！」

「我的也是如此！」

由於隔著茶几握手，我們必須俯身接近，這時我發現她含著眼淚的瞳孔中，放射出欣喜振奮的光輝。這光輝我曾經見過，她宣誓加入組織時，就如此顯露過一次。

鍾鳴的工作由我結束，自始至終我都不懷疑她的堅貞，但在組織立場上，這可能是個問題的開端。她與特務結婚，有如一隻組織的鑰匙落在敵方的手裡，我們不知它何時被利用。如因此而使組織遭受破壞，我自然是罪該萬死。縱然自我咎責仍得不到內心的平安，所以負責人召見我時，我當面向他請求制裁。負責人卻說：

「這事沒有什麼，你也沒有錯誤。鍾鳴是個忠貞的好同志，不會對組織有危險。焦警尉也許像

鍾鳴所知是個有國家觀念的人，如果不是如你所說他對一般商民的行為不好，我們未始不可爭取他。現在就這樣結束好了。不過青年女同志，私生活問題很多，今後要多注意。」

接著負責人對我商談另一件事。原來一二三〇事件蒙難的黑龍江省負責同志，最近殉難了，北部組織雖曾重新佈置過，但一直沒有主持全局的適當人選。尤其是最近工作日有擴展，需要調幾個人參加總機關，專任督導工作，以加強對地方的聯繫。負責人說：「你已有多年工作歷史，對工作有深刻認識和豐富經驗，我想你擔任這個任務最適宜，哈爾濱方面也由你督導。假若你能擺脫家庭，切斷社會關係，不必再任偽職，就以整個時間心力從事組織活動，可能貢獻更大些。這是一件大事，你多考慮考慮，過幾天再給我答覆。」

負責人還提了幾點別的理由讓我參酌，在他的語調面色目光中，確實是叫我做一番充分考慮的意思。我考慮什麼呢？我毫不考慮地立時承諾了。這時，我沒有對負責人加重我的工作有何興奮之情，也沒有對責艱任重更產生恐懼之感。我只覺得我對工作常有錯誤，我想我只是應該待罪之人；加強工作表現，也算自我制裁的另一種方式。我更知道，當時地下工作同志沒有誰重視個人職位。大家都認識：越多擔任工作，危險越多，越負重要責任，越接近死亡。

一路上，我在計劃著如何擺脫家庭、親戚、朋友，以及一切社會關係人，不再接觸舊日相識者，準備做個完完全全的「黑人」。我將不再報戶口，設民籍；我將改裝易履，使用假身分證；除了我主動現身之處外，「滿洲國」不能再找到我這個人；我與這個社會將成幽明異路。

正如一切青年人青年時期的心理一樣，對於家我是容易擺脫的。家裡有房產地業，生活不成問題，父母康健，無需我來供養；另有弟弟妹妹，我替二位老人家想，把我奉獻給國家也是應該的！痛苦嗎？擔心嗎？在這救亡圖存革命抗敵大鬥爭的年代中，還能計較嗎？況且我並不將實情說明，只偽稱入關到北平去求學深造，暫時離開家鄉，幾年不見何妨？

一般同學朋友們，我仍可按照原來計劃說是到哈爾濱去，他們大部分都生活就職在「南滿」，沒有幾個人能有機會到「北滿」去，偶然在什麼地方相逢，託個詞兒也就應付過了。

只是對於宛如，尤其是對於詩彥，我該怎麼辦呢？

走過附屬醫院時，忽見各處都是燈火輝煌的。平日下班後就冷靜黑暗的門診部，也完全亮如白晝。候診室的一角豎起一大棵截來的松樹，上邊掛滿霞光閃閃的紙條；用藥棉仿製的積雪，被塞在枝椏間垂墜著；紅綠金銀五顏六色的星星和小圓球，高高低低、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的，懸在樹枝的間隙中，一亮一亮地閃爍著。

啊！今天原來是聖誕節的前夕。

聖誕節在我們的學校和醫院中，每年都是個大日子。英美籍教職員在校時是要特別歡樂慶祝的，他們被俘遣走後，這種風氣依然習慣地延續著；受過宗教薰陶的青年男女，什麼時代都忘不掉這和平的安靜的牧歌式的生活。中央走廊不時有女孩子們，滑著輕盈的腳步，帶著唧噥的笑語在各病房間跑來跑去，互相比賽互相誇耀彼此所做的室內裝飾。若在往時，我一定會走進眼科病房對宛如讚

美一番，可是今天我的情緒不對，我再沒有心情去欣賞那惹人憐愛的笑靨和令人神迷的瞳眸。於是我來一個過門不入，因為這裡一切的一切，將真的與我無緣了。正如某個劇本中的主角所說：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我並不是要睡，我是要走了！突然地走了，也許，永遠地走了！

宿舍裡也是一片明亮，今宵已沒有晚自習，有的同學圍坐小吃，有的同學唱歌彈琴，有的陪著女孩子出去，有的伴著女孩子進來，關係淺的都停在會客室裡聚晤，關係深的就直接迎進寢室。我走進我那幾年來稱孤道寡的小小房間，眼望望貼在壁上「身居斗室，氣吞宇宙」像似座右銘的那張紙條，不知什麼心情，舉手將它撕掉。有位自詡為萬事通的同學，曾因此條向別人譏誚我：「他是典型的妄想誇大狂，無怪乎他去做精神病！」若是我能仗氣直言，今晚我就告訴他，但我不能，我只有再將這口氣吞入肚子裡，坐下來，無言地坐下來，望著，望著擺在案頭上那件小小油畫「凱旋」。當我們分手時，鍾鳴說她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秋林洋行看見過，當時好像我很喜歡，事後她曾便買來，因為覺得我們的關係不適於贈送這些小東西，所以一直自己保留。現在一切無妨了。所以當她把組織的文件交回時，除了另行附還一封信外，也把這個送給我，算是一種紀念。這東西又給我一次更深一層的啟示。

奇怪，心竹哪裡去了！心竹自從參加工作後就常常利用我這小天地閱讀文件，不然就跑去開展活動，他倒是滿有勁的。我想我這個新的決定必先告訴他，也必須請他幫我把社會關係擺脫一下。

例如早經劃清界限的宛如，甚至剛剛開始的詩彥。唉！我忽然對我這間小小屋子起了無限的愛戀。它雖狹小，我卻從未感到悶塞；它雖簡單，對我卻非常的豐富。這裡曾經有過我的夢想，也有過我的生活。決定去哈爾濱時，我雖也必須離開這個小房間，但並不改變在這裡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同樣從事祕密活動，我仍有表面的社會職業；我把大部份時間奉獻給組織，卻仍可保留一小部分私人的社會生活；假若我想，我可以見到我所想見的人。可是今天我向負責人慨然做的新承諾，將使這一切又大大的改觀。我將再沒有屬於我自己的生活了，我將只有工作、工作、工作。不知怎的，我忽然軟弱起來，我竟莫名其妙地陷入一種莫名其妙的悲哀中。

門輕輕開了……

驀然，我看見宛如畏縮地站在半開的門縫裡，我陡然站起，她像是受了驚嚇地說：

「我叩門，裡面沒有聲音，我以為你不在，所以試著開門看看。」

「坐，坐，我不知你來；原諒我，我沒有聽見，」我歉意地急急解釋，同時移過椅子請她坐。

「這麼晚了，你還來？」

「才九點多鐘嘛，今天不能算晚。我給你買點小東西，我以為你會到病室裡來，所以先帶到那裡……等明天再給你，節就過了，現在特地給你送來。回頭她們還等我去報佳音哩！」

「報佳音！嗯。」我用手撫摸著她送給我的小盒子，還沒有意思打開。「什麼東西？」

「別針。」

別針？在這將要分別的時刻？我的思緒一時飄開很遠很遠……

「大哥，你想什麼？」

「我在想，你送我別針，我可真的要與你別離了！去年今天，我們在這兒玩的多熱鬧。今年，我因為準備離開，這間小屋子也無心佈置，就連應該送給你的禮物都忘記買了，真是不好意思！」

「你怎這樣說呢，大哥。嘿！你的氣吞宇宙哪裡去了？」她沒有聽懂我的言外之意，卻注意到那光光的牆壁。

「我撕掉了，」我慨嘆地笑著說：「因為今後不是我來吞宇宙，反倒是宇宙把我吞了！」

「宇宙怎樣吞你呢，我可不知道，不過我可知道一個人生氣了，要吞你哩！」

「誰？」

「詩彥。」

「什麼意思？」

「她來信說她接到大哥一封信，又氣又惱又難過。她說好像大哥有點瞧不起她，所以她一定要做一番事業，做一番一口氣能吞下你的事業，讓你佩服。她要做什麼，我不知道，可是你到底對她寫了什麼？說了什麼？」

「我對你寫了什麼、說了什麼、又做了什麼呢？」

她默然不答。我再問她：「信呢？」

「我沒有帶來，她還囑咐我不讓我告訴你，你看，我又說出來了。」

「嗯！她一定誤會了。陽曆年我準備回泰城去，我想我會找個機會向她解釋。」

「大哥，你對詩彥的印象如何？」她又問我這類的話。

「你先看看這張油畫。」我沒有回答她。

「很好看嘛！哪裡來的？」

「朋友送的。」

「大哥，我真想問問你，你到底有多少個朋友？」

「很多。」

「最好的一個是誰？」

「葛心竹。」

「我問女的。」

「不用問了，你再看看這張油畫吧！」

「我看不懂。」

「我講給你聽。這張畫是出於一位白俄貴族的手筆，內容是西方騎士的故事。以前我看見一張放大的，比這張更逼真動人。你看，這畫面上：這邊是夕陽將沉，殘紅一抹，天際飄蕩著幽黯的浮雲。遠處幾株枯樹，有數點寒鴉正在盤旋，似乎是無枝可棲。這邊曠野蒼茫中突起一抔荒塚，孤獨

聳立墓前而俯首沉思的是一位騎士。其後，征戈斜依野蔓，戰馬長嘯秋風。下角是文藝巨人拜闊夫所題的俄文『凱旋』兩個字。據說這位騎士久羈疆場，當他百戰榮歸的時候，他的公主——愛人，卻因憂思憔悴而長眠地下。他所能看到的只有這些。這景色，這情調，這故事，都濃烈地描繪出一個英雄的悲哀。當一個人不能承受他所心愛的人的讚美，一切光榮都歸於空虛。我不甚理解這位騎士佇立在他愛人墓前的感覺，但我很受感動，我不知我是同情這位英雄的悲哀呢？還是同情這位悲哀的英雄！」

「啊！我明白一點了，不過，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你不明白最好，我也不希望這畫與我發生什麼關係。其實我也不全了解，譬如題字的拜闊夫，他本是白俄貴族，蘇聯革命後便逃到我們『滿洲』來，他每年都要到大興安嶺的原始林中去獵虎，他曾用獵虎的體驗寫了幾部關於虎的小說。他就是為了寫小說而去獵虎嗎？」

「他是為了什麼呢？」

「人，都有一種理想，都要為這個理想而奮鬥，但奮鬥結果能達到理想嗎？達到理想又有什麼獲得呢？我們不談這些吧！你有沒有看看這畫的反面？」

宛如遲疑著拿起那張畫，翻轉過來，仔細地看。

「我不是說畫的後面，」我笑了。「我是說這畫的另一面的意思。假若這位英雄騎士已經戰死沙場，音訊全無，畫面上畫個少女獨坐樓頭，憑窗遙望，不管天氣是清和日麗，抑或是風雨黃昏，她

都獨自地、痴痴地、永久地遙望……」

「大哥，別說了，你怎麼想出這些慘象，今天是聖誕節哩！」

「是的，聖誕節我應該說些快樂的事。可是我要走了，我一定要趁此機會說一說我自己的事。這些年，大哥總有一個夢想，總想遠遠地去飄泊，因此雖認識幾個女孩子，卻都不敢深交。我可以明確告訴你，我很喜歡你和詩彥，但我只把你們當妹妹一般看待。有一次你在小說上看到『在情場上的懦怯者，在戰場上也將是逃兵』那句話曾來問我，我說那純然是兩件事。我自然不配做英勇的戰士，可也不會做逃兵，但我卻甘願做一個情場上的懦怯者。因為我感到愛人是一種痛苦，被人愛也不一定是幸福，誰願意他所愛的人，將來為了愛他而深受痛苦呢？」

「有人願意為她所愛的人受苦呢？」

「真正施愛的人，絕不願他所愛的人為他受苦。」

她頭低了，臉紅了，眼角間懸垂著一滴我所不了解也很少見到的東西。我知道，我把不應該加的負擔加在宛如身上了。我本不想說這些話的，我原想把我的行程留給心竹向她間接慢慢地說，可是不知不覺間竟先自流露一些，使這位快樂天使般的孩子，也墜入迷惘的霧中。

不久，心竹回來，低班的同學們也在宿舍門前響起集合的口哨。我說：

「你來正好，趕快送宛如回醫院，不然，她便趕不上她們報佳音的隊伍了。」

宛如立起身來：「不用了，不用麻煩葛大哥，我自己走吧！」

「心竹，你一定要送；宛如，原諒我不再送你了，因為今後，一切事都要依靠葛大哥的。」

宛如看看我又看看心竹，似乎想說什麼，因為忙著走也就沒有說。

心竹再回宿舍時，我把我今天的新決定告訴他。他說：「這樣也好，要幹就痛痛快快地幹，不然半明半暗拖泥帶水地，實在不夠意思。」

「有些事總要做個安排，」我說：「譬如對於宛如——」

「把她忘掉算了！」

「那是我們心裡的想法，但是對於她，我不能突然沒啦！將來她若問到你，你也要有個妥善的說詞。」

心竹曾經批評過我，說我想得太多，計劃得也太多，事事不如他來得乾脆。事實上，無需木莎忠告，我也不能再三心二意；我已下定決心，一切結束，澈底結束。只是對於宛如我可以不了了之，對於詩彥，我不能不做些安排。如何安排？本想也和心竹研討研討，但是看他那樣子，我只好暫時放在肚子裡。

06

夜車裡，我因種種思考，未能入睡。我設想許多理由來應答我的叔叔和下鄉辭別我的父母。我叔叔本意要我留校深造，不然便希望我回到泰城，在他的普濟醫院裡共同為地方服務。只要我來，他便將擴建院舍增添設備，使這荒僻縣街的醫藥水準，也追上其他的文明大城。我叔叔這種質樸切實的事業精神，常常使我感動，若不是我已獻身國事，我一定會追隨他的腳步，但現在我將使他兩方面都失望了，因此感到十二萬分地愧疚！

叔叔正忙於午前門診，見我進來忙招呼一聲：「你到啦，先休息吧！」他還以為我像往常一樣來渡假，並不知我是專程為長期別離而來辭行的。

車上未得好睡，一覺醒來，已屆中午。午飯時叔叔對我說：「黎經理剛剛親自來，請你今晚過去吃晚飯，我已代你答應了。」

「太打擾人家，我想還是不去好！」這次回泰城，我原想與詩彥見面，以便向她解釋一番結束過去。但在車上想來想去，覺得情感的事越描越深，越聚越濃；為了沖淡記憶最好避免碰頭，所以我又決定不再見她。我打算行前給她留書而去，就算一了百了。誰知我剛到家，她爸爸就來請客，

我只好請求叔叔把此事謝卻。

「沒有關係，」我叔叔不明內情，還說：「我們是老朋友了。這一次是特地請你，你不能不去。聽說宛如給他女兒來信，說你最近回來，他就常來電話打聽。你們在瀋陽幫了小蓉的忙，你不能不給他個機會盡盡心。」

「那麼，好吧！」聽叔叔這樣解說，我感到可能是詩彥在作手腳，既然如此，我只有面對現實。

當我到詩彥家裡時，黎經理還在商務會裡開會。她的母親招呼過後便到廚房裡去指揮廚娘燒菜備肴，只留她與小蓉擔任我的招待。

她的家，我還是第一次來。一般商民因受經濟統制的影響，許多物資都感缺乏，但她家的日用鋪排仍相當闊綽。壁爐中的火在熊熊地燃燒，她仍不停地向裡面投擲撫順的無煙煤塊，像松枝一樣地發出呼呼的歡叫。

一種急驟上升的熱流包圍了我，包圍了室內的一切，使我特別感到呼吸迫促。我本不想說話，卻無意中說了一句：「太熱了！」

她接過去就說：「我怕又像在旅館裡一樣，把大哥給凍壞了！」

旅館！旅館！又是旅館！就是因在旅館裡有那麼莫名其妙的一瞬間，使我不願再見她的面；而她在今夕偏偏又有意地提起旅館。我心裡想：「你自己提吧，我已決心忘卻！」我故意未予接言，用沉默回答一切。她似乎未注意這些，也似乎在掩飾她心中的什麼，所以竟走到客廳的另一角，掀

開留聲機，問道：

「大哥，聽個什麼歌？」

「夢中人！」小蓉回答了。小孩子也有令人可怕的記憶。

熱氣蒸人的室中，像潑了一盆冷水似的，忽然暑氣全消。我似乎看到了模糊的月色和矇矓的夜霧，也似乎聽到了夜鶯的啼哭和松濤的哀訴，而一遍又一遍的「你在何處？」也都像對我發出的哀泣、呼求與痛苦的追尋。這本是我不敢設想的未來的場面，現在竟提前放演了……

我真奇怪，這個時代，什麼人有這麼多的感情，唱出這樣撕肝裂膽斷腸的歌聲！

歌聲停止，熱意又冉冉上升。

今晚，她仍穿著那件玄色絲絨旗袍，堅定的口唇上塗抹一層腥紅的油膏，這是一種怎樣的顏色呀！殷紅陪襯著猩紅，在圓圓溜轉發射電磁的雙睛下，那充滿生命力的口，噴射著火，噴射著熱情……

我，我在暗中祈求上帝，不再給我這青春的試探。

「詩彥，來幫幫忙呀！」廚房中發出一聲呼喚。

「媽媽喊你，」詩彥對她妹妹說：「去，快去！」

「不是叫我，是叫你，你快去！」小蓉並不承認。

「我在這裡招待客人！」她說。

「客人是大哥，我也一樣招待。」

廚房裡再催促一聲，她狠狠地瞪瞪她的妹妹，「死蓉子，下次不帶你去治眼睛！」又輕輕對我說：「這孩子懂事太多——」然後勉強地離去。

「下次你自己害眼睛吧！」指著她的背影，小蓉也不示弱。

詩彥離開客廳，就像后羿射落那多餘的太陽，空氣頓時清爽。

晚餐十分豐盛，有嫩江的鮮鯉，有肥美的山雞，有一般「滿洲國」民「配給」不到的高級罐頭，有他家獨自珍藏的白玉露醇酒。另有兩位自省城龍江來的商界人物同席作客，他們和黎經理年紀相仿，儘談些經濟情況和市場內幕。我自然搭不上言，但我仍然吃得十分愉快，也頗不寂寞，因詩彥就在旁邊協助配酒上菜。她對那兩位客人恭謹端莊，對我卻和悅殷勤，我似乎喝了不少美酒，也用了不少珍肴，但她仍恐我吃不飽，最後一碗飯也盛得滿滿的。我當時似乎有一種奇怪幻覺，若不是幾天後我將開始一種幽靈般的生活，在心情上，我豈不是已經成了這個家庭未來的嬌客？

飯後，黎經理又會同那兩位客人到什麼地方去商談生意，先走了。仍由黎太太和她們陪著我閒談。

詩彥說：「本來我求爸爸只請你和叔叔的，那麼我們大家可以在一起吃，情緒就舒服多了。誰知叔叔沒有時間，爸爸又請兩個外人來，開口買賣，閉口買賣，真是討厭！」

我本想問問她給宛如寫信是什麼意思，同時也把自己表白表白。一因黎太太始終在座，不便暢

談；一因自感酒力發作，頭暈目眩，深恐說話不當，所以急流勇退，說聲謝謝，告辭走了。

我獨自邁向回往普濟醫院的路。雲淡星稀，下弦月孤懸天空；雪路冰凝，步履聲踏破長巷；餘酒生溫，我未覺北風刺骨；前途迢迢，卻感到人生茫茫……

我剛踉蹌地轉過一個街角，詩彥已從後面追蹤而來。

「你又跑來做什麼？」我發出一句又激動又無奈的詢問。不知是對她表示歡迎，抑或責難。

「送送你！」

我無言，由她扶持著我的臂膀，向前漫步。

「媽媽進屋休息了，我藉機溜出來……我知道你喝了不少酒……我不放心你自己走！」

「不行，你給了我過多的照顧，這種照顧已不適於我這種人生。不論酒抑或感情，我都能自己控制，我不會跌倒，也不至於迷失。我在信上說得明白，這一點你該已經深知……」

「做為一個哥哥，總不該拒絕妹妹的關心，即使僅僅是朋友，她也該有如此的權利。」

「不是這個意思。」我向她解釋：「天寒地冷，我有足夠的體力支持，你，一個女孩子，陪我走冬天的夜路，實際上是增加我良心的擔負……你不在乎，我何能忍？」

她不做聲。

我只好懇求她：

「詩彥，聽我話！我送你回家——」

我們又循著她的來路走去。

到了她的家門，我祝福她晚安，然後轉身。誰知沒有幾步，她又從後面跟來。

這樣，我送她；她又送我……

我們都緊閉雙口，誰也不肯說話。

我們遇到打更的更夫，也碰到巡夜的巡警。

最後，還是我止不住開口：

「聽宛如說，你生我的氣了？」

「別聽她胡說！」

「她胡說也好，不胡說也好，今天我想把話跟你說個明白；我絕沒有輕視你的意思。我給你寫那封信的目的，話雖然很多，實際只有一點，那就是我們可能走錯了路，我們必須重新再開始。」

「我不反對重新開始，不過，我們並沒有錯！」

「你沒有錯，可是我錯了。而且，我現在又有了新的計劃，你雖然不反對重新開始，我卻想一切即時結束。現在，我想，假若你聽從你父親的意見，在這個寒假中結婚；我，今天，是被請來吃你喜酒的話，那，你的未來可能是更幸福的。」

「這句話可是真正看不起我了。你現在還以為我不配走入你們那人群裡，去接受真光的照耀嗎？」

「你誤會了——」

「我影響了你的新計劃？」

「這都與你無關。我現在的計劃是今後不再會見你們——你和宛如，所以也願你能夠靜一靜。說實在的，你比宛如堅強、勇敢、成熟得多，做什麼都夠資格，只是，我怎麼說才好呢？我為你著想，至少你現在要靜一靜，一切要靜一靜……」

我因為擺脫家庭還沒有進行，對詩彥就不能多提前透露口風。我這樣吞吞吐吐的解釋，結果越使詩彥迷惑，因此她似乎是想到別的上去。

「大哥，」她悽然而激動地說：「也許在瀋陽時我得罪了你……但是我走時我曾說過，一有機會我將另行報答。現在我請求你原諒我，接受我，你說你不預備再見我們了，那麼，現在我就送給你……」

於是她依在我的胸前，仰起她那在慘淡月光下呈顯蒼白的臉，微閉著被冷風封鎖的眼睛，在祈求，在等待，在奉獻。

「詩彥，」我說：「不可以，不可以這樣！你給與我的已經太多，你使我未曾迷失，你使我感到被尊重。你的事，是你奮鬥應得的成果。詩彥，確實的，我應該得到的，我已經得到了；我不該得到的，我不能夠妄求。」

她沒有收回，仍在那裡等待，等待，等待，睫邊滲出冰滴般的淚珠，鼻翼與口角亦陣陣抽動，

然後像對上蒼祈禱似的，喃喃地說：

「大哥，相信我，請相信我！相信我也心地無他。我只把這當做是朋友間最崇高的饋贈；不然，我將為我現在的行為感到羞恥，今後我將再沒有臉面坐在鏡子前面，看我自己。」

這純是個僵局。她說得那麼誠摯、崇高、純潔，我若不接受，倒顯得我自己的心靈卑鄙齷齪，何況今日的結局還是最初由我所惹起。但，我能嗎？我真是進退維谷左右為難。接受？我則自感不義！拒絕？她將因此蒙羞！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夜風凜冽，心血沸騰，冷熱交併，我的胸膛砰砰爆裂，頭腦惴惴脹痛……餘酒全消，新釀醉人……於是我用力捉住她的膀臂，低下頭去，用冰冷的口唇，緊緊地吻著，緊緊地吻著——吻著她的前額。像慈祥的老父，親吻他稚齡的愛女一般。我在想，在情感上詩彥還是個孩子，我自己應該做個成人！

第二天晚間，我得機會和我叔叔長談。我惟恐說深了洩露工作祕密，說淺了又解釋不清，但不等我說上幾句，我叔叔已了然於懷。他不但不再追問我，反倒給我下了指示。他說我以前想到哈爾濱去做事，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諒解，要想求學深造則不妨去日本，去北平就不如去內地。他說求學問是他最贊同的理想，參加抗戰也是這一代青年應盡的義務。不幸他自己畢業時正值九一八事變，李頓調查團事件後又因參加義勇軍而失掉了深造的機會。現在他隱遁於這塞外小城開業行醫，十年來他已從實際診療中領悟到為民服務的真諦。多少大學畢業生，受過高等教育，為了自己的生活享

受，都熙熙攘攘地擠在大都市；而偏僻的地方，人們的疾苦生命，還委諸於神巫符咒。現在他已成了這地方居民真正的救星，每當他走到街上，人人都對他敬禮，他自己也以保衛這地方人的生命健康為己任。他已離不開這地方，他早與這地方人的生命聯接在一起。可是他又說我還年輕，我可以先做做其他工作，等到抗戰結束或等到他這個年紀，也應該走他現在的路，因為這才是一個醫生的本務。

「去吧！」他深深地注視著爐火：「為祖國服務去吧！這也是我青年時期未了的心願。」

最後他問我何時動身，好給我準備充足的旅費。叔叔對我這樣瞭解與支持，感動得使我立時想對他說出全部實情。我覺得我不應該再隱瞞，我應該告訴他，我哪兒也不去，我只是隱姓埋名，不出「滿洲國」境；我不去內地也不上北平，我仍留在東北現地，為國家民族作最危險的敵後鬥爭。但這些話我一句也不能說，我竭力收斂我的激情，我含著眼淚與他一同注視著燃燒的爐火……為叔叔著想，他認為我已遠赴後方，便不會擔心我的安全，一朝發生事件，也可免受牽連。

次日，我下鄉看我父母，在鄉下住了一宿。

當我與叔叔商談我走後應該對家裡安排的事情時，詩彥忽然來訪，見我叔叔在座，便說：

「我父親說，在瀋陽時也很麻煩葛大夫，叫我送來兩條前門香煙，託紀大哥帶去，給他謝謝。」

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她所說的純屬託詞。叔叔似乎未注意這些，因有患者來請出診，便起身離去了。

「這就是你來的目的？」我請她圍爐坐下。

「你以為？」她反詰。

我不願與她再對臺詞，叔叔毅然給我的同情使我獲得信心，我覺得把話說明白更比較容易擺脫，而且她進來時所做的託詞也給了我一個新的啟示。於是我倒認為她來得恰好，決定向她做有限度的坦白：

「詩彥，你的心，我知道，因此我不能不向你求取最後的原諒。以前我們談過的許多話，那只算是紙上空談，事實上我早已有了工作。現在我又接受任務要離開家鄉，離開一切。因此，我們沒有再會的機會，我也不敢再承受你更多的好意。在我助你解決問題時，我本無他意，但我應該受咒詛，我一時缺乏自制力，在你心裡刻下較深的痕跡。說萬千話，也不能道出我對你的懺悔。假如事實可能，不可能也得如此，你必須將我忘掉，這樣你會得到幸福，也可減少我對你的負疚。假如你要記憶，那就像我們所共同說過的，一切限於友誼。」

「我不是向你討債來的，你不該這樣不相信我。」

「現在我已把更重要的話向你說明，這表明我對你的信任。」

「你是說你要到後方去？」

「可以這麼說——」

「你一個人走嗎？」

「一個人。」

「宛如呢？」

「你知道她的個性，她不適於這種旅程；而且我和她也沒有和你談的這麼多，這麼深！」

「我也不可以去嗎？」

「你當然可以，只是不能和我一起。」

「為什麼？」

「因為我走的路線，既艱險又迂迴，無法與你結伴！」

「我可以自己走！」

「走到哪裡去？打消這個念頭吧！詩彥，做人最好講實際，別追求空想。像我這種荒原野馬的人生，多少是受了空想的毒害，但我不能再更改。你不要再蹈我的覆轍，你要以葛大哥為榜樣，他為人誠樸切實，學問好，脾氣好，對你的印象也很好；你對他怎樣？可否告訴我？」

她沒有直接回答，卻說：「假若我也不願以溫室為家，喜歡在野地裡搭帳棚呢？」

「不！詩彥。你剛從不幸中走出，你應該追求幸福，不能再冒風霜，重尋苦難。」

「大哥仍認為我勇氣不夠？」

「不是的，我只是不願見你跨入窄門。」

我們的談話到此為止，時間似乎從煙囪中流出，我們兩個被爐火烤得通紅的臉，也隨著火焰的

將熄而轉趨黯然。我不敢動身添加炭火，恐怕驚走這難得的靜默，不是無言勝有言，在我是避免新的考驗……

「你什麼時候走？」

「今晚。」

「到瀋陽能呆好久？」

「一禮拜。」

「可以給你寫信嗎？」

「一星期內，可以寄給葛大哥代轉，以後他也找不到我。我想我們的話已談清楚，沒有再寫信的必要。」

「也許沒有寫信的必要——」這句話她說得十分平靜、微弱，語尾拖長又近乎呻吟。她拿起火鉗，無意義地撥弄那殘餘的灰燼。

「好了！詩彥，你還沒有給我回答，」我站立起來。「這次我回瀋陽，我把你正式介紹給葛大哥，連同你父親的香煙。你要聽從我的建議，不要再找我，今後的一切，都要找葛大哥。我說是一切，你懂我的意思？」

她承認的笑一笑。

「那是說，你同意我的主張？」

她也笑一笑。

「而我們的記憶，只限於崇高的友誼！」

她又笑一笑。

我送詩彥離開，正趕上叔叔出診回來，他看著我們雙雙走在一起，進到後屋時便很鄭重地問我：

「你想帶詩彥一起走？」

「不！」我半苦笑地回答。

「詩彥確實是個好孩子！」叔叔坐下後又慨嘆地說：「唉，本來你這次大學畢業回來，我很想談談你的婚事，可是前夜你提出遠走計劃，我就只好不提。你在外邊有沒有朋友我不知道，就這個城裡我所認識的女孩子說，孟宛如和黎詩彥都算上選。論長相，宛如比詩彥迷人得多；論性格和能力，詩彥比宛如強百套。可是詩彥早就訂了婚，最近又聽說解除婚約。而且……」叔叔忽又頓一頓，「這件事聽說和你還有些瓜葛，有一次黎經理跟我談起，好像對你還有些誤會……當然，你若真把她帶走，那倒無所謂了；事後我可以跟黎經理說開。不過，我要給你準備雙份旅費了！」

「叔叔，謝謝你，你對我太好了！不過我確實沒有這個意思。解除婚約的事，我只是偶然幫她出個主意，今後的事，方才我和她談過，她已同意我給她介紹葛心竹。」

「心竹很不錯嘛！」叔叔立即表示。

「所以，再過一段時間，他們感情成熟時，還望叔叔出面做個正式介紹人，那麼也就解開黎經理對我的誤會了。」

「對！對！幫人幫到底。」叔叔很讚許地說。

07

回到瀋陽，我即準備向祕密機關搬遷。心竹幫我整理行李，除衣物用品外，一切代表我過去生活的東西都不攜帶。我將筆記本、參考書、臨床講義、各科疾病學，以及剛領到手的畢業文憑和醫師證書，都委託心竹得便送給我叔叔，這是我同他約定的。然後燒掉畢業同學間互相贈別的相片和一般朋友間往來的信件；這樣做對於別人將有很大的好處。收拾完了，我感到好笑，就像處理一個已死的人的遺物似的……看那紙灰化做白蝴蝶，心頭忽然湧上來一種不是滋味的滋味。其實像日記已經多年不寫了，信件都是經常銷燬的，每當時局有變，情況緊張，組織便命令清理一次。青年人總是珍惜小感情，幾次三番仍未清理徹底。這一次是我生活的大轉變，徹底清理時，仍發現有些令人留戀的東西，不忍付之一炬。

最令我聯想不已的，便是當叔叔看到我的書籍文憑時，他該有什麼樣的感覺，當然他的感覺與單戀宛如而死的李庸的父親不同；李伯的希望是完全幻滅，叔叔還以為我在實踐他另一理想。然而天知道結果有何兩樣？

「歇歇吧！抽根煙。」心竹說：「奇怪，詩彥又送香煙做什麼！」

「正好，」我接過一支大前門。「工作上的事，我們已交代清楚，現在就談談詩彥吧！」

「詩彥有什麼可談的？」朋友間充滿分別情緒，哪有談女孩子的興趣，但我鄭重提出，倒也引起他的注意。

「詩彥對你有很好的印象，」我說：「我這次回來的時候，曾同她親自談過——」

「你是什麼意思？」

「我想我得把話從頭說。這些年，你知道我對宛如很好，但我有工作在身而她不適於這個，所以不能談別的。以前我曾有意將她介紹給你，可是你現在也參加了工作，自然也無從談了。詩彥呢，原是我計劃徵求的工作對象，不料現在情勢都變了。她因解除婚約，無論她的家或她任職的小社會，她都不願再久呆下去，她必須換換環境，尤其是在精神方面需要朋友支持。我若不是受命徵召，我當然可以負擔這個責任；她若已經是同志了，那自然可以把她交託給組織。她現在可以說是被拋在半天空中，誰來接手？誰來相助？這副擔子我雖然不想加添給你，事實上又不能不加添給你了。記得你曾把她與宛如比較說，要交朋友的話就交這樣的。所以現在我正式向你介紹，在工作責任方面，在社會道義方面，在朋友感情方面，你可以不理會宛如，卻不能不照顧詩彥。」

「你自己是怎樣打算？」

「我若不參加工作，也許很早便對宛如打了主意；如果組織不徵召我完全獻身，我也未嘗不可和詩彥多交一段朋友；但現在一切不能談了，一切都得放棄。」

「你不要一切事都往我身上推，我和你現在有什麼不同？」

「當然不同！有一次你問心超兄為什麼被判十五年，我還沒得機會和你談，原來審判你哥哥時是使用《叛徒懲治法》，那是敵偽初年軍事鎮壓時期的法令，條文簡單，伸縮性大，判刑輕重，無從推測。一二三〇事件，敵偽新公佈了《國防保安法》《治安維持法》和《軍機保護法》，同時又成立了『思想矯正局』，並分設了幾個集中營性質的『矯正輔導院』，一切都有詳細的劃分。有一次，我參加法政大學同志的小組會，會後一位同志幽默地說，我們既是知法犯法，犯法也該知刑。於是他就依據新法令給大家都判了刑。有的五年，有的十年，有的無期。他說時間短的不用歡喜，時間長的也別憂愁，因為進去的是住小監獄，不進去的是住大監獄，只要抗戰勝利，大家同時自由。他說這些話雖屬笑談，確也是事實。大約從事蒐集敵偽軍事情報的適用《軍機保護法》，從事破壞敵偽電訊橋樑，焚燬敵偽倉庫工廠物資或殺敵除奸的行動工作者，適用《治安維持法》，而從事祕密組織宣傳等所謂陰謀推翻帝制危害國體的同志們，適用《國防保安法》。量刑輕重還要看負責任的大小和工作活動的範圍。重的不說，輕的還可只判到矯正輔導院裡做幾年勞工而已。」

「我現在要判多少年？」心竹聽得很感興趣。

「目前，你只是輔導院的程度，再過幾年也不會超過十年，而我現在就是死刑，這就是你我不同之處。你可以對你的人生做較長的計劃。我對我們的工作前途並不悲觀，也確信最後勝利終必來臨，但對我自己不能不做最壞的準備，因此我不願在情感上留下牽掛。頭些日子，另一位負責任的

同志已受絞刑，我想，我也得隨時準備接受那個繩圈套上我的頭頸……」

「死生有命，不能那樣肯定。」心竹說。

「至少我不該再編織無邊的夢，而且我也不願任何女孩子再煩擾我的決心和內在的安寧。現在我覺得詩彥的未來比宛如更使我關心，所以也就把她向你特別交託。我曾向她說過今後一切事都來找你，同時也跟叔叔談過，將來你們……」

「你又是計劃太多！」心竹截斷我的話：「好吧，我想我還是把她當做一件工作來接受吧！如她有意參加工作，由我來向組織介紹，別的暫時都別談了。」

「若論氣魄能力，詩彥都是優秀的，不必再訓練考查即可納入組織。只是我現在的想法有些矛盾，我說不出是什麼理由，反倒不願她也參加工作。不過，以後的事，完全依你的意思做吧！」

最初，我先搬入尚智里暫住。

這時，民國三十二年元月，組織於頒佈工作大綱後，又通告為了適應新的工作局面，中央已核定領導責任的逐次繼承人。我們的組織雖受中央指揮，但瀋陽去重慶遙遠，電訊交通時常中斷，我們只有孤軍奮鬥，獨力應變。中央對我們的組織有遼、吉、黑三省，長、哈兩市，及日本等六個單位的編制；但東北是一個整個地區，敵偽機構也是一個整體，我們的組織不能不聯合統一，機動運用；所以中央指定六個單位的共同負責人，設立聯合辦事處。我們對這個總機關擬定一個籠統的化

名，稱為「省方」。這樣，在黑河工作發生困難的同志，通過「省方」我們可以把他轉調大連，同志因偽職「轉勤」他地的，也可與當地組織取得聯繫，繼續活動。因此，我們的機動性大、辦法多，可以適應變化多端的環境。按著這個通告，指定「省方」的總負責人為第一負責人，亦即我們所慣稱的負責人。負責籌措各種工作經費的經濟建設委員會的書記長為第二負責人，通稱書記長。主持通訊宣傳機構的東北通訊社社長為第三負責人，簡稱社長。通告中又說：這種安排不只是建立平時的指揮體制，實是為變時預作措施。蓋今後工作加強，鬥爭日劇，第一負責人蒙難了，第二負責人就要繼續領導，第二負責人不能執行職務時，第三負責人就要肩當大任。立義森嚴，語意沉痛，讀後有斜陽古道不勝蒼茫之感。

各負責人辦公處所的化名亦經規定。負責人為至善里，書記長為大勇里，社長即為尚智里。另有幾處如敦和里者，則專為各督導人員來往各地臨時住宿並接洽工作之用。我住入尚智里的第二天，社長來里當面對我說，這次徵調兩種人員參加省方工作，一種是督導員，一種是編審員。東訊社的工作本是編審人員的責任，但編審人員只在內部從事書面工作；其編審成果的分發及各地通訊調查資料的蒐集，仍需賴各督導人員分赴各地之便來往攜帶；遇有問題亦需就地指導。因此要我對這方面的工作也熟悉熟悉，我才瞭解更多的情況。

原來東訊社在各地尚設有十九個通訊部，通訊部也出版祕密刊物。如營口的《渤海潮音》，瀋陽的《拓光》《公理》《大地》，四平的《改進》，長春的《新血輪》，哈爾濱的《江流》，吉林

的《南望》，此外還有康平的《柳邊》，通遼的《駝鈴》，齊齊哈爾的《先鋒》等。而東訊社除了出版綜合性雜誌《東北公論》外，仍有其姐妹版本的《時事月刊》，專門刊載抗戰形勢、國際動態，及敵偽政情。在既有的現地教材、抗建文庫外，社長還說即擬發行文藝性質的《黑白叢刊》。自一二三〇事件後，敵人了解文化與文藝活動是啟發民族意識的有力武器，民族意識的啟發又與東北青年的抗敵活動成正比。為了壓制及打擊此種活動，敵偽最近公佈一項文化統制政策——藝文指導綱要，取消「全滿」各中文報紙的副刊，一切文藝創作皆須以日文發表等等。社長說：文藝是我們文化戰的主要環節，對培植同志的革命情緒也極重要；我們既不能再利用敵偽報刊做滲透性的宣傳，我們就自己出版，祕密傳佈。東訊社已將《虹霓》劇本刊印，現在正將我的另一長篇小說《夜行人》製版，他問我還有別的作品沒有，詩歌散文均可。提起《虹霓》，我想起些人和事，提起《夜行人》，我另想起些人和事，我還有別的嗎？我還要有別的嗎？

過了七八天，伊正與心竹接頭回來，給我帶回一包小東西。心竹說是我忘掉的，煩他帶還給我。打開一看，原來是鍾鳴送給我的那個小鏡框。這東西我已把它送給心竹了，心竹又把它送還幹嘛？另外還有一封信。信封是摺疊過的，外面沒有黏貼郵票。不用看，我就明白了，我的心驀然跳將起來。

信，內容不多，她先說她完全遵從我的建議，有事一定麻煩心竹；而現在就有事，因為她已向學校辭職，她也不願在家鄉另找工作，她要離開。往哪兒去？哪兒均可！做什麼都行！最好是再找

個機會讀書。她已把這個意思向心竹說明，一切憑心竹全權安排。信是封著的，心竹沒有拆閱，而我與心竹說定，她的事我再不管。她如何寫給心竹，心竹對她做如何計劃，心竹無需向我告知，也就沒有附筆陳述。最後幾句話是她描述對我送別的感想，而這短短的幾句話卻使我墮入萬丈深淵，既不能掙扎上浮，而又久久不能落底！使我一直懸游於失重失神之中。

使人銷魂的汽笛聲啊——
你真的走了；
我未曾感覺到你的冷酷，
可恨那機車太無情啊！

我反覆低誦這幾句詩樣的言語，與詩彥這一段快樂的抑或痛苦的歡合悲離，也迅速像交流電波似地在我的心頭轉替。她未曾感覺到我的冷酷？她恨那機車太無情？詩彥，恨我吧！是我冷酷，是我無情，恨我吧！只要你恨我，我的靈魂就稍得安歇。我已看不見那些字句，眼前黑森森一片……

那一晚，我離開普濟醫院時，叔叔堅稱要上火車站送我。我說這一次不要特別，一切應與往常一樣，那麼將來有事時，叔叔可以推說不知。叔叔想一想，便道：「那麼，我就不送你，我們各盡各的責任，以後一切要自加小心！」說罷，破例地與我握握手。那時代，親族間並不通用這種西洋

禮節，因之使我當時頗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楚。

嚴寒的隆冬，荒城小驛，夜行列車，很少有旅客搭乘。鉸票驛員佇立於「改扎口」處，直打哆嗦，長耳皮帽深掩他的脖頸，寬黑口罩橫遮他的鼻前，眼睛埋藏在縫隙間，除了他自己的手，可能什麼也看不見。月臺上另有一位旅客，套著長統皮靴，豎起大衣皮領，來回急促踱步。見我進站，便向我湊來：

「我已等你好久，車快來了，我真擔心你會誤點！」

「唉，」我不知是喜悅還是痛苦：「你又來了！」

「我當然要來送你的。只是我怕別人看出來，所以穿了父親的衣帽……」

「這樣很好，你可以暖和些。」

「暖和？」她說：「入冬以後，我感到今天最冷！」

「詩彥，別說這種話，我請你寬恕我！忘掉我！」我哀哀地懇求她。

車來了，我跳上踏板。

車開了，她握住我手不放。

起初，她在月臺上隨著車走。驛燈昏暗，我看不清她的面龐，只感到自己的淚水搖搖欲墜。車加速了，她快步跟著奔跑，陡然間，車廂拉斷了我們的手，她像一枚落葉似的被拋在車後。我定睛向後遙望……我真想跳下車來……我什麼也看不見，只見一條影子飄落在黑森森的月臺的盡頭。

就是這樣我別離了詩彥。我冷酷嗎？我何嘗冷酷？我不是用更大的愛心去愛更廣大的人群嗎？我是熱情的，我有足夠的熱情來從事這如火如荼的工作。我已將身心做全部的奉獻，我不願保留一點對任何個人的私人情感，雖然這個人也許就是詩彥！但這能算做冷酷嗎？若然，時代不是更冷酷嗎？這都是冷酷的侵略者所造成的冷酷時代，冷酷時代就產生冷酷的人，冷酷的人就必有冷酷的熱情了！我衷誠希望，詩彥真能感到我的冷酷最好，這樣會使她早一日把我忘掉；不然，那不是可能造成更冷酷更悽慘的結果嗎？因此，我倒怨恨那機車不該替我承擔過錯。由於機車，我想起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徵》中所引述的比喻。他說在蒸汽機裡的水蒸汽，由於機器的控制，才能發出能力使機車在鐵軌上運行；同樣在理智控制下的感情，才能做出更偉大的事業。所以艱鉅的苛烈的革命運動，就需要所有的工作者都保有冷酷的熱情。

照理，我應該得到如此邏輯式的平定；然而未曾。恍惚間，我忽然發覺我似乎是愛著詩彥，這，這，這是怎麼說！我痛擊頭顱，緊咬牙根，我必須清醒！這是如何愚蠢的念頭？我已走過多少愚蠢的道路？當我一步一步走上萬里征途，當我前思後想地把她向心竹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今才知道是自己在愛她，那，我是否要調整我既定的人生計劃？

不！不！不！

我沒有喜歡過宛如，我也沒有愛過詩彥。

當然，抗戰一定勝利！

但是，這些年，我們的腳下有多少伙伴的屍體，我們的衣襟沾染了多少同志的血漬，我既沒有絕對機會與我所愛的永生廝守，我又怕與我所愛的扮演生離死別的慘劇，那我又有什麼可後悔？心理學上說，直感往往是對的，我的一切安排也都是無錯的了。一切都是激情，一切都是偶然。我未曾愛她，她也未曾愛我。最初我對她的舉動是毫無意義的，她寫這封信也是毫無意義的。時間會沖掉一切，時間會改變一切。當激情消散，偶然成空時，詩彥會發現心竹是她的理想，心竹是她的一切。

想到這，我又覺得我的安排真是完善無缺，世間事沒有比這再美好的了。詩彥咒詛那機車，對！確是那機車太無情。於是我不自主地唱起：

冬夜裡颳起了一陣春風，
心底死水，起了波動，
雖然那溫暖片刻無蹤；
誰能忘記那逝去的夢！

誰能忘？我就能！不能也得能！
我取火柴將那封信燒掉，一面燒著一面哼唱，一面哼唱一面燒。

「紀剛，我無意干擾你，假若你不唱歌，我不會將你驚動。我怕你歌聲大了，驚動了四鄰，驚動了樓下的顧客。你知道，我們這兒是從來沒有人唱歌的！」

「對不起！對不起！」伊正什麼時候上來的，我連連向他致歉。

「你坐在這裡，已經三個小時了，」伊正解釋：「你呆呆地坐著，沒有抽煙，沒有喝水，有時冥想，有時翻閱你桌上那些東西，那是什麼，都是信件吧？有時候你還對那個鏡框出神。紀剛，你有困難？如果需要幫忙，希望你不迴避我。」

「沒有，沒有，已經解決了！」

「我們是道義關係，除了工作，我不該問你別的。不過，我們既同住於尚智里，我不能視而不見。我們也不能欺騙自己，有些事不妨談談，因為有些東西，是不能用火銷燬的！」

「好吧！」我把桌上的信件攏總湊在一起，拿到他的面前，放在他的桌上：「這些東西也是早該燒掉的，因為有個朋友對我直言斥責，要我對別人的感情負些責任，所以我想重新檢閱一遍，再作處理。方才我就是在審查、研判，到底是我用錯了情感？還是我寫錯了詞句？既然你不能視而不見，就請你見個徹底。」

這突如其來的舉措，使伊正感到愕然。他以為方才的言語衝撞於我，因而想要解釋。

「請你不要誤會，」我說：「我請你看這些，是希望請你給我做個批判做個見證，你就看看吧！我要睡一覺，回頭再說。」

一覺醒來，四周寂寥，馬路上已了無聲響，似乎將近午夜，伊正還在他的小燈下整理文件。我因感到頭昏腦脹，周身滾火，繼續賴在床上未思起身，但卻止不住轉輾反側。伊正察覺了，隨即倒來一杯熱茶，送過一袋醬肉燒餅，同時也移過一張椅子，坐在我的床前。好像他正在照顧一位重病患者。

「晚飯時，我沒有叫醒你，我知道你愛吃這個……」

「謝謝你，伊正兄，實在謝謝你。」

「我已經被徵召來此一年，你這幾天的心情，我想我能夠了解，雖然我們不一定有相同的記憶。」

「我實在並沒有什麼！」

「當然，一切都會過去。」

「人，沒有記憶最好！」

「你是學醫的，你比我更知道，那是辦不到的。人不但不能沒有記憶，而且記憶也不能被分割，過去的會永久影響未來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不要被記憶絆倒，更好的是從記憶中獲得鼓勵。」

「……」

「信，我都看過了，好像是寫給很多人，而且多數是女的！」

「是的，她們有的是普通朋友，有的是準同志，有的也參加了組織，有的已停止了工作。」

「你是說，其中也有鍾鳴？」

「有她一個。就是向她收回文件時，她還給我給她寫過的一封信，使我想到何不向別人也要回。也算是擺脫社會關係的一項步驟。要是要回一些，今天才得機細看，我覺得還沒有需要負私人感情責任的地方。不過一切都無意義了，一切都成過去，我只要知道我可以心安理得就夠，無需再保存它們，等一會就煩你把它與那些作廢的文件一同投入火爐算了。」

「何必呢？」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的意思。」

「我看，這些東西都是你為工作寫的，所以它們可以被看做是公物；如果你放棄你的所有權，我可以為東訊社接收它。社長希望你寫些新東西，我看這些就是最好的作品，因為它們最純真，都是有所為而發，沒有無病呻吟，正好暗示一種人格的典型，這個時代，就是『將愛一個人的心分散給大眾』的新典型的時代。我想把這些當做是革命書簡看，可以列為『黑白叢刊』的一種。我還為它代擬了一個書名——《火舌集》，不知你認為可否？」

「你譬喻的太過份了！火舌是什麼意思呢？」

「我認為每一篇都像一片火舌，足以燃起閱讀者的革命之火。」

「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有的燃燒起來的可能是別種之火呢！也好，若是那樣，我只好說我自己是灰石之軀，可恨的是長了一條火舌，有何責任都歸咎於它吧！」

08

不久，我奉命自尚智里遷往大勇里。

這裡與尚智里不同，尚智里都是獨身同志居住，生活習慣稍形散漫還無傷大雅；這裡是一個家庭，不單起居飲食不要給人添麻煩，出入應對也要合乎身分，以免使鄰舍起疑心。在我個人是寧願住在尚智里，那個光棍堂更適合於想做苦行僧的我落腳掛單。而且大勇里地處東關，距小河沿不遠，每逢上下班或上下學的時候，若站在胡同口，就很容易碰到我們的同學和施醫院裡的熟人；對於我這已告隱身的人，一出一入就得萬分小心。因此，我儘量減少出入，外出時必須等待天黑，成了名副其實的夜行人。

更有一件使我感到彆扭的，是要我偽裝為書記長太太澄波同志的弟弟，還要扮演得親切真實。什麼姐姐弟弟哥哥妹妹的，這些稱謂我是不想再聽再叫了。我特別向這位「姐姐」提出異議，希望改個別的稱呼。

「你不知，」澄波同志說：「約定一種社會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事。以前在這方面我們曾經吃過虧。工作是需要智慧的，社會風俗裡也有很大的學問，今天我們得來的一點經驗，還是流過不少血

淚。」

她的話使我有些不解。

「一二三〇事件前，我與書記長都任偽職，」澄波繼加說明：「我們當時都在社會上活動。那時由東京回來一位女同志，住在我們一起，我們以為女人總是說女人的關係比較好，因之便假稱是我妹妹……」

「那不是很相當嗎！」我說。就像我心裡想我應該扮做書記長的弟弟一樣。

「相當？」她感慨地笑道：「社會上可另有一番道理。那時那位女同志為了接頭工作，常常與書記長同時出入，有人問到，就說出去看電影。」

「那是很好的託詞嘛！」

「可是出了毛病。」她揭開謎底。「鄰居人都閒言閒語地說我們這一家，姐夫和小姨有些不清白。我們才覺悟我們所定的名分，犯了社會上的忌諱；逼得我們不得不搬家。」

「另有一家，」澄波又說：「為了掩護一位受嫌的男同志，那位男同志年紀較大，就假說是男方的哥哥。男方天天出去上班，那位受嫌的同志不便出門，常常呆在家裡，時間久了，街坊又議論說大伯子和弟媳婦有些不名譽，因而漏出線索，引起特務的注意，結果他們都被捕了。我們若早發現這條原理，把要掩護的男同志定為女方的關係人，把留住的女同志定為男方的關係人，那麼哥哥和親妹妹就不會受注意而遭非議了。譬如你現在扮做我娘家弟弟，不論住的時間長短，不論書記長

在不在家，關於這一點，鄰居也罷，房東也罷，就不會再說閒話了。」

「啊！」我如夢初醒，覺得這些天對她矯情的淡泊、無關心，未免不合乎掩護上的要求。因此向她道歉：「這樣說，我對我的角色唱的做的都很不像了？」

「不客氣，」她說：「你已經表演得很好！」

我們的祕密機關，有家庭、有商店、有書局、出版社、律師事務所、小工廠，也有別的場所和行業。根據經驗，以最簡單的家庭為最理想。因為別的方式都要跟社會多接觸，那麼就會增多意想不到的麻煩。同志們的偽職也是五光十色的。一般同志都憑藉偽職或自由職業打入敵偽機關或各行團體，以發揮滲透作用。省方總機關的幹部需要專任其事，就以不任偽職，擺脫自己的家庭與社會關係為最便利。之後，為了工作與掩護的需要，也曾移花接木地分派男女同志扮做夫婦模樣，建立幾個「偽家庭」。

以家庭為祕密機關也有它的困難。瀋陽的住宅區多是古老式的建築，一個大宅院分別租給許多小家庭居住。租用這種大雜院的機會較多，應付起來卻複雜，像澄波同志所說的那種情形，便是如此發生的。最理想的住宅該是獨門獨院，但那種多是自用，不易租用到手。像大勇里的條件已是十分令人滿意的了。大勇里院落幽靜，房屋也很寬大，只有房東和我們這家房客兩戶住用。老房東是個旗人，年輕時是以吃皇糧渡日，現在更是不問世事，天天到萬泉茶社去吃茶下棋消磨歲月；房東太太在家管事，實際上並無事可管；另外兩個女兒正在讀中學，小丫頭們什麼也不懂；所以我們進

進出出，倒也方便自在。

書記長在大逮捕以前是我們覺覺團的聯絡人，被通緝後才由伊正前去接頭。書記長身材矮壯，面孔黝黑，講解工作時，雖然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是眼皮兒不眨、眼珠兒不轉，毫無表情，在我們崇拜英雄的青年同志心目中，他是最缺乏英雄感的一個。羅雷當時曾送他一個綽號——小鐵人，因為他太欠風趣了。

澄波同志，我以前也曾見過，方儀和鍾鳴都由她領導過一個時期。那時她清秀超逸，以我個人對女同志至高無上的敬意，我不願用普通的筆墨將她描述；可是看她現在那個樣子，實在令人有隔世之感。我的年齡不會少她兩歲，曾幾何時，在家庭主婦的裝束下，使人認為她已年近四十。她從不修飾，而且毋寧說用盡一切技巧向與女性心理相反的方向化妝。這一切當然騙不過我這醫學生的眼睛。不過，假若仲直和羅雷他們自後方受訓歸來，我一定要告訴他們，小鐵人的妻子，現在已變成老婦人了！

人不可以貌相，而今小鐵人卻是我們的第二負責人。當我被調到總機關以後，就有兩種感想，很想告訴仲直他們。一是我們多少優秀的領導同志們，在大逮捕中蒙難犧牲了，我們被積極補充上來，我們的責任是如何艱鉅重大！一是我們一定是有些優異的特長，被組織所器重期許，那我們覺覺團的弟兄們，應該如何奮邁工作，做更多的貢獻！

自從我不再故意地與澄波同志相疏遠，加之工作和生活雙方面的緊密接觸，在以後的一段生活

裡，我們處得十分融洽。我常常幫她做些家事，有時也為她帶帶他們的男孩「小民」，我真做到了我做「弟弟」的身分。我們本有超越五倫的革命道義，因之我們也產生了同胞骨肉般的感情。工作之暇，也談一些閒話。一天，我正洗碗，澄波同志一面整理炊具，一面感嘆地說：

「你看，生活是多麼煩瑣。」

生活的煩瑣是當時負掩護機關責任的女同志們，一致的苦痛呼聲，這種內心的悶躁，是我以前所不能了解的。她與書記長都是被指名通緝的要犯，在敵偽警網密佈下，他們改姓更名重新建立工作機關，不再從事任何社會活動，也不再涉足任何娛樂場所，而家庭裡又不能僱用傭人操作家務，白天她要煮飯洗衣帶孩子，晚間還要印刷文件整理資料，她實在是太悶躁太疲勞了。

書記長每日外出活動，回來後仍埋首工作，不苟言笑。我已在這小鐵人的身上發現偉大的氣質。他的矮壯代表剛強，他的黝黑代表意志，他的無表情的臉代表堅定。整個地說，是代表地下工作者的奮鬥力量，是革命抗戰勝利的保證。這種工作態度是令我景仰崇敬的，但在生活上便出了問題，因為這個家庭太缺乏家庭樂趣。

革命者也是人，人是不能沒有生活的。負重要工作責任的同志們，還能夠以工作的勤奮昇華了生活上的寂寞；一個被迫打入家庭承擔生活雜務的女同志，卻無法在煩瑣無聊的家事中尋覓安慰。

「生活、生活，討厭的生活！」一天，她又說。

「你是不是抱怨什麼人和事？」

「你不要誤會，我討厭的就是『生活』。聽說你是個醫生，請問你，一個人不吃飯能不能生活？」

「什麼意思？」我不解。

「我是說，現代醫學進步了，有沒有一種像維他命那類的藥丸，吞下一粒，便可以多少天不進飲食？」

「現在還沒有。」

「若有該多好呢！你看我現在整天忙碌的，多無價值，多無意義！」

我了解，一個超時代的女性，加給她以家務的綑綁，無異是一種酷刑。雖然做這些事也是為了偉大的工作。做為一個同志的我，在任何同志軟弱的時候，均有義務互相勉勵。於是我不能不向這位「姐姐」進言。

我滿以為我的理論夠正確，引用夠恰當，然而工作經驗比我更豐富的澄波同志，說出她更深刻的感受來。

「你不曉得，紀剛。你對工作還保有些文學家的意象，我最初何嘗不是那樣想？但不久你就會明白，小說是小說，戲劇是戲劇，而工作就是工作。接受一個地下工作者生活的現實，千百倍難於接受一個文學家書面上的構想。」

「事實上，」她又說：「我很明白，現在的我，喬裝著家庭主婦，掩護著祕密機關，是我唯一

的工作貢獻。我們已被摒棄於這個社會，時時都有被逮捕的可能；書記長除了為工作，就不願多出一次門。固然就現在的情況判斷，敵人可能認為我們已經撤回重慶去了；我們可以晚上到街上走走，看看電影、逛逛夜市，舒暢舒暢精神；但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危險，想想也就算了。這種比入獄還緊張悶塞的生活，過久了你想能怎樣？」

「我沒有經驗。」

「真令人發瘋！真不如進去！入獄了，一切拉倒，死活痛快！像現在這個樣子，這生活，這工作……國內戰局不見好轉，盟軍艦隊節節敗退，如果抗戰十年、二十年不獲勝利……就這樣子做一輩子地下工作，過一輩子幽靈生活……想到這，你能不心煩氣躁？」

晚飯後，房東的女兒們又唱起那撩人的歌聲——《五月的風》。歌聲伴著晚風飄落整個院庭，叫你不聽也得聽！陽曆年過後到春節，春節雖過，還沒到清明，在這早春的季節，唱什麼《五月的風》？而且小小毛孩子，懂得什麼人海滄桑？最令人厭煩的，是那位無事可管的房東太太，又擺來閒話家常。

「喲！胡太太，不是我愛誇獎人，你這位弟弟真怪好的，一個男人家能幫你做這麼多家事，可真不容易。我有兩個女兒，一個也不中用。可是什麼時候考呀？我看他天天在小房裡念書，從不跑到街上去玩，我敢打賭，一定考得上。」

「借你吉言，」澄波說：「快考了，考上的時候給你道謝去！」

「你說你只讀小學，你弟弟卻要讀大學，你為什麼不多讀點書啊？」

「我們家腦筋舊，重男輕女，不喜歡叫姑娘念書的。」

「不過，看你的談吐倒很有程度的，不像只念小學呢！」

「誰還騙你老太太？」澄波辯解著：「都是你老誇獎，我這還有什麼程度，不過一直跟先生在外面，時間長了，學會幾句眼前話罷了。」

「不要客氣，可是……你弟弟結婚了沒有？」

「謝謝你掛心，已經成家啦！」

「喲！正在念書，就結婚了嗎？」

「我們鄉下人，統統娶親早。」

「那，你弟妹為什麼不來城裡玩幾天哪？」

「我媽說，不讓她來，怕打攪他用功。」

「……」

房東太太走後，澄波過來對我說：「恭喜你呀！紀剛，你這婦女之友真是名不虛傳，房東太太也對你有了好感，我看她是想給她女兒打主意，可惜我回說你已結了婚！」

「回答得好！」我說：「這樣會好些，免得她再來麻煩。」

誰知那老太太並沒完結，半個月後又來一次。

「你弟弟考完沒有？考上了吧！」

「考是考上啦，只是檢查體格說身體有病，先讓休學，病好再念。」

「什麼病，看不出來呀！」

「說是肺部不大好，很輕的；若是看出來，可就重啦！」

「有病還是回家養好，有太太伺候……而且你也太累啦！」

「是我勸他在這裡養，這個病說是要隔房的。」

「可也是，大概他用功過度了，而且老是不開窗戶，他那個小屋子，空氣不流通哩！」

「是的，天氣暖和一點就要開的，他現在很怕冷。」

「沒吃藥嗎？趕緊吃藥吧！」

「已經吃啦，天天吃哩！」

從此以後，我這個「胡太太的弟弟」，由一個準備投考的學生，一變而為需要療養的病人。裝病，我有本行的知識，弄些大小藥瓶擺在書架上，定時開開窗戶，一切都很像了。

澄波在這類談話應對上，常是很圓滿的。本來，按著我們工作的原則，一切要爭取主動，避免被問，必要時反問人家。但這老太太朝夕見面，你若問她，她更問你，所以只好採取消極的防守政策，儘量少接觸，不多說話，說一句要記住一句，以免前言不對後語。比較起來，大勇里的老太太

問題還算簡單的，要比應付別的社會人物容易得多。因為老太太們的家常瑣事多，政治警覺小，對於我們工作的掩護力也就強些，而且做為一個房客把房東交往好，遇事時也就消息靈通，多得照應。譬如「派出所」要查戶口啦，「鄰組開會」啦，「防空演習」與「救護訓練」等等，一切她都代理，澄波就可避免出席。總之許多地方都需她的美言。可是交往好就無法拒絕她來串門子、說閒話，問東問西，又頻添麻煩。這種既要處得好又要來往少的微妙之處，就完全寄託在澄波身上，要靠她運用機智聰明和忍耐力來妥善達成。這個任務要比一個外交官折衝一個國際問題困難得多，因為這個任務放在一個負責掩護機關的女同志身上，成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無限期地，時時刻刻地，注意著，警覺著，運用著。這種長時間的緊張與束縛，實在容易引起神經衰弱，無怪她在對工作不能提出異議時，只有怨艾生活，討厭生活，而控訴生活的煩悶與瑣碎了。

我受徵召，擺脫家庭、放棄社會，深入地下，從事現地工作，完全是出於理智的實踐，在心理上也多半是主動的成分多，一時還沒有感到苦惱。另一方面，我雖然斷絕了個人的社會關係，但與一般的社會尚沒有絕緣；只要在沒有熟人的地方，還可以自由隨便，而被通緝的同志們是被動地關在敵偽社會的門外，想自由生活，想隨便行動，就會多遭危險；許多活生生的人生要求，都得克制收斂。澄波同志的內心苦痛，我現在雖然瞭解一些，但沒有辦法相助，也只好任她受情感、理智、工作、與生活的煎熬。

一次，夜深了。先是小民吵夜不停，我在自己的房間中趕印文件，次日書記長要帶它出外城，

不弄妥當是不能睡覺的。好像澄波剛把小民哄睡，就聽她與書記長小聲地口角起來……很久很久……我覺得我應該過去看看，便藉著問點文件上的問題過去了。

「你就曉得你的工作，」澄波坐在小民身旁，有些哽咽地說：「你不知道我的工作，你毫不同情我！你根據什麼說我懶惰？」大概是書記長催促她快點幫他整理什麼，不要她休息而造成的紛爭。看我過來，也把我拉入問題裡面。「你問紀剛，我每天每天，哪有一時一刻休息過？」

「……」

書記長默不作聲，只顧翻閱文件。由他那缺少表情的面孔中，多少看出些他並沒有注意到文件上的內容，也正在那裡隱忍沉思。

我坐在書記長對面的椅子上，由飯桌也兼代辦公桌上取過一支煙，燃著，吸了。

經過一段沉默，趁著他們無言的空檔，我講話了。

我把澄波同志每日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勞累情形，述說一遍，等於替「姐姐同志」訴訴怨苦，本來這些情形，書記長也是曉得的。當我把三個月來的觀感說明後，更進一步地強調：「以我一個學醫的人對人類心靈的理解，我覺得，工作的認識是一回事，生活的感受又是一回事。」所以我建議書記長對澄波同志的生活現狀多予關懷，對其工作的負擔多予同情。

其實像「工作認識和生活感受」這一類的話，還是澄波同志對我所講解過的。

書記長立時表示接受我的建議，承認他在生活上所忽略的缺點，並破例地對我們說：

「不怪大家說你是婦女之友，真不愧為婦運工作專家，我提議，今後在組織內要請你作女同志的代言人。」於是又特別轉向澄波說：「女同志，贊成不？」

澄波笑了。

我也笑了。

沒有一件事比一個從不說笑的人，忽然說起笑話時的表情更可笑的了。

09

四月初，書記長帶我到各地接頭，月末，由我個人單獨巡迴督導。這一次是先走「連京線」由瀋陽到大連一段的各縣市，然後由大石橋換車赴營口，再過遼河經盤山轉溝邦子到錦州，沿「奉山線」各大小站上下車，最後回到瀋陽。預定按各地組織發展的廣狹與同志人數多寡，有的停留一、二日，有的盤桓三、五天，總計約一個月的時光。

行前，聽說仲直他們已自後方回來了，而且即時回到學校復課。這個月我一直在外城奔跑，還沒有機會與他們見面。可是當我五月初剛達營口的時候，即得組織密電，命我立時回瀋，並直接到尚智里聯絡。

發生了什麼事件？我在想。不然不會將我急急召回。

我星夜趕回，到達尚智里，已將及子夜。

上得樓來，伊正在，負責人在，最出人意料的，仲直也在。我以為他到後方訓成個什麼色相，其實還是那個老樣子。

「吃了東西？」負責人問。

「在火車上用過了。」我答。

「好！伊正，你給他倒杯開水；仲直，你將心竹失蹤的經過，簡略地說一說。」負責人吩咐著。同時也先指出什麼事，讓我心裡有個準備。

「今天早晨，是五月二日，」仲直說：「我們學校在大禮堂舉行偽滿皇帝訪日回鑾，頒發訓民詔書的紀念式典，醫院的醫護人員也都過來參加。我確實看見心竹坐在前排的邊座上，典禮完畢後，他好像就隨同別的大夫回醫院去上門診。可是據人說這個時候有一位小姐前來找他，醫院和學校裡都沒有找到，當時也未引人注意。心竹是個工作認真的人，從不在班上溜號，到了十一點，他還沒有到班，病房找他，門診找他，開刀房也找他，這才發覺他真的不見了。因此大家更急急地找。最後據掛號處的一個工友說，他在走廊掃地時，看見心竹穿著白大衣走來，被一個不認識的人攔住，一同走到大門外。在門口，心竹叫他過去把白大衣脫下交給他，說跟朋友出去一趟，可是那個人同他走到醫院拐角，那裡先停了一輛屁驢子，另外還有一位便衣駕駛，他們上去後便開走了。工友以為心竹在警察局裡作事的朋友請他，所以也未留心。我想，心竹在警察局裡並沒有朋友，而且任何朋友不能因私事把他從班上請走，心竹必須前去，但如久久不歸，也該向醫院打個電話，同時穿便衣駕駛摩托車的到底是警察局或是憲兵隊，也不能斷定。我越想越覺得心竹的情況可疑，所以急急向負責人報告。」

「那個找心竹的女的呢？」負責人提示仲直再說下去。

「是的。我中午見到負責人後，負責人推想恐怕心竹發生意外，讓我急速回去，在警特還沒有搜查之前，設法整理心竹的東西，如有祕密文件或禁書，全部拿出來。心竹沒有物證，有案情亦可減輕，這是我們援救心竹應做的第一件事。因為學校和醫院裡人多眼雜，敵偽警特可能還不願在大白天搜查心竹的東西，以免驚擾；我們先行下手正是時機。其次要我探明那個找心竹的女的，看看有沒有線索和關連。我回校後，找幾個人一齊動手，很順利的把心竹收存的小冊子和他的來往信件拿出來了。關於那個女的，我曾去找宛如。據宛如說那位小姐是她家鄉的朋友，最近因找工作，請心竹幫忙，今天來找心竹沒有找到，又聽說心竹失蹤啦，就乘下午兩點鐘的快車回長春去了。因為到了下午，醫院裡謠言很多，人心惶惶，宛如又膽小，好像不敢跟我多談似的，我也就沒再多問。總之，那個小姐也是前來找心竹的，心竹不見後她才走的，若是心竹出事的話，看來也與那位小姐無關。」

「大致就是這樣子。」負責人結論說：「照那個工友親自所見，還接過心竹的白大衣，而現在還沒有他的消息，很顯然心竹是被捕了；因為以前有過這樣的例子。心竹的事關係重大，我要你緊急回來，研究研究他可能被捕的原因和如何善後。你能提出幾點參考的意見嗎？你不必忙，好好想想再說！」

這個消息實在使我震驚，在這種情況下也最怕胡說意見而紊亂軍心。心竹的哥哥心超已住獄很久，心超的未婚妻嚴姐伴著心竹的寡母過著等待而安靜的生活，顯然不會出什麼事。如果我有什麼

麻煩，找不到我時可能找到心竹，藉以追求線索，因為我與心竹的多年同學與友誼是人所共知的。但我想我擺脫家庭的安排毫無破綻；就是未去哈爾濱醫院，我也向吉田顧問做了交代，不會有什麼不妥。於是我推測說：

「比較有問題的，恐怕還是任俠那一條。任俠與心竹有過聯繫，我們還為任俠做過出國證，不過去年冬天心竹送任俠上火車的時候，一切經過倒很順利，而且時間已經四、五個月了，想像中任俠在山海關的檢查方面也平安通過，如若發生問題，早就應該發生，所以直接影響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任俠當時帶個女朋友一起走，心竹並不知她是什麼人，那個女的是否有什麼麻煩而間接引出問題，使人不能不有點疑慮。另外心竹參加工作後非常積極，也許他接觸到學校以外的什麼人，受到牽累也說不定。」

「校外接觸方面，據伊正說，他還沒報告有特殊人物，」負責人說：「若有，關係也不會深。你還能想到別的原因嗎？」

我想了想。當仲直說出找心竹的那個小姐是宛如的家鄉朋友時，我就想到一定是詩彥。詩彥這時候來找心竹做什麼？但仲直已經分析詩彥找心竹不會與心竹被捕有關，負責人又沒有直接追問這個女的，我也無必要提出報告。我只是說：

「其他原因，我還想像不到。不知心竹的信件裡有沒有可尋的線索？」

「我已經全看過了，」仲直緊接著表示：「都是普通的信件，看不出什麼，不過回頭請你再看

一看。」

當仲直做經過報告和我做案情推測時，負責人大都是在靜靜地聽，煙捲一支連著一支，不停地吸著。這時，負責人彈掉一段煙灰，說：

「照紀剛的分析，心竹如果被捕，可能與任俠有些關連，但可能性也並不很大。至於校外接觸或信件往來，你們既然都找不到具體資料，也就無從研究。好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案情都不會重，心竹也許能夠擺脫開，這倒使我們對心竹有一點安慰……不過，」負責人再深深地吸一口煙，停了半晌，像吐出陳年積悶似地吐出全部的煙雲，然後雙眼注視著仲直，神色凝重地說：「在我們沒有確知案情原因及其發展之前，我們不能不採取防衛措施。有了心竹的事，小河沿的全體師生必被警特調查，你和羅雷都是休學返校的，容易引起注意。你們剛從後方回來，我不能讓敵人把你們逮去。心竹今天第一天被捕，這頭三、四天最要緊，他若能撐過三、四天，案情就會穩定些。無論如何，你今晚就不要回家，明天用電話向學校請個病假，暫時請假三、四天，看情形也許永久不回學校了。家庭方面，你也間接取個聯絡，說是到外城躲幾天，避避風頭，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是最簡單的，」仲直說：「一切按負責人指示辦理。」

「紀剛，」負責人轉向我：「今天夜深了，在街上行走有被警特抓去的危險。再過幾小時，一露曙光，你就去搶救羅雷，直接到他家裡，一切要小心！也許敵人捕人後尚在那裡守候，不要落入陷阱。當然你要先報告書記長，他有經驗，按著他的指示，把羅雷帶出後即交給書記長，書記長會

把羅雷送到另一處機關暫住，你再回到此地待命。」

最後，負責人又對伊正說：

「這一年來，你常到小河沿去接頭，那邊的人免不了有人認識你的面孔，所以覺覺團的工作暫時另派女同志與方儀聯絡。」

「好！」伊正恭謹地應著。

拂曉時候，我與書記長出大南關，向金家園子胡同走去。那裡有羅雷的家。初加入組織時，羅雷自擬的化名叫金家棟。那時候真幼稚，起假名起到自己家門上，讓敵人可以按圖索驥，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不知他當時來的什麼靈感！

時間尚早，清道伕仍在清掃馬路上的垃圾，賣菜的小販們挑著菜擔子匆匆地向城內市場奔行，晨起的炊煙在高低不等的屋頂上空繚繞，訓練鴿子的站在遠處樓角，手舉紅色小旗在晨曦中搖蕩。一切是那樣和平靜謐，我個人稍嫌緊張的情緒為之沖淡不少。但當我們在火神廟前分手的時候，書記長忽說：

「我在這廟前廟後等你，你拿這個去，」他把手槍遞給我：「頂門子已經上上了，必要時就扣扳機，無論如何，不能束手被擒！」

羅雷睡眼惺忪地開啟大門，身上還穿著睡衣睡褲，乍見我來，甚感驚喜。

「老朋友，你好！」也許細看我神色不對，隨即改用小聲問我：「有事嗎？這麼早！」

「沒什麼，你起身太晚了。」我儘量鎮定，故示輕鬆地隨著他向上房走去。

「你知道我昨晚什麼時候睡覺？」他又恢復了嘻皮笑臉的樣子。

「誰知道！」

「三點，三點鐘！這幾天我天天如此。」

「做什麼？」

「做什麼，你說我會做什麼？」羅雷反詰著，事不關己他絕不會緊張，在工作上一點也不容人質詢，為了睡覺早晚也要辯駁。「我正在抄聖經、寫鋼板，就是這個樣子幹，至少也還要三個月……」

「抄聖經？」我給他搞胡塗了。

「我告訴你，我們祕密寫一部委員長手著的《中國之命運》，像到西天取經似地帶了回來，組織要我們趕快製版印書，分發各地同志閱讀，你叫我什麼時候睡覺？」

真的，差不多一年不見，他還以為我是前來訪友敘舊，因之對他自感滿意而有貢獻的工作任務，不免要向我自詡一番。這時，我們已走進上房，跨入他家的客廳，我不能再浪費時間與他閒談，所以直接告訴他：

「我是說，昨天心竹失蹤，可能真出了事，你應該提高警覺有所準備，不能同往常一樣地大膽

工作。」

「警覺，警覺，要談警覺，我哪一天都無法工作了。」羅雷仍不服氣地說，沒有聽到我對他的讚美，很感委屈似的。

「沒有工夫跟你多講！負責人命令：趕快穿上衣服，收拾東西跟我走，像我一樣，離開學校，離開家！」

「情況不對嗎？」他發傻了，兩眼直直地望著我。

「是的。負責人判定心竹確已被捕，決定把你和仲直立即從學校撤出。書記長怕這裡已經出了事，所以叫我帶著這個來闖關。」我把槍把子露給他看看。

羅雷未再費話，立時穿好衣服，收拾文件，包紮起鋼板油印機，和那些已經寫好《中國之命運》的蠟紙。我的手仍在風衣口袋裡，握著槍柄，扣著扳機，站在窗口對著大門瞭望。

「多拿點衣服可以吧？若是有時間……」

「不必了！」我沒有回頭。

羅雷的母親還記得我。她從西廂廚房走過來，帶著滿臉慈祥的微笑，隔著窗戶玻璃向我打招呼，好像問我什麼話。但一腳邁進房門，看見羅雷正提著包裹，笑容驟然消失。

「怎麼，又要走了？」不知她老向誰發問。

羅雷低下頭去，沒有回答。

「羅伯母，」我說。臉上強皺著笑容。「學校裡有人出點事情，我接他到我那裡避一避。」

「你現在住在哪兒呀？」老人家焦切地追問。

「你兒子知道。」我如此回答。

「這麼急嗎？吃過早飯再走吧！」

「不用了，伯母。我跟羅雷已經說定，由我請他吃豆漿、燒餅。」

「什麼時候回來呢？」

「幾天，事情過去後，幾天就回來。你老放心吧！」

「幾天，幾天，上一次一走就是半年多，剛回來才幾天又要走了……」老太太十分不悅地叨咕著。一面用她震顫的手指，費力地解開她下廚的圍裙。「我已這麼大的年紀，本想最近給他張羅和姚蕙結婚的事……上次他走時，我用多少話對小蕙勸說；現在，又要走了……」

羅雷抬頭看看母親，似乎想要叫聲「媽！」但卻緊閉著上下唇，側身衝出門檻……

五月的朝陽，特別煦暖光明。上班的、上學的，大街上的行人已經來往蜂湧。我們注視一會巷口，無何異狀，便想急急離去。可是剛出巷口，就碰到姚蕙匆匆而來，這種不期然的遇合，使我們都突然駐足對視。

姚蕙對我道聲：「早！」然後即對羅雷說：

「聽說你回來有幾天了，也不過來看看我。我今天趁上學前，特意來跟你定個約會，我想我們

需要談談！」

「我既然回來了，還要談什麼？」

「怎麼？」她似乎要發小姐脾氣。

「紀剛，」羅雷急躁地：「由你去說。」轉身向北而去。

「姚小姐，請跟我來！」姚蕙似乎也想一賭氣就走，但為了欲明究竟，而且我也不是她發作的對象，便忍著滿腹怨忿的樣子跟過來。轉過巷口，我們停在一處僻靜的地方。

「姚小姐，」我說：「請你不要誤會他。我們學校昨天出點事，恐怕牽累羅雷，為了安全，我們一齊到外城躲幾天。有什麼話以後慢慢說。這幾天你最好不要找他，也不要到他家裡去。有什麼人問你，你就說他走的時候你不知道，回來後還沒見面，包括今天早晨，這樣說會對你有好處。」

她立時會意地點點頭，然後很擔心地問：「他會安全嗎？」

「他會安全的！」我保證地說。「你快上學吧。我也需要快點離開此地。安心吧，再見！」

「再見！」我剛要轉身，姚蕙又叫住我：「紀先生，他是不是另有朋友？」問得十分鄭重。

「絕沒有此事！」我勸慰她。「請你不要向這方面想。」

羅雷與姚蕙從小訂婚，長大了也彼此相愛。我知道，有些人由於雙方都是深深地愛著對方，因而缺乏一點退後一步的耐心，反倒常常嘔氣頂嘴成為歡喜冤家，他們正是這樣的一對。羅雷最怕姚蕙發火，像今天的事，他知道一兩句話解說不清，而且這個時刻站在街口，他有話也說不出。他等

於把他對她告別的話讓我來講，我說了，但我卻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遺憾。

在火神廟前我把羅雷和那小傢伙交給書記長，便急返尚智里。仲直還沒有回來，我在樓上不安地踱著，心中想起許多事，每一件事都不能有系統地想一遍，一個念頭跟一個念頭繞來，旋又被另一個念頭打斷。伊正有時上來坐坐，不久又下去看看，上來下去，我們都沒有交談。上次遷往大勇里時沒有帶去的那個油畫「凱旋者」，仍擺在我用過的桌子上。我趁此空檔期間把仲直取來的心竹的信件檢查一遍，都是畢業同學分散各地互相問候一類的書信，還有一位在安東同學一月前請他作結婚儐相的喜帖，都看不出什麼有關他失蹤的線索。其中沒有我叔叔的，也沒有詩彥的，看來心竹確是比我乾脆得多，有任何一點關係的信件都處理得十分俐落。當然，一些無關重要的信也要保留幾封，不然一個人在社會上一封普通的信件都沒有，也是反常的現象。

中午，仲直回來了。

「敵人已……已經行動了……我……」他似因走得急喘，氣息未順，緊連嗆咳幾聲，也有些驚魂未定的樣子。

「坐下，慢慢說。」

「早晨，我用電話和家裡聯絡，家裡情形很好，我就決定回家一趟，另外我也給方儀一個電話，告訴她心竹和我們有關係，他這次失蹤可能影響我們遠行的人，要她注意學校裡的動靜，隨時向我家給我來電話；同時也讓她作準備，把文件整理好，保持鎮定。回到家裡，我說有位同學出點事，

我也要出去幾天，我父親沒說什麼，但當我整理東西時，他卻忽然從書房出來，告訴我家裡現金不多，要到櫃上去取，叫我等他回來再走。十點多鐘他從櫃上來電話說櫃上也不夠，正派伙計到銀行去支；他說出門一定要多帶錢，要我千萬等等他。誰知剛放下電話，方儀的電話也來了。據方儀說已有特務二人到校長室，不久校長派祕書出來找我和羅雷談話……」

「你沒有先請假？」我記得負責人的囑咐。

「請假就糟了！」仲直說：「校長還以為我們在校上課，所以派祕書到教室、圖書館、醫院實習室等地方找我們，方儀才有機會得消息。若是校長告訴特務說我們已經請了假，那特務們就會警覺立時追到家裡來，我就成為『敬等』了。你知道，我家離學校太近，我與方儀的電話未完，就聽到門口有摩托車聲，然後有人無禮貌的急敲大門上的銅環，我便向方儀說：『知道了！保重！再見！』放下電話，便從後角門溜了出來。」

「你父親還沒有回來？」

「這樣倒好，他若回來，又給了我很多錢，他對特務就不好應付了。我出來後，已借電話告知他，這樣他可以完全推說不知。」

「唉！你父親真是個好父親，也是個怪父親。」我即時浮起那張我所熟悉的老人的面孔，以及由他那馬褂下面長袍裡掏出香煙遞給我時那像似陌生而實親切的動作。

「你說的一點不錯！」仲直十分感觸地：「他在家裡很少講話，把錢交給母親，任何生活事務

都不管。來客也向不打招呼；當然他並不是不歡迎。在外面他是個生意人，在家卻從不談買賣，除了吃煙吃茶，就是看線裝書，再不然就刻刻石頭。對你真是特別例外，上次他送給你那塊『男兒志在四方』雞血石印，就是他自己刻的。」

「不知這一次，他老要受什麼磨難了……」

「當然免不了。」仲直無可奈何地肯定著。「不過父親總會有辦法應付，也許不致遭大難！唉，我父親與我，在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是兩代的人，可是他老總是無條件的，不怕任何犧牲地支持我們這一代。我到後方去的時候，他沒有說什麼，前幾天回來的時候，他也沒問什麼。他雖然沒說沒問，我想他對我們所做的，心裡一定有數。這次我說還要走幾天，他比我自己想的可能還多還遠，他一定是要給我弄更多的錢，不然不會耽擱那麼久，還要我等，差點等到特務手裡。這樣最好，我雖然沒有接受他的好意，也沒有來得及向他拜別，但只要他知道我沒有被捕，就抵得住他將遇到的任何不幸了。」

「真像是鬼使神差，」我無限感慨而又故示坦然地說：「羅雷與你都能逃離虎口，總算是我們的福氣，多謝祖上的餘德和神靈的保佑。」

「未來的日子長呢！幸運能總屬於我們。」

伊正上來招呼我們午飯。仲直倉惶出走的沉重情懷已完全淹沒我搶救羅雷那點興奮愉快，尤其他最後這句疑問，他使我感到莫名的悵惘，因之與他同樣的沒有胃口。伊正最懂人情，沒說一句無

聊的安慰言語。

飯後，我把羅雷離家的景況也向仲直述說一遍。我們都欽敬負責人在應變的時候，對變局的處理，特別有決心、有魄力、有速度，所以能制敵於機先；至於其對同志所自然流露的愛護關切之情，尤增吾人對其拳拳服膺之意。

情勢突然急轉直下。第三天警憲同志報來消息，心竹確實是被捕，他們未能探出被捕的真因，但知與我們工作無關。最出人意料的，被捕不到一天，這位老老實實而又缺乏工作經驗的心竹，在日本站大和警察署的「留置場」裡，竟於審訊中途藉機越牆逃走了。這一逃，激怒了敵警，加重了敵人的注意，擴大了案情。為了追緝心竹，於他逃跑的當日即到校內傳詢仲直與羅雷，也傳詢了別的同學與社會關係人，自然也就急急調查我。當時吉田顧問「出張」在外，校內談話都說我在哈爾濱，敵特撲空後轉赴泰城搜索時，又發現我已離家半載……我們都哪裡去了？敵人自問。這時才意味到他們逮捕心竹時，只以為他是另一宗案件的一個小枝、一條小魚；未曾想到這個小枝關連到另一株大樹，這一條小魚屬於一個魚群；而它已經到手竟又脫網而去。日本警犬的嗅覺是最銳敏的，日本戶政的嚴密也是世界聞名的，偽滿翻版應用，且握有偽滿各部門各階層的統治權力者，也都是日本幹員，但竟追緝不到我們，真是天天打雁被雁啄了眼，小河沿裡翻了大船，他們的憤怒與難堪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於是他們亂肆兇殘逮捕無辜者……他們捉去了羅雷的哥哥，仲直的父親；我的家裡，除了叔叔、父親外，還有堂兄表舅等六人，都因我而鋃鐺入獄……

10

心竹脫逃了，他的案件沒有完結。敵人找他，我們也找他；敵人想重新緝捕他繼續追查，我們想掩護他歸隊以便工作。結果，敵我均沒有成功，經過一段徒勞後，他成了雙方的懸案，偵察的熱潮也逐漸消褪。

心竹跑到哪裡去了？是否他已潛行入關？我常常暗中想，我知道任俠曾給他留過路線。

一次打擊、一次教訓，一番風雨、一番精進。心竹事件使我們覺覺團裡的仲直、羅雷和另外兩位幹部同志離開學校、離開家，和我一樣地潛入地下，加上從其他市縣所徵召而來的優秀同志，連同自一二三〇事件後即已隱身的省方幹部們，共有四十餘位專任工作人員。這四十多人又大多數是被敵偽通緝的。這一事實足以說明我們的組織工作是如何龐大，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可知這時總機關所背的包袱是如何沉重了。但負責人卻好整以暇地立即趁機開辦第二期幹部訓練班，班址就設在尚智里。

地下工作，一群被通緝的人，當然不能一同公開受訓，只有祕密分組進行。普通六七人編為一組。後來把幹訓班推展到其他地區，由各督導員分別主持，各地幹部同志大都接受了訓練，前後三

十多組，共有二三百人。

「自從千山訓練團以後，」負責人於開班時致訓詞說：「我們總不停地想辦法舉辦有充實內容的訓練。我們都知道，地下工作和集體訓練在祕密原則上是互相衝突的，但是訓練對於開展工作極其重要，蔣委員長說訓練重於作戰，就是這個意思。現在，我們在採取更主動與敵人搏鬥的前夕舉辦訓練，就是要大家更貫徹現地抗戰理念，充實工作能力和增強奮鬥信心。我們現階段是徒手與敵人槍桿肉搏，我們憑恃什麼？就是我們擇善固執的理念，堅決不拔的信心，百折不撓的精神，和無往不利的工作能力、方法與技術。所以希望各位同志要拿出對於保守祕密維護組織最大的信心，來接受這次訓練。」最後負責人還要求大家舉手宣誓，保證訓練的成功，保證保守訓練的祕密。他說：「如果任何人做不到這兩點，我個人就要跟他拼命！」

我從沒有看過負責人講話是如此激動，激動得猶如羅雷事後所說有點撒野的程度，可見負責人對此次訓練期待之大與對組織和同志安危關切之深了。當時可以說是聲淚俱下的場面，發聲的是負責人，落淚的是我們。我們現在均一無所有，我們只有組織與工作，其實用不著負責人那麼諄諄訓誡，現在組織是我們的家，工作是我們的命，我們對組織和工作，那能不拼命！

訓練內容繁重，無法一一記述，倒是有幾個特點，不能不提。其一是大家不分學員職員，每個人都主講幾個專題，可謂互訓互練，教學相長。其次是提出工作實際問題，及工作實例，共同檢討、質疑、辯論、補充。所有的成果與結論又都成為現地教材的一部分，即時印發各地同志閱讀。

伊正綜合心理建設與行的道理講了一課革命哲學，因其駐箚博智書局之便，平時閱讀甚廣，參考各家學說與各派宗教信仰推衍出許多精采意見，真不愧為我輩中之哲人。羅雷卻批評他所說的全是假真理；我個人仍認為他總算言之有故，另有一番人生意境。仲直根據《中國之命運》所指示原則，參照偽滿現況資料，對東北收復後的建設工作，擬訂一套完善實用的藍圖。惟亮報告他關於抗戰歌曲與民族精神的研究，我也對滿洲文壇現象與敵偽文化統制政策，做了分析檢討。羅雷性急而執拗，對他所贊成的事物也常提相反的意見；儘管如此，我仍很欣賞他所講述的釘梢術。他對跟蹤與脫梢的技巧說來頭頭是道，好像他是一位警探老手；他若跟蹤，敵人一定跑不了；敵人若跟蹤他，他定能擺脫掉；這對於我以後在變局中的行動，得益匪淺。

我們一面接受訓練，一面研究調整組織的結構，一面改進開展工作的方法。所以所謂訓練班，實際也發生了工作檢討會及工作決策會議的作用。羅雷、仲直是剛從後方受訓回來的人，卻說這才是實際有用的訓練。

我們是第一組，也許是負責人要藉此機會把工作做全盤的檢討罷，訓練的時間特別長，前後三個月整整熬過一個炎熱的夏天。在此期間，我每月仍必須抽空赴外地督導一兩次，沒有當堂聽過的課目，回來後雖然必須開夜車看記錄趕緊補修而特別忙碌，但在情緒上畢竟有些調劑。伊正、惟亮已習慣於駐守尚智里的生活。仲直性格內向，日不出戶亦無窒息的感覺。羅雷則像頭小豹子，忽然關在籠子裡，實在是悶得急氣得慌；溽暑蒸人，負責人等不在場的時候，他就找碴兒跟我們發脾氣。

大家明瞭他的心意沒人理他，他想打架沒有對手，只有脫光上衣，連背心都不穿，揮汗寫他的鋼板，以便早日刊印《中國之命運》。

「羅雷，」仲直勸告他：「穿上衣服好不好，我們得準備隨時行動。」

「跑？你還想往哪裡跑？哪個敢來，我就給他來個張飛裸臂戰馬超！」羅雷如此說。

尚智里原屬羅漢堂，生活雜務向由駐守同志負責料理；訓練期間人口增多，除跑街採買仍由駐守同志擔當外，一切內務炊煮則由各學員輪流操作。我因出身農村，保有莊稼人的作風，一切以量勝，大鍋煮飯，大勺燉菜，每餐必有賸餘。仲直比較講究，但他在家從未下過廚房，對香味兩項不免眼高手低，力不從心，對顏色一項倒能把握，紅蘿蔔白豆腐綠菠菜等，總是五彩奪目，結果是中看不中吃。羅雷所做的東西，不是半生不熟便是燒過頭而焦黑一片。有人檢討他，他會回答你：「留著那份精神，到監獄裡再去挑剔吧！」大家沒得話說。

生活必需品，偽滿當時亦因戰時物質不足施行「配給制」，市場上十分缺乏，有亦價昂，有時根本買不到。我們都是被通緝的「黑人」，不能以「配給通帳」領取，又沒有足夠的財力私購，欲使物質生活充裕實不可得；負責人卻在如此條件下儘量使我們感到豐滿。負責人除了致開班訓詞時像羅雷所說「兇」了一次外，整個期間都是和平親切的。我們組織原有「道義團結，科學服務，堅忍奮鬥，壯烈犧牲」等四種精神信條，結業典禮時，負責人特別就「道義團結」一項加以闡明。結論是同志愛必須由生活上互相關心扶助做起，所以他特別撥發雙倍伙食金為結業宴加菜，有酒有肴；宴

後還開同樂會，真可謂「忙裡偷閒，苦中作樂」了。

同樂會畢，負責人等離去，我們開始閒談，受訓期中我們都忙，我們也不願談閒話，閒話必涉及私事舊事，想起私事舊事必引發無謂的情緒，但過此一宵我們又將分別，仲直即留尚智里，開始其編審工作，並整理自後方攜回的各項資料，我則隨羅雷疏散到他所住過的敦和里，以繼續我僕僕風塵於各地區的督導生涯。各里間的內部交通仍由伊正兼任，惟亮則聞將他調。

羅雷還在趕寫他未完成的鋼板，也好，這個人不做工就說廢話，且偏愛說觸霉頭的話，說者無心只在發洩，聽的總是遭受些心理的干擾。我們不願招惹他，三個人坐在寢室一角低語閒聊。談話無邊無際，由現地工作談到後方生活，也談些他們穿越火線的旅途風光。談話中斷，沉默中，仲直忽由桌面上取起「凱旋者」，睇視良久，問：

「這是誰的東西？」

「紀剛的。」伊正回覆他。

「由哪兒弄來的？」仲直問我。

「你先說說你對它的感覺再說。」我反問他。

「這些天來我就對它很留意，」仲直說：「說實在的，這個畫面很迷人很有魅力，只是氣氛太淒涼空虛，令人有不幸的感覺。它好像象徵什麼啟示什麼。象徵什麼？現在很難預測，最好也不要預測。不過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女朋友，如果它的啟示涉及愛情，應該與我無關。」

「當然於我也扯不上！」伊正更推得乾淨。

「我不能算是戀過愛！」我也鄭重地表示：「自然也不應該與我有關。而且這是鍾鳴的臨別贈品，鍾鳴和我們的關係你是知道的，一點私人的感情成份也沒有。」就便我把經過的情形向仲直略述一遍。

「你們談什麼情啦，愛的？」羅雷忽然走過來。

「我們談紀剛的這件東西，」仲直告訴他。「沒有祕密。」

「這是怎回事？」羅雷接過「凱旋者」，匆匆端詳一會，露出一臉鄙夷的神色。「孟宛如送給你的？」

「你怎麼扯到她身上？」我反詰說。

「你當我不知道？你那套自作無情的障眼法，瞞過別人，瞞不過我！我早就看透了，下地獄的時候你也忘不了孟宛如；今天你不能把她帶來，卻把她的紀念品偷偷帶來。我看過你的《火舌集》了，我告訴你，你沒有做苦行僧的資格，你只配做花和尚！」

「羅雷，」仲直截斷他的譏諷：「不要冤枉紀剛。我作證，此物與宛如無涉。這不是一件情人的紀念品，這只能算是一朵浮雲，一片落葉。人總是有感情的……」

「你也別幫他作繭自縛，」羅雷也未容他把話說完：「人家把從小兒青梅竹馬的朋友，訂了婚而且就要結婚的未婚妻都棄之如敝屣，你們卻把一朵浮雲，一片落葉，當珍寶似的來收藏，哪有這

份道理！」說罷，卡卡幾聲把它撕破了。

這突如其來的結局，引得伊正做不停地苦笑。

開訓練班，是我們所敬佩的負責人的偉大工作措施之一；在敵騎縱橫、警網密佈之下，集中多數被通緝的幹部，設堂授課，真可謂大手筆。受訓期間，羅雷曾調侃地說：

「真好，真方便！我若是鬼子，現在就來包圍博智書局，把你們大大小小，頭頭腦腦，一網兜收！」

可惜我們有此冒險精神，敵人卻沒有這種幸運的收穫。接著就開始了我們都感興奮而踐履的另一偉大行動——督導工作。

我們受訓完畢，像是在慶祝節日夜晚所發放的煙火，於夜空中爆裂後，火光一閃，流星四散。那真是極美麗的圖案！敵人從長春（偽都新京）發號施令、控制全滿；我們從瀋陽（昔日東北的軍政中心）指揮戰鬥，做收復東北，再建東北的艱鉅工作。負責人依據地理與交通形勢，組織及工作關係，在「滿洲國」大地圖上，用紅筆作圈，劃出我們各督導人員的駐在據點，用藍筆圍繞著這個據點，沿著附近的鐵路線，劃出每個區域的督導範圍。我與羅雷及文毓、景樵、責一、彭齡、舒源、建仁、穎川、尹生等人都是專任督導員，也叫巡迴督導；就是每月在其區內各縣市巡迴一週，並代表總機關與各地駐在督導員聯絡，然後回省方報告。駐在督導員亦有十餘人，如漁洋、克德之於旅

大，時鑑、伯方之於錦州，安東通化之仙石、亞倫，通遼東蒙之松操、曉峰，長春之公謀、歐凱，吉林之致中，合江之廷奇，北安之友芝等。他們分駐各地，或有偽職掩護，或以自由職業身分活動，只在其工作區內駐在督導，並不到省方報告。瀋陽為總機關所在地，除伊正、惟亮、仲直外，尚有鴻學、正身、季風、碧丹、澄波、大華等均擔任重要工作。這三五十人無日不在各地活動，有的大巡迴，有的小巡迴，就地下工作而言，真是洋洋大觀。假若把我們每位人員都用不同顏色的小燈泡表示，按動電紐，同時放光，直如朗朗星空，閃閃流動，燦爛無比！

羅雷接替原由我所巡行的遼南和安東地區兩條路線，我仍保留遼西地區並兼負瀋、長、哈三大據點的督導與聯絡工作。心竹事件已經過去半年，敵人對我的搜捕可能轉移焦點，所以負責人說我仍可以每個月前往哈爾濱一次。至於由哈埠東經珠河牡丹江而至綏芬河所謂「濱綏」，西經齊齊哈爾，海拉爾而至滿洲里所謂「濱州」，以及北去北安黑河所謂「濱北」「北黑」等鐵路之沿線各城鎮則由責一、建仁、景樵三人分別奔跑。

事後回想，那真是我們工作的黃金時代。但當時供應這麼多專任工作人員的衣食及交通旅費，實是一筆很大的負擔。中央鞭長莫及，對我們的經濟支援等於杯水車薪，甚且長期轉撥不到東北。我們只有自力更生，一切皆由同志捐輸。經濟建設委員會就是負責籌措經費的機關。但捐輸有限，用度浩繁，尤其不足應付這半年以來陡然擴大的開銷。好在大家都是「白吃飽白幹活」的幹部，否則不發薪水就停工不幹，那還了得？組織並沒有提出要我們如何節省，負責人也不要看我們的花銷

帳單，還堅持要巡迴督導人員乘坐二等車，服裝整齊，以減少被檢查的機會。但我們都知道實際情況，當然就自動儘量節省，因之生活就更不成生活了。可是若以羅雷常喜歡用「獄中伙食」的尺度來衡量，現在的生活我們仍應十分滿足。比這項生活補給更困難的，倒是各項證明文件的籌製了。

我們這些受通緝的人，第一項需用的文書是戶籍謄本以便申報戶口，當然都要用假姓假名假職業假籍貫，這一項假造起來比較麻煩，而且敵偽戶籍實行「照會」制度，如偽造甲地戶籍遷入乙地申報，如甲地無妥善安排，一經「照會」必出紕漏。好在除必須定居以建立祕密機關之同志外，我們各地遊動的人尚可不報戶口，只需要身分證件應付臨時戶口檢查或旅途中警憲盤詰。可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許多個，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化名和不同身分。譬如時鑑在遼西任偽「錦州省政府」的高級職務，我與他聯絡時的化名是許文東，用偽司法部的職員證，穿協和服配偽中央機關官吏白色偽旗領章，而且離開「職場」所在地偽都「新京」，還要備具「出張證明書」，才合身分。魏邦在營口「專賣公署」做事，我到營口時是扮做商人身分，穿便服，只用「國民手帳」即可。這些證件，有的依賴各敵偽機關內部同志盜出空白，由我們自行填寫，有的則由有刻印技術的同志偽造仿製。但無論如何精巧，仔細觀察起來，不免發現漏洞，因此引起羅雷跟伊正在敦和里的一場舌戰。

「我們要以精神補物質的不足，」伊正堅持他的意見，為他所仿製而不太理想的證件辯護：「我們一定要在心理上戰勝敵人，因此絕不會在使用這些證件時發生問題！」

「好！我虛心，我檢討，」羅雷表面自制，內心不服地說：「我拋棄我的成見，請你講講你的

心理戰術，開開我的茅塞，長長我的見識！」

「謝謝你的誇獎！」伊正接下羅雷的幾柄小刀子，繼續心平氣和地解釋。「我的意思是指『滿洲國』是偽政權，它的一切都是偽的，惟獨我們才是真的。我們持用組織所製作的證件，就要想這是我們自己的真證明，遇有任何檢查，都會心安神穩，理直氣壯地通行無阻了。」

「真是妙論！妙論！但我們不是巧辯你那假哲學上的真偽問題，我們是研究這證件像與不像和通行效用的問題。仿造得像，才能通過各項檢查。你看你給我的這一份，印泥的顏色淡，印紋的線條粗，這，這……我看你是有意陷害我！」

羅雷最後這句話，雖屬笑談，也是言重了些。

「我所做的固然不十分理想，但也不能說沒有達到適用的程度，」伊正苦笑著應付：「這一份大體上是很像的了。敵偽警憲的一般檢查人員，並不是印章證件鑑定專家，絕不會由證件上引起問題。一旦因其他變故而遭意外時，像我們這些人，證件真假還不都是一樣。而且追究起來，真的來源還要受牽累，倒不如假的好推脫——」

「你完全是強詞奪理！」羅雷等於指責他。

「你也夠得上是吹毛求疵！」伊正也回敬了他。

伊正還沒太失掉他的幽默感，羅雷卻氣得鼓耳撓腮地說不出話來。這個局面很尷尬。按著我的經驗，伊正所供應的證件確實達到適用的程度。一個督導員如能鎮定自然不露形跡地應付一般檢查，

持用這類證明文件是沒有問題的。反之，如果神色慌張進退失措，即使持用真實證件，也會發生破綻的。所以說問題倒不在證件本身。但，假若像羅雷的感覺，認為那個身分證有些不妥，硬要他使用那份他認為不妥的證件，在心理上足以構成弱點，在應付的態度上就要受影響。現在他二人由事理的辯論發展到有些意氣之爭時，我應該出面打圓場了。我放下手中整理的報告，正在斟酌開腔詞句，恰巧負責人來到，羅雷就帶著他的餘忿隨負責人到裡屋「過關」去了。負責人是明眼人，一面走著一面問：

「羅雷，什麼人惹你生氣？」

「沒什麼，沒什麼……」羅雷恭謹地答。

當然，這些雞毛蒜皮的事，都算不得什麼。

所謂「過關」也是羅雷發明的妙詞兒，區區兩個字，卻把我們各路英雄自督導區歸來向負責人報告工作時的情景，完全表現出來。尹生曾為文描述，有一段十分逼真，正好引用在此。他寫著：

「過關是敦和里的一個術語，它代表督導人員向負責人報告完畢而生的輕鬆之感。別看負責人對任何人都向無疾顏厲色，他在工作上卻從不饒人。當他傾其注意於聽取督導人員報告時，為了吸收每一要點，他會不厭其詳地打破砂鍋問到底。他習慣於和報告人面對面坐在土炕上，在他們中間的小桌上擺著一份書面報告，另外的人自會識趣地轉向遠處。他們喁喁私語，彼此口不稍停地講，講什麼當然別人聽不到，但只要看那報告人額上青筋暴起，面紅耳赤的苦相，就不難想像那種滋味

是不好受的。這種情形以羅雷為最，他本來生就一張孩子臉，此時卻一變而為下蛋的母雞了。」

由此觀之，無怪乎羅雷有其靈感創造那個妙詞了。

各督導員在回省方述職時的物質生活雖然同樣清苦，但在各自的督導區內卻各有千秋。各地同志在接待我們時，最初是既緊張激動，又興奮熱情，大家都是生死伙伴，在敵偽高壓下同為一個偉大的目標而犧牲奮鬥，都有一種不可言宣的濃郁的道義感情，於是都把他們所能拿出的最佳的菜肴來與我們共享。時間久了，緊張的情緒因磨練而寬舒，接待的熱情仍與日俱增，因此也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插曲。一天，大家回到敦和里，過了「關」後，閒談中竟談到各地同志的接待情況，而且互相比較起來。比來比去，羅雷比輸了，他矯情地喊道：

「好啊！你們這些帝國叛徒，美其名曰思想犯，結果竟是一群『思想飯』！」

原來羅雷現在所去的地方，同志們多是一般「官公吏」與中產階級的市民，正是敵偽經濟統制下受影響受限制較多的一層，主副食都很低劣。而我所到的地區則被彼譏為「肥缺」，同志有醫生、有任高級偽職的，任高級偽職的使用「福字通帳」可以領到「特配」，除了大米白麵不虞匱乏之外，還可以得到南洋罐頭和日本清酒，真是口福匪淺，聽得他不免垂涎三尺也！

就各地同志的家庭情況言，夫婦都是同志的居極少數，多半的先生是同志，太太不是，有的尚有父母在堂者。我們的工作是極端祕密的，除了同志，原則上是六親皆背的，所以在接待督導人員食宿談話時，要對其家人做種種的掩飾，可是有時候這種掩飾保密倒顯得多餘了。譬如我到營口時

住在魏邦家。魏邦和馬潔夫婦都是同志，魏邦的母親與他們一起居住，我們的事都背著這位老太太。一次為攜帶重要文件，讓馬潔把它縫在布鞋的千層底裡，馬潔是一個職業女性，只會上班打算盤，拿針線半會不會，哪裡會用蔴繩上鞋底？二拇指已扎了兩個洞，血流點點，鞋底還沒有縫上一針，萬般無奈，只好求助婆婆。

「媽，」馬潔說：「請你老幫個忙，把這包東西做到鞋底裡。這不是壞事情，你老不用問，也不要講……」

「甭說了！」老太太接過針和鞋，並制止了馬潔的叮囑：「你們一天來來往往的，我心裡什麼不明白？不用跟我說那些廢話！你們年輕人都不怕，我這老太太還怕什麼？」

東北同胞的愛國心和潛在的敵愾意識，由這老太太的一語即可窺知全貌，但東北地區地下工作的艱辛程度和特殊的型式，卻不是一般人，尤其是在抗戰後方的人所能想像領略的。提起地下工作，一般人的印象都是平、津、京、滬的那一種。那時華北華中華南等淪陷區內，敵偽所佔領的只是點與線，廣大的面仍為我游擊部隊所掌握，而敵人進駐不久，做不到嚴密的控制。在那些地區作地下工作的同志們，真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一朝情勢不佳或遭受破壞，只要混出城，就可到安全區棲身。敵偽統治東北十餘年，不僅有全面的控制，而且深及各層社會。我們沒有租界地可資掩避，更沒有游擊區可以退守，只有依賴我們自己的智慧與勇氣和我們用生命與鮮血所建立起來的組織力。我們的組織越嚴密越龐大，我們的應變力和戰鬥力就越堅強越雄厚。在任何不幸的情況下，

我們都堅持現地抗戰信念，忍受各種艱苦，永遠留在東北，無情地支撐下去，使得我們更要特別注意平時的掩護，這對巡迴各地的督導人員尤其重要。

我們所謂的掩護，實際上並不神奇。我們不用鋼筋水泥造一座銅牆鐵壁似的工作機關，以防禦敵人炮火的轟炸，我們也不穿著全身盔甲，以求刀劍不入地避免襲擊。我們的辦法就是平常、平常，和一般人一樣。我們潛隱於社會眾人之中，我們一切的衣食住行言語動作都和常人無異，讓敵人無法把我們從我們同胞中區別出來，這就是我們的碉堡、我們的護身符、我們最大的安全保障。

我們這一群，就是像幽靈般化身於社會眾人之中，朝發白山麓，夜宿黑水頭，昨抵公主嶺，明走鳳凰城，忽聚忽散，忽東忽西，披星戴月，巡迴巡迴！

11

「各位旅客：往山海關方面的急行列車，就要開車啦，沒有上車的，請趕快上車吧！」

「奉天驛」月臺上的發車鈴聲嘩嘩在響，擴音器裡播出那沙啞而疲憊的職業性的嬌聲報告，緊接著便「放送」出令人聽得習慣已無任何感覺的《海軍進行曲》了。不！對於有心人而言，感覺仍是有的，只是由於時間與戰局的變遷，前後的感覺不再相同了。「大東亞戰爭」初期，日軍席捲南洋，這支曲子既興奮又輕快，特別滲出驕狂的音韻，現在戰局逆轉，敵人和著苦水與血水一堆堆吐出以前曾經吞噬過的太平洋島嶼時，這支曲子就流洩出一種貧血、空虛、悲愴，與日暮途窮之感了！

太平洋上的風雲，敵人雖呈敗象，但仍急圖反噬，在中國大陸上瘋狂肆虐；而我們在敵人的後方，也分秒不停地積極活動。

這是民國三十二年冬至日的下午三時，「大陸號」急行列車自朝鮮釜山來，經漢城、新義州、安東，到瀋陽，完成它的吞吐作用後，再開往錦州、山海關、天津、北平去。按著敵人最初的夢想，待打通大陸走廊後，這列車可由北平繼續南行，經平漢接粵漢，通過中國大陸，直抵它早自英人手中奪取的戰果——由新嘉坡改稱的——昭南。所以命名為「大陸號」。

我本擬乘坐上午的「興亞號」，因事遲延才改搭這班快車。車輪已開始緩緩轉動，我匆匆自地下道追趕上來，手中提著一隻鼓脹的皮包，毫不遲疑地跳上二等車廂後，已感到微微作喘。我原以為自己走得太急驟些，等到我把提包像其他旅客處理「手荷物」一樣地放在火車座下時，兩臂酸酸的，這才意識到今天的提包實在太沉重，沉重得就像中國的命運一樣！

車廂中的暖氣雖然若有若無，但仍比外面的冷風溫暖得多。我揀著一個「日系」旅客身旁的空位坐下，這位同座像為排遣寂寞似地向我搭訕說：

「呀，呀，這裡的天氣真正冷哪！」

「說的是呢！」我也用簡單的日語做禮貌的應答。

聽他的口氣似乎是過路人，也許是來自日本本土，也許是來自朝鮮半島，目的是向中國大陸去。做什麼的？一時看不出來，我也不去管它。我堅守我們的原則：在旅途中，不失禮貌也不多做交談。我自大衣袋裡掏出一份當天的《朝日新聞》，佯做凝神閱讀的樣子，卻用兩眼的餘光考察一番車內情況，最後又不自主地俯瞰一眼座下的皮包，那裡裝的就是《中國之命運》。地下版的《中國之命運》也是六十四開本袖珍型小冊子，小雖小，巧則巧矣，但數量多了，多到一大包一大包的，仍然無法像其他單張文件或薄本小冊子易於掩藏攜帶。如果一冊冊地分別傳送，在一個城鎮裡尚可，若搭乘火車跑遍東北各縣市，不僅時間經濟兩不容許，而且也違反祕密工作的另一原則。地下工作與文件像集體訓練一樣，也是有衝突性的。想祕密，最好是無片紙隻字，以免貽為物證；但文件對開

展工作又有無比的推動力，是以組織仍冒萬險發行各種工作刊物。傳遞文件的危險性固與文件的體積成正比例，但與傳遞的頻率也是成正比例的。傳遞的次數越多，被敵人發現的機會亦越多，因此我們這次採取「公然提持，大膽闖關」一策。先自省方向各地區整批運送，再個別轉發到基層細胞組織的每位同志手中。這個整批運送的責任，大部分落在我們巡迴督導員的身上。

聖誕節快到了。當東訊社將此書出版消息傳播後，各地同志紛紛要求，均欲先睹為快。今年的聖誕節，我再也看不見聽不著我所喜悅的人們那些青春的歡笑，但當我像聖誕老人一樣，在聖誕節以前，冒著嚴寒的天候和旅程的艱險，把這件聖誕禮品送到各地同志手中，想像他們那種「雪夜閉門讀禁書」的興奮情懷，也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半個月來，我就是為了運送這批東西而來往於以瀋陽為中心的各大鐵路幹線上。先是松北，後是奉吉……這次是前往遼西。本來遼南方面也擬由我去運送，後來羅雷另想出辦法而減少我兩次奔跑。這次如能安全返防，就算完滿達成任務，那就不必再聽羅雷的吹牛調侃了。

「紀剛，負責人把這件事交給你，又說你有福氣，這下子可要看你的道行了！」

「看我的？好，就看我的！」這是當時我心裡想回答他的話。羅雷口尖舌利，在最嚴肅的工作上，也總要給攪拌一些刻薄詼諧。誰說有福氣？全是他胡說八道！但羅雷的辦法確實很妙，他請鏡塵同志擔當這份差遣。鏡塵法師「九一八」時曾從事義勇軍活動，事敗後削髮隱居於千山龍泉寺，最近又參加了現地工作；他用出家人托缽的袋子，像化緣似地遊行於遼南各縣市，沒有人注意到他

和尚的褡子裡另有玄機。看來羅雷倒是有點福氣，我的福氣在哪裡，我不去想它，現在我必須再詳細思考一番這次旅行中可能遭遇的事故，因為仲直那句「幸運不會永久屬於我們」的話，依舊縈繞在我的心裡。

車行途中，我藉著上洗手間的機會，整理一下呢質的「協和服」，正了正偽司法部的白旗領章，抖了抖「戰鬥帽」上的灰塵，再仔細欣賞一下鏡子中那位儼然「帝國政府的官吏」，不免對鏡會心一笑。我身材中等，面目平庸，站在人群中毫無特徵，可以說裝什麼像什麼，就是不像地下工作者，所以同志們也認為我有最佳的保護色和最高的安全度。

性格方面，我是比較接近仲直的，一點沒有羅雷那樣的鋒芒神采。羅雷、仲直奉命取經，越山海關，渡黃河，穿火線，到抗戰的西北重鎮西安；一路走「三國」——偽滿、汪偽政權、中國後方；八千里，雲和月。歸來後，仲直沒說什麼，羅雷卻幾次三番地自詡為當代妖猴！我呢？我沒有什麼好比，負責人吩咐時雖曾說過「放心去吧！得道多助。」我卻不敢以此慰勉的話來自我寬解，我只知道：服從、負責、奮鬥、犧牲而已！

二等車廂的旅客，多數是「日系」人，少數所謂「滿系」的中國人，也都是「帝國政府」的中堅幹部，隨車的鐵路警察對待這一類乘客均給與相當的尊敬，加之「大陸號」中長途旅客較多，除到山海關時做出入國境的嚴格檢查外，由瀋陽開行的這一段途程中，車警雖然巡行數次，並未對任何旅客盤詰，所以有一段時間，我自己都忘記了那提包的存在了。

戰爭使一切脫軌，這班快車本來是準時不誤的，不料幾度為軍運列車讓路，太陽已快落山，應該是抵達錦州的時刻，車又停在溝幫子車站，一等又是二十分鐘。月臺上的小販正好大做生意；此去彼來不停叫著：

「便當，便當——」

「燒雞，燒雞——」

同座的日人自「食堂車」回來後，我已解決了我的飯盒子。我也可以到飯車去用我的晚餐，但我不願離開我要送人的聖誕禮物，只好在我的座位上便當便當了。

小販的叫賣聲又引起這位同座者的發言興趣，他一面用牙籤剔著牙縫，一面噴著酒氣自言自語地說：

「聽說燒雞是這裡的名產哩！」說罷，卻偏過臉來望著我。

「說的是呢！」我只好接應著。

「可是食堂的僕役說，現在賣的燒雞全是烏鴉哩！」

「這個，我不知道。」

「不知是戰爭的關係呢？還是商人的道德呢？」

他這話很難回答，我也不準備回答，好在他也不是真正要求回答。不久，不知是他酒力發作，還是他長途勞頓，竟呼呼地鼾聲大作了。我也依著座椅的靠背假寐著，上一個月在這裡所發生的一

幕，也應時的浮上腦際。

上一次，我乘坐的是慢車。人人都知奉山線上三犯俱全，尤其是在「普通列車」的慢車上。有為販賣生活必需品而跑單幫的經濟犯；有來往熱河私運黑土的煙毒犯等等。因此敵偽警憲的部署上，這條路線上也多由「日系」人擔當。敵人往往因檢查第一種而破獲第二種，或因注意第二種而影響其他，是以地下同志在心理上也都對遼西之旅視為險途。當我上車時，車廂中已擠滿了旅客，許多人的手中肩上腋下，都提著背著挾著大大小小的包裹；不用問，不是米麵菜蔬，便是不准自由買賣的肉蛋雞鴨等經濟統制品。上車後躲躲藏藏，東塞西放地，更顯得擁簇混亂。車廂裡已找不到可坐的位置，只有車警的「警乘席」的對面座位仍然空著，那位留著仁丹鬍的日本警察正端坐在那裡吸著神風牌香煙。說實在的，儘管車內再擁擠，怕日本警察的老百姓都寧肯遠遠地站著，也不願帶著「違禁品」坐到這個空位上來。當時我攜帶的皮包比這次為小，裡面裝的也不外是現地教材和幾部抗建文庫。我忽然覺得與其站在我的同胞間一塊擁擠，倒不如坐到敵人的面前。

「對不起，這裡沒有人坐嗎？」我的日語客氣話，說得也滿流利自然。

「哈伊！」對方回答個「是」字。

「我可以坐坐嗎？」

「伊呀！請。」

也許是看在這身協和呢的「協和服」的面上，居然也換來個「請」字。我未再加考慮，乾脆將

手提包大模大樣地送到「警乘席」頭上的棚架上，然後份有應得地安然就座；同那日警再略事天氣寒暄後，便取出觀光雜誌自行閱讀著。佇立附近的一般旅客們，都對我投以羡慕的眼光，但一看到那鬼子的撲克面孔，又趕緊扭過頭去。

車過皇姑屯，列車長開始驗票，車警也隨即檢查旅客所攜帶的東西。那個日本人仰視一下棚架上的皮包，又望望我——

「要看看嗎？」未等他開口，我便主動問他，同時站起來伸出手去，做著要取皮包的姿態。

「免了！免了！」對方說。但由第二列座客起，便搜查得仔細認真，口裡還不停地咒罵著「馬路野郎」、「五月蠅」等類的下流話。當那車警再回到「警乘席」時，我又搶先地說：

「辛苦了！」隨著送過去一隻香煙。

「伊伊呀，責任哪！謝謝，謝謝。」

這一次他未再注意那隻皮包，我也把曾經吊起的一顆心輕輕放下。那時，火車正好駛抵溝幫子。直到我抵錦州下車，都是相安無事。

我曾把上次的旅途經驗，在督導工作研究會上提出報告。最後，我學著負責人的口吻做結論說：「你不怕敵人，敵人就不可怕；你若站在敵人面前，敵人對你反倒視而不見。所以說『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險』這兩句掩護原則，由此可得到一個實例。」

負責人當時未在座，羅雷即席提出個有趣的質詢：

「你有沒有想到，假若你能坐到一位漂亮小姐旁邊，是不是更安全？」

「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許多日本警察都是浪人出身，常常對女性討厭；因此，當他們把目光集中在漂亮小姐身上，對於你不就視而不見了嗎？」

「完全相反！」我鄭重其事地舉例說：「有一次，我自龍江回瀋陽，曾經與一位年輕的女客同座。車過白城子還沒到四平街，鐵路警就來跟我囉嗦，他口裡問著我，眼睛卻盯著那個女人。他捨不得立時走開便不停地盤問我，好像想在那位女客人面前顯威風。幸虧我當時還在校讀書身分明確，而且沒有攜帶文件，他如何刁難都無所謂。此後我就再也不在女客附近找座，除非她是提孩抱崽的老太婆。」

「那你當時為什麼湊到人家跟前去坐？」

「是我先上車，她後上車。」

「可能是孟宛如吧？」

「別開玩笑！」

羅雷好開我玩笑，我可不能開工作玩笑。負責人認為那個辦法雖好，但也不能常用。所以這次特別不怕花錢，要我乘快車二等，車廂內的氣氛情況完全不同，上次的寶貴經驗也只能記錄在卷了。

錦州到了，夜已深沉！

收票口處的檢查人員，也把注意力的焦點投射在老百姓的背包上，我以「官公吏」的身分，提著我的公文包就很順利地混出車站。

時間太晚了，約定來車站接運的同志，可能早已離去；在我佇望尋覓的時候，驛前廣場上的馬車，已全被人搶先僱走，結果我只好隻身步行。

一路雖然疲倦，但此時心境已轉輕鬆，手提包也不再那麼沉重了。

滿天星斗，似乎也都為我即將達成任務而眨眼祝賀。北風也有些暖洋洋的！

夜靜人稀，聽得到雪地上自己的腳步和腕上的手錶聲交相和奏。五分鐘，十分鐘，再過五分鐘我就可以走到錦州城內的地下機關，見到時鑑，交代清楚，大睡一場。我也想起羅雷向我所說的調侃話。這次回去，我一定向他說：「你看吧！你們能由後方把這東西運回東北，我總算把它們由總機關送到基層。」

「喂！喂喂！」

剛過十字路口，就從斜角的派出所裡傳出一陣劃破夜空的喊聲，我佯做未聞，繼續前行。

「喂！站住！」

那喊聲更加高大，還是道地的日本口語命令型。音調頗為粗暴。

我未想到在這最後五分鐘還要橫生枝節，自忖情勢不妙有心想溜，可惜附近沒有小巷；若在白

天，行人混雜，那就容易多了；空街獨行，不易脫逃，弄巧成拙，反為不妙；乾脆仍用老辦法——面對敵人。於是我收住腳步轉過頭來回聞一聲：

「我嗎？」

「進來，進來！」

那傢伙繼續命令著。紅燈映射，面現兇光；手槍晃動，寒星點點。

我的兩腳無法遲疑地邁上高高的臺階，走進派出所。那個值夜班勤務的警察，退到他的辦公檯後，手槍仍舊指著我，氣勢兇兇地問：

「你的深更半夜的，街上什麼的走？」

「伊呀，火車誤點了，實在對不起！」

「提包裡的，什麼的有？」

「公文雜誌等等，你的看看？」

「呀，我的看看！」

「都是公家的東西，可看的什麼沒有。」我說得仍極自然，心裡已開始緊張。

「囉嗦的沒有！趕快打開——」那傢伙已顯得不耐煩。

我只好表示滿不在乎地把提包擺在辦公桌上，一面報明自己的「身分」，一面提出證明文件給他看；希望藉著偽裝的「身分」發生嚇阻作用。可是那傢伙偏不聽邪仍要檢查，只是態度平和些。

「請打開吧！」

我取出鑰匙，極力鎮靜地，逐步開啟皮包，取出上層的雜誌，展示給他：「這是司法月刊……」最後又說：「這是本部文件。」

那傢伙看到帝國政府中央部會專用的最高機密文件袋，上端騎縫處已用火漆封口，蓋著明晃晃的朱紅大印，不免稍顯猶豫，但仍用左手取出一袋，摸來摸去，抖上抖下。裡面的東西長方端正，整整齊齊。這類東西一共五袋。

「武器的沒有，煙土的沒有。」我說。

「假鈔票的有？」那人道出心中的疑點。

「哪兒的話呢？」我故意出聲漫笑著。

「最近的，偽鈔犯的多多的有！」那人面色凝重地說。然後堅持地表示：「我的還是要看看的！」

我也禁不住嚴肅起來，不客氣的對他說：

「這是帝國政府的機密，你我都無權拆看！」

「我的皇帝陛下的警察官，警察代表皇帝，你的知道？現在，帝國安全的原因，我的檢查責任的有！」

變局已經無可避免地在開始——

我心中警告自己：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再想出一個最妥善的辦法，以期挽回不幸。否則……可是，我所準備的辦法都已經用過，我再沒有更佳的辦法可想。我只有任此變局無救地發展下去，我只有接取即將來臨的噩運。一瞬間我忽然靈光一顯，想請他暫緩，並借用其派出所的電話向時鑑求援。但那是應變的禁律。因為事態演變到如此田地，如用時鑑偽職的影響力暫時渡過，也將留下以後的線索；如渡不過，即將爆發更大的變局；何況對手方又是日本人，時鑑只是「滿系」高官，對他也不可能發生作用。就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剎那，那個傢伙已掃盡猶豫，動手拆封。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想要搶奪，我的手已抓住那紙袋的一角，忽聽「撕——」地一聲，文件袋被我們從中扯裂，十幾本《中國之命運》立時跌落在辦公桌上。室內的空氣突然凍結，我們兩個人都楞住了。

半晌……

那人費力地說：「你——」

我也費力說：「你——」

「你的重慶份子的有？」對手已完全瞭解我的身分。

真相暴露後，我感到再無顧忌，反而精神大振，因此便理直氣壯地向他展開宣傳攻勢。我說：「不錯，我明白告訴你，我就是重慶方面的工作人員。我們抗戰已到反攻階段，最後勝利已經屬於我們。今天，為了祖國，我已準備犧牲，可是你要知道，你們的末日也快到了……」

那位日警，先是驚愕，繼而激動……最後竟將手槍放在旁邊，用他震顫不停的雙手，將散落桌

上的《中國之命運》急急地收攏一起，再送入我的提包裡……末了，又從已投入提包裡的書中取出一冊，放在他的槍旁……然後像突發心臟病的患者一般，十分用力而稍帶口吃地說：

「你，你的走罷！你，你，提包拿去，快快的走！現在，別人看見的沒有，我的看見的也沒有……今後小心，這樣攜帶，大大的危險……你，你的走吧！」

我一時弄不清他的意思何在。竟然呆在那裡，動也未動。那人接著又說：

「這、這一本，我的看看……我的讀一讀……你放心，我的讀完的燒掉，你做得對！你為了你的祖國準備犧牲，可是我的祖國哪裡的有？我……我……我是高麗人……」

那人再也說不出話來，只用盡力氣將提包從辦公桌上推向我，他的淚水也跟著湧下，滴落在辦公桌上，滴落在他的手槍和《中國之命運》一旁……

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使我如遭雷擊，全身痙攣，手足麻痺。我驀然瞭解，原來對方是一個「高麗棒子」，不，是一位朝鮮反日志士！但我竟忘記了向他表示感激，也未向他做禮貌上的道別，只木然而乏力地接過皮包，轉身想走，可是忽覺眼前一片汪洋，不知如何舉步。

12

我自遼西歸來，抵瀋下車時，已經天黑了。回到敦和里，等於是遇險返航的船隻再進避風港一樣，應該有一份安全輕鬆歡愉的感覺，事實上我卻像跑完萬米的運動員，已經人困馬乏筋疲力盡，爬上我的舖位，倒頭便睡了。

半夜，聽到有人敲門，進來的是伊正。

伊正走近我的床邊，悄聲對我說：「負責人找你！」

我忙著起身、穿衣服、打裹腿。

羅雷被驚醒了。睡眼朦朧地問：

「什麼事？上那去？」

我沒有回答，伊正也沒理他。

「半夜三更鬼叫門，絕無好事！」

羅雷喃喃地咒念著，算是對我們對他無言的報復。

我隨伊正出門前往，在路上，我沒有問他；但羅雷的閒話不免有些影響，我禁不住在心裡自己

尋思。我今天，雖然也算是負重要責任的多年幹部，提到負責人找我，仍不免感到緊張。一方面因負責人是現地組織的最高領導者，有其嚴肅性；一方面由於多年的工作訓練，使我們習慣於考慮本身工作範圍以內的事。現在找我，必是我的工作部門出了什麼事，惴惴然，惶惶然，心裡無限憂慮！

穿過青年會，越過大帥府，伊正不向北拐而繼續西行。

「我們不到尚智里？」我追上前去，問。

「不，直去至善里。」伊正回答。

至善里？負責人居住的地方？我心裡更感奇怪！

以前，我不知道至善里的所在。我們一向都是不知道與他個人無工作關係的機關，若是知道多了等於增加他的保密負擔。為什麼這次要我到至善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故？伊正已走離我很遠，我不便再上前去問，既然找我，我只有去了再說。

至善里到了。

至善里，這個省方的中心機關，黑夜中從外面看去與普通房舍無異。放眼四鄰，這時已戶戶無光，家家入睡。我們進入時，則見炕上地下，屋角牆邊，人人都在一盞微弱的燈光下，靜肅而迅速地整理著文件。窗戶上都滿遮著防空窗帘，並無絲毫光線外泄，但這些燈光的匯聚，若與外界的黝黑相較，室內真可說是燈火通明了；至少在我進屋的一瞬間有如此的感覺。待我的眼睛適應了室內的情況後，我才看清楚室內的人與物。

正在各據一方而忙碌的同志們，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我們進來，也沒有人向我打招呼，其中有的人我還不認識。我被直接領到負責人的座處，這一切情況使我更無法想像。不遠的地方像是負責人的太太也在收拾東西，在我和負責人整個的談話過程中，只有她時而靜下來聽聽，也似乎只是藉機會休息休息。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負責人的太太，她當時的化名叫碧丹，經負責人再介紹後，我才認定是她。第一次見她是在一二三〇事件以前，那時我與仲直羅雷等覺覺團的弟兄們，在從朝鮮歸來不久入獄的金希根同志處開會。三年未見，她亦與澄波同志一樣地前後判若兩人，苟非介紹，真不敢認。

負責人讓我先坐下歇一歇，然後告訴我瀋陽地區將有案件發生，不適省方繼續駐用，因此考慮迅即遷離。將要發生什麼案件？負責人未加說明。地下工作時期，最困難的事莫過於有關「案情」發佈的範圍與程度；說多了，怕大家增多不必要的戒懼；說少了，又擔心聽聞者低估情況，不夠警覺。蓋因同志眾多，性格不同，有者敏感，有者凝重，同一囑告，反應各異，所以我們並不希望負責人多發表案情。但我理解到這一次一定很嚴重，不然，作為東北全境地下工作指揮塔的省方，不會考慮搬遷。遷往何處？這是負責人星夜火急找我前來談話的原因。負責人特別查詢關於我所督導過的各地區的工作基礎，社會環境，和掩護潛力。

「若就營口、長春、哈爾濱三處比較，」我的回答，不能不特別慎重。「營口的同志有一百幾十人，組織比較完整。魏邦所連繫的，有很多殷實商戶和地方士紳，掩護力是雄厚的。李牧之所領導

的另一系統多是教育界人員，其中有五位小學校長，有兩個學校在郊區，正好利用做祕密機關。一般的社會環境單純，日系人也少。只是遠處遼南，地勢偏僻，對指揮全面工作似乎不便。哈爾濱同志也將近百人，組織亦不弱，掩護力雖佳，但有國際都市之稱，白俄人、朝鮮人在人口比例上亦高，因之社會結構複雜，似亦不適充任省方重鎮。至於長春，同志有兩百多人，我組織基礎深厚，各界各階層同志都有，且地理位置適中，交通四通八達，對指揮工作最為便利。但該處為新興都市，人口比例稀少，掩護力則感薄弱，而且又是敵偽統治的心臟——偽都新京所在；平時即警憲林立，防範森嚴，若鬥爭起來，交手白刃，似亦非省方理想之地。」

一口氣，我做了很長的分析報告，負責人未表示當否，卻繼續垂問：「另外呢？」

「四平街如何？」我提出反問：「有一次聽書記長說，偽四平省區西安西豐各縣的工作面很廣，若然，那個地區有長春之利而無長春之弊。只是我們省方工作人員有三四十人，一個縣城是小地方，突然去了這麼多陌生面孔，是否也不相當……」

負責人沉吟良久，仍未作任何表示。但見他扔掉一支煙蒂，又扔掉一支煙蒂。

當時，我畢竟只是負一部分工作責任的幹部，對省方轉移陣地這樣大事，並沒有負責人那樣沉重的感覺。我對我的建議也未敢堅持，因為我不敢負責任，負責人也不讓我負那麼大的責任。但當負責人正靜肅沉思的當兒，我卻禁不住內心裡幻生些羅曼蒂克的遐想。我想，假若省方真能向長春進軍也好；那樣一來，敵偽的統治中心在長春，我們反滿抗日的大本營也在長春；地上一個政權，

地下一個組織；一同發號施令，好戲對臺，何等精采！而且，當我們雄踞長春街頭的時候，放眼雲天，東北在握，一朝情勢有變，我們正可首先控制長春，進而號召全境。

這樣遐想，只是瞬息間事。待我離開至善里，已過午夜，負責人的沉重感染了我，地心吸力倍增，呼吸悶促，舉步維艱！

第二天傍晚，省方駐瀋人員，除了銜命外出者，幾乎齊集敦和里，總計有十五人之多，形同召開一次核心會議。

負責人向在場同志反覆掃視很久，說：

「大家都在這裡，我向你們宣佈一件事情。這件事有些同志已經知道，但知道的不多不全。現在，我把這件事向你們重說一遍，希望大家有所了解，也希望聽聽大家的意見，對我最後的決定再做一番參考。」

原來瀋陽市立六中有個祕密讀書會，有四五個學生傳播抗日思想，這個會是由一個劉生發起的。數月前，正身同志的弟弟被吸收進去。正身弟弟已察覺他哥哥是有工作的，曾告訴了劉生，劉生就要求正身對他們指導。這件事報告了組織，我們對中學生原認為年輕，意志尚不堅定，一向只對他們灌輸民族意識、國家思想而不組織。但他們的讀書會已成事實，如任他們自己去做，恐怕他們大膽妄為，一出破綻，必將株連正身和他弟弟。我們讓正身弟弟調查劉生及其他份子，報告說他們都充滿熱情，並無其他。這樣組織就指定調到至善里居住的惟亮同志指導他們，要他們不再擴大吸收

新分子，把他們這個讀書會當為外圍團體。因為惟亮有工作經驗，外表仍是學生派頭。

惟亮與劉生聯絡已有兩個多月，昨天傍晚見面時，那個劉生突然哭了。原來他曾因言談激烈為日本憲兵隊逮捕，讓他組織讀書會，做為被釋放的條件，還時時威脅他、壓迫他，他被迫無奈將與惟亮聯絡事向敵人報告了。最近我們給他們閱讀的一本《中國之命運》，他送了上去，敵人看到這本東西大為驚訝，也大大地誇獎他一番。據他說直接指揮他的那個日本人昨天上午到新京出差去，四天後回來，臨行時命令他繼續與惟亮小心聯絡，不要引起我們的警覺等等。他感到情勢不對，忽然天良發現，把這個經過哭哭啼啼地都告訴了惟亮。他說他聽到惟亮幾次講述民族大義，深深地受了感動，如果我們的工作因他而遭破壞，他就真成了國家民族的罪人。負責人據報，立時派惟亮同志再去與他聯絡，安慰他，稱讚他的悔悟等於為國家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我們絕對維護他，保障他的安全；如果他願意躲起來，我們負責將他掩護，或者送他去後方，讓他自己選擇決定。

「這就是這個事件的概括情形，」負責人源源本本地講給大家聽。「有人還想要問什麼嗎？」

大家都默默地靜聽，沒有人想問什麼。

「劉生還告訴惟亮，」負責人停息片刻，見大家無言，又說：「敵人跟蹤惟亮發現我們的住所已有一個月時間。我分析劉生的報告，認為是實話，因為最近敵偽警察查戶口的次數較多，而且還有一個高麗人來賣我們東訊社印小冊子專用的美濃紙，我們感到奇怪並沒有買。大約他們發現了至善里和正身同志的住所，也可能跟蹤惟亮到其他辦公地方，只是對我們還未摸清，不然他們早就動

手了。這次那個日本人到新京去，也許就是專為這個案子，所以他回來時，可能對我們開始行動。現在我們既已知道消息，就要採取主動，我們要在敵人之先動作。今天上午，我已與書記長社長決定將省方撤離瀋陽，三天以內轉進到長春去。如果我們做得快做得好，我們就一無損失，不然，後果便不堪設想。我不知你們對此決定有何意見？」

原來，負責人是當日凌晨撤出至善里的，經過一天部署，大體安排就緒。因為案件還沒有發作，僅據可能的必要，決定立時放棄至善里和其他兩處機關，事情過後，敦和里也在放棄之列。負責人還特別解釋，總機關遷動是一項不得已的措施，現在時局瞬息萬變，我們的工作正在緊要關頭，所以不能因應變而影響工作的進行，省方遷長春，我們工作就可一天不停。但因這是特殊情況，所以負責人雖然宣佈了決定，卻仍慎重地徵求我們的意見。

大家似乎更沉靜了，沒有意見提出。

「當初若不派惟亮同志去接頭就好了！」不知是誰，忽然迸出這麼一句。

「是的！」負責人很虛心地接納了這句話，眼睛直直地注視面前的燈光。「可能是如此。當然現在不是檢討過去的時候，若檢討起來也尚難判定是非得失。因為劉生由正身弟弟而發現了正身，即已注定出了漏洞，敵人照樣可以偵查破壞我們。惟亮前去聯絡，只是擴大了漏洞；但如果沒有惟亮同志那樣的熱情衝勁，因而感動了對方，我們可能仍然蒙在鼓裡，得不到機先。不過，暫時不去談它！」

敦和里位於大東門外菜市大街末端一條橫向胡同的中段，專供一部分省方督導人員返省述職辦公及住宿之用。這個卑微的所在，由於此次事件竟身價百倍地一躍而為負責人發號施令的應變指揮所。它是一棟兩間相當破舊的臨街平房，房門經常關閉。左間玻璃窗，下三分之二滿糊白紙，上三分之一，透過玻璃向外顯露一支斜插的雞毛撢子，這支撢子就是這裡的安全訊號。來敦和里的人必先經菜市大街，菜市大街相當長，街道兩旁整天擺滿菜攤和菜擔，街道當中也終日滿坑滿谷都是人；經過這條街時我們可以不必戒備特務追蹤，因為這裡是人的海，人的洪流，被追蹤與追蹤者必同遭淹沒，相互流失，無形中為敦和里增加一層極大的掩護力。拐進胡同要進敦和里前，如遠處不見安全信號，便須繼續前行，出胡同繞個彎子再來，仍不見信號出現時，便只有三過家門而不入了。在裡面的聽到有人叫門，不論普通或用暗號，也不問來人為誰，開門前先將雞毛撢子取下。

「卡——卡卡！」這一次進來的是惟亮，開門同志把門關好後又將撢子送回原位。

惟亮同志向負責人報告說，劉生很沉著堅定，表示敵人不會懷疑他向我們告密，他自己可以與敵人周旋，不用我們掩護。他只求我們寬恕他的無知與錯誤，他就是死——也心甘情願。

據負責人的估計，此次事件的應變時限只有三日，說是三日，當然越快越好。但地下工作的人與物，都不能公然行動，並且不能動員過多同志，打開組織的祕密關係。在多種主觀客觀條件限制下，調度起來十分不便。何況這還只是我們單方面的應變措施。敵方是否另有詭計？三日時限的情報是否可靠？而在我們決定放棄的幾處工作場所外，敵人的毒爪是否還伸向我們未曾預料的機關？

那麼瀋陽全地區都是最不安全的地帶，是最前線，是即將火拼的戰場了！是以惟亮離去後，負責人無限感慨地對書記長說：

「有幾句話我想對你特別談談。昨夜，我已考慮了很久。今天上午想跟你說，卻說不出來，現在不能不說了。自從我們開始工作以來，經過一二三〇事件，經過三省黨部事件，經過前前後後多次案件，許多老同志們，被捕的被捕了，殉難的殉難了，我們三個人總算『留在外面』，平安工作到現在——」負責人頓了一頓，回顧一下社長，再繼續注視著書記長。「現在，為了適應這次變局，為了彌補這次破綻，你、我、社長，我們三個人中，也許不免要犧牲一個了；我們支撐這工作已經八九年，也值得犧牲一個了！如果必須犧牲一個才能穩定住這次局勢，犧牲誰呢？我嘛，時機未到，你們也許不會同意；社長，他、他身體病弱，不能支撐這種難局；假若瀋陽的局勢支撐不住，那，我們省方撤到什麼地方也都沒有意義了；所以，只有你了。因此，我決定社長隨我到長春去，你要繼續留在瀋陽，不能撤退！你要考慮考慮！」

書記長頻頻點頭，毫無表情地說：「考慮什麼，哼！」

書記長似乎忽然感冒鼻塞，所以「哼！」了一聲。

這時我們都環侍在側，負責人坐在炕裡桌後，書記長坐在炕沿桌前，燈光微暗，聽得到大家屏氣凝息的呼吸聲，卻看不清彼此肅穆的面容。

不知為何，睡在碧丹懷裡的「大胖子」，忽然無端啼叫起來，一時安撫不住，負責人趕忙接抱，

才使他止住哭泣。敦和里也一向是光棍堂，窗臨街路，忽有小孩啼哭，也是反常現象。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負責人撫慰大胖子，是不能單以父子情深加以解釋的。不過，當小孩重新安睡，負責人將他交給碧丹以後，又似乎自我安慰地說了一句：「我雖然只三十幾歲，可是有了兒子，死亦無憾了！」

這句話，別人也許未注意，我卻聽得清楚，十分地清楚。我聽得這句話後，當時即有三種不同的聯想：

第一種是反感的。我覺得負責人這種說法，實在是反革命的。我們參加工作的時候，組織要我們打破封建觀念，犧牲小我一切，要為國家盡大忠，為民族盡大孝；不僅子女，連父母都不顧了！現在負責人卻說「有了兒子死亦無憾」，那，我們許多青年同志們，有的還沒有子女，有的根本沒有結婚，那，那我們都將死而有憾了嗎？

第二種是同情的。我覺得我們年事尚輕，還不懂得中年人的情感。我們一無所有一無牽掛，頭掉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可是中年以後，「出師未捷身先死」，在無望與絕望的困境中，兒女是惟一的安慰與希望了吧！

第三種是更加沉重的！因為我又忽有所悟，我理解到這句話是說給碧丹聽的，可以說是負責人對他太太的暗示和鼓勵；他雖然給書記長下了「犧牲」的命令，可是他自己也在準備犧牲了！

將帥棋定，我們較易分配。督導人員尚未回瀋者電令他們不再返瀋，已回瀋者如羅雷等人即前

往督導區待命。最受敵人注意的如正身全家及惟亮，送往外縣掩護；伊正等人仍伴同書記長留瀋；仲直和我則隨社長與負責人同時北上；其他同志亦均有妥善安排。另外還給我一個特別任務——派我接防至善里，將至善里的行李綑好，然後押運到火車站，託運到長春。

社長平素就是很少談吐的人。在這一段緊張而凝滯的時間裡，他一直帶著幾位同志在整理文件——那是他在省方比較專責的工作；沒有他的決定，我們不知何者應當銷燬，何者應當留存。他既沒有說話，我們就很難從他顏面上看出他內心的反應。

書記長原有「小鐵人」之稱，一張紫銅臉，平常就老有一種像煞有介事的樣子，這時候不會有輕鬆的表現，所以也無法看出他是否有更嚴肅更沉重的感懷。

負責人倒是和平時指導工作一樣地寧靜安閒。一切分配停當，就又悠然地劃根火柴燃起一支煙來。

我們從三位負責人的表情上，本看不出事態的嚴重，但我們明白這次的應變方策是空前的。自開始工作起，我們一直以瀋陽為根據地，為司令塔。雖敵偽年年以負責人等為對象，施行特別搜捕檢舉。但負責人等照樣在瀋陽來來往往，了無掛懷。我們年年增調幹部，擴展機關，均未感到任何困難，因為瀋陽人口已逾一百二十餘萬，掩護力極為深厚。可是這次負責人竟認為它不適再加利用，決心撤走，那麼，這次事件的嚴重性也就不言可喻了。

在緊張的情況下，鐘錶走動也快，轉眼間又趨夜半，正是我該到至善里接防的時間。

「負責人，我去了！」

「我陪你去！」

我剛說罷，書記長即席表示。說時遲那時快，書記長已經起身探摸探摸他的手槍，開門出去了。任何一次的應變行動中，「身先士卒」這句話，好像是專為他說的。負責人深知他的性格，所以對他也未加制止。

我忙動身追趕，未到門前，卻被負責人叫住。

「紀剛，」負責人說：「書記長的安全由你負責！」

這真是一條不知如何實踐的命令。在路上，我想。

負責人讓書記長死守瀋陽，不准撤退的託囑猶迴響在我的耳際，現在又告訴我書記長的安全由我負責，我一時惶惑起來。想來想去，我只有一個辦法，於是加緊腳步，追到書記長的身邊。

「書記長，」我說：「我走在前面吧！」看他沒有理會，再試著加以解釋。「這是負責人的意思。」

「現在，你聽我的！」

書記長截斷我的話，頭也不回地繼續前行。既然如此，我只好退到街的那一邊，尾隨著他。

書記長走的是另一條路，與昨夜伊正帶我走的不同。我們沿著南門臉，穿過胡仙洞，繞著巷子向小西十字街走去。我們擔任特種任務的時候，都由兩位同志同時出動，在街上一前一後一左一右，

像馬跳連環似地，互成犄角之勢走在街的兩邊。這樣，不拘是走在中途或到達目的地時，前面的主動者如遭意外，後面的副手可揆度當場情勢：敵寡可聯手出擊，共同制敵；敵眾則乘機脫走，回營報警。

深夜行路，這時是違犯宵禁的。在一條陋巷的轉角處，我拾到一塊拳大的鵝蛋石，緊緊地握著。假若湊巧碰到偽警巡邏查問：「拿石頭幹嘛？」我可以說：「打狗！」但他若找書記長的麻煩，我從後面竄上去，用這東西「打人」，也未嘗不可！

我們小心繞過偽警崗哨，迅速機敏地前進，不久便到達至善里。我們再偵察一次各方情況，覺得尚無動靜，而安全信號也正常，便闖了進去。伊正和惟亮仍在整理東西，書記長交代一番後，他們便分批從旁邊的小門，次第撤去。

這就是這一天的變化。昨夜這個時候，我辭別負責人由至善里走出，今夜這個時候，我又奉命回來；我真不知，也不想知，明夜這個時候，我將身在何處。

13

曙光初現時，我開始疲倦了！

敵人發動檢舉，常在拂曉前一二小時，我和衣倚牆斜臥，雖然睏極，亦不敢入睡。我必須時刻留神周遭的動靜。突然一聲鉅響把我驚起，原來是老鼠在開玩笑，我只好忍下這口怒氣。這時屋裡是黑的，天棚也是黑的，窗戶紙卻透過來一層慘白。這間屋子恰似一個張開的虎口，我好像被塞在虎口內，我不知道這虎口會不會隨時合下來，我只有不去想它！

天色大亮，我動手綑紮行李，綑行李是容易發出聲響的，夜裡不便工作，恐怕驚動四鄰。而最重要的是整理行李時，還要仔細檢查一下所裝入的物品有否給敵人留下一點直接或間接的線索。譬如無意中放在衣袋裡的片紙隻字，襟邊褲緣的姓名，服裝店的商標字號等等。這些工作，伊正、惟亮已經做過了，為了慎重，我重新再做一遍。

這天上午平靜地渡過，緊張的情緒也逐漸鬆弛，中午以後，我還飽睡了一覺。

指定的時間到了，我即開始行動。依照負責人的意旨，我應該下午四時起運行李，乘馬車到火車站需一小時，伊正奉派於五時至六時間在火車站前等我，事先由他買好去長春的車票，等我一到，

便幫我搬動行李交行李房託運。

行李共六件。三個柳條包，另三個是用線毯綑紮的，體積、重量都不小，也不輕。原本計劃僱兩輛馬車，偏巧這時街頭只有一輛，再等又怕誤了時間；馬車伕想要多賺幾塊錢，硬說他一輛足以拉得動。馬車開動後，才知上了當！那馬又老又瘦，力氣有限；那車業已古舊，輪軸轉動不靈。就這樣，老馬、破車、超載，我們上了路。

出了至善里的巷口，轉過「九鬼洋行」豎立在馬路邊上的招牌，我們便行在由大西城門到大西邊門去的大西關大街上了。行李堆滿車中，我高坐在行李上，舉目四望，希望另找一輛馬車分擔此車的載重，也好行動快些。可是跑在街上的，沒有一輛是空的。我不死心，再前後左右的張望，空車沒有看到，卻見一個鬼頭鬼腦的傢伙，騎著腳踏車從後面急追而來。

我的心頭一震，本能地認出他——他是特務！

那個傢伙，一身灰藍色混紡布的工作服，有點像電力局檢修電線的工人，但是頭戴鴨舌帽，一臉陰陽怪氣，屁股後面衣襟之下鼓鼓凸凸的，當然不是工具而是武器了。

瀋陽特務亦多。走在馬路上，經驗使我們可以在萬人叢中指認特務如探囊取物，並無何驚異之處。但這個傢伙先由後面向我疾駛，離我的馬車五丈開外卻改了慢騎，又從鴨舌帽的帽沿下，用一雙賊眼向我翻看，這就使我不大自在；因為，我感覺他正在跟蹤我。

當時，我只是普通人家搬家模樣，雖然一輛馬車拉的行李多些，惹人注目，但我身穿「文官」

制服，持有「職場」證明，一般特務或經濟警察臨時起疑對我盤問，我都有充分把握應付過去。但他若是從至善里跟蹤而來，那情形就完全不同……

這時我想到羅雷在尚智里時所講授的釘梢術；人小鬼大，妙計無窮。只是假若我也騎單車，或是步行也好，那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脫梢而去。現在，我卻在押運一馬車的行李，目標奇大，而這個車又是「馬跑」的比「人走」的快不了許多。

將近大西邊門時，緊張的情勢升高。

我們原是按著「左側通行」的交通規則向火車站方面行進，他或遠或近，或快或慢，都是騎著他的單車像個尾巴似的，悠蕩在我的後面；這時他忽然向右快騎，斜過馬路，超越我的馬車，騎到對面那座邊門派出所去。派出所的門是面對大街開的，他下車進門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拿起桌上的電話耳機打起電話來。更令人煩心的，他打電話並不是面對裡面的辦公桌，而是背轉身來面對大街，一面說話，一面注視著我和我的馬車從派出所門前通過。

他這種舉動，使我立時意識到：

一、他確實是個特務。

二、他確是在跟蹤我。

三、他打電話向上級報告；也許在請求增援，做更詳密的部署。

這三點聯想和判定是顯明自然的，無庸我再猜疑推敲。我的心理也瞬間起了急劇的變化。我真

痛恨這馬車走得太慢。我若乘用一輛汽車多好，趁他打電話的機會，我就可以快車開溜。不幸我的想法根本不切實際；因為汽車早被統制，全部支援「大東亞聖戰」去了，我的心願等於幻想。我叫車伕快馬加鞭，但沒有幾步，又慢了下來。我說再給他多加錢，車伕表示現在是上坡路，不再慢就很好了。

真是急死人！

出了邊門，便是商埠地的「千代田通」，馬路從此向右彎曲，正好掩遮那特務從派出所裡向我瞭望的視線。高中時期，我曾在邊門外一經路文會書院讀書，這一帶的地理我特別熟悉。我也想到電話，我可以到一經路口新新茶食店借電話向負責人報告，可惜的是——敦和里未裝電話。那個破所在，真若也裝上電話，不驚震四鄰才怪！我又想，這時能有兩個人同時押運就好了，為什麼不著伊正協助護送？何必先讓他在車站候等？否則，也好有個商量，或是溜出一個人向負責人去請示。可是我這時缺乏任何人力物力的憑藉：我不能開快車逃逸；我又不能打電話請命；我又沒有人替我分憂。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更有甚者，我還知道這次應變人手不足，負責人並沒有加派同志暗中尾隨。我這裡若有進一步的變化，也沒有人向他報告，而我這裡任何變化在今天的其他應變措施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人在最沒有辦法時，常有異想天開的奇念。我以前常看偵探和間諜小說，我真願我是那些書中的主角，在極度困境中奇蹟出現，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可是事實上，我只是一個人被丟在大海

裡，孤身無助，任由兇濤吞噬淹沒……

在對敵搏鬥上，我個人此時面對的難題如此，我們整個組織面對的問題也幾乎如此，多年來我們在東北就等於是孤軍奮鬥。負責人說得好：我們所做的是革命工作，和辛亥時期的革命志士一樣，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資本只是我們個人的智慧、勇氣、與生命。其實生死本小事，這是我們每個地下工作幹部同志所共有的體認；當我們宣誓參加組織的初期，可能還殘存些生死安危的顧慮；工作久了，對這些早已置之度外；所念念於懷的，只有組織的安危與工作的責任。

車抵二經路，我忽然靈光一閃，便命馬車離開千代田通繞過大吉祥藥店的樓腳，岔入九緯路去。無論如何，現在我是一個人面對現實，我必須自做決定；因此我需將一切情況重新判斷。第一、由大西邊門到火車站的千代田通和大西關大街同樣地人車混雜，若認定後面有個人就是特務，也難免有時出於誤會。尤其是至善里已被敵人發現月餘，由至善里拉行李出來，心理上容易有被人跟蹤的幻覺。第二、大西關大街和千代田通是人人都走的大馬路，即使有特務同行也可能事屬偶然，未必就是對我跟蹤。第三、九緯路是條經過住宅區的僻靜街道，數百米內一草一木，都可以目力控制，有何情況比較容易研判。

路靜人稀，晚風稍急，我剛感到一絲輕鬆，可是回頭一看，那傢伙又疾疾追來，看到我的人車俱在時，反倒停下車來，拿出打火機點燃香煙，然後再上車緩緩地慢騎跟進。這簡直是對我開玩笑，跡近侮辱，因為他的行動超出羅雷所講的釘梢常規。按著原則，負責釘梢的敵特必須暗中跟蹤，必

要時換人輪替以免被我們發覺。現在，他們不但沒有換人，而且公然尾隨，若不是他們的愚蠢，便是他們已另有決策。什麼決策？敵人不使我逃出他們監視線外，那就是逮捕的先聲！

想到被捕，我的心倒忽轉平靜。負責人對書記長所囑告的話猶深深記在我心。在這次大變局中，負責人認為他們三個人中都不免要犧牲一位，我們就更不在話下了。於是我不再研判敵情，乾脆做被捕犧牲的準備。所謂「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就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敵人不會一個人行動，也不會在馬路上捕人，他必須等待增援特務到達時，再脅迫我跟隨他們而去。不然，便是等這車到憲兵隊門口，到了他們的大本營再開始動手。展眼望去，再過一條小橫街，便是三經路的日本憲兵隊本部。我又感覺到這隻老馬破車，走的未免太快了些。

我趕緊將身分證摸出，暗中撕碎吃下肚去，身分證本是假的，沒有真實的姓名職業住址，不能判定什麼，但落在敵人手裡也怕弄出間接線索。至於行李裡面，那已是檢查再三毫無問題的了。只是行李外面，為了火車託運要「起郵便」關係，我用布條寫了長春兩處地址。想到布條，我立時滲出一身冷汗，當即用腳一蹬，將一個柳條包踢掉，像是顛落的樣子。同時我將馬車叫停，藉著重新擺放柳條包的機會，將行李左翻右轉地把所有的布條扯下，暫時收放在衣袋中。那個特務由我車旁經過時，一點也沒有察覺，好像他還在暗中竊笑；不知是笑我不曉得他在跟蹤呢？還是笑我已成了他的甕中鱉！當他騎行在我的前面，背對著我的時候，我又開始吞食我的布條；吞布條可不像吃紙團那般容易，但此時我的胃納奇佳，三口兩口便將它們全部吞下去。這時我又深深感謝我的車「慢」

有用了，因為那個特務又停在前面小橫街口的小攤子旁購食糖果，意在等我前進。等馬車經過那小攤處，我的布條早已落阯，如果他真動手捉人，除了空空的一個我外，敵人將一無所獲。所以當他再從後面跟我而來時，我也開始竊笑了！

負責人沒有預料我會被釘梢，所以沒有預告我此際如何應變；現在也不知我正在被跟蹤，因此也來不及臨時指示；一切只有由我做主。我知道：我個人尚可能任意溜走，卻沒有辦法帶著一大馬車行李脫逃。而按著負責人的估計，敵人雖已注意至善里，但還不到動手捉人程度，假若我把行李一丟，等於立時將案件引爆，無事變成有事了。所以我只好跟在行李一起，希望它無事，有事也只好由它。

我已做了被捕的準備，也就不再去想什麼。快到憲兵隊的街口時，我將眼睛輕輕閉上，好像一位走到斷頭臺上的人，雖知即將來臨的命運，卻不願眼看著那鍘刀下落。只聽馬蹄聲嘀嘀嗒，車輪聲吱吱嘎嘎，那馬車繼續在走著，走著，並沒有其他動靜……睜眼看時，早已越過憲兵隊快到所謂「馬路灣」的國際大馬路上。經過這瞬間休息後，我的腦筋突然靈活起來。我暗暗回頭，看到那個傢伙正和一個相同的人物併肩交談著，不久，那另一個人物轉向旁邊的街巷騎去。我忽有所悟地不能傻等著被捕，因為敵人似乎正在廣佈羅網，他們不僅要捕我，而且正追蹤這車行李，放長線釣大魚。敵人既然一定要釘住這車行李，我就必須使這車行李成為絕緣體；不僅使敵人捕不到別人，就連我自己也不能讓他們捕去。於是我想到「丟」與「逃」。

決定「逃」，容易；決定「丟」，實在難！

春天，三省黨部案件發生時，致中同志中陷被捕，脫獄後曾先與我碰頭，口述其被捕後所受的各種嚴刑毒打；張輔三同志於殉難前也從長春獄中傳出話來，說「敵人的酷刑不是一般同志僅憑革命精神所能忍受得了的。」我曾奉命用這些材料寫《應變篇》續稿，補充現地教材的內容。在研討的時候，負責人曾說：「我們訓練同志，要他們有革命、犧牲、冒險、犯難的大無畏精神，以開展工作。不幸被捕，要他們能夠本必死成仁的決心，不供祕密，以保衛組織。可是當他們落入敵人的毒手後，這一切固然可以做為憑恃，但不是完全而絕對的憑恃。我們當然相信我們同志的革命志節與精神，但也不能漠視敵人種種偽裝設陷的審訊技巧和他們所特製的種種毒刑的威力。所以我們最大的安全保障，便是——不使同志被捕。」

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言論。我們集體訓練，個別啟發，天天都在培養革命精神，但在應變的時候卻不能完全依賴它。然而聽訓的幹部沒有人對此置疑，因為有抗日地下工作經驗的人，都體認到對兇狠殘暴的日本特務以及其所設的人間地獄而言，這是一條很現實的真理。

假如我現在任由敵人捕去，我相信我自己有成仁的決心，有取義的勇氣，我能至死不說出絲毫祕密。但組織能夠不受驚擾嗎？回想一二三〇事件時，組織的精英損失泰半，我們被急急補充上來，在蜀中無大將的情況下，負責人將過多的工作責任交託給我；先是瀋陽各大專院校的青年社團，繼之以遼南和遼西的地方組織，其次是長春和哈爾濱兩大據點，最後又開展了松北及龍江的線與面。

總之，在目前的組織關係上，我幾乎接觸了五成，除了負責人和書記長外，我所知道的「人」是最多的了。這兩天來，我已由負責人寧靜的面容中，體驗到他沉重的心境；透過他那平和的目光，感觸到他那焦慮的情緒；若我現在被捕，負責人將如何應此大變？那時，廣大地區組織同志的安危繫我一身，這個責任，實在沉重得可怕！所以為了組織、為了工作、為了同志、為了一切，我不能被捕，我必須逃。

可是逃了人，逃不了行李，行李一丟必將促使敵人提前發動檢舉，這也不是小問題。方才我已經想過，也許情況並不如此嚴重，可能「天下本無事」，人一逃行李一丟，變成「庸人自擾之」。若由此而引發新的問題，將把此次已經安排妥當的應變措施弄得一團糟，那，我又有何顏再見江東父老？

丟也不行，不逃也不行，這兩個矛盾問題，瞬息萬變，反覆急驟地衝擊著我，我坐在馬車上，真是六神無主起來。說實在的，我工作多年，常遇風險，就如日前在錦州與「高麗棒子」交手的那個夜晚，也沒有使我受這麼多的心靈煎熬。現在，在我後面這個討厭的傢伙，一直在悠閒而得意地尾隨著，像一頭狼纏著一隻羊——牠本可一口吞噬，卻偏要慢慢捉弄。

我的心忽感無限酸楚，我想哭，卻哭不出來。這時我才真正體驗到做幹部的輕鬆和做負責人的苦痛了。做幹部，奉命行事，一切簡單容易。負責任的人，面對整個組織的安危和全體同志的生死，訂政策，下決心，是如何地沉重！沉重！

最後，我終於決定，寧肯接受組織的制裁，不能讓敵人捕去。「丟」「逃」最理想的地點是火車站。瀋陽車站四通八達，來往人群川流不息，要擺脫一個特務的釘梢是最方便的地方。但假若敵人已在車站周圍撒下羅網，而伊正在車站等我，他又不知底蘊，豈不等於引飛蛾投火？不成！車站絕對不成！

於是我再考慮第二個地點。

真是天造地設，車過馬路彎，就快到「滿洲醫科大學」。我命馬車沿「北四條通」行進，以便經過「滿大」的後門。滿大的工作原是由谷音發展的，他被捕後便由我前來聯絡。所以這裡進出的路徑與環境我也特別熟悉。谷音同志入獄前常用「呢喃燕」筆名寫詩，雖篇篇充滿故國之思，詞意終嫌溫婉，而今面壁三年，筆鋒突變，特別雄壯豪邁起來。最近祕密傳出的一首刊在《東北公論》上，題稱「我是王！」，在這首詩裡，他已自喻為一頭猛虎，結句且說：「虎入牢檻，虎仍是虎！」那麼，我也要做王，豈可做羊！

車抵「滿大」後門時，我說要到裡面找一個人同走，叫馬車停在門旁等我；走進門裡幾步又復返門前，大聲問馬車伕的姓名，查記他車牌號碼，警告他不要把行李拉跑；再囑咐他只稍等我一等，我馬上就和這裡的朋友出來。這些話那傢伙全聽見了；他一定暗中慶幸，他必以為他此行豐富，更將另有所獲。

經由圖書館，轉過紀念像，便是預科大樓旁的學生寄宿舍——啟明寮。進寮後，正值學生下課，

進出人多；混亂中我從走廊壁的衣帽掛上摘下一頂四角帽自己戴上，取下一件黑斗篷自己披上；然後像個「滿大」的學生一樣混在學生群中，從開在「浪速通」方面的便門走出去。是時已逾五時，冬日天短，暮靄朦朦，五十公尺以外亦不易辨人識物了。

那個傢伙，一定仍在後門口的馬車旁等著我吧？

我急急跨過浪速通，穿入對面小巷，左彎右拐地閃避著。最後走進一條極僻靜的小巷裡，丟掉順手牽羊來的衣帽，躲在一個幽暗的門洞中。天已全黑下來。足足有半小時工夫，這條橫巷無人通過，於是我判定我是完全擺脫了敵人的釘梢。

為萬全計，我繞過「十間房」，從「小夜市」走出「北市場」才搭乘電車，未等到大東門終站即由小北門下車，然後再順著城牆根走回敦和里。

敦和里這時似乎正人心惶惶，因為伊正已先我而歸，報告我未依時到達車站。紀剛哪裡去了？有什麼意外變化？敦和里的同志們都在悶聲不響地懸猜，負責人也正在堂屋地上來往踱著。

我一進門，大家都定了神，時鐘正指夜晚八點。等我把經過情節約略報告後，登時全體又陷入緊張。負責人叫我到屋裡休息吃飯，又派兩個人出街為敦和里做安全瞭望，再派一個人到至善里附近去察看風情……

緊張後的疲憊使我毫無食慾，吞下肚裡的布條不能消化，這時也開始反胃做嘔，我哪裡能下嚥吃飯？

負責人原擬與社長於當晚搭車北上，但為了處理我丟行李所引起的至善里及其他善後問題，延緩行期，其他的人反倒奉命提前自瀋疏散。

稍稍靜下來，我聽負責人、書記長、和社長等在低聲談論。他們談論的很多，我在裡面聽到的很少，我只影影綽綽聽到幾句「沒有勇氣」「智慧不夠」等等的話，好像與我有關。

次日，負責人因「事」外出，我正在燒飯。這時我已被視為「驚弓之鳥」，不再奉派外出辦事，所以只有做火頭軍的份兒了。柴煙燻眼，我不停地流淚！負責人回來時，正好屋裡沒有別人，我本想跪在他面前痛哭一場，訴明我決定丟行李的心理歷程，請求給我應得的制裁。可是話剛出口，負責人卻溫和地說：

「事情過去，不必再談了！」

14

通告□字第一號

省方負責人為視導工作並慰勞同志於日前蒞□，即將訪問及接見同志，懇談一切。茲將負責人來□視導之隨行人員、接見人員、接見方式及程序，通告如次：

（一）隨行人員

①東訊社社長

②（略）

（二）接見人員

①各單位之領導同志

②受嫌被捕殉難殘廢之同志或其家屬

③參加現地工作二年以上之同志

④有特殊工作表現之同志

（三）接見方式

①集體接見
②個別接見
（四）接見程序
①負責人講話
②社長講話
③聽取工作報告
④聽取工作心得感想
⑤交換意見及解答質疑
希各該單位遵照以上各項，充分準備，妥善安排。
特此通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三日

省方遷駐長春後，組織即時以省方公報對各單位幹部同志發佈通告。捧讀這份通告時，我有無限的感觸與領悟。這就是我們的負責人，這就是我們負責人的作風，這也就是我們的組織越遭破壞越加擴展，我們的同志越是犧牲越是眾多的焦點所在。我不願用再接再厲、越挫越奮等慣用詞句來形容我們的戰鬥精神，最恰當的字眼還是我們家鄉的一句土語——頂煙上，才能充分表達。若用日

本大本營報導戰況時的常用術語說，那便是——我們真正做到了——敵前登陸！

無論如何，據我所知，我們是由瀋陽「逃」到長春來的，但負責人卻不這麼說也不這樣想。在我丟行李的次晨，負責人還曾與書記長又親自去了一次至善里，這時至善里已為敵特侵入守候，街的兩邊亦有敵特看守，看情形敵人已經動手了；幸虧他們機警鎮定，脫身險地。負責人仍不甘心，還是設法借用電話向房東太太交代，使房東太太應付敵特有個準備。負責人在瀋陽又多坐鎮五天，等到工作同志疏散的疏散，重做掩護的掩護，一切善後安排妥當，才與社長起身來長。他們在車上無視敵特的頻頻檢查，還悠閒地做了兩首舊詩，其中有兩句是：「河山原我有，策馬入長春」，大有理直氣壯之概。

從此負責人即開始巡行各地，使現地工作態勢開創了新紀元。負責人每到一地，那個地方便立時燃起燎原的烈火，每蒞臨一個單位，那個單位便興起蓬勃奮發的朝氣。一年來，我曾代表省方到各地區督導工作，受到各地區同志熱誠的關懷與尊敬。但當我以隨員身分隨負責人接見同志時，我所體察和我所感受的，更十百倍於往昔。負責人帶給各地同志的戰鬥情緒與工作衝力所造成的感人盛況，只有主帥督師三軍振奮時，在戰場上所產生的一鼓作氣、衝鋒陷陣的熱潮，差堪比擬。

儘管各地同志和工作都在振奮歡騰與飛躍猛進，我心底總有一股濃重的鬱悒。關於丟行李那個事件，負責人曾說「事情過去，不必再談了！」我知道我獲得了原諒，但我覺得我並未被了解。我所希求的是被了解而不是受寬恕。因此，當我與羅雷在敦和里分手時，我曾試著想對他解釋解釋。

羅雷卻氣虎虎地說：「解釋什麼，說你怕死，你就是怕死！」

我被他封住了口，沒有說出第二句話。羅雷似乎也感到他出言過分，看我悶悶地呆坐在那裡，便又把話頭扭轉回去。

「對不起，大哥！」他說：「我是說笑話！」

他瞇縫起原本就小的小眼睛，在漲得通紅通紅的圓臉上，綻出一絲笑容，笑得卻極不自然。

笑話？這個時候他跟我說笑話？當然不是的！但我寧願他是開玩笑。不然，他是什麼意思呢？他也和負責人同樣譴責我嗎？難道我真正給覺覺團的弟兄們丟了臉嗎？若是我應該受譴責，他只有沉默的份兒，因為他該與我同感蒙羞！若是我不應該受譴責，而他還要譴責我，那他又是什麼意思呢？

那天，隔室的談話我只聽到一點點，羅雷在場，當然聽到的會比我更多。在他們更多的談話中是否對我丟行李的措置有更多的非議？其實，無論負責人等對我持什麼觀點，我都應該坦誠接受，我原擬以接受組織「最嚴厲的制裁」的決心才脫梢而歸，冀求以此方式保衛組織，我受到任何程度的責難、非議與誤解，都是微不足道的。那麼，我又何需求人了解？羅雷這一記悶棍，打得我深自慚愧，我覺得我不該再作任何解釋，我所應該做的，只是努力向前，正如負責人所說，事情已經過去了，還談它做什麼！

我知道，我若跟仲直談論這事，我會獲得較多的同情。他會聽完我的傾訴而不說羅雷那種笑話。

但羅雷的話已先入為主地發生作用。到長春後雖與仲直有更多次的會晤，我卻不願再主動提起這件事。

不提歸不提，我心底的鬱悒潛流仍常在不時激蕩，假若這也算是我個人冰點的話，那只有用死亡才能將它融化吧！

一二三〇事件前，負責人是一副中學教員的模樣，穿了三年商人裝束後，現在已剃去鬍鬚，留了分髮，戴上金邊眼鏡，儼然成了「偽高官」。負責人說這是他最佳的行動時期。三個月來由我做隨員，負責人的足跡踏遍了「北滿」地區各主要城市，旅行了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綏化、哈爾濱、北安、齊齊哈爾、白城子、王爺廟、札蘭屯等地。用偽滿的鐵路系統說：由偽都新京出發，沿京圖線東行，轉圖佳線北上，然後循綏佳線、濱北線、齊北線、濱洲線、平齊線，最後經京白線重回長春。我們在沿路的重要縣市和同志眾多的地方下車訪問，只有一處例外，那便是我的第二故鄉——泰城。

綜述負責人在各地接見同志時的講話內容，主要的是依據現地工作大綱闡發現地工作的本質及其重心，而每次都要強調動員的重要並提醒同志對動員工作的認識。負責人說：

「組織、宣傳，與對敵偽鬥爭，都是我們現階段的中心工作。等到戰局接近東北，我們就要動員民眾武力展開游擊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陸軍主張北進，如果那時日蘇發生戰爭，東北即在戰爭邊緣，所以我們當時曾成立準備動員委員會，積極部署軍事行動，可惜那次機會過去了。

但是除非有意想不到情況，關東軍絕不會不戰而退，我們還有動員的時機與必要。我們必須對爭取偽滿軍警及動員民眾武力預作籌劃。至於動員時之景況，大家都知辛亥以前，革命黨人屢次起義，但誰也不知那一次那一個地方能起義成功；到我們動員的時候，局勢如何演變也是無法預知，省方與各地區受到阻隔，亦在想像之中。那時，全要靠各地區獨自發動起來。所以各地幹部必須先做獨立戰鬥的佈置以及其他種種準備，才能負起這個重責大任，才能不使我們多年以來流血流汗的奮鬥，功虧一簣。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現在我們抗敵工作已經走了九十里，但只能算是一半途程，因為最後十里的動員工作，比以前的九十里，將更艱鉅更激烈，將使我們同志流出更多的血汗，在此願與諸位同志共勉！」

其實這些話，負責人是經常向省方幹部講述的，現在我再一次一次地重新傾聽，每聽一次仍有一次更新更深的認識與徹悟。

在我伴隨負責人作「北滿」巡行的旅程中，我特別不敢多睡覺。坐在自己的座位中或躺在睡舖的「寢臺」上，強自警醒極欲合攏的上下眼瞼，觀察觀看，因此感覺最深的，不僅是長夜漫漫而且也長日漫漫了。東北北部地區所謂「北滿」，在昔日帝俄與日寇爭奪經濟資源的目的下，交通是發達了，縱橫和迂迴的鐵路線，加上交織穿梭的公路網，使人可以到達任何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但人口的集聚不能比例地同時增加，所以敵人現正藉機大力推行其「滿洲拓殖」計劃。原來日本蓄意侵略東北，炮轟北大營後，未便公然佔領併吞，乃先假託「滿洲民意」，利用偽帝溥儀成立「滿洲國」，

宣傳「日滿協和」，互稱「兄弟之邦」，但雖稱兄弟之邦，畢竟仍為兩「國」，對於日本人進入「滿洲」之身分數量仍無立場。據說偽政府成立之初，那個不識時務想利用日本反被日本利用的偽國務總理鄭孝胥，曾對國聯調查團說明「滿洲是皇上的故土」，所以溥儀回「滿」是繼承大清帝國的祖業，脫離中國而「獨立」是理所應該的。但調查團問鄭以何立場在「滿洲國」當「總理」？鄭無以對；蓋鄭原籍福建，自然是個中國人。日本人似乎也懂得這個道理，於是在宣傳上套用漢滿蒙回藏等五族共和之說，在「滿洲國」內喊出「日滿蒙鮮俄」「五系共榮」的口號，將一般東北同胞統稱「滿系人」，中國話亦稱「滿語」，猶恐有人見「外」，硬把「朝鮮」人及流落在東北的「白俄」人拉上做陪。這樣一來，大家都是「滿洲國」人，只族系不同，做官做民都份有應得；因此除駐滿之關東軍外，在東北的日本人都取得「雙重國籍」，在東北時則為「滿洲國」的「日系」人了。名義是虛，佔領併吞是實，日本預定十年內完成五百萬人對滿移民開拓計劃，屆時「滿洲」的總人口將由「九一八」時的三千萬達到五千萬，敵人便想透過這十分之一的「日系」人口永久控制滿洲。不過東北確是地大物博，也真像日本朝野所公認的是「謎樣的滿洲」，雖然天外飛來這麼多的「日系」「開拓村」，也未能使「北滿」火車線上的驛站密度增加。在「南滿」十里一站，二十里一停的情景，這裡是沒有的。尤其是以前被稱為「中東鐵路」的濱洲線上，常常百里不見人煙，只聽到空洞！空洞！空洞！單調的車輪撞擊鐵軌聲，更顯得旅途的孤寂與漫長。

火車像被踏傷了的蜈蚣似地在荒原上蠕爬，特別顯得渺小而緩慢，曠野遼闊無邊，行駛半天，

周圍景物如故，好像它已經睡覺了，「空洞！空洞！空洞！」的聲音，正好給它自己吟唱催眠曲。現在是冬天，「大漠孤煙直」的圖案是看得見的，「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已無緣入目了。我曾以荒原野馬自喻，而且也曾以此自詡。而今，我似乎真做了荒原野馬，我也似乎任由我的豪性狂奔著，但冰雪擊蹄的鏗鏘，是否和這火車的輪軋聲同樣的空洞而單調？

火車爬上高丘，爬下高丘，齊齊哈爾在望了。在晨曦中，從高丘舉目展望，齊齊哈爾是一片霧、一灘雲、一團烏煙瘴氣。朝陽未露面，燈光已褪色，只見一大堆模模糊糊，混混沌沌。那清皙的，一條條的，從四面八方而來的鐵路和公路像動脈和淋巴管似的，都伸進那一團煙霧裡便不見了。人在漫長而單調的旅途中，腦海裡卻可不受拘束地泛起無邊無際的文思。自從敵偽加強文化統制，公佈「藝文指導綱要」後，特別誘迫「滿洲國文化人」直接用日文寫作，也真有人用「和歌」和「徘句」的型式作起新詩來。清晨起，站在原野裡去觀望都市，任何人都會有這種靈感吧：

都會呀，
你是大地的疥！

說都會是大地的瘡，原野的潰瘍，是很好的「徘句」意境與題材，只是不能加以鮮明的解說。因為潰瘍裡有戰鬥有犧牲，有壞死有新生，有入侵的細菌，也有抗敵的白血球；正如都市裡有善良

有罪惡，有黑暗有光明，有敵人和他的爪牙，也有愛國民眾和革命分子一樣。這裡的前任黑省工作領導者，一年前已受絞刑；而尚勇和另幾位軍方同志，仍住在龍城的軍事監獄中，他們曾隨同馬占山將軍從事過江橋保衛戰，其後又打入了偽軍作到上校團長。在這個偽軍軍管區內，我們已爭取了三分之二的力量，可恨的「一二三〇」先把他們吃掉了。瘡或潰瘍總有痊癒的時候，可是我們多數人都將遭逢那些繼續犧牲的白血球的命運，我們既做了白血球，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小學的時候，東北尚未淪陷，老師曾說中國的地圖像一片美麗的海棠葉，又像桑葉，列強從四面八方來要蠶食我們。要我們立志，將來長大了要盡到匹夫之責。未等我們長大，「九一八」事變了，這個事變等於縮小了也固定了我們有責的範圍。現在我們已經長大，中國的國土也實在太大，有更多的人在那廣大的土地上從事保衛戰鬥，負責人則主張現地抗戰，就是說要更直接地負起光復東北的使命。有時我常常凝視地圖，就局部看，東北的地形加上朝鮮，正像一隻被吊起來的肥鴨，朝鮮是細瘦的頭頸，東北是豐美的身軀。在這個軀體上，由帝俄和日寇前後侵佔並且修建了「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縱橫交叉結成了一支龐大的十字架。近百年來，東北這塊土和這塊土上的子民，一直在承受著十字架上的痛苦生活與悲慘的命運。負責人曾說：「東北淪亡了，做亡國奴的是東北人，東北人不先圖自救，還等待誰來救我們？東北有三千萬同胞，十個人裡有一個不做順民，該有多大的作用；一百個人裡有一個人起來抗日，該有多大力量。這就是現地抗戰！」負責人就是常常用幾句平常話，深入淺出地說明地下工作的理念。這句平常話人人皆知，而在未聽到有人說出

之前，又為人人所未想到。現在我們在東北，有成千成萬的知識青年，就是為這幾句平常話而熱血沸騰，奔走拼命！

晚間，我們搭夜車南下，這列車就是那列車，只是時間已經過了一年又一個月，天氣依舊是那麼寒冷。車停泰城時，負責人已經睡著了，我也佯裝入睡，似乎是沒有人由這裡上下，至少是沒有旅客來騷擾這節「寢臺」車。車長早已完成了他檢票的手續，全臥車裡只有一片鼾息配上一片靜寂。又是一聲使人銷魂的汽笛聲！車身動了，我忍不住悄悄爬起，傾吐出全胸腔的熱氣，在已凝結一層厚霜的玻璃車窗上，呵成一個可以透光的圓圈。朦朧中，我似乎看見了我叔叔醫院的兩層樓房。卻望不見三十里外我父母鄉居的農莊。俯首近觀，已快到月臺的盡頭，那地方，就是那地方，似乎是詩彥，似乎是詩彥正在那裡匍匐蠕動。

近來，工作之餘的孤寂中，我常想起詩彥。不是我對詩彥的懷念超過宛如，也不是像我初到尚智里時的那一晚忽然覺得對詩彥有所愛戀。一年來，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件件都證明我的決定正確，我沒有一點對不起她，若不是託負責人的洪福，我可能早已成為她永久的夢中人了。不管主動抑或被動，我已將詩彥推介給心竹了。在心竹未被捕前，他與詩彥有多少次過從？他與詩彥間所建立起的感情，究竟到如何程度？我不知道詩彥知否心竹已經逃出，時間仍是短促，就是詩彥愛上了心竹，也不會那麼根深蒂固吧！她不會也有像嚴姐對心超那樣長期等待的心理吧！那麼，現在她還去尋求誰呢？這兩個從未經過如此風浪的少女，現在知道心竹被捕了，特務們又到處追緝我，一

定大大受驚了。據仲直說宛如那時候嚇壞了，就她的柔弱性格來說，我早也想像得出，她一定驚恐萬分，她怎能受得了那種打擊？即使宛如對我真的有些情意，經過這番打擊，她的心理與感情都會有了變化的。她從此忘掉我最好，像她那樣迷人的人，還怕沒有人想盡保護之責嗎？最低她現在還有一個安適的生活環境，雖然是蝸牛式的，總不需別人去掛心。只是詩彥，聽說她張惶地走了，她到長春做什麼？假如和她偶然相逢，那時我還認她不認她？依她的性格經過這番打擊，是否會更堅強，還是轉弱下去？她與心竹的感情到底是……唉！心竹你哪裡去了，你是否安全？你一定受了很多的苦！這些人和事構成我一個思念的環，只要提起一節，就將全部扯動。

在瀋陽，我個人出街的活動都儘量排在夜裡，尤其是剛剛徵調入省的那幾個月。接著心竹事件發生的那一段期間更是如此。這樣，可以減少被熟人發現的機會。瀋陽的街燈本是暗淡無光的，加上破損了也無人去修補，所以無光的地段總比有光的地段多，現在的長春也是如此。一個人走夜路時，最容易接觸到星星，特別是在陰曆的月頭或月尾，天上只有星星，每個星星都發射出閃閃的光芒。其實星光本是微渺的，但對黑夜行路的人卻是無上的安慰與親切，而且天越黑越顯星星光亮；想到敵偽多年統治東北，同胞們正生活在黑暗的黑暗之中，我們幸能擔任些星星的任務，也應該感謝這時代的優遇吧！

一晚，我們從長春市內向二道河子走去，走到東大橋頭——東大橋是接通郊區的要衝，街兩旁商店稀少，也更缺乏路燈，但路面並不太暗，這時才注意到這晚是個有月亮的夜。正是明月在天，

人影在地，而月明星稀，只有寥寥的幾顆，躲躲藏藏地點綴在天際，顯不出一點點的光輝。我不禁又為那高潔孤獨的明月而感到落寞了。

不知怎的，也許是長時間被自己理智所抑壓的情緒發了酵，也許是故意飲吞下自己的委屈而不願向任何人傾訴，因此在自己心靈的深處，常常凝聚一層孤獨的寒霜；不單為自己孤獨，也為負責人孤獨，更為我們這一群人感到共同的孤獨。數月來，我常跟負責人在長春大馬路或大同大街上行走。自從離開瀋陽，負責人出動的時候，書記長所擔當的伴隨任務便由我來代替。每天隔著馬路，斜望著前方負責人的背影。他的個子本來很高，也許是為了掩藏面孔因而低著頭頸走路；也許是歷年的工作重擔，壓駝了他那強韌的脊椎；望著那彎曲的背影，聳露在來往人潮之中，不覺油然地升起荒涼孤寂之感！有誰能了解他此時的心境呢？

一陣風沙驟起，吹迷了我的眼睛，忽然間車馬行人全不見了。看不到傀儡皇朝的帝宮，也看不到鬼氣森嚴的關東軍司令部；滿洲中央銀行那兒去了？滿飛大樓飛向何方？這裡已不再是偽都的鬧市，只見一片荒涼，曠野蕭蕭，一個彎曲而偉大的背影，在前方踽踽地行著，踽踽地行著……

偉大的　卻孤獨的　真孤獨嗎　不

四萬萬　五千萬　祖國同胞

抗暴　殺敵的心

都和我們一起　在跳躍著
都和我們一起　在跳躍著

這是我當時所激起的感懷，也可以說是我們根本的信心和期望，至少是我個人對我自己的安慰。

春節過後，羅雷病了，我再替他到遼南巡行一番，也順便將遼西的經常工作轉移給伊正。上元節這天，我恰巧到達營口，吃過魏邦夫婦的元宵後，曾獨自走到遼河岸上去散步。這晚，小雪初霽，月光隔著雲層像遮著布幕的一盞燈，厚重處仍感暗黑，微薄處則顯蒼白，河上景物倒可依稀辨認。靠岸的漁帆都熄滅了燭火，生活的艱苦使多數人忘卻了燈節的樂趣。河的中央，解凍而逐流漂下的一列列大冰排，在混濁的河水中，閃著慘白的光輝，發出悶喳悶喳的聲響，徐緩地向前移動著。

遼河真像隻疲憊的老牛，拖著沉重的車載，緩慢而不停息地流動。有人用松花江作過一篇悲慟的《流亡三部曲》，有人以鴨綠江詠出一首淒涼的懷念少女的歌唱，我沒有他們那樣的才華，但我這一晚卻對遼河興起獨特的偏愛，從心底湧現出對它的頌讚：

滾滾的　渾渾的
你　永恆的遼河
渾渾的　滾滾的

你　永恆的流

你衝過那　千山萬嶺
你追求那　光明自由
你的胸膛　長滿了高粱大豆
你的脊背　牧放著豬馬羊牛
你世世與黃河握手
你代代向祖國翹頭

你痛苦的時候　毫不悲愴
你歡樂的時候　也不歌唱
你　背負著歲月沉積的泥沙
你　拖載著千萬人們的希望
你從不訴說　你遍體敵騎的創傷
你永不改變　你飛躍奔騰的方向

你　渾渾的　滾滾的
永恆的流
你　渾渾地　滾滾地
永恆地流

15

我們在長春重新建立起祕密機關，這些機關和瀋陽大有不同。長春畢竟是新興都市，沒有瀋陽那麼多古老的僻靜的單獨的小院落。長春的同志們又多是從外縣市聚集而來的偽滿各機關公務員，住在眷村式的「官舍」裡。一行行一列列，房屋連著房屋，沒有間隔的院牆。有的家庭人口簡單，有的尚在獨身。我們的祕密機關也只好暫時採取「貼附政策」，將省方人員分別貼附在適宜的同志「家」裡。可是一個小家庭裡不便貼附兩位以上無職業無身分的外人，因之不能集體辦公，不便利於開會，也多了一層應付被貼附同志社會關係的麻煩，同時也須加倍提高對敵人耳目的警覺。

負責人辦公處定名日新里，明示日新又新之義。社長，浩然里、仲直，明德里。我的處所叫致勇里，不知是出於偶合，還是對我寓有啟示。

我嘗想：一個人如何才能表現出一個「勇」字呢？是不顧一切後果地猛然行動？還是在變局時迅闖那最後的一關？現在我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不悲傷也不歌唱地工作。

省方環境轉變，新的工作亦接踵而來，負責人不分晝夜地忙碌。他從未再提起丟行李那件事，也沒有察覺我的悒鬱心情，只是把我的工作責任日益加重。我完全接替了書記長以前的某些任務，

除擔任省方內部的交通聯絡、伴隨負責人的行動，還要指導長春地區組織，每月仍要前往哈爾濱、瀋陽一二次。書記長此時則專主持瀋陽地區工作。負責人希望瀋陽能再加強開展佈置，過一段期間想將省方再遷回瀋陽，一方面因長春的辦公和掩護都不甚理想，一方面也許就是要與敵人捉迷藏吧！

五月初，又是五月初，我回瀋陽尚智里。這一次我很坦然輕鬆，不像上年心竹被捕時那樣火急緊張。伊正已去遼西，羅雷在，書記長將瀋陽的工作情況向我交代完畢後，對羅雷說：

「羅雷，遼南各縣的事，你自己和紀剛談吧！」

書記長離去，我們重新坐下。我正想向羅雷開口，他卻先來一句：

「恭喜您，總督導員，你這叫能奔善跑，加官晉爵！」

聽得羅雷這話，真想回斥他兩句。所謂「能奔善跑」，當然還是由行李丟逃而引出的話柄。但看在他病後尚未復原的微黃面龐和我身為覺覺團大哥的份上，只有勉力嚥下去。而且他所說的總督導員，意在調侃，並沒有這個稱謂，大家都是督導員，身分相同，至於駐在督導員和巡迴督導員的區分，也只是工作方式不同而已。尤以省方遷長後，為免人員集中不便，有些督導員減少回省次數，就由我與文毓同志間接聯絡幾回代為轉達。文毓與我這時都經中央派任職務了，但一直未對同志公開，為的是減少敵人注意的目標，所以仍以督導員名義工作。假使當時羅雷知道了這件職務事，不知他對我更要如何取笑了，因為當時大家的心理都認為做工作而談職務，就是侮辱革命。這且不談，我還是很坦然地對羅雷說：

「暫時放下你對我私人的諷刺，先談談公事再說吧！」

「諷刺？笑話！」羅雷說：「大哥，我實在是抬舉你，若談公事，我昨天就回營口了，書記長向你轉告還不是一樣！我等你今天來，就是為了和你談點私事。」

「私事？」

「不可以嗎？」

「可以，什麼事？」

「討債！」

「討債？」我很感奇怪，不免用疑惑的眼光盯著他：「誰欠你什麼？」

「討債就是討債！」羅雷很認真地說。「你這叫貴人多忘事。去年今天一大早，你到我家去，你對我媽說要請我吃早點；結果你是個騙子，早點至今未吃到口，可是家卻一直回不去；你想想，這筆帳我們應該怎麼算？」

「有家不得回這筆帳，我還想找人算算呢！怎樣算，我也不知道。不過，請吃早點這筆債，我可立時加倍償還，今晚晚飯，我就請你出去吃——」

「真的？上館子？」

「當然，上大館子！我們可進城到中街明湖春，隨意點菜，闊氣一番！省方現在雖然很窮，但請你吃一頓豐盛的晚餐做犒勞，負責人還不會說我浪費。」

「別提負責人好不好？一提負責人就大煞風景了！」

真如羅雷所說，一提負責人就使我們想起了工作和責任，就不能不收斂起我們那點青年人羅曼蒂克的情懷。為了安全，為了節省，我們並未能上「明湖春」去隨意點菜，只能到城牆根底下那家自號「別有天」的小吃店隨意便酌了。

我們要了兩籠包子，兩籠蒸餃，一大碗三鮮湯。羅雷破例想喝點酒，所以又加切一盤滷肉和一碟豆腐干與醬花生。兩小壺老白乾，羅雷只喝了四分之一，可是他的臉色已恢復原有的紅潤與天真，甚且猶有過之。

出了「別有天」，他順著城牆就向南走。我說：

「羅雷，你醉了？這不是回尚智里的路——」

「你才醉了呢！」他反斥著：「這個時候回尚智里做什麼？」

「那你想往哪裡去？你知道，在瀋陽沒有必要，我們不應該在街上隨便行動！」

「你少打官腔好不好！什麼叫必要？去年今天，我一聲沒響地跟著你走出來，你還帶著槍逼我。今天，我可沒有槍，你若不願意跟我走，你可以回去，不然你就別囉嗦！」

在馬路上，我不便與他爭吵，但我察覺到他心中一定有事，而且這似乎不只是想家，所以很想與他回尚智里詳細談談，但他偏不回去，我只好跟著他走，照顧著他。

走出大南關，來到火神廟，這是去年我把他交給書記長的地方。在黑暗而陰森的廟門洞中，他

呆立了很久。我沒有再問他話，因為一路上不是被他頂嘴搶白，便是遭他的閉門羹。但在這個時候，他卻哼起那個怪腔怪調——

初一十五廟門開，
牛頭馬面兩邊排，
閻王爺就在當中坐，
一陣哪陰風吹個女鬼來……

這是一節民間小調，羅雷在學校時常常哼唱，高興時候唱，悶氣時候也唱，有時竟成了同學們向他取笑的資料，直接用牛頭呼之。可是一年來我從未聽他哼這個，可能他自己也未再哼過。現在他又哼起這個，在這般陰森的黑夜裡，在這個大廟門前的鬼地方，思想起在校時期的生活，而今實有幽明兩界之感。只是今天並非初一十五，廟門根本未開，看不見牛頭馬面閻王爺，也沒有風吹女鬼來，只有我們兩個人像遊魂似地在這裡踟躕徘徊。

最後，他又突然向前走去，不是回程，也不是向著他的家——金家園子那個方向，這使我多少感到心寬。穿過南關大街，拐入一條胡同，看樣子，他是想重遊小河沿了。也好，小河沿——我們母校所在地對面的萬泉公園，曾經有過我們多少青春的足跡，那逝去的年華，往日的歡笑，現在都

成夢境。若不是羅雷今夜發瘋，我就是發瘋也絕不會自己再來涉足的。

回到尚智里，已經很晚了，躺在床上，羅雷還在哼呀哼地哼那隻怪歌不停。實在令人心煩意亂！伊正在家就好了，有伊正在，羅雷多少會收斂些；我與他的關係，在任何方面都是降不住他的，現在只有我掛起白旗了。

「羅雷，」我說：「睡覺吧！有什事，明天辦；你辦不了，我來辦。」

「用不著你辦。」

「你自己辦，有什麼責任由我來負也好。」

「這話可是你說的。」他霍然從床上坐起，披著被單；我也照樣，只要他把話說明，不再悶在肚子裡嘔氣，讓我做什麼都行。「我說要跟你談點私事，就是這個。」羅雷繼續說：「這次回瀋陽，我聽到姚蕙的消息。你知道我們原是表兄妹，從小訂了婚，我們自己也有份感情。自從參加工作，我就故意疏遠她，怕她幼稚礙事，所以她很久就不高興了。等我前年入關受訓，一去半年毫無音訊，她就起了很大猜疑，因為她哥哥就是鬧戀愛糾紛而帶著女朋友跑的。後來我回來了，事實證明我沒有背棄她，我也想找個機會和她談談，誰知道你不容分說，一下子就把我從家裡拉出來。那時候在馬路上碰到她我還能說什麼？而今又是一年不見面，因此她對我的懷疑也就更大。」

「是的，」我回想起當時的情景──「那天早晨她就問過我，問你是不是另有朋友，我說沒有此事，而且曾向她保證，讓她安心。」

「這就是你的責任了，你保證什麼？你什麼也保證不了。唉！當時若是時間充裕或是在我家裡，我可對她把話說明，這次出走關聯這麼一個大變化，至少我該把我個人的立場叫她認清，那麼她以後愛怎樣猜疑就怎樣猜疑，愛怎樣行動就怎樣行動，我都無所謂，只是——」說到這裡，羅雷停息一會，似在努力壓抑胸中的痛苦。

「羅雷，」我深自遺憾地說。「無論如何，我個人向你道歉，當時沒有人能控制情況，我也只有拚命地催，不然像仲直那天的情況，不是很危險嗎？」

「說那些做啥？一切都不必說了！」

他的聲調已轉平和，不像方才那般激動。於是我問：

「到底你聽到姚蕙的什麼消息？」

「前天我聽伊正說。你去長春後，伊正接替你『滿大』的工作，上個星期他出席『滿大』的小組會議，那邊的同志提出了有關姚蕙的消息。我沒有告訴你，今年二月開學時，我看報紙已知道姚蕙考取了『滿大』。我想這樣正好，考上大學她的情緒可能振奮些，課業繁重也可以暫時把我忘記，就等於給我們一段情感的假期。誰知道她竟是個膿包，一進大學就跟男同學戀愛，你說氣人不氣人！」

「不會吧！」

「我還說謊不成？」羅雷的情緒又激動了，用拳捶打床板。「據伊正說，他們在小組會中曾有討

論：有人提出她是可以燃起抗日熱情的分子，想向她開展工作；有人反對，聽說她早已訂婚，現在又與某同學戀愛，因此應該考慮；有人說她已解除婚約或者遭受打擊，這種在情感上失意的人倒容易啟發工作；有人說她這是變態心理，所以要更加慎重。他們還弄不清她的未婚夫是誰，只知那個人和我們學校有關，所以決定請伊正協助調查。伊正想到那個人可能是我們同志，正趕上我回來，所以就先向我打聽研究。」

「你跟他怎樣說？」

「我告訴他，和我們誰都沒關係。我還表示這種女性要不得，別讓他們對她工作。」

「你怎這樣——」

「我氣都氣死了！你要我怎樣？昨夜我左思右想，一宿沒得好睡。」

「怪不得你今天氣色不好，我還以為——」不知怎的，聽到這種消息，我也感到不是滋味，似乎是比我自己的遭遇還要關心。我知道羅雷在工作上的定力，但對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這個感情，若真受了這種意外的打擊，也真是……無怪今天他一直同我反芻。於是我說：「那麼，你想怎麼辦？是不是給她寫封信？」

「不，寫信不好。我想過了，一封無頭信會使她驚駭，郵丟了也是物證，會惹出麻煩。而且用一封信也談不了那麼多，何況寫信只有去語沒有回言。我想我乾脆去找她，和她當面說清：若是她真對我不滿意，我們就解除過去的關係，任她自便，我們不能誤人青春；若是她能諒解我，就請她

專心讀書，靜靜等我。無論如何，我要和她做一次正式告別。」

「怎樣去找呢？」

「她每天由家裡起身去上學，必定要搭磨電車，最晚不會遲過七點鐘。我明早趕時間到電車站去截等她。明天不成，後天再去。大清早行人少，和她走一段路或者到小公園去坐一會，就足以把話談完，也不會留下痕跡，你說行不？」

「這個辦法倒可以，不過……」

「這件事在紀律上，我知道有點說不過去，所以我特地等你來跟你講。這件事說私就私，說公就公，而且你同意就算同意，不同意也得贊成，反正我已跟你這位總督導員報告過了，不能算我擅自行動。但是你可不能向書記長或負責人報告，假若你要告密，我就跟你拚命！」

羅雷這幾句話，說的斬釘截鐵，配合他那牛脾氣，使我提不出其他可討論的意見。室內寂靜無聲，我只感到我自己的心頭酸酸，看不見小牛是否流淚，朦朧中顯出我們兩尊聳立的巨影，在暗房中像牛頭馬面似地對峙著。說實在的，我雖然矯情放棄宛如，拋開詩彥，但卻從心深處贊同羅雷與姚蕙會面。唉！這是什麼年代？為什麼讓那些本應團聚的人，都不得不漂流離散？

「你不敢負責任？」羅雷不耐地追問我。

「好吧！」我說：「你要提高警覺，也要特別化化裝。」

「謝謝你，大哥，你還算是覺覺團的弟兄！」

說罷，他像一切都解決了似地倒頭便睡，不久鼾聲大作，只有我仍像馬面似地佇在那裡，呆呆地想。

羅雷如所預期地會見了姚蕙。他的出現完全出乎她的意外，當他走近她呼喚她的名字時，她還向前後瞻望，等到辨明呼喚她的正是身旁的他，也認出了他就是她的他時，她又驚疑震嚇地說不出話來。

「你、你、你——」她囁嚅著，如在夢中。

「不要慌，是我！」羅雷叮囑她：「跟我走，到前面去談。」

他先走前一步，她就像一隻被捉到的小羊緊跟在他後面。

「你不是被捉去了嗎？你從哪裡來？你沒有再回後方？你……」清醒後的姚蕙，像陣驟雨似地發出一連串的詢問。她說：「那天早晨，我和姑媽雖都知道你被紀先生帶走，可是第二天學校裡卻傳說你們全被捕了……接著三個月特務未離你家門，半年後才不找你家麻煩。可是一年來沒有你一點消息，你們學校裡又傳說日本憲兵隊已把你們祕密槍斃了。姑媽每天每夜都哭，我想你也許又跑到關裡去了……我那樣勸她她不信，現在她已經有點精神錯亂，而且視力更模糊不清了……多，多虧大表哥和大表嫂……不然……但……」她再也不能有條理地訴說他家情況，因為這時她已恢復了她對他的各種情感；她毫無準備，對這種突然的會晤，她不知是憂傷是喜樂，是興奮是恐懼；只是鼻涕眼淚一齊湧塞她的喉頭……

「啊！」羅雷啞然，他也說不出他所要說的話，他也想不起他想說什麼話，若不是他受過嚴格的工作磨練，不發狂地奔回家去，也不免要當場昏厥了。

「有人說你們是做祕密工作的，你到底做些什麼呀？弄得姑媽心神不安，連我也一點不知內情，既然日本人要捉你們，你怎麼還在瀋陽？趕快逃走吧！」

「姚蕙，」羅雷說。他已恢復了他的鎮定。「我來，就是要告訴你真情的。我已多年參加現地的抗日工作，我既沒有被捕，也沒有再入關，現在也不住在瀋陽，不過若有任務，也可能隨時去後方。我媽是你姑媽，還要請你多照顧，但不要向任何人說今天看到我，這關係你自身的安全。你以前太小，原諒我許多事都背著你；今後我也很對不住你，照目前情勢，我實也不能再見你。在學業上，你自己努力吧！去年離家的時候實在太匆促，今早就算我正式跟你告別吧！總之，希望你還像以前那樣想像我已經不在了，或者遠走了；只是願你明白，我現在是為工作也是被通緝，才不得不離開你，並不是為了別的。」

姚蕙睜大了眼睛用力地注視著他，似懂非懂地，嗯嗯地在喉管裡應承著，然後又不停地眨著眼皮，不知是眼淚遮掩了她的視線，還是想判明他是否是幻覺的存在，口角搐動著，似乎還想說話。可是未等她說出話來，羅雷就看看腕上的手錶說：

「快上課了，趕緊趕車去吧！」

聽完羅雷這段會面的經過，我說：

「你的問題並沒有處理嘛！」

「告個別就算了，還處理什麼？」

「昨夜晚你所說的感情問題——」

「我一見到姚蕙，就覺得頭兩天的想法錯了。」

「伊正的消息不確實嗎？」

「誰還有心研究那種事！大哥，我想我們既沒有把握把感情保留給別人，我們還有什麼權利要把持別人的感情！你說是不？不過，唉！只是母親的消息太令人傷心了。我們固然不能去照顧母親，但並不能忘掉母親呀！」

「誰還不是一樣，既然不能照顧，最好還是忘掉！你不曉得，去年心竹案發時，我家裡就有六口人被捕去。受刑最重的是我叔叔，日本人認為他一定知我下落，所以一直用嚴刑拷打他，他受刑不了便割斷了自己的頸動脈，幾乎死掉……實在想來，這些消息，不知道倒好；知道了，也是無能為力，反而影響情緒！」

我用這些話來勸慰羅雷，卻抑制不住自己也想起母親。我的母親是位標準的農村婦女，沒有進過學校，但一點不妨礙她做母親的偉大。那一晚，在泰城鄉下家中，母親聽說我要入關到北平去，便從左手無名指上褪下她那配帶多年的手鐲，那是「滿洲國」還沒有禁止買賣金銀的年月，她用拔

草挖苗的辛苦血汗錢換來的。她把那個金鐲子放到我手裡，說：

「你把這個好好的帶著，在北平我們無親無舊，什麼時候呆不了便把它賣了，買張火車票回家！」

「你把那個給他，更糟了！」父親在旁邊冷笑著接了一句。

「我是好心好意，你怎麼說更糟？」母親有些不滿意父親的嘲諷，因為父親沒有出言阻止我的遠行計劃，她早就不高興了。

「你瞧！」父親說。他拿起母親針線盒邊的量布尺，走到對面山牆旁。父親是個道地的莊稼漢，可是也很關心國事，每年他都買一張大亞細亞詳圖，像年畫似的貼在山牆上，沒事的時候就把「大東亞聖戰」的態勢和ABCD包圍圈的情況對報紙研究研究。現在他用母親的尺在地圖上測量著，說：「由我們泰城這兒起身到瀋陽是三寸半，由瀋陽到北平又是三寸半，再由北平到西安是三寸半，由西安到重慶也是三寸半。你想，他在外邊混得好，他不會想回來；他若混不好就沒有臉回來，還不是越走越遠？你給他那個鐲子說不定正是他遠走的路費！」

「我不懂什麼西安重慶，我只聽說過瀋陽北平，」母親為自己辯護著，並且又再叮囑我：「你別聽你爸爸瞎比劃，不管好不好，去個一年半載就回來！若是不夠，我這還有一個。」

我沒有忍心接受媽媽第二個手鐲，我也沒有勇氣拒絕第一個。就當時講，我不需要一個錢，可是我又不能不裝做真像遠行的樣子，所以第二天離開泰城時，我叔叔給我的旅費我也得收下。錢，

老早就捐獻組織了；很遺憾的，母親給我的鎦子我也沒有給她好好帶著，因為最近我看到組織經費支絀，也把它連同各處募捐來的財物一併送交上去，當做工作活動費了。這事只有我自己知道，當然也無須向別人說明。惟一感到不安的，算來我已經漂泊一年有半，我沒有像我父親猜想那樣的遠行，也沒有辦法依照母親的叮嚀按時回家，雖然五個月前，我也曾車過泰城。

16

羅姚會面之事，我自然沒有報告書記長或負責人，但回長春後，還是忍不住向仲直說了。

那時，在訓練方面，除了加強小組訓練外，幹部訓練班仍在繼續舉辦。宣傳方面更為擴大，以東北通訊社的名義積極推行。岳嵐、惟亮、田祥、益年、仁仇、繼堃等同志都是東訊社編審員或幹訓班指導員。社長負宣傳與訓練的總責，而仲直是副手，他擔任編審主任兼主任指導員等工作。聽過我的敘述後，仲直便說：

「按著紀律的規定，凡是被通緝的人是不得與家族親友聯繫的。但據我的看法，這條紀律主要是怕影響家人，我們與家人聯繫，勢將增加家人的精神負擔，警特前來查問，就不易安詳鎮定。我們同志眾多，當然不能放鬆這條規定；不然，很容易發生破綻。至於例外的，組織也會特准的。羅雷與姚蕙相見，既未留下痕跡，不會影響安全，而且關係他們重大感情的事，無論事先或事後你對負責人說，他都不會不准的。我們的紀律雖嚴，但不會嚴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我也知道這個道理。」我說：「只是放在自己心裡總覺擔子沉重，聽你這樣一講，我就感到輕鬆一些。」

「羅雷是對的，」仲直又表示：「他本可以單獨地，或者說偷偷地自己去會面，他不說也無人知道，但他卻一定要向你先說然後才去，他向你說就等於向組織報告了。唉！人本來就是有感情的嘛，所以任何事都不能過分矯情，尤其是愛情方面——」

「談到愛情，」我緊接著加以說明：「這也是我今天向你說起這件事的另一原因。你沒有看到那天晚上，羅雷就像一隻被擊昏了頭的野獸似的，在大街上東奔西闖，假若姚蕙對他的感情有何變化，我真擔心他今後的工作情緒。」

「羅雷沒有問題。」仲直斷然回答。「我不妨對你也談一談我們在西安的情況。這些話沒有機會特意向你講，今天趕到口邊，也就不必避諱，你想聽嗎？」

「當然！很早就想和你聊聊這些事，本來負責人是要我和你兩個人先去的。」

「不去倒好！你不知道我們在西安受訓時有多洩氣。若是別人，根本就不會回來了。所以你不必替羅雷擔心，他若不堅定，不必等到姚蕙的變化。」

「你就從頭說說吧。」

「我也只能簡單的說，因為說多了也無意義。」仲直思考一會，以整理他回憶的程序。「當我們動身的時候，負責人曾把後方的情形向我們介紹一點，怕我們沒有心理準備而影響情緒和意志，事實上他倒是顧慮多了。有人說失掉健康的人才知道健康的可貴，這話是有道理的，同樣，做了亡國奴的人才真正懂得愛國愛民族的重要。我們到西安後，發覺多數人似乎對抗戰沒有什麼感覺。西安

是西北重鎮，不容置疑地有許多事都證明抗戰的存在，在物質上也體味到抗戰的艱苦，但如果你到酒樓飯館一看，當地的軍政商民那種『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氣概，真不免使人要問：這是抗戰嗎？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呢？所以有一天，羅雷的姑父請我們去吃飯，聽我們說受訓後還要回東北，當面就把我們大罵一頓！」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是這樣，」仲直加以說明：「羅雷有一位姑父，九一八時隨軍入關，現在已是砲兵團長了。他們的隊伍駐防在寶雞，經常到西安辦事，羅雷和他取上聯絡後，他就常常找我們吃飯。最初他得知我們從淪陷的家鄉跑出來，認為我們有種，著實誇獎一番。離鄉背井久了，聽到些家鄉消息，確是他很感慰懷的事。後來知道我們在西訓班受訓，他就不甚贊同。他說：青年人幹什麼不好？為什麼要做黨混子？他勸我們既然當初學醫，現在就到蘭州醫學院插班復學；要搞政治，乾脆就去重慶入中央政校。這兩個地方，他都能託人保薦。總之，說什麼也不要我們回來。罵完了，便限定我們做一個禮拜的考慮，或習醫或從政，他好為我們分頭進行。」

「羅雷當時做什麼考慮？」

「他什麼也沒有考慮，倒是我替他考慮一番。他姑父是忠厚長者，也是典型的愛國軍人，他對中國抗戰很有信心，作了很多分析說明青年人應該努力的方向；他的話自有一番道理。他和我們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不了解在敵人嚴密統治的東北還能做什麼工作，而我們也不能向他多加解釋。所

以我向羅雷表示，攜帶文件資料有我一個人回東北就可以了，他不妨接受他姑父的好意，可是羅雷卻說：『你願留下，你就留下，我一個人回去也是一樣！』

「哦！」我不禁喟然。

「所以我們後來都沒敢再去看他姑父，沒有向他辭行便偷偷回來了。方才我勸你不必為羅雷擔心，就是根據這個說的。我當時建議他考慮留下，也不是我自己有什麼動搖，而是我對工作有時候也有些別的想法。無事時我常對自我做些檢討，或是對我們覺覺團的弟兄們加以研究。記得有一次社長對我說過：『你們幾個人儘管個性不同，但都有個共同點，某些氣質完全一樣』；我的研究結果也是如此。回想起來，我們最初發起覺覺團的時候，只是基於青年人的熱情與自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就不願做日本人的奴隸，所以一遇到東北抗戰機構時，便全體奮勇參加。一二三〇事件後，組織遭受重大破壞，因而採取化整為零政策再以抗戰團體方式活動時，你還提出過我們還幹不幹的問題。說實在的，那時我已經沒有那麼多的熱情，但由於認識加深，我們不在現地抗戰，我們還做什麼呢？當時的動力可以說是理智的實踐；認為我們所做的是應該做的，而且還應該繼續做下去，不計其成果如何；這可以說是力求人格的統一，做到盡其在我的意思。至於這一次從後方回來的心境與前兩次又不相同，未去內地的時候，我們總覺得國家民族與我們很近很近，似乎一伸手就可碰觸到祖國的臂膀，撫摸著民族的胸膛。我們在現地抗戰，在敵人的鐵蹄下奮鬥，覺得我們的工作是那麼切實而具體，一點也不空虛孤獨，真能感到像你所說的『四萬萬五千萬顆祖國同胞抗暴殺敵的

心，都和我們一起在跳躍著」，可是一到西安，回到祖國以後，卻忽然感覺到國家民族距離我們是那麼遙遠。我們真想呼叫：『祖國，你在哪裡？』或者也想問它：『假若你不需要我們，我們何必再為你奮鬥呢？』自然，這些都是內心的獨白。我們既沒有發問的對象，也沒有誰回答我們的問題。我們仍然回來，回到我們現地抗戰的工作崗位上。這一次既不是熱血的衝動，也不是理智的實踐，若勉強分析的話，可以說是為了道義，為了信守，為了對同志對朋友那點人與人間純真的情感。假如一二三〇事件時谷音同志不被捕，我也許主張不再幹了；同樣，假若沒有我們大家在現地繼續工作，我可能就留在後方。老實說，喚起我們參加工作的，是國家、民族等等大題目；支持我們繼續工作的，只是為了守信用、講義氣；換句話說，也就是一點平凡人的小感情。當然這些話，我並沒有跟羅雷談過，不過我相信有些地方他跟我會有同樣的想法。而且在信守、道義、責任上，羅雷的表現又常常比我們強烈，因此我不擔心他會在工作上有任何軟弱的地方。」

聽仲直這一段深長的心語，我不禁興起無限的感懷。我有時也常常沉思，做過自我檢討與批評，但都是自責的結論居多，沒有什麼較好的理由使我自覺寬解與自恕。就這些年來工作的心理歷程來說，我感覺我的動力似乎是一個「群」字。國家民族是個大群，那個大群太大了，有時也像仲直所說的大得空虛與遙遠。但對於覺覺團，對於我們這一個小群，永遠感到緊密切近；我們的理想希望是一致的；我們的憂傷煩惱也是一致的；我們在心理上、感情上，都成為彼此的一部分；你的痛苦快樂就是我的痛苦快樂，你的愛也就是我的愛；我所不能得到的，我願望你能得到，只要你得到了，

就和我自己得到一樣。比這個小群再大一點的群便是現地抗戰組織——負責人所領導的在東北現地從事革命抗敵工作的全體同志。當我到各縣市巡迴作督導工作的時候，對於這個群體，我也有同樣的感受，只是屬於我個人的「私人情感」，我卻不便向他們宣洩。

無論如何，與仲直這次談話，減輕我許多方面內心的負荷，胸中的淤塞似乎滌淨了不少。我們實在應該時常談談，可惜在這種緊張忙碌的工作日子裡，像這種談話的機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雖親密得不分彼此的覺覺團的弟兄們，也聽聞不到彼此心靈深處的呼聲。好在緊接著一個令人興奮的日子來臨，這個日子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緊張更多的忙碌，這些屬於個人感情上的私人苦惱，也就沒有人再提了。

那是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這個日子是偽曆康德十一年，也就是我們要打倒的敵人日本帝國的昭和十九年。從這個年頭開始，世界戰局已顯然於我有利——這當然是指最後的勝利說的，因為聯合國在各戰場上都已掌握了勝利的機運。歐洲方面，盟軍已於上年七月登陸西西里島，推翻了墨索里尼，軸心國三隻腳已被截斷一隻。當年六月，艾森豪威爾將軍以空前的軍事行動登陸諾曼第成功，使希特勒也註定了倒臺的命運。太平洋方面，日本本土真正前衛的塞班島，七月七日完全被美軍佔領，二十一日又在關島登陸。自此日本門戶洞開，美國空軍以塞班島為基地，直接轟炸日本本土並進攻日本近海，使日本本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窮兵黷武的東條尚擬與陸軍死硬派主張遷日皇至「滿洲」，而以其本土從事

焦土戰爭作最後的掙扎。儘管大勢如此，在中國戰場上，敵人仍作瘋狂的進攻，自四月份起於鄭州、於洛陽、於長沙、於衡陽等地加強兵力，展開更激烈而殘酷的戰鬥，終於控制了我平漢、粵漢兩路，用敵人自己的報導，就是所謂要打通「大陸走廊」，以連接通往越緬戰場的運輸系統：因此，對我國抗戰勝利的曙光，加重了天亮前的黑暗。

東北同胞慣常與日本軍部的報導持有相反的感應，當敵人歡呼慶祝的時候，他們就低頭；當敵人垂頭喪氣的時候，他們就暗中歡樂，我們各地的一般同志也是一樣。但在幹部同志中間很少有這些情緒上的波動，尤其是我們覺覺團這一小群，除了本位工作外，沒有人受戰局的演變和敵勢盛衰的影響。可以說真正有些「痛苦的時候也不悲傷，歡樂的時候也不歌唱」的情態。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絲毫不懷疑對最後勝利的信心，我們也都有一個認識：「當東北重返祖國的懷抱時，我們也許已將我們青春之血流乾。」

比我們對時局更缺少表情的，應該是負責人了吧！

負責人曾經說過，抗日戰爭的開始是我國獨力支撐的，過了很久，歷經許多變化，才形成軸心和反軸心兩個集團。現在看起來，聯合國的勝利是比較接近了，但中國戰場如何結束則很難推定。為了獲取徹底的勝利，真正的勝利，我們在東北現地的工作就有非常的意義。為了保證我們東北完整地回歸祖國懷抱，不使敵人再在這塊土上保留任何特權，更不容許第三者對我們家鄉提出什麼條件，我們就要更加緊地工作，加倍的奮鬥。

負責人說：「現階段，在祕密階段的現階段，我們的工作和組織就屢遭打擊頻受破壞，未來，在半公開和公開階段，尤以軍事行動展開後，我們同志的犧牲將更慘重。我們不知誰何時會犧牲，我個人也不一定能夠和你們永久並肩戰鬥。所以你們一定要在能力上加緊鍛鍊，在責任上有特別覺悟，你們要人人能做負責人，人人能獨力奮鬥，一個倒下去，另一個就接替上來，而且永久要記住，只要有我們一位同志存在，東北就一定能夠光復！」

負責人這些囑告，我自認有足夠的了解，所以在各地督導工作時特別加以講述闡揚。為了謙虛與忌諱，我說我們沒有人願意有真正接替負責人的那一天，但我們每一位同志都要有做第四第五……負責人的能力與抱負……誰知有的同志在暗中竟將「第四負責人」送給我做了綽號。

七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我正在鞍山。

鞍山地區的組織是熊火社，由霍炎同志領導。霍同志個性豪爽而粗獷，當時在「昭和製鋼所」任偽職，對工運工作有特殊貢獻，負責人期許至重。經常是由羅雷前來聯絡，這次負責人讓我特地跑一趟。

我到達鞍山是上午十一點鐘，那真是一個好天氣，萬里無雲的蔚藍天空，特別使人心情爽朗，我與霍炎已經一年多沒有見面，相談甚為歡暢。午飯時，他從壁櫥裡取出一瓶酒來，痛快地往飯桌上一擺，桌面上碰出一個清脆的響聲。

「好啊！」我說：「你還有酒？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日本清酒！」

「一點也不錯！朱同志，可以喝罷？」

「當然，酒是英雄膽，為什麼不可以喝！」

「杯酒見性，朱同志，我就贊成你這一點！說英雄，我們不敢講，不過聖人都說飲食男女是人之大欲。為了國家為了工作，我們不扯那個，但偶爾來上兩杯也算不了什麼毛病。」霍炎舉杯邀我同乾後又繼續說道：「可是王同志他就不肯喝，同時也一定勸我不喝，其實……」

「他還是學生脾氣，」我替羅雷解釋：「而且他也無量。」

「不！他就是太堅持原則。他怕我酒後出事。其實現在任何酒都是統制品，花錢也買不著。就是你想喝醉也無處去弄那麼多的酒。」霍炎忽轉話題說：「若是就酒來看，日本鬼子不會長久了。因為我們東北最多的米產是高粱，現在都沒有高粱來做酒，『滿洲樂土』尚且如此，日本三島可想而知，你說他們還有什麼辦法？」

「可是，你有什麼神通弄來日本清酒？」

「不瞞你說，這瓶日本清酒的牌子是白鶴，我就管它叫『白喝』，因為這是我滲透工作的成果。」霍炎揚起他的濃眉得意地說：「在我們製鋼所裡，日本人都說我的協和精神最好，我們工務部的佐藤主任常常要獎賞我。他問我喜歡什麼，我就說酒，因此他不時地送我一瓶酒。你知道日本人的脾氣，他們認為愛喝酒的人心眼直頭腦簡單；他媽的！小鬼就是小鬼，他們用小鬼眼睛看人，把人都看小了。還是心超了不起，他就看得起我，他到所裡來不久，就敢跟我談國家大事。這些年，

我也算對得起他，他雖然被捕受難，我還是照著他的意思幹。他現在情況怎樣？」

「他在裡邊很好，」我告訴他。「現在已經在犯人中升到計算夫的階段，行動比較自由，也可以讀些科學方面的書。據他表示，戰後出獄決心要來製鋼所工作，因為將來這裡也是中國國防工業的重要機構。」

「那是後話，以後再說。朱同志，一個月前我就把破壞昭和製鋼所的計劃呈上去了，到底負責人准不准許我們採取行動？這個製鋼所現在還是敵人的戰力根源，我們等於每天幫助敵人生產武器去攻打我們同胞，細想起來心有未甘。」

「負責人說過，這件工作是件大工作，當然會讓你們去做，只是要選擇合適時機。如果發動太早，會影響整個工作程序和組織安全。」

「你想大約是在什麼時候？」

「這類工作原則上是在半公開階段。那時候，我們不僅在一處做，同時要在多處做：鞍山、撫順、本溪、阜新、以及北票、鶴立等地，我們要一齊發動，讓敵人首尾不得兼顧，使其重工業系統立時癱瘓。」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霍同志有些感慨而又焦躁地說：「朱同志，你不知我用霍炎兩個字做化名，就是表示要燒光他們，我真想早點兒痛痛快快幹一場——」於是他又乾了一大杯。

「別著急！」我說：「這是第幾杯了？我看，剩下那半瓶你慢慢喝吧！當然，這樣喝法對我們

愛喝酒的人，實在不夠意思。不過，我預約下，等勝利後我一定前來和你喝個夠，喝個醉，喝個痛快快……怎樣？」

「君子一言！」霍炎伸出他那粗毛厚皮的大巴掌，把我的手緊緊地又握一次。

飯後，我們到「滿鐵病院」去慰問一位生病的同志。回程的路上，忽聽西南方轟隆轟隆巨響幾聲，震得地動天搖，許多路人都失足跌倒，我們也不自主地緊靠著一棵電線桿子才定下腳步。舉目望去，製鋼所上空，高高昇起數處沖霄的濃黑煙柱。不一會兒，那些黑煙漫天散開，工廠區的一切大小煙囪都看不見了。

霍炎先從驚愕中清醒，氣急地說：「糟了！窯胡盧炸了！誰幹的？」

幾乎是同時，防空警報器發出緊急的哀號，街頭擴音器也反覆播出「敵機來襲！敵機來襲！」的通告，接著便有警憲出動到街頭宣佈戒嚴了。我們不能再走，便轉到附近一棵大樹蔭下去觀望。只見那些走在路上的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幼，一個個恐懼萬分地急急鑽入附近的防空洞壕去躲避，有的人已兩腿癱軟不能再動一步，便就地伏倒在路邊。路上的中國人卻不理會那些，還是這裡一堆那裡一堆地站著交談，原在屋裡的人們也湧到門前來眺望，好像來襲的「敵機」長了眼睛似的，絕不會向他們的頭上投彈。

街頭已轉死寂，陽光無神地照著，熔礦爐那邊又繼續轟隆數次，可是聽不到「敵機」的聲音，也看不見「敵機」的蹤影。但在蔚藍的天空上，像那冬日結了冰的天鵝湖面似的天空上，忽然泛出

一條、二條、五六七八條美麗的銀線，像是有一群仙女正在那裡滑冰似的，前衝、彎曲、迴旋……看不見那輕盈倩影，只遺留那耀眼的劃痕。不久，咚咚咚——的高射砲聲從四面八方升起來，在離那銀線遠遠的半空中，爆出朵朵的白雲……而那些銀線仍在悠然地滑動。

事後我們才知道，那刻劃在天空中的美麗的銀色線條，是中美空軍新式戰略轟炸機，飛行在高空時所曳起的飛行雲。日本的飛機沒有這種性能，日本高射砲也沒有那麼高的射程，所以對「敵機」沒有一絲一毫的驅逐威力和嚇阻作用，反倒成了一陣鼓掌，一種喝采！

四點三十分，戒嚴解除了，我與霍炎同志急返他家，已有一位製鋼所裡的同志先來他家候等，據說有幾位同志不幸受了輕傷，並約略報告一下製鋼所被轟炸的情形，我們聽過後真是又難過又興奮。我們即時決定由霍同志到市內和製鋼所裡通知所有同志迅速藏匿持有的文件，半個月內不做集會活動，但要做蒐集轟炸結果的詳細情報。根據經驗，在這種事件之後，敵偽對整個社會，尤其對鞍山地區，必將加強檢查與戒備一個時期，所以我們的工作也要加強掩護。我自己亦擬於當夜搭車回長，向負責人報告一切。

霍同志去後，天色已經大暗。我坐在霍同志家的樓上，從窗口向市內望去，多數街區都黑暗無光，看來電路尚未修護，製鋼所裡殘餘的幾座熔礦爐，也不像往日那樣耀武揚威地放射毫光。

日本人說熔礦爐的日語發音，鄉下人弄不清楚便循聲會意地把它念成「窯胡盧」，同時也把它當做整個製鋼所的代稱。自從窯胡盧開鍋煉鐵以來，鞍山的滿鐵附屬地，工廠設施地日漸擴大後，附

近的農田相對減少了，農地因之而漲價；同時附近許多鄉村人被這些工廠吸收去「磨洋工」，種田的人工也跟著昂貴了；因此使那些真正務農為本的種田人家感到耕種艱難，生活不易，所以除了民族的、政治的因素外，也都對這個日本鬼子的窯胡盧抱有敵視與反感。他們便不約而同地常常在口頭上叨念：

「窯胡盧炸了！」

我的祖父就是這種人中的一個。我們南城的家距鞍山不足八里，每年全家辛勞的果實，只是白吃飽；房不能多蓋一間，地無法多賺一壠。為了發展家族生計，我父親被派「跑邊外」，到北部泰城「開荒」去了。我因讀書關係被留在祖父身邊。「九一八」那年，我剛剛十一歲。那天晚間，我從夢中驚醒，屋子正在動搖，窗戶紙嘩啦嘩啦直響。我問祖父道：

「什麼事，這麼大響動？」

「窯胡盧炸了！」祖父肯定地說。

「出去看看好嘛？」我有些好奇。

「不要管它，讓它炸去好啦！」

我只好蒙頭睡覺。第二天中午，我放午學回家，祖父正在院子裡餵豬，我急忙將在學堂裡聽到的消息向他轉告。

「爺，」我說：「有人剛打鞍山來，說窯胡盧並沒有炸，可是鬼子已經佔了瀋陽……」

「什麼？你說什麼？」祖父怒目地：「你想當亡國奴嗎？小混帳！」

我被斥責得沒有說出第二句話，可是從此，我們統統當上了「亡國奴」。

這些年來，祖父受了更多鬼子的欺壓，尤其因我出走，又使七十高齡的祖父受了一段日本憲兵隊的監牢所之苦。現在，我由霍同志樓上的後窗就可遙望我老家的方位，這時祖父已經入睡了吧！您是否仍是那樣健康？您是否正因繫念您的孫兒而失眠？當您明天聽到人說窯胡盧畢竟炸了，您總算能吐出一口多年來的怨氣吧！

17

「九一八」的悶氣，一直梗塞在東北同胞的胸中。最初，大家還不知道日本鬼子玩的什麼把戲，只以為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對於炮火總應該還以炮火，可是當時當局卻來個「不抵抗」；各地民眾激於義憤而風起雲湧的義勇軍，終敵不過帝國主義者蓄謀的侵略；國聯調查團只能在書面上不予承認，卻摧毀不了傀儡政權「滿洲國」的建立；於是東北同胞事實上開始了亡國奴的生活。萬般無奈的境況下，人們只能用民謠形態念喜歌的方式，發洩心中的希望和咒詛。

那時遼鞍地區的女孩子們，正好流行穿紅色陰丹士林布褲鑲著白色花邊的服式。於是大家便念道：

「紅褲子、鑲白邊，「滿洲國」、不幾天！」

「滿洲國」旗是採用民初五色旗的顏色而仿用中國國旗的式樣，左上角「青天白日」部分改用紅藍白黑四色橫條，「滿地紅」部分完全改用黃色而成為「滿地黃」了。東北人對做生意倒閉的商店，通稱為「黃舖了」！什麼事計劃未成功也叫「黃啦」！因此，一看到這面「國旗」，便念念有詞道：

「滿洲國旗——黃面大！」

而日本為了便於統治「滿洲」，一開始便迫誘東北同胞學習日語。學校、機關、工廠、社會團體，統統在學。人們一面被迫在學，一面又自我解嘲地說：

「日本話，不用學，再過兩年用不著。」

「學」字土音與「著」字正好押韻，說來頗為順口。

東北各地區各階層的人民，都不約而同地叨念各式各樣的「喜歌」，「滿洲國」卻沒有應聲倒斃，而且不止兩年，一扯就是六年。民國二十六年，「七七」炮火軍興，東北同胞以為打跑日本的日子近了，那知越打越遠，炮火一直落在關內的土地上。太平洋戰爭起了，中國總算有了盟友，而一開始敵軍竟能席捲南洋。這一切一切，都使塞在東北同胞胸中的這口氣，悶上加悶。其後，敵人為了戰爭的持久與消耗，積極開發東北的資源，增修鐵路公路以便利軍經運輸，扒除各縣市的城牆以便擴展市區土地，看到這些景象，人們又在心中湧起那些念頭，把「扒城」諧音地說：

「修路好走！八成要完！」

但戰局越形不利，敵人的搜括越兇，壓制越嚴，東北同胞的生活越形悲慘。

可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中美空軍 B 二九型飛機首次編隊出關，轟炸鞍山、大連，並偵察瀋陽、長春等地，給久被壓迫的東北同胞，帶來無比的興奮，那美麗的飛行雲，把埋藏在人們心底的希望，也愈發沸騰……這一下子，窯胡盧可炸了！中國的炮火真正打回來了！東北同胞所

期望的那個出氣日子總算來了！

這時，東條等所擬還日皇於「滿洲」的計劃，受日本重臣激烈反對，主要理由是說「滿洲」民族意識高昂，安全堪虞，這自然與我們地下工作之活動有莫大的關係。其次是說對蘇「友好」關係，亦無絕對把握。而七月二十九日中美空軍空襲東北，亦有嚇阻作用。

根據此種情況，負責人立時宣佈我東北現地抗敵工作，自即日起進入半公開階段。

按照早經頒布的現地工作大綱所規定半公開階段的工作項目與方法，除了指示各地區潛伏於偽軍偽警中的武裝同志積極籌劃游擊戰備外，更通令全體同志在早期先全力推行不合作運動、怠工減產運動、破壞消耗敵偽公物資材運動，以及鼓勵走私囤積以打擊敵偽經濟統制等運動。這些工作，我們做得普遍，一方面使敵偽各種公務受了制阻，一方面也使敵偽有敗象畢露之態。

組織的線、面更開展，各地區督導聯絡的人次必須更增加，省方機關的辦公處所就更感到不足用、不適用。

國父誕辰前夕，我自哈回長，到日新里報告。事後，負責人說：

「你今天回來正好，明早有一件事，我想還是由你去接頭比較合適。」

「嗯。」我不知是什麼事，只是習慣地靜聽著。

「半公開階段以來，各地工作尚稱平靜，但工作到這個階段，破綻的機會將隨時增多，尤其綜合各區督導報告，大家都認為現在社會上，已由我們對敵心理作戰與政治經濟鬥爭，造成一種反攻

將臨的情勢，那麼敵人不會沒有感覺。另一方面，省方從瀋陽遷來長春，我們雖然應付得乾淨俐落，但敵人一無所得當然不會甘心。鞍山被炸後，只有地區性的緊張，並沒有太平洋戰爭初期那種全面性的檢肅。這，也許是敵人沒有線索採取行動，也許是敵人改變政策，準備一次更殘酷的行動。當然，我們並不在乎這些，只是──」負責人沉吟著。用力在煙盤中熄去那垂滅的煙蒂，然後兩手互相搓揉以禦夜寒的侵襲。又繼續說：「我最擔心的，還是省方內部的辦公和文件的整理。你知道，長春的辦公處所不太理想，文件資料不能隨到隨整理銷燬，組織系統的登記，也沒有全部用藥水祕寫完成。這不僅不利於現階段的應變，也無法迎接公開階段戰鬥。所以我決心從速在瀋陽、長春、哈爾濱等處，多建立幾個掩護家庭，以便辦公。你們覺覺團裡有一個叫方儀的女同志，這次也報名應徵。據伊正報告，這一年多，他與方儀只有工作上的接觸，對她的個性與能否勝任這種工作，還不完全了解。雖然方儀表示得很堅決，伊正的意見希望由你們再與她做最後一次研究。我們三年以前，就有男女同志假扮夫婦設立掩護場所，都扮演得很成功。但對一位未婚女同志來說，是一件大工作，不是小事。她們要假扮一位不相關的男同志的太太，辛苦操作家務，小心應付四鄰及警察來查戶口，還要忍受寂寞單調和物質上的艱苦生活。你們是同學，而且原來是你領導的同志，有些話比較容易談。你要讓她明瞭掩護場所的一切困難及應做的應該注意的事。讓她不要靦腆，一切都說出來，不要拘情面，也不可逞英雄。明早九點鐘的快車你到車站去迎接她，找個適當地方好好談談，她若決心接受這件工作，省方是極需要極歡迎的，就把她帶到明德里暫住幾天。不然就讓她當天返

回瀋陽，考慮一段時間再說。」

「我知道了。」我說。

「即使方儀感到困難，不願擔任這件工作，也不要責備她；告訴她有許多別的工作可以使她充分發揮，叫她不要失望，不要難過。」離開日新里的時候，負責人又諄諄地囑咐著。

第二天午飯前，我把方儀帶到明德里。這給仲直一個十分意外的驚奇。他們緊緊地握手，半晌都說不出話來。

「你怎麼來的？」還是仲直先發問。

「紀剛兄領我來的。」方儀回答。

「怎麼，學校裡又出了事情？」仲直表露了他詢問的真意。

「沒有，」我從旁解釋：「她是應徵來的。」

「我沒有聽你說過——」仲直轉面向我。

「我也是昨天晚間才知道。」

「我以為你們早知道了呢！」方儀緊接過去。「我來以前，伊正對我說你們都在長春，而且會到車站來接，我就想到不是你就是紀剛兄了。」

「唉！」大家坐下後，仲直忽然感嘆地對方儀說：「你怎麼想到應徵到省方來，若是我早知道……」

「你們早早都來了，我怎麼不能來？」方儀以為仲直還在考驗她，所以很嚴正地表示著她意志的堅決。同時也反問一句：「若是你們早知道，你們還反對我來此不成？」

仲直輕輕地苦笑一下。

「仲直不會反對你來，我也不會反對你來。」我說：「不過，若是羅雷在瀋陽遇到你的話，他一定不會讓你上火車。」

「什麼緣故？」

「沒有緣故的緣故！或者說是一點點情緒問題。」

「羅雷的工作情緒不好？」

「他比誰的工作精神都高，只是對覺覺團的同志再有人應徵入省，不太贊成罷了。這個……」我用一句打趣的話說：「也許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吧！」

忽然有一種異味從廚房裡傳出。仲直倏然站起來說：

「糟了，飯燒焦了！」

中午，我也就留在明德里吃午飯。我們把話題扯到學校方面去，方儀談到了學校的人事變化，也說些萬泉園的風物趣聞，聽起來十分親切受用。

方儀是我下兩班的同學。她的左額近耳處有一塊竹葉形的紅跡，用醫學上的術語說，那是該稱做毛細血管瘤的。若在別的女孩子身上，會梳攏一種特殊髮式把那塊小東西遮掩起來，方儀卻不！

記得我們還在學校裡從事學運活動的時候，有一次公演話劇，她與仲直分任男女主角。仲直畢竟不是粗線條的人，他的角色雖也演得很好，方儀卻演得更真摯、深刻而動人。許多觀眾不一定能記得住方儀的名字，但這個一塊紅跡女孩所帶給他們的悲劇感染力量卻久久不能磨滅。

這次午飯，實在欠佳，所以仲直一再責怪我說：

「我不知你們要來，所以沒有準備，其實你應該想到順便在街上買些吃食帶來。當然你算咎由自取，無話可說；方儀第一次吃省方的飯，卻是這種味道，太不夠歡迎的意思！」

自然他不是真責怪我，我也沒有抱怨飲食，當大家因方儀之來而引起往事的回憶時，即使是羅雷在場，也不會挑剔了吧！

明德里是由仲直駐在，但他是客居，真正的房主何同志現在上班去了，中午帶便當在偽職機關食用。方儀來此雖然是暫住，我也囑咐仲直待何同志晚間回來，訂好社會關係，以免使鄰舍生疑。

最後我又向方儀提示說：「從今天起你參加省方的工作，也就是立時和我們一樣變成了「黑人」，沒有事不要到街裡去。我們討論過的工作任務，你可再和仲直研究一次，一個星期內，你還有機會做最後的決定。還有，」我注視一下她額角的紅跡。「你把髮型修正修正，不要給鄰居留下特徵的印讀。」然後便逕赴日新里向負責人覆命去了。

第三天上午，我再到明德里的時候，氣氛完全不同。有女同志光臨的地方，畢竟比純男性的住所清潔得多，規整得多，尤其是廚房裡的炊具，一件件都有了固定位置。洗衣盆裡泡了好幾件襯衫

和一大堆臭襪子，看來都是陳年老山貨了。方儀正在那裡洗濯，看見我來，便把那沖了肥皂半白的衛生衣放下，拭乾了手跟到客廳來。

仲直說：「真不好意思，我說等我把這期《東北公論》趕出，然後由我自己來洗，可是方儀同志偏要搶著作，不單我的，就連何同志的，她也代辦了。」

「這有什麼關係，」方儀不以為然地：「將來要我喬扮家庭主婦，這些工作還不都是我的。我現在正好先練習練習，叫你們看看夠不夠格。不然，你們向負責人作不利於我的報告，我又得打回瀋陽去了！」

「不過省方的同志，不拘男女，都是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我介紹這裡的情形。

「但是就一個『家庭』來講，男人洗衣服，畢竟不合於我們這個社會的習慣！」方儀倒是想得更細微。然後又由嚴肅轉為輕鬆地：「有一件事，我覺得你們似乎為我們學校丟臉，作為堂堂正正小河沿的醫科大學生——」

仲直的臉忽然紅了，方儀沒有再說下去。

「什麼事？」我急欲知曉真象。

仲直面上仍有赧色地說：「她指的是衣服上那些小動物。」

「啊！」我明白了。隨即告訴方儀：「你若是遇到羅雷，他準會訓你一頓。羅雷給那些小動物正式命名為革命蟲，因為那是用革命者的血培育的。按著他的理論，革命精神好的革命蟲必多，革

命蟲多的革命精神必好。若以此為標準，仲直還趕不上我和羅雷，因為我和羅雷經常跑外縣，沒有時間也沒有多少衣服可換洗，而到外縣有時住在小旅館裡，那些地方是蝨子臭蟲的大本營，自己不生也會得來意外之財的。」

「我可不希望有此意外之財！」方儀表示。

「但願你沒有這種福氣。」我說：「你有沒有聽仲直講，襯衫不洗而天天乾淨的理論？」

「早晨剛剛聽過。他說他有兩件襯衫，頭一件穿髒了便掛在牆上，換穿第二件；第二件穿髒了又覺得第一件比較乾淨，所以又換穿第一件；如此週而復始，便天天有乾淨的襯衫。」方儀望望仲直，然後似乎請他原諒似地下個判語說：「我看這完全是謬論！」

仲直只好再付以羞赧的一笑。

「謬論還多著呢！」我代為解嘲地：「從前在瀋陽敦和里時，有位曉峰同志，對游擊戰術很有研究。輪到他燒飯洗碗的那一天，他就是不洗碗。他說他一頓三碗飯，前碗後碗之間，沒有人洗碗的；那麼午飯時的第三碗和晚飯時的第一碗也不過是前碗後碗之別，何必再洗呢？我當時也批判他亂發謬論，他卻說等到游擊戰起，蹲在山邊野地的戰壕裡，誰還有心情洗碗？所以透過這些謬論，你可以對工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謬論雖屬謬論，內中也有大道理……」

「紀剛，」仲直截言：「你別借題發揮了。說到吃飯，我倒想請你今天在此欣賞欣賞方儀的手藝，到底女同志比我們高明。」

我因為有事還要到別的地方和浩然里去，不能留下領略方儀的傑作，所以拿起仲直帶呈社長的文件就走了。不過約定星期六再來，因為上個月房主何同志不知由哪裡弄來些麵粉，他們一直未捨得吃，方儀會包餃子，決定大家犒勞犒勞。在學校裡開班級同樂會時，女同學們都要露這一手，現在我們沒有豐盛的生活必需品來歡迎她，卻先要享受她的特技表演。

週末，我準時前往。

他們正在廚房中擀麵做皮，拌好的肉餡散發著蔥油的香氣。我也顯得輕鬆愉快地打著招呼，然後說：

「方儀，你先自己慢慢做，我要同仲直談點事情，再來幫忙。」

當我與仲直同到客廳坐下後，便忍不住地對他冒出一句：

「大難臨頭了！」

「哪裡又出了破綻？」仲直猜問。

「不，是你個人的。」

「我？快說明白！」

「負責人說，和方儀組織偽家庭的事，那個男主人打算由你來擔當……」沒出我所料，這句話幾乎使他跳起來。

「這怎麼可以！」仲直小聲嚷著。

這怎麼可以？這句話我也曾向負責人說過，但經過一番討論後，我不得不將此意轉達。擔當這份工作當然有困難，雖然不能與死亡任務相比，設身處地替他想一想，不能不說是大難臨頭。

半晌，仲直恢復了冷靜，對我說：

「紀剛，你是不是開玩笑？」

「若開玩笑，我就在廚房裡當著方儀的面前說了。」

「這事萬萬不可！請你向負責人給我回話；」仲直鄭重地：「不然，我要親自跟他去講。」

「若能擺脫，我就替你擺脫了。」

「別的事負責人說啥都可，這件事我要表示意見。」

「負責人當然不是對你下命令，是讓我與你商量。你有意見，不妨先對我說說，不過我想不出你有更好的理由加以拒絕。」

「我想應該由一位生面孔而年事稍長者擔當為佳。昨天方儀和我談起這事，我還把我的猜測告訴她；今天竟弄到我的頭上，實在太尷尬。我們本來很熟而且年紀又輕，無論如何，我不願接受工作以外的考驗。你懂我的意思？」

「我明白！」我說。「我完全同意你的主張，事實上，負責人最初也是這樣安排的。他原來計劃由吉林調來一位同志，不巧那位同志有特殊困難，臨時再調整別人就有許多不便。一方面是人的身分個性合適不合適，組織起來像不像個家庭；一方面組織也不能為此種安排打開太多橫的關係。昨

天曾考慮到把伊正調來，可是他在瀋陽的工作又無人接替，就地取材，在長春只有你了，所以又把這付擔子落在我們覺覺團的弟兄身上。」

「那，為什麼不是你？」

「請你別誤會，我曾用你方才所說的理由給你向外推，卻沒有把這個擔子由我推向你。負責人認為假若你有困難，我就更不合適了。你知道，每個月我有一半時間要跑外城，這些日子讓方儀一個人如何支撐門戶？」

仲直緊閉著嘴，呆在那裡低頭沉思。

「說句私心話，我也感到矛盾。」打破沉默，我也感嘆地說：「這種工作，對我們固然是一種極大的難關，但對於生命、自由，我們都超越了，在這一點上彼此勉勵吧！如果我們常常想起在獄中的谷音同志，也許能獲得更多的安定力量。至於說『生面孔』一點，負責人與你我看法不盡相同。他說『熟人在一起也好，能夠處得來，表現自然』。我想也有道理，與其將她放在一個不相干的環境裡，還不如與自己人在一起，彼此容易照顧。還有一層希望你了解，有些地方，我實在比你更軟弱，你的性格比我安穩堅強得多。所以由你擔任這份工作，對組織來說自然有貢獻，對方儀來說也會使她比較心安。這是我誠心所說的話——」

仲直並沒有答言……

這時的我不能不想到我們在學校裡工作的那段日子。我是一個男生，與一般男學生一樣，對於

女孩子有天生的好感；但發生好感是天性，發展好感是人為；我不能控制發生好感，我必須避免發展好感，以免為情累。我常默記那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說實在的，現在雖然為祖國將生命、愛情、自由三者皆拋棄了，卻沒有此詩作者那份豪氣，拋得痛快淋漓，擲地有聲。我是一步一步咬緊牙關走上來的。我常想：生命愛情自由，為美滿人生的三大要素，可是這三者在如此的時代裡，實在是不易兼得的事。如何選擇都是悲劇。沒有生命，一切無由談起；沒有自由，只有愛情與生命，像動物園裡的籠中鳥檻中獸，那人生有什麼意義？而沒有愛情，雖有生命與自由，那人生也將沒有光采吧！我戀慕愛情，卻因工作而有所戒懼，繼則敬而遠之，終致自我禁絕。仲直則不然。他好像有一種先天的免疫力，對鍾鳴，對方儀，對我們圈內其他的女同志女同學，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有較頻繁的接觸，卻似乎從未發生過所謂男女私情的那種感情，給他以心靈上的困擾，所以我對他說了以上那段私話。

仲直依舊在沉默。

我正考慮應否再向他進言，以促他勉為其難，卻聽廚房中傳來一聲輕快的呼喚：

「餃子煮好啦，等會再談吧！」

我們回到廚房，只見一切都弄得妥妥當當。兩大碗熱氣騰騰的餃子已擺在桌上，醬油香油醋，都已調配好了，還有幾粒剝淨了皮的蒜頭，放在小碟中。剩下的一鍋也正在煮著，那白白的鼓鼓的元寶形的東西，都在翻花的水面上滾動著，撞擊著。我自然要誇獎一句：

「方儀，真有你一手！這都是我們覺覺團的光榮！」

仲直卻說不出勉強的言辭。

「你不舒服嗎？」方儀注意到仲直潛沉的表情。「剛才還是好好的呢？」

「不，沒有什麼！」仲直回答她。「等會兒，紀剛會跟你講。」

吃過餃子，我把內情向方儀重說一遍。我提出掩護場所人選的種種困難，以及總機關當前所面臨的情勢，所以才有這種不得已的決定。只是沒有把仲直所說的工作以外的考驗說出，這些話自然也是不便出口的。

方儀卻有明快的表示。她說：

「這樣更好！跟你們在一起，做得好不好，大家都有個擔待。跟別人裝扮在一起，如裝扮得不像，倒叫人說我方儀沒有工作能力，結果給覺覺團丟臉！」

18

為了組織的需要，為了方儀的願望，仲直沒有再提出異議，於是我們便積極籌設一個「偽家庭」，用為掩護機關。

建立一個「家庭」就必須「申報戶口」，而且要領「配給通帳」。仲直已是通緝有案的人，方儀也剛剛脫離家庭，何況他倆又非真有婚姻關係，自然不能用真名實姓申報。

日本統治滿洲，在社會方面更用戶籍及身分證明為主要控制工具，辦法相當嚴密。所以我們製作假戶籍，說起來也是繁難而冒險的事。我們要我們潛伏在街村公所戶籍課任職的同志，按我們所需的條件，用真的戶籍用紙圖章關防，為我們繕製一份假戶籍謄本。我們用這個謄本到遷移地方去報戶口，依法令規定，設籍單位必須在一週之內用公文向原單位照會，製作假謄本的同志在此期間注意收文，取得此照會時立即再發一件假覆文，然後將此件有關文書底卷統統銷燬。如此一方面是真正有戶有籍，一方是無影無蹤。惟製作此項戶籍時必須注意字跡及指紋，否則使用者發生案件時，就會追究到製作者。

以上可謂是無中生有法。另有所謂移花接木借屍還魂法，也很巧妙有趣。

我為仲直方儀弄好新戶籍，並在東三道街長春戲院後巷中租到一處房舍，於是明德里便準備遷入。明德里的新址和瀋陽大勇里的情況相彷，也是一個大宅第的小跨院，環境非常安寧僻靜。房東住在正院的正房，廂房則分租與另三戶小家庭住用。

「搬家」這天，方儀的表演就滿叫座的。她穿著半新不舊的藍布棉袍，外罩一件黑色毛線衣，頭上包紮一條偽「國防婦人會」規定的防空防火通用的防護頭巾。那頭巾一方為避免風沙吹亂了頭髮，同時也把她那額角上的特徵掩蓋住了。像澄波同志在瀋陽大勇里所常遇到的問題一樣，在這裡方儀立時就遇到了。當我們搬完家具，剩下她一人在院中打掃塵土時，好奇的一位鄰居太太便倚在跨院門傍開腔了。

「我說這位新鄰居，你們貴姓呀？」

「好說，姓唐。」方儀不冷不熱地答。

「幾口人哪？」

「兩口。」

「哪位是唐先生，胖的？瘦的？」

「瘦的。」

「胖的呢？」

「我娘家哥哥。」

「沒有小孩嗎?」鄰居太太又進一步纏問。

「沒有。」

「喲,你們還沒有小孩?」

「我有病啊!」

「那你應該治一治……」鄰居太太倒很善心地。

「謝謝您啦!這年頭生活艱難,配給又不夠用,沒有孩子不是更省事嘛。呀,天氣很冷,風又這麼大……」

講評起來,方儀這一段應答是很得體的。我們的原則就是要不得罪人,也不要引起別人的熱心。方儀進來後,我不免稱讚她一句。卻臊得她滿面緋紅,我這個「娘家哥哥」倒不知如何才出言得體了。

這次搬家是很簡單的,不外是兩張桌子,幾把椅子,加上幾件皮包和行李而已。雖然說是簡單但搬家畢竟是搬家,抬上抬下挪挪擺擺,仲直顯得特別勞累。我知道,他的心靈負擔比這些體力的勞累更沉重。

每次我到明德里,公事辦完不免要閒聊兩句,時間允許就在那裡享受一餐,閒話內容總是很不自覺地涉及到我們學校裡的事和在校時期的生活。其中也有與工作扯上關係的:第一是說谷音近來在獄中更有較大活動的範圍,有時候還被派到撫順炭礦美俘營中去做診療工作。第二是木莎已與捷

夫同志訂婚，而方儀離開學校後，即由捷夫同志負責覺覺團的內外聯絡。第三、校內訛傳心竹被日憲祕密處決並埋葬在東陵義地裡，因此，有的同學和護士們竟偷偷地到義地裡去查找，且在那些無主的新墳上亂放鮮花。這個消息雖然不確實，但也可見吾人之作為仍獲多人的暗中崇念。

不知怎的，一談到這些前塵往事，我們，尤其是我，便感到歡愉興奮，津津有味。

「奇怪！」方儀詫異地問：「紀剛兄，我投奔省方來，是想在工作上極力追求新境界，為什麼你們那樣懷念舊生活？」

我無言自解。

「都是天氣太冷的緣故！」仲直代答道：「談談舊事和喝酒一樣，能使人心肌亢進，血流舒暢，全身溫暖。」

另外方儀也談到宛如，她說宛如更成熟更漂亮了，許多人都在追求她。我本想問問追求她的都是那些人？宛如是什麼態度？可是為了表示我並不關心，故而漠然過去。以後也未再詢問。但是當時仲直似乎很注意我的神色，只是也沒有說什麼。

方儀是善能照顧人的。有時候我實在太累了，便躺在仲直舖位上閉目養息；方儀常常小心地取過毛毯，輕輕地給我蓋上，身體一暖和，也就真的睡著了。

說也奇怪，這一年的冬天特別冷，尤其是我們大家都患慢性營養不良症，體內所生熱量不足，對寒冷更是敏感。在這樣嚴寒的冬天，供應長春市各辦公場所的燃料比食米更形困難。我們所需的

燃料比一般的家庭用量為大，因為我們必須多利用夜晚時間工作。獲得這些燃料，有時須用高價到黑市去買，有時則仰賴各同志家庭的捐獻。當然有的同志家是自己有餘，有的同志家則特別在自己用量內節省；使用這樣的炭火，就像使用同志們的生命血汗一樣地讓人難以忍心。方儀也特別在她廚房工作上減少消耗。社長去的時候，我去的時候，她就把臥房兼辦公室裡的爐火升得旺旺的，不然，這間屋子有太陽的時候，他們就熄火省煤。明德里因是跨院倒是不受風侵，但是很少見到太陽，一進去總是陰涼地有些冰窖的感覺。仲直還算容易忍受，方儀必須弄柴弄水的。所以腳凍了、手裂了、鼻水常流……

明德里如此，其他處也差不多。一晚，我到歐凱同志家出席小組會。他太太是舊式婦女，對她先生的工作是不敢贊成也不敢反對。我們開會時，她便到外屋門前去瞭哨。他們住的也是「官舍」，一家挨一家的，不這樣會有鄰居因閒事闖入就不方便了。屋裡的爐火弱了，他叫他太太去弄煤添火，他太太在屋外又冷又怕的已經有些不耐煩，聽到這話馬上進來說：「明天不夠燒的了！」歐凱說他明天下午可到公家去借領。他太太又說：「早飯就沒法做了！」歐凱同志很不好意思地僵在那裡。我便出面打圓場，說：「屋裡還不算冷，不用加火了。」然後又特別安慰他太太一句：「大嫂，現在大家受點苦，將來就好了。將來大家住高樓大廈，冬天開放暖氣……」我的話還沒說完，她又衝我一句：「將來，將來你們都要住大樓去了！」

住大樓？「住大樓」是東北俗話所說的住監獄。她這樣也弄得我無話可說，只好繼續開會。會

中，在偽司法部印刷所任職的益年同志，報告他正承印一部偽警務總局編纂的機密文書，是日文本，書名《重慶派國民黨、抗日團體對滿之攻勢》。每印一章，益年便可暗中帶出一份。這是一部敵偽警憲系統十餘年來與我地下抗敵組織鬥爭工作的總報導與總檢討。全書凡一百二十萬言，洋洋大篇，嘆為觀止。特稱我為「重慶派國民黨」者，以示與汪逆之「南京派國民黨」有別。敵人雖將「國民黨」與「抗日團體」並舉，但對後者較不重視。近幾年我們的青榆社、血雪團、自強學會等單位發生案件，亦均被列入抗日團體內；看來敵人已被我化整為零的組織方式所愚弄。

敵人統治「滿洲」維持內部治安的重責大任，經常由兩個系統承辦。一是關東軍屬下的日本憲兵隊，他們都是軍人出身，慣用高壓手段和屠殺政策。偽滿初年在遼鞍地區，把認為是反滿抗日的嫌疑分子推入熔礦爐或送入軍犬訓練所餵狼狗的，便是他們的代表作。另一系統便是「滿洲帝國」的警察機構，以警務總局特高科為發號施令中心。這一系統也幾乎全用「日系」人，其少數「滿系」人只供驅使與翻譯工作。他們雖亦兇狠殘暴，但有若干知識分子主持其事，特別講求方法技術，對反滿抗日組織，搜集各類資料，做深入研究並用作其破案之參考。這兩個系統，平時獨立辦案互相爭功，但對重大案件，像對我們的偵查追捕，則聯合會報全面動員。

我曾把《重慶派國民黨、抗日團體對滿之攻勢》全書閱讀。其中記載以安東事件、貞星事件、一二三〇事件、三省黨部事件以及若干零星案件為主要內容。對我們組織記述甚少。可證他們所知不多，因此對我們尚不足構成重大威脅。雖然如此，該書對我們仍有極大價值。因其最後結論說，

這些年來，由重慶派來的許多抗日份子，他們幾乎全部消滅，最「殘念」的——也就是說最遺憾的，他們對我們這一個「組織體系」尚無良好對策，將有功虧一簣的危機，所以今後將以全力來偵破我們。

書中更進一步分析我們這個體系，組織龐大遍及全滿，以就地吸收土生土長的「滿洲青年」為特徵，因而曾檢討日本人本身的責任。他們特別引證了偽「新京法政大學」前身的法學院長筒井太郎為一二三〇事件對被捕同志辯護時所提出的意見。筒井說：「這一群青年罪犯，在九一八時都還是兒童，未受過中國教育，而在接受日滿協和的完全教育後，卻都起來反滿抗日了，為什麼？」他的解釋是：「其一、民族意識是天生的，自然的。中華民族具有悠久歷史，而滿洲建國為期尚短，今天滿洲人有他們固有的民族意識，自屬當然之事，不能認為罪大惡極。其二、滿洲以日滿協和為建國理想，這種協和精神應由日人首先表現。我人皆知滿洲建國最初是基於日本的軍事行動，為一不可否認之事實，建國後，在滿工作之日本人又多以征服者的態度，造成反感與敵視。今天這些青年的罪行，有一部分應由在滿工作的日人負責。其三、民族情感的融合要憑親善與感化，不能用壓制手段以獲得。」最後他更說他以日本人的立場有負天皇，以教育者的立場愧對學生，所以他提出量刑從輕加強感化的意見。

偽「警務總局特高科」方面在偵捕技術上，提出他們的困惑。他們在書中說：「×××以×××、×××為左右手，以滿洲留日學生身分，在東京發起活動，並曾潛赴『支那』內地與重慶取得

聯絡。重歸滿洲後，憑藉社會地理有利條件，以特殊組織方式，滲入我帝國政府各機關團體，使我有患生肘腋，防不勝防之感。」且有「雖遭我一二三〇事件之重大破壞，似未喪其絲毫鬥志，或暫時隱匿，或短期潛逃，今竟死灰復燃，大事蠢動。」最遺憾的是「馬車行李案件，我等偵察月餘，竟不知瀋陽小西關某處為其巢穴，終令其全部脫走。如任其一旦行動，將使我各機關有癱瘓之危機」等。所以他們建議必須「成立專責機構，改變偵察方式」，並且下了警告：「如再失敗，主辦人員即應剖腹以謝皇恩」云云。

且不論敵人在觀念上如何檢討反省，也不管敵人在偵察技術上如何研究改進，有一點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對我們革命風氣的剖析。在總檢討中他們說：「這一系統的工作者，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秉賦與氣質，不畏艱險，無視生死，以民族復興為己任。」「他們既無個人政治欲望，也無崇拜英雄心理，純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抱負。」「他們猶如基督教初期傳教士一樣，個個具有殉道者的精神。誠為可畏可敬的敵人。」

看到這些，使我恍然大悟。我們天天埋頭苦幹，從未有人在此方面檢討自己；或因「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故。現在經敵人一語道破，倒覺其深得我心如遇知音之感了。可惜他們或因立場不同，雖有此認識，卻不能覺悔，因而未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重慶派國民黨、抗日團體對滿之攻勢》一書，敵人列為極機密文書，我們也同樣視為祕密資料，只在省方少數幹部同志中傳閱研讀。看過這本東西後，最使我感到煞風景的，不是重溫蒙難死

亡同志痛苦的記錄，不是驚訝於敵人對我們工作組織探討之深，乃是那某某以某某、某某為左右手那句話。參加工作以來，我從未知曉負責人、書記長和社長的真名實姓；最初是基於組織的祕密，其後被通緝了，大家都三更兩換的，任何名字都成為毫無意義的了。時間久了，三位負責人的代稱已在同志們的心中建立了固定的觀念與人格，若說他們是張王李趙，實在是又生疏又平庸，不順耳也不順眼，一點也不如「負責人」「書記長」「社長」這三個代稱既神祕而又莊嚴。

經過詳細研究後，負責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以前我們知道敵人，敵人也知道我們；而今我們又知道了敵人所知道的我們，同時也知道我們的工作對敵人所發生的效果。現在我們還從敵人的敘述中增強我們工作的信心，須知敵人所怕的，正是我們工作效力的證明，也正是我們對敵人迎頭痛擊之所在。所以我們更要爭取主動爭取時機，加緊奮鬥。」

半公開階段工作的半公開程度，也是次第擴展的。現在，組織已容許某些被通緝同志在某些地區於安全範圍內，可以與家庭或親友覓取聯繫。一為擴大宣傳爭取社會民心，一為勸募資金充實活動經費。因此，我趁又有任務赴瀋陽遼西之便，除代仲直與其父親設法接頭外，我自己也計劃拜訪幾位親友。

在瀋陽為了方儀、仲直之事，我仍受了羅雷一頓悶氣，但錦州之行，卻收穫甚豐。

第一天晚上，由時鑑同志陪同去會見偽「錦州省省長」王瑞華，在偽職身分上，時鑑為其僚屬。王氏於「九一八」時任哈爾濱特區警務處長，曾力主與馬占山將軍聯合抗日，後特區長官張景惠參

加偽組織，彼乃遁入空門，數年後仍被敵偽逼迫出仕。他做偽高官亦有一套原則，即終日念佛毫不過問政事，但發現日系屬下有何誤謬，則即以長官立場大罵不已。本來偽滿最高政務決定於偽國務院之日系總務長官，各省政務決定於日系副省長或總務廳長之手；如若爭權，連傀儡都不得做。但能憑偽職所賦予形式上的威權敢於斥罵日系屬下者，則以王氏為最有名。這一點傳入遼西民眾耳中，大家都很「欽佩」這個「省長」還不給中國人丟臉。王氏獨具慧眼，在省府僚屬中對時鑑特別器重，因此兩個人常常得機做個別談話。一日時鑑問道：「時局已經如此，聽說重慶常常派有人來，省長有什麼意見？」王氏告以如果關係可靠，他願意會會面，負責人對這件工作十分重視，在我們發動軍事行動時，遼西將成為一個重要游擊區，進可以奪取瀋陽，退可以據守熱河。這一地區的工作雖以時鑑為中心，但也特別要借重王氏的號召力。

第二天上午，我單獨去拜訪我讀醫大時一位同班同學。這位同學外號老牧師，在班裡是一個提不起來的人，交遊甚少，和我倒建立些友誼。他像貌平庸，口齒木訥，家境清寒，讀書乃是得教會資助。也許是對宗教信仰虔誠，也許是為維持教會對他的印象，他總是按時守份規規矩矩地去教堂做禮拜，這也就是他得此外號的主因。畢業時留校研究或留院深造都沒有他的份兒，他竟異想天開，跑到錦州來開設眼科專門醫院。論眼科，前曾言及東北有兩大名家，即所謂南高北石。高大夫就是我們眼科主任，詩彥即曾以此理由帶小蓉來瀋就醫。老牧師的專門經驗，也不過最後那年輪替到眼科實習三個月，可是他到錦州後就出了名，凡遼西各縣市眼科患者，不能到瀋陽求醫的，都到錦州

去找他，大家都傳說他是高大夫的大徒弟，因此門庭若市。

據說老牧師看病特別親切細心。一般眼科醫師看病，翻翻眼皮就算了事，進去出來不過五分鐘；老牧師為人診療，先上一次白藥水，十分鐘後再上一次紅藥水，最後再上一次白藥水或藍藥水，前前後後，上藥擦藥，打針敷膏，最低總要一小時。這樣一來，候診室裡經常有許多人坐著，坐候治療的人滿心歡喜，對過路的行人也做了活招牌。我跟他同是一個師傅學藝，眼科哪有這一套？幹嗎要上三道藥水？仔細一想也就明白了。第一道可能是生理食鹽水，目的在清潔患處；第二道不外是紅汞，為的是眼外消毒；第三道才是當時常用的治療劑——硫酸鋅或硫酸銅。想不到老牧師在《聖經》之外也很懂生意經。

眼科醫院位於阜康門外，以前我來錦州時，都是過門不入或繞道而行。這次我專誠去拜訪這位舊日同窗，在做了幾年「黑人」後，大有重赴人世陽間之感。

醫院是臨街的市房。進門後，我先在候診室裡察看一下室內情況和出入路口。這時屋內已坐滿了人，有的蒙著眼罩望天，有的低著腦袋拭淚。老牧師正拿著洗眼壺為一位患者沖洗，抬頭時一眼看出是我來，便道：

「才來，樓上坐，樓上坐！」

語音極其明順，極其自然，極其平和。然後毫不顯示意外地，又按著他的老規矩為下一個病人洗眼去了。

我領會他的用意，也像常來常往的熟人一樣登上樓去，坐在客廳裡候等。十分鐘後，他走上樓來，坐在我的對面，口唇顫動兩手發抖地悄聲問我：

「你剛出關？」他以為我剛由內地回來。

「很久了！」

「心竹呢？」

「還沒有到。」我只好如此回答，並藉機向他詢問：「他以前來過嗎？」

「沒有。」老牧師這時已較鎮靜，回想往事說：「學校鬧事那年，我們都以為你們被捉去了，後來又傳說你們都去了關裡……那時候，特務常常來調查，可能認識你們的地方都是一樣。那時候，我們真怕你們來……可是這一年多，特務已不再來盤問了。我們深夜偷聽重慶廣播，說中央就要反攻的，我們想你們也該回來了。我跟內人常說，說不定我們是最先歡迎你們回來的人，果然，你真來了！」

「你結婚了？」我心中稍有顧慮。

「孩子都快兩個了。」說話時，上來一位護士，他立起身來給我們介紹。「這就是我內人，你們應該還認識。」

認識？當然認識！想不到老牧師的太太竟是宛如的同學。

「這不是紀大夫嗎？」她略顯驚愕地說：「方才我在藥局裡看見一位客人上樓，沒曾想到是你。

紀大夫，我們常常偷偷談起你……你可好？」

大夫！我是應該被稱為大夫的。可是醫學院畢業後，這還是第一次被人稱做大夫。

「我先來陪客人。樓下還有幾位患者，你快下去看看再來。」她又對老牧師吩咐著。

老牧師遲疑一會，說：「好，我去去就來，你們小聲談話！」然後邊走邊回頭地下樓去了。

我們重新落坐，面對這宛如的同學，老牧師的太太，我誠意致歉地說：「希望我這次來，不給你們帶來驚擾。」

「怕什麼？老牧師他怕，我才不怕哩！」確實她比較膽壯。

「你也知道他的外號？」我也故意輕鬆地。

「誰不知道？你們班裡的事，我們都知道……就像您和孟宛如的關係，可是——」她忽然若有餘悸地說：「學校捉你們時候，可把宛如嚇壞了。宛如被傳去問話好幾次，前前後後到她宿舍裡也檢查三回，那些特務們可討厭透了！」

「宛如也一定恨透我了……」我猜測地說。

「那倒沒有。」她確定地說：「當時她只喊冤枉。她向特務說，同時也向大家表白，和你只是同鄉關係，別的一概都不知道。」

「是的，確實如此。」

「可是，事後她告訴我，多虧你想得周到；她說當你臨走時，把你的相片你的信和你給過她的

一切東西都要了回去，當時她很奇怪也很不高興；後來特務抓人，她就完全明白了。她還說，她自己有個小本日記，也在那個時候暗中燒掉了。不然，如被特務搜去，像捉葛大夫沒有捉到，把張大夫瓜連進去，豈不白白送掉一命？所以她向我說的時候，還十分感激你呢！」

「我也聽說這事，我感到很遺憾！」我說。心竹被捕時，張大夫正在安東做事，在心竹的物品中，敵特得去一張照片，正是張大夫結婚時心竹給他做儐相的那張。心竹脫逃，敵人就根據這種關係也將張大夫捕去。張本非同志，毫無心理準備，何能當此大難？所以竟於獄中委屈病死。他雖未殺伯仁，但提及此事，我亦間有愧疚之感。

「宛如最近的消息，你知道嗎？」我想到方儀所說的話，對方儀不便問的問題，很想向她打聽打聽。

「沒有。我們已經一年多沒去瀋陽了。」

「那麼，見著她時不要提到我，她不知道我回來，我也不計劃去找她。」我只好改口如此關照。

「當然，這是生命交關的事，我們對誰也不會說的。」

老牧師上來後，熱誠而堅決地要留我吃午飯，聽我介紹一些現地工作情形，他也願意參加，並且即席起個化名叫「聞道」，取「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意思，以示決心。既然參加工作，我就說明我將介紹另一個人前來聯絡，因為我不便常來，他們也完全同意。

我將錦州之行的結果，完全向伊正交代。依王「省長」意見，彼之言行常受日人監視，彼之立

場亦不便從事組織宣傳等活動，但彼可藉偽職之便，注意錦熱地區偽軍警械彈裝備之儲藏，糧秣之存量，專事企劃發動游擊戰的時機地點，非必要時，不與省方人員接頭，一切均繼由時鑑個人轉達。至於聞道，我們也決定不把他劃歸錦州地區組織，今後只由伊正做單線領導，以備必要時多一個據點，多一個散兵坑，多一處掩護場所。

19

由瀋陽回長春，車行一百二十里，即是瀋北第一個大站——鐵嶺。再繼續前行相仿距離，便是開原、昌圖和四平。由於聞道夫婦的表現，給我增加了到鐵嶺下車的勇氣。下車的目標是拜訪李伯。

鐵嶺縣城正位於龍首山麓，龍首山自然成為地方的名勝和市民郊遊的處所，山尾還有幾處公私墓園。天氣晴朗時，十數里外就可以望見龍首山，旅客們就知道鐵嶺快要到了。當我遙遠望見那浮著白雲的山峰時，立刻就想起數年前所做的一節悼亡歌：

啊！李哥葬身龍首山，
山邊有家園；
父母呼兒兒呼爸，
李嫂慘呼天！

李伯是歌中李哥的父親，歌中李哥就是我那同班同學曾因迷戀宛如致死的李庸。

在李哥悲慘死亡的背面，有一幕淒豔浪漫令人惋惜的故事。知道這故事的只有我一人，李伯逼問的時候，我曾告訴他一點點，而宛如迄今卻一點點也不知道。

我曾放棄宛如割捨詩彥，決心以整個身心獻與工作，可惜我沒有觀音菩薩用五行山鎮壓妖猴的法力；這兩個人的影子常像幽靈似的湧現腦際。我曾祈求上帝幫助我，說：「撒旦，退我後面去吧！」但我稍一軟弱，它們便又來竄擾。聽方儀說，宛如現在更成熟更漂亮了，而且有許多人在追求她，當時不免有酸溜溜的感覺，但自己既已放棄也就不該反對別人追求，何況為宛如計也該早有歸宿。不料據聞道太太談，學校捉人時，宛如曾燒掉一本日記，她為什麼要燒掉？日記裡記載我嗎？記載我什麼呢？又深深地引起我的關心與猜測。假如我此次逕回長春，這一點心靈上的漣漪，自然瞬趨平靜。但我正要到鐵嶺下車，下車去看李哥的父親，記憶之海，豈能不氾濫起往日生活的浪潮！

李庸秉性溫良，風流倜儻，大一的時候即已獲得全班好感，因之本班同學均以李哥稱之。我們之間，初無特殊友誼，似乎是大四大五的時候，我們開始一週兩次或三次到醫院去見習，他發現了宛如又發現了宛如跟我有往來，於是便特別與我親近。時日稍久，他見宛如與我接觸越多，也就對我糾纏越切。

說起李哥對宛如的痴迷暗戀，被二十世紀的人聽來一定譏為是天方夜譚，但多讀浪漫主義或古典主義小說的人，可能對他這份內心的情感有所了解。最初他只是無事也多跑兩次醫院，經中央走廊通過宛如值班的病房，隔著護理辦公室的玻璃窗對她瞭望兩眼。最後也能鼓足勇氣找個機會走進

護理室去同她接談幾句，享受一次禮貌的微笑。這時他還被稱為「李先生」，後來因我的關係，宛如對他有時也叫「李大哥」了，這更使他感到無上的快慰！誰知那一聲聲的李大哥，是不是對他催命的音符！

李哥是很有教養的，並不是登徒子之流。作為「大哥」又不能不保持個端莊身分。譬如他需用紗布口罩本可自己去要，但他怕被宛如瞧不起，硬逼著我代他去索取。戴紗布口罩是我們同學生活特色之一，到解剖室裡戴它可以遮掩佛馬林刺鼻的臭氣，走在路上戴它可以避免襲面的風沙。已經在醫院裡工作的大夫們，均由供應室配發，不虞匱乏，醫學生們則只有輾轉相討。如有人在醫院裡認識護士請求代製，則可向同學們大大誇耀一番。我自然不能老找宛如的麻煩，可是由別處弄來的他偏不要；我想當他戴著宛如親手縫製的口罩，一定有一親芳澤之感吧！

李哥早婚，對李嫂的愛情亦是忠貞不渝。毛病也就出在這裡。他既不肯做對不起李嫂的事，又視宛如為純潔的聖女，不敢妄動邪念，但又不能忘懷於宛如的嬌容笑貌。於是只有折磨自己，煎熬自己。天天夜夜，失眠抽煙，夜夜天天，抽煙失眠。半年過去竟得了肢端末稍血管痙攣症。足趾手指經常僵冷疼痛，重的時候不能走路寫字，只好請假在宿舍裡休養。他哪裡能休養？還不是躺在床上呆思呆想！

「李哥，」我勸勉他說：「我看你老是這個樣子，不是辦法……」

「我又有什麼辦法？」他深深地吸口煙，又重重地吐出去，然後無限感慨地：「我若像你就好

啦！」

「像我！有什麼好？」

「如果我沒結婚，我就可以追她。不然，像你跟她有那種鄉親關係，就那樣不遠不近地維持也好。」

「你就乾脆追她好了！」我又可憐他又嘲弄他地建議。

「追她怎麼辦？」

「成功了，就在瀋陽設個分號。」

「設分號？我能辦那種事？你嫂子答應，我爸爸也不會答應！你不知道我們的家風？」

「我去跟李伯說。」

「他老若聽說這事，會把我一棒子打死！」

李伯是位風骨嶙峋、黑白不苟的人。偽滿成立時，他無力攜眷內遷，乃息影家園義不帝秦。對固有文化與傳統道德亦極為堅守。我知道，李哥說這話，一點也不誇大其辭！於是便說：

「你這樣糟蹋自己，雖未被李伯一棒打死，還不等於是慢性自殺。」

「我一定是前生欠她的，只有自作自受吧！」

李哥確實是自作自受。可是他受得了，我可受不了！那時，我們工作正忙，下課後，我往往不回宿舍就跑到城裡去，或者留在圖書館裡撰寫文件……李哥的心病日重，能上課時還可以自己走到

醫院偷看宛如一眼，請病假時就期望我早回宿舍，好問問我有沒有看到宛如。據笑話說：有人看到饅頭就醉，因為製饅頭原料的麥子可以做酒；有人看見和尚就醉，因為和尚常常吃饅頭。我想，有些日子我已成為李哥眼中的和尚，他若一天看不見我，他就難過萬分。下課以前就爬到我的寢室來等，有時整天躺在我的床位上「養病」。並且亂翻我的書桌衣袋枕下床邊，希望能找到些宛如給我的片紙隻字照片等物，為他療飢止渴。弄得我自己的地方什麼也不能存放，必須把工作上的文件和小冊子送到羅雷和仲直處去保管，傳遞取閱均不方便。這時的李哥，簡直成了我工作上最大的障礙。

大學生活，有的方面是真夠荒唐的。入學不久，大家便在宿舍裡把班上的女同學給「分」了。僧多粥少，不足分配，便幾個人自動協議合分一個，並組成後援會，儼然以護花使者自居或逕自號稱某某禁衛軍。三四年級，開始涉足附屬醫院，爭奪領域擴大，而護士眾多，於是便有「剩餘物資」你尊我讓了。當然也有例外者，譬如聞道就未介入此紅塵之爭，這也是他榮稱「老牧師」的另一原因。像宛如與我有固有社會關係，自然就被劃歸我的勢力範圍。在這方面，大家也有個不成文法，即不經「所有人」許可，不准他人擅打主意。如果有人批評某某不好，則「所有人」或「後援會」必起而護駕。一日，心竹品頭論足地竟說到宛如也有缺點，我倒未接言，李哥卻憤然反對。心竹當即嚴正地質問他：

「李哥，宛如是紀剛的，你憑什麼資格發言？」

宛如是紀剛的？是的！那時候我還不認識詩彥，假如不是為了工作，宛如可能真是我的了。

李哥對宛如的態度，漸漸地心竹也發覺了。但他還不知道李哥對宛如的迷戀之深，也沒有把李哥的失眠和病與宛如連在一起。又一次，我很晚還未回去，心竹來找我，正好李哥也躺在我的床上呆等。可能他們猜想我跟宛如約會去了，也許李哥對他發些什麼牢騷，我一回宿舍，心竹忽然像個仲裁人似地對我說：

「紀剛，你既不專心於宛如，何必又常常把持？」

「什麼意思？」我愕然。

「最近李哥很喜歡宛如，我看你，讓給他算了！」

「我早就讓他了。」我了然地笑著說：「就連設分號都可以。我還保證他，宛如不同意，我向宛如去疏通；李嫂李伯不答應，我可以跑趟鐵嶺去說情。你問他，我夠義氣了吧？」

「那你還有什麼困難？」心竹雖知我這是笑談，但也很鄭重地問他。

「你誤會我了，」李哥像受了刺傷似地對心竹解釋：「你若以為我想據有宛如，那簡直是對宛如侮辱！」

「你們兩個活寶，簡直也是一路貨！一個不真心想要，卻不乾脆丟開，一個愛得發瘋，卻又不想據為己有！」不得要領的心竹，頓時顯得厭煩起來。

說這話時，心竹還沒有參加工作。我所說「讓」是真心，李哥不想「據為己有」，也可算是實意。李哥不想把宛如據為己有，因有事實上的困難，我們都知道。我為什麼能讓，我又為什麼把可

以據為己有的宛如不據為己有，這種內心的矛盾和幕後的力量，他們卻都不知道。

暑假歸來，李哥的心病毫未減輕。我由於千山受訓，接下新任務，新學期的課程又多，因此忙上加忙，就沒有空閒對他多理會。九月份最後的第二個週末，李哥上樓來找我，這個日子我清楚記得。他重重地坐在我的床上，像報告重要消息似地對我說：

「紀剛，我決心開刀了！你看如何？」

「這事要慎重！」我表示疑慮。「外科主任怎樣講？」

「陸主任說，這本是一種心身病，如果精神療法不能改善時，亦可施行腰椎部交感神經節截除術。這種手術的效果，據最近世界的臨床報告都很推崇。他自己的經驗不多，但他做過的幾個病例也都完全成功。所以他說假若我願意，他可以親自給我動手。」

「陸主任知道你的精神狀態嗎？」

「他知道我是神經質，容易得這種病；得這病後，更易因疼痛而失眠造成精神不安，成了惡性循環。陸主任說，假若手術後把疼痛解除，自然就不再失眠焦慮，」李哥很有信心且帶著希望的口吻：「那麼，以後自然不再疼痛了。」

「但，你我都知道，你的精神問題中有宛如，這一點，我們不能欺騙自己。」

「最初倒是那樣，」李哥並不否認地說：「但我最近感覺，那已經不是主要的了……你不要以為我總是思念宛如，現在我確實是疼痛難忍，每夜也是為這個病而焦慮失眠的時候多。因此我想像

陸主任所說，動手術後疼痛解除，失眠好了，對宛如也容易忘掉……」

李哥說時幾乎流下眼淚，而且也有一套自圓其說的理由，我雖不認為適宜，也不便堅持反對，只好建議他再拖一個時期看看情形再說。

「你不知道，」李哥肯定地表示。「要動手術就越早越好，天氣一天比一天冷，腳一天比一天疼，體力再耗下去，將來想動手術也不行了。還有，現在手術，我可以住後樓下第八病房，宛如正好是在那裡上班。下個月她就要調回女醫院去，一調就是半年。我想趁現在住院，每天能看見她精神上比較好些，對手術後的復原也會有幫助……這一點，希望你不要見笑。」

把宛如上班的病房，也列為提前開刀的理由，雖屬可笑，但李哥說得十分誠懇，也怪令人同情的。

「那，你需要得李伯的同意。」我說。因為開刀志願書，一定得由親人簽字。

李哥想邀我次日禮拜天一同回鐵嶺去跟李伯商量，我因為另有約會未便更改，建議由心竹陪行。

「不用了！」李哥顯然失望地說：「上下火車，我自己還可以。我的意思願意你去，因為談到開刀問題，我父親比較尊重你的意見。既然你又有事，那就算了！」

這倒是實話。我不曉得我那一點顯得成熟，有一次李伯確曾對我說過：「你們都是同學，李庸雖然比你還大些，可是我拿你當大人看待！」事後想起來我就內疚不已，假若那次我能陪李哥回家同見李伯，後果可能完全改觀。倒不是李伯「尊重」我的意見，做父母的除非萬不得已都不喜歡讓

兒女開腸破肚，只要我表示一點猶豫顧慮之情，李伯一定不同意他施行手術。可是當時我確是有事，我已與心超約定從遼陽同去鞍山會見霍炎，因心超回長春工大任教，距離太遠，決定由我代為聯絡。

星期二我自遼陽回校，李哥已辦好入院手續，住入後樓下第八病房。我去看他時，宛如趕緊跑過來對我招呼。我拿起身分地向她吩咐說：

「這次李大哥住在你的病房，你要特別照顧！」

宛如含笑答道：「我早知道李大哥是你的好朋友，你不說，我也是一樣！」說得那麼中聽！笑得那麼甜！惹得李哥滿懷喜悅，對手術前途極抱樂觀。

次日，星期三，整日大雨滂沱。午後開刀時，陸主任曾說：「這樣最好，天雨無塵，避免空氣傳染。」手術是在極細心極順利的情況下進行，只是時間過長，足足耗去三個鐘點。我曾幫助麻醉醫師照料麻醉，隨時試探脈搏，測量血壓。我知道麻醉藥比一般手術超過三倍。術後送回病房時，李哥尚未甦醒，因有心竹他們許多同學照料，我也就「偷閒」辦別的事情去了。

第二天情況正常，李哥的精神看來十分愉快。第三天不大對勁，李哥說他「又」失眠了，腳倒很好，可能是腹部刀口疼痛的關係。第四天樣子更不好，李哥說了實話，他說他覺得今生實在無法離開她。第五天，腹部麻痺鼓脹，體溫轉高，時發囈語，有自家中毒、心力衰竭現象。第六天傍晚給李伯打電報，通知「病危」。第七天……

第七天一早，九月三十日，又是星期三。我還未吃早點，宛如打發病房工友老田到宿舍來找我，

叫我「趕快」！我急急跑到第八病房，只見主治醫師木然無語低頭走出去，住院醫師正用大床單把李哥連頭部蓋上，並且對我說：「辦理後事吧！」然後關照站在身旁的護理長準備擔架。我走到床頭，掀開床單一角察看，李哥的眼睛尚未閉嚴。宛如這時正在遠處為一位病患整理床位，我給她一個手勢，她立時奔了過來，一臉惋惜地說：

「我剛剛接班，他們就說李大哥不行了，我想應該先通知你，所以就叫老田——」

「我知道了！」我說。這時我的臉色一定很難看。「去把李大哥自己的衣物取來！」

宛如默默地去了。護理長帶擔架工友來，我請他們暫勿移動，等我給李哥換完衣服再搬。

「照規定，衣服要等到太平間後再換。」護理長以為我不知道。

「都是本校同學，規定變變好嘛！」我說。

宛如由傷患寄物處取來李哥的鞋襪衣褲，我吩咐她幫我給李哥更換上衣，宛如毫無難色地照辦，而且從床頭櫃上取過髮梳為李哥整理整理頭髮，我也用手指將李哥半睜的眼瞼壓攏。我暗暗地祝禱說：

「李哥，在你魂歸天國的日子，有宛如為你理衣整容，你總該瞑目了吧！」

確實的，李哥從此未再睜開眼睛。

在整個經過中，溫順服從的宛如，始終表現著同情與惋惜，她惋惜這個生命的死亡，卻不知這個死亡也算與她有份。

李伯到來的時候，李哥已被送入太平間裡安放停當。李伯檢點李哥的遺物，在衣袋裡書頁裡發現幾張紙片，上面寫的都是寄相思的詩句。有的塗了又寫，寫了又塗，有的突然冒出一句……李伯悲傷中夾著氣惱地把我叫到太平間側的涼亭中。雨後添涼秋風瑟瑟，他用顫抖的手把那些紙片遞給我，問：「這是什麼？」

李哥以前就在無眠之夜寫了很多這些東西拿給我看。我感到太膩煩，便嚇唬他說要送給宛如，他才表示不再寫了。誰知住院不到幾天，他又寫了這麼多。

「紀剛，你該早早告訴我，」李伯痛悔懊喪地說：「暑假在家，我就看出他的精神不對，問他，他說腳痛……我若早知他有這種心病，我哪能同意他開刀？」

李伯老淚縱橫地數說著，我也噙著淚水想起李哥那句話，李哥說，李伯若是知道會把他一棒子打死……

李伯夫婦年老，李嫂又懷孕在身，敏妹靜妹都派不上用場，所有的喪事，都是我們同學分頭辦理的。心竹負責坐火車陪伴李伯先行回家，我則僱乘大板馬車運靈。天快黑的時候才到達龍首山墓地。下葬以前，先把未釘釘子的棺蓋移開，讓家人看看李哥最後一面。李嫂忽然慘叫一聲，抱頭就往棺材裡跳……

學校為李哥開追悼會，我做了一首《弔李哥》的哀歌，與心竹和另幾位同學同到靈臺前祭唱。

唱時聲淚俱下，聽者無不動容。我知道大家的悲痛都是同情與惋惜，可能也間雜一些物傷其類的情緒，如心竹所叨念的——學醫未成身先死，徒使學友淚滿襟！只有我自己的心裡，更是百感交集，錯綜複雜，不可言說。歌詞凡三節，前兩節都是追憶校中生活情狀，詞句已記不清，但這最後一節是敘述下葬時的一幕。當我坐在火車上計劃去訪李伯，遙望著龍首山的時候，往事前塵歷歷如繪，這節歌詞也就字字不移地呈現腦際……

無論如何，李哥的死對於我，曾有如斷情劍般的在我與宛如之間割了一劍！

我們幾個同學為了安慰李伯喪子之慟，請他老把我們當做義子看待，將來對他老的家庭生活，以及小妹們的求學做事，我們都願像「李哥一樣」義負其責，並且都承諾每逢年節或寒暑假期，輪流或一同地去他家裡探望。可是那年底一二三〇事件爆發了，我意識到自身處境的危險，恐怕連累他們，有事就多煩心竹前往，我自己則故意疏遠，諾言自食了。今日趨訪，不知李伯還有沒有誤會？

「紀剛，你真來了！」李伯母坐在炕上驚喜地問。過午的陽光透過大玻璃窗，照得屋裡又溫暖又明亮。

「方才，是你拉的門鈴？」李伯也緊接著追問。

「是的。」

「那你為什麼在街對面站著？我開門沒有看見人……」

「我不瞭解你老這兒的情形，」我解釋著。「站遠一點兒，比較方便。」

「還是你做事仔細，」李伯說：「心竹他就馬馬虎虎，不加這份小心。」

「可是，你看到心竹沒有？」李伯母同時插口。

「心竹來過嗎？」我心中不免激動。其實我是多此一問，二位老人的話，已表示明白。

李伯告訴我，一個月前心竹曾經來過，表示尚在找我。他向李伯說他的工作很好，一切都有辦法，兩三個月後，將會再來。他的「工作」很好？他有什麼「辦法」？這可能是心竹為免去老人家的懷念而設的託詞，我自然也不便把猜想他離群逃亡的困境透露。小敏小靜從隔室躡手躡腳地走進，悄聲喊過：「紀哥！」也坐在遠處傾聽。我們談話時，李伯母忽然行動蹣跚地站起，走到窗前想把窗帘放下。

「你又拉那個東西做啥？」李伯說：「上次我就告訴過你，院子裡不會有外人，大街上還隔著一道門和牆，你倒怕什麼！」

「喲，我又忘了。」李伯母自嘲自解地坐回來，但又不甘心被李伯搶白，便反駁著說：「我怕什麼，我一個老天八地的老太太怕什麼。你不怕，你不怕，前年鬼子來調查，你還不是半個月沒有睡覺！」

「那也不是我怕，」李伯剖白著：「我是替他們憂慮……」

於是我們又談些別後情形，我對這些年與李伯的往還疏遠表示歉意，李伯卻說：「我沒怪你，

我早就想到你一定有特別原因。」李伯母又插口問我結婚否，李伯再次斥責她：「你竟扯閒，人家做工作的那能結婚！」我則回答這沒有規定，全看個人情形……

梳著兩條長辮子的敏妹，看來比較成熟，小靜則充滿孩子氣，不時探問些工作情況。問男同志做什麼，女同志又做些什麼……她們聽得又驚奇又恐懼，我知道她們並不能理解那恐懼的真實意義。

聽說李嫂帶孩子回娘家去了，所以此次未得見面。

我與李伯約定一個月後再來，假若心竹先來時請他給我留下聯絡地址。李伯母在旁忙問：

「那麼，你住在哪裡？」

「你真是好問！」李伯替我做了回答。「連心竹都不知道他的地址，你能問出什麼？」

「他告訴我也沒有關係，我也不去找他。」李伯母很有理由似的。

「這不是廢話！」李伯仍不客氣地批判她。「你既然不去找他，那又何必問他？」

「我就是問問嘛，有什麼了不起！」李伯母深感委屈似地。「你也不想想，紀剛並不是專來看你。」

當我告辭時，李伯叫李伯母從炕氈底下掏出一個紙包，他把那個紙包整個塞給我。並說：

「你一定要今天走，我也不強留。這裡有五百塊錢，你統統帶著，也算是我的一點意思。」

「用不著，李伯，確實用不著！我們什麼也不缺，這些錢還是你老留著過年用吧！」說實在的，聞道的錢我可以代組織收下，李伯的錢我無論如何也不忍心接受。

我拿著那個紙包幾次向回推送，終於惹得李伯光火。

「這錢是我送給國家的，並不是給你的。」李伯訓示著：「你一定要帶去！至於過年，我還另有辦法。你把這錢帶走，我過年才能心安；不然，這個年，我過得絕不會順氣！」

20

回到長春兩週後，我才得機再訪宜民同志。

宜民原是在日本留學時期參加工作的。為人自視頗高，具創業性格，很有社會活動能力，只是太神經質。當我與她接頭一次後，我對她的印象和負責人所做的人物介紹，可謂完全吻合。

據說東京醫專時代，她是一位積極分子，回東北後即逢一二三〇事件，她雖未被捕卻與組織失掉了聯繫，最近才接上了關係。依我看來，宜民這些年以一個獨身女子，聯合二三知己，能在長春創辦一所護校，也算很有成就。

護校校址位於長春郊區，從東大橋過去走半小時的路程即到。過了護校再走半小時，經過幾處稀落的民舍，便與去吉林的公路銜接，也可以說就離開偽都「新京」了。在長春所有市區中，只這一方面沒有敵偽的軍政機關和工業重地，所以敵偽警憲的觸鬚也很少向這方面伸展。學校又是單純的女校，宜民同志連操場上都砌了圍牆，除了由臨街的校門進入校舍外，其他方面閒亂雜人想進也無處通行。這裡很有歐洲修道院的外觀，在校裡做任何事，外界都不易知曉，無怪負責人特別選定要在此處建立一個工作基地。

無論如何，坐在二樓校長辦公室裡跟宜民同志談工作，是件十分愜意的事。這裡自然比不上「錦州省長」王公館那般豪華森嚴，但這裡溫暖明朗安適寬敞，較長春市一般同志家庭中那種侷促狹窄寒冷的感覺舒展得多。我到時正逢下課，宜民同志怕我們的談話受干擾，便先出去料理校務。我站在窗前向校園中瞭望，有許多女學生正在操場上活潑天真地做擲球遊戲，也有三五成群地倚在牆邊或樹下相互論談或晒太陽，即使在冬天，這種情景也會令人興起一種和平無爭、世外桃源的感懷。

「對不起，讓你久等了。」宜民匆匆回來說，然後又急急問道：「負責人有何指示？」

「負責人說，工作是多方面的，任何方面任何一項工作，在總的成績上都是有價值的。這一段時期，你在社會上的成就並不算少，所以負責人特別表示讚許。」我先轉達慰勉，然後問她：「上次我留下的省方公報和其他資料，都看過了？」

「看過了，」宜民說：「每一種我都看過了兩遍。現在這些小冊子可比以前進步得多；裝訂規整，印刷美觀。蘇同志，不怕你見笑，就小冊子來看，我覺得我有點落伍了！」

「人多了人才就多，」我說：「而且熟能生巧，因此很多同志都有你這種感覺。不過各有各的貢獻，不能為此自貶。現在先談你的問題：你說你希望派到這兒與你取聯絡的同志，要社會身分明確，不要有受嫌或被通緝的人員。負責人很尊重這一點。負責人說，目前只由我前來聯絡，這個地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除非我將來離開長春，他不預備派別的同志來，假如要換新人，一定會按著你的意見指派。」

「好！」宜民同志說：「我們希望以後永久由蘇同志前來指導，希望你別離開長春。」

宜民既然很爽快地接受了我，而且也沒有問我有否受嫌，曾否被通緝；我原想解說的，「受嫌同志均有妥善掩護，並不比身分明確的同志不安全」等語，也就不必說了。因為宜民既是神經質，總以不多說為妙。

「其次，」我繼續轉達。「負責人說這個學校環境甚佳，適於做個工作基地，還有特殊用途可以隱密。所以希望你把在學生中開展的工作，保持一個限度。實在好的成熟的可以徵求為同志，一般的就不要吸收。你自己也在社會上少露鋒芒，不引人注意；使這個學校的內外環境越單純越好……」

「我和組織已有幾年間隔，對工作也失去經驗，現在對學生工作，應該如何是好呢？」

「她們還都是女孩子，年輕人多半熱情衝動，距離思想成熟、意志堅定還要一段時間，所以不必急於吸收為同志。只要平常多增進師生感情，使她們對你崇拜敬服，也很重要。能夠做到這樣，任何時候你都能領導她們，甚至她們雖非同志，你仍可以使她們做些祕密的事，她們也不會洩露什麼。目前最主要的，還是要注意她們家庭社會背景，要弄清楚她們之中有沒有被敵人利用的分子。譬如在瀋陽一個學校裡便有個相仿的例子。敵人命令一個學生偽裝愛國分子，在學校裡組織讀書會，也以反滿抗日的思想祕密徵求會員，我們一位同志在那個學校裡就幾乎落入了他們的圈套。」

「敵人也用這個方法？」宜民無限驚訝地。

「是的。」我說：「敵人管這個叫做培養法，比以前常用的釣魚法更為惡毒。敵人用這個辦法

有兩項作用：第一、他們在任何機關學校裡，用此種方法先把有反滿抗日思想的愛國份子，都網羅在他們手裡，必要時他們就可收網捉魚了。進一步，他們還可以用這個方法發現真正抗日組織，然後乘機潛入從事反間破壞。所以對學生工作，必須提高警覺。」

「糟了！糟了！」宜民忽顯緊張的說，一面用手掌拍打她的膝蓋。「我們這裡正有一個這樣的同學，而且我已經把一本《東北公論》給她看過，假如她是一位反間份子豈不糟糕！」

「事情不會那麼湊巧，你先別緊張。」我安慰她說：「那種份子常常有特殊的背景，你若仔細調查，可以辨別出來。那種人以前也許是愛國份子，但因案被捕情節不重而做有條件的釋放，受敵人的威脅而為敵工作；不然就是家庭背景複雜；或因男女關係不檢，交友不慎而受制於人；再不然——」

正說至此，忽聞防空警報急鳴，可能是我空中堡壘又偵察轟炸來了。宜民必須出去帶領全校員生做防護措施，因而談話中斷。一週後我再來接頭時，宜民正焦切地期待著我，似乎她已遇到嚴重的問題。

「蘇同志，」她十分不安地說：「上次我跟你談的那位同學，簡直是個問題人物，她太積極熱情，一心想要參加工作。我感覺她確實是個愛國份子，現在又怕她是給敵人利用。我照你上次所說的原則想勸導她不要急於參加，可是她說她尋找這個機會已經三年，她不能再放棄這個機會；假如我不信任她，她可以切斷一個小指以明心跡。你看，蘇同志，我也弄不清她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請你接見她一次，你們經驗豐富，辨別力強，我是沒有辦法了……」

「這個，嗯，」我說。心想竟有這樣激進的女孩子，也頗受感動。「你把這位同學的詳細情形說說，待我多了解些再作決定。」

「是的，我應該先說清楚，你看我，簡直弄亂了主意。」宜民表示歉意地：「這個學生的年齡比較大，為人做事也比較成熟，所以入學以後便被同學選為級長啦、伙委啦等等。這樣一來她跟我的接觸就比較多，我也很喜歡她，因為她的學品兼優，很有辦事能力，也替學校做了不少事。我們接觸多自然談得多、談得廣、談得深。我發現她思想很好，她對我也什麼都不隱諱。據她說好像她很受她表哥的影響，她表哥就是有工作背景的人，我猜測可能和我們有關係，所以我對她也顯露一些我的立場，她因此也就表示願意跟隨我參加工作。」

「你什麼時候對她表露立場？」

宜民遺憾地說：「時間倒不久，可是我已經說出去了，我沒有方法再把話收回來。她原來的計劃是想畢業後到後方去，我說在現地也可以找到為國家服務的路子，她說若那樣她就可以不走，所以我就約略地告訴她一點——」

「她既然這樣積極，為什麼不由她表哥那邊參加工作？」

「她說她表哥已經走了，走了好幾年了。」

「到哪裡去了？」

「她說可能是去重慶。」

「那麼說，她表哥不會是我們的同志了。」我試做分析：「因為我們不主張同志到內地去，負有任務去的人，不久也會回來，而且若是我們的同志，他會把準同志程度的工作對象向組織介紹，組織不會不加理會。因此，這位同學倒是應該考慮了！」

「據她說，」宜民更審慎地思索著：「好像她表哥認為她年紀輕，思想不成熟，只勸她多讀書多學技能，像我們想說的……並未重視她現在的革命意志。」

「她表哥是做什麼的？」我只有詳細詢問，以便研究。

「據說是學醫的。」宜民稍加回想。又說：「有一次她猜測說她表哥也可能被捕，因為不久她表哥的家就發生了案子——」

我的頭忽然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於是忙問：

「她是什麼地方的人？」

宜民從沙發上起立，走向她的校長辦公桌，一面說：「這個，我要看看學生名冊再說……我記得她的家，好像是泰城……」

聽到此話，我的心忽又像被人揪了一把。我未曾想到，也不敢相信這樣巧合；難道是她嗎？不是她是誰呢？我心裡想：不用看了，一定是泰城，連她的名字我都知道。我真不知我為什麼要問，而且為什麼竟問出這樣的結果！

宜民卻很有所獲地走回來說：「對了，就是泰城！」然後遞給我一本裝訂厚厚的冊子。「你看這裡，三年級的第一個學生，她的名字，她的簡歷，她的家庭概況。你仔細研究研究！」

我本來不必看，不必研究了。但我必須看也必須研究：一方這是我向宜民同志所追索的答案資料，我必須為她看為她研究對策，以解決她所焦慮的問題；一方我也必須為我自己看，以免張冠李戴，胡思亂猜。

我接過學生名冊一看，我的心更加劇跳動，無法安靜下來。「黎詩彥」三個字躍然紙上，閃閃發光。而且不只是三個呆板的文字，更好像一條活的人影如嫦娥奔月似地飛撲到我的眼底，我必須把眼睛緊緊閉起，以避開她的撞擊；但她又像善於爭雄的游泳選手，已經一躍便衝入我的腦海裡掀浪翻騰。不對，也許，也許湊巧同名同姓！我幾乎用上五百磅的壓力來鎮制我的心，睜開我的眼，再詳細審閱其他各項記載。不錯。當然不會錯！她父親的名字職務，她家的住址，以及她家所經營的糧棧寶號，完完全全一樣，無法將她與我所認識的詩彥分開……

我一定是「審閱」了很久，在一段冗長而靜凝的時間裡，我只感到我面紅耳熱，口乾舌燥，頭昏腦脹。至於我想些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可能什麼也未曾想，只是混亂、混亂、混亂……當我不自覺地伸手到茶几上去摸茶杯時，宜民卻捷足先登地拿過去了。

「哦，對不起，茶都冷了，我給你換杯熱的！」

這時我才意識到「對不起！」的應該是我。當我看學生名冊時，宜民一直站在旁邊。我想我的

窘態她可能沒有察覺，因為我是在低頭審閱，她所能看到的只是我那長長了還未剪理的黑髮。想到這裡，我自感稍安。說實在的，這時我所需要的並不是一杯熱茶，而是想大大地吞飲一口冰水！

「有問題嗎？」宜民放下新斟的茶杯，仍在焦慮地問。

我真想回答一句「沒問題，也有問題」。沒問題的是她這位學生，有問題的是我自己。可是我一時說不出來，我只能向她客氣地表示：

「請坐！請坐！讓我們坐下談……」

「蘇同志，我們是自家人，你何必客氣！再說，」宜民十分誠摯地：「我這個校長，就是接見學生時也不一定坐著，而且這個學生的問題弄不清楚，我無論坐立都是不安！」說罷竟真的在沙發後面踱起步來，同時又釘問一句：「你看她，有沒有問題？」

「我看沒有問題。」這是我所能做的回答。

「根據什麼？」

「根據，」我說：「看她這些身世紀錄，家庭環境，都不像是有問題的。」

「這些紀錄都是表面的，」宜民倒更精細起來。「她說她有一個表哥，這裡並沒有記載。而且她有沒有表哥？關於她表哥的那一套，是不是出於她的捏造？我們都無法知道。我們這裡的『身元』調查表，都是由學生自己填寫，她們寫什麼就是什麼。若是在長春就好，我們還可以親自調查，可是她家遠在泰城，那個城裡來的學生只她一人，也無法從側面探問。按著你上次所舉的那個例子來

看，這個同學實在有令人擔心的地方。譬如我越勸她不必急迫她就越急迫，好像是要從我這個線索追查什麼似的。」

這時我才瞭解，我所舉例說明的瀋陽六中劉生的那件事，已給神經質的宜民帶來過多的驚擾；當然我處於她的立場，我也要像她那樣發問的，假若我也多向危險方面思考的話。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解開宜民的焦慮——那便是將我認識詩彥的真相說明，並現身與她相見。但，這是不可以的！第一，宜民最不願意一位受嫌被通緝的同志前來聯絡，假若我把真相挑明，固可將她對詩彥的顧慮解開，但我的身分她知曉後同樣地會給她增加心理的負擔，等於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今後在工作聯絡上將更增加不便。第二，就宜民所陳述的，詩彥對她所講的話也有許多保留。真被宜民猜對了，「表哥」就是編造，而「關於她表哥的那一套」，很明顯地是我與心竹的綜合。那麼現在她對她的「表哥」，在心理上保持什麼關係？她這樣急迫地想要參加工作，到底是受民族大義的號召，還是個人私情上的追蹤？第三，我承認我對詩彥有過一點特別的感情，而且這些年還不時將她想起，但那已是過去的事了。我曾親手將那一點點的感情之火扼熄，同時也將她正式寄託於心竹……我很恐懼我那幾乎是以九牛二虎之力所扼熄的那點情感，是否會因與她相見而死灰復燃？第四，她所謂的「表哥」如若專指心竹，但我現在雖有消息卻不能告知她心竹的確實下落，那該使她多麼失望！所以我不能見她，至少現在不能……如果決定見她，也必須從長考慮。

「蘇同志，你看有問題嗎？」宜民必是看我考慮很久，所以又惴惴焉地坐回沙發上問。因我未

立即作答，她又建議說：「再不然今天你留在這兒午飯，我們再詳細談談。飯後午休時間，我把黎詩彥找來，你對她來個個別談話，由你做一次正面考察。好在她並不認識你，她也無處找你去，我是無論如何也得認了……」

這真是十分尷尬的場面，尷尬得有如《三堂會審》的巡按王金龍。可是那齣戲，在場的人物都猜到內情而又都裝糊塗，所以尷尬中尚有喜劇的成分。今天，宜民一方面代表蘇三陳述身世與經歷，另一方面又身兼藩臬二位大人要審要問；只是她不知曉內情，故而充滿惶恐與疑懼。我則明知內情，卻因不能打開天窗說亮話，無法解除宜民同志的疑懼而深感慚愧，同時也確因這突如其來的刺激，在情緒上造成極大的紛亂。我想，我這時的臉色一定很難看，所幸我的座位背靠著窗，面部全陷在陰影裡，宜民若是注意也會察覺到，但她不知我內心另有文章，她所想的是全是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一再邀請我正面出馬，替她分憂。

「午飯不必了！多商討一會倒是需要。」我說。「不過和這位同學見面，還是下一次好，因為泰城方面我們也有組織，我想先透過當地組織對這位同學做個調查，一星期後就會有確實報告，這樣比較合乎工作原則。我估計一個星期內絕不會發生問題，請你放心好了！」

我這樣說，當然只是緩兵之計。我無需調查，一切結果早在我的心腹中，我只是要等到見過負責人得到指示後再說。因為事態複雜，必須報告。

宜民似乎也覺得沒有逼我立時會見詩彥的理由，但卻堅持留我午飯。她說：「午飯一定得吃。

我們見面後，我還未盡地主之誼。第一次是初見，你又太忙，我未便留你；第二次又趕上空襲；這次無論如何也得賞光！」

「那我就不客氣了！」宜民同志既如此說，我只有爽快地應諾，以減輕其精神的負荷。實際上我這種應諾是很勉強的。現在我已知詩彥就在這裡，我心裡願意見她實際又怕見她，所以在此停留，反覺如坐針氈。

我還是勉力鎮定地與宜民同志研究些其他工作上的問題，尤其是關於安危的問題，我有意為我未來表明身分時留下註腳，特別說明就一個工作聯絡人言，有時被通緝的「黑人」反倒比較安全。同時也為她舉個例證說：

「你看過省方公報上徵求同志參加省方工作的通告了吧！省方經常徵調人員擔任特別工作，要他們擺脫家庭，辭離偽職，自動地做個黑人，就是基於這個道理。」

「噢！」宜民忽有領悟地說：「這個我完全未曾想到，真如俗語所說：站一站二里半！看來在工作上，我真是落伍多了！」

「大家都是一樣，我們都是　總理所說行而後能知的人，工作上的智慧是全體經驗的累積，不遇到實際問題，誰也不易想通。」我因要多了解，所以又把話題轉回詩彥身上。「方才我們研究過的那位黎同學，你說她的思想很受她表哥的影響，假若她的背景沒有問題，那麼她的工作動機是否基於私人感情？」

「這一點我還未做深入地考察。按照一般情形，一個女孩子對於她所崇拜的人，感情的成分不會沒有一點的。」

「若是這樣，今後你仍要特別注意。你知道，我們不希望吸收一位思想不成熟、動機不純潔的人，參加工作。」

「這個同學倒不像那些鬧戀愛的一般青年。她這個人，很有理智，個性極強，她要參加工作也是由於她自己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她曾經表示她只是要工作，並不是要透過組織尋找她的表哥；而且她更表示過，她希望能在再見她表哥以前有一番工作表現。她似乎是要證明，證明她表哥對她的觀察是錯誤的。假若她的心裡有感情的成分，她也是要贏取而不是乞求。所以只要你能查明她的背景，證明她不是作反間工作的，我就敢保證在這方面我的觀察正確。你還沒有見過她，下次你接見她，一定會同意我的話。這樣的女孩子，毫無疑問地可成為一個優秀的同志。」在工作上，宜民似乎因稍感隔閡而處處謙虛，談到一般問題，她便立時顯出她的見地與自信。

「但願如此，」我說：「我回去後，即速給你查明。」

我還能說什麼？宜民對詩彥所做的分析，在我聽來，完全是代她控訴！宜民以為我沒有見過詩彥，這時我真想我從未見過她，不然，我現在也少受此穿心的暗箭，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我不知曉小飯廳是在樓下一端，出門左拐通過一小段走廊便是操場。宜民像款待佳賓似的邀請主持教務和訓導的兩位同志陪我一同進餐。學生們在運動場上遊戲，喧鬧聲音不時傳進飯廳裡。我

等於是提心吊膽地在吃這餐飯。剛剛用到一半，有二位女生慌慌張張地跑進來，我一看便趕緊將頭轉向內面，放下筷子取出手帕，掩著露在外面的半邊臉，像要打噴嚏的樣子……真是冤家路窄，那為首的同學正是詩彥。她還是那個樣子，紅紅的臉，勇邁而堅定的神情……雖屬驚鴻一瞥，印象卻十分鮮明。她是否也看見我，我不敢猜測；我想她未曾想到，所以不會注意，因此雖看見一位客人也就認不出是我。我只聽宜民說：「你們快回去，我就來！」好像詩彥向她報告什麼同學打架或意外跌傷一類事情。她們走後，宜民向我客氣一句，便偕同訓導同志一起出去。我的心仍怦然跳個不停，頭腦脹脹地……也向教務同志道個歉，諉稱胃口不適，不再吃了。教務同志還誠懇而讚嘆地說：「你們太累了，先請樓上休息吧！」

回到樓上，我立時走到窗口向操場探望，果然宜民和訓導同志被一群學生圍繞在中間，不知在講些什麼。詩彥卻退到一丈開外的一株大樹下，對著校長室這邊的樓窗瞻矚。當我第一眼看到她這樣時，就像觸了電而自動縮回的手臂似的，趕緊退離窗口躲到壁影裡去……稍停，我才察覺我這種恐懼是多餘的。當時日正當頂，陽光映在校長室的玻璃窗上，由對面地下向這邊遙望，必見玻璃一片反光，並不能看到室內什麼。於是我再大膽地佇立窗口去看她，看她……小時候聽祖父說過，人死七天後，閻王爺開恩，准許鬼魂回家探親，但進不了房門，只能站在煙囪頂上觀看，又說那煙囪就叫望鄉臺。那時我常常對著我家的煙囪發呆，我想我死了也不回到這望鄉臺來，我若想念我的親人，我就要走進房中和他們在一起歡樂或悲痛，我不顧只站在煙囪頂上乾看著他們而不能互通款曲。

因此對天齊廟裡那位藍臉怒目的閻王更增惡感，我覺得閻王的那點仁慈是更殘酷的表現……

現在，上蒼竟開我這樣的玩笑！讓我站在校長室的窗口，像一個望鄉臺上的鬼魂似地遙望著詩彥。我站在陰影中，她立在陽光下，同一個地球，同一個校園……咫尺天涯、幽明兩界……

我何以堪！

詩彥一會兒抬頭一會兒俯首，忽又左顧右盼地在窺測什麼。難道她已在飯廳中認出了我？或者她看出我有點像她表哥？她能不能追問宜民：「校長，你的客人是誰？」

詩彥，你在想些什麼？你要表現什麼？你要證明什麼？你又要贏取什麼？你呀，你，假如宜民校長對你的分析正確，那你就錯了！我所以擺脫你，只是我的懦弱，懦弱得怕傷害你；我這私衷如何能向你訴說明白而獲得你的諒解？

我木然地站在窗口，像那從所多瑪城逃出，但不聽天使警告，因眷戀回顧而化成的鹽柱；又像宜民辦公桌上所陳列的那尊醫學始祖——希波克拉第的石膏塑像一樣，直挺挺地在那裡僵立。

21

方儀買菜去了。

仲直在趕製五月份的《省方公報》。

我躺在仲直的舖位上想求一段小憩而不可得。數週來，我一直被詩彥的出現而困擾著。雖然在處理她的問題上我仍能堅守原則，但在下意識裡一個被搗毀的夢境常常自動地連綴。我又兩次前往宜民護校，我必須謹慎而迅速地通過走廊，以免再被詩彥撞見。我曾轉告宜民根據「調查結果」不必再懷疑詩彥的背景，並准許她經過一段訓練後可以參加工作，宜民如釋重負，表示不必再加訓練立即將她納入組織。

我忽然懊悔，詩彥既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我們這一條路，我又何必再矯情地拒絕見她？我何不與詩彥也建立一個辦公場所，像仲直與方儀一樣。我太疲勞了，我需要一點休息；我太緊張了，我需要一點鬆弛。我何必強作聖者？我何必徒事苦修？假若我與詩彥在一起，至少可比仲直減少一份困難。我以前的想法正確嗎？我把自己掛在超人的地位，我要為我所喜愛的肩負生前與死後的責任，我祝福我所喜愛的人能享永恆的幸福，我這樣做能達到我的心願嗎？什麼才是詩彥永恆的幸福呢？

唉！什麼什麼呢？我感到無限的迷惘與徬徨！

「紀剛，你不舒服？」仲直忽然詢問，打斷我的紛亂思想。

「沒有，」我說：「沒有什麼！」

「我已經注意到，紀剛，你在床上不斷地翻來覆去，若不是身體有病，便是遇到難題，可否告訴我？」

「我遇到詩彥！」我說。直接了當地，因我不能再自禁。

「什麼人？」

「就是心竹出事那天，到醫院裡找他的那個女孩子；宛如曾經告訴你說她回長春了，那位就是詩彥。」

「那兩個字？是思前想後的思，還是藕斷絲連的絲？」

「《千家詩》的詩，文彥博的彥。」我不禁苦笑。

「從那以後你未曾談過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使你精神受此干擾？」仲直帶著迷惑的關切說：「你還是詳細說說，有些事說出來比悶在肚子裡好些！」

於是我把我、詩彥，和心竹三個人的前後關係述說一番。談詩彥就要提及宛如。我對仲直述說得很詳細，但我仍有保留，保留我對詩彥在心靈深處那一點似是而非似有還無的感情，保留我與詩彥之間雖屬清白而又不便公開的一、二次接觸。並非我對朋友不忠，我已向詩彥和心竹作過明確的

交代，我又何必將那已經掩埋了的再行掘露！

我所敘述的在仲直看來是十分簡單的事。所以他說：

「那麼，你是由於詩彥的出現又聯想到宛如了。難道上次方儀說到有人追求宛如的消息，仍在使你不安？據我所知，在學校時你與宛如相處那些年，雖然有許多同學說你們的閒話，可是我曉得你並不是放不開她，事實上你已經放開了，像你在《火舌集》中所表明的一樣。所以我想，宛如在今天不應該對你有多大的影響……」

我只有再示以苦笑，因我不能再多解釋。無怪他剛才說出「思前想後，藕斷絲連」的話……但他最後的結論也極正確。

「當然，」仲直又說：「感情的事，我沒有體驗，我也不能對你今天的感受妄加論斷。不過既已發現詩彥，就該儘速再去鐵嶺一次，如果能找到心竹，可以請他們建立一個掩護場所，或者把明德里的任務轉移給他們，我跟方儀這臺戲也好早日收場。」

「對的！」我對仲直說：「你的意見是對的。但你們明德里的任務倒不必等待向心竹移交，因為負責人已經表示，由於戰局的演變，公開階段的時機可能提前，所以他考慮在本年「七七」抗戰紀念日要做幾件大的行動工作，以便醞釀情勢，造成風潮。他叫我最近再出去走一大圈，分別研究幾個問題，更要召集駐外地的督導人員回省，由他親自做些特別指示。所以，你們這個苦難的日子，也許不會太久了。」

「但願如此！不過，無論如何，你還是趕快去找心竹，真不知這兩年的逃亡生活他是如何度過的！」

仲直這番感嘆和建議，給我一個新的啟示，使我豁然開朗。我很慚愧，我竟有適才那一度非分的聯想。我應該繼續走我自己應走的路，對於詩彥，我應該實踐我最初為她所做的安排。

算來鐵嶺歸來已將兩月，心竹可能已到李伯家把他的地址留下。說找就找，我想立即前往日新里報告行程。

方儀回來時正巧我就要走，使她深感奇怪，她原意以為我能在此午餐，所以特別給我帶來一份我所喜吃的醬菜；我說為了「工作」必須爭取時間，有違她的雅意，她也只好諒解。但她無法了解我所以要急急離去的另一理由，還是為了羞於見她的面。一意識到方才我對詩彥所做的聯想，我就感到不配再在明德里多呆一會兒。

「真不巧，」李伯說：「昨晚心竹才由這兒離開，你若昨天來，你們就碰頭了。我真不明白，你們的祕密未免太過火，連自己人都找不到自己人！」

「心竹昨天來的？」我問。

「他已經來了一個禮拜，每天都盼望你來，昨天我還勸他再多住兩宿，可是他說他自己那邊的工作不能離開太久，誰知他一走你就來了。唉！」李伯很替我們遺憾的樣子。

「他留下地址？」

以。」「他沒有明說，他只告訴我向你說一句話，你就明白了。我要他寫下來，他說口頭轉告就可

「什麼話？」

「心竹說他住在一個僻靜平安的地方。只要你到那僻靜平安的地方去找，就會找到他。」李伯小心謹慎地學說，恐怕說錯了。然後笑著評論道：「心竹這孩子倒很幽默，他不住在僻靜平安的地方，難道要住在公開危險的地方？」言下頗似不以心竹如此為然，大有怪他故弄玄虛之感。

我對心竹的話加以尋思。

「你猜到沒有？」李伯很關心地問：「心竹說，我對你一說你就知道的。」

「我，我知，我知道！」說完此話，我才比較確定。

「無怪你們是同志，昨夜我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他到底住在什麼地方。我還以為他住在深山古廟裡呢！」李伯感嘆而安心地說。

李伯母說心竹在此住了一個禮拜，我至少也要住三天，她老好給我做點吃的喝的。她說：「你們做工作，一定很熬苦！」我計算火車的時間，當晚也只好住在李伯家。

原來心竹所暗示的地址，我想一定是心超的未婚妻嚴姐處，嚴姐的芳名就是靜安二字。我和心竹由學校分手時，他曾告訴我，說嚴姐已經由遼陽轉職到瀋陽盲啞學校。因她原來任職的地方，總有些人關心她，要她另作打算，不要死等心超；她為避免心煩，所以轉到這看不見的人多、會說話

的人少的地方。心竹出事時，我也曾託一位同志以社會關係身分前往探詢，也許那時心竹還沒有與嚴姐取得聯絡，也許嚴姐對那位同志的立場不敢相信，所以表示不知道。這不能怪她，那些日子一定有特務常去調查。

瀋陽盲啞學校是建築在小河沿南一座密林裡，一般社會人士很少到那個地方去，算得上是安靜幽僻，但心竹不會住在那裡，可是嚴姐見到我，會告知我他的真實下落。只不過那個地方和我們的大學醫院同在一區，我要去也必待第二天夜晚，比較方便。

這一晚，李伯母再搬到兩個小妹那屋去安息，我則與李伯同住。臨睡之前，李伯懇切地對我說：「紀剛，我現在年紀大了，可是我報效國家的心並不減當年，我自然不能拋下這個家和你們一樣去各處奔波……李庸死得太早，不然他也可參加工作，替我出出這口被鬼子壓迫多年的怨氣。唉！李庸這個冤家，他真不中用，同樣是個死，死得太窩囊……」

老人說到這裡，似乎重汎一次當年的悲痛，屏息良久。我想加以勸慰，卻無適當言語，只有陪同沉默。

「現在，我想，」李伯寧靜一會又說：「我總該還有點用處！你替我想想，我在鐵嶺守家在地的，能替你們做點什麼？」

「你老有這份意思也就夠了，其實不必再做什麼。上次我把你老的錢帶回去時，就跟我們負責任的人談過，我們都因你老的處境而深為感動，實在不願接受你老再多的貢獻。假若你老贊成，我

們倒希望把你老這裡當做一個掩護場所，必要時送些東西在這裡保存，或者有什麼人到這裡隱居幾天。做這種貢獻，並不需要你老到社會上去活動，一切和從前一樣，越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就更安全隱密。」

「這沒問題！」李伯毫無難色地應諾：「這樣的工作對我是太容易了。回頭我們要訂好暗號，不然，怕弄錯對象。」

「那是當然的！」我說。

「另外，我還有一點私人心願，想和你先談談。心竹住在這裡時，本想直接跟他說，但我總不好意思開口。昨晚他走後，你伯母還在抱怨我。今天你來正好！記得李庸死後，你們大家都表示要和李庸一樣的對待我，當然，我不敢當也不敢侈求。我只想在你們中間——」李伯語聲微頓，似乎在想一個合適的詞句。「我的意思是，」他說：「把小敏或小靜給你們那一個，那樣我也可以有個託靠。這些天我觀察心竹，他是個平實穩妥的人，我很喜歡他，我很願把兩個小妹給他一個。你見著他時替我把話說明，他喜歡小敏就小敏，喜歡小靜就小靜，這兩個孩子對心竹的印象都不錯。假若他現在工作上有需要，他就可先帶出去，那樣我也算真正出一個人參加工作了。你看怎樣？」

「等我見著心竹，我一定替你老說。」

我能說什麼呢！我有一肚子內幕，現在沒有一件可以說出來。只是我更因此體驗到，心竹有一種令人可以信賴、可以依靠的氣質，關於女孩子的終身大事，都想向他身上寄託。

第二天夜晚，我由嚴姐處得知心竹是在北安附近一個大牧場裡牧羊，並告訴我去找他時的聯絡信號，不然那牧場的錢當家的不會承認有心竹這個人。嚴姐說心竹在牧場裡已學會了很好的騎術，不備馬鞍就可奔馳二十里，想來心竹真不知變成個什麼樣子。我因不能即時前往北安，即請嚴姐轉知心竹，月內不可外出，以免我去時再撲個空。

在瀋辦事三天才回長春，然後再去哈爾濱。在哈又盤桓了兩星期，五月中旬到達北安。北安現為濱北齊北及北黑線三條鐵路中心，也是偽滿新劃北安省省會所在地，又瀕臨半國境地帶，地理形勢十分重要，政治氣候更形森嚴。我很擔心心竹怎能在這個地區隱藏一年有半？我等下鄉見到心竹後，才了解其中道理。

據心竹說，他逃到這裡來避難的頭半年是相當困苦，他是經人介紹偽稱腦病需要單純環境和清新空氣來療養的。所以錢當家的就把一個羊群交給他，說：「和牛羊在一起，最少惹人間的閒氣！」後來他才知錢當家的當年也是馬將軍麾下的一名連長，與尚勇相識，義勇軍解散後，他就率領弟兄們插槍務農，牧畜墾荒。這一帶的居民很多如此，平時大家都不提那一段，遇事可都有個關照，在北安市內開大同客棧的趙掌櫃的就是他們的聯絡站。大家原是馬上馬下的，到時候一拉就起來！

心竹跟錢當家的打通關係後，錢當家的如獲至寶，興奮異常。錢認為心竹是外鄉人，不便在當地活動，仍請他繼續牧羊以免暴露身分。當地一切均由他自己出面，只要心竹負責與省方接頭，並鼓勵他練習騎術，因為將來拉起隊伍來，一定要有馬上工夫。心竹覺得這部分人馬很重要，所以才

積極找我，尋求聯絡。

錢當家的對於我們當晚就起身南返而不能痛痛快快地促膝夜談，很感遺憾，但他也急需具體的工作指示，未加強留。為避免敵人的眼線或意想不到的檢查，我與心竹乃裝做互不相識分別登車，所以一路上總共十六個小時，並未得機再談什麼。

五月十八日上午抵達長春，心竹先到小旅館去休息，我則逕赴日新里報告，恰巧公謀同志正在請示工作。公謀同志現於偽陸軍軍官學校任教官，他的學生遍佈偽軍中，均已擔任中級幹部，其中多人且亦加入組織。負責人認為心竹在北安牧場所開展的民間潛伏武裝同志，正是將來發動游擊戰的工作基礎，因而極為讚賞亦至表重視，隨即指定由公謀同志將心竹帶至合適場所詳細研究後，囑其即返北安，並介紹其與北安地區之偽軍同志接頭，以便互相聯繫，積極部署。

當我回到旅館，轉達了負責人的決定，在等候公謀來接心竹的時間，我覺得必須趁機把某些話說明：

「心竹，有兩句私話，我想跟你談談。這次我到鐵嶺時，李伯向我表示，他有心把小妹給你一個，叫我問問你的意見……」

「這個時候，你有心說笑話？」心竹笑著反問。

「不是笑話，是真的。這是李伯誠意相託！我答應過，所以見著你，一定要問問，李家的事不談，談談詩彥如何？」

「這個時候，談她做啥？」

「假如有辦法，你願意不願意和她取個聯絡？」

「這個時候，你怎麼竟談這個！」

短短的幾句話，心竹一連說了三次「這個時候」。我知道這個時候是不宜於談論這類事，可是「這個時候」我若不談，等他再回北安後，我們又不易見面談了。當然，我更知道這個時候心竹馬不停蹄的心情，我只是不知他對詩彥的態度，其實他對詩彥的態度，我是不該再過問的。可是這個時候，我必須知道一點心竹對詩彥的態度，不然，我與詩彥見面時，如何向她交代？

一般說來，這個時候凡有心竹相同遭遇的同志，不是積極就是消極。一個消極的工作者，常常會向感情方面逃避，假如他是如此，我也是十分同情的。但心竹卻走向積極方面，一點不往感情方面想，使我對詩彥的事，無法和他再談。心竹並沒有聽到我那有關第四第五負責人的言論，可是他已經做了第四第五負責人的工作……

這時候，歐洲戰局已經結束。五月一日聯軍攻入柏林，德方宣佈希特勒已死，七日繼任元首鄧尼茲派代表簽降，八日為歐洲勝利日。太平洋戰場，日軍亦節節敗退，二月美軍光復馬尼拉，三月攻佔硫磺島，進而更大規模轟炸日本本土各大城市，東京建築物，半化灰燼。日本自殺飛機所謂神風特攻隊，雖曾一度揚威，但至五月狂燄漸熄，制空制海權已完全落入美軍手中。同時蘇俄又宣佈廢棄日蘇中立條約，英軍亦參加太平洋戰場。大局變化在即，我們就更加緊籌備軍事動員。

大約心竹回北安的第四天，也就是五月二十二日清晨，我自祕密通訊處取來一封伊正寄來的快信。塗上顯像劑一看，上面有一則重要情報，立即前去送給負責人。

負責人看過伊正的信後，沉思半晌，說：

「這部分的工作以前是你熟悉的，你先把這些人的關係說說。」

「信裡所說的捷夫是現在覺覺團的連絡人，」我小心地報告著：「方儀來省後就由他和伊正接頭。木菸是捷夫的未婚妻，他們訂婚剛剛半年，現在因捷夫的關係也已是準同志。這位木菸我也認識，她跟鍾鳴原是好朋友，不過那時她不知我們有工作背景。鍾鳴與焦特務結婚，木菸是很反對的，所以她們中間已經很久沒有來往。」

「嗯！」負責人彈彈他的煙灰。

「信上說，十幾天前，焦特務回家對鍾鳴講日本憲兵隊首腦份子最近常來長春開會，並得知要有一次大檢舉，範圍比一二三〇事件還要大，只是得不到詳細情報，不然也可暗中幫幫朋友等等。鍾鳴以前對我說過無論什麼時候她都會愛護組織，必要時也會有些貢獻；所以她得到這個情報便特別拜訪一次木菸。她或想木菸仍在學校圈裡，總可找到關係通知我們。木菸轉告捷夫，捷夫再報告伊正，總算起來，這消息還是來遲了些。」

「你對這個情報有什麼意見？」

「關於情報本身，我不能判斷；但這個消息傳達過程，我想是沒有問題。我對鍾鳴有信心，木

莎的關係也很可靠。」

負責人沒有再追問，只靜坐在那裡嚴肅地沉思，猛猛地吸煙，重重地彈灰。足足過了一刻鐘才說：

「這是一個重大消息，需要比省方遷長那次的應變情勢，更要重視。我們知道，現在美軍戰略是直取日本本土，日本在敗亡前夕為圖最後掙扎，未始不再考慮遷日皇於滿洲或朝鮮。至少關東軍要在滿洲做鞏固治安的準備。《重慶派國民黨、抗日團體對滿之攻勢》書中寫得明白，他們要憲警聯合設置專案機構，改變方法，全力對付我們，我想就是與此一準備有關。他們此次檢舉，自然規模要大，可惜我們不知敵人已掌握什麼線索，好使我們想個具體對策應付。」

「現在我們工作正在緊急關頭，實在不能稍有停頓。」負責人又說：「也許正因為同志們對工作太積極而忽略了掩護，現在我們組織太龐大，同志人數太多，欲求保衛周全，不是容易的事。加上最近我們幾次燒倉庫、炸煤礦、破壞工廠等行動工作，不免留下些線索。看此次敵勢來頭很大，也許他們發現的線索不只一方一處。不過正因為我們組織龐大人數眾多，我有信心，我們總有辦法繼續奮鬥下去。我決定：第一、你即去找長春偽職較高的警界同志，打探消息。其次，通知社長、仲直和在此地的督導員，大家仔細想想那一同志那一機關那一地方有被敵人注意的情況，明天開個會共同研究研究。第三、後天或明晚你趕去瀋陽找鍾鳴探聽具體一點的消息。你一個人跑不過來，找仲直或惟亮一同去跑。」

「長春的辦公場所太不方便，想開個會，沒有一處可容五六個人以上參加。我原想省方再遷回瀋陽，可是一時未能辦到。這麼大的事情，有書記長在這兒更好一點！」

人常在危險中，對危險的真實性容易失卻感覺，正和置身在戰場上的士兵聽不到砲聲一樣。年來反映到省方的情報，大大小小不斷，負責人都沒有像這次如此注意；這次負責人雖然重視，我卻沒有在瀋陽那夜離開至善里時的那種沉重感覺。自從丟行李事件以後，我常常鞭策自己：「不要怕！不要怕！」我自然沒有怕的意思，但我必須不表現甚至不感覺任何與怕有關的言行。我要學書記長那樣一副勇者漠視一切的氣度，給人以安定，給人以信心。提到書記長，另一種慚愧油然而生，在跑腿學舌方面，我似乎學到了，在智慮思考判斷作為負責人的副手，協助負責人運籌帷幄、擘劃大計方面，我一點也未學到。無怪負責人說，這麼大的事，有書記長在，就更好一點！

書記長不在這兒，還有社長，想到這，我心稍安。

到浩然里見過社長後，再趕到明德里時，他們早餐已過，我也感到飢餓，正好借詞請仲直陪我到街上去吃。有些事，最好暫時不使方儀知道，讓她擔心真是不忍！

「這兒還剩下很多稀飯，」方儀不明真象地說：「我給你熱熱算了！」

「不用麻煩，」我婉卻：「今天我想吃豆漿。」

豆漿店的掌櫃和伙計們正在用飯，我們可能是最晚來用早點的人。燒餅已經賣完了，油條只剩幾根，鍋底還有幾碗豆漿。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這地方這個時候正好清靜。我們選個角落坐下，

離店夥們吃飯的桌子遠遠地。

喝完第一碗豆漿，心裡有點底兒，我說：

「最近可能有大檢舉，負責人叫我通知你整理文件。」

「管它呢！」仲直反倒輕鬆地：「檢舉是敵人的事，他們愛什麼時候檢就檢吧！」

「當然，」我說：「不過，這次的情報是鍾鳴供應的。」

「鍾鳴又恢復了工作？」

「沒有。若是那樣，這次情報會更快更詳密一點。」我稍感遺憾地：「據鍾鳴的消息說，半年來她由焦特務的口氣得知日本人對『滿系』的警憲越來越不信任，尤其對政治案件已由『日系』警憲另設專案機構，幾個大都市都有祕密辦公處。『滿系』人沒有機會參與，只在行動時臨時分派任務，事前不能得悉內情。這次鍾鳴找木莎說的時候是很情急的，她還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讓我們得知。」

「鍾鳴畢竟是鍾鳴，在她這種情況下還能傳出這樣的消息！實在令人佩服！」仲直終於感動地說。

「不過，」我也觸發感慨地說：「若是木莎不認識捷夫，鍾鳴的這番心血，也只有天知道了！」

22

禍不單行。當晚回到致勇里，充任偽警的永純同志正焦急地等我，見我進門即遞過一個紙條，說：

「今夜我們奉命加班，準備出動捕人。我只偷偷抄下這一個名字，不知與組織有沒有關係。我得馬上回去，溜出時間太久，他們會起疑心。」

我看過紙條，也立即去日新里做緊急報告。

「這個人是我們的同志？」負責人注視著紙條。

「是的，他化名仁仇，屬於歐凱的小組。」

「什麼機關做事？」

「都在『滿洲國通訊社』做職員。」

「和這日新里的乃溫同志，有沒有社會關係？」

「沒有，完全是兩個系統。」

「太晚了！太晚了！」負責人自語著。

我看看手錶，正是十一時一刻。我不知道負責人是說今夜時間太晚，還是指這個消息來得太晚。

「那位警察同志有沒有報告其他情形？」

「沒有，」我說：「我回致勇里時已太晚，他只說一句話就忙著走了。他如果有更多的消息，不會不說。」

「頭幾天有一宗文化人的案件，也許仁仇受那個案件牽累……不管怎樣，我們救人要緊。敵人行動的習慣，不是午夜便是拂曉。我們要快！你認識仁仇的住址？」

「我去過一次，離這兒有三條街。」

「我們就走！」負責人連忙站起身。「現在沒有時間去找人幫忙，我陪你去。假若仁仇那裡無事，歐凱和那位益年同志也不會有事，你就自己去營救他們。他們自己有躲藏地方由他們自己暫時躲藏；他們無處去，今夜都送到崇仁里，明日再想辦法。」

夜是出奇的靜，我們很順利地走近仁仇的住處，由我潛進宿舍通知他這個消息。仁仇表示自己有地方躲避，我即退回負責人隱身之處，直待仁仇室內的燈光熄滅，也見他平安走出門去。負責人說：

「這裡沒有問題，你自己去那兩個地方吧！事後趕快回來，我要知道各處的情況。」

我很遺憾於如此深夜前往歐凱同志的家，歐凱太太在那次凍人心寒的晚間曾說：「將來，將來你們都住大樓去吧！」這句話，至今又迴響耳際。但使我稍感心安的，我總算在危急之夕，冒險前

來營救，使她先生免住「大樓」。

「大嫂，」我說：「歐凱暫時跟我去躲避幾天，請你不要擔心，等到風聲平靜，他就立刻回家！」

「吳先生，我什麼也不怕，只要他平安，早晚回家都行！」歐凱太太反倒異常鎮定，沒有驚惶，沒有怨責。

送歐凱和益年先後到崇仁里時，羅雷還半斤半怪地說：

「今夜你來來去去，連番驚我好夢，明晚可不許這個！」

好夢？自然！白天在驚濤駭浪暴風疾雨中工作，夜晚誰不需要一個好夢？可是我卻無福消受，這一天我馬不停蹄，這一宿我沒有閉過眼。在路上，在任何一處家宅前，我必須以高度警戒心避免落入敵人陷阱。但說也奇怪，心裡沒有一點恐懼不安與大難臨頭的感覺。這和在瀋陽為至善里應變以至省方遷長的那些日子迥然不同。我想，這也許就是進步，進步到向書記長看齊，只知道工作，勇往直前地工作，無安危感覺地工作。

五月下旬的夜是短的，四點鐘東方就有些發白，算來這已是五月二十三日的清晨了。這次的任務可謂圓滿達成，負責人已經入睡了呢，還是一直在警醒著等我？我應該快些回去報告喜訊，免得他憂慮擔心，不要自己先輕鬆愉快！

我用規定的訊號，敲打日新里北側的玻璃窗，室內已無燈光，真是都睡了？當我轉到房門前，

門竟無聲息地輕輕開了，門縫兒也慢慢擴大……

怪！我想。

沒聽見負責人的咳嗽，沒聽到乃溫同志趿拉皮鞋；門，怎麼會自己開了？

那門縫越張越大，室內黝暗不見物，可是門縫處卻有一對兩對，好像共有四五對鬼火似的眼睛向外窺視。不對！我剛想轉身，那門像突然被暴風刮開似地以千鈞的威力猛撞我的肩臂，幾乎將我撞倒。我趁勢就跑，但方向錯了，前面乃是牆角，出路卻在左方。再想回頭時，那五條漢子已經一字兒排開，將我圍住，其中一人正擋住路口，其餘四人則逐步向我逼近。我像一隻鬥敗的蟋蟀，拼命想跳出圈外，但日新里是一處下窖的房子，圍牆不高，院子低窪，我一跳竟又落回原地。那四個逼近的傢伙之一，乘機以日本柔道式的快速動作，一個箭步衝上來捉住我的左腕，另一個接踵而至抓牢我的右臂，其餘兩個也同時上來抱住我的雙腿。這四個人把我拉懸在半空，急速拉到房門前，想把我拉入室內。在大學時，我也曾是足球校隊的中鋒，在敵方層層封鎖的球門前，我總可憑智能與技巧將球踢入，現在我自己卻不想進門。門，同時並進二人尚可，四個人扯著我，再加上我的掙扎，無論如何也拖不進去。如此卡在門前纏鬥了十幾分鐘，在敵人憤怒紛亂的情況下，我又得機踢出一腳，踢在門板上，用力至劇，震破了一塊靠近門框旁窗上的玻璃，也震落了窗邊放置的安全訊號。敵人並未察覺，我仍繼續纏鬥，我要盡力拖延時間，我要設法弄出聲響，驚動四鄰，傳出消息，最好讓住在前面五十米外的成澤同志知道，知道這裡已經「出事」了。

不久，我已筋疲力盡，我再無力掙扎，只能用最後一口氣大聲喊叫：「來賊了！來賊了！」可是頭上忽遭重擊，立時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待我悠悠甦醒時，頭皮尚十分疼痛，想起剛才一幕，但願是在夢中，動動手，手已被鐵銬銬上，伸伸腿，腿又被什麼縛著，原來我是「睡」在水泥地上，大半個身被塞在鐵床底下。我偷偷觀察，屋外可能大亮了，室內亦可見物，我看到許多條大腿，有的吊在鐵床沿，有的靠在椅子旁，有的立在地中央。我這才下了一個最不願下的判決：無庸置疑，我是被捕了！日新里出事了！出事太快，連安全訊號都無人撤下！但負責人是否也已被捕了？這裡的房主乃溫同志哪裡去了？想到這，我一陣心酸，多年來所預料的命運終於降臨；我倒無所謂，怕只怕負責人！平時我們常不求甚解地說「不成功便成仁」這句話，負責人曾特別加以申論，說：「一個革命者沒有個人的成功，只有在革命大業中立功，否則成仁。抗戰救亡、收復東北的大業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我們地下工作者，就是要以個人成仁的決心來換取組織的成功。」現在，我求仁得仁，已達到我奮力以赴的目的地；但負責人是組織的化身，是現地工作的生命，他不能被捕，他必須繼續領導奮鬥。我相信，他一定沒有被捕，在我們營救仁仇同志分手後，他會早期警覺地撤走了。

有兩個傢伙低聲嘟嚕了一陣，接著一個人悄悄出去，不久，在我叩打過的玻璃窗上響起「嗒——嗒嗒。嗒——嗒嗒」的聲音，只是不太自然不太熟練。原來他們練習試用我們的訊號。糟了！再過一些時候，社長與負責人的約定時刻就到了；社長的新地址只有我知道，負責人撤走後也不能立刻

通知到他；他若仍然依約前來，我必須發出警報，使他得機逃脫。果然稍停一會，那窗上的聲音又響了，我立時在鐵床底下大吼：「出事了——」，「快跑」二字還未出口，露在床邊的小腿即被一陣皮鞋狂踢，痛得我立時嚥下吼聲。我不知這一次是敵人的試探還是我們同志或社長前來，但卻給我留下一個難題，下次我是否還要吼叫？

那訊號又響時，我強自忍耐，我靜聽，我等候，沒有人走出也沒有人進來，想來又是敵人在愚弄我。過了很久很久，貼在水泥地上的背脊又僵又酸，眼睛只能上望鐵床的下面，判定不出現在是什麼時光，腕錶必是扣手銬時被敵人摘去了。再過一會，我以耳貼地，利用固體傳音的方便，聽到一個沉重的腳步聲由遠而近，走到窗前停下了，很像社長！接著玻璃上又敲出那訊號。這一次我不顧三七二十一地再發吼叫，他們也不客氣地把我拖出痛打一頓，滿口「馬路野郎」、「畜牲」地咒罵著，又用一條氣味難聞的手巾塞住我的口，然後將我推出房門牽到街上，迫我坐進一輛停在馬路轉角的褐色轎車，那兩個傢伙仍左擁右護地陪坐在我的身旁。這車，我認識，是偽「首都警察廳」廳長的座車嘛！

車子快開動的時候，另一個傢伙提來一個皮包坐到司機身邊，那不是負責人的文件包嗎？看見它比看見負責人更難過！

車子以中速度行駛，通過長春大馬路轉入大同大街。我真是被擊昏了頭，當我被塞在鐵床下的時候，我覺得時間已過很久，我焦慮擔心社長赴約所做的忍痛呼喊，現在看來全是沒有意義的掙扎，

因為從剛才小學生們背著書包在馬路上行走玩耍，可判斷不過是七點多鐘，那麼社長還沒有到日新里去過。時間越久，社長得到消息的機會越多，而在白天從遠處便可了然日新里的情況，也就不會陷入敵人的詭計。想到這，我真如在晨曦中乘專車兜風的要員，頗有悠然自得之感。

五月的晨風是溫暖的，今天的天氣又格外晴朗。大同廣場到了，「首都警察廳」門前寬闊的草坪上，三人一夥五人一堆地聚集著許多組便衣人員，像是野宴又像是遊園；有的愉悅地談笑，有的靜靜地吃東西，有的做各式體操，有的躺在草坪上休息；那草坪在朝陽中映射出一片迷人的新綠，似乎也散發出醉人的清香。長春的風光原是這般美好，這一刻更使人感到喜愛留戀。當我們的轎車駛近時，那許多人都側過頭來注目致敬，好像「首警」今天舉辦一場喜慶盛會，我正是一位應邀而來觀禮的貴賓。

「首警」辦公大樓後面，有兩處臨時拘押人犯的「留置場」。一個是收容一般人犯的圈樓，一個是專收政治犯號稱「思想室」的方樓。在「登記處」，敵特點交搜身時，看看我的身分證便把我送到圈樓裡來。圈樓共三層，每層沿著圓周的外牆隔成許多鴿籠式的房間。房間裡的牆上向外開著砲臺眼似的窗洞以通空氣，人是爬不出去的；向著內面則豎著粗壯的鐵柵欄。樓的當中為空心建築，在空心正中央立著一個由地通天的大圓柱，蟠著圓柱有螺旋梯盤旋而上，每層都設置一個刁斗式的瞭望臺，以為「看守」值勤之用。站在刁斗中，上下左右一目了然，滿室風光盡收眼底；一個人不拘以什麼身分進來觀賞時，都會覺得這樣的建築可謂十分藝術又切實用。我進來時，整個圈樓沒有幾

個客人，空氣也算得上清新流暢。事後得知，那正是敵人所謂「掃榻以待」的安排，而門前那種眾多人群所構成廟會式的熱鬧場面，也都是這一夜參加行動的各路警特。

我可能是真正疲倦了，所以一覺竟睡了十多個鐘頭，醒來後四周漆黑，索性再睡一場。忽然鐵門開了，一個人被推進來，幾乎仆跌在我身上。

「誰？」

「哪一個？」

我們彼此悄聲詢問，也幾乎同時地「啊——」了一聲。

「完蛋啦！吳同志，」歐凱俯在我的身邊，用疑慮的口吻說：「有人說負責人也進來了！」

「不要信它！」我說：「你在什麼地方被捕？」

「就在崇仁里嘛，你走沒多久，特務就來一大群……」

「羅雷呢？」我急問。

「就是沒有看見他，也許慌亂中他跑了。除他以外，崇仁里連窩端啦！」歐凱有些懊喪地：「我們都擔心你，可是，負責人呢？他到底如何？」

「我沒有看見他被捕，」我說：「我們是一同出來營救仁仇同志的，我想他會先發現情況而轉移地方。無論如何，我們要振作！」

「那是當然！」

據歐凱說，他一進來就被拉去過堂，先用木棒打，然後即上大掛，因他在長春任職，就特別拷問他長春的關係。當他認清這裡逼供的手段實在太厲害，不說幾個人是不能罷休時，就把他平常調查來的那些漢奸，以及給日本人跑腿的，都假稱同志供說出來。特務問過一段就把他放在一旁；然後就去抓人；抓來後立時拷打，發現是他胡說，就再來打他；他再另說別人，特務再去另抓。

這一下子可真熱鬧啦！後進來的講，這天一整天，長春市沒有一處不捉人，沒有一個機關不捉人，由偽國務院各部局到各區公所，各會社學校及各人民團體，聽說有一個私人醫院就捕了三十多個，連去看病的都照捉不誤。真的假的，打魚摸蝦捎帶鱉地，不知有多少人這天都進來了，整個「新京」都亂了。這樣也好，既然亂就讓它大亂，社會上越亂，發出的警報作用越大，長春市的消息，不用組織通知，就會很快傳佈到瀋陽哈爾濱以及其他各縣市，那麼，我們的同志們，也就有時間掩護應變了。

「特務問你什麼？」歐凱問我。

「我還沒有過堂，我因昨夜一宿未睡，睏倦極了，直到你剛才進來時才醒。」

「那奇怪呀！」

「這兩天我帶的是瀋陽市的身分證，他們登記時或以為我是外地來人，對本地不能供應線索，所以先把我放在一邊，慢慢清理。你覺得怎樣？受了一天的刑，有沒有嚴重的內傷？」

歐凱在暗中動動手腳並做了幾次深呼吸，說：「沒有，一點也沒有。奇怪，和你談過幾句話，

什麼痛苦都沒了。人家都說頭三關難闖，今天各『取調室』都用大刑，那些日本特務像瘋狗一般，這兩天誰被過堂誰就要多受冤枉刑，再過幾天他們打膩了，可能理智一點，希望他們把你忘在一邊，過堂越晚越好……吳同志，這個地方不大好跑，白天我曾經研究過，若是有機會還是跑吧！」

能跑當然好，最好是別進來。昨夜這個時候，我還以為我做了一件使歐凱太太安心的事，誰知今夜我們竟真的住進「大樓」，別人進來尚可，何必多一歐凱？只這一點心願亦不得償，寧非憾事！

再醒來時天光大亮，歐凱不知什麼時候又被提審去了。樓裡鬧鬨鬨的，可不是全都裝滿了人！男的女的，還有小孩子。我不願向別的柵欄裡詳細探望，我怕看見有我認識的人。看來這案子範圍真不小，到底是以我們為主，還是我們被株連，一時不能判定。

下午，一個兇狠而年輕的日本特務親身將我由圈樓提到方樓，而且直接帶到二樓上一間作為審訊用的「取調室」中。隔著一張辦公桌，我們面對面坐著。這小子用充滿血絲的眼注視我良久，口中噴吐隔宿的酒臭，面露猙獰驕狂的笑容，故作禮貌地問道：

「紀剛君。久違了！」

這小子一開口就說出我的本姓本名，看來真是「完蛋」了。但我沒有回答。

「我叫新保勇。新京特別市的新，保衛大東亞的保，勇敢的勇。新保是姓……」

這小子囉哩囉嗦自我介紹一番。我還是沒有說話。

「你不懂日本話嗎？」新保已撕去偽裝的禮貌。

我表示茫然。

新保大為不耐，用手中準備做筆錄用的鐵筆桿敲打桌面。連喊兩聲：「馬尼諾！」一個小白俄立時進來。新保命令他做翻譯，繼續審問。

「你叫什麼名字？」

「吳濟時。」被捕時的身分證上是這個名字。

「吳濟時？混蛋！紀剛是誰？」

「不知道。」

「你不認識紀剛嗎？」

「不認識！」

「完全是謊言！」新保怪聲冷笑著。「紀剛君，你把自己是誰都忘了嗎？笑話！你是泰城人，小河沿醫大畢業，我們已通緝你三年，這裡有你學士裝的相片，你仔細看看，回想回想，認不認識？」

新保把一份通緝狀讓小白俄遞給我，那上面有我一張畢業禮服的照片，不知他們是由學校裡還是由我家裡弄來的。重睹這張照片真使我感慨萬千。我曾將送出的一張自宛如手裡討回來，也曾將對此照片所題的〈像讚〉一詩在信中抄寄詩彥。說認識當然認識，說像已經不像了。對我自己來講，這位紀剛只能算是似曾相識，雖只三年卻恍如隔世。照片上是一位氣宇軒昂、英姿勃發的青年，曾以荒原野馬自況；而今滿面星霜一身風塵，竟成狡猾獵人的狩獲物。我不願承受這樣的現實，堅持

原則，否認到底。事實上我早已將我的人生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我也不願再把它們連接起來，那樣會給我帶來更難堪的回憶。

「這個，」我把那張通緝狀放回桌上，然後告訴他：「我從來沒有見過。」

「沒見過！不認識！不知道！」新保憤恨地咒罵著，一回手取過木刀就對我兜頭劈下，我本能地將頭閃向一邊，那木刀就砍在一邊的鎖骨肩上。那是人體肌肉脂肪最少的地方，皮下即骨，連續砍打，痛澈肺腑。我的手被銬住，只有用頭偏向這邊來護衛，那木刀又砍落在另一邊，如此交替，實在疼痛難忍，我的頭也不能自主地加速連續擺動……新保這小子粗中有細，似有顧忌，只掄著他的木刀在我頭上左右飛舞，卻得不到機會「投籃」——砍將下來。於是他用木刀指著小白俄怒吼著：

「把他吊起來！吊起來！」

馬尼諾把我帶到隔壁大刑室，新保又找來兩名助手，剝掉我的外衣，把我四馬倒攢蹄地上了「大掛」。

剛吊起來時，新保還不斷用皮鞭子抽擊拷問，直到我昏迷過去才把我解下，然後用一桶冷水將我澆醒，再把我拖到樓下，送進一間囚房裡。

我真不知第一個禮拜是如何挨過去的。新保實在是不高明的「取調官」，只知道毒打毒打，無人性地施用非刑；我可能是個最蠢笨的犯人，只會一股勁兒地否認否認。七天的工夫，在敵人最要爭取時機的初期審訊階段，新保在我的「取調書」上沒有記上一行字，無怪他逞兇著惱；而我也鬧得

十八般兵器樣樣皆通地受了所有的酷刑，落得遍體鱗傷，元氣耗盡。綜計上大掛三次，灌涼水兩番，過電五回，至於壓千斤、跪楞木、走釘板、燒肚臍、穿指甲、絞夾棍、拋繡球……等十樣雜耍，一件不免，而拳打腳踢，更是不計其數。有一次我竟想到：假若我能活著出去，我一定要寫一部《日本特務毒刑記》，向全人類控訴，或者以我本行立場，提出一篇關於《人在非常暴力下所有的生理與心理反應》的論文，送到日本東京，一定會得個醫學博士的榮銜！

敵人的審訊不分晝夜地進行著，他們尤其喜歡在夜間拷問。當你睡意正濃的當兒，鐵門忽然嘩啦一響將你驚醒，特務們像厲鬼似的將你提訊。猙獰的面孔，兇狠的目光，陰森的夜，殘酷的刑。用刑的目的自然在逼出口供獲取偵察資料，但新保這小子似乎在此以外，還要求取發洩求取滿足，發洩他私人的憤恨，代償他審訊的失敗。我的手被銬著，腳被鐐著，我的人被關在煉獄中，只這一點新保佔了上風，所以他能為所欲為。谷音雖說「虎仍是虎」，但「虎入牢檻」就躲不開鞭刺者的肆虐。

有好幾個夜晚，新保喝足了「馬尿」，將我提到大刑室，瘋狂地痛打一陣後，再帶到取調室中對坐著。他打著酒嗝，噴著酒氣，死釘釘地瞪著我。夜風從窗口吹進，酒精使他熱得冒汗，而我淋過涼水濕漉漉的全身卻冷得發抖。他一言不發，就這樣彼此僵坐著，半小時，一小時，甚至兩小時；他不睡覺，我不睡覺，連帶著為我們做翻譯的小白俄也不能睡覺。一次，新保氣得走出去，沒有叫小白俄把我送回囚房，我們只有等。等得無奈，小白俄發話了：

「先生！你是紀剛也好，吳濟時也好，我有幾句話想對你說。我不是特務，我不是真正的翻譯，

我也是犯人。」馬尼諾先表明他的身分。「我住在這裡已經兩年，我看見的太多，願意提出一點經驗供你參考。在這裡你不供訴不承認是沒有用的，你若不說，他們就要使你皮肉受苦，換一個取調官也是一樣。去年這個時候有個老頭子進來，他是真正從重慶派來的，還不是什麼都說出來。我倒不是幫助新保勸你認供，我只是同情你，不忍看你無意義地受苦。我是相信價值論講行為價值的。你是革命者是抗日英雄，你不供認的目的當然是為保衛你們的組織和同志。假若你自己一個人被捕，我倒贊成你這樣；可是你們的組織已被破壞，這個方樓和那邊圈樓，一共關起二百多人，你們的領導者也同樣被捉進來，你不供認已毫無保衛你們組織和同志的價值與作用，結果只是給別人添麻煩給自己找痛苦。在我看來，你今天這樣做是一點價值也沒有，何必做這種毫無意義的奮鬥？」

馬尼諾這番話說得很是誠懇，他原是白俄，全名應是馬尼諾夫，新保為了喊叫方便硬給他切掉尾巴。據說他是因給蘇聯做情報嫌疑而被捕的。他很有語言天才，白天被放出來在方樓內做雜役，有時也兼做翻譯，夜晚再關回監房裡。這個曾被祖國放逐的流浪子孫，卻不忘懷為其祖國工作，因此在骨子裡對我們這群抗日分子也寄予無限同情。這時，我雖不能完全相信他說此話是出於真心，但也不能視為奸細之言。

「謝謝你，」我也很誠懇地說：「我相信你說這話是一番好意，我十分感激。不過，我們的信仰基礎可能不同，你是就價值觀點講求實際，我是堅持原則注重精神。我們當初曾發誓言：被捕時不說出組織，不供出同志。現在我被捕了，我雖然沒有能力再保衛組織和同志，我尚有能力否認它

不承認它；這是我完成個人的一個心願一點赤誠的惟一辦法。不管價值如何，我不願違背誓言，我只有這樣做！」

「你這樣說也有道理。」馬尼諾夫感嘆地：「不過新保有他的困難，你不說他就無法做筆錄，沒有筆錄他不能交差，無法將你移送法院。那你們的麻煩也就完不了！」

「若是那樣，我的抗供還是有點作用和價值。不然，我們的組織已被破壞，我們的人已被捉來，他們任意處決好了，何必要一個個做取調筆錄？」

「也罷！若是你決定這樣抗拒下去，我勸你還是多吃點東西保持體力要緊。這裡的伙食都吃光也不夠營養，可是我每次取回你的飯盒，你都剩了大半。你進來不過十幾天，已經瘦了很多，你要注意，你的體力支持不了，你的精神也不容易支持……」

回到監房後，我反覆思量著馬尼諾夫的話。

我忽有所悟，這些天的頑強挺刑和無理拒供，實在是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事，我應該早有作為早有行動才對。我已不能再保衛組織和同志，在如此龐大的案件中，我自己拖延一點時間也是無大作用，我只是給敵人造麻煩給自己找痛苦，我應該早一點走我自己當行的路。

我為何如此掙扎了許多天？原來只是我被捕當時的一種心理執拗。我不願發生的事我就否定它！我否定這次案件的發生，我否定我們業已被捕，我甚至否定我是紀剛。否定儘管否定，事實終是事實。

我進來了！負責人進來了！許多同志都進來了！

當我在大刑室被吊起來還沒有昏厥的時候，我曾聽到負責人在另一間取調室中談話。他平靜地、嚴肅地、深思熟慮地，像指導我們工作似地和小西科長辯論，有時音調高昂，有時出聲緩慢。負責人現在作何感想？他對工作前途有何計劃？他、他……有幾次我也聽到歐凱對新保的痛罵，他受刑時的呼號雖然淒慘，他罵起新保的聲音也確實痛快！

我為什麼不能像負責人那樣冷靜地應對？

我為什麼不能像歐凱同志那樣痛快地咒罵？

我為什麼還要愚頑無意義地忍受苦刑？

負責人是負責人！我是我！負責人負工作全責，他必須為整個工作組織和全體同志籌謀對策，他在獄中仍必須堅忍奮鬥；我，我必須死，立時就死！

回想省方遷長春雖然不是我的主張，可是當時曾是我的心想。現在，負責人竟在我的工作地區蒙塵，省方精英也多數在此鎩羽，我尚有何顏再事生存？

記得為至善里搬家那次丟行李事件，似乎負責人曾認為我的措置是怕死的表現，之後，羅雷也曾不止一次地以「你就是怕死！」向我嘲諷。現在，我只有用「死」來證明，證明我對死無所懼怕！

算計起來，這件案子總要清理三五個月，我一定是被判處極刑的，執刑的日子也不會拖延到明春。早晚都是一死，何不早死早安心！

23

決心就死，我突臻一種經虛涉曠的境界，又恢復身居斗室氣吞宇宙的胸襟。我有如一名身歷創世紀的巨人，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攔我的手去叩那安息之門。

我的父親有三個兒子，我替他向國家奉獻一個，並不為過。我的母親嘛，她曾經希望用她那血汗的手鐲將我再帶回她的身旁，古今中外，所有的母親對那些異鄉漂流的浪子都付予錐心蝕骨的牽腸掛肚，死亡當不會再增多她的痛苦。我的叔叔曾經盼望我和他一同為桑梓服務，但當我出走前夕，他對我的選擇十分贊同，因為這也是他青年時期具有的私衷。

自古艱難惟一死，而我的困難倒是死亡的技術。

這座方樓的建造和那邊圈樓完全不同。監房是兩排並列，中間是甬道，門是向甬道開的，左右隔壁都是鄰室，另一面也是圓鐵柱構成的柵欄。柵外是五尺寬四周迴通的走廊，再外便是這座方樓用鋼筋水泥築的外牆。牆上的窗子是大的，所以坐在監房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近處的樹木草地，遠處的街路屋頂，還可以欣賞清晨的朝霞和黃昏的落日。每間監房有四坪大小，門與壁齊，平坦光滑，水泥天棚無樑無棟，只有為固定鐵柱的水泥牆臺距地板有二尺多高。這樣的監房樓上下共二十間，

樓下一號是馬尼諾夫，二號是盥洗室，我住七號。樓上除大刑室小刑室外，有一半是為辦公審訊用的「取調室」。無疑地這次案件使這裡的房間大有客滿之患。圈樓那邊多人集居一室，可謂統艙；這邊方樓可稱特等，有時一房也增容至二人三人。監房裡沒有床舖，但用二張軍毯一鋪一蓋，睡在光亮清潔的地板上，也很舒泰愜意。不要以為敵偽的設施如此進步，這只是偽都新京「首善」之區，也算「天子」腳下，全滿洲國惟一的「首警」「留置場」而已。據以前蒙難同志或同案扣押在他處的難友描述，有的監牢，進去如不穿衣，那些等待吸血的跳蚤臭蟲一下子會撲滿全身，其他情景可想而知。

住在這裡，我大有身為寓公之感，若不是親受刑痛或聽到別人的呻吟哀號，這裡真可說是最好的隱居遁世之所。最大的好處是不必再顧慮敵人的偵緝與逮捕。好雖是好，對於求死卻不方便；無槍無刀不能自戕，跳樓、臥軌、投河，必須出去方能辦到；而上吊一項，因房內無棟無樑也是難行。但經仔細研究，我最後還是決定第一可行的——還是上吊。

在大學上法醫課時，我曾研讀過許多變死橫死的實例，想到有一個人竟靠在椅背上利用頸部折屈的角度自縊而死，這給我很大的啟示。我先試行背靠鐵柱下的水泥牆臺而坐，使身軀滑下仰臥在地板上，頸部前屈的角度足以使氣管折閉，如再加上一條繩索懸勒在鐵柱，那鐵柱又比椅背木條穩定牢固，我的計劃定會成功。進來搜身時他們已將褲帶沒收去，我乃將內衣襟扯下，撕成許多布條，再將布條捻做小股，搓成布繩。弄好以後，我又學習我母親自己纏線方式，一端拿在手中，一端蹬

在腳下，用力拉曳，深知其足當大任，心中甚為欣悅。這些事自然都得偷偷摸摸進行，在準備過程中，我要傾聽看守們來往巡行的腳步聲，偶爾也隔著鐵柵透過窗戶遙望那蔚藍天際的白雲，我想，今晚我的生命將重返太虛，我的靈魂將隨白雲翱翔，無苦無憂無牽無掛地向我的同志，我的親友，我心所愛的人揮手告別了！

夜深人靜，我獨自清醒。看守們很久沒有在迴廊中巡行，樓上各取調室也都沒有聲息，真是天假良機。於是我開始行動。我摸索著將頭頸伸入繩套之內，用力將身軀仰臥滑下，只覺喉部布繩驟緊，頭面充血燥熱，兩耳嗡嗡蜂鳴，眼前一片金星……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必是迷失了路，不然為何捉不到一朵白雲，也看不見一粒星光，混沌中兩手被什麼巨魔握著，反覆地在我的胸膛上壓縮伸張。我想用力睜眼觀看，好像兒時逞勝賭看中午的太陽，剛一張眼就不能自主地把眼瞼立即關閉，因為有一個強光正懸在我的頭上。莫非我已回到我們大學醫院的急診室，同學們拿我做臨床實習，給我行人工呼吸？

「熊蛋！要死，就安安靜靜地死！半夜三更裡，你驚天動地的，那怎能死得了！」

原來當我喪失意識後，四肢基於生理反射，兩手奮力撓抓，雙腳拼命踢蹬，全身掙扎翻騰，為的是要噴出那一口氣，結果牆壁地板發出聲響，驚動了所有的人……必是新保對值勤看守有所斥責，所以在眾人走後，曹大麻子遷怒於我。

以前聽人說過，上吊的人腳一登空便開始後悔，可是悔之晚矣，雖極力掙扎仍不免一死，故死

後伸舌突睛，狀極猙獰。現在我知道那全是無經驗的人妄作推測，一切掙扎扭動都是本能的反射，當事人早已毫無知覺，悔從何來？真要比較時，以我自己的經驗，自縊比溺水舒服得多。因為慘遭滅頂之時，人陷在絕望的深淵裡，肺胃都脹滿了水，頭腦還有一段較長時期的清醒，那滋味實不好受！

我不願給第二個輕生的人授予技術上的暗示，所以對自縊經驗不願多說。但我這次行為使特務們提高警覺，第二天，新保率領看守又來一次搜身，把剩餘半件可撕做布條的襯衫強行取去，又把衣褲上的金屬鈕扣全部摘除，連褲腰對襟處那對鐵皮掛鉤也一併拿走。我很後悔，我應該早想到利用它，把它磨成解剖刀，那麼我第二個計劃便可優先採用而早告成功。

第二個計劃是割動脈放血。這個辦法在變死紀錄上是屢見不鮮的。據說哈爾濱被捕的高雲龍同志便是把磁碗摔碎，利用鋒銳的碗片割斷頸動脈而獲解脫的。長春監房裡的飯具可惜全用木盒，我只能乘馬尼諾不注意時留下一支竹筷，在水泥牆腳處將它磨成竹刀，然後以右手切割左肘脈管。竹刀切皮尚稱適用，切到皮下層，組織鬆軟，刀刃又被滲出的血液浸漬而鈍化，即時失去作用，必待乾涸後再磨再切，但不久即被新保發現，所以又告失敗了。

在押犯自殺，「取調官」是有責任的。新保因此曾受特高科長的斥責，所以他也遷怒於我，又將我修理一番。一個人為了求生而受刑痛尚有可說，為了求死而受鞭笞，著實悲哀。這時我對新保可真怕了，我不怕他把我弄死，我是怕他不讓我死，所以我的求死計劃必須瞞過他。

最後，我採取絕食政策。這個辦法必須避開馬尼諾的注意，他每天為犯人送飯送水，然後再將空盒空杯收拾回去。最初幾天我是粒米不沾唇，只喝一點水，餓得實在難過，胃一陣陣地痙攣，空腸迴腸跟著抽搐，食道也像被捉住的老鼠一樣，時時發出唧唧的叫聲。我以畫餅充飢的方法用力吞嚥口水，但吞嚥結果是增加飢餓。為了矇蔽馬尼諾，我必須用手指將飯盒裡的飯壓成一個凹坑，表示曾吃過。但當我端起飯盒這樣做的時候，我恨不得一口將飯盒整個吞下。這時我的神智清明，對於想吃的慾念能夠自我控制，可是不聽話的手指有時竟捏起一團飯來向口裡遞送……我真鄙夷，難道我竟變成了貪吃的豬？

一個星期過去，胃部痙攣靜止，大小腸蠕動安息，食道也不再唧唧亂叫，飢餓的感覺全失。我知道我已戰勝了「飢餓」，闖過了絕食的第一關。

第二關是「渴」。這個階段我必須滴水不入。馬尼諾一日送水兩次，飯盒收去，水杯仍留在飯洞裡，擺在那裡實在誘惑人，乾脆把它傾入小便盆，杜絕這份渴望。渴比餓更難忍受，我的嘴唇乾燥皸裂，舌葉腫脹硬化，像一塊燻朽的木柴塞在口裡，吐不出也吞不下，一陣陣麻刺刺地刺痛著。周身皮膚像塗了油漆似的悶滯凝重，四面八方都是蠕動的螞蟻由毛孔反竄歸心，弄得心煩氣躁，坐臥不寧，於是勉強爬起來在監房裡走圈子，又感頭重腳輕，腿麻眼花，搖搖欲墜，無奈何再躺回原處。我是睡在左內角的地板上，斜對角即放置便器，當我走圈子走到它的近旁時，便像被強力磁石吸著似地停住了腿，有時竟蹲下去，用顫動的手揭開那小便盆的蓋子，想喝一口自己的……

我終於又闖過了第二關。

在整個絕食的過程中，我能克制住實際生理的要求，卻無法扼止住半意識狀態下心理的漫想。恍惚中我把以前曾經吃過和未曾吃過的食物都重新咀嚼一次，把以前曾經喝過和未曾喝過的飲料也都再品嘗一番，對於以前那些喜歡吃的喝的，更是反覆不已地加以回味：稀飯、乾飯、小米飯、大米飯、臘八粥、韃子飯、包子、麵條、餃子、餅，茶水、汽水、熱咖啡……羅雷在尚智里時曾對我們加以嘲笑，這時真應了他那句話，我本是一名堂堂正正的思想犯，而這些日子所思想的，只是一個「飯」字！

現在我可好了！我已不飢不渴，再沒有什麼能對我加以誘惑。我已超脫，我已將自己完全失落……忽然，我正走在長春大馬路上，負責人彎曲的背影飄浮在我的前方；忽然，我佇立在營口河濱，遼河之水滾滾；忽然我奔行在塞北草原，什麼人在那裡牧放牛羊；忽然，我仍在長春街頭漫步……我必是走了很遠很遠的路，突覺腹中又飢又渴，恰巧仲直自身邊走過，我們便同進路旁一家燒餅店。那地方真令人興奮極了！店中央置一面大鍋，鍋底下燒著熊熊的烈火，鍋裡面正煮著浮漣浮漣一大鍋滾滾翻花的豆漿……我來不及等待晾涼，端起碗來就喝，一口一口地不趕口，莫如仰起脖頸向裡傾倒，只是喉嚨不爭氣，竟連連噎哽噴逆，有許多豆漿便溢出嘴角，流進領口，潤濕了肩膀……

肚子稍感滿足，才覺得脖頸、肩膀、前胸等處都癢癢的，膩膩的，我不得不去抓搔。奇怪！有什麼東西在我鼻孔中直爬？

「糟了，糟了！慢慢！等等！」

怎麼？仲直不見了，好像新保說話……

我不知何時失掉知覺，也不知一共昏迷幾天，當我意識清醒的時候，新保，馬尼諾，和一名醫師正圍在我的身邊，我仍睡在我的監房裡，只是被他們移在地板的中央，醫師手裡拿著一支膠皮細管，馬尼諾捧著一瓶牛奶或是米湯一類的白色汁液……

我的絕食計劃也告失敗。我沒有喪失意志的時候，我有毅力拒絕飲食；大腦停止活動後，我又重返嬰兒期，不能控制本能的吮吸。他們什麼時候發現我的昏迷？他們怎知我昏迷的原因？是馬尼諾的猜想還是醫師的診斷？於是他們用胃管給我灌輸流體。

真該死！我又復活了。

更難堪的是：一切痛苦憂煩恐懼不安，都隨復活而復活。在這求死不可得的時候，我真正體驗到文天祥《正氣歌》中，「哀哉沮洳場」那句話的悲慘含義了。

既然死不了，就得活下去。但我將如何活下去？那即將來臨的明天如何度過？我如何去應付新保？我怎能再忍受酷刑？昨天我有求死的決心，今天，我已失掉生活下去的勇氣。現在，我已變成一個真正的弱者，紀剛啊，紀剛！這是你的名字嗎？

又過三天，我的體力稍稍恢復，新保特別客氣地來「請」我上樓。特高科長小西國雄已先坐在新保的座位上，他的手中拿著兩張十行紙，上面寫滿了小字，待我坐定後，就繃著他的仁丹鬍子，

說：

「紀君！新保君的名譽在你手裡，你的生命在新保君的手裡。從今天起，希望你不再拒絕取調，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他意何指，我也無力作答。

「不明白嗎？我跟你講！」小西像是勸誡罪人悔改似地。「這次你們的工作失敗了，你們的同志被我們捉來，你們都是滿洲帝國政府的叛徒，你且是首要從犯。新保君是你的取調官，你還年輕，假如你對新保君誠實招認，新保君會同情你，幫助你，在你取調書上簽註好的意見，可以免你一死，或者代求更輕的處罰。可是你過去這些天不友善不合作不知悔改的態度，使新保君很沒有面子。一個月來，他對你的取調工作毫無進展，他對你的印象能好嗎？當然你是不怕死的，這些天聽說你已兩次三次自殺，可是你能自殺得成嗎？我告訴你，紀君，在這裡，你想求活我們可以幫忙，你要想死可辦不到；只有我們處你死，你才死得了，可是你有求活的道路，為什麼不求活呢？」

小西這番話說得相當坦白，也還講出些他自以為是的道理，不愧為新保的上司。他的面色雖然也嚴肅冷酷無情，但還沒有蠻橫暴虐動輒打人的樣子，這就使我恢復講理的勇氣。我說：

「科長先生，你對我的勸告，我很感激，但在立場上我希望科長有一個了解，不然，我很難接受科長的好意。在原則上說，東北是中華民國的國土，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中國以及世界沒有承認滿洲國，我們更不承認。今天，中日兩國正處於交戰狀態，現在我看你們是日本機關和日本官

吏；在沒有被捕的時候，我是你們的敵人而不是叛徒，現在我是貴國的俘虜而不是奴隸。新保君以對待奴隸的方式待我，這樣的取調我不能接受。第一、你們有能力破獲我們，你們就應該有辦法調查審判，一味施刑，實在有辱文明國家和大國民的風度。第二、新保君喜歡打鬥，他可以選擇任何方式和我比武。現在我是喪失自由的人，新保君卻利用職權，借著留置場逞威風，也算不得是個武士——」

「住口！」小西阻止我。他似乎因我的言語激惱而想發作，但他畢竟涵養功夫大些，所以又保持平靜地說：「紀君，我同情你的談話，但也要求你同情新保君的立場。這次發動檢舉時有一個決定，要是捉不到你們的負責人，我們就不發動，所以我們擬定五月二十三日零時去捕你們的負責人，清晨四時以後再檢舉其他地方。可是新保和他的哥哥新保毅君這一組到達的時候，你們的負責人卻被一個人先請走了。我們以為這一次又失敗了……你知道我們日本人最重視武士道精神，必須完成天皇陛下交付的任務，新保毅君以為你們負責人逃掉了，所以當場剖腹以謝天皇……」小西流露出無限哀悼的情緒，新保也在旁邊流了眼淚，我也首次聽到一點案情的真相。那時候，正是我和負責人去營救仁仇同志的時光。「託天皇陛下的福，我們正想撤退，你們負責人也正好回來。現在已經調查出來，那位先把負責人請走的就是你紀君！這位新保君，」小西以目示意指著身旁的新保勇說：「是我們最年輕最優秀的刑警。他的哥哥在這次行動中首先殉了職；他，為了大和民族的光榮，為了手足的激忿，對紀君有過分的地方，請你諒解。今後希望你不再固執，我們認為你是一位可敬的

敵人，新保君不會再仇恨、再侮辱。希望你對他的榮譽和職責加以協力！」

「科長先生，」我很感嘆的說：「我很抱歉我使新保君的榮譽職責受損，而新保君哥哥的慷慨殉職，也使我至為讚佩。我自己的生命，我是毫不珍惜的。我是最敬重武士道精神的，貴國青年近來均以充做神風特攻隊員為榮，並且喊出了『人生二十五』的口號。我今年正好是二十五歲，做為一個中華民族的鬥士，如果活過二十五歲，不僅餘生對我毫無意義，而且不配做貴國的敵人，將被大和青年所恥笑；那麼，我和新保君一樣，統統沒有面子了！」

說到這裡，我竟幽默地笑將起來。雖然只是坐在那裡談話，但時間久了仍感中氣不足，所以停下來稍事喘息。小西接著就說：

「紀君，日支事變的發生可謂是出於誤會，今天中日處於交戰狀態，實是歷史的不幸，我想將來一定有和平的一日。現在，你們負責人聽到你自殺，非常關切、非常焦急，我請他給你一信，勸導你。假使你肯對新保友善，順利完成取調，我就把這信給你看。」小西把已經放置桌上那兩張寫滿字的十行紙，拿起來對我晃一晃。「我們知道對你說什麼也沒有用，你們負責人的話你會信服的，你考慮考慮！」小西繼續把那信在他胸前擺動，好像垂釣的人有意擺動他的魚餌；又好像成年人拿給兒童的糖果，露出一臉撩撥的神色。

我本半信半疑，但內心已開始激動，同時也靈光一閃地突有所悟。我被「請」上樓時心裡還充滿恐懼，以為像往常一樣，一言不合便遭毒打。對於新保的毒打，我實在怕了，我不知我還有沒有

耐力支撐，可是就現狀判斷，似乎新保也在怕我，怕我仍不招供。我雖連續自殺未死了，可能對他的前途有重大影響，所以對我也深懷戒心。這真是「麻稭打狼，兩頭害怕」的局面，因此小西出面想替他扭轉局勢。我還以為特高科長職位高，有學養，對我談話也總帶著點教授的口吻，那知他不過是採取懷柔手段，改變取調方式；而他似乎是對我也沒有把握，竟用盜令過關的辦法，拿出負責人的書信作王牌。這，更增加我敢於爭辯的精神，原以為必陷於敵進我退的困境，反而生出敵退我進的契機。

「科長先生，」我頓以極悠然而謙虛的神態與他論理。「勞你出面勸導我，你又費心請我們的負責人給我寫信，無非是希望我不自殺和對新保友善完成取調。在我想，看信是看信，友善是友善。你不能先叫我友善，然後才給我看信，假若信中的意思不讓我與你們友善，你會永久不給我看；假若信中是勸我友善的意思，你們就不必怕先給我看；而且我看了以後，就更容易接受友善的要求。科長，你說對嗎？」

「嗯，也有道理！」小西有些不甘願地：「你看吧！」

接過那兩張信一看，正是負責人的手筆，不禁熱淚盈眶，還沒有看清楚一個字，就感到兩眼墨黑，頭向後墜，我又昏厥於椅背上……

「紀君，」小西於我知覺恢復後，就催促說：「你趕快看吧！看完了我要拿走。」

「科長，」我說：「這封信我要詳細看看，我也許要看十遍百遍。無論如何，這是以前我所尊

敬的負責人寫給我的東西，看見它我感慨萬千。現在，我很感動，從心裡想哭，我滿眼含淚，看不清信上的字句……請不要刺激我，給我機會讓我平靜地看，平靜地想一想……」

小西很受感動，允許我把那信帶回監房細看。

我一面看信，一面流淚。對小西所說的話並不是假的，我實在抑制不住我的激動，真想伏地痛哭。四十多天來，我只是用最愚笨的方法做個人的奮鬥。我真羞愧，我沒有盡到做幹部的責任，我忘掉了「平時如變時，變時如平時」那句話的真實涵義。我沒有在獄中為組織和工作繼續圖謀策劃，我只一味地否定，否定敵人的審訊尚可，否定組織的現勢就不切實際了。我雖無視於死亡，那也無非是消極的抗爭，結果不過是求取個人心淨，淨除自己心理上的暗影，那表示對此次工作的破綻我已引咎自裁，對負責人證明我不怕死，對我深深關心的人表白我對她們「無情」的初衷；此外，一點積極意義也沒有。因為在負責人的信上看，我們真正的任務，並不是在此地表現「死亡」。

負責人的信很長，也寫得委婉、慎重、沉痛而堅強。其中有三點主要意旨。第一點：

負責人說：這封信雖然是受小西科長的請託，也是他個人的一份意願。他表示信裡所說的話，都是在他個人自由意志下所寫，希望我能採信。第二點：

負責人說：這次組織被破壞，省方幹部都將感到自己有責任，實際應該負責的是他，他心情「十分」沉重。他說當我們工作的時候，我們已經用了全部心血，盡了全部能力，用盡心力而仍未能防止組織和同志的被危害，亦可問心稍安，死而瞑目。他說自一二三〇事件後，積案三年有半，被通

緝者不下五十人。據他所知此次警方獲得五六個線索，而且動員全滿警憲從事偵察達四個月之久。我們又限於財力物力，無能做到更妥善的掩護與保衛，故欲求此次檢舉之完全避免，已非我們力之所能及。他要我不可苛責自己太甚。繼續說，據他入獄後的觀察，每個同志都有壯烈的表現，我們工作雖失敗，而精神並未失敗，此乃最堪告慰者。他說：他自己抱定「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的信念，他將以對組織對同志的待罪之身，要活到執行絞刑的一刻。他說：同志均在青壯之年，來日方長，豈可自尋短見，做無謂犧牲？要大家往遠處去看，注意身體，保持健康。據他看我所犯的罪刑，沒有絕對構成死刑的條件，應與取調官維持友善關係，以免冤枉致死。最後他又說，假若我一定求死，希望我能死在他以後，否則，他將感到「十分」難堪！第三點：

負責人說：取調官所要求的友善合作，是指對取調做合理的供述。依今天的情況，這對我並非萬難之事。我自己證據確鑿，堅不承認已屬無益，如取調官追問同志，據他所知與我有組織關係的，均因文件被警方獲得而遭波及。接著他具體列出羅雷等十餘人，這些同志他說或已被捕或在逃脫，對我而言已無責任。信末他說他知我讀此信時的痛苦絕不減於他寫此信之時，他一定能堅強忍受更十百倍的痛苦，直到他生命終了之日，願與我共勉！

我反覆閱讀這封信，用各種角度研究信中的真意。很明顯地，有些話是隱諱之詞或暗示之語，上下文一連串就都成了雙關，落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小西看，這是封很切合其需要的勸告書，由我來看其中另有文章。就第一點分析，負責人先說是受小西請託而又說是出於其心願，等於是「將

計就計」，不然他沒有機會傳達他的意旨。就第二點分析，他說「來日方長」、「注意身體」等語，是要我們設法生存奮鬥；一定要死也不要死在他面前，不然他將有「後繼無人」之感。第三點等於指示我一個供訴的範圍。他把可承認的人都一一寫出，而且說那是我所知的全部，實際上那不足我所知道的幾十分之一。這樣一來，這些關係我固然不能不承認，其他關係，敵人也就無理由再問了。

看來，負責人進來以後，仍在晝夜籌思對策，研判案件的發展，對被捕的同志指揮如何應變，對未受株連的地區組織，設法掩護保衛。這裡面還有無限的工作責任，豈是我「一死」所能「了之」？當我再留心負責人兩次使用「十分」，而那個「十」字均寫得規整用力，很像算術課本上的「加號」。我應用我們組織用的嵌字格的密碼術去查尋，果然從某處起每隔十個字連綴起來，豁然是一條祕密指示：

「生存奮鬥，不可自棄，開闢工作，爭取最後勝利！」

24

得負責人祕密指示後，我的精神大振，體力亦覺恢復迅速，比新保每日送來的特別營養更有功效。五二三事件，對於敵人自然是一大勝利，偽警務總局撥付偽幣一千萬圓作為犒賞及專案開支。特高科像鄉下人辦喜事般的在思想室的方樓後面搭蓋三進蓆棚，作為臨時廚房及雜役人員休宿之用。據說自「首警」建造這兩座所謂「留置場」的拘留所以來，這是第一次大客滿，而且有些監房還有超載之勢。除首警直屬特務人員外，還分別由各省市抽調協辦人員前來參加工作，而這件案子所涉及的東北各地區各縣市的特務人員，亦頻頻往來長春，交換資料，查對案情。臨時廚房裡燈火通明，蒸炸燴煮，晝夜不停，在生活必需品極度缺乏時，這裡卻油酒米麵、雞鴨魚肉，一應俱全。新保這些天對我特別孝敬，早晨給我送紅豆圓子粥，中午送雞湯肉絲麵，晚餐送什錦蛋炒飯，有時還放上幾塊咖哩牛肉片。這食物差不多都是由他親身來送，很少讓馬尼諾代勞。這類飲食也都是「取調官」們的「特配品」，「犯人」自然是吃不到，是否他怕別人私自偷吃，還是對我表示真心友善，我就不知道了。儘管這一段期間，他對我總瞇縫著笑眼，「低姿勢」政策做到了家，但他穿著木屐，走在樓梯或迴廊的地板上，仍發出驚人的聲響。事後很多同志跟我講：「當時一聽到那卡達卡達的腳步聲，

便知道那是新保給紀剛送高餐來，真令人羨慕極了！」說實在的，我一生很少注意飲食，任何菜肴吃飽拉倒，若問我說什麼東西最好吃，在我經驗中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是長春「首警」時期這幾天的囚飯。我對新保說：「下星期一，我跟你正式談話！」新保高興極了！隔著鐵柵和我緊緊地握了一次手。

在和新保「談話」之前，我必須了解更多的案情，這才開始和獄中同志採取聯絡。等看守走過去，我用手指叩打右側牆壁，然後將頭靠近鐵柵的右端：

「歐凱！歐凱！」我用噓聲呼叫，好像他就住在隔壁。

同樣用噓聲回答的：「我不是歐凱，歐凱是九號，我是仲直啊！」

「仲直？你怎麼也進來啦？」

「這叫做命中註定，在數難逃。我再告訴你，方儀也進來啦！」

「那不應該，絕對不應該呀！明德里只有我知道，可是我什麼地方也沒說呀！」

「我們是過了十幾天才在四平被捕的，因為我們用的是長春的身分證，他們又把我們解來，現在不到一星期。」

「那你怎不找我說話呢？」我搶著說，幾乎又要哭泣。

「我也是整天整夜過堂，不說就打，還沒有機會——」

「你是那一個取調官？」我又忙著問。

「也是新保嘛。這小子太可惡了，有機會非把他幹掉不可！」

「其實你不必勉強拒供，你是作宣傳的，沒有什麼必要保密，他要問你，就向他講三民主義好了。」

「他是天生的棒子手，那聽你那份鼓兒詞？我一來到這裡，他什麼話沒問就先打個夠。其實挨打倒無所謂，幹得了就受得了。可是承認之後，他那份瞧不起人的樣子比挨打更難堪。像什麼，像一個良家婦女被惡人用強，反遭惡人惡言侮辱的滋味。本來中日兩國在交戰，在東北我們也是敵我雙方組織的鬥爭，勝敗都不是個人的榮辱。可是，新保那樣驕橫野蠻耀武揚威的，實在令人不能忍受。所以我很後悔，倒不如採取你的方式和他窮鬥幾天，至少也讓他麻煩麻煩！」

「我們先不管他，西諺曾說：會笑的最後才笑！現在負責人對我們有指示，要我們保育潛力，繼續工作。你先把你所知道的內外情況說說，然後我們再共想對策。」

我們的談話是不得暢敘的：我們不敢用大聲音，因之常常聽不清楚，必須重說再說；而當看守巡視走過時，我們必須迅速離開柵口各歸原位；有時彼此專心談話沒有注意到走廊裡的動靜，被看守發現則遭叱止。雖然如此，經過一晝夜的乘隙努力，斷斷續續地仍由仲直和歐凱兩方蒐集了許多情報。這些都是我幾天以前還故意不願聽聞而現在急想知道的事體。

原來「五二三」那天早晨，社長到日新里赴約以前，有事經過大同廣場，從遠處看見首警門前的「非常場面」即知有異，乃特別提高警覺。到日新里附近，先行注意觀察，發現安全訊號不在了，

即轉赴日新里斜前方一棟宿舍成澤同志的家查看，成澤同志正在門前刷牙尚無異狀，他便走近與他接頭，兩人又在其宿舍的後窗瞭望，正好有日本人自日新里進出，當即斷定發生事件，乃囑成澤同志整理文件準備應變後，就到致勇里找我，致勇里此時已出了事，再到崇仁里聯絡，崇仁里也發生變故，最後轉到明德里告知此種情況。第二天由社長和仲直分別利用公共電話找他們所知道的市內同志打探消息，大多數的回答說：「某君出差去了！」「某君還未上班。」「聽說生病了！」有的機關接電話的還緊緊反問：「你是誰？你是誰？」或者有的地方乾脆回答：「不知道！」方儀自街上回來報告，說她到幾個菜場和幾家巷口小店去察看風聲，也是處處有人交頭接耳地互相驚告著：「這裡出事了！」「那裡捉人了！」有個太太多嘴好問，還被老闆搶白道：「買完東西趕快回家，別管閒事！」

第三天，社長親自到幾個祕密通信處去收取信件，以求了解外地情況，正巧碰到羅雷在一處徘徊。所謂祕密通信處也是因地制宜的，其主要條件在於因信件檢查發生問題時，除了收信人是假名無從查考外，敵人也不能從通訊地址獲得線索。我們在情況正常下則收取此信，感有異狀即予放棄。在瀋陽，盛京施醫院是個最適宜的地方。那裡員工病人的信件每天在千封以上，傷患的流動性很大，無處投遞，放在陳列箱中待人認領的信很多，普通信並不登記，多一封少一件無人知曉，我們尚有一位同志在總務處做收發，近水樓臺總會把屬於我們的信件送入組織。這個通信地點由「一二三〇」到「五二三」，歷次案件均未遭破壞，收信範圍，除了「滿洲國」內，也有遠自南洋、日本、朝鮮、

以及中國內地寄發的。在長春，我們利用幾個大雜院的大門洞。有些大雜院前門開在三道街，後門直通四道街，一個院子等於一條巷子，三、四十戶人家的信件只用一個門牌總號，都由郵差放在大門洞裡的公共信箱中，任由各收信人乘出入之便自己檢取。正好，我們也一日兩次派人由這些門洞通過，羅雷也就利用這個機會與社長取上聯絡。

那幾天，可謂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偌大長春市，處處風聲鶴唳，家家雞犬不寧，整個社會都陷入大地震大風暴中，人人都有驚悸不安，無端自危的感覺。對我們留在獄外的同志來說，更是緊張萬分，苦不堪言。面對如此突如其來的重大鉅變，一時間茫茫然若喪家之犬，惶惶然似漏網之魚。羅雷碰到社長固屬幸會，而伊正自瀋陽寄來的祕函，卻報告了一件更大的不幸！

瀋陽的案件是五月二十四日發生的。就時間和其他因素推算，並不是長春案件的影響，可能是敵人另有線索一併待命發動的。敵人於二十四日晨檢舉一批，傍晚書記長進入尚智里綜合案情指揮應變，處理文件後天色已經大黑，未等書記長走出，敵人已摸到尚智里。幸虧那天書店已早早關門，根本不再做那份假生意。外面叩門甚急，書記長由樓上窗口看到有十餘特務圍門，就伸出手去對外連放兩槍，嚇退叩門的特務，即命伊正等同志開樓上後窗，藉著黑夜爬上隔壁的屋脊，穿宅越戶脫走。伊正要求書記長把那支百朗寧給他，由他拒敵斷後，書記長仍要他先逃。伊正再堅持，書記長即鐵青著臉，說：

「不要浪費時間！你不聽令，我先槍斃你！」

書記長等他們都安全撤走後，想一個人憑藉手槍的掩護乘機遁走，剛轉入尚智里後面小巷時，突然有幾條大漢前後衝出將他圍住。他又打了幾槍，打傷了兩名特務，但仍未得脫身，如此僵持十幾分鐘，不得已乃連聲高呼：「打倒日本！中華民國萬歲！」隨即用最後一顆子彈自戕。

記得最初在瀋陽，我住大勇里的時候，有一天夜裡，書記長在我的小屋中給那支手槍洗銹上油。我坐在旁邊觀察學習，接過槍來一弄，「砰！」的一聲，槍走了火，我的褲腿上留下兩個洞洞。書記長忽然幽默起來，說：「對不起，紀剛，你的一粒已經用過了！」誰知說這句笑話時，他早已下定決心，他果然自己也用了一粒！

書記長是否當場殉難，抑或重傷後被捕，一時尚不能判定，不過第二天瀋陽市民都知道有一個重慶來的重要人物犧牲了，聞者莫不駭然而激憤！

伊正的信上說，瀋陽當時亦呈大亂局面，要我或羅雷回瀋時不可再去尚智里。他自己在瀋陽再支撐一、二星期後，將赴遼西聞道處待命，請負責人從速指示一切。

他不知那時候，負責人已經一切不能指示了！

當時，社長與羅雷、公謀、景樵、責一、尹生、岳嵐、志仁、立華等齊集於明德里，共同研商大計。仲直說：那真是空前絕後的集會，也是一次最悲慘的場面。方儀白白做了一大鍋飯菜，可惜沒人想吃。一年前，瀋陽敦和里撤退那次，大家多數經歷過。可是那時候，三位負責人俱安全無恙，一切情況的發展，完全在負責人掌握之中，大家雖也感到緊張，但心有所恃，方寸不亂。這一次……

社長一面請大家交換情報，一面讓大家傳閱伊正的信件，然後請個別發表當前局勢的意見。

人人都無話講，空氣特別沉靜。

羅雷以其幾度幸運的餘威，勉強幽大家一默。他學著敵人慣用的口吻，自嘲道：「我看這是敗戰會議一個樣的，我的無話可說。」

原來我離開崇仁里時，羅雷因睡眠被打攪而感氣悶，決定立時搭早車回瀋陽，穿好衣服行到院中，正值特務前來，他就乘隙溜出。因此一變，他要了解真實情況，復又決定不走。上午九時左右，他到二道河子一家婦科醫院去，那是他進省時的備用聯絡處。那間醫院開在一座菜場附近，本來已是診病時間，可是隔著玻璃，看到候診室裡只坐了兩位形跡可疑的中年男人，診療椅上坐的也不是他所熟悉的那位大夫。正猶疑間，候診室裡的一位男人起來走到門前，一面想要開門，一面大聲問他：「你做什麼？」

羅雷回答他：「請醫生！」一面用手將門往裡推。

那人急急喊告他：「門朝外開！」

羅雷裝糊塗，更故意向裡推。等那人用大力向外推的時候，他突然將門向外一拉，那人陡然撲空，跌個狗吃屎。羅雷轉身跑入菜場，另一個人卻從醫院跑出來追趕。

羅雷在菜場裡大喊：「抓勞工的來了！抓勞工的來了！」

菜場裡登時大亂。買菜的跑，賣菜的也跑，土豆白菜滾翻一地……在人慌馬亂之際，羅雷又溜

脫了。

兩次遇險，羅雷發了牛脾氣，不弄清長春情況無法回瀋陽報告，可是他亦再無接頭之處，把惟一希望寄託在收信地點。頭兩天他自然沒有機會，我與社長都沒有去取信，他自己擺在那裡的一封信，也在痴痴地等。挨到第三天，終於碰上了第三負責人。說幸運就是幸運，不然，他無辦法而回瀋陽時，說不定會落入尚智里的陷阱。

羅雷的幽默並未能使局面稍顯輕鬆，仲直的老實話，卻真正加重了這次「敗戰會議」的黯然情緒。

仲直說：「說老實的，在外面這種應變的滋味，倒不如明天到首警去報到，乾脆跟負責人一起去！」

當然這樣的老實建議，也沒有人願意接受。

社長叫方儀把存在明德里的現款統統拿出來，連同他自浩然里帶來的，一共一千九百六十五元。然後平靜地說：

「各位同志：當初負責人向中央呈報，推薦我權充第三負責人時，我曾極力推辭：一因我身體素弱不克擔任繁鉅；二因資深的老同志甚多，而年富力強、青年有為的同志亦復不少，人人都會比我勝任愉快；更主要的是我不願意有一個第三負責人接替負責的局面出現。可是負責人當時對我說：『你是怕死刑嗎？』我就不能再說下去。這些年蒙各位抬愛，社長社長地叫著，我也只好當之

無愧。不幸，今天居然發生了這種局面，負責人已經進去了，書記長又生死不明，我，我……」

社長忍著眼淚，很久很久才接著說下去：

「我，我到這個時候，不能不有幾句話要說。我沒有負責人那種嚴正堅執的作風，我也沒有書記長那種質實的幹勁，我只把我心裡的話對大家說明。這個，你們能遵從也好，你們辦不到也好，我絕不要求，也絕不責難！」

「第一點，」社長沉靜地宣佈：「這次長春市已有不少同志被捕，省方在長的機關亦多遭破壞，案件的發展現在仍不能估計，剩下浩然里和明德里等處也不宜繼續固守，而瀋陽的情況更屬不明……所以我決定從現在起將省方化整為零撤離長春；諸位各回各自的督導區，依照現地工作大綱的原則，就地領導，獨立活動。目前主要的任務是向各地同志分頭告變，一個月內除了應變，其他工作一律暫停。」

「第二點，省方現在只有這一點點錢，大家分用，今後一切困難都要自行設法。回頭我們彼此相互間都要訂好接頭關係，至少每月見面一次，如不能與我直接碰頭，也要彼此間接聯絡，不要斷了連繫。」

「第三點，我個人絕對堅守崗位，暫不退卻。希望你們也不離開現地！」

仲直說，大家在明德里都很靜肅地聽完社長這段話，沒有人在中間插嘴，沒有人在會後異議。社長的性格大家是久知的，他很少向幹部要求什麼，當負責人向我們強力責成使我們覺得承擔不起

時，他常常說一兩句話替我們緩頰。這一段話，社長也像往常一樣沒有要求什麼、責成什麼，可是大家聽了，覺得比負責人的要求更強烈萬鈞，比書記長的質實更剛毅固執；沒有商量，不容討論，不折不扣，必須貫徹。因此，大家的心都像掛上千斤石，重重地向下墜著。大家都明白，這不僅是第三負責人主持工作的局面，同時也等於是第四第五負責人負責的日子到了！因為這次鉅變，不單是負責人蒙難，書記長生死不明，而是整個省方被擊碎。

比較起來，省方由瀋遷長時那次敦和里的場面，確比這次明德里的「敗戰會議」輕鬆多了，可是聽過社長這幾點宣佈後，對於已經殘破而不得不化整為零的省方，無形地復又結成一個堅強的領導中心，受指示可以各自為政獨自作戰的省方劫餘幹部，又獲得了一個穩定的依靠。大家記取了當初的誓言，體認了目前的艱困，懷著沉痛而不敢失望的心，挺身走向這最後一段，本可快速完成，而今突然拖長，看似更為遙遠的路。

羅畜最先返瀋，設法與伊正謀取連繫。大家也都陸續離開長春。社長讓仲直和方儀在四平附近尋覓掩護場所，以便重新建立省方基地，他自己則擬重返瀋陽，看看能否收拾瀋陽的殘局。他們曾一同到鐵嶺「拜訪」李伯一次，然後才南北分手，他們認為李伯家是一個最好的連絡站。

仲直方儀到四平未及半月，不幸亦遭逮捕，真應驗了他那「在數難逃」的話，好在「敗戰會議」時他就表示願自投首警，向負責人這裡來歸隊。

新保請我做正式而友誼的「談話」那天，看「取調室」牆上的日曆正好是七月七號，原來我入

獄將近一個月半，苦難的四十多個晝夜總算滾過去了，未來的日子有多長，還不知道。幸虧得到負責人的指示，不然我已忘掉獄中是另一個戰場，和獄外同志的繼續奮鬥相比，我幾乎竟成了逃兵。新保的辦公桌擺著四盤大菜，又命馬尼諾自廚房提來半打啤酒。我們舉杯互祝，把酒言歡，這一次的共進午餐，算是友誼合作的第一步。真是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有如今日生。我們可能都醉了，也可能都是裝醉。新保要我為了中日兩大民族未來和平著想，不要介意他過去這些天對我的無禮，我特別表示請他不要以他的無禮為憾，因為他不那樣就不像日本刑警，我對他也就不佩服了。我告訴他嚴子陵不事漢光武的故事，說我們中國大文豪為他寫祠堂記時有二句話，所謂「微先生不足以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隨先生之高哉」，正好做我們今日的寫照。比喻雖不恰當且含義諷刺，但新保卻感大樂，舉杯而盡，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之概！

提到文章，新保指牆上貼著的一首七言絕句說，那是一年前某一被捕的主任委員題的，大意是對他披星戴月、宵旰精勤的頌詞。新保認為那是他的戰績而深以為榮，希望我也詠讚一首以便左右輝映。我說中國文化偉大淵博，可惜我讀書時成立了「滿洲國」，無機會深入學習古詩，但盛情難卻，只好打油幾句以示謝忱。詩曰：「年年南北走風塵，敢將大業寄此身，頸上頭顱任君取，沖霄壯志萬古存。」新保也十分滿意。

馬尼諾夫坐在一旁，我們也不時向他敬酒，感謝他的翻譯能夠使我們的真情暢通。馬尼諾常常用驚異而迷惑的眼光瞥向我，對我應訊態度所做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表示無由理解。

酒足飯飽，新保要訊問我參加工作的經過，以作筆錄。他拿出一張他自己繪製的「日滿支」紀元對照表，我的回答概用中華民國正朔，新保只熟悉日本的昭和紀年，而筆錄上又必須用偽滿洲國康德年月日，有此一表，彼此方便。至於他將民國紀元排在最後一行，我也就不便爭議了。

新保說他對我的「取調」已經「誤點」，為了趕上「車班」，請我在他做「取調書」即審訊筆錄的同時，就在監房裡開始寫自白書式的「思想推移之過程」，我自然也接受了。

這時「首都」長春地區的審訊工作，大致初步完成，敵特們依其所審訊結果與其他被捕同志的關聯性，分別到瀋陽、哈爾濱等其他各省市縣的特務機關開始「打合」——核對去了。關在首警的同志們都被命令寫這篇文字。所謂「思想推移之過程」是「取調書」應有的附件。是敵偽統治機構據以研究「滿洲人」抗日思想的來源及其原因，以「改進」他們的統治政策。另外司法機關將視思想犯有無反悔，來決定量刑輕重。可是我們同志不理會這些，利用這個機會大談三民主義的大同理想，總理孫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而大加批判敵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協和萬邦」、「王道樂土」等美麗名詞下的猙獰面孔。

我與歐凱、仲直根據負責人的指示，研究開闢獄中工作的辦法。三人決議利用手中都有紙筆之便，於七月份先行編發一獄中刊物，就命名為《公開階段》。因大家都被敵人打開橫的關係並公開了彼此的本名身分；更主要的是負責人曾計劃於本年抗戰紀念日，將工作推進至公開階段；現在情勢變了，但大家仍嚮往於對敵作公開鬥爭。

在《公開階段》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便是我們三人集體執筆的《五二三紀念歌》。詞曰：

五月二三　黨人蒙難　蒙難苦如飴
嘗盡了辛酸　受遍了嚴刑　發揚了民族正氣
患難相助　生死與俱　大家親愛精誠　難中倍加淬礪

生存一日　奮鬥一日　抗敵莫休止
激勵我同志　整編我組織　補充我戰鬥實力
獄中工作　積極開闢　大家再接再厲　爭取最後勝利

黑水白山　久遭塗炭　收復事業鉅
武裝的流血　祕密的鬥爭　十餘年前仆後繼
打破枷鎖　拿起武器　大家奮勇殺敵　重見青天白日

歌詞三段，主旨不同。首段表現蒙難，次段激勵重建，末段預祝光復。原詞三叶山韻，所以最後一句是「重見白日青天」。中間一段是照負責人給我信中的祕密指示綴成，詞意尚無問題。前後兩

段包含些失敗主義的色彩，如首段原有「蒙難苦悲慘」，末段有「收復事業難」之句，負責人認為不妥，指示將「苦悲慘」更改為「苦如飴」，將「事業難」修正為「事業鉅」。一字之差，精神意義迥然不同。而結韻之「白日青天」也就得以匡正為「青天白日」了。

在獄中，喜愛音樂的惟亮同志尚不能作曲，我們的歌詞乃是按黎錦暉所作《總理紀念歌》舊調填成，大家輕車熟路，一唱百和，聲勢自然壯觀。

傳遞文件或轉達消息，有時是用拋紙團的方法。我們將手伸出鐵柵把紙團拋到鄰房鐵柵外的地板上，第二監房的同志趕快拾取進去。拋得近了或過界了，就會落入敵人手裡。所以這種方式只適用沒有祕密性的文字。另外則主要依靠仲直式的通訊術了。

仲直不愧為宣傳專家，他適時地應用國語注音符號的行位制，依明碼電報術打出音位，再合音成字，雖慢卻極準確。鄰房用叩壁法，隔室或向全體廣播則敲打通連各室的暖氣鐵管。每每金石齊鳴，驚動看守。曹大麻子為此常來恫嚇制止，但他畢竟是「中國人」，不能對我們過分發威，又怕日本人刮他鬍子，只好央求我們小聲一點，並與我們約定，當日本人下樓時，他發暗號我們不再弄出聲響，彼此就可兩便，狀極可憐！

曹大麻子去後，仲直忽然喊我：「紀剛！我考考你，你還記得莊周化蝴蝶的故事嗎？」

「當然記得！」我說。

「我方才想，像曹大麻子這班人，每天和我們一樣地在這裡上班，我們出不去，他們也不能隨

意離開，我們同在留置場裡，中間只隔一道鐵柵。所以我要問你，到底是他們看守我們還是我們看守他們？或者說是他們住獄呢還是我們住獄呢？另一方面，自從進來以後，睡覺時常常做夢，什麼夢都做，全是獄外的事情，從來沒有做過入獄的夢。所以我又要問你，到底是我們真正住獄而在夢中出去呢？還是並未住獄只是夢中進來的呢？」

「你所講的夢中出或是夢中入的問題，倒和莊周化蝴蝶的境界是一樣的。」我對仲直回答：「不過若與看守比較，以前歐凱曾經說過：在外面可以說是住大監獄，在裡面可以說是住小監獄。因為在滿洲國內任何中國人的生活和生死，都掌握在日本人的手裡，所以也就沒有誰住獄誰不住獄和誰看守誰的問題了！」

「提到生死問題，」仲直說：「我前天也有個感想。我們幾個人將來都是要受絞刑的。聽他們說，絞刑室裡有個地窖，窖口蓋著翻板，板上有個木椅。到時候，我們先坐在木椅上，行刑官把索套套在我們的頭頸上，按動機關，翻板一轉，我們就掉入地窖裡。地窖很深，落不到底便吊在半空中，過幾分鐘再把我們拉上來。法醫填寫死亡檢定書時特別明白準確，不僅年月日，還要詳細到幾時幾分。然後他們把副本寄到我們家中算是通知，也便註銷戶口。記得我們出生的年代，老一輩人都是看日影算時辰，什麼子午卯酉的，一個時辰就是兩點鐘，可謂生得糊裡糊塗；現在若能死得明明白白，也算說得過去了。」

「你怎麼知道這樣清楚？」

「我的舅父就是這樣的死法。他原在偽交通部做事，據說他是利用電臺向重慶祕密通報的關係。我看過他的死亡檢定書。可是絞刑的滋味如何，我還想像不到！」

「那我可有經驗。他們真用絞刑處決我們，倒是這個『王道樂土』裡一個最王道的辦法。一點也不難受，你不用擔心！」於是我把上吊的感覺告訴他。「奇怪，你怎麼竟有這些怪念頭？」

「我只是隨便想的。一天到晚無事，自然就想東想西。剛進來時，我並沒有想到必死，現在雖然負責人勉勵我們要生存奮鬥，我也沒有想一定會活。戰局確是越來越對敵人不利，但我們被握在敵人手裡，到最後關頭他們怎樣對付我們？實在無法猜想。所以想到若是按部就班接受絞刑，也算是壽終正寢了！你呢，你都想些什麼？」

「以前我絕食的時候，幾乎完全想到吃的，真正應了羅雷那句疙瘩話。方才聽你談到住獄的感覺和我們現在的實際情況，我倒想起羅曼羅蘭一句話。他說『監獄是革命者的休息所』，看來他對革命的體驗還不夠深刻。因為他還不知道有獄中工作……」

「不要講話了，二位大人！」曹大麻子又巡轉過來。

25

「紀剛，你的真正的朋友沒有！大大的撒謊的有——」新保自外城回來，立即把我提到樓上「取調」，瞪圓鬼眼，繃緊驢臉，完全和第一次審訊我的神情一樣。這一次他沒有找馬尼諾做翻譯。起先用日語式的中國話發問，辭不達意的時候，也就羼雜日語。他說：「我的二週間的，瀋陽、哈爾濱……統統的去了。朱子青的，哪一個？許文中的，哪一個？陳光漢的，哪一個？你的四十八個名字的有！你的最惡最惡的，最大最大的叛徒的有！」

他的面前放著一張紙，最上一行的字是大的，寫著我們被難同志的名字。每個同志的名下註著許多較小的字，坐在對面的我是看不清楚的，惟獨在我名下那一行字最多也最長。很顯然，那是一張姓名和化名的對照表。看到這張表，我知道情形不妙。

「我的說話的有！」我還想理由搪塞。

「你的說話的沒有！」

新保不容我再事狡辯，掄起木棒又是一頓毒打。從此，我與新保又從「朋友」化為仇敵，我的那份高餐也即日停止。

原來敵特們由中央到地方經過一次巡迴大「打合」後，發現我們所有同志的供詞都驢唇不對馬嘴，內容真假難辨。新保對我未再正面拷問，卻一連過了仲直三堂。據仲直推測說：「敵人似乎採取就我們組織系統，分成專案，重新整理我們的供詞。他們把方儀也撥歸新保審訊了，看來我們覺團，也就是有關我們小河沿的這一部分，可能為一專案。這個專案就由新保承辦，那麼，他們就容易核對證詞了。」

說起專案，我忽然想到在首警拘留的女同志都住在圈樓那邊，聽說方儀解來後，她們已結成十三姐妹。十三姐妹中有方儀，有翠蘭，有負責人的太太碧丹，我是知道的，其餘都是那些位我就不知道了。長春女同志被捕有十多個人，大概宜民也在內吧！那麼詩彥呢？如果詩彥也進來了，說不定也分到新保這部分來。將來各種個中關係實在不好供說，而心竹的命運如何，也時時在我念中。

七月下旬，負責人通知大家要鍛鍊身體，我們就在獄中不停地做復興體操。不會復興體操的就做偽滿的「建國體操」。敵人不明白，我們自己也不明白，但意會到是負責人要大家振作應變的意思。因為琉球已於六月末被美軍佔領，美空軍天天大編隊轟炸日本本土，並有即將攻取日本本土的趨勢。日本特務們的臉上常現嚴肅之色，「滿系」特務尤其是看守們已暗中傾向我們，只有曹大麻子還混漿漿地罵我們「死不知愁」！

月末，我又哭了一場，雖然只是幾滴酸酸的淚，甚至還沒有湧出眼眶，其深度與濃烈都不亞於接到負責人的書信。那天傍晚，晚餐還沒有開上，歐凱讓馬尼諾轉送我一個蛋，說是他太太自獄外

送進來的；第一次只送一個，聽說我們倆住在隔壁，這次加增一個指名給我。歐凱夫人——應該稱她一聲夫人，這位當初對工作提心吊膽的女子，沒有讀過幾天書，摸不清社會上的門路，案發後卻能剛強勇敢，暗中託人給歐凱送進食品和衣物，而且還關心到我。想到「五二三」前夕我對她所做的保證，看著眼前比任何珠寶都珍貴的這個蛋，久久不忍沾唇！

七月過去了。

一進八月，情形更顯特殊，再沒有看見日本特務的笑容，本案之初那種勝利驕狂的樣子一點也沒有了，只剩下陰沉和無端的發怒。這情形以新保為尤甚！人人都有一種無名的恐怖感。「滿系」的特務們也似乎被什麼暴力所懾伏，謹慎戒懼不敢跟我們多接觸，好像我們都感染了黑死病。相形之下，馬尼諾倒成為一位精神最舒暢的人。新保的酒越喝越兇了，常常一個人醉倒在「取調室」中。我們推測這可能又是與戰局有關，但戰局到底有什麼變化，我們仍不知道。負責人又傳知大家要時時警覺時時準備，使我們更加惶惑，莫非敵人要來一次瘋狂的大屠殺？不然警覺什麼？而我們都是赤手空拳住在獄裡，又能準備什麼？大家各自猜疑，更增恐怖不安！

八月七日早晨，敵偽特務們都交頭接耳低聲議論著，說是日本廣島於六日落下一顆奇怪的炸彈，威力特強。八月九日又傳說同樣的炸彈於前一天又在長崎落下一顆。這幾天的長春也日夜都有空襲警報，特務們都向防空洞裡進進出出地奔跑，只有我們坐在獄房裡靜等。

十日晚間，警報解除了，新保酒醒了，半夜三更地又要過堂。第二天就傳出女同志被污辱的消

息，而且可能就是方儀。當我們正義憤填膺地傳遞這消息時，新保又把仲直提上樓去，不久就聽到樓上有不正當的撞擊聲，再過片刻，馬尼諾把仲直背回監房。我叩壁，仲直沒有回應。詢問馬尼諾，馬尼諾說他被打昏了，同時不停地搖頭。我再懇切地請問，馬尼諾才說今天新保又喝醉了，把仲直提上樓去，要仲直脫去褲子，新保說要看看他是不是男人，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仲直隨手拿起一隻酒瓶擊向新保，但新保是會柔道的，回手一拳反將仲直打倒，復又用木棒在仲直的頭上身上亂打一陣。新保的胸部受傷不輕，仲直卻被打昏了！就是這樣、這樣……

十二日一整天，我設法與仲直聯絡，可是他一直昏迷未醒。我在猜疑，我在恐懼，我在痛恨。為了方儀和仲直的關係，新保曾兩次問我。在明德里的戶口上，記載他倆是夫婦，我們只承認是同志和同學。新保說他調查明德里的四鄰，他們都說他倆是夫婦而我是方儀的哥哥。當然我這個哥哥新保相信是假的，但對方儀和仲直的夫婦關係也是假的，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他還說即使夫婦的名義是假的，但青年男女同「居」一室而竟沒有夫婦之實，他是絕不相信。我告訴他，這種關係只是我們在工作需要上的一種掩護性的安排。我們同志就是同志，同學就是同學，絕不會發生不應有的關係。我們是民族志士，我們是革命者，我們有這種非常的操守非常的修持，我們有自我昇華的力量，因為我們有堅貞的意志，有崇高的理想。新保只是訕笑、搖頭，搖頭、訕笑！擠眉弄眼，狀極卑鄙！其實他出生於日本的窮鄉僻壤，只是憑藉日本軍閥的霸權，到「滿洲」來作威作福！像他這樣一個衣食不足、文化低落的島國之民，怎能了解聖人的境界？

十二日夜晚仲直還未醒轉。我用耳貼在牆壁上傾聽，只能聽到他呼吸短促，鼾聲凝重。以我的臨床經驗推斷，他必是第三度腦震盪，現在已引發墜積性肺炎。我的心中充滿焦慮，思前想後，終夜未眠。天亮時候，離我們監房三百公尺處——大同廣場的東南方落下一顆炸彈，在人心惶惶之際，我設法報告負責人，由負責人向小西科長交涉，允將仲直送到五馬路長春施醫院療養。因為那裡是我們學校所屬一系列的醫療機構，醫師都是我們先後同學，必要時可以通知仲直的家，其他事也都會有人照顧。

據小西說，新保也因傷重住進「新京特別市立病院」。

隨後我們才聽說蘇俄已於八日對日本開戰，「北滿國境」已有數處被蘇俄軍突破，早晨的炸彈和這幾天的空襲都是由北方來的。「滿洲帝國政府」也將隨關東軍司令部遷往通化，因為那裡是山岳地帶，又靠近朝鮮，準備據險抵抗。至於如何處理我們，首警尚未決定……

這一天完全在謠言不安中渡過。

十四日清晨，命令來了，說是要把我們解往吉林，但火車汽車都沒有我們的份，命令我們先徒步走到吉林，然後再搭火車轉往通化。「首警」派三十名武裝看守押解我們，內中有三個日本人。起身、整理、吃早飯、站隊、點名，都極迫促。每個人又被銬上手銬，手銬和手銬間又串上鐵鍊，結成兩行隊伍的一字長龍。出發前，負責人得機和我打個照面，叫我通知大家儘量少拿東西，但我無法自己將此命令轉達，只有傳球似地一個個回頭祕告。我們這邊的隊伍走在前頭，圈樓那邊的跟在

中間，女同志們拉在最後。隊伍曳得很長，我回頭看了幾次，都不見方儀何在，也沒有看見詩彥。我想，方儀當然在隊伍裡，詩彥也許並未被捕。

催促、命令，說快也快不起來。人數多，而每個人三個月都沒走過一百步，忽然走起路來，兩腳已不適用，平平的馬路，卻都一跛一拐地。通過市區時已日上三竿，市民奔走相告，一時萬人空巷，都跑到馬路兩旁來爭看「革命黨」。人叢中有位婦人在喊叫，原來是歐凱太太要送他一個衣服包，隨隊的看守卻不許她接近。另外，我又發現羅雷在人群後面躲躲閃閃地向前奔走，我，也未敢對他呼喚。

我們的隊伍走畢大同大街，穿經長春大馬路，越過東大橋，沿著二道河子的省道向吉林方面行進。行過宜民學校門前，我不自主地向裡面張望，門前立著稀疏幾個人，沒有一張熟面孔，這段路已屬郊區，看「熱鬧」的人已經不多了……

又向前行幾十分鐘，路旁全是高粱地，風吹禾葉，呼呼有聲。有人走不動了，要求休息休息；有人告訴大家趕快走，越快越好。我們正莫知所從，忽然由後面追上來一列馬隊，幾匹馬飛快地奔向排頭，其中一人竟是心竹。

另外幾匹馬勒住繩韁，圍住我們兩旁。突然槍聲連響，有人高呼：「臥倒！臥倒！」正遲疑間，中國看守把我們每個人的手銬打開，幾乎是同時，原站在我身旁的那位日本看守已被中國看守抱住，繳去他的手槍，雙手反扣，加上手銬。驚愕中，另一位看守遞給我一支手槍，告訴我：「這個小子

壞透了，必須處決。由你們自己辦吧！」說罷掉頭走了。曹大麻子卻站在那裡痴痴地發楞！

烈日正懸當空，曠野一片沉寂……

原來負責人在監中傳諭大家要鍛鍊身體時時準備時，他已與獄外同志羅雷、心竹取得祕密聯絡，並正陷於困難的決策中。因為羅雷、心竹、公謀等人，該時已與吉林軍方同志會合，吉林軍區有一團偽軍擬立時起義，偽長春陸軍軍官學校學員總隊，有二中隊軍官候補生可以拉出來武裝劫獄。他們要求負責人出獄領導偽軍及偽軍校學生，即行展開游擊戰。羅雷就在長春潛伏，等候負責人的決定。軍方的意見，只劫救負責人一人可保證成功，如全體劫救，因人數眾多，同志中且有老弱婦孺病患，在時間上行動上都有問題，恐不能順利，也難免傷亡。負責人又顧慮劫救他一人出獄後，其餘一百二十位獄中同志必將遭受報復性的屠殺。最後決定軍方同志暫緩舉事，俟較佳時機再行劫獄。這時各地未被波及的同志，已重新整備組織，紛紛活動，都積極部署軍事行動。長春同志亦有一部分恢復工作。敵偽雖仍有維持治安能力，但憲警特務均在獄中全力審訊，已無暇顧及獄外。與羅雷祕密聯絡之李東復，是首警資深之「滿系」特務，他是關東州人，自幼即在日本學校讀書，頗得小西科長信任。由他擔任審訊負責人的翻譯，經兩月以上與負責人接觸，深受感召，自告奮勇為負責人通風報信，負責人對之亦深信不疑，才得與獄外聯繫。

後來，羅雷聞將起解，經再與負責人約好，決定在去吉林途中由軍方同志將我們劫救即行轉赴山區。這時那批隊伍還在二十里外的高粱地裡埋伏，但在長春市內暗中保護我們的同志，於我們離

開首警不久，又聽到日本國內有宣佈投降的消息，而首警的日系特務們忽又有人主張將我們追回即時處決，所以心竹會同公謀率領軍校同志騎馬追來，提前解救。

曠野的大馬路上停了我們這一堆人，有的仍在臥倒，有的茫然佇立。跑在前頭的武裝同志回過馬來圍著負責人說話，留在隊後的武裝同志則進入備戰狀態，以監視後方有否敵人追來。隊前隊後兩名日本看守已被當時解決了，多數的中國看守也早由李東復關照，但他們沒有勇氣繼續保護我們，只把我們的手銬去掉，又把他們的武器扔給我們，便各顧各地自行散去了。

「紀剛！你還不解決這個？」有人喊著。

我才想起身邊這個日本看守。我舉起手槍對準他的前胸，他那驚慌哭喪的臉孔，使我不忍卒睹。我命令他轉過身去，用槍嘴頂著他的脊背，手指卻扣不動扳機；長這麼大，我還沒殺過人呢……我請歐凱幫忙將他牽向右面的高粱地。我想，到高粱地裡我可以閉著眼睛開槍，打不準他也不會傷了別人。走時，那個日本人苦苦向歐凱哀求。

「紀剛兄，」歐凱對我說：「這個傢伙說他是朝鮮人！」

「是嗎？你再問清楚！」

歐凱又和他談了一陣：「他說的情形很像，聽他的口音倒真是朝鮮日語。」

「那麼，」我說：「把他推倒在高粱地裡，用東西塞上他的口，再把他的兩腿綁住！」

我用手槍在旁監視，怕他對歐凱反抗。歐凱照著我的話做了，然後兩手搓著泥，問：「還怎麼

辦？」

「我們走吧！」我說，同時把手槍垂下。「我們不斃他，生死看他的造化！」

我在想，壞人總沾好人光。在錦州那個朝鮮警察放過我，今天我也放過他。歐凱不明原因，我也沒有向他解釋。

回到馬路上，負責人正坐上一輛馬車，心竹和我招一下手，便同另幾個武裝同志又跨上馬向吉林方面馳去，竟沒有時間同我說句話。馬路上的同志們已三三五五地向四面八方散去。負責人招呼我讓我趕快上車，羅雷忽然跑上來問：「仲直呢？」我告訴他：「長春施醫院。快去找方儀，帶方儀一起去！」匆迫得我也沒有向他講明仲直住院的緣由。

回到市內由心竹及軍方同志預先安排的二道街一所住宅的大院子，負責人即隨公謀同志到軍校去了，留下我在此守候，並以此處為暫時聯絡中心。有很多同志也陸續集中於此；有的守住短波收音機收聽國內新聞，編印《新聞快報》；有的趕製國旗；有的忙碌著寫標語、印傳單；有的同志到街上冒險去貼。不久又來了幾位武裝同志換上便衣在門前警衛，有的我曾見過，但一時也叫不清他們的名字，有的連我也不認識。

這個下午在謠言與不安中，過得很慢。我曾到街上察看，街上一隊隊垂頭喪氣無精打采的關東軍，由北方西方撤下來，再向南方東方開出去。市內處處有散亂的槍響，南嶺方面時時有隆隆的砲聲。有人說偽滿軍已與過路的關東軍開了火。高空中偶然也有長頸烏鴉式的蘇俄飛機盤旋而去……

忽然有人來說首警的日本特務搭乘三輛汽車前來追殺我們，我們立即準備應戰，又有人來報說那些特務們轉過二馬路，向伊通方面逃跑了。

夜裡，負責人曾回來一次，顯得特別疲倦，小睡片刻又被人請出去了。每次來回，就多了幾名武裝同志隨來護衛。他沒有時間和我多說話，我只知道他指導軍方同志推舉曾任偽滿憲兵中將司令的劉尚華為東北光復軍長春地區司令，與關東軍留駐長春部隊交涉，要求日本軍民集中南嶺，投降繳械，並要求日本人退出各機關，組織治安維持會接收，以維持地方治安，且對俄軍即將抵長春，形成有利態勢，以便準備交涉。日軍方面只答應向南嶺集中，拒絕投降繳械，亦拒絕接收各機關。雙方乃列陣對峙，並有局部衝突。這時，收音機裡卻播放著下面的通告：「各位聽眾注意！明日中午十二時正，日本天皇將有重要消息發表，請到時注意收聽！」

這條通告反覆地播放著。聽呼號，是「新京放送局」發出的，其餘的時間就是音樂音樂，討厭的音樂，不合時宜的音樂。想聽時局和戰局的消息，一點也沒有，但卻時時轉播關東軍司令部自通化發出的呼籲，要求大家本「日滿」一德一心的精神，奮起作戰，抵抗蘇俄自北方來的侵略。國內電臺的短波新聞，對俄軍的進兵東北和關東軍仍在呼籲作戰，卻沒有一字報導。

馬路消息倒比電臺又快又多，街上盛傳日本投降是請託蘇俄轉達美英，但蘇俄卻乘機對日宣戰，進兵東北及朝鮮，以圖坐收漁利。有人說俄軍分三路進兵東北，關東軍戰意全失潰不成軍。有人說天皇廣播是正式宣佈投降，勸告各戰場日軍放下武器，但日本軍人可能發動政變，繼續作戰。在東

北，最令人擔心的還是關東軍的動態，成立滿洲國就是關東軍導演的把戲，若關東軍要繼續作戰，天皇的大命也莫可奈何。於是整個長春市民，都陷入極端矛盾的情緒中，他們不願憂愁，卻不敢為即將實現的希望提早快樂。

十五日中午，重要消息準時播出，正是日本天皇的投降文告。他在投降詔書裡要求他的全國臣民和前線將士，放下武器，接受一切即將來臨的命運。最後兩句：「以不能忍者，忍之！以不能堪者，堪之」聲調瘖啞，語意悽涼。我和幾位坐在收音機旁的同志們，都不約而同地跟著落淚！敵人投降，東北同胞重獲自由，我們這些死囚得慶生還，我們血淚交織的地下工作從此結束，這該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刻，不知為什麼，我們反而流淚，流淚……

接著又播出了「滿洲國皇帝」溥儀的詔書，由偽國務總理張景惠代讀，老豆腐匠的聲音有氣無力地。內容極為簡短，意思是：「朕與日本天皇精神如一體」，不忍見「爾眾庶」再受戰亂之苦，所以自即日起宣佈「退位」！

這個可憐的「皇帝」，真是傀儡做到底，到今天不幹了，仍不能有自由意志，還要說與日本天皇精神如一體。

我淚，不流了，卻突感空虛，莫名的空虛，空虛得連夢都不如。東北同胞十四年的受奴隸受壓迫，十四年的血淚生活，就這樣地結束了，無聲無息地結束了；一瞬間，好像沒有什麼改變地結束了，結束得不像事實……

這時院外鞭炮聲、歡呼聲，響徹雲霄。滿街懸掛國旗，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出現在千萬人的面前，飄揚在東北天空，偏偏也有許多同胞對著國旗流淚，我知道他們的淚與我的不同，他們是真正地喜極而泣啊！

「紀剛！走！」羅雷匆匆走進來，神色凝重地叫我。

「什麼事？」我不知那方面又生意外。

「出門再說，帶著傢伙！」完全是命令。

我起身隨他出門，摸摸腰間，那傢伙根本並未離身。我再追問：「什麼事嘛？」

「跟我走！」

「我在等負責人！」

「負責人！負責人！」羅雷激恚地：「這是什麼時候；人都死了！你還等負責人！」

「你說誰？」

「仲直嘛，除了仲直，還有誰？」

真是，除了仲直還有誰，不怪羅雷發怨氣。我不再說話，咬緊下唇跟著他走。可是越走路線越不對。

「羅雷，你向哪裡去？」我忍不住沉默：「這樣走去，根本到不了長春施醫院。」

「我們先找新保算帳；公仇公報，私恨私了！」

「就你我兩個人？不妥吧！」

「你若怕死，別跟我走。」

「新京特別市立病院」的招牌仍在那裡掛著，門診部裡只有一排排的候診椅在那裡空擺著，好像今天沒有人再生病的樣子。我們直到住院處查找新保的床位。羅雷亮出傢伙，那個日本小姐嚇得直打哆嗦，急急翻閱住院傷患登記表，越著急害怕越是查不到。我們帶個事務員穿越走廊向外科病棟奔去。走廊上遇到許多「日系」人士，都遠遠地肅立在路旁向我們行九十五度的最敬禮。看到曾經站在你頭上對你濫施殘暴的人，自動向你低頭的可憐相，比你自己做階下囚時的滋味，更覺難以忍受。

電梯停電，我們爬上「五階」，事務員對看護長說明我們的目的。羅雷把守在病房門口，看護長命令傷患各歸各床，就是新保那張床空著，看護長說方才還在嘛，可是人呢？羅雷叫我按床依次檢查，一個個病患恐懼的面孔，沒有一張是新保。這時忽然有人在天井中喊叫：「有人跳樓，有人跳樓了！」我們連忙走到陽臺上向下觀望，那躺在地下的病衣號碼正是新保的床位。我們又急急衝下五樓，奔到天井裡，圍在那裡看「熱鬧」的病患們都趕緊閃開。

「是他嗎？」羅雷問。

我仔細瞧瞧，正是新保。口角流著鮮血，臉上仍滿佈著猙獰的訕笑。是笑我們來遲一步呢？還是笑他自己家國的命運？

「是不是？」

「是的！」我說。

「我們回去！」

方儀正在我們上兩班同學楊大姐的宿舍裡哭泣。楊大姐畢業後即來長春施醫院工作，這兩天仲直的「病」就是她醫治的。許多事她並不知道。她正勸方儀說：「死的死了，沒有辦法；好在東北光復了，你們的目的已經達到，大家應該快樂！」這時別的同學聽說我到，都聞訊趕來，我還來不及悲死樂生，以及對那些關心的同學們寒暄致意，一位同志奉負責人命令來，找我立時回去，我真不知何去何從，無論如何我要到太平間去看仲直最後一眼。楊大姐又隨後趕來告訴我：「方儀的精神不好，你們要留心！」

我急忙跑到太平間。仲直的面孔是那樣安詳平和，痛苦與歡樂均已離他遠去。我真的只看了仲直一眼，又急急回去見方儀。她正泣不成聲，沒有抬頭，我拍著她的肩，只說一句話：「方儀，你要剛強！」就匆匆走出。

在門前，我對羅雷說：

「我先去見負責人，這邊的事，死的活的都交給你啦！」

「你只知道負責人，」羅雷像個仇人似的對我吼道：「你就不是人！」

我不是人？羅雷這樣罵了我！我到底是人不是人，我自己也很懷疑。這兩天變化太大，我已不

能適應。敵人宣佈投降，我陪著收音機落淚；我的同志死了，我們覺覺團的兄弟死了，我們同讀書、同工作、同受難的好友死了，我竟沒有哭，而且沒有想到哭。我木然，我茫然，我不知所以然。我跟羅雷去找新保，我卻沒有想到報仇。我來到這朋友死難的地方，我卻不知道如何悲傷。一聽到負責人的呼喚，竟匆促離開現場。我，我也許欲哭無淚；我也許真是鐵石心腸；我，我也許是高速冷凍下的冰人，雖然生機尚存，可是喪失了一切心智……

26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那是一個偉大而悲慘的時代！那是一個用生命寫歷史、用血寫詩的時代！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工作？那是一種偉大而悲慘的工作！那是一種以生命和血所堆砌的工作！那是一種事實上確已存在而令人懷疑它是否曾經存在過的工作！

那種工作中有愛情嗎？那種工作有愛情也得要拋棄！那種工作有愛情也不敢希冀有幸福！但卻誕生了其他時代所未能誕生的人間最聖潔的愛情！

那個時代，我們都自然而然地，拋棄一切地，做了那種工作。根本就未曾考慮過他人是否理解，是否懷疑。待痛定思痛時，也只是我們自己無言的悲痛，更從未希望任何人來分享。

負責人叫我回去，我就回去。離開了屍身未寒的仲直，離開了悲痛欲絕的方儀，也不管羅雷對我的詛咒是出於激忿還是惡意。負責人找，就是組織的呼喚，就是工作的需要，在這個混亂的局勢下，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間中，我只有應聲報到。當我快步走回我們臨時辦公場所時，還沒有看到負責人，便有十多個人湧上前來，齊聲問道：

「紀剛，你出獄了，你好吧！我們等你老半天，現在局勢怎樣了？我們未見過負責人，也不認識其他同志，快領我們去見負責人，我們要報告和請示工作。」

這些同志都是由各縣市來的，他們冒險奔來，他們興奮起勁，使我忽然領悟到我還沒有想做逃兵，就是想逃，我的伙伴也必將我捉回；我還沒有想去休息，就是真想休息，我的同志也不會讓我休息。疲勞衰弱的負責人，我想，他更應該休息一段時間，可是，就在十五日的下午，他召集同志說：「我深知大家為著艱苦緊張的地下工作，太辛勞了，尤其是剛出獄的同志們，更應該有一段時間的休養。我也與大家一樣。但情勢迫人，欲罷不能，在政府接收尚未到來前的這段空檔時間，我們無法放下手，惟有接受更為忙碌的工作。我們地下工作的目的是打倒日本，收復東北。現在日本投降了，但東北光復還只是一句話，這一句話是否成為事實，是否為新的內憂外患所阻撓，尚未可知，也可以說我們的目的還沒有真正達成。所以這最後的一段路，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不把它走完。過去做地下工作都是大家自動自願，今天公開工作我更不能勉強要求，但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心願有個了結，對工作有個善後，對死難的同志有個交代！」

十六日清晨，我們遷入一棟大樓，公開掛出我們機關的招牌，四層樓頂懸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及青天白日黨旗。八月溽暑的天空已逐漸爽朗，這兩面美麗鮮明的旗幟立時燃引起同胞積壓多年的熱情與追求新生的方向。人人以我們的機關為重睹祖國的象徵。他們來探聽他們所急欲知曉的各種消息，他們來領取他們多年未得閱讀的主義書刊。他們也由衷地帶來他們熱誠的禮物，慰問我們

這些為國家民族曾經受過苦難的同志。我們也就以維持治安，收撫民心，擴大主義宣傳，把握民眾武力，保護國家資源，協助政府接收等六項為工作重點，積極工作。

我們指導偽滿時期有資望的中國官吏，和地方各界紳商，即時成立治安維持委員會，以臨時接替政府職責，維持地方治安。這時等待受降的日軍雖仍不願接受我們繳械，但已不再衝突，各機關的日本人亦均退出或不再管事。維持會組織極為順利，且亦達成保持社會秩序與安寧。

我們成立宣撫委員會，以宣撫偽軍並領導民眾武力。這些武裝力量必須把握及領導，以積極使其為協助政府之武力，消極防範它為禍亂之源。

我們設置復員設計委員會，網羅原任職偽滿各部會的高級中國官員及專門技術人才，從事編製全東北的經濟、金融、產業、工礦、交通、郵電、文化、教育、科學研究等各種接收資料，並督促原在各機關任職的中國職員負保管之責，以為政府接收之助。這些工作，在短短的兩三週內都已完成。

至於領導民眾團體，以及組織、宣傳、訓練等工作，都是我們的本務，不待記述。

我們曾出動幾十位同志在街頭教唱國歌，這些同志們最感到輕鬆愉快，年輕的一學即會，年長的根本未曾忘記，一唱百和，馬路上，庭院裡，處處響起嘹亮的歌聲！

傳單標語，三民主義小冊子，一批批地趕印出，一批批地被搶光。同胞們爭著閱讀，看過後爭著收藏和傳閱。沒有一面國旗，沒有一張標語被撕裂或被丟棄在街頭上，像敵偽時期被強迫參加各

種「慶祝」遊行時所常見的那樣。

同胞們已完全自噩夢中走出，開始用真實的感覺想到歡樂，想到痛苦，想到未來的希望，想到過去的恥辱，也有人想到寃仇與報復……

爆竹和煙火自國旗飄揚那一刻起便不停地被人燃放，一片新年的氣象，偶爾仍間雜著時時可聞的槍聲……

在興安大街寶山百貨店轉角處，有一名中國小孩，小手舉著國旗對附近的日本居民搖動，口中咿呀地喊：「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他搖著叫著，竟激怒了由羞變惱的日本浪人，兇狠地用拳打了他。有人說：「打死人了！」消息頻傳引起眾怒，於是有人開始在街頭毆打日本人，用磚頭石塊打，用日用鐵器打，用敵偽時期奴役民眾組織的「義勇奉公隊」的木棒打，打死了，打傷了，打得中國人區的街頭上已見不到日本人行走，也有少數忿怒的民眾三五成群地打到那些孤居散處的日本人的住宅……

三道街口派出所裡，有個精神失常的日本警尉，忽然跑到派出所的樓頂上用機槍向馬路街心掃射，有人中彈傷亡，行人被迫在各街口躲避，不敢冒險前進。一位軍方同志路過，不得已自後面商店的房脊爬過去，用手榴彈將那個瘋漢消滅，才恢復了那裡的交通……

電車站有個迷路的日本小孩在哭泣，他的父母不敢出來尋找，一位好心的同志把他護送回家，他的父母就跪在榻榻米上不住地叩頭……

長春原是偽滿的首都，大同大街、興亞大路……國務院、偽皇宮、滿炭大樓、關東軍部……幾天前還是敵偽飛揚跋扈、兇殘肆虐的神經中樞，現在已成為最無作用的軀殼。高級的統治人員飛走了，剩下的中下級公務員，日本人都躲避到南嶺區的「居留民會」，中國人則紛紛各自還鄉，每個機關都像是散了戲的劇院，空下來的大樓都像是失掉生命而仍在那裡僵立的巨獸，顯得空寂荒涼……

北大街、二馬路、東大橋等處中國人集居的舊市區，對照之下則特別顯出繁華。大商店都沒有開門做買賣，事實上開了門也無人去購買；「光復了，買那些東西做啥？」可是賣醬肉白飯血腸的小飯館、餃子餡餅包子舖，卻忽然如從天而降似的比肩林立起來，不拘什麼時候，都流動著大吃大嚼的人群。這些東西以前都是統制品；許多年未曾入口的美味，現在可以自由吃吃喝喝了。未住過小監獄的同胞，在大監獄裡同樣患著營養不良和飲食飢渴症；又像在這個時候，只有吃吃喝喝才能充實，才能醫治失神混亂空虛的心靈……

忽有一群學生、公務員、換了便衣的警察、商人、苦力、大膽的婦女、跟著亂跑的野孩子們，風起雲湧般地奔向火車站去，說是歡迎中央軍，結果什麼也沒有。火車仍在鐵軌上停著，車中滿裝了逃難還鄉的旅客，沒有票也沒有座位。已經擠上車廂的人群聽見有人叫喊中央軍，也跑著擠下車來觀看，可是再也擠不回車廂去，勉強擠上了，也再找不回已經搶佔過的座位。好在光復了，沒有人再對這樣的小事計較。

忽然又有人群奔往飛機場，說是迎接空降的政府大員，同樣也是白跑一趟。

又有人說這次可是真來了！大家又往火車站湧，又往飛機場跑，一天裡幾次幾次地……一隊向某處集中的日軍由郊外經過，有人猜說不聽日皇命令的關東軍又來反撲長春了，於是馬路上的人群又都跑回家裡去，關門閉戶，街頭突然又呈真空……

謠言像風、像瘟疫、像海潮，退去一個又來一個，都是不脛而走，撲朔迷離。什麼原子彈、蘇俄軍、中央接收大員，交流在人與人的口耳之間……

流彈越來越多了。街頭上常常發現無名的屍體，沒有人認領，沒有人掩埋，不久也就自然地沒有了……

在這六神無主的時間裡，在這百萬市民突發寒熱的情況下，我們無形中成為一種安定的中心。更有趣的是幾天以前我們還在計劃發動民眾對敵作戰，現在又本著中央以德報怨的意旨，勸導我們的同胞，保護日本僑民。但這時群眾的心理有如頻起風暴的海洋，我們彷彿是一葉在狂瀾中航行的小舟，想把我們的同胞渡到平安的彼岸，可是波濤洶湧，濁浪排空，我們自己也幾乎掌握不住我們自己的舵盤。

負責人指示工作時雖然依舊是那般詳細堅定，但在考慮決策時，我開始注意到他眉宇間顯露出猶豫與躊躇。第一使他憂慮的，也是我們大家所共同憂慮的是蘇軍進駐問題。蘇聯對日宣戰只六七天，日本即投降了，現在戰事已停，但據報蘇軍於我東北境內仍繼續推進。其將長駐抑或短駐？東北是否再將淪亡於蘇？蘇聯與中共向為一體，蘇軍來了，中共自然也要來了，那東北未來又將成何

局面？另一方面，中俄同是對日作戰的盟軍，俄軍為盟軍，對此盟軍到來，我們將以何種態度交涉應付？這都是特別重大的。其次他顧慮國內的事而非當時同志所能理解的，就是國內黨政軍的體制。在中央固然能做到所謂「三位一體」，在地方則常是各行其是，能夠互不摩擦，互不衝突就是最好的了，但也各有各的任務和業務，豈可越俎代庖？若在承平時期，我們可以不管軍政的事，但目前東北是非常地區非常時期，我們不能不宣撫偽軍把握民眾武力，可是未來軍方能否容納？我們不能不保管國家物資，協助復員，而政方能否接受？在在均使人有進退兩難之感。負責人曾感嘆的說，二十七年他去後方曾對中央建議東北地下工作為非常時期非常性質的工作，必須是一個黨政軍統一的機構，有執行黨政軍三方面的職權。中央雖亦有人了解，但認為茲事體大，東北尚未至發動軍事時期，遂拖延下來。現在，這個時期突然來臨，我們均認為我們雖未兼有軍政職權，但這是國家的事，在軍政機構未到達前我們不能不管，我們不管，地方同胞也要我們管。而各地來長春報告工作的同志，也帶來更多不幸的消息，所以為了我們過去工作的責任，為了東北的前途，為了整個國家民族，我們乃以背十字架的心情繼續工作下去，待政府接收人員來到時再行善後。

照理說住獄同志們，時間長者多達三五年，時間短者亦均三五月，更有少數在十年左右者。長時住獄者健康均不良好，短期者刑傷尚未痊癒，出獄後惟一要務都是營養與休息，營養與休息。但這個時候，縱然沒有負責人那段談話，又誰敢享受這種福氣？又誰肯享受這種福氣？雖然敵偽組織「日滿一體」地倒下，我們自己的政府還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我們同胞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還

沒有確切的保障。我們這一群，儘管都已遍體鱗傷，疲憊不堪，但為了這歷史空檔的一段時空的責任與義務，仍本著地下時期的精神，日以繼夜地工作，緊張嚴肅地工作，怕的是如此勝利的果實遭受劫掠，怕的是如此可愛的家鄉再度淪亡。

在局勢的混亂，工作的壓迫和情感的煎熬中，我們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我已不能完全記憶，但有一件事我必須在此特書，那便是在三日內我們派出五百多位青年同志到東北各縣市。這時各縣市的當地同志，有的已設立機關而尚不知工作重點，有的因在等待長春的指示還未設立機關。所以派他們回去，一方慰勞各地同志，一方加強各縣市的工作，以求工作一貫，步伐齊一。負責人對大家說：「革命工作就是民眾工作，革命要建立於社會上，要植根於民眾中。我們要使各縣市乃至各鄉鎮的同胞，人人都能接觸到國民革命的洗禮，人人都能聽到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的福音。」

幹部之中奉命起身的，有原負督導責任的，仍回各自督導區分頭督導，我自己則擬趕赴龍江，主持黑省工作。羅雷於十七日中午才來報到，負責人要他立即返回瀋陽。他又轉到我的房間，跟我說：

「大哥，你叫我辦的事，我都辦了。我自己的事也請你替我擔當，將來負責人追問的時候，希望你不要幫同罵我！」

「什麼事？」我問。

「仲直的事嘛！昨天我們已將他的靈柩送到紫竹林去浮厝。他家不信基督教，而且我想活時不

能回家，死時也要回家。將來局勢平定我們再設法移靈，無論如何，我們要把仲直運回瀋陽，葬在他的家墳——」

「這個，我知道，」我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我和仲直在獄中時有次閒談，他說他希望死時能死得明明白白，誰知他仍然死得胡胡塗塗。自新保把他打昏時，他就是嚴重的腦震盪，一直到死也未再清醒。甚至他死的那天就是日本投降日，就連這點令人安慰的消息，他都未能聽到，所以我們不能再見他葬身異地作他鄉孤鬼。我方才問你是指你自己的事，你有什麼事會遭負責人的責罵？」

「很簡單，」羅雷說：「負責人的命令，我再聽從這一次，到瀋陽後，我把這次任務交代完畢就想不幹了。跟從負責人出生入死這些年，好歹我仍願意落個善罷甘休，我不願意到最後還惹他的責罵。」

「不幹了？為什麼？你詳細說說！」

「第一、當初參加工作的時候，是為的打倒日本，現在日本倒了，我的抗戰義務完成。第二、我大學還沒有畢業，我要趕緊回校讀書。第三……不說也罷！」

「是為了姚蕙？」

「誰像你，總把女孩子和公事扯在一起！」

「不然，為什麼？」

「這要談到我在後方受訓時的感想。在西安時我遇到了我的姑父，他給我講了許多黨政內幕，根本就不同意我再回來。那時，我們的理念是現地抗戰，我當然要回來，你們都在幹，我不能不幹……」

「以前仲直和我說過，我了解——」

「嗯，那嘛，現在是勝利了，今後的工作是屬於黨政活動，對於這個我沒有興趣。當然我現在退出，會有人說我不革命了，但我早就下定決心，早退晚退早晚必退，晚退就不如早退，以免自誤誤人。假如我做對了，我就無愧於覺覺團三個字；假如我做錯了，就等於我跟仲直一道去了，對組織也無何損失。地下時期工作的人少，個個都屬需要，現在敢幹肯幹的人多，再多我一個也不顯大作用。何況總理說過『革命必先革心』，不能革心，做黨務也不是革命，能革心做那行都能救國建國。據我在後方的觀感，要救中國須從社會根本上著手，若不能與社會民眾相結合，什麼黨啦、政啦、軍啦，最後都是枉然！對不起大哥，別笑我班門弄斧。」

「我們不談這些，」我說。「方儀呢？」

「她也同意跟我回去。她雖然學科畢業，但還須補一年臨床實習。而且依我想，谷音也在瀋陽，對她精神的恢復會有些幫助。只是現在交通不方便，路上怕要冒些危險。」

「冒險也一起去吧！跟別人走我更不放心。對於她，越早離開長春越好，她若能振作精神回到學校去是最好。我希望她能把這一段工作和這一段生活完全忘掉。唉！她的遭遇和仲直的死，將是

我們覺覺團的永生遺憾！」

「廢話少說，大哥，你對我有什麼話講？」

「你的決定，我當然同意，負責人也不會責怪你。記得地下時期負責人就曾對我說過，一旦東北光復，他將使失學的同志都能有機會復學、入學，這是他對大家惟一的精神慰勞。他也說過，勝利後是建設時期，沒有學問技能怎能談建設。不過，我倆是擔任督導工作的，你督導過的各縣市組織，必須由你整理交代，於公於私，你不能扔下就走。」

「我能那樣做嗎？」

「那就好！別的話也不用我說。不過見著你母親和姚蕙，請代我致意。二年了，真不知老人家想你想成個什麼樣子。」

「那我替母親先謝謝了。回到醫院，我想我能見到宛如，宛如那裡你要不要帶個特別消息？或者你給她寫幾個字，也許更好一些——」

「不必了！」我說：「如果見面，可以給我先做個普通問候。」

「普通問候？」

「是的，別的不必多說，有些事你還不太知道。」

下午，羅雷他們就整裝就道了。這時車次不準，何時有車來，何時有車開，都不能事先預定。對於那種等與擠的車站現象，令人無法想像。旅客們也都是有車時固然乘車，無車的地方還要步行。

好在除了羅雷與方儀外，還有幾位派赴遼南方面的同志同行，自然都有照應，無須我再分心。羅雷走後，卻把我的問題勾起，那是屬於感情方面的。

我的感情原是我自己的祕密。地下時期，仲直多少與聞一點，仲直死了，這些問題又歸於我自己。這兩天來，我似乎時常想起這個問題，我不記得是我自己到宜民學校去打聽，還是宜民同志來聯絡工作時順便提起的，得知學校現正放假，詩彥並未被捕，且已提前返回泰城了。人生的遇合真是不可思議，本可輕易聚會的人，結果又不得立時相晤。至於宛如，假若我回瀋陽，我定會先去看她，對於她的近況有正面了解後，我才能表示我的心意。目下，我只能讓羅雷給我做個普通問候，不然，讓我帶給她一個什麼消息好呢！恰巧當晚心竹也從吉林回來，吉長地區的軍事工作他已交代公謀等軍方同志處理，他和他哥哥一起要回遼南。心超的目的是去鞍山保管鞍山製鋼所，心竹則擬參加遼陽的地方工作。心竹這時正燃起工作的熱情，對負責人的任何決定均無異議。

這一晚，我們就睡在一間宿舍裡。我們那能睡得著，心竹很高興地談論他五三三以後這段時間的軍事活動，我卻無心告訴他我們在獄中的種種經過。

「心竹，」我說：「我們先放下公事，談談私事，談談我們個人感情上的事。地下時期我們常考慮到死，所以對這種事不願多談論，現在既然勝利光復，這種事也不容我們再漠視馬虎。」

「你又想談女孩子的事，好吧！談吧！」

「第一，關於李伯所提的事，你現在是什麼態度？」

「我已經跟你說過，小敏也好，小靜也好，我只把她們當做妹妹，婚姻是談不到的。」

「那麼就剩下宛如和詩彥了。以前因為工作關係，大家都認為宛如的個性很不適宜，現在情況已變，大家也不妨都重新考慮。自然聽說宛如年來有許多人在追，不過不管什麼人追她，我想，只要我們出場，我們總還有機會。至於詩彥，她本來是在長春，現在聽說已回泰城。不論她們的情況若何，我倆總要先做我們的決定；」於是我下結論地問：「在詩彥和宛如中間，現在，你想要追哪一個？」

「我要詩彥！」心竹毫不猶豫的說。

「你不喜歡宛如嗎？」

「你喜歡她，由你喜歡去吧！」

「既然如此，」我就說：「明天你不必和心超兄同回遼南，乾脆跟我去龍江。這種事不能再蹉跎，再因循誤事就是我們自己的過錯了。到龍江後，我們儘早回泰城，只要詩彥與你雙方當事人同意，詩彥的父親，由我或仍請我叔叔去說，以前他就答應過的，一切應當無問題。你看好不好？」

心竹也完全同意。

我不知道心竹決定要詩彥要得那麼爽快是根據何種心理。是他真正愛詩彥呢？還是他以為我愛宛如而不肯奪愛呢？自然我也很愛宛如，我跟宛如有長時期的來往，這種關係是人人皆知的。許多人都以為我愛宛如，圈外人不說，圈裡人羅雷如此，仲直如此，心竹還曾當笑話似地公開說過「宛

如是紀剛的」！總之，或真或假，人們常把我與宛如連在一起。過去因有「工作」把我們深深隔開，宛如當時並不了解，但時過境遷，我相信宛如會把我原諒。至於詩彥，我們見面只有三五次，相處的時間甚短，但我們在感情上卻有一點深刻的記憶。這一點深刻的記憶是我與詩彥間純潔的祕密，因此別人不曾注意到我倆之間的關係，而最深刻最純潔的祕密，又是最不易令人忘懷的。

我曾再三地想，想把我跟詩彥這點純潔的祕密向心竹坦白，但他若真正熱愛詩彥呢？難道我要把我們問心無愧的行為，幻成他們愛情中的暗影？人生中有許多個人的記憶是無法攤開的，為了自己更為了別人，只能埋葬在肚子裡。當我決心就死而把詩彥向心竹誠心推愛的時候，我並沒有把這一點記憶說清，今天，還是繼續埋葬的好！

心竹當然會真正熱愛詩彥的。當他們初次會面，在醫師休息室為她小妹出院開歡送茶會時，心竹就說過他喜歡詩彥的性格，其後我又正式將她介紹將她交託，他們又有一段比我較長時間的接觸，他愛詩彥也是自然必然的。那，我怎能還有話說？心竹比較樸質爽朗，不像我這般多慮，我請他挑選他就挑選，沒有客氣客氣請我先擇定。假若他先讓我來選擇，我會選擇誰呢？我或許也先選擇詩彥，但當心竹已把詩彥挑定後，我又覺得我真正愛的，可能確是宛如。

我真慚愧，在方儀受辱，仲直殞命，在我的弟兄姊妹同學志友遭此人生鉅變之際，我竟有心談此問題，很有些不仁不義。事實上，也就是因此鉅變，使我更痛悟到生死莫測聚散無常，趁我與心竹相會之日，把這些關係從速理清，別再弄得四角空懸。

27

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上午，蘇俄紅軍進駐長春，我們的龍江之行，因之遲延。

俄軍是分五路來的。一路自西伯利亞經滿洲里、海拉爾、哈爾濱而南下；一路由蒙古通索倫、王爺廟、白城子而東來；另一路從沿海洲過綏芬河，攻略虎林、勃利、牡丹江而西進。之外，還有一部分直接越黑河取孫吳而南進及少數空降部隊。蘇俄東方軍區馬林諾夫斯基的總部暫駐哈埠，加爾羅夫少將擔任長春衛戍司令。當塗著紅星的巨型坦克在大馬路上爬過，市民們正以歡迎盟軍的熱情去歡呼吶喊時，兩旁行進的步兵即開始摘取歡迎者的手錶、鋼筆和一切飾物了。大家不明就裡，以為這些士兵們行為天真，有的市民還自動地把這些東西贈送給他們，做為友好的表示。第一批進城的隊伍，武器、服裝、行列，還都整齊可觀，其次一批說是由歐洲戰場調過來的，就完全不成個軍隊樣子，個個都像餓鬼，個個都沒人性……

負責人偕同翻譯人員親自到俄軍司令部會晤加爾羅夫少將，以我機關立場，致歡迎與慰勞之意，藉以探詢其任務與意圖。加也表示友好，他說他們是第一線部隊，他們的任務是繳械武裝，接受日軍投降，暫行軍管，維持地方治安，其他有關中國內政、黨派，和民間的事，他們都不過問。他表

示特別敬重我們敵後鬥爭工作，為了聯歡，還請負責人喝伏特加酒，共同為兩國的偉大領袖乾杯。負責人詢問他繳械武裝部隊的範圍，他表示除日軍外，偽滿部隊也要繳械。負責人說我們抗日組織也有民眾武力，他表示他們無法分別偽軍與抗日武裝。負責人與之爭辯，他最後表示讓步，但要抗日武裝撤離俄軍所進駐的城市，以免因誤會而生衝突。負責人歸來後，不得已通知軍方同志率隊撤離俄軍所到城市。這時所有偽軍均已為我改編為民眾武裝，未為俄軍繳械。維持會出面慰勞，俄軍也表示對維持會的承認。

八月裡爽朗的空氣突轉沉滯，沒有風也沒有雨，卻處處感到呼吸窒息。重慶對東北同胞的廣播只是說：「各安生業，靜待接收。」中共的「解放軍總部」卻從延安發出前進東北的行動命令。剛展眉歡笑的東北同胞，心中又升起無邊的陰霾。

俄軍的政工單位到了長春，格別烏人員和《真理報》記者帶來了中蘇友好條約。我們看到條約內容，群情大譁！那是什麼友好條約嘛？那簡直是新的不平等條約！那等於是戰敗國割地喪權的條約！根據此約所載，蘇俄已恢復一九〇四年以前帝俄對東北侵略所得的一切特權。什麼合「中東路」、「南滿路」之幹線而成的「中國長春鐵路」由中俄共營；什麼開闢大連為自由港；什麼以旅順港為兩國共同使用之海軍根據地等等，完全是對友邦侵略的「友好」。許多同志們拿著條約，全身發抖，滿面流淚。大家都不願信其為真，又不能認其為假。東北已受十四年淪亡之苦，我們這些年的犧牲奮鬥，就是怕東北不能完整收復；現在這數紙條約的協定，把我們想維護東北主權完整的理想

全撕毀了。

同胞們和我們有同樣的感覺，而且更加驚疑迷茫。因為車站前，馬路口，高大建築物的空壁上，忽然都立出列寧、史達林、莫洛托夫等等的巨幅半身肖像。戰勝紀念碑也迅即建造起來，碑的尖端頂著坦克車、飛機等等奇奇怪怪的東西。後來改稱為中山路、中山廣場的「大同大街」和「大同廣場」，這時也樹上了「史達林大街」、「史達林廣場」的標誌。所有懸掛國旗的樓頂，也都飄起印有黃色鐮刀和斧頭的紅布，處處都是紅、紅、紅，人們不在臂上紮著一個紅布條，就不能在街上走路。俄軍的姦淫、擄掠、破壞、燒殺也立即開始了，處處有槍聲有死亡，處處有流血有哭泣。同胞們開始感覺，感覺到好似第二個「九一八」再度降臨，只是膏藥型太陽旗，換上了更兇殘的東西。

敵偽倒閉，會社工廠解體。閒散、無工作、貪小便宜，多年受剝削壓迫的報復心理，加上俄軍有計劃的誘引，亂民行列爆發了。一群群的人流，由市街來，由郊區來，由附近鄉村來；年輕力壯的，老弱不堪的，瘋癲的婦女，不知死活的兒童；衝向工廠，衝向倉庫，衝向敵偽各機關會社的辦公廳舍；撿拾俄軍劫運剩下的大米、白麵、被服、布匹、紡織物、工業品、機械零件、五金、電線、門窗、桌椅……撿他們能拿得動的，撿他們所需要的，撿他們看著新奇好玩的，撿他們認為以後有用的。他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來來去去跟在俄軍後面，像是一堆堆的蒼蠅，在膿瘡滿身的乞丐周圍飛繞……

每當俄軍拆運一座工廠，洗劫一棟倉庫，我們的保管人員，沒有力量去制止，只有呆望的份；

我們的同志便冒著俄軍隨意槍殺的危險去偷偷拍攝照片。但當俄軍整批劫掠後，他們就招徠那些亂民去撿剩，《真理報》記者再公然在那裡拍活動電影，到了一個階段即向亂民開槍射擊，又使那些亂民驚慌四散……於是在《真理報》向世界宣傳的報導中，這些紅軍倒真成了保護中國物資的盟友英雄！

另一個地方，另一個工廠，再重新排演這種相同的鬧劇、醜劇……

俄軍對我東北工廠倉庫之搶劫拆運是部隊的集體行動，而對我同胞家屋的攪擾是個別的，三五成群的。同胞們基於自衛，都在自家的門窗上釘上鐵皮木板，巷子口堆上沙包或其他障礙物，完全是一種市街巷戰的景色；這種方法也能防止一點毛子兵的獸行。太陽還沒下山，街上就斷了行人，中午還在搖扇揮汗，入夜則噤若寒蟬。同胞們再度陷入更深的恐怖與不安。

重慶的廣播仍在說「各安生業，保護物資，靜待接收」；同胞們連自己的生命財產都保護不成了，而接收的人員卻不見蹤影！

我們再到俄軍司令部交涉，要求他們根據中蘇友好條約精神，制止這些不當行為。加爾羅夫司令很客氣，請我們會見參謀長；參謀長特別禮貌，帶我們去看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繃著臉讓我們到一間空屋子裡坐，然後他走了。一坐就是八小時，門前站著衛兵，政治委員卻未再露面。天黑後，衛兵端著輪盤槍鬨我們走，我們只好悶著一肚子氣回來。歐凱同志一面走一面感嘆地說：

「父抗日，子抗俄，百年大計！」

誠然，我們這一代的無能，將給下一代留下更多的血腥！

這種情勢，使我們了解對俄軍不能期望與信賴，為了國家民族，為了保衛鄉土，我們必須自己奮鬥。於是我與心竹乃不再等待，即時啟程。這時，鐵路運輸已完全被俄軍接管，火車在鐵軌上日夜不停地行駛，但不載旅客只做軍運。南來的車廂裝的是繼續進駐的俄軍，北往的則滿載著掠奪的工業機械、礦產、軍需品和民用物資。還鄉或出門的老百姓只能用燒酒肉腸，用各種引起興趣的東西向押車的毛子兵行賄，則可暫時爬到車頂上去，什麼時候又被攆下來，要看個人的運氣。開車停車的時間不定，停車的地點往往又在曠野，無疑的，那個附近必有一座正被拆解的工廠。

我們是乘火車頭後面那節煤車抵達哈爾濱的。往日六小時的車程，這次足足走了一天一宿，風吹煙嗆，煤灰抹臉，下車後我與心竹都成了黑鬼，衣服髒得和炭坑裡揹煤工人一樣，守站的俄軍以為我們是勞動同志，任由我們在車站內走動。我們見到站裡站外所有的客貨月臺以及附近路軌間的空隙，都堆滿了待運物資，準備再從新裝車轉運到西伯利亞去。由哈爾濱經滿洲里到西伯利亞這段鐵路，原屬帝俄經營的中東鐵路系統，與日本經營的南滿路的軌距不同，蘇俄把它「賣」給偽滿後，敵偽曾把它縮窄與南滿路軌距一致，關東軍在北進計劃中曾在「哈爾濱機車廠」製造寬軸的機車和車身，以便「征露」時進軍西伯利亞之用，現在正派上用場。俄軍一夜間又將此路改為寬軌，機車輪軸都同時放寬，滿載掠奪品的列車由此直通蘇俄腹地，蘇俄自己的貨車亦可直接駛抵哈埠。那些早年建造的不能放寬輪軸的車廂，都被推翻在沿線的鐵路兩旁，一個個像用過了的火柴盒或便當盒

子一樣……

哈爾濱的市情比車站的景象更是混亂複雜。

「中蘇友好協會」出現了！

「紅軍之友社」出現了！

「民主大同盟」出現了！

更奇怪的，詆譭政府、污蔑領袖的傳單標語也出現了！

建仁、彭飛等同志已在道外展開工作。哈市分道裡道外南崗等幾大部分。道裡多是日本人和白俄，道外則等於是中國人的商業區與住宅區。同志們見面都急於討論當前面臨的問題，沒有人談及「一二三〇」或「五二三」事件所身受的痛苦。我們原擬慰問蒙難傷殘同志或殉難同志的遺屬，當地同志認為這一件事已屬次要，最迫切的是政府的聲譽影響民心的向背。於是我們又到哈市俄軍司令部找喀茶科夫中將去交涉，恰巧碰到馬尼諾夫自長春出獄後即到這裡作聯絡官。交涉結果和長春的加爾羅夫少將所說一樣，而對我東北工廠物資的拆運則聲明是對日戰爭的戰利品。馬尼諾夫算是獄友，對我很親熱，還特別給我請發一紙護照，通令沿途紅軍保護放行。事實上這份護照遠不如一瓶伏特加有效，因為許多蘇軍士兵根本不認識俄國字，而且蘇軍士兵的個別行動也一向不理上級命令。不過，有些事俄軍倒也很有限度，除了「中蘇友好協會」、「紅軍之友社」，有格別烏人員參加工作外，對於我們的活動也未正面干涉。孰知這不干涉的理由，正是俄軍庇護中共方便行事的張本。

在哈停留一星期，我與心竹又繼續前行。我們原可搭濱洲線火車直去龍江，因想到交通如此不便，各縣市同志不易進省城聯絡，許多蒙難同志或病或殘，我總要親身見見才能安心，乃沿濱北線先上北安，再經齊北線折返齊市。沿途依次下車，經呼蘭、綏化、海倫、通北、克東、克山等八個縣市，抵達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市時，已是九月過半到了陰曆中秋了。

時間這東西善於開人玩笑！它可謂是一個妙術無窮的魔法大師，它能使美好的變為醜惡，使鐵血的果實化為煙雲，明明是一種失敗，情勢一變卻成了意外的光榮。在我們的體驗中，多少年來使人哀樂唏噓的工作際遇，星移斗轉後，從歷史的觀點瞭望，往往又使人啼笑皆非了。

五二三事件、三省黨部事件、一二三〇事件，以及若干次被檢舉案件，都是地下工作失敗的記錄。我們許多同志被捕了；有的同志在獄中用他們自己的手否定了他們可以活下去的生命；有的同志在酷刑苛杖下成為永世痼疾。假如時間拖長，我們也將一起被敵人絞殺。意外地，勝利突然降臨，我們這一段苦難的獄中之旅，卻成了別有意義的經歷。時間是如此巧合，幾乎使人相信「失敗」真是「成功」之母。有一段期間，「地下工作者」成了最漂亮的名詞。誰是地下工作者？住獄的！各縣市監獄門前，都曾有歡迎愛國志士出獄的盛大場面，那些未被捕的同志無法自己證明曾做過地下工作，惟有「住獄的」才是正牌的民族英雄！一路上，許多蒙難的同志對我說：「若不是我們由監獄中出來，不會獲得這樣高的信望，甚至無人相信我們的立場！」

按著東北舊制，黑龍江省會設在齊齊哈爾市，齊市的地理位置又在龍江縣境內。「滿洲國」劃省

時，龍江省會仍在齊市，北安設北安省，黑河設黑河省，佳木斯設三江省，王爺廟設興安總省，各以其地為省政中心。這些都是大黑龍江省原轄範圍，所以人們在習慣上對齊市仍以龍江稱之。當我們到達龍江的時候，齊市的同志們，各縣的同志們，地方父老各界領袖，都熱烈地來歡迎我們。我實在慚愧，我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我更辛酸，地下時期我幾次祕密前來時所接觸過的老同志們，有許多位都死難了。而其他位同志在此時期，冒險往來省縣之間，積極推行宣傳軍事等工作也更感人。最不幸的是佳木斯佳獄同志十五名，在勝利前夕被敵特全體用機槍射殺在監房裡。幸運的是德淳同志，他在日本被捕，與另十八位同志同押於康城監獄，只有他一人得慶生還。他是一個學術型的人物，他把整個精力用於復員設計委員會的工作，希望真能以劫後餘生重建家鄉。慶華同志已把我們的機關建立就緒，還開辦了五處三民主義訓練班。宗華同志也擴大出版了《先鋒月刊》，發揚了中華文化的光輝。除了俄軍司令部外，全是青天白日旗的天下，「中蘇友好協會」、「紅軍之友社」、「民主大同盟」，在這裡一點也顯不出聲色。

同志們曾在患難中別離，又在患難中相聚，雖然大家均無暇，甚至有意迴避談論過去，但心中都有無限酸楚。不曉得誰無意中提到死難同志的壯烈與不幸，竟忍不住哭了，大家都隨聲飲泣。我自己也覺得自從仲直死後，這還是第一次發洩自己的感情。本來我們都應該為勝利光復過一段慶祝狂歡的日子，但接收遲遲不前，俄寇兇殘肆虐，社會真空，治安堪虞，我們本該放下的擔子為勢所迫仍托在手中扛在肩上……可是我們對同胞所給與的保證和希望，越來越變成空言，我們自己也似

乎又墜入渺茫的命運之中……為此焉能不流淚。

現實是不能用眼淚解決的。我們必須再創造希望，振作精神。在長春時雖然也晝夜忙碌，但有時也能忙裡偷閒，這時我獨立負起責任，才真正感到工作的重壓。事繁心更不閒，因此與心竹的泰城之行，只得延緩。

幾天後，關樞同志自泰城來，提出泰城組織的人事。他共保薦六名委員候選人，並將每人的學歷、性格和工作能力詳加介紹，請我決定四人以便發表。其中多數我原有所知，所以迅即圈定三人剔掉一人，餘下二位甚難抉擇，但我仍然決定了。

「這位女同志做個幹事吧！」我說。

關樞同志笑了，笑得有些奇怪。

「你笑什麼？」我問。

「我來的時候，」關樞同志解釋：「關於保薦委員的事，我曾和黎詩彥同志談過，黎同志表示最好別保薦她，因為她已猜想到紀先生不會通過。果然被她猜中了！」

「她以為我不重視女同志的地位？」我必是很不自然。

「黎同志沒有那麼講，她的意思只是說紀先生對她個人的工作能力，一向沒有信任。」關樞續加解釋。

「她那樣說嗎？那可能是誤會！」我覺得我應該正面談談這個問題，所以又問他：「黎同志還

跟你談些什麼？」

「她只把她參加工作的經過，向我做過簡單介紹。她說她立志革命很久，只是沒有機會，碰到紀先生後曾明確要求工作，但紀先生沒有立即接受，只把她介紹給另外一個人。後來與那個人也失掉聯繫。最後在長春讀書時，她又找到線索，好像在那裡也碰到過你，可是你當時並沒有肯認她，以後又發生了案件。所以她覺得……」

「嗯，那真是誤會了！」我說。我無意做詳細解釋，當然也不能做真相的剖白。我只說明第一次是因我被徵調入省，第二次是已被通緝的關係。這些也都是實話，想像中詩彥也不會談到別的。關樞同志聽我如此解說，也認為是事實所迫，值得諒解，並表示回去後先代我解釋誤會。於是我再問他：「對於黎同志擔任委員的事，你有什麼意見？」

關樞說：「五二三事件後，黎同志潛回泰城並未灰心，反又展開工作。勝利後她立即在縣城裡公開活動，因她手中保有許多小冊子，使她獲得信任與擁護。在我到達之前，泰城已建立了工作機關。要照我的意思，我的書記長都應該由她來作才相當。」

「別說笑話了！」在我們同志之間，客氣話就等於是笑話。

「不然，」關樞建議：「我們不談工作貢獻與能力，按男女平等原則，也應該給黎同志一名保障名額。依黎同志自己的意見，她連幹事都不願做，只要能跟大家在一起工作，她就心滿意足了。」

「那麼就照你的建議，派她為一名委員。」

關同志又跟我談些其他工作上的細節，地方社會環境，以及遭受俄軍破壞的情形。我也問到我叔父的健康和醫院的業務，他對我叔父也十分推崇。我就順便告訴他當初給黎詩彥介紹的另外那個人，就是葛心竹同志，本來我們想一同回泰城，但現在我不得脫身，所以想請葛心竹隨他先去看看。葛與我叔叔很熟悉，我叔叔會招待他等等。

我所說的是我所能說的話。我不能把我與詩彥的關係告訴關樞，也不能把心竹此來的真意向他說明。當地方同志都在奮力為公的時候，我以主持全省工作的身分，自然不能先提起私情。關同志也就各處接頭業務去了。

心竹回來時，我把詩彥的消息轉告他，並提出請他先與關樞一同去泰城的意見。

「我不去！」心竹斷然地說：「若去我們就一同，我絕不先去！」

我不得不搔搔我那未得剪理的頭髮說：「這裡的情形你是看到的，目前我不能考慮回家的問題。你與我不同，你的目的，在長春時，我們已經決定了的。」

「我也不能說專為這個而來，即使為這個，我也不願單獨前往；何況訓練班裡我只上兩天課，剛起個頭還沒告一段落，我怎能放下就走？」

「心竹，我了解你的心情，我並不是不重視工作的人，只是我們兩個人談問題，不必用工作藉口，因為你在那裡工作都可，你現在的工作別人也可接替。由長春來的時候，我確想諸事就緒後跟你同去泰城，幫你辦好一樁大事。可是這一路上的經驗，使我對此局面特別敏感。情勢多變，人生

亦多變，你與詩彥過去也是會少離多，詩彥如果在長春，你就不必來龍江，所以你應該以與詩彥相會的事為優先。感情的事，你一定要主動、要積極。」

「上帝若給我機會，早晚我們總會見面，上帝若不成全，見面也是枉然。」心竹說的像個虔誠教徒。「而且你再替我想想，到泰城後我參加不參加縣裡的工作？參加工作而與詩彥作過多的接觸，別的同志有什麼觀感？若不參加工作，只住在你叔叔家，單單與詩彥約見，這個時候豈不被你叔叔笑話！」

「你不必在泰城停留，你乾脆把詩彥帶出，先回瀋陽。」

「路上這樣不太平，處處都是毛子兵，就算我能說出口，詩彥的父母又那能放心……」

「那麼，你給她寫封信吧！把許多事都告訴她，越詳細越好，託關同志帶去，暫時不得見面，紙上談談也好。」

「你忙什麼！既然快見面了，又何必寫信！」

心竹的脾氣有時是反常地執拗，越是關照他要緊的事，他越表示滿不在乎。經我再四申說，他表示回宿舍時試試。這時我們並不住在一起，我要利用晚間餘暇，登門拜訪同志家庭，慰問殉難同志遺屬。照理我也可以寫信，只是我已與心竹劃清立場，就決定不再與詩彥發生聯繫，更不願在她未與心竹相見前先行動筆。當我第二天送走關樞時，他告訴我心竹並未寫信，只託他帶個口信。我也臨時改變主意說：「關同志，你向黎同志也給我加帶一句話，你說我一點不輕視她的工作能力。

假如她願意，我想立時調她到省城來，下次跟你一同或請她先來都可。」

塞外春遲霜降早，中秋過後，天氣迅趨寒冷。我們的機關沒有經費，所有同志都是無待遇地工作著，一切生活用品都是靠同志們的自力供應和愛國的地方人士捐獻。可是社會日趨混亂，俄軍繼續搜刮，一切生產停頓，因勝利而突然自敵偽倉庫所流出的物資，也日漸消耗減少。同志們特別給我弄一套禦寒衣物，穿起來仍不能保暖，其他同志生活的苦況可想而知。但若與工作環境相比較，這些個人的飢寒勞瘁就微不足道了。在這一段期間，我一直未抽出機會回泰城，我不提走，心竹就更不說去，詩彥也沒有應命來省城，不拘她個人是以什麼理由不來，只沿途俄軍隨意槍殺姦淫這一項，我也不願她冒險前來。

九月末，仍沒有「接收」的消息。聽廣播說，中央正在重慶重新劃分東北省區。其實為了迅速，可按「九一八」前舊制；為了實際，可依敵偽時期的行政區分以及有關政經產業交通文化教育等現狀接收，以後再行調整。不知為什麼，中央卻來個急事緩辦；而且又變中加變，徒增紛亂。省區確定人事尚未公佈時，延安卻發表了九位省「主席」的名單：遼寧張學思，遼北栗裕，嫩江于毅夫……而且他們竟立即到任。嫩江省按中央新制，就是龍江這塊地區。十月一日，烏爾斯基到我們機關來訪，他的名片上印的是《真理報》記者，但我們早知他也是格別烏人員。馬尼諾夫的介紹對他有些功效，他對我很友善，我們曾見過幾次面，喝過幾次伏特加，他的酒量好，中國話說得更流利驚人，我們喝酒時他還說了許多黃色的笑話。這一次他告訴我嫩江省「主席」于××已經到了，正和俄軍

司令交涉要建立「聯合政府」。他說我是重慶方面的人物，希望我也選帶幾個人去參加。我立即告訴他，我不能參加這種形態的「聯合政府」，同時勸告他轉告俄軍司令根據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不可協助非國民政府委派的任何人員建立任何形態的地方政府；現有的地方維持會對地方秩序之維持，對俄軍態度之友好，對俄軍需用之供應均甚理想，希望俄軍讓地方維持會繼續維持，以待我政府正式接收。烏爾斯基露著神祕的巧笑說：「這是貴國的內政問題，只要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願意組織有能力的地方政府而不影響俄軍軍管下的治安時，俄軍均不擬過問。地方維持會裡原有你們許多同志參加，俄軍亦從未加以干涉……」

第二天，于××果然就任「省主席」，俄軍裡的華系軍官後來改任共軍地區司令員的王明貴者接掌警務處。我們的工作立時遭受威脅，訓練班裡有不明身分的人持械騷擾，參加維持會而身分暴露的同志受了警告，有的同志夜晚行路時遭受狙擊。我們乃緊急商討對策。結論是：

（一）目前情勢顯示：俄軍之目的不在長期佔領東北，而在第一劫運工業設備及各種物資；第二以繳收日軍之武器裝備供給中共，並扶植其建立地方政權。此種作為顯是違反中蘇友好條約，應請政府迅速對俄交涉。

（二）中共現在北部地區之活動，只仰賴俄軍之羽翼，尚無實際力量。各地民眾均與我同志相結合而竭誠擁護政府。偽軍及民眾武力均編入東北光復軍，由勝利出獄即被推舉為龍江地區司令之尚勇同志所領導。目前共方尚不敢對我採取武力鬥爭，于××本人亦只用魚目混珠方式欺騙民眾。

他說：「中央劃分東北為九省，我就是嫩江省主席……」

（三）中共實力因俄軍之資助培植，及大量由關內前來，勢將逐漸加強。敵偽時期並無共方人員活動，勝利當時，東北全境亦均未見共軍蹤跡。只以趁俄軍進駐及我政府未來接收之空檔，由山東乘帆船搶渡渤海湧向遼南，有的自熱察綏地區流入遼西，並用俄軍供給之武器，大量收編各地的徒手遊民，擴展極為迅速。據報遼寧安東地區大部分有共方武力盤踞，且有逐漸北竄之勢，對我將有嚴重威脅。

因此我們決定：各地機關暫留少數同志看守，另設祕密場所辦公，同志亦化整為零，轉入地下活動，並加強組訓鄉鎮民眾及軍事工作。恰巧這時尚勇同志邀我到「軍部」，研究軍中政訓工作及人事協調問題。尚同志設光復軍司令部於克山拜泉望奎之間，現已編有三師十二團共三萬餘眾。機動部隊全是騎兵，步兵隊伍則祕密編入各縣地方維持會的保安員警中。地下時期掩護心竹牧羊那位錢當家的所帶領的弟兄，也經心竹介紹編為一團。

尚同志為我在初冬的草原上安排一次「閱兵」，北地健兒的馬上工夫真是矯若游龍，氣象萬千。心竹這時成了我臨時的「隨員」，我的騎術遠不如心竹，可是這些武裝同志對我的尊敬並不在乎這個，我相信這支人馬將是協助政府接收的最好力量。

尚同志對我講：「不瞞你說，紀同志，我出生入死地抗日這些年，就是為鄉為土，為國為民。但是一般弟兄認識不夠，必須加強政訓工作，把主義思想深植於軍中，才有堅強的戰鬥力量，所以

請你多派同志來這裡工作，而且請你早一點回長春，向行營聯絡派員收編。我個人只希望政府早日接收，天下太平，有個解甲歸田的日子就夠了。唉！兵乃兇器，鋪局容易收攤難，弄得不好，將來的麻煩可多啦！」

經我仔細觀察，這一支民眾武力大體上是純潔的，都是中華男兒，有機會為國服務保衛地方，皆能奮勇當先。這時的形勢，除了城市據點與交通線在俄軍控制下，廣大的鄉村面均為我們掌握。當我巡行各地檢視駐紮部隊時，有許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故事，堪稱歷史的縮影，在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中，也是最富傳奇性的一頁。

軍中去來，一晃二十餘日，再回齊市時，共黨之勢力大增，鐵路沿線各城亦復如此。聽說行營已經到達，打入共黨機構內之同志又得出俄軍與「中共中央東北局」間的最重要情報，心竹乃決定與我再急返長春。泰城之行，終成泡影。

28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的先遣人員，於十月九日飛抵長春，十二日負封疆重任的熊式輝主任駕到，以「滿洲炭礦重工業株式會社」舊址「滿炭大樓」為辦公處。這對長春市民，可謂已見曙光，對如臨大旱而望雲霓的整個東北同胞，亦有望梅止渴的作用。但行營對俄軍之交涉，一開始即形不利，最初是不協助、不予方便、製造小麻煩，繼則給予威嚇、困擾與阻撓。

我與心竹返回長春時已是十月將了，而行營仍與俄軍辦理「初步」交涉中。接收工作尚未開始，許多沮喪的消息卻頻頻流傳。更切身的不幸是從鞍山帶來的，說是心超與霍炎同志為保護製鋼所已遭當地俄軍扣押。心竹聞訊，連夜趕赴瀋陽，臨行匆匆，我們均無話說。

不知是心竹離去使我若有所失，還是長春的沉悶環境使我在塞外奔馳的豪氣全消，我幾乎想去仲直的寄骨所痛哭一場。但我勉勵我自己：「明日再哭，今日還不是哭泣的時候！」我須迅速整理各項資料，和其他地區回長春的同志們，一同向行營提出報告。

行營當時的接收政策，置重點於中蘇友好條約，期望俄軍真心協助我國軍接防及我接收人員建立政權。在我國軍未接防前，要求俄軍保障接收人員安全。但俄軍對我軍接防與行政接收均不予真

實協助，而我行政人員在國軍未接防地區又不肯展開接收。

在行營作地方情況報告時，我特別強調兩點。第一：俄軍積極劫運我機械物資，破壞我工礦生產設備，均顯其無久遠佔據之企圖。如我政府交涉軟弱，則必增其覬覦之念。這是我在龍江時檢討的結論，也是各地區返長同志們的共同意見。第二：俄軍之另一意圖為庇護與扶植中共，惟其庇護亦視情勢而為，並非一定要庇護到某種程度。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對下級的祕密指示透露，「俄軍依條約規定，決定於十二月三日以前，完全撤離東北」，之後彼等將失去庇護，是故命令其所有份子「以各種身分，潛伏於各界各層，準備最低再做十年以上的地下鬥爭」。由此可知共方對其現有力量之認識與未來的策謀。這是我們得來的重要情報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建議，於俄軍進駐之點線地區，固應循外交途徑協調軍事接防及行政接收，而對廣大的面——農村和距鐵路稍遠的鄉鎮縣城，則宜用實力接收。實力有兩方面，即國軍與民眾武力。國軍須自遙遠的後方輸運，民眾武力即在現地。在國軍未到達前，我行政人員可隨我同志到各地區先與民眾結合，建立基層政府，以防止共黨之擴展。如依行營原定步驟逐次推進，即使順利，亦必拖延時日。

主持會報的官員，見我們都太年輕，說話太激動，乃滿面春風地安慰我們說：「各位同志這些年工作太辛苦了，精神也太沉重了，今後應該輕鬆輕鬆。接收東北，中央有妥善的對策，行營也有更多的情報，諸位所想到的，我們都想到了。共匪的力量算不得什麼，主要的問題還是蘇俄，只要

蘇俄尊重條約，接收東北是沒有問題的。政府官員不能像共匪那樣穿個二尺半忽東忽西地在鄉下遊竄，那成什麼體統？我們要堂堂正正地接收，漂漂亮亮地接收，省縣鄉鎮政府依次建立下去，建立了就不能再丟失，那才是個樣子。也許在時間上稍稍緩慢一點，希望各位同志回去向地方父老轉達這個意思，請他們要安心等待，不要焦急！」

等待？好！同胞們都想安心等待；「共匪」卻不等待。

輕鬆？是的，我們早就應該輕鬆輕鬆了！

我們不想輕鬆也不行，因為不出旬日，中央要我們輕鬆的命令到了。命令很簡短，是熊主任以戌東代電轉達，未述明任何原由，只說：東北所有單位人員，「一律歸該主任負責指揮監督」，而我們各地機關亦「應一律暫停活動」。

在長同志們得知這項命令時全體愕然，繼又為一種莫名的複雜情緒所浸滲。我們的組織不是一部關閉電鈕即可停止轉動的機器，我們的工作是置身於一個歷史驟變的時代和行政解體動盪不安的社會中。我們已與民眾結合一體並與反動勢力展開鬥爭，我們停止活動，對方卻不停止。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每個人的心理是無比的沉重，一點也輕鬆不了。

聽說行營對俄軍交涉頻生齟齬的時候，行營主任曾數度飛渝請示。不知這是行營主觀認為黨的活動有防礙中蘇外交之虞，還是適應俄軍的客觀要求。如果真是後者，當然也是中共利用俄軍借刀殺人的陰謀。

地下時期敵偽動員全部警憲力量，緝捕濫殺我們，為的是防制我們的活動。光復後，中共想爭謀東北，所以懼怕我們的活動。現在，我們的中央也命令我們停止活動了！

「紀剛兄，」歐凱私下對我說：「這個命令等於是自己打擊自己嘛，如此下去，我看……」

「中央一定有中央的道理，你不要悲觀太早！」我說。

我雖又勉自振作地為歐凱打氣，可是自己內心也與他同樣地感到彷徨。苦悶無告的時候，我只有跑到寄骨寺去看看仲直。我無言，仲直更無言。我們中間已經隔層木板，我忽然想起在獄中他考我莊周化蝴蝶的那段話。我兀自問：到底我倆誰在睡覺？誰在做夢？

我們的活動雖奉令停止，行營對俄軍的交涉並未改善。一夜，忽有少數共軍向「滿炭大樓」開槍射擊，長春市面也進來不少共方武力，東北行營被迫於十一月十六日撤回北平，另留部分人員組成軍事代表團在長與俄軍保持聯絡，繼續交涉。

行營撤退前夕，中共已在市區內公然貼出——

「驅逐東北行營！」

「人民解放軍萬歲！」

「打倒……」等等標語。

甫現黎明的長春，忽又轉入黑暗……

行營一走，俄軍忽然轉變態度，似乎恐懼我政府採取強硬政策，或顧慮遭受國際干涉，故而要

求行營重回長春；對長春中共分子的猖獗行動亦加限制，市面又呈平靜。惟行營恐落俄軍陷阱，未再返長，國軍亦沿遼西走廊，挺進錦州。其他省市人員則得俄軍協助次第前來，再由俄軍聯絡官陪同下，先接收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市的行政權，治安仍賴俄軍維持。其次松江省政人員亦前進哈市，而遼北進抵四平，嫩江挺進齊齊哈爾，開始接收。

對於我來說，只要有行政接收使我能早辦善後，亦是一大解脫。

嫩江省彭濟群主席開誠佈公，他只有少數文職人員，並無一兵一卒，需要我們協助，所以邀請我和我們同志同去龍江。我們是沿濱洲線前往。這一次的旅程倒是十分輕鬆的，比陪負責人地下時期來此視導時完全不同。省府人員的安全有俄軍保護，我們也同蒙庇衛。各廳處長也特別聽取我們的意見，尤以德淳同志的嫩江復員計劃，更為彭主席所欣賞。

車抵齊齊哈爾，在夾道民眾的歡迎聲中，我又分享一次接收人員的光榮。這一段的工作十分順利，于毅夫率其黨徒北退訥河，我們把握的武力次第進入市區，二個星期內即接收了省會附近八個縣份。有的縣份省府只能派出縣長一人，我們同志必須盡保駕之責，有的縣份則全由同志們出任艱鉅。尚勇同志，說句江湖上的黑話，總算「落了點」，就任了省保安副司令職。司令是由省主席兼任。對他自己也許無所謂，但對他所領導的這部分民眾武力能正式為政府效力，我們均感心安。省府還有意邀我擔任一項職務，我則婉言謝卻了。

仲直之死，當時我竟無何感觸，之後越來越使我意識到諸行無常，人生飄忽。而羅雷毅然表示

抽身的決定，也日益影響我對未來工作的態度。所以對任何新的職務都缺乏興趣。我想過，黨政工作不是我的路，我要再讀書、深造、研究；我本來是學醫的人，只要等到接收完畢，等到所有同志都能各得其所，各安其業，我就可以返璞歸真，再回我的本行。

接收伊始，又值三十五年舊曆新正，每日酬酢頻仍。我已成此一時間內「官民之間」的橋樑，地方父老的請宴，政府官員的宣慰，甚至與俄軍司令部間的國際聯歡，我都是一位必須到場的「賓客」。烏爾斯基和我又有幾次碰杯的機會，但並沒有再事多談。

關樞同志來省，帶來叔叔希望我回家過燈節的消息，我忙著介紹他去省府找新任縣長談泰城接收細節，關於詩彥近況，我沒有問，他也未得機會講。關同志去後，我拿出他帶來的工作報告書翻閱著，翻到最後的一部分，赫然是詩彥的筆跡。對於這幾頁報告，我似乎看了一遍又一遍，但那裡竟寫些什麼，我卻一點不知道。時間好像為我倒流，似乎我正在學校裡讀著她寄給我的信，接著我看到了我們瀋陽的會晤……最後又看到了泰城車站上那次冷酷的握別。冷酷？是的！那兩句椎心刺骨的話，正寫在我眼前的紙上：

我未曾感覺到你的冷酷，
可恨那機車太無情啊！
……

然而我是否即回泰城，仍不能立時決定。因為我仍有種種顧慮。於是我決定利用鐵路的電訊設備，和我叔叔通話一次。當我把我的未來計劃和目前暫不回家的理由向叔叔申明後，我叔叔也忙著說：

「還有，還有詩彥……」

「詩彥什麼？」我急急追問。

「……」叔叔沒有回答。

「詩彥什麼？」我再大聲問。

「……」聽筒裡依然是一片寂靜。

這時另有一個聲音自聽筒裡傳來，說電路故障，請我等一等再通話。我不知叔叔提詩彥作什麼。是叔叔要跟我談詩彥的事呢？還是詩彥就在電話旁邊要跟我直接講話？等了半個小時，電話還沒有接通，電務段的人表示江橋那邊有報告來，說江橋到五廟子中間的電線和鐵路又被共軍破壞了，什麼時候修復，不能逆料。我只好廢然而返，嚥下這口未完成的通話，和「詩彥什麼」的滿腹猜疑。

幾天後，泰城方面的一切交通均未恢復，我在嫩江省這邊的任務已告一段落，聽說黑龍江省和合江省的部分接收人員也已前抵哈市，那都是老黑龍江省的範圍，有些事情也急需我去辦理，所以我又重新化裝，潛返哈爾濱。

到哈後，才知合黑二省人員因不能前進，又折回瀋陽去了。而俄軍原應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以前撤離，後改為三十五年二月一日，現在又展延至四月三十日了。俄軍晚走一天，他們就可多拉走一天的物資；俄軍留駐一天，中共就利用時機壯大一天。我們國軍最初是運集量少，無力挺進，現在已有大部隊到達瀋陽，又顧慮與俄軍發生誤會衝突，不敢貿然北上。我們處處想對俄軍親善友好，俄軍卻一反初期的表面中立政策，公然與中共設陷阱佈圈套。每一城市俄軍撤離，必先祕密交付中共，國軍聞訊前進時，即遭共軍抗拒，如欲接防必須硬打。軍事代表團恐怕已接收而尚無國軍接防之地區遭受共軍襲擊，特別向俄軍聲明國軍尚未接防處並無任何政府武力，請求俄軍對該地區內之「非法武力」予以收繳，保障接收人員安全，以明「責任」。俄軍對此特別合作，代表團所稱「非法武力」原係指共軍而言，俄軍卻會同共軍把各處堅守待援的愛國民眾武裝全部「掃蕩」了。甚至據遠在齊市的嫩江省主席報告，連尚勇同志所部經改編成已接收各縣之保安員警的武裝也被繳械了！

眼睜睜看著這些力量消散，看著這事態演變，預感我們的努力化為雲煙，東北局勢更趨混亂時，我真是問天無語，欲哭無淚。正值此時，忽得伊正來函：

紀剛兄：

不得音訊者數月餘！近聞吾兄在哈，確否？弟已由錦來瀋，前閱吾兄致負責人之報告，略知吾兄心境。負責人現已由錦赴平轉渝，約一月後始歸。

吾兄能否離哈？以弟愚見，吾兄應即南來，藉以觀察各地的同志，各地的民眾，以及各地的接收人員；對於「工作」的認識，必大有裨益。如再株守濱北，勢將孤陋寡聞。蓋弟已了然所謂「回京述職」的大員們之飛來飛去，不無道理也。切切！

弟伊正　三十五年三月六日

三月十五日我啟程離哈，路經長春並未停留，車過四平時，已有共軍圍城跡象。

三月十七日，四平防衛戰揭幕。這是中共於勝利後搶先竊踞東北未接收地區，經八個月的滋長，現已坐大成軍，第一次向政府已接收地區發動攻城掠地之戰，放棄其再潛伏十年做地下鬥爭的陰謀，開始其公然割據武力奪國的行動。四平是遼北省會，國軍尚未到達，省府接收亦只少數文職人員，與嫩江相同，僅賴我同志領導之一部分民眾武力收編為保安團維持城防。十九日，四平不守，省府劉主席以下接收人員，經代表團交涉由俄軍保護脫險赴長，建教兩廳長被共軍所拘，我同志及愛國商民犧牲甚眾。

四平失陷後，軍事代表團奉行營熊主任電轉委員長手啟電令略開：「凡已到任接收省政市政之官吏，應堅守任所，不得撤退，如至萬不得已時，可在區內游擊或隨俄軍撤至俄境亦可。」

「委員長命令接收官吏在區內打游擊，也正同於我們當初的建議。」伊正跟我討論：「依你看，他們能不能奉行？」

「若是肯打敢打有勇氣犧牲打的話，當然能行。」我說：「不過，假若在行營初抵長春時，能夠採行這類的辦法，那局面會更好得多了！」

四月一日，共軍揭開進攻長春的序幕。

四月九日，俄軍統帥部撤離長春，我軍事代表團隨馬林諾夫斯基前赴哈市。

「四一四」，長春亦與「三一九」之四平同一命運。

鑑於四平長春兩地的遭遇，代表團認為哈市與齊市亦無力堅守，乃決定通知哈市，松江嫩江兩省，以及中長鐵路局各單位接收人員，於四月二十五日集中哈市隨俄軍總部撤往蘇俄國境。但限於重慶飛來之人員，至當地任用者，則必自謀逃生之路。

政府自然有政府的苦衷。第一、接收伊始，接收人員即被共方俘虜，有失政府尊嚴，影響國際視聽。第二、政府自以為在國軍勢力不及之處，必須善盡維護所屬官員的責任。第三……但，這樣的撤離，在同胞的心裡卻留下一個很大的暗影。「九一八」時已經有過一次，現在又有一次，將來是否還有一次？

嫩江省政府是四月二十三日棄城向哈市集中的，德淳同志破例蒙彭主席准帶同行。個人的命運在戰亂時期常常有不可思議的機緣。日本投降時，他是康城監獄中十九名政治犯中倖存的一人。這次接收人員撤往俄境者計軍事代表團董團長以次十五人，松江省政府關主席以次十四人，嫩江省政府彭主席以次二十一人，哈市政府楊市長以次十二人，中長鐵路劉理事以次八人。在這七十人中，

德淳同志又幸與其他六十九名「重慶客」同到西伯利亞做一次政治難民。而尚勇同志奉命率部向南轉進，突圍渡江時，有許多同志均中彈犧牲。他們生於龍江、長於龍江、抗日於龍江、住獄於龍江，最後死於龍江之畔；征馬不前人不語，江水悠悠，恨也悠悠，而「四一三」也成了龍江地區同志又一個最悲慘的日子！

五月末，蘇俄大使突然向我外交部覆照謂：俄軍已於五月三日自我東北九省全部撤退完畢。到底俄軍何日撤退完畢？真否撤退完畢？因北部地區國軍一直未能到達，一切無從查證。但我人均知，美、英為換取蘇俄對日出兵而簽訂雅爾達祕密協定出賣中國權益，中國政府被迫依據雅爾達祕密協定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以希望換取兩國間三十年的友好和平，東北行營擬依據中蘇友好精神，委屈求全地對俄軍交涉借重外力以接收東北的一切計劃與目標，到此時都成夢想！

29

「大哥，」羅雷跑來對我說：「星期天請你去吃酒。」

「什麼事？」

「結婚嘛！」

「結婚？這麼大事，應該早早告訴我。都準備好了？」

「好了，好了！因為是大事，所以我親自來請你。可是，我最不願再到大帥府來，等你好久，也沒見你到醫院……」

「你知道的，現在我也不願到那邊去。」

「其實，你不能怪怨人家！」

「我沒有怪怨誰。」

「若怪，就要怪你自己，你與我不同，我與姚蕙是有婚約在先的。當然這並不是問題的焦點，主要的，你當初應該把話說明白。不然，誰能望風捕影地等你一輩子？」

「道理是那樣。」我說：「好吧，不談這些！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星期天中午十二點，中街明湖春。這裡有帖子，別忘了！」

我拿起印有雙喜字的紅帖，看了看說：「這回可真是明湖春了，記得你與姚蕙私會那次，我說過要請你的……好吧，能夠參加你的婚禮，該是我們覺覺團弟兄們惟一的一件暢快事，我一定去痛痛快快地喝你一場！」

一回瀋陽，我便住入大帥府。這當年東北王的深宮禁院，敵偽時期曾被沒收充做「奉天圖書館」的地方，現在是我們瀋陽機關的辦公處。這時的我，幾乎成了姜太公，不論齊市哈埠或長春，走到任何一處，他們都留我接手辦公。當我接伊正信由哈來瀋時，目的固在「公」務，附帶著也有「私」情。瀋陽是我浪跡青春之所，也是我情感生活的故鄉，這裡有那麼多事、那麼多人、那麼多令我喚起舊夢的地方。我原意回瀋陽觀察一下這裡的同志同胞和接收官員，當然也想瞭解一下宛如的現狀。到瀋後，行營和遼寧省府雖均已抵此開府辦公，瀋北各地卻又全部陷落，所以各地工作同志也都紛紛來瀋接頭，各地流亡同志也都紛紛來瀋覓食，結果我並未得偷閒。自從地下時期「省方」祕密遷長，現在事實上又無形中還瀋，三年中一切都起了重大變化，惟一沒有變化的，是我個人這擺脫不開工作纏身的命運！

回到瀋陽後，立時有三件事使我精神不得開朗，一路上心底的期望均行落空。第一是莊公謀的消息。公謀同志在長春劫獄營救我們，政府接收後任中長鐵路警護總隊大隊長，為保護經濟部東北區工礦接收特派員張莘夫先生前往撫順接收時，一同遭共方殺害。第二是心身俱受傷害的方儀，亦

於去年底病故於我們母校的盛京施醫院。她還留給我一封遺書，羅雷一直沒有通知我，見面時才同時告知並轉交。第三是純屬私情的。據心竹告訴我，宛如已經與別人訂婚了，我與心竹可謂互惠平等，我沒有帶給他較好的消息，他的消息正好戳破我想重溫的夢！

這時瀋陽城的別人，卻都活在真正接收的歡樂中。國軍到了，俄軍退了，共黨的恐怖也被逐出城外。東北全面接收，似乎只是時間問題。行營高級官員有此信心，省市接收人員有此信心。滿懷熱愛祖國的市民同胞有此信心，他們把一切問題都放在國軍身上，只要有國軍，他們的一切都有保障。對於中共在北部開始的一切暴行，他們已不太關心，他們只用心力趁此機會搶先發展他們個人的地位與名利。當俄軍壓境，不敢出門和剪短髮偽裝男性的少女少婦們，這時也舒露了肢體，在馬路上顯耀她們曲線美麗的時裝。總之，這時的瀋陽，雖然某方面還是兵馬倥傯的景象，一般社會上卻呈現著太平盛世的風光。

我自己也是多少懷著一點這類綺想南來的，我曾把這次回瀋的旅程當做是「還陽」之路。地下時期我曾以夜行人、沙漠裡的苦行僧自況，過的是幽靈般的生活，走的是黃泉路。五二三未死，接著又聽到勝利之歌，表面上似乎已改觀了，但奔走在濱北那一段工作上的重擔和環境的緊張，在我來說仍等於是地下工作和生活的延續；回瀋陽，等於是重到陽世之間走一場，我才會有真正復活的感覺。誰知當我「還陽」之後，那麼多不幸的消息，反將我擊落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境地。

心竹也不是個歡樂的人。他曾去鞍山一次，但未曾查出他哥哥和嚴姐的下落，現在更沒有消息。據說心超回瀋時會到嚴姐只團聚了兩天，便啟行前往鞍山，嚴姐說無論如何不願再和他分離，冒著任何危險也要和他在一起。她和心超同時被俄軍拘禁，後來聽說又轉交給當地的共軍。按著張莘夫的遭遇推測，他們也將凶多吉少。心竹悲痛之餘萬念俱消，乃回到醫院裡，又穿上手術衣下了開刀房。

藥理學上說：兩藥併用時，其效果有時是相乘相加，有時是干涉消滅。病理心理學上也有相同的理論。我們身心雙方，有時為了兩個以上的小不幸，會使我們感到煩惱很大；有時一件痛苦會將另一件痛苦淹沒，我們只感到這一件十分痛苦，另一件便無足輕重了。論到旁人，宛如的琵琶別抱該是那件大的痛苦，但我這時仍然保持著以工作為重的習慣，對覺覺團等群體的關懷，依然是勝於個人情愫的階段。心竹的情況比我更慘，我若因宛如的消息而表示出受了重大的打擊，那我還算是什麼覺覺團的弟兄，何況宛如訂婚的對象還是我的同班同學徐凡。

聽說徐凡已到錦州做事去了，宛如尚留在醫院。我本想去看看她，但向她說些什麼？說贊成的話我不甘！說反對的話我不該！因為我總是她的大哥一場，且曾私自祝福她應早有歸宿。雖然如此，我仍感到一種不自然。所以我住的大帥府與小河沿雖相距不遠，我就是不願意去盛京施醫院。

萬般苦悶無處發洩時，我寧肯找伊正去喝酒閒談，因之與心竹和羅雷見面的機會倒少了。

羅雷曾囑咐我不要把方儀的遺書拿給外人看，羅雷說我們所做所想的完全不屬於這個世界，對

牛彈琴，牛會恥笑。但我還是忍不住拿給伊正看了，而且這麼重大的事，我也必須找個人商量。伊正閱讀時也忍不住涔涔落淚。伊正說我應該為文紀念，我當時答允下來，因為那也是我捧讀遺書時所曾激發的意願。可是我幾次執筆都寫不出一個字，我總覺得我自己不夠完美，我的文筆也不能完美地將方儀崇高的情操表現出來；表現不好，對她和她所代表我們所共有的純情精神是一種褻瀆。於是我決定待我情緒穩定後再說。後來我忽然想到真實的東西就是最完美的，誰還能寫出比方儀遺書更真實完美的文字？當然我這本書並非專寫方儀和仲直的故事。我所寫的是「那是一個什麼時代」，「那是一種什麼工作」，「什麼樣的一群青年在那時代做那種工作」，「在那一時代那種工作下產生了什麼樣的愛情」。可是我個人卻認為惟有仲直才配代表革命青年，惟有方儀才配象徵聖潔之愛！所以我就把遺書公開在這裡。

紀剛志兄：

長春分別時，我們的心情因仲直的不幸殉難都十分低沉，當時我有幾句話想向你說明又不便出口，迄今仍悶在胸中不得開脫。其實我的話我也想永久不說，即使我不說你也會完全了解，也只有你才會了解，但我還是很矛盾的想向你說個明白。我之如此，並不是為我自己，更重要的是為了仲直。

我很幸運能夠追隨諸兄參加現地抗戰工作，為中華兒女盡一份應盡的責任。我也很驕傲能夠應徵入省擔當核心機關的掩護任務，不辱沒覺覺團的弟兄們應有的光榮。可是我太年輕、太幼稚，對某些方面也太不懂，所以我像在學校裡答應出臺演劇似地承擔下這個角色。決定由仲直扮演對方時，我且更感輕鬆，我一點也不知道這項任務對仲直是多麼沉重。

對於仲直和對於你與羅雷一樣，我只認為你們都是好同學好同志，大家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樣，從未想到別的關係。在長春建立偽家庭半年多的時間中，我與仲直曾嚴肅地工作，也曾輕鬆地生活。我們雖獨處一宅，但仲直從無半句戲言，其他更無從說起。我們一心一意地為現地抗戰而努力，為多難的祖國而奮鬥。仲直關心我，照顧我，因為我在覺覺團的弟兄中可以說是最小的一個。

在五二三後那一段漏網之魚的逃難生活中，我們在精神上更是患難相扶生死與共了，但我們仍然是同志同學或兄妹，沒有一絲一毫不純潔的情愫。被捕後，我們同被解回長春，但我對仲直的關心並未超過對於其他的蒙難同志，至少未超過對於你。

回想在長春住圍樓那一段獄中生活，可以說是我參加工作後最愉快的日子。在學校裡初起活動時雖不孤獨卻有恐懼，明德里時又恐懼又孤獨，一星期內偶爾見你兩次面，大部分的時間都賴仲直支持。等到住進首警的圍樓後，精神上的束縛和重壓才得釋放。整個圍樓中七八十人全是我們的同志，以前從未謀面的都是一見如故，沒有人抱悲觀，沒有人發怨言，我

那冬日因洗衣燒飯而凍裂的手指，住獄後也才完全癒合。尤其是和同檻裡的女同志們談天，更是海闊天空無憂無慮。當大家合唱你們傳遞過來的那首蒙難紀念歌時，更是聲氣相通無限振奮，我自己還寫了一首〈乍出校門入牢門〉的詩句，那時的心境，實在比我現在住在病房裡舒暢得多！

當新保對我非禮後，我並未感到特別難堪，我只當做是我們所共同身受的非刑之一，與上大掛，灌冷水，跪楞木，挨鞭箠，沒有什麼區別。但聽說仲直為此向新保拼命時，我的觀念為之一變，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是「受辱」了；一個革命者生命可放棄，志節不可奪，一個女孩子肢體可摧殘，清白不可破；而我在這方面已經受了傷害，永生不能痊癒的傷害。且從仲直死亡的那一刻起，我心靈上的創傷也日益加劇……

我們是學醫的，我們都了解一個人在不可抗的暴力下所受的這方面的損傷，原不該當做什麼。我在臨床實習時，也曾勸過有類似遭遇的女病人。可是這一次我自己卻無論如何也想不開。我的身體是實在有病的，但我心靈上的羞憤憾恨是使我的病不易減輕轉趨沉重的主因。我的理智越要我把此事看得開，我的感情越因此事而苦惱……

羅雷常來看我，他要我把一切都忘掉，就像我們沒有離開過學校一樣。我們由長回瀋的途上，他就和我約定，我們如同假期完畢回到學校上課，對以前的事，一件也不提一句也不說。他已完全厭倦了「工作」，為了盡人情他不得不再幫忙一段，但他卻從不把大帥府那邊的

事拿來談論。我也試著那樣做，但不成功。地下工作可忘記，獄中生活可忘記，只是心靈上內在的創傷無法忘記，何況許多相識的人直接的間接的，關心的或無所謂關心的又常常將那些事提起。

谷音更常來看我。你知道谷音是我參加工作的介紹人，我們可稱得上是青梅竹馬的朋友，在這種基礎上我們本可以發展另一種感情，後來因為工作，大家都有所不屑，而他比我們都蒙難得早，兒時的感情也因以停頓。現在，彼此死生重聚，他心情依舊，我卻不願接受了。他越勉勵我不要看重那意外，我卻越把那意外看得重！不知怎的，我越來越不能適應這社會。我已經變得像清教徒那般地固執，或者像你所說的苦行僧一般地自虐了。谷音說這也許是「環境」的關係，離開這個環境就會轉好。他說美國已經來信，待我病好後我們可以一同出國，遠遠地走！走到那裡還不是這同一的世界？而我知道，這個世界已不屬於我，因我已不適生存於這個世界。我願到另一個宇宙去追尋那更真更善更完美的生命。假若可能，我想我應該早一點從這個世界離開，以免絆住谷音的腳使他不得早速遠行！

我原不想給你寫這封信，但聽說你仍在北部地區像地下時期一樣地支撐著工作；所謂勝利後的「工作」，像你那樣的態度繼續奮鬥下去也好，像羅雷那樣得機會就撒手不幹也好，我都沒有意見。只是不知你何日南返，我深怕沒有機會和你見面把我內心裡矛盾的話談談，所以才決定提筆。可是這封信，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經過了很久。尤其是我最後的一項要求，

的意思認識混亂，所以我還是把我想要求的事寫在下面。麼話我們都要向你說，你知道我說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相信你不會把這封信前後兩段使仲直的聖潔靈魂遭受懷疑，我更罪莫大焉。但在覺覺團的弟兄中，你一向位居「大哥」，什我特別躊躇！怕你把我的意思誤會，那麼我為仲直清白純淨人格做證的一片赤誠全黑，甚至

在病榻上，我日夜地思想，越想越認識到仲直的偉大，偉大得這個污穢的世界不能容納他。他已先到那更乾淨的地方去了。我不配，但我想追隨。我對他從來沒有過的感情，當谷音向我有所表示的時候，我忽然有了。因為只有仲直深知我的清白，只有仲直保障我的清白，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能心地坦然了無愧赧。新保那萬惡的畜牲，他懂得什麼，他怎會了解我中華兒女革命人格的純貞！

紀剛志兄：假若可能，希望我死後能將我和仲直埋葬在一起，像你為我們建立明德里那種安排一樣。我常想，革命者不會也不應寂寞的。仲直生前有成千成萬的伙伴共同奮鬥；住獄時，大家曾合唱蒙難之歌；他死後，我願永遠陪伴他，使他永不孤單……

區區之情，兄其助我！

方儀絕筆

處於亂世，人與人之分合常是不可思議的。谷音已於春初即去南京辦理出國手續，我們竟未得

一見。仲直彌留之際我不在場，方儀魂歸天國時，我尚未回瀋陽。這兩個人我都應該「親視含殮」而竟緣同陌路。對方儀最後的願望，我不能不負責辦到，不然對他們我更是永存虧欠。閱遺書的第二天，我就去拜謁仲直的父親；不為方儀，我也應該去看望他老人家，雖然仲直的一切已由羅雷詳細轉告。記得地下時期半公開階段，我趁回瀋之便，代替仲直與他老接頭一次。我遵照仲直的意見，先向他老的櫃上通電話。

我說：「仲老先生嗎？」

「是的！」正是仲伯的聲音，「您哪位？」

「我是仲直的朋友，現在來瀋陽辦貨。仲直叫我問候您老人家！」

「什麼？啊——你等一等！現在電話聽不清，你不要放下！回過頭來我再跟你談。」多歷世故的老人，比我們做工作的還機警。想必是電話旁邊有外人，作生意的免不了有顧客。

我把持耳機靜聽著，不久又傳來仲老伯的聲音。

「你在哪裡？」

「我在公共電話亭。」

「你是紀剛嗎？」

「是的，老伯。」

「他好嗎。」

「很好！我們經常在一起。聽說您老人家受了很大的折磨，我們都很難過！」

「別談那一些！」老人急著說：「你方便不方便？我們見一面！」

「好的！」我們約定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我怕給他老增加新的麻煩，所以特別表示一句：「如果您老不方便就不必來，我只想報告您老，知道我們平安就夠了！」

「我沒有關係，我的意思是給你們帶幾個錢去，他走的時候太匆忙——」我當即表示我們的生活還可以，可是仲伯忽然提高聲音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做生意嘛，本錢越大越好！」然後即掛斷了電話，想必是又有閒人打攪。

我依約到會面地點與仲伯見面時，仲伯先順手塞給我一個報紙包。我想跟他老談談，仲伯卻阻止我說：「趕快走吧，我見著你就像見著仲直一樣！」然後逕自去了。

這一次，我懷著方儀的遺書，到仲直家去見仲伯。我們再不怕敵偽警憲的監視，我們可以隨意講話了，但都久久不能說出一言。對仲直說，他的生意是全軍覆沒，本利皆無！而仲伯大人這時候見到我，是不是還像見著仲直一樣？

還是仲伯比我有更高更深的涵斂。他說：「方儀的信，我不用看了。你們小弟兄們的事，就由你們決定。我完全依你們。」最後又似苦笑又似自己解嘲地說：「也好，我家出去一個，回來兩個，也算夠本的了！」

事情雖如此說妥，真正辦理還得等待東北的局面平定。而這平定的局面何時出現，一時尚難逆

料。

伊正是於錦州時被薦到行營做事的。據他自己說這也是一種「逃」，逃避原來的工作崗位，嘗試一下新的生活。這話我相當了解。地下時期，省方同志都被自己的工作咬得很緊，精神太桎梏，心情太沉重，數年間等於沒有一次呼吸，在潛意識中多少有些抗拒的作用，遇有機會都想作暫時的逃避。但那時候大家過的是幽靈般的生活，根本沒有這種機會，真有機會也會被自己的責任心捉回，光復後便都以不同的方式發洩了。羅雷想回學校讀書，伊正要擺脫老圈子混入新環境，我也決定想重拾那已被拋棄的昔日情感，都是同一心理。所以當伊正隨行營來瀋後，他們曾要他坐回大帥府，他再也不敢著邊，真可謂「逃之夭夭」了。現在行營派他管理中蘇聯誼社，因為這裡留用的日籍技術員工甚多；同時也兼辦一些日僑俘管理處的工作，都是基於他日文太好的緣故。他自己說，這也是「奴化教育」的用處。所謂聯誼社等於是行營的招待所，以前的貴賓是「偉大的蘇聯紅軍」，現在則是美國強制推行「國共合作」政策下「軍事調處」的三人小組了。最初我與伊正閒談就在聯誼社的頂樓——「七重天」，後來看不慣有些趾高氣揚、陰陽怪氣的所謂軍調人員，也就常到對面的「文化新邨」坐坐。

「文化新邨」所做的並不是文化生意，說它是茶室也好、咖啡店也好，說它是酒館餐廳也無人反對。總之那就是流行於戰後各大都會裡一種新興的燈紅酒綠，半醉半醒的地方。坐在這裡放下清茶端起酒杯，一個人可以睜著眼睛說夢話，也可以閉上雙目吐真情，正是我們這群關心大局而又無

能為力者逃避心靈苦悶的場所。很想不到的在這裡碰到任俠，那個心超的同學曾受我們協助入關的任俠，更想不到他就是文化新邨的經理。

「你怎麼搞起這個？」我很驚訝於他這份行業。

「一言難盡，先喝酒再說，」大廳裡鬧哄哄的，他特別為我們安排一個最幽靜的雅座，然後說：

「我請客！」

一位溫順而伶俐的日本侍女——這是她們現在最易謀得的職業——一下子提上來一打啤酒。我忙著給伊正介紹，他們在聯誼社見過，但不知彼此的關係，經我再加介紹，自然更有話說。碰過杯後，任俠開了腔：

「我這是流浪人還鄉，找不到爹娘，沒事可做，不得不混混生活！」

「上次你奉派回來招生，這一次最低也應做個委員。」

「別提了，」任俠呷了一口酒：「論貢獻我應該做個大員，論關係我只能做個小員，我就不如不員，也好落個冷眼旁觀。如果叫我混在接收人員裡，得不著真正好處而又同樣挨罵，我就犯不上。我告訴你，」他把餘酒喝乾，又滿上一杯。「做賣命工作的都是傻子！不怕你見笑，我說這話似乎有點腐化，那真正腐化的人連這種話都不肯說的。當初在現地工作的時候，我和你們一樣純潔……去到後方久了，看得聽得多了，心理自然要有改變……負責人可好？」

「他去重慶了，我此次回來還沒有見著。」

「去重慶最好，他早就應該去！」任俠回憶著：「地下時期我就跟你提過，建議他去。他去和我們不同，我們走到哪裡都是馬前卒，給別人做腳墊，負責人若去，能和中央高頭接觸，若是他能出席大會，那對東北的接收方案和對現地工作同志的善後安排，都會有很大幫助。若是那樣，我就可能借光至少弄個專員了。」

任俠向我們講述了許多當初有志青年，投奔後方後的一切遭遇與見聞，以及勝利歸來後的境況。最後他說他可以唱兩隻歌代表戰時流浪青年的全部心聲。第一首第一句是「紅燭將殘」，那是西安戰幹團畢業時的惜別歌，可以說是奮勇離鄉追隨抗戰的誓師詞，其中還有「如蛾愛火，如螢愛夜，吾輩愛難愛難。」「風濤何懼，昂首挺身走向前！」「擦乾腮邊淚，脫卻繡花衫，溫室不是我們的家，願那滿天的風沙！」等句，蒼涼中不乏豪放之氣。第二首是《流浪人歸來》，唱出了歸來的流浪人忽見家園景物全非，頓感空虛徬徨的悲哀與失望，比「近鄉情更怯」者的抑鬱淒苦，更令人感傷流淚……這時我瞭解了一點那每個檯面上都燃起一枝紅燭也是別有用意了，原來任俠依然懷念當年的壯志。

兩個星期過去，大局依舊沉悶，軍調小組的活動使我們暫寄希望的軍事接收也受到掣肘。我個人的胸襟更缺乏開朗的因素，似乎是任俠那種流浪人歸來的淒楚心情也加重地感染了我。在濱北時我必須裝腔作勢；在長春我也必須保持尊嚴；在瀋陽，這時的瀋陽，人們的眼光再也不集中於我們身上，我也正好混在那些自感失意的人群裡去借酒澆愁。這一晚，我又會同伊正到文化新邨，同時

也用電話把心竹邀請過來。面對著紅燭，我告訴他們一個歷史插曲，這個文化新邨原是青葉茶室舊址，是我與鍾鳴握別的地方，只是情調完全不同了。由鍾鳴提到《火舌集》，由《火舌集》中的人物扯到聞道的太太，而伊正在錦州時曾從聞道太太口中聽說過我與宛如的關係。他問心竹內幕如何，心竹便把現況告訴他。這時我只有無言地飲酒。也許我的酒喝多一點，伊正看不過眼，便說：

「紀剛，地下時期我最欽佩你處理感情的工夫，想不到你今天這樣軟弱。早知如此，我就不寫信勸你離開濱北了。像你這種人最好永久留在敵後或淪陷區，在那裡你還有奮鬥的目標，比酒更容易壓制個人的煩惱！」

「你不要誤會，」我向他解釋：「當著你們的面，我不否認宛如給我的影響，但只這一件事不會壓倒我……」

「再不然，」心竹看我這個樣子，隨口接道：「我仍把詩彥留給你——」

「什麼話！」我等於是斥責他。倒不是他這句話刺傷了我另一心頭上的隱痛，我怕的是他把他與詩彥的感情任意放棄。

30

羅雷結婚那天，我確實是喝了不少酒。不知是什麼時候由什麼人把我送回大帥府的。一覺醒來，已是子夜，而且起了風雨。酒醒後的苦惱不是頭痛腦脹，不是口乾舌燥，不是胸塞胃悶，而是你想用酒力驅散的記憶又一一回聚，並且對你感情的斲傷更新鮮有力。

我本應早到明湖春去幫忙的，因事耽擱，到場時婚禮正在進行，同志同學，老親少友，街坊鄰居，幾乎有五百多位賓客，真是盛況空前。我沒有擠進禮堂觀禮，我想趁此機會找些不易見面的熟人談敘談敘。第一個碰見的是捷夫，他權充總招待之職，我們在大帥府中時有工作連絡，此處不再多話。我請他由禮堂中請出木莎，木莎的爽朗風格總是壓人一頭，沒有客氣話，開口即責問。

她說：「大帥府有何事忙，為什麼不早來看我？」

我說：「我沒有忘記你當年對我的囑咐，所以特別檢點自己的腳步。」

「你別挖苦人啦！當初我不曉得你們有工作內幕，你自己知道就算了，何必跟我翻老帳！」木莎改變了口吻。

「不然！」我說：「一定是我那時的言行有欠收斂，所以才引出你對我的誠言；即使你未說，

今天我仍會認錯；好在時過境遷，對與不對都請你原諒。有一件事我要特別謝謝你，也要謝謝鍾鳴。鍾鳴來未？」

「什麼意思？」

「我想見見她。」

「別刺激她了！」

「完全是感謝的意思。五二三案件前，我們得到她經由你們傳給組織的消息，為了這個消息，不知她受了多少委屈，我怎會再刺激她……」

「委屈？」木莎有所不平地，「她跟焦先生結婚還不是最大的委屈！你還用問？」

「她曾向你這樣說？」

「你應該心裡明白！」

「木莎，」我懇求地：「不要和我辯論吧！鍾鳴若在禮堂裡，麻煩你把她請出來，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談談好不好，一切由你鑑證。」

我在禮堂外的走廊上靠窗邊等。鍾鳴出現了，木莎似乎是多心地沒有同來。鍾鳴跟我握握手，但握得很輕很不自然。不知為何，我們竟如此陌生，一點也沒有老同志老朋友們那種生死重逢時的激情，因此我們默對良久。

「焦先生好？」我竟世俗化起來。

「他到北平去了。」

「伯母呢？」

「還在瀋陽。」又是一句漠然的回答。

鍾鳴如此矜持，使我幾乎無話可說，但我必須說話，說出我內心的積悃。

「鍾鳴，我實在對你不起，假若我們分手時給你留個通訊聯絡處，你最後的情報會早達到組織，那麼五二三案件會完全改觀。」

「事情已經過去了，對組織有否作用也不必討論了。記得我對紀先生說過，什麼時候我都會愛護組織的，只要證明我已盡了力，也就夠了。」

「你也曾說過，我們永遠是同志和朋友，現在不談工作了，在朋友的立場上我對你的虧欠也很多。以前你似乎有許多話沒有對我說，現在我願意以朋友立場做幾分補償。焦先生什麼時候回來？我也願跟他做個朋友，如果他有困難，希望你不拒絕我的好意。」

「不用了！」鍾鳴感慨地說，表情恢復些我們原有的關係。「他不準備再回來，他在那邊能有安身之所時，我跟母親就一同搬去。離開瀋陽，我們就沒有困難，你的好意，我由衷感激！」

「那麼，在你未走以前，我們詳細談談。鍾鳴，對於你的境遇，我心實在難安，給我一個時間地點，我們再見一見。」

鍾鳴沉吟著，不知她是考慮應允還是決定拒絕。未等她的答言，一下子從禮堂中衝出許多賓客，

原來婚禮完成了，也把我們的談話沖斷。

接著就是開席。來賓們都紛紛結伴找座。明湖春在瀋陽城裡是數一數二的大館子，除禮堂大廳外，還有許多單間的客房，樓上樓下全被羅雷的親友佔用了。我們幾個覺覺團的弟兄們，湊到廂廊末端的一間雅座，說是吃羅雷的喜酒，等於是小團體的聚會，五二三時他們在學校裡的幾位倖免於難，今天正好趁機會彼此慶賀，惟一的「外人」，還是伊正。剛上第一道菜，捷夫來說仲直的父親也來了，要我去陪。我一聲未響地隨他轉了桌。最初老人家倒頗能矜持地跟同桌的客人做禮貌上的舉杯，但未終席即藉故先退了。我想去找新郎新娘前來送客，仲伯示意免了，我尊重老人家的意思，便自己陪他下樓僱車，看他獨自回去。

吃結婚酒的很少有人安坐到最後，一人離座大家跟走，我回頭上樓時，羅雷夫婦已經佇立樓梯口躕躬送客。我再跑到覺覺團那間席位時，正好送上最後一碗湯，有的同志也起身欲動了。

「不要走！」我說：「我還沒喝一杯酒。大家請坐，我們重新喝！」

有幾位同志同學確實另有事情，放他們走去，剩下伊正、心竹、和我還有六七位。我請心竹把捷夫找來，我對捷夫說：

「給我們這桌重新擺上一席！」

「時間來不及了。」捷夫以為我開玩笑。

「把你們招待人員留下的那桌分一半也可。」

「這個——」

「這個什麼？你是總招待，你有權去辦，你也可坐到這邊來！」

「可以！可以！」

捷夫口頭應承，人並沒有動身。伊正等穩坐桌旁，含笑不語，似乎都在靜觀我的鬧劇如何收場。不知誰去通風報訊，羅雷親自跑過來，他的母親也蹣跚地跟在後面。這使我更理直氣壯。我沒理羅雷那份鬍子，端起空酒杯對他母親說：

「大娘，今天是你老最快樂的日子。當初我把羅雷從你老跟前帶走，你老當時很擔心，現在我總算把他平平安安給你老帶回；而且今年娶媳婦，明年抱孫子；就憑這點功勞，可不可以跟你老多討一些吃喝？」

「你說的實情實理，真是多虧你。捷夫呀，你照著紀先生的話去辦，叫館子把那最好吃的最好喝的都端上來，一定要紀先生他們喝個歡喜！」

捷夫聽羅雷母親的吩咐，立時叫跑堂的捧過一個新的拼盤，我們重新斟滿酒，也一同先向老太太敬一杯。

羅雷說：「大哥，你們先慢喝，我把母親送去休息，回頭再來奉陪。」

「好吧，」我說：「快去快回！假若你離不開姚蕙，乾脆帶她一同來陪。」

「紀剛，」心竹接道：「你還沒有喝酒，怎麼說話忘了分寸！」

「可是，」我終於忍耐不住，情緒也真開始飄忽。「為什麼看不見宛如？」

「她今天正巧值班。」心竹答覆。

「其實，她來不來都無所謂，今天最少應該還有谷音。來吧，我們為他乾一杯，祝他早日萬里鵬程。」

大家喝過了。我又說：

「真正缺席的還是仲直。這一杯為他——」

大家又乾過，沒等我說，有人也舉杯為方儀。

「這杯酒你們要快喝，」伊正提示著。「羅雷回來了，這類話請不要再說！」

羅雷是一個人回來的，我們喝酒亂談更是毫無忌憚。杯起杯落，大家的話也都有欠斟酌。

「大哥，你少灌幾杯行不？」羅雷竟然制止我，並且對我建議：「留著這份精神，去找宛如算帳吧！」

「你這話說得糊塗，難道大哥的心裡只有宛如？罰你喝酒！」

「我不能再喝了，大哥。」

「你不喝我喝！」

於是我又連灌兩杯，羅雷急得發了識惱，說：

「你這叫喝酒嗎？你小子是雞飛蛋打，一無所有，看人家結婚，自己吃醋！」

……

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酒醒後立時就想起羅雷的話，他竟譏諷我是「雞飛蛋打，一無所有！」

「我真是一無所有嗎？」

我獨自對天花板怒吼兩聲。「我真是一無所有嗎？」

我斥責羅雷糊塗，因為我的心裡不「只有宛如」，我也曾向伊正表示我不否認宛如對我的影響。我由地下工作的祭壇上燒剩下來，現在還不到完全「為我」的程度。我不是一無所有，我現在還有一肚子的痛苦，我為我們這一群無所皈依的工作者憂心，我為我們這一代的青年憤怒。我們的理想何在？我們的希望何存？我們的歡樂向何處去追尋？

社長已經交代過，自五二三事件後整整停刊一年的《東北公論》，擬定下月份公開復刊，要我最少交上一篇東西以為紀念。現在已到五月中旬，我尚未動筆。今宵，酒後無眠風雨夜，正好趕稿。當我拿出稿紙鋪在桌上，忽然間死難同志們含怨的幽靈和所有顛沛流離同志們的生活慘象，都同時湧現在我的眼前，於是〈五月的厄運〉這個題目像鮮血似的滴落在紙上。

我寫：

五月裡，

我們沒有春天。
那紫燕穿越柳煙，
那黃鸝鳴徹雲巔，
丁香的馥郁，
紅桃的鮮豔；
這生命的歡欣啊！
我們——
沒有一點點。
　我寫：
五月，
是開花的季節；
我們的許多伙伴們，
在這個月份裡，
生命開了花，
開了血花！
　我寫：

……

我一連寫了三日三夜。第三個夜晚，我已筋疲力盡，心血嘔乾，我想下樓去取水解渴，恍惚間竟由樓梯滾落，跌斷了門牙。上班時，雖然可以戴上口罩遮住缺陷，但說話時「飛肥匪吠」，兜不住風，發音不清。我到附近的牙醫看過，他們說必須拔掉換新，而牙根正常牢固，若拔掉需動大手術，我只好跑到小河沿盛京施醫院去想辦法。

一切手續都由心竹辦好，我是自己人回娘家，有的手續根本免掉，並且提前把我排入手術表。上午十點鐘，他們請我到開刀房，先在預備室做局部準備。有些在羅雷婚禮上未得見面的同學，聽見消息都抽空趕來慰問，不是為了牙齒，乃是為我們曾經受過的那份苦難。無論如何，同學們還都把我們看作是「夠樣的」人物。

同學們都走後，我一個人躺在手推床上，閉上眼睛，靜靜地等，靜靜地想。還不知想些什麼，就聽到預備室的門輕輕地被推開，一個柔聲的腳步走進來，我以為是手術室裡的護士小姐來取材料，所以也沒有去觀看。

「大哥！」

竟是宛如的聲音發自我的床頭，我的心立即顫播，沒有勇氣睜開雙目，我說「是你嗎？宛如！」然後把手伸出，像手術時痛苦求援的患者想要抓住一點實物……宛如也把手遞給我，一隻溫軟的手，

親切的手，連接昔日生活情感的手，讓我握著。我暫時陶醉了忘卻發言，真要叫我說話，我也很難決定在這個時候說些什麼才好，只好讓時間無聲勝有聲地向前流過……

宛如親切地告訴我：「大哥，早聽說你已回瀋陽，總想見你也沒有見到你，我也不是你們那一黨的人，我也不愛到大帥府去看你。你什麼時候回到醫院裡呀？羅雷羅大哥，心竹葛大哥，他們都早早回來了。你們鬧事那年，你們家裡可真受了大禍了，當然這也不能怪你們。去年春假，我回泰城家，在普濟醫院碰到紀伯父，伯父和叔父都說只要你能平安回家，什麼都不希望了……你就趕快回來吧！英雄已經做過了，做個大夫就行。不然，你再在外面胡鬧，老人家會傷心的。大哥！你聽見我講話沒有？」

當然我都聽見了。我雖閉著眼睛卻開啟心門，讓宛如的話一個字一個字滴落在我的肺腑。我靜靜分析她說話的心理，細細咀嚼她言語的滋味。勝利出獄死而復生已八個多月，現在才是第一次聽到人間的話語。宛如的胸脯必是緊緊地貼靠手推床頭，經過手推床的彈簧，可感到她那撲咚撲咚的心房跳動。在紗布藥棉酒精消毒水外，我還嗅到女孩子們特有的芳香。什麼夜行人苦行僧，我都不要做了。陽光、花草、清泉該多好！我本是凡間的活人，我還是喜歡充滿煙火氣的十里紅塵。宛如的話雖然有些責怪勸誡，聽起來卻是那麼悅耳受用。若是我的親妹妹，我的母親，我的父親說我的工作是「胡鬧」的話，我一定要出言駁辯，但宛如的話就是對，一百個對，甚至我的眼中已隱含了感激的淚水，我是不應該再「胡鬧」了！於是輕輕問她：

「你還有什麼話說？」

「我要聽你的啦！」回答得依舊那麼天真。

「我的話可能太多，但我只先問你一句：你勸我回醫院，我還有什麼希望？」

「做醫生嘛！」

「做醫生有什麼意思？」

「救人嘛！」

「誰來救我呢？」

「大哥……你……」宛如的聲音有些慄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該明白！宛如，我要聽你心裡的話！」

由手推床頭傳來她心跳的韻律開始紊亂，同時聽到她的呼吸轉為急促，而她也陡然地迸出一句：

「你活著回來，不如你死去！」

這是屬於我希望聽到的那類言語，但宛如如此說，倒是超出我意想的濃烈！我立即睜開眼睛想看看她的表情，可是預備室的門開了，護理長高聲叫著：

「孟小姐，請你幫忙把紀大夫推過來！」

俗話說：「壞牙易掉，好牙難拔」，也許是「醫不醫己」的關係，他們弄了半天，最後還是用全身麻醉。

手術後，心竹送我回他宿舍休養，借著麻醉劑的餘力，我整整睡了一下午的覺，把許多天來的疲憊都恢復了。醒來時已近黃昏，我沖了一杯牛乳當做晚餐，然後在房前的庭園中散步。這座花園洋房本是蓋爾教授住的，位於我們大學宿舍區的一角，光復後分配獨身醫師住用了。蓋爾教授是國際病理界知名學者，最喜愛肯讀書的學生，谷音被捕前曾留在他的教室裡研究，現在他又在美為谷音辦了一份紐約大學的獎學金。當然這還要感念他住獄時在美俘營中治病的一點機緣，若不是杜克少將回美後熱心幫忙，他與蓋爾教授也不能這麼快取上聯絡。夕陽西下，倦鳥歸林，舊地重遊，倍增感思！

心竹自醫院查房回來很晚，我想和他談談，他認為我於牙部大手術後必須絕對「住口」！不然不易消腫。這，一方是朋友的忠告，同時也等於是「醫師命令」，我只好幾次忍住要說的話，躺在床上跟自己商量。

夜是靜的，夜裡的獨身宿舍更靜。席夢思床十分溫軟，使我這風塵客不易適應，何況白天睡多了，這個時候更容易清醒。手術部位也開始加痛。比這更難忍耐的，還是宛如那句話重創了我的心。自從聽她那句話，我心一直在顫抖。初回瀋陽得悉她與徐凡訂婚，我雖內心追悔激動，一想只好「算了」！因我一向主張：愛一個人，就要使所愛的人幸福。宛如既已投向徐凡，就該使她心安意靜，不對她做任何形式的攪擾，像在龍江時我不給詩彥寫片紙隻字一樣。因此我住大帥府，出小南門到小河沿沒有幾步路程，卻從未回過施醫院，就是基於此種心理，並不是如羅雷所說怪誰怨誰。

天地不仁，鬼使神差，我竟因回來拔牙而聽到宛如那句話。她本應慶幸我的生還，卻反認為我不如死去。

我一定要弄明白這話裡的真正涵義。

「心竹！心竹！」

心竹以為我發生緊急情況，迅由外間走進，扭亮檯燈，見我平靜躺臥，不免惶惑。

「你喊叫什麼？」

「我想說話！」

他皺皺眉頭，咬咬嘴唇，沉思了一會，便斜依在床前的沙發上說：「你說吧！我實在也睡不著。」

一個更深夜，兩位失眠人，談話是最好的辦法。

我倆都燃起一枝紙煙，我是不便吸的，但只看著那些煙雲繚繞，也能減卻不少煩惱。

我告訴心竹，今天在手術預備室裡宛如向我說的那幾句話。我問他：「你看，這是什麼意思呢？」

「她真這樣說嗎？」

「我的牙疼就夠受的！難道還有興趣編臺詞？」

「這是什麼話嘛！」他猛然將大半枝煙摔落。

我也從床上坐起。「是呀！我就是要問你，這是什麼話嗎？」

「既然如此，我就把一切情形告訴你。」

於是心竹說他跟我去龍江一趟，沒有見到詩彥就怪令他洩氣的，滿希望回瀋陽能把宛如的好消息帶給我，誰知她已訂了婚，所以也就沒有寫信告訴我。可是宛如每次遇到心竹都要打聽我的消息，要他把我這幾年的情形詳細告訴她。譬如工作內幕啦，獄中受刑啦，有沒有感情密切的女同志啦，還有一次問到有沒有在龍江會見詩彥啦等等。有幾次心竹很想把我們在長春的心意告訴她，可是總未講出口。因為那樣怕使她心緒不寧。同理，他也未把這些話告訴我，雖然我回來以後，宛如因未見我回醫院，又向他追問幾次。最後，心竹結論說：

「事實很明顯，這種女孩子一點沒有主見。你走了，她就愛上別人；你回來，她又想念你；朝秦暮楚，反覆無常。你還值得為這種人去傷腦筋？」

「心竹，你不能這樣批判她！她的個性雖然柔弱，但對愛情不會毫無主意。假若責怪，只能責怪這個時代，或者責怪我自己。她是個善良而單純的女孩子，我們不能期望她有堅強的行動。當初她曾經向我表示過她的感情，只是我裝做不知，故意漠視。現在，只能說是我們在變，我們的命運在變，不能說她朝秦暮楚反覆無常。假若今天我們不是活著回來，我們還有何話說？」

「那麼，你打算怎樣？」

「你聽我慢慢講嘛！」我有些不耐煩心竹的順口打岔，他也可能討厭我的囉嗦。這不能怪我，

我的牙齦腫脹，忍痛說話，自難流暢。

「我現在有一個辦法，」我肯定地表示：「以前為了工作我曾經擱置、曾經迴避、曾經放棄的感情，現在我想堂堂正正地收回，不管它在此期間經過什麼變化。除非……除非她……」

「除非她結婚？」

「不，除非她本身現在不愛我！」

「你以為她還愛你嗎？你知道他們決定下個月就結婚了嗎？」

「這就是我要和你討論的目的。我失眠請你也陪我失眠，就是要弄清這一點。上午，我還以為宛如說的那句話是一時激動，超乎想像。方才聽你說她曾一再地打聽我，使我深一層意識到那是她從心底發出的悔怨。為什麼悔？為什麼怨？那是由於愛！那是一種愛的悔和愛的怨，我不能再漠視，再裝做不知，再任她對於她的愛猶疑徬徨。假若她與徐凡的婚約是錯誤的話，我不能讓它錯誤下去！」

「這種愛徬徨的女孩子的愛，要不得！唉！我勸你還是放棄吧！」

「不！我不能再放棄。我要急救！這不是像你所說她個性柔弱愛徬徨，實在是愛的徬徨。若是她過去對我沒有過愛，或者說現在對我已沒有了愛，那她今天就不會有愛的徬徨，甚至於悔怨我活著還不如我死去。我們都了解她的性格，她不像詩彥，若是詩彥遇著這種情況，她不會猶疑，她想回來，一下子自己就會回來。可是宛如，我們得另想辦法——」

「什麼辦法？你想把她搶回來？」

「不是搶，是為她開門，敞開門，歡迎她回來！」

「你想辦法開門吧，我替你跑路。不過，我不敢保證能跑出什麼結果。」

「不管結果如何，我們現在要面對一次現實，不再迴避。明天，我決定還住在你這裡休養，你把宛如邀請過來，我要親自和她談談。」

31

「宛如，大哥請你原諒，今晚請你來想和你談談。」我開門見山的表示：「以前，大哥總把你當做自己的妹妹看待，有時候雖然也想到妹妹以外的關係，但因為怕連累你，就一直自持著做個大哥的立場，所以每逢遇到你有些特殊情緒時，我就申斥你……故意說你是小孩子，故意說你不懂事……我想那時候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現在在這裡，向你做一次總抱歉！」

「不要這樣講嘛！大哥，」宛如也很感動地：「其實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幼稚無知！當日本人到醫院來捉人的時候，我才知道大哥們真做著偉大的工作，也明白了大哥常常鼓勵我們的話不是空談。所以鬧事那天晚上，我雖不知大哥在哪裡，但我一面替大哥擔心，一面替自己後悔；我覺得對大哥這種人以前竟有些不該有的感想，實在不應當……」

「我給你矯正，」我說：「你方才所說的『感想』，應該說是『感情』！」

宛如看看我，沒有辯駁。繼續說：「所以那幾天，我每天都為你禱告，求上帝保護你……我還想過，幸虧大哥常常申斥我，不然，我若成了大哥的絆腳石，該多罪過！大哥，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後悔我那小孩子般的感情，現在反聽你來抱歉，我是多麼不安！」

「好了，這就夠了，」我緊接著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要討論誰該向誰道歉的過去事，我是想和你研究研究過去在我們中間到底發生過什麼樣的感情。過去的事只有我來負責，因為有些話當時不能明講。現在，我們從頭想想，我們從認識到分開以至今天再相見，我們是否只有兄妹感情？這中間有什麼變化？變化的結果是否合適？有沒有遺憾和錯誤？假若真有錯誤和遺憾的話，趁著這錯誤還可以扭轉，遺憾尚能補救的時候，我們要扭轉它！補救它！」

「大哥……」宛如有些哀怨悽悵地說：「今天，還提這些做什麼！」

「不！宛如。今天我們一定要弄明白，你已經更大更懂事，我也沒有工作祕密再要隱避，我們要公開地談，要坦白地說，我們都要說心裡的話。」

「唉！一切所發生的事，不都是公開而坦白了嗎？」

「不是這個意思。過去的不說，昨天我們勝利後第一次見面，你就悔怨我不該活著回來，我即感到你心裡定有隱痛；再加上葛大哥告訴我你對我特別關心的消息；還有我去錦州時，老牧師的太太也向我說醫院鬧事的時候，你還燒了一本日記；一切一切，都證明你我之間有些問題……宛如！我已說過，過去的錯誤，都由我自己負責，今後不能再有錯誤。」

「大哥……錯就錯了吧！現在還有什麼辦法？」

「宛如，」我開始激動地說：「我很誠懇很鄭重地向你說，這是關係我們彼此一生幸福的事，我們先不要顧慮既成的事實，我們要從最原始的地方檢討，從心靈的深處研究，不能一錯錯到底

……」

「大哥……別說啦……」宛如低下頭去，聲音也低啞而淒迷，她似已被我趕到解剖臺上，但她不願被開膛剖心。她想做最後的掙扎，或者說是無言地求饒了。

「宛如——」

我也忽然說不出話，一股酸楚衝上鼻峽，幾滴熱淚自眼角湧出……但我強自噙住……稍靜一靜後對她說：

「宛如，現在坐在你面前的，還是你從前的大哥，我仍然以大哥的立場向你說幾句話：我明白地告訴你，大哥曾經做過一番像你方才所說的偉大的事，那是人生的另一面；你不知道大哥也忍受了很久很長、很重很大的痛苦，那是在事業中所得不到的感情。假如只是大哥自己，大哥可以忍受；假若你也有那種痛苦而且與大哥有關，那就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今天如能明確地談，坦率地談，也許問題很簡單，也許問題根本不存在。但你若不談，避免談，就表明問題深刻而嚴重。難道你還讓大哥像當初那樣裝聾作啞？」

宛如迅用雙手掩面伏在案頭上。

「這樣，」我說：「我只說兩句話：第一，大哥當初就愛你，那時未說，現在說出來。第二，現在我仍然愛你。我再說一遍……你都聽到了吧？至於你，我也問你幾句話。若是對了，你就點點頭；若是不對，你就搖搖頭。記住！要從心裡回答，不要為難；我不怕你說不，只怕你說假話。假

如你不愛我，我會永久站在兄妹關係上，大哥一向是剛強人，當我瞭解事實真象後，我會更剛強，而你又得重見你所崇敬而歡樂重生的大哥了。所以，現在，我先問你，當初有一階段在兄妹關係上，你曾對我蘊藏過別的感情。對不對？」

宛如沒有表示。

「你回答嘛！」

她點一點頭。

「但是大哥沒有表示，你以為對你沒有意思，於是不得不另做打算……」

「然而大哥是你最初發生感情的人，給你的印象最深！」

「假如大哥真死了，你會忘掉那過去……」

「不料大哥又僥倖生還，於是你發生了心理矛盾。」

宛如又點頭又搖頭，又搖頭又點頭，我幾乎弄不清她的意思，因我自顧自說自話。但當我把這些問題像小魚吐泡似地吐完以後，宛如也抬起頭來移開雙手，露出一副安詳而舒暢的面龐，那雙討人喜歡而充滿淚痕的大眼睛也流散出一種隱痛被人瞭解時的欣悅。

「事情簡單了。」我也比較輕鬆地說：「現在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你現在還愛不愛我。你可以用較長的時間考慮，然後再回答。」

她笑了！

雲開霧散，透出陽光，一切都象徵順利。於是我讓她：「來，我們先吃點東西！」那是心竹給我們準備的，就擺在我們中間的書桌上。

宛如遞給我一塊高級點心，自己取去一顆紙包糖，沒有立即剝吃，先在手中玩弄。

「大哥，還有一件事你沒有提到，」她回憶著說：「促使我另作決定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不單是你對我沒有表示。」

「還有什麼原因？」我疑惑。「我未向你表示，只因工作太危險，怕你受牽連，就是如此簡單！」

「我覺得那時，你似乎在愛詩彥。你好幾次對我誇獎她，說她比我勇敢剛強……」

「哪有的話！」我不等她說完即加以駁辯：「我們相處三年，和詩彥只能算聚首三面，那能談到這些！」

「我有這種直感，我覺得，至少詩彥的心裡會很愛你。記得我們共同相聚的那個夜晚，你們談人生理想談得那麼投機，一見如故。當時我就想，她與大哥也許比我合適……而且你又那樣支持她解除婚約……不然，我不會那麼早就答應徐凡。」

「唉！你意會錯了，那都是為了工作。」

「大哥，」宛如忽然建議：「我看你最好是等一等詩彥，這三年，她並未結交新朋友，她也許是正在等你！」

「錯了，你更錯了。」我向她解釋。「我走的時候曾將詩彥向葛大哥介紹。她是等葛大哥，並不是等我。」

「你怎能知道？」宛如不以為然。

「我們不必辯論，讓葛大哥自己作證。」我起立，走到圖書室的門前，喊道：「心竹！心竹！」

心竹開門走過來，嘟嘟囔囔地，滿臉不高興：「你們談你們的話，叫我做什麼？明天我還有一個大手術，我要溫習溫習解剖圖……」

「對不起，心竹，」我說：「我和宛如談得順利，將來免不了重謝你。方才宛如給我建議，要我等詩彥——」

「那你就等詩彥好了——」他竟板起臉孔拉出怪聲。

「不要說笑話，心竹！現在你必須把我們在長春那晚的決定，詳細講給宛如聽。這是宛如決定她下一步的關鍵。因為她誤會我愛詩彥，所以才轉向他人。現在，如果她了解了你與詩彥的關係，她就好考慮回頭了。」

心竹見我說得鄭重，便不再捉狹，然後介乎我們中間，坐在桌子一端，誠懇地向宛如述說我們在長春時的心意並一同去龍江的經過，同時也向她進言保證：「紀大哥確實愛的是你，不要誤會別的，回到他的身邊吧！你現在還只訂婚，很好解決。紀大哥已下了決心，即使你已經結了婚，若是

你還愛紀大哥，紀大哥仍會把你接回來。」隨後，他又對徐凡稍做微詞，這是在我的立場上不能說的。

「現在，你總該明白了，」我向宛如提示：「你還有什麼疑慮，統統提出來，然後好下正確的決定。」

「那麼，葛大哥，你一定要等詩彥喲！」

「那是一定的！」心竹肯定的表示，又向她繼續解釋。「紀大哥就怕你又愛他又不敢回來而增加你的痛苦，所以回瀋陽這麼久也不敢跟你見面。現在你就乾脆回來，別再猶豫！」他倒比我性急，單刀直入地向她叫陣，也許他急於回到隔壁書室，研究手術圖譜。

「大哥，」宛如起立，稍加思索地說：「你們二位都在座，請聽聽我的意見。方才紀大哥用了許多假定的話來問我，現在，我也用假定的話問問你們吧！」

「一句話就算了！假定什麼！」心竹故示不耐煩。

「讓她先假定吧！忙中出錯，事緩則圓。」我替她緩頰。

「假如我說……」宛如對著我，「我從來就沒有過呢？」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不好出口，我卻能坦然地回答她：「那就說明，大哥以前所做的處理都完全正確，只是把你昨天所說的話誤解了。由於現在把話說明，消除誤解，我們中間的感情仍歸原位，再無糾葛。等到你做新娘的日子，家鄉仍未收復，親族不克到場，我還可代表你父親給你做個主婚

人。」

我這樣說時，似乎已達到一種超然忘我的境界，對宛如做到了慈情的關懷，盡到了愛護的責任。

「你太好了，大哥。」宛如深受感動，繼續又說了幾個假如，自然都不成問題。最後也說到假如現在她仍愛我，我怎麼辦！

我當即表示，只要她說她還愛我，以下的事都由我與心竹處理。心竹也接口說，結婚日期、地點、方式，由我們自己決定，解除婚約的事由他出頭，明天手術完畢，他就去錦州找徐凡，不消三天便給我們辦個乾淨俐落。

「那麼——」宛如用笑瞇瞇而略感羞澀的眼色瞟著心竹。

心竹會意地：「好！你不好意思當我面說你愛他，我走開，我就走開！」於是他離去了這暫時不適合第三者存在的空間。

「你過來吧！」我說。

宛如稍顯遲疑但很快地從桌子那面轉過來。我本想再說一次，讓她再考慮最後五分鐘，但是我自己卻先不能自禁了……

心竹老早說過：「宛如是紀剛的！」我不能再將她遺失。

很久很久，她從休克狀態中甦醒，漫睜雙目，仰望著我，發著愣怔。

「我是怎麼的了？我是怎麼的了？」她喃喃地問。

「一切正常，一切美好。」

「不對……不對……我都與人訂婚了……為什麼竟在這裡……大哥，我是不是違背了社會的禮法？我是不是觸犯了上帝的誡命……」宛如又開始泫泫地流淚了。

「都沒有……你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訂婚；別人跟你訂婚，那是他們的錯。純真的感情是超自然的，超社會的，不受法律和習俗的制裁。沒有人敢說我們不對，我們是愛，愛是上帝的恩賜。上帝要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只要依從祂的旨意，尋求真純的愛，對它忠實……」

「是的……尋求真純……對它忠實……」

終於，宛如的淚消了，我們又並坐談起家鄉。談到那我們所熟悉的小城風光；談到冬日雪後在城外荒原上如何追索野兔的芳蹤；談到夏日黃昏在嫩江河畔如何赤足涉水捕捉小魚的樂趣……談到她父親還剩下多少根稀疏的白髮，也談到我叔叔是否仍如往昔地為敬仰他的患者醫病……同時還聯想到幾位聞名地方的好人，是否已遭受共黨的迫害……

我們似乎重溫了多年前我們在醫院裡的生活，只是比那個時候更親近，更無忌諱。我為她梳理那被拂亂了的兩條髮辮，她拿起我襟前的領帶默默地摺弄。我們曾談到徐凡的處境，認為他是一位善良無辜的不幸者；我們決定給予他真誠的同情，不讓他受半點刺激。我們也談到心竹與詩彥，為他倆未來的日子祝福。當然，我們還設計一下我們即將來臨的生活。

宛如告訴我，詩彥的父親曾對詩彥責問，可是詩彥沒有說明，所以她的父親一直對我誤會。我

說：「那真是誤會了！」宛如也問我由她手中要回來的信都弄哪兒去了，我告訴她地下時期我出版一冊《火舌集》，給她的信都蒐集在那裡，不但沒有燬棄，而且廣為流傳。可是我問她在她所燒掉的日記裡究竟記些什麼？她說她偏不告訴我！

我們娓娓而談，不知更夜已深。

心竹從隔壁書室出來，要送宛如回去。他說今晚他若再沒有機會睡覺，明天恐怕沒有精神開刀。於是我送她走到門前，對她說：「站住，面向我，讓我知道你快樂。」

她就像一名小學生似地，按著老師的口令，回轉身來對我微笑。

第二天，我的精神大振，立即回大帥府辦公。對各地流亡來瀋的同志比平時更有耐心地加以安慰，加以接待。昨夜，宛如對我所作的表示，使我重獲美滿的人生；今天我變成一個真正的慈善家，一點也不吝惜對別人付出關心；我心靈不再空虛，我要讚美上帝；對於依賴國軍力量可以接收東北，我也和別人一樣地充滿希望。宛如是我第一個留有美好印象的女孩，只要她還能以最初的感情接待我，我就不能不愛她。然而愛要忠實，不能有半點虛偽，更不可以一個人作另一個人的替身。現在我定靜澄思，我才知我確實是最初就愛宛如，只是她的性格不適於風險，又因愛她而深恐傷害她，所以只有將青春之火，青春的生命，青春的熱情，完全投注於工作。其後，我曾以不忍灼傷宛如的烈火失手燒向詩彥，幾乎以詩彥為鵠的射出愛神的金箭，在那段寂寞森冷夜行生活的夢中，也常常

飄起思念詩彥的煙。長春夜談時，心竹先要詩彥，我不得不回取宛如，我還有一點以為宛如是詩彥的代替，而今明白了，原來地下時期詩彥對我是宛如的化身，現在才正是物歸原主，各得其所。我真感謝上帝，幸虧我對詩彥所表現過的瞬間激情，適度而止，使我們互相間的關係只是一種朋友間最崇高、最美好、最善良、最聖潔的記憶。

下午六時，我早早到文化新邨去準備。我不理會那鬧哄哄滿堂的顧客，在人叢中找到任俠，對他說：

「老任，給我一個最幽靜最舒暢的房間，拿出兩瓶上好的美酒，再準備幾份特級西餐……」

「你好運，正巧還有一間。有高貴的客人？」他略顯驚奇，以前我們來都是隨便找座的。

「有超乎你想像以外的客人！」

「遵命！遵命！」他即吩咐侍女照辦，並將桌上的紅燭換新。

我就是這樣的人，我的快樂必讓我的朋友分享。我與宛如約定今晚在此舉行一次晚餐會，將我們昨夜的決定先向知己人宣佈，用俗話說也可算是訂婚，但我們不願用這無聊的字眼。我們也想徵求徵求大家的意見，用什麼方式擇什麼日期進行下一個節目。紅燭洋溢著溫暖的光輝，幸福在我心頭蕩漾。伊正先到；羅雷還沒有來，也許姚蕙又怕我把羅雷帶走，不肯放他離開，好在他不來也無關宏旨。可是時間已過，仍不見心竹和宛如的蹤影，任俠走過來問：

「老葛來不來？」

「他就是負責為我請客的人！」

「別又給急症患者耽擱了。」

「不會的。可能是被請的客人要打扮打扮，費些時間。」

「怎麼？是女客？」他興奮地舉起杯子，「為你祝福！」

「謝謝你。時間尚早。」

我說這話只是表示我對成功的慎重，正像外交家對於沒有公佈的消息，不願事前透露。但任俠卻饒有興趣地追問，並願以啤酒一打先換取內幕新聞。

大半多數人平常無事時，都懶於給朋友寫信，寥寥數筆就乏善可陳了。但遇有重大快樂或極度悲傷的事則迥然不同，後者是忍不了，前者是裝不住，因之便要逢人傾吐。別說任俠追問，不然也要向他宣告一番。同時我也正式請他為賓客。有些事伊正早已知曉，但我不怕他聽得膩煩。話剛說畢，心竹來了，只是單單一個。我繼續向樓梯口張望，後面也上來幾位女客，個個都不是宛如。

「別看了！」心竹走到我的面前說：「她若來，我不會走在前面。」

「什麼緣故？」我有些敏感。

「我早就說她是個膿包……」心竹一坐下就開始咒詛。「我到班上去會她，別人說她請了一天假，我找到她的宿舍……她還在蒙頭大哭……總之，她不幹啦！她後悔啦！」

「她後什麼悔？」我怒問道：「昨夜我們說得清清楚楚，每一處關鍵都由她主動抉擇，我沒有

半點強迫她的意志，她又後什麼悔！」

「你不要對我兇嘛！」心竹不耐煩地對我傳述：「她說她後悔她那不幸的命運；她後悔在沒有接觸徐凡以前暗中愛過你；她又後悔在你走後公然愛了徐凡。這些天，她就很痛苦了，但她還能支持。昨晚你向她攤牌的時候，她雖毅然回向你，可是離開你以後，她又失去了那份勇氣。她說她與徐凡訂婚也快一年，不是沒有一點情感。」

「那麼說她愛的還是徐凡，昨夜對我是一片謊言！」

「事情那樣簡單，她就不必哭了。她說她不是不愛你，只是太怕人間的閒話和上帝的懲罰。她對我說，請你不要再想她，希望你能像當初那樣將她捨棄，將她忘去，或者就當她死掉！」

「真是胡說！我們誰也沒有死掉，我怎能忘記她？她又怎能忘記我？」

「所以我說她是個膿包……就是讓你恨恨她……討厭她……」心竹歉意地解釋：「這樣，你的精神會好些，不然你有什麼辦法？」

「我什麼辦法也沒有，」我頹然地把兩條癱瘓無力的腿擺開，將身體仰靠在卡座上，斷斷續續地說：「宛如本是經不起風波的孩子……揉搓感情的事，她伸不出手……現在看起來，她連堅持一個選擇的力量也沒有……怪可憐的……都是我不好，傷害了她。我想只等明天再去找她，把她拖出來，帶她上火車上飛機，去北平去南京……遠遠地走，遠遠地離開……離開這一切令人矛盾痛苦的地方……來吧！乾杯吧！為這多變的時代，為這多變的情感，乾杯吧！」

一個時間內，聽到一件事兩個極端的消息，使任俠尚義的任俠君動了激忿，說：「這種女人根本要不得！天涯何處無芳草？我看你就算了。不然，你想出氣的話，我可以給幾個朋友打電話，把姓徐的抓起來幾天，看她如何……」

「好啊！」我未加思索地應和。

「這事萬萬做不得！」伊正即時出言糾正，同時持重地向我說：「紀剛，現在你要理智地處理這事。很明顯的，此時事難兩全，進退都有暗影。為宛如計，你應該放開她，別使她再多受刺激。你自己就曾說過，愛一個人就應該以她的幸福為重。當然，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不過目前，你最好是實踐你的理論了。」

32

不怪有人說：上帝是快樂時候的魔鬼，魔鬼是發怒時候的上帝。原來上帝與魔鬼竟是一位「神」的兩面，對人類的禍福任興予奪。只兩天中便賜給我一次感情上的瘧疾，忽熱忽冷，一喜一憂，真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

我一點也不剛強了！對宛如還抱有一絲沒有希望的希望。我不理心竹那種鄙夷不屑的目光，仍請他給我安排一次約會，好歹我都要和宛如再談一談。

心竹下班回來了，對我撩撥地說：

「好消息！好消息！她要見你！」

「什麼時候？」我自然急著問。

「就是今晚。」

「她說來嗎？」

「她要你去！」

「我去？什麼地方？」

「到他公館。」

「她，哪有公館！你是說到她宿舍？」

「你說誰？」

「宛如嘛！」

「我說的是負責人！」心竹忽然拉下臉子。「你別老提宛如宛如好不好？今天我在班上，伊正打電話來說，負責人昨晚已由重慶飛回來。國軍今日中午也收復了四平，新一軍正繼續前進，指向長春。所以負責人急急找你！」

負責人說：「我知道你對黨政工作毫無興趣，我不反對你回你本行，但你不必今天就急急地退出工作。我還離不開瀋陽，希望你能隨軍到長春去，主持北部的工作。老吉黑兩省，你過去的關係最多，長春一接收，他們又會先聚集在那裡。你想，那麼多同志流亡無依，那麼多同志生活困頓，那麼多同志家敗人亡，那麼多同志苦悶徬徨，你就為了要做一名什麼時候都可以做的醫生，而掉頭不顧，而安心離去？今天，我對任何同志都不能再下命令，但我對任何同志不能說沒有責任。所以我找你來，以同樣沉重的心情期待你再擔負一段工作。」

我隨新一軍，再度進入長春這一天，正巧又逢五二三。不過我們並沒有為這個日子興起更多的感嘆，因為像國軍剛進瀋陽時一樣，一切人們又都燃起新的希望。自「四一四」長春棄守到「五二三」再度收復，期間甚短，而共黨此時的城市政策，除了作各種反政府的宣傳並搜刮物資金錢外，

對我同志尚少殺害。歐凱同志們也都平安潛伏住了。長春一接收，鄰近各縣市潛逃來長的同志們也都有了還鄉的希望。這一期間我們與軍方配合得很好，我們許多同志都參加了軍隊，主要的是擔任戰地情報任務。我們的同志慣於冒險犯難，又熟悉地理社會人情，而且很多人尚在未收復區潛伏，線索密佈，消息靈通，對國軍的擴展推進助益頗多。

中間，我曾回瀋陽一次，因來去匆匆沒時間到小河沿去看心竹，那晚就住在中蘇聯誼社，和伊正幾乎談了個徹夜。所談者都是時局與工作問題，甚少涉及感情，因為宛如已於我回長春那天被徐凡接到錦州去了，對我等於不了了之。最後伊正告訴我，他已決定下個月辭掉行營職務，想再回東北公論社重幹一番。這一次不是被捉，是他自願，因為他「逃」了一個階段後，覺得在任何處「工作」，都不能發揮理想。

國軍於收復長春、吉林，及附近幾個衛星縣份後，軍事進展便逐漸地停頓下來。先是政府擬定拿到東北的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五十二軍、十三軍等五個軍，不能同時運到；而國軍於線的突進外仍須做面的擴展，接收一城後又須留兵駐守，開始背起包袱；因之沒有更多餘力繼續挺進了。其次是中共的武力已經形成了野戰軍，和國軍指向的矛頭正面對壘。再其次是三人小組發揮了利共的功能，軍事調處的結果，處處對國軍不利。於是收復區不足東北整個疆土九分之一。沿山海關、錦州、彰武、通遼、遼源、農安、德惠、五常、永吉、海龍、輯安、安東，折返遼南的金、復、海、蓋等縣境，形成一個很小的內球。充氣的管道，從陸上只有遼西走廊；從海上因旅大仍在俄軍

霸佔中，只能利用設備不良的葫蘆島和營口，無力使這個小球擴展。時日拖延，這個小球的球皮也逐漸硬化起來！

一晃就是三個月，復刊的《東北公論》也出了三期。六月份刊出〈五月的厄運〉，這篇文章在同志群中掀起很大的反應。歐凱曾說：「這真是為我們苦難的、苦痛的、苦悶的同志們，吐出一口濃重的怨氣。」七月份刊出〈北荒道上〉，那是我一年前在「北滿」草原上和尚勇同志宣撫民眾武力的一段生活經歷。我強調那廣大的未收復區的民眾，對政府企望擁戴的熱誠——如果我們能把握時間，在他們尚未完全冷卻以前——仍是政府的助力。八月份刊出一篇〈東蒙風雲〉，那是自王爺廟方面潛來長春的同志們所提供的地方情報，由我輯寫而成。所謂「東蒙」即指偽滿時期興安總省所轄範圍，以王爺廟為政經中心，界於遼北、黑南、熱東等蒙旗地區。日本佔據東北初階段，曾誘使內蒙古脫離中央成立內蒙自治政府，陰謀未逞卻留下分化的禍根；勝利後，外蒙基於中蘇條約在蘇俄勢力下宣佈獨立，又對蒙胞增加了新的刺激；而共黨在此時期也採分化破壞計策；因此「東蒙」地區的野心家們，已在王爺廟組織起「東蒙人民自治政府」，使東北的接收工作更混亂、更複雜。

〈北荒道上〉和〈東蒙風雲〉這兩篇文章特別引起新一軍政治部的興趣，派個科長來請我去研究。他們說四平七十一軍方面也很注意這項資料。當然他們所注意的還是戰地情報而非接收政策。關於大局大計我們已無力參與，我們的意見，我們的資料，能獲得地方軍政人員的重視，亦屬不枉徒勞。

軍事活動沒有停息，戰線卻很少變更。政府軍隊未做擴展性挺進，共方的武力則時常到接收區內來突襲竄擾。大體說來，自三十五年冬初至三十六年春末，那是一段軍事僵持的局面，或者說是兩個角力者未分勝負前那種形態的平靜時期。可是流亡同志們卻陸續增多，分別集中到四平、長春這兩個地區來。按著新省制言，松江、合江、黑龍江、吉林，都順著中長鐵路自哈爾濱而南下或自永吉而西來；嫩江、興安、遼北，則沿平齊線集中於四平。最初由於以為國軍可能隨時前進，部分同志來後，尚可潛回活動，以便策應；最後則有來無往了。

當我再回長春時，負責人曾和我談幾點現階段工作內容，什麼社會建設工作啦，共區同志聯絡工作啦，流亡同志安撫工作等等。負責人說：「我們都是農村出身的人，我們該懂得種莊稼的道理。我們在現地不計安危冒險犯難地啟發抗敵救國思想，等於在人心裡撒種子，使它們發生成長蔚為革命運動，造成我們在東北所做的這一段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這一份莊稼人的收成，當然是我們一大群熱心幹部們一番艱苦血汗的結晶。我們不能，我們不忍心，我們也不肯讓這些善良的禾苗受摧殘而枯萎。我們在這種生長環境裡所種所收的同志，是捨私為公的一群，是見義勇為的一群，是有理想有抱負有希望的一群；我們不能使他們失望悲觀而消極；我們一定要照料他們，培植他們，為中華民族傳遞下革命復興的命脈！」

我自己卻把這些都當做是廣義的善後工作來做，以了結我地下工作未了的責任。但做起來是相

當艱難困苦。因共黨為戰後復員建國的總障礙，對共鬥爭為政府對內的總體戰，我們只將同志就其志能推薦參加軍政黨團體系內，做總體戰鬥的一份子即可，但接收地區狹小，僧多粥少，無處用武；而流亡同志日眾，只維持其食宿一項，即成了嚴重問題。所以對我來說，那真是一段痛苦的生活。不是悲傷，不是失望，只是痛苦。白天痛苦，晚間也痛苦！

回想「五二三事件」對我們的打擊雖大，但那次痛苦的種子使我們勝利後有一段豐盛的收穫。儘管俄軍明火執仗，儘管中共趁火打劫，我們的同志仍能憑藉信心，衝破艱危，在那一段歷史的空檔裡，給地方維持了安定與和平。可是接收遲遲不前，中共日日膨脹，我們那一段興奮努力的耕耘，給我們種下更多更痛苦的根苗。因為我們大部分同志都已暴露了身分；我們的家屬親戚朋友，也因愛國的熱情，響應我們、協助我們而表明了他們的立場。所以在共黨比日本還兇惡、比俄軍還殘暴的狠毒政策下，大家都成了代罪的羔羊；有些忠貞的同志們，起初還持續著「現地抗戰」的理念，不願離開自己多年堅守的工作崗位，等到無法再潛伏的時候，便被共黨像破冰捉魚似地，一條條被捉去宰割了！

白天在辦事處裡所看到的盡是愁眉苦臉，所聽到的盡是悲慘不幸，同志被屠殺的一天天的增多，同志的家屬親朋被殘害的一天天的擴展，僥倖逃脫虎口而來長春找到我們，我們竟無法安慰他們的傷痛，甚至不能為他們解決最低的物質生活。什麼人能身當此種淒苦的現實而不心痛？瞻望前途，我自以為可以早日結束的善後工作，也變成了遙遙無期。尚勇同志說對了，「鋪局容易收攤難」，現

在已到了無法收攤的局面，因之情緒之低劣，心情之沉悶，可想而知。我曾寫信向伊正發洩，伊正居然又向我說教起來。他說：「支持一個人活下去的理由，有時候不是對他自己有何意義，而是他對人有何意義。」他又說：「目前這——」不用他說我都懂得，只是他比我幸運，他所面對的是鉛字和稿紙，我所面對的是全身創傷，滿腔悲痛的一群活人。

當然，在理論上講，這是國家民族的不幸，這是國家內亂的結果，我們並沒有對不起別人的地方，只是在道義上感情上，卻是我們擺脫不掉的負擔。唯一使我們稍感輕鬆的，便是負責人去重慶時，曾請求教育部核准惟亮等數百餘位蒙難青年同志進入各大專院校復學讀書，使他們得到深造的機會，以便在未來的日子對國家民族做更多的貢獻。

伊正重編《公論》後，曾親到各地旅遊一番，一以了解各地實情以為立論之本，一為分門別類邀請撰稿人。他來長時對我講，《公論》已做到為民喉舌的地步；但因係綜合性月刊，比例之下，論著及報導較多，文藝較少；而輿論之建立與感情之疏導，對當前社會風氣與青年心理同樣重要。所以他計劃每月增出《公論副刊》一冊，以藝文與青年問題為主。他要我多寫一點情感方面的稿件，像〈五月的厄運〉那樣的東西最受歡迎，而且指出我與宛如的故事就是最好的題材。他說：「當然你不願再提她，也不願自揭傷疤，但放在肚子裡並不會好受。你要知道，這不是你個人的不幸，這是時代的不幸。我知道多數同志有此類似的遭遇，你如能將你自己的故事寫出來，也算是替這一代的青年提出控訴了！」

用個人的感情故事寫一篇東西，當宛如最後反悔時，我自己也曾想過。為了了卻這一段情潮，為了整頓一下這被攪翻了的心緒，然後好重新做人。但總以為在這群眾的大苦難時代，實在不宜記述個人的事；經伊正如此提示後，我就有勇氣動筆了。

文章定名為「葬故人」。

伊正認為不妥。回信說：「何必咒人！」

我不知道伊正由這個題目聯想到什麼。我未將內容大綱先告訴他，他也許以為我只是寫宛如的故事，因為到目前為止，他所詳知的只是宛如這一面，而宛如是那樣良善的一個人，正在錦州新婚燕爾、鳳凰于飛地好生生活著，我怎可活活地將她埋葬？事實上，我是想用這一篇文章結束我過去所有的感情，這感情中至少包括對宛如和詩彥兩個女孩子的。至於到底互相牽涉到什麼關係，深刻到什麼程度，其間有怎樣的錯綜複雜，伊正不知道，心竹不知道，宛如、詩彥不知道，可能連我自己也不完全知道。

伊正知道我與宛如最後的糾葛；他雖聽說詩彥，卻搞不清我與詩彥的關係。心竹知道我與宛如和詩彥的關係，卻不知我真愛的是誰。詩彥是由宛如的介紹才與我相識，她曾以為我與宛如交往日久，必定情深。而當我出走前夕與詩彥有一段過從，宛如又直感地認定我的心另有所屬……我自己呢？坦白地講，我對她倆都有好感；只因由於工作，使我一直站在「感情的邊緣」，當初既沒有作選擇，現在就很難說我到底是愛她們哪一位。世事推移，死生驟變，為了尊重友誼，我曾甘願摘取心

竹給我剩下的一個，誰知徐凡這小子竟在馬路邊上拾到珍寶，現在的我，正如羅雷所譏斥，真是「一無所有」了。

在《葬故人》裡，我能寫我的真感情，卻不能寫出真實人物。宛如已琵琶別抱；詩彥尚陷身共區，我的好友心竹仍在等待著她；我必須小心我的筆觸，以免傷害他們，因為我實實在在關心著他們的幸福。於是像所有小說作者一樣，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女主角則由宛如與詩彥合塑而成。我將男女主角都寫成為純情者，雙方都願奉獻給對方以最純美、最真實、最完整的愛情；但時代給他們以攔阻，像我們地下工作的實況一樣。他們在不同的戰場上，一面勇敢地奮鬥，一面殷切地期待那一天的來臨。

勝利——終於來臨了。可是他們都在抗敵工作中受了傷害。男方因非刑而成重殘，女方則受辱於日特。他們本可早日相會，但他們都為了某種理由，不約而同地以不願放下工作而南轅北轍。事實上，工作確也沒有一刻將他們放鬆。等到他由側面得知她已病重瀋陽，由哈趕來探視的時候，她已死去旬日。他所能看望所能觸摸的，只是一坯新塚。

這些情節，有的得靈感於重傷成殘的同志們的遭遇，有的受啟示於方儀的不幸，最後的結局是借用鍾鳴送給我那張油畫「凱旋者」的場景。西風落葉，斜陽孤塚，征戈棄地，戰馬嘶鳴；那位凱旋的戰士佇立於孤塚前，淒然俯首；一種蒼茫、落寞、孤獨、虛空的氣氛，迷漫於……

這張油畫在我這一段多變的生活中，常常若隱若現地與我發生關聯。我不知為什麼在秋林洋行

裡一見動心地喜愛了它。鍾鳴經過審慎考慮後，在停止工作時把它當做純友誼的紀念品贈送了我。我曾把畫面的含義，隱喻地講解給宛如聽。誰知仲直一見它便產生了一種不幸的感覺；無論如何，這張畫和他扯不上關係！但他卻先我而遭受生命的不幸。也許羅雷做得對，他否定它，撕掉它，所以他今天的結局最為圓滿。

我不相信這張畫竟成了符籙，因為我們任何人的命運都不能與它相吻合，但若綜括概觀，我們共同的命運也就等於如此了，所以我就用我由這張畫所獲得的深刻的感傷印象，給我的故事落幕。

伊正也許只注意「死亡」這一點，以為我殘忍，所以勸我「何必咒人」！其實我所要埋葬的，不是宛如、不是詩彥、不是任何一位與我相識的故友；我所要埋葬的，實實在在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那一份感情；如此而已！我要解脫，我要追求新生，我必須將我那份舊日的感情埋葬掉！

《東北公論》這時候已成為東北地區發行面最廣的刊物，《葬故人》因之也贏得廣大的社會讀者層，不僅我們自己的同志，連那一代的青年人也都響起了共鳴。不過在該文付印時也有一段插曲。我原意在故事的結尾時，讓我的男主角在極度悲痛時戳破他的中指——其實是我用我自己的血淚和情感——在那個墓碑上寫出我為她所撰擬的七字碑銘，曰「革命誤我我誤卿」！且擬加繪墓碑插圖於刊頭，以增加悲悼氣氛。大凡人對自己的悲悔不能承受時，往往找些藉口以減輕心理的負荷。我「誤」故人自然是我自己的責任，但我何曾想誤願誤，只是因革命把我「拖」住了。七字碑銘中上下兩個「誤」字是各有不同語義的。我「誤」故人，是我對故人表示我的遺憾、我的虧欠，和我的

懺悔！並沒有反悔或譴責我們所作所為的革命工作的成分。但伊正卻在揮淚斬馬謖的心境下把它砍掉了。他來信說明：「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文章千古事，《公論》與《副刊》皆為公器，我不願在目前情況下有易滋思想混淆的言論與情緒灰黯的文句在本刊出現，更不願別有用心者，斷章取義、造謠附會地來否定我們用生命所寫的歷史功業！」他所用的帽子太大，使我不敢與辯。這故事又繼續刊出兩期，尚未完結，就在這前後連載的期間內，東北的局勢，社會的情況，我個人的生活，統統起了重大的變化。

三十六年春末，國軍與共軍僵持對峙的勢力開始消長；先是國軍有力進攻而未進攻，因之敵軍雖無力抵抗卻亦不必後退；這時倒是共軍發動反撲行動了。經過德惠、農安兩處重大戰役後，敵我元氣皆損失慘鉅，我再無力進攻，敵亦無能反撲，形成雙方就地喘息之局。五月末，共軍又對四平發動「第五次攻勢」，經我軍民四十晝夜的浴血保衛，七月一日方始解圍，其他失落的衛星據點地區則從未收復。從此政府軍困守點線；已接收之面復被撕裂，吉林長春，長春瀋陽間之鐵路交通，亦時時遭受割斷；安東、通化之國軍為縮短戰線，主動撤守；遼南遼西之軍事優勢，亦日漸逆轉。

在國軍軍勢這樣有氣無力所控守的接收區中，社會人士的目光卻完全被選舉熱潮所吸引。選舉是民主政治第一步，是社會建設的基石，是實行三民主義的一個重要里程。尤其「以民主對獨裁」、「以自由對奴役」為反共鬥爭的重要武器。政府為應全國的要求，已決定定期舉行大選，期能以行憲來解決國內的重大政治問題，實為明智的決策。大選之前要先辦地方選舉，選舉是一種

競爭，競爭易導致紛亂，尤其在烽煙處處的半收復地區，內有社會民生艱困，外有共軍圍城的種種不良條件下，更是問題重重。惟在地方選舉時，各接收區之省市縣民意代表，多半由地下工作同志當選；這不僅使他們多數人獲得了服務機會，以繼續發揮其革命抱負；對我自己的「善後工作」的包袱也減輕了許多。因為在反共鬥爭工作方面，今後可黨政軍民互相配合；在對共區同志聯絡以及流亡同志安撫方面，他們也都有些憑藉，可以分擔責任。我自己雖未能立即「功成身退」，但亦可開始做初步抽身的準備了。宜民同志已將其創辦之護校擴展為護專，要我擔任幾個鐘點的病理課程，我的老班同學主持長春施醫院，也歡迎我去做一名兼任醫師。十年秀才如白丁，許多掛著博士碩士頭銜的人，從政日久，在學術上已失去地位，而建設國家卻依賴科學的發展和學術的研究。我對臨床還沒有荒蕪那麼久，在教學相長、溫故知新的情況下，對目前拾取起來這份醫療工作，倒也勝任愉快；待我整個回歸本行時，也會輕鬆自如、覓機進取了吧！

歐凱同志當時當選為地方參議會議員，且被推選為議長。選舉時期我曾協助策劃，當選後他仍拉著我不放，我也只好陪他參與一段工作。

議會成立之初，新聞記者來訪，由我權充發言人。我據實情說出我的感想。我說他們這一群青年所以當選，自然是由於地方父老同胞對他們的抬愛，地方父老同胞所以看重他們期許他們，是因受地下抗敵時期許多同志流血的感動，所以他們今後的工作態度與操守，一定要不辜負地方父老同胞的期待，更不要有污染殉難同志所流鮮血的行為。第二天，某報編者在議會專訪的報導中，竟用

了這樣的標題：

「鮮血漂上來的一群！」

這樣富有色彩與刺激性的詞句，立時引起政府官員的注意。但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們了解「當選」是容易的事，當選後要真想做一番代表民意、監督政府、建設地方，以及革新政治是很難的。一因軍事時期，一切都要便利戡亂，有許多事我們不能不容忍。一因軍政人員大都是國民黨員，同為三民主義的信徒，又不能扯破他們的顏面。所以除了聽聽施政報告外，便只有代表人民去前線勞軍的份兒了。

民意機關畢竟也是機關，代表人物不能不衣冠整齊。冬天，我和歐凱都做一套海軍呢的中山裝，以便開會應酬之用。這在當地軍政人員的眼目中仍屬囚首垢面的寒傖相，但在飢寒交迫、家破人亡的流亡同志心理上，已經認為有些生活腐化而反革命了。我瞭解他們，因為他們剛從共區逃難來長，還沒有辦法弄一件棉襖棉褲，而我們每天還有時有酒有肉！這種生活現實的對比，實在是痛苦的對比，我自然無話可說，因此，對《葬故人》的續稿，也無情緒交卷了。

33

這天午後，我到宜民護專去上課，課畢，外邊落著首次的春雨。宜民同志乘機說：

「平常你太忙，今日可是下雨天留客，晚飯後再走吧！」

實在說，地下時期我與宜民接頭，因為有所顧忌，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現在每次到這裡來上課，心理上不免有些依依，尤其當我來得早些，獨自坐在校長室的時候。校長室中的一切，似乎均無改變，那尊西醫鼻祖希波克拉第的塑像，仍在窗旁佇立，倚窗下望，操場牆那邊，恍惚間……我嘗想，假若當初我肯打開組織關係，在這裡與詩彥先行會面，那今天的一切可能都有些改變。最低限度，她如不回泰城仍在長春，她與心竹早已聚首，她會隨心竹到瀋陽去，因此對我與宛如的關係，定能增加結合的助力。她是宛如的好朋友，她有敢作敢為的性格。她能從宛如的心裡給宛如打氣，她可以勸服宛如有勇氣回向我。假如宛如有什麼人言可畏的疑懼，我們四個人，心竹、詩彥、宛如和我，可以一同遠走。走到天涯海角，我們都有旅伴，不會孤獨，不會寂寞。可惜一步錯過，步步錯過，她與心竹尚未重逢，我和宛如已確定分離。看來宛如的話是對的，我活著不如我死去；假如我和仲直一樣地死去了，今天的我該如何省心！

晚飯過後，雨仍未停，我們繼續在校長室內閒談。這次晚餐倒用得十分平靜，不必怕被什麼人撞見，只是心情並不十分爽朗。好在這是我個人的情緒，宜民並未覺察。我們的談話仍是輕鬆愉快的。

話題由革命事業談到她的學校前途，又轉到個人的生活上。宜民忽然問我：

「這個月的《公論》沒看到你的稿件，《葬故人》為何脫期了？」

「雜事太多，寫不出來。」

「趕快寫完吧！我們都急著要看結局。」

「結局還用看，標題不是已經表明了嘛！」

「那不同，我們還要看細節。」

「細節……」我端起茶，呷了一口，卻想不出合適的話。

「紀同志，」宜民稍顯斟酌地：「以前你來是代表負責人，我們也把你當做領導人看，有些話自然不便問——」

「不能那樣說，以前我來聯絡，也只是個同志。」

「現在我們不僅是同志、同事，而且可以稱做是朋友了。」宜民接著說：「我有一件事，想不客氣地問一問，《葬故人》中的女主角，是不是就是詩彥？」

「不，不是！當然不是！」我連忙否認著。

「那麼，她是誰呢？」宜民疑信參半地尋思著：「我仔細讀過你〈咫尺天涯〉的那一章，那個背景不正是我們這個學校？現在想起來，那次留你午飯正好詩彥進來找我，那一天你的神色多特別！而且對她加入組織和為她宣誓，你似乎都故意迴避，那不明明表示都是詩彥嗎？」

「難怪你有這樣聯想，」我對她解釋：「我寫那一章，的確是借用那次背景。但寫小說那能都是真事，譬如我寫男主角因刑成殘，而我健康如故。至於當初對詩彥有所迴避，只是怕暴露我被通緝的身分，影響你們的精神而已。」

「但你又是醫生，又是她的同鄉，也曾因案離家——」

「可不是她的表哥！」

「紀同志，」宜民因我的回答而感到好笑。隨後又說：「我問這些閒話，也有一個目的，如果你對我見外，不說實情，我想說的話也就不便出口了！」

「你是什麼意思？」

「我願先知道詩彥是不是你的對象？」

「你一定要問背景真相，我只好據實告訴你，詩彥不是我的對象；我的對象是詩彥的朋友，現在已經與別人結婚。至於詩彥，她的對象是我的朋友葛大夫，葛心竹。他們的結識倒是由我介紹的，他現在正在等候她。」

「葛大夫，葛心竹……」宜民一面叨念，一面瞬目思索。

「你不認識，但你也算見過。」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我們出獄那天，帶領軍方同志前來路上營救我們，騎馬跑在前面的那位就是。」

「啊──他們講那位是高同志呀！」

「葛高易混，你可能聽錯了。就是他，葛大夫。」

「若是那樣，我的話就好講了。」

「請講吧！」

「我原以為你的對象是詩彥。詩彥那孩子太好了，有膽識，有學品，還有一點說不出來的逗人喜愛的味道。我不曉得你為什麼把她介紹給你的朋友。假若你的對象是詩彥的話，我知道她的個性，在任何時候她都不會變心；而且假如你們中間互有感情的話，在任何情況下，我也不願有第三者介入……」

「你到底要說什麼？」我有些糊塗了：「詩彥向你還說過別的話嗎？」

「沒有，她以前向我所說的，我都向你報告過。我的意思是說，假若詩彥不是你的對象，你的對象又已結婚另嫁，你現在嘛還沒有對象的話，我想給你介紹一個！」

「好啊！」我聽她把話說明，如釋重擔地說：「我在這裡先謝謝！」

「紀同志，我可不是說笑談，我很認真喲！」

「是女同志嗎？」

「你希望女同志嗎？」

「不，跟女同志是道義關係，談別的不好意思。」

「那太好了！」宜民同志興奮地說：「我心目中這位小姐就不是女同志。論人品、論儀表、論性格、論才學，樣樣都好；我一定給你們介紹，管保你好！」

「管保你好！」宜民這一句話就決定了我的終身。

真是不可思議。這位教育家，這位社會事業家，這位巾幗英雄，為什麼地下時期有些神經過敏。不然，她若像現在這般沉著有魄力，我也許不一定顧慮與詩彥見面。那麼宜民雖然認識甄青，並不一定關聯到我。

若說我與甄青「一見鍾情」，可能是偷懶的筆法，讀者不會見諒。當時就有許多朋友，對於我們傳奇性閃電式的結合不太了解，都認為我有些瘋狂。直到他們與甄青親自接觸後，才改正了他們的觀感。

甄青是一個沒有泥土氣，沒有脂粉氣，沒有社會氣，沒有什麼氣的那種類型的女孩子。用正面的詞句說，她為人很純很醇；清新而又天真。她也像宜民對詩彥所做的評語那樣——有一點叫人說不出來的逗人喜歡的特點！

對了，用詩彥和宛如來做比擬就更為具體。

甄青有與詩彥相同的內在美點，也兼賦宛如一樣的吸引人的風儀。我這時也正苦悶徬徨，極需尋求放心之所；我這一顆曾經自豪將要「分散給大眾」的心，歷經浩劫，內外洞穿，必須送進加護病室，以求醫治。一見甄青，便傾心投寄了。

事後我得承認，我當時正處於百憂感心、萬事勞形的困境中，我的心理是十分不協調、不平衡、不正常的。我不掩飾我的過去，我不故意用心討好，我坦白地講我想完全忘記過去，我想過一種完全新的生活，所以我不顧在我的學校圈和現在的工作圈結交女友。我還像是荒原野馬似的，自顧滔滔不絕地自說自話。幸甄青年事雖小，閱世未深，卻和宜民同志同樣具有知人識性的慧眼，透過我複雜、煩亂、激動、不安的情愫捉住了我的不變本質。

當然，在我決定這樣的人生大事時，也不是一意孤行的。我是最重視友誼的人，我將來仍將活在朋友的關心中，如果他們對甄青沒有好感，我自己的決定也就算「免！」我曾打電報給覺覺團的弟兄們，心竹，羅雷應邀同來長春。他倆都和甄青舉行一次個別談話。他們「會診」的結果均同意我的「錄取」。誰知甄青也借機做了「反考察」，很久以後她曾對我說：「因為你這兩位朋友都是很正常，很誠懇，很可信任，所以我才對你下了最後決心！」

我們首次相見於宜民的校長辦公室，那真是一處令人永恆懷念感觸叢生的地方。甄青當時在瀋陽東北大學讀書，正逢春假回長春，再過一年就要畢業了。那晚我們談得很多，很少談過去，多談未來。過去的事宜民向她說些，我也差不多都坦白交代，至於微細深刻的心靈上的感觸，她說她也

看過《葬故人》那篇文章，因此能夠體會了解。我們的關係與詩彥宛如不同，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我們有如兩條發源不同的小河，現在正好碰頭；假若我們能匯合成一條水流，我們將有共同的未來。我們將永遠在一起，流過峽谷，沙洲，草原，奔向大海。

我們為我們未來的生活，做著比較保守的設計。我曾經滄海，已厭倦流浪。我願意拖起犁頭耕種生活的田地。甄青的人生經驗雖質樸天真，了無塵埃，但感情的意境卻深邃成熟，並沒有一般少女那種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的幻想。我們估計不到未來的日子將有什麼艱難困苦，但我們互信，我們能在一隻遭受風雨的小船上，有共患難同生死的誠心。

我們在神前共誓後，我不放她走。甄青說：

「我也同樣不願離開你，但我的學業只差一年就要完成，我怎能放棄？何況你答應我大選完畢就回本行，據你估計今年年底大選就會完成，你又不一定在長春作本行工作，所以……」

所以甄青堅持回瀋陽讀書去了。

自從歡迎接收人員的熱潮消退後，接收人員與現地同胞間，在心理情緒上，在思想觀念上，都有些潛在的反感，即所謂「二化」的衝突。此時，更因某省主席的言論而表面化。某主席曾公開斥責東北陷區同胞：「誤統治為法治，以奴化為進化。」於是吉林、長春、四平、瀋陽各種報刊上，都有關於「奴化乎？腐化乎？」的議論。

伊正不知何來熱情，也連續在《東北公論》上析評，並列舉事證說明東北同胞並未被奴化，反

之，他們的國家觀念更濃；而有些地方首長之生活言行確實是腐化。最後他還警告的說：「我們知道有些人在抗戰後方，輾轉遷徙，流浪逃亡，走火線、跑警報、穿草鞋、吃糙米，一朝得意時，能不設法滿足「五子登科」之慾？但你們不要忘了，這是你們自己的國土！這是你們自己的同胞！」

因為伊正的文字太鋒利了，例證太具體了，撕露了某主席的隱痞，使他惱羞成怒。但他雖位高權重，卻不能公然下令將東北公論社封閉。不過，某天突有武裝人員前來公論社，將庫存白報紙裝車劫走，將機房設備搗毀，《公論》不得不因而自動停刊了。

我們了解孟子說「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此之謂大丈夫」。最難能可貴的是富貴不能淫；一個有權有勢有金錢的人，能夠不濫用職權，能夠不放縱情慾，那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聖經》有云：「讓富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的眼還難。」一般人不是大丈夫，那能做到這種境界。當然接收官員中仍多忠勤廉能之士，但一滴墨染黑一缸水，在人慾橫流之下，顯不出他們潔身自好的光輝。這真是一個不幸的現實。陷在共區的同胞們，因久等不到接收官員而失望；收復地區的同胞們，因見著接收官員的「劫收」而失望。等到被人大喊「你們是奴化的一群」之後，就不僅是失望而是對立了。

伊正將《公論》停刊的消息函告我時，我正好讀完《凱旋門》這部書。對小說中的主角——二次大戰前夕一位尋求自由的德國醫生，從心深處發出同情的共鳴。這位醫生為了反納粹的迫害，從柏林逃亡到巴黎。德軍進攻法國時，他又被法國以敵僑的身分加以俘捕。登上囚車的時候，他說：

「敵人（指法國）以為我屬於祖國，而祖國卻以我為敵人！」

面對這樣的命運，實在叫我們啼笑皆非。

但《東北公論》停刊，對我個人卻鬆了綁。不然，伊正屢屢催稿，而我與甄青結識後，精神已有寄託，何來苦悶再寫文章？於是《葬故人》這篇小說，土埋半截，便沒有下文了！

甄青離長時，我們曾經約定利用週末假期，每月至少會面兩次。誰知她回瀋返校後，瀋長交通即時時被共軍切斷。為了安全的理由，她勸我不要去瀋，我也勸她不必來長，兩地相思，只能魚雁往還，好在有羅雷夫婦和心竹能就近照料她，我亦甚為心安。是年春末，行營改制為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秋初行轅易長，總綰兵符的陳誠將軍出關坐鎮，召集各省市黨政軍及民眾代表座談，我也得搭機來瀋出席。許多出席者似乎都甚感振奮，社會上一般商民亦奔走相告，咸信東北危局將有轉機。無論如何，此舉於我乃一大快慰事，我可以趁開會的餘暇去會晤甄青。

由於心竹的安排，這學期甄青已遷入「漢卿北樓」前側的女生宿舍，這棟宿舍是用紅磚砌築，因此男同學均以「紅樓」稱之。二〇三室共住七位女生，其他六人皆是復學的女同志，有的我曾經見過，有的也互有知聞。雖然是假期，但她們都有家歸不得，多數人仍留住校內，聽說我到，許多男同志也都紛紛跑來。淑筠同志當眾對我說：「紀剛兄，我們現在最討厭做官的人到這裡來；可是為了甄青的關係，我們破例歡迎你！」看來甄青已獲得我昔日同志們普遍的友誼。東大校區位於瀋陽郊外，地近北陵，他們都不願進城，當晚就在學校的福利社請他們打打牙祭，算是我補請喜酒。

這時惟亮告訴我，下學期他將轉學北平國立藝專去讀音樂。他表示這些年的地下工作磨鍊，已使他有耐力堅持奮鬥的目標，更使他有信心能勝過未來人生的任何阻難。他說得如此堅定與輕鬆，但總隱含個「別」字，所以都不勝依依。最後大家談到，學校裡也有共黨的「職業學生」做各種反政府的活動，他們並未在校內與對方做正面鬥爭，但他們專心讀書的態度，在學生群中造成一種穩定的潛力，共黨雖然搶據了廣大的未收復區，在這個校園內卻沒有辦法鼓動較大的風潮。

週末，心竹等人堅持在文化新邨為我們設宴慶祝，邀請所有覺覺團的同志同學參加，惟一的「外人」伊正自然有份。這個宛如曾經悔約的聚會，現在已由甄青成全，我雖口中無言，心頭仍多感觸。任俠特別為我們多空出一個雅靜房間，暫做休息室。李哥的妹妹小敏也來了，她家已遷來瀋陽，她也考進小河沿的護校讀書，還曾在宛如的病房上過班。文化新邨外廳裡的客人雖多，但一點也不攪擾我們，我們這裡可說是別有天地。

席間，心竹舉杯對甄青說：

「這都是為你而準備的。我們歡迎你參加我們這一個生活行列，我們認為你能愛紀剛是我們共同的光榮。」

甄青起立答道：「實在不敢當！你們大家都是多年的生死弟兄姐妹，在你們親密無間的友誼中，也容我這微末的人來分領一份，我真不知應如何來表示我的感激。我只有，謝謝大家——」隨即揚杯而盡。

大家也同時乾杯。

這也是甄青令人欣賞的品德之一。她和我私人相處，處處流露著溫柔體貼，在大眾面前則全無忸怩之態，表現得十分豪爽。但她說我們都是生死弟兄，卻提起了我的感傷，我已喝了不少的酒，不禁潸然淚下。是的，除了她以外，都是覺覺團有關的同志同學；除了我以外，他們也都恢復了本位的工作與學業。只有兩位殉難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到場了。只以我在此群中年位居長，今天的情勢又使我不能不強做歡顏和大家以各種理由連續碰杯。

不知什麼人首先唱出：

「用這一杯來慶祝我們的復活！」

於是此起彼應：

「復活！」

「復活！」

「復活！」

復活的臨時定義便是乾杯。

任俠也頻頻走進來招呼，總讓我們杯杯有酒，杯酒不乾。

酒後的言語，也都時時脫軌。

一個因酒精浸漬而致喉嚨沙啞的聲音喊著說：

「來，為紀剛兄埋葬的故人乾一杯！」

這時，覺覺團的關係人中，都多少知道些我與宛如的糾葛，一提「故人」，大家均以為專有所指。小敏十分精細，生怕這句話刺激她的「甄青嫂」，便機警地會同姚蕙把甄青帶到隔壁休息去了。

甄青本無酒量，三杯她就頭昏，帶走正好。

甄青去後，大家更形放肆。我也有心無意地對坐在近旁的木莎說：「木莎姐，你還有什麼訓誨？」

「我當然有！」木莎特意收斂起笑容，十分凝重地：「我再告訴你，甄青確是個好孩子，你要用心善待她，仔細照應她，不要再像以前那樣馬馬虎虎，自誤誤人！」

伊正這時忽然起立，等大家都安靜下來注意他的時候，慢慢地說：「提起《葬故人》，我先向大家抱歉；由於我個人的執筆不當，使大家所愛護的《東北公論》停刊；由於《公論》停刊又連累紀剛兄的《葬故人》成了未完成的傑作，我深深地感到遺憾。在我把我個人的計劃報告前，我想先說一說我對大家的觀感，並藉機完成一件未了的工作。我很有幸，這些年能經常與各位相接觸。我敢說，你們覺覺團是現地抗戰組織中最健全最成功的一個單位，你們覺覺團的弟兄們，是我們現地革命青年中最純潔最典型的一群。你們有二大特點：你們優異而卓越的工作表現，人所共知，我不多談；你們在感情上所表現的純潔情操和崇高的境界，使我特別感動。這種高潔的情感，若不是在現地的革命工作烈火中是不能修煉得到的。我認為這是一種純情之愛，你們也可稱為是一群純情主

義者。不過紀剛兄在《葬故人》中另有發揮，他另有一套愛情哲學，可惜沒有機會印出來，如果大家願意聽，好不好請紀剛兄在此口述一遍，也算是我這編者交了差……」

「可以！可以！」

「贊成！贊成！」

「慢！慢！」羅雷表示反對：「他所主張的，全是空談，我看算了吧！」

「我跟木菸都看過他的《火舌集》，」捷夫插口接言：「我們只知道他曾用火舌誤燒過野火，卻未聽見過他的愛情哲學。還是請他講講吧，我們也好開開耳界。」

於是我借酒遮臉，大言不慚地信口開河。

我說，我們可以把人對愛情所抱的觀念或態度，分成本能、功利、道德、聖神四種境界。

本能境界的愛情就是動物界固有的原始的愛情形態。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是下意識或無意識的。假若分析，這種境界的愛情是慾多於情，或有時是有慾無情的。

功利境界的愛情是有慾有情而又慾勝於情，或以慾蔽情，所以容易因慾移情。同時也充滿得失心理，一朝失戀，既悔且恨，因之也就無情了。社會上許多自殺他殺毀容等事，多由於此。

道德境界的愛情也是有情有慾，但卻情勝於慾，或以情制慾。發生問題時，一方能將自己的感情昇華，不自暴自棄；一方能尊重對方感情，並妥予成全。有人說：「當你看到你所愛的人，愛著她所愛的時候，不也感到快樂嗎？」就是這種境界的人所有的襟懷，也可說是一種君子風度。

聖神境界的愛情又超越道德境界，有時可以是有情無慾的。常能以高級的情揚棄低級的愛，甚至達到一種太上忘情的地步。此所謂情之至者為聖，聖而化者謂神是也。

人人都希望愛人、被愛，也希望給所愛的人以人生幸福。但古今中外，能給所愛的人以人生幸福者又有幾人？除了主觀的嗔忿痴頑困擾對方外，又有客觀的生老病死等苦痛。當你真正愛著一個人的時候，你願她為你柴米油鹽、生兒育女，嘗受生活的煎熬嗎？此所以莊子提倡相忘於江湖，釋迦出家修道，發大慈悲，立渡眾生之宏願故也。

當然我也說，愛情境界不能截然劃分，不是永恆不變，也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無關。大人先生所作所為有者不出本能境界，愚夫愚婦一念之誠可以成聖成神。為免有些名詞被人誤解，譬如「功利」、「道德」二詞，有人用於人生境界，有人用於婚姻境界，和我在此用在愛情境界上的含義是不盡相同的，所以我也用愛情的利己主義者代替「功利」，愛情的利他主義者代替「道德」而「聖神」就同於「超人」加以說明。我更聲稱，就實際人生而論，最理想的愛情與最理想的婚姻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求靈肉合一。惟因許多個人的社會的條件影響，以致愛情與婚姻不能達到理想時，退而求其次，希望人能以較高的境界自處。我並不主張人故意要如何「道德」如何「聖神」，因為較高的境界並非理想的愛情等等。

「我倒想起一段話，」伊正接著說：「我們在尚智里時你曾與羅雷辯論一次。那時羅雷主張要愛就要正大光明地愛，自由自主地愛，要因愛而愛，要真愛！他所謂的『真愛』和我所說的『純情

主義』，是屬於你的哪一種境界？」

「我不參加討論。愛就是愛，有什麼真假之分！」羅雷還是故意攪場。

「那我就單就純情主義來解釋。」我說：「在我看，純情主義者的愛情，是介乎道德境界與聖神境界之間的。或者說是兩種境界的合稱，進可直上聖神，退亦不下於道德境界。但一個人雖可有聖神境界的胸襟，並不一定有機會顯露，所以大多數純情主義者，多表現在道德境界中。」

「你們談的都近乎玄虛，我不太理解。請各講個實例讓我們聽聽！」捷夫又提出意見。

「我只舉個聖神境界的例子也就夠了！」於是我把《雙城記》的愛情故事介紹一下。我說：「當卡爾登先生替他私心所愛的人的丈夫走上斷頭臺的一剎那，其人生意義是十分偉大的。正如卡爾登自己當時所想的，他一生沒有做什麼好事，但只這一件，也就再好沒有的了。他知道在那一對生存的夫婦之間，不拘是有生之日或同埋墓穴之時，他在他們心中的位置，是比他們彼此所佔的位置都大。我們當有同感！這種無條件的為愛所做的犧牲，用犧牲所施的拯救，即可謂是『真愛』。其行為和精神與耶穌走上十字架相比，也毫無遜色。這種愛情就是聖神境界的愛情。」

「多謝！多謝！」捷夫客氣著。木莎卻小聲問我說：「你與鍾鳴算是那一種境界？」

「你怎能這樣問！」我也低聲回答她，矯正她：「你知道我與她和我與你一樣，我們都是朋友，只是我與她多上一段工作的同志關係，這些，都扯不上什麼境界……」

木莎笑了，而且不自主地笑出聲來。說：「那是你的說法，在我看來，她對於你也可能是聖神

境界！」

「這——」我不知如何說好，羅雷正巧耍起酒瘋：「正式討論，不准私自談笑！理論講完，應該做個解剖實驗。就請你現在說說，你與甄青是什麼境界？你與宛如又是什麼境界？」氣勢洶洶，好像要報復我那天在他的婚禮宴上的行為一樣。

「我們的境界都不高，但最低也低不過本能境界。」我只好如此幽他一默。

「現身說法是很難的，」伊正出來打圓場：「我們還是先向他乾杯，謝謝他的高論。若要解剖，以後再來。」大家乾過酒後，他又繼續說：「現在我把我不是計劃的計劃，向大家報告報告。由明天起，我可能隨時離開瀋陽。在這裡沒有我可做的事，我也不願做了。我想到關內去看看，到各個地方都去看一看；到底是東北如此呢？還是全國都如此！到底我們應該做什麼？我沒有固定的地方，因此也許不能經常報告行止了。好在我只一個人，做什麼都能活，我會活下去，現在，我就借你們的酒，向你們正式告別！」

於是這場餐敘，由慶祝會經過討論會，現在又變成惜別會了。

正當大家情緒轉趨低落時，老牧師聞道，忽然萬分興奮地進來，咿呀咿呀地喊道：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我找你們找得好苦，好！你們都在這兒。」

34

新客入座，空氣一變，大家又恢復了乾杯的好情緒。

老牧師目中無人地說：「老早我就想到瀋陽來，就是沒有時間，也找不出名堂。前天醫院派我採購醫藥器材，正好看到紀剛來瀋開會的消息，公私兩便，我就提前來了。我不知紀剛住在什麼地方，但想心竹定會知道，可是跑到醫院找心竹不在，找羅雷也不在，幸虧李敏的同學告訴我，我才找到這裡；哎呀！真是感謝上帝！」

「別說閒話了！」心竹問他：「吃飯沒有？」

「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找到你們，吃不吃都沒有關係！」

心竹出去一下，回頭對聞道說：「我已經給你補叫一客，隨後就來，現在先喝酒吧！」

「好的！」老牧師怎說怎好，舉杯而盡。

「牧師喝酒？」羅雷俏皮他。

「我也是人！你們能喝我就能喝；你們能做的我也緊跟，絕不落後！」

說的一點不假，聞道在覺覺團中，可算是一枝額外的彩筆，在座的同志同學中，有許多人還不

知道他參加工作的祕密，當我把我如何拜訪他，他們夫婦如何慷慨接待支援；尤其伊正把他於五二三後，以廚伕的身分在聞道家中掩護，他們是如何鎮定堅強的經過約略報告後，大家莫不熱烈讚揚。伊正結論道：「不客氣地說，假如大家在五二三時都完了，剩下聞道一個人也會幹起來！」有人為此又向他敬酒。

說話間，姚蕙自隔壁走回，在羅雷耳邊細語。捷夫俯過頭來告訴我，說她已有身孕，不宜過分勞累。於是我對大家宣佈：「謝謝各位的好意，我真希望常有這樣的聚會，但今天時間很晚了，請大家自由行動吧！羅雷，你陪姚蕙早點回去，代我問候伯母……捷夫，你也就送送木莎姐，我們再跟老牧師談談……可是，你們結婚要早些告訴我，我好趕來參加。」

「算了吧！」木莎說：「你們結婚時都沒有告訴我，神出鬼沒地就辦了，好像怕人把你甄青搶走似的。」

「我的情況不同，你要原諒。你們的喜酒，我一定要來吃。你看到了，我有甄青以後情緒特別穩定。我敢保證，再不會像參加羅雷婚宴那次那樣耍酒瘋！」

剛開始的時候，我沒有注意想，以為今晚的歡聚除了方儀和仲直外，覺覺團的弟兄姐妹差不多都到齊了。後來由《葬故人》提到宛如，由宛如聯想到詩彥，而木莎又說起鍾鳴，現在聞道忽然光臨，才使我記起還缺少一位谷音。看起來要想都「團聚」確是不容易的，真所謂「此事古難全」，何況在此多災多難的亂世。

侍女把餐桌上的杯盤收拾過去，我們留下的幾個人退到沙發座上休息，繼續用冷飲和水果。任俠沒有忘記上次的諾言，又吩咐送上一打啤酒助興。這時大廳裡的客人亦走掉很多，他自己也得空閒參加我們的座談。

「真是不容易！」聞道還在激動未已地說：「我們真是差一點就被五二三隔住了。所以老徐結婚的時候，我真想你能來錦州，誰知我們今天才得見面！」

提起徐凡結婚，我自然要問一句：

「他們婚後可好？」

「這話，真叫我難於回答……說他們好，就是我牧師撒謊；說他們不好，又怕刺激你的情緒。最好你別問我！」

「你這樣說，就逼著我更要問了。我已聽到一些閒言，說徐凡婚後對她無理，我想知道真象，我想證實。」

「事實是有的，」聞道仍感為難地：「你真要問我，我也只好說。他們現在都在鐵路醫院做事，我也在那兒兼了個差，住的也很近，我們常常見面。前天晚間我到他家去坐，正趕上他們剛剛口角，就是因為報上有你們開會的消息。老徐不知和她說句什麼話，宛如看報沒有回答，老徐就發了火，說了許多難聽的話。宛如說她並沒有看到那段新聞，但老徐並不諒解，還說氣話。我只好兩頭勸說。宛如真是好脾氣，只在一旁流淚，一句話也沒說。」

「後來呢？」

「今天早起，我動身以前，她暗中告訴我內人，要她囑咐我見到你時，不要講什麼，你要問，只說她很好。」

「老徐真混蛋！」聽到這樣鐵真的消息，我不能不氣憤。我似乎看到前晚的宛如是如何地忍氣吞聲、以淚洗面，而今晨，她又如何故作寧靜。

「你到底和宛如有什麼事，惹得老徐如此生氣？」

「我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我說：「我和宛如當初的關係，你是知道的。勝利後，像你所聽到的一樣，我不能不奮鬥爭取一番。宛如決定不離開他，就證明是愛他；他應該歡喜快樂，心滿意足。說良心話，宛如今天是否真的想我，根本還是問題。他不該如此嫉妒、偏狹！」

「但是在他想，宛如仍然暗中想你，所以他就受不住，不願她看到或聽到你的任何消息。」聞道如此推測著。

「唉！」我仰首長嘆。「善良反得惡果，可憐宛如無辜。徐凡也太不配承受宛如的愛了！」

「你們這群純情主義者，我實在不敢領教。」任俠從旁接口說：「若是依我看，你們完全錯了！」

於是他也發表一套高見。第一、他說有些人的不幸，是妄想於婚姻中摻入愛情。他說他研究過《六法全書》，在民法中，婚姻的成立只規定男女雙方同意，經二人以上證明，舉行公開儀式即可，

並沒有規定愛情是婚姻要件。第二、他說天下本無情，庸人自擾之。他說像我們這樣推重感情的人，結果都會得到精神病！

任俠這次言論比他上次的主張平和多了。宛如悔約那晚，他曾建議把徐凡捉起來。他認為對女人不必多談情字；要，就不必考慮手段；不要，就算！據他講，敵偽時期他由家鄉帶赴後方的那個女孩子，本來與他海誓山盟的，誰知到西安不久，就被人誘到延安去了。他為她追到延安，險些遭受暗算，僥倖逃出來後，就對女人改變了態度。他有一段很放蕩的生活，曾接觸過不少女人。他說，若不追求「情」，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樣，而他還沒有遇到一個有「情」的女人。

任俠的言論自然是基於他個人的不幸遭遇，我雖不贊同，但也似乎說明一些事實。這些年來我心靈所受的煎熬，未嘗不是為情所累。我們原本有情，而竟矯情地自認無情，或者說是冷酷的熱情。今後，我與甄青相許共渡安定而平凡的生活，我應該付出溫情，別再冷酷了！

心竹較重實際，他已好久沒有發言，這時對聞道說：

「別聽他們談理論了。為了大家心理乾淨，你回去建議老徐離開錦州到內地去，大家不見面也不聽消息，自然就減少刺激。不然，」他又轉向我：「關於你未來的工作，校長說漢口福州都可以介紹，我也正向南昌進行轉職；你回去趕快擺脫長春的責任，帶著甄青遠走高飛，等我們都離開東北，老徐自然安心，宛如也少受閒氣。」

事實確是如此。大局混沌，家鄉無事可為。淪陷期，我們堅持現地抗戰，落個「土頭土腦」；

滿腔熱血，反遭「奴化」之譏。工作結束，勢應如伊正所說，入關一遊，以廣見聞。了解了解，研究研究；到底為什麼辛亥成功反遭軍閥割據，北伐完成引起強鄰入侵，抗戰勝利又有國家內亂？劫後餘生，遁跡江湖，亦應求個明白。但想到假若心竹越走越遠，更減少與詩彥相會之機，頓起一種錯綜的情緒，使我故意向徐凡發作。

「聞道，」我說：「回去告訴徐凡，不管我們誰走，假若我再聽到這一類消息，我會前去揍他！」

「你要揍誰？」甄青自背後發問，原來她與李敏剛從隔壁過來，正好聽到。

於是我把甄青向聞道介紹。她同聞道寒暄後又追問我：「方才你要打誰？」

「他要打我，」聞道說：「我們開玩笑！」

「不必隱諱，」我說：「我與甄青相處萬事公開。假若她問我為什麼打你，我是否再跟著扯謊？」於是我將聞道帶來的消息向甄青轉告，聞道拘泥不安；心竹面現不悅；小敏也從旁瞪我；只有伊正保持他那特有的微笑。

我的朋友都不贊同我向甄青道及往事，他們不知，往事的坦白正是我對甄青愛的忠誠。

「那你就應該打你自己，不過，不必打得太重！」

「你看，大人怪罪下來了；但是又不忍得——」聞道也學著詼諧，以緩減他自以為尷尬的處境。

實在說，他們都不太明白，他們仍以為我袒護宛如而歸罪徐凡，因之遭受甄青的責怪。豈不知

我所以要揍徐凡正是我心理的自責，因為宛如的不幸都是起緣於我，我有何理由去揍徐凡？只有甄青心中了解，她不忍我自責太深，所以暗示我：「不必打得太重！」

回到長春，對於這一次的聚會，反覆迴想，久久不能忘懷。記得結帳的時候，任俠向我正式聲明，他說：「見過你的甄青後，我把我方才和上次所發表的謬論完全修正。假若我也能遇到與甄青相類似的女孩子的話，我願回到當年的情感，重新開始。」

小敏卻替甄青抱不平。「大哥，」她說：「你對青嫂太不公，我提出抗議。婚後生活是兩個人的，可是今晚你的言行卻只有你自己，你一點沒有考慮到青嫂的感覺與立場。」

我倒是一點沒想到，小敏能說出如此成熟的話語。那晚，小敏是隨心竹一同回醫院的。離瀋前我曾到過小敏的家，李伯和李伯母像重見愛子似的歡迎我。我們還是光復後首次會面。談到地下時期我到鐵嶺去拜訪那段事，李伯母說，她到現在才真有點害怕。心竹曾帶甄青去過李伯家，因之又談到心竹本身的婚事。李伯說：

「上次我跟你提的話，你和心竹談過沒有？」

「談過了！」我答。

李伯緊接著說：「不過情形有點變化。那時我的意思是小敏、小靜，心竹喜歡那一個都行。現在，我有個老朋友自後方回來，他有個男孩子很喜歡小靜，今天他們出去玩去了。所以而今只剩小敏了，不知心竹是什麼意見？」

於是我把心竹和詩彥的事向李伯說明。李伯忽有所悟地：「怪不得小敏回家講，葛大哥對她很好，可是同時也對其他幾個女護士好；好可是好，就是不向前進，原來他心中另有詩彥。詩彥……詩彥……這名字似乎宛如也向小敏提過，不過小敏沒聽清楚，我也沒注意追問……這樣很好，一個人不可以隨時變心。我就喜歡這樣的青年人。好在李敏還小，我可以等，等到心竹有一定歸局再說。」隨後李伯也說明了他叫小敏去學護士的用意，除了學份技術能夠自立外，也讓她能與心竹有個自然接觸的機會，彼此多所了解，不然只憑別人的意見，也許並不正確。我只好說：「多接觸自然多有好處，也自然多有機會！」我還能說啥？

最後又談到宛如。李伯表示：

「不是我事後說閒話，聽說你去年回瀋陽時和宛如鬧過一場事，我很不贊成。我想李庸當初糊塗，你怎麼也糊塗起來！現在我都看見了，宛如怎能跟甄青相比？當然，宛如看起來漂亮，尤其是那一對眼睛。」

「人家都說那叫什麼？」李伯母從旁插言：「叫，對啦，那叫勾魂眼。」

「什麼勾五勾六的！」李伯搶白她，然後繼續他自己沒說完的話：「那一對眼睛，相書上有講，我也閱歷過，你們年輕人喜歡它，以為它迷人，其實那正是賤處！我們年紀大了就懂得，有那種眼睛的人，不但自己命薄，而且剋禍別人。李庸沒福，你幸虧逃了出來，今後不要再想她！」

不必李伯勸誡，我自然也不願再想宛如，我的朋友似乎也故意幫我將她忘掉。聽說伊正將遠行，

聞道特別請他順道再到錦州住上幾天。聞道來信說，伊正去了，也走了。又說伊正這次到他家，他雖然待以上賓之禮，總沒有地下時期他做廚伕那段有意思。他敘述伊正在錦的情形很多，還提到當選錦州議長的伯方同志為他舉行一次盛大歡送宴，就是對宛如隻字未提。

現在，我自我檢討，對於宛如已不是思念與遺憾；實在是虧欠，實在是犯了大錯。若用我自己的理論來衡量，對於詩彥，我可謂表現到最高境界；為了她的幸福，我盡量給她安排一條平坦道路，願她的生命安全，願她的心靈平靜。對於宛如，我就失掉這份崇高的情操。自然我有理由解說，卻不能不承認，我沒有像尊重詩彥那樣地去尊重宛如的感情，我未能始終成全她。我很後悔，對於宛如來說，我真是活著不如死去了！

偶然，我也想起木莎那句話。鍾鳴去北平前，我們沒有機會再見面，對於她的心情，我一直不太了解。我對別人的虧欠已夠多，我不願鍾鳴也記上一筆。

很快又到冬天，大選亦將完畢。選舉是在非常局勢下舉行的；因為是「非常」，所以有許多變通之處；對未收復地區以流亡同鄉會為基礎而施行的選舉辦法，便是如此。有一段期間，我與每個流亡同鄉會都有接觸。一天，在泰城旅長同鄉會中，居然碰見詩彥的父親黎經理，他是剛從共區輾轉逃出來。黎經理在家鄉素有人望，旅長同鄉公意推舉他為泰城國大代表候選人，且決定派人分赴吉林、四平、瀋陽地區拉取選票。黎經理以家人安全為理由婉言謝絕。他私下對我說：

「紀賢姪，我看這情勢不對。我剛從共區那邊來，那邊的辦法實在殘酷，令人痛恨！這邊的情

形我不太了解，聽別的同鄉們講，在政府區雖然言行自由，但是生活十分艱難……長久下去，不堪設想！我是生意人，仍得經商謀生，我看你對國家的貢獻也差不多了，你自己的前途，也要早作打算。」

「家鄉還有別的消息嗎？」我問。

「你叔叔和我是同時被共黨捉起來的。關了半年後，你叔叔先被放出來，派到縣立醫院『為人民服務』去了。我被鬥爭清算後，落個掃地出門，後來聽說還要抓我，我就跑出來了。」

「別人呢？」我未便明問。

「詩彥和你家大妹，兩個人搭伴向南逃，逃了兩次都未成功。一次是被共軍的卡哨留難；一次是趕上四平的五次攻勢，又被炮火逼回去了。這次我來的時候，她倆又計劃結夥走。我是繞濱洲線先上龍江再轉哈爾濱，由這邊來的。這樣走雖繞遠，可是共產黨不注意。她們是直接沿平齊線南下，由泰城奔四平，不知她們造化如何。」

「嗯，」我說：「到四平，她們有投奔嗎？」

「以前我有幾家商界的朋友，詩彥她知道，只要她走到，他們就會幫忙。我明後天就想前去，看看她們的消息，同時也想湊一些生意資本。你還好嗎？聽關樞說，你在此地獄中很受了些苦頭。」

「現在都不值得提了。關樞有消息嗎？」

「聽說他被送到佳木斯『改造』去了，現在死活不知。唉！共產黨雖然罵國民黨不好，但你們

都是好樣的，我是知道的。可惜你們趕的年月不對……」

「詩彥受些什麼牽累？」我終於把話逼近。

「她還好！」黎經理說：「我看共黨是用兩種不同的辦法。對原有社會是用砍頭政策：在農村對所謂地主，在城市對所謂資本家，像你父親和我，早晚都是一個命運，經過幾次鬥爭清算，最後還是殺戮。共黨說我們是社會的頭，而且是壞頭，把我們殺掉就沒有人領人民走壞路了。被迫鬥爭我們的，一定是平常對我們有好印象的，這樣他們就可製造『階級仇恨』，製造『社會分裂』，使人民跟著他們走，不敢再想回頭。對國民黨則用砍腳政策：國民黨的基層幹部，共黨就一個一個砍光……至於對一般青年，共黨現在還是採取利用手段，像詩彥和你大妹她們，只要表面上表示坦白悔過，現階段並不深究，統統集中受訓，然後分派工作。詩彥她們就是利用這種機會向南行動。行得通就算跑出來，行不通再回去敷衍。」

「我父親呢？」

「不知道了！我只知他被捉起，又聽說他已跑掉，究竟下落如何，也無處去打聽……」

聽到父親安危不明的消息，我自然關心感觸，一時陷於沉默。我本想多問些關於詩彥的話，但因宛如說黎經理對詩彥與我的關係有些誤會，詩彥自己未辯駁，也不知我叔叔有否說明。我已經三次提到她，黎經理並不主動問我，我也就不便再多打聽。同時我還想，也許詩彥已經逃到四平，將來一切都能澄清，我何必此時多費唇舌。於是我只能順便問問他：

「我大妹長多大了？我離家時她才十二、三歲，現在應該十七、八了，不知我見著時還能不能認識！」

「噢！長得好高了，和詩彥差不多一般高了，不過模樣兒沒大改變，你會認識！」黎經理比劃著說。

「那麼，你老先去四平，有什麼消息即時告訴我，需要我辦的事我都會辦。明天，我給你老送些錢來帶去，假若大妹她們逃出來，總要換些衣服什麼的。」

「不用了！你有那麼多流亡同志，你會剩什麼錢？我到四平總有辦法，只要她們逃得出，有詩彥花的就有你大妹花的！你不知道，她倆現在相依為命，好得像一個人似的……唉！年輕的女孩子逃難，不是一件容易事。」黎經理深深感嘆地說。多少風霜，多少辛酸，多少苦難，盡在一聲長嘆中……

兩個星期後，黎經理自瀋陽給我來信說，他到四平時並沒有得到大妹和詩彥的消息。他為了早謀生計，不能在四平久等，不然，家人孩子逃難出來還得餓死！他又寫著，他的朋友都是商界人物，跟當地的黨政軍方都少交誼。聽說軍方的諜報營中和其他的政工單位都扣留了很多人，有的是匪諜嫌疑，有的是一般難民或商旅，大約穿過國共兩軍封鎖線的行人，暫時都是同一命運，必待調查清楚後，才能找保放行。他不知大妹她們是否已經逃出而正在國軍某些單位扣留中；不然，將來逃到時亦將遭受扣留。他希望我與我四平的朋友聯絡，代為調查調查，必要時負責擔保一下。不過一定

要關係可靠而且說得對詞，因為大妹她們起路條造證件，可能都用假名，用什麼名，他亦無從知道。關係不可靠的人去找她們，她們也不會承認，怕被反間諜的騙露了身分，再被遣回共區時，她們就無法活了。

既然有這種複雜情形，我誰也不便託，託誰也不太中用，我只有自己去。

我決定自己去四平。

我是多麼希望見見我大妹，那是我的同胞親骨肉。

我是多麼想見見詩彥，我好把話說明白。

35

一到四平，共軍又圍了城。

經過十幾天的拜訪、聯絡、查詢，很幸運地藉機保釋了七位由嫩江逃來的流亡同志，就是沒有我大妹和詩彥的蹤影。我遺憾，我焦急。

來前，我曾寫信給甄青和心竹，告知我的行程和目的。甄青回信一反往日的鎮定，特別流露出擔憂與不安。心竹則表示無論找到詩彥與否，均請我立時回瀋一次，因為他已搭伴包了飛機，隨時起飛南行，行前希望和我會會面。最主要的是他不能再替我照顧甄青，而我對甄青的諾言已經到了時限，不能再事因循等語。

心竹想到內地去工作是夏天就決定的。等他接到江西南昌醫院的聘書，開始購買機票時，飛機票已登記到兩個月以後才有機位。這時由東北赴關內的交通已很不便了。北寧路火車時通時斷，遠行必搭飛機。飛機大都是仰賴空運東北軍用物資的回程腳，機會不多，想舉家逃離東北的旅客甚眾；大選完畢，立監委、國大代，也都爭先攜眷赴京報到；總之，瀋陽此時，人人均有北雁南飛之志；水漲船高，飛機票價亦一日一調整。由瀋陽南飛的航線有二，一是逕去北平，一是直達青島。心竹

是購買赴青的機票，他說兩處的票價差不多，但由青南行可節省一段船資，而由青搭船又比由平轉津容易。我所以決定到四平來，主要與心竹南行有關，心竹越走越遠，即使此心不變，但與詩彥總不謀面，畢竟不是下場。我，已有甄青，宛如好歹有了歸宿，我的「善後工作」也可說告一結束，只是對詩彥的私願未了……心竹催我回瀋，而我得不到大妹們一點的音訊，叫我如何不心焦？

我是農曆年前到達的，城防司令為了避免混淆，禁止商民於春節期中燃放鞭炮，可是由除夕到上元則完全在炮火聲中流過。我相信我還有膽量和機智化裝而走，四平地區的同志們則堅決反對，認為我的身分已較暴露，在行人稀少的旅途中不易混過，勸我再等一等，後來再詳細打聽，國共兩軍陣地均加強封鎖，根本斷絕行人，連個野兔也跑不過，我只好放棄這一項冒險計劃。主持四平市議會的廣文同志對我打趣說：「你這才真正成了守土無責，陪死有份的人物了！」

原來共軍「五次攻勢」時，前任城防官事先未暇妥善疏遷，致市民損傷頗重，故街坊間流行了這樣一句閒話。這一次，七十一軍軍長兼綏區司令，已由有儒將風度的劉將軍接替，然一月前已奉命隨帶一師之眾開往新民協防瀋陽，此地只餘八十八師據守，兵力單薄。共軍除了慣用「圍點打援」戰術外，又兼採美軍於太平洋戰爭反攻日本時所用的「越島」進攻法。如共軍幾次重要攻勢均放棄吉林，越過長春，逕打四平。四平陷落後，吉長孤城遠懸，自行枯凋；而最後遼西會戰，錦州失守，瀋陽乃成其囊中物矣……

四平防衛戰先從外圍地區開始，不久八面城、大榆樹、虻牛哨相繼淪陷，守軍的指腕全失，只

能退守城邊耳鼻式的幾個據點和稱做北山的一處高地。

甄青在瀋必是焦慮萬分，差不多每天一封航空信，催我設法歸去，就在舊正將殘陽曆的三月六日這天，航空信也收不到了。因為前一天晚上，北山高地失守，共軍陣地又運來重炮，機場完全在其射程控制之內。從此一連三天，軍機都未得降落，北山高地又出現了共軍高射炮火，空投亦不能施行。同時電報電話亦被切斷，我與甄青亦不能再通消息。

三月九日，共軍正式開始攻城，我東關外最後一個城郊據點德源燒鍋的守軍，亦撤回城內。敵方先用重炮二十四小時不間歇地向城內密集發射，硝煙瀰漫，耳聾眼花。我空軍戰鬥轟炸機也曾兩次前來助戰，所投之彈並未能阻減共軍攻城之威力。如此連續兩晝夜之強攻，十二日拂曉，東南城角被敵軍楔形突破，巷戰開始，我所寄身同志之住宅迅被敵軍佔據。下午，半個城被共軍奪取，戰鬥仍在進行，炮火相對減弱，我便混入大隊難民群中出城逃難了。

逃到瀋陽，市面風情大變。

這時的瀋陽城，整個現出大搬家的氣氛。沒有人關心四平丟失與否，似乎也遺忘了吉林和長春。從人們的耳語中，只聽到下面這幾句話：

「你走不走？」

「你向哪裡走？」

「你什麼時候走？」

我，想一想，還是先到馬路灣去做個報告。負責人正巧外出，負責人的太太一見面就搶先囑咐：

「你可到了！紀剛，趕快去看甄青吧！」

「甄青？」我聽後一怔：「忙著看她做啥？我要等等負責人，談談公事再說……」

「私事要緊！私事要緊！昨天這個時候，她還跟一個女同學來打聽你的消息，快點去看看她吧！」

「她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想你想瘋啦！」

這是什麼話？我叫輛馬車，在奔向北陵的路上，不停地想。負責人太太不是對我說笑話的人，但她方才的話卻有些像開玩笑。甄青懸慮我、擔心我、怕我陷身四平，那是當然的事。也許她還年輕，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到馬路灣打聽我的消息時顯得急切些，因而引起負責人太太對我幽默一句也是有的。記得我與甄青的婚事傳到她們家裡時，她就曾責問過我：「紀剛！你瘋啦？這麼大的事也不跟我們商量商量！」也許她有好說「瘋了」的口頭禪，不過她如此認真地囑咐我快去看甄青，倒是打破我一向先見負責人的慣例。

走進東大校門，一點也沒有學校下課後那種活躍氣氛，令人突生空寂荒涼之感！我想，這也許是「春假」使然，至於現在是否是春假時期，我也無從追問。

女生宿舍的紅樓也是闃靜無聲，房間裡面很少開燈，甬路上幽暗空洞。二〇三室的房門正開著，

裡面零亂卻沒有人。其他室有者半開不開，有者逕自大開；室中都亂擺著橫三豎四沒有被褥的空床和不見書籍的桌椅……這哪裡是大學宿舍？簡直是清明以前的墓地嘛！幸而靠樓梯口處的房間裡，還有一位同學憑依窗檻，對著暮靄默立。

「借光！同學……」我站在門前，用較高的聲音。

「什麼事？」她慢慢轉過臉來，默然地回問。

「請問二〇三室的甄同學，甄青同學在哪裡？」

「甄青？她剛剛跑出去……有個同學去追她，你也去追吧！她每次都向北陵那邊跑去……唉……」說罷，並沒有向我追問什麼，又逕自轉回頭去。

我不必再問她。我急急跑下樓梯……跑出校門……跑上通往北陵的大馬路……我只是加急地跑，沒有時間再想！好在這時間這條路上，沒車沒馬，任憑我獨自狂奔……

跑進北陵的石牌樓門；跑過叢叢的松樹林……遠遠的，我看見兩條模糊的人影在小湖邊的草地上撕鬥著。

「甄青！甄青！」我高聲地喊。

「甄青！甄青！」不管她們是誰，我仍一面跑一面高喊。

一條人影不動了，另一個人影仍在掙扎。

跑到近旁，果然是她們。那位站著不動的，是家住營口的惜芬同志；那位掙扎亂動的就是甄青。

「紀剛同志，你可來了！拉住她吧！拉住她吧……不，不要客氣，抱住她吧！抱住她吧……我一點力氣也沒有啦……你抱住她吧……」惜芬同志氣喘吁吁地說。

我像機械人似的用我的大手扣住甄青的臂膀。甄青卻不理會我，一面掙扎，一面嚷嚷。

「讓我走，讓我走，我要去找紀剛！白雲……紅葉……兩悠悠……」

我把著她的頭，讓她面對我，我用力說：

「甄青！看看我，看看我！我回來了，我就是紀剛！」

甄青卻有目無睹地搖著頭，然後又怪叫怪笑地：

「你們都說笑話！讓我走……你們別騙我……讓我走吧……你是哪一位同志呀？你不是紀剛，紀剛還在四平……紀剛被共產黨捉去啦……讓我走……」

「紀同志，」惜芬同志建議：「把甄青拖回去吧！回到宿舍再說話，這裡天黑很冷，不要讓她再著涼！」

我在前面拉著走，惜芬同志在甄青的身後幫助推，拉過松樹林，推出石牌樓門，甄青仍不停地喃喃著：

「讓我走，讓我走……白雲紅葉……兩悠悠……」

不用請教高明，這個事實我可以確定診斷：甄青患了「急性躁狂症」。

回到宿舍後，甄青忽又出奇地安靜，呆怔呆怔地望著我，一句話也不說。營口的惜芬同志卻開

始哭泣了……

「紀剛同志，」她拭著眼淚說：「你若不來，我真不知道今宵怎麼過……昨夜她鬧了一宿沒睡覺，我把門窗都關嚴，她就在地上走……今天，像剛才那樣地跑出去，已經二十多次了……本來昨天上午還算好，下午從馬路灣回來就支持不住了……你知道的，自從她得到你往四平的消息就很擔心，後來音訊斷絕，她更焦慮……十四號報載四平情況不明，她就每天去馬路灣打聽消息，有時一天兩次。十五號就有同志自四平跑到瀋陽，十六、十七號跑出來的人更多，就是沒有你的消息。有人說看見你被共軍捉住了，但是又不敢叫真，當然更不敢對甄青說。昨天，我們又去馬路灣，他們說已經沒有新來的……甄青就認定你跑不出來了，又說你胖胖的，一定被捉去了……」

算起來確是這樣，我自城破那天出走，應該十六號就到，但我走路太慢，晚了一天，中途又和許多難民被共軍的檢查哨卡住一宿，所以遲遲未到。而據惜芬同志說，東大也正醞釀遷校，人心浮動。有的師長和同學已先去北平，另謀他途；有的同學回家觀望，學校等於無形停課。無處去或有家歸不得的一些同學，被遺留在校園內，飢寒寂寞，喪魂失魄……所以每個人的心理都失掉了平衡和依靠，情感也極脆弱……

「她說什麼白雲、紅葉的？」我接著追問。

「那是她幾天前寫的一首詩，她給我看過，最後兩句是『心緒欲平平不得，白雲紅葉兩悠悠！』當然是怕見不到你啦……我也怕她跳樓、投湖什麼的，我真擔心！」

「葛心竹已經走了嗎？」

「他差不多兩個星期前就該飛走了，後來一再延期；從那時起，他就把甄青完全交給我了。可是今天上午葛大夫來說他明天一定走，行李已經過秤，今晚就住在同澤街一家旅館裡，說是明早到航空公司上飛機場方便……他看甄青這個樣子也沒辦法……」

「羅雷沒來嗎？」

「聽說他太太難產了，產後又得了什麼敗血病，現在還住在醫院裡。葛大夫說很危險的，就是這半個月內的事，所以他也未得分身來……」

「嗯！」我默思一會。這時甄青還是很安靜，雖不時仍叨念那幾句話，但聲音已經很低……她用一隻手捉住我的手腕，用另一隻手開合我的手指……拉開又合起來，合起來又拉開……兩眼呆直地觀察我的手掌，像個「相面先生」似地要從我的掌指紋中窺測我的命運。此情此景，我對我自己的命運也迅即下了決定！我對惜芬同志說：「你再說一遍葛大夫住的旅館，我現在就去看他，假如我沒有時間回來，就請你再照顧她一晚……」

「不，不！紀同志，你帶著她吧！你已經回來，我再不管了……」

「時間已經太晚，」我望望昏黑的窗外：「我怕找不到車，帶她走進城十分不方便……這樣吧，無論如何晚，我今夜一定回來，請你再照顧她一二個小時！」

「不！一分鐘，一秒鐘我都不看了，你想辦法帶著她吧！」

「那麼，我們一起進城，留下你自己住在這，我們也不放心。我想，有你幫忙陪著甄青，可能更好些。」

「謝謝你，紀同志，你不用管我。那邊還有幾位女同學，我可以和她們一起住，你放心好了……聽葛大夫說他明早九點以前就到航空公司，你們會去送他吧？我明早就到航空公司去看你們，希望那時候甄青會對我有說有笑……」

心竹正坐在旅館的房間裡發傻，和我會面的驚喜也未驅走他面上的憂容。原來他們的包機被某方面要了去，明天走不成要改後天，而票價又提高了二分之一，因此有六個人錢不夠了決定退出。航空公司要他們補交包機費，不然後天的飛機就要包給別人。他們補交票價難，一時湊不足人還要分攤那些空票，錢就更多了。心竹手中的乾貨，全變賣可以交上機票，但下機後沒有了船錢。他已自醫院中辭職，每日都在消耗積蓄，如果行期再延，連飛機票也要吃光了。

「別愁，別愁！」我說：「趕緊去找辦事人，給我留三個位置。我也走！這回是真走了，不然甄青要糟！」

「錢呢？」

「我想辦法！」

「你和甄青，那個票給誰？」

「我想給那位惜芬同志，這些天都是她陪伴甄青，我們能逃難，不能丟下她不管。」

「也好！」心竹考慮一會，又說：「甄青也需要一個伴，短期內，恐怕她也不易復原……」

我出去找到長春市銀行瀋陽辦事處的黃主任，時間雖晚並未惹他厭煩，我說要用幾個錢，他慨允於第二天一上班便撥借我五百萬東北流通券。正好夠買三個機票。

九點鐘到航空公司交費時，惜芬同志堅持說：

「不要給我買票了，我不想走，我想媽！假若媽能逃出來，我再想辦法和媽一塊兒走，不然，只有等待有機會以後，我再回家找媽……」

於是我把省下的機票錢送給她，她堅拒不收。甄青忽然從我的手中接過去，然後也是送給她。

她對甄青說：「你走遠路……你要用錢……你留著吧！」

甄青沒有說話，依舊向她的手袋裡放。

我從旁用較小的聲音對惜芬同志說：「看在甄青的面上，你收下吧！你說今天要看到她對你有說有笑，你雖然沒有看到，但你看到她還是認識你，而且知道感激你，為了這個，你留下做個紀念吧……」

惜芬含著眼淚收下，向外走了幾步，示意要我過去。然後又把那錢塞給我，說：「這算我給甄青買紀念品的，你也不能拒絕……明天……我再來送她。」

我想說：不用了。但她卻不敢回頭地快步離開。

我與心竹約定，他先去看看羅雷，我還要到馬路灣去報告報告我的行止，然後再辦辦各人的私

事。其實我決定出走是無目的地的，我只是想把甄青帶到沒有炮火的地方，她業已崩潰的神經，不能再受驚嚇。

又沒有看到負責人，可是負責人太太卻告訴我另外一個消息。她說半個月前，我父親曾到他們家打聽我，匆促間她竟沒有將我結婚和甄青在東大讀書的事，告訴老人家，而心竹也很久沒有與馬路灣取聯絡，因此我們一家人還不知道有這一家人。

我按可能寄居的地址去找父親。由北關找到鐵西，由鐵西找到皇姑屯，傍晚時候才在一位鄉親處找到。這一天我把甄青帶到這裡帶到那裡，像個連體人似的，手拉著手一刻也沒鬆開。她已較少講胡話，我對於她似乎仍是夢幻中的存在。我們回到旅館邀心竹陪我父親一同吃晚飯。心竹說羅雷來過，姚蕙的病情好轉已出院回家，告訴我沒有時間不必去看她；羅雷沒有工夫再等我，也說是明天早晨到航空公司相送。

晚餐是在二酉軒吃的，父親喜歡清真味；那是一間中級飯館，但在瀋陽也算有名的了。四菜一湯，經濟實惠。甄青還是楞楞怔怔，不知飢渴。心竹這些天生活不正常，胃腸奇壞。我……這是我受父親培育成人後第一次用我的錢請他老吃飯，這次飯是我與父親分別多年而又各自經過許多苦難的相聚飯，同時也是又將分別不知何時再能相聚的離別飯……吃起來，真是難以下嚥。父親倒是很能振作的，似乎是吃了不少……

席間，父親告訴我說：

「共產黨一到泰城鄉下，就把農民會設在我們家裡，第一個就鬥爭我。他們說我是地主，是剝削階級；我告訴他們，我們是剝削過，但我們只剝削我們自己。我們的錢財和我們的房地產，都是我們自己一代一代起早蹚黑、省吃儉用積蓄下來的，並未剝削別人。但他們不聽，他們逼使本村的人出頭來鬥爭我們。農民會長就是我們以前的打頭的夥計，我們大夥心裡都明白，過去誰都對得起誰……他們把我押在我們的穀倉裡，我的倉房竟成了我的監房……你母親她們早被趕出家門做苦工去了。我們家成了他們區政府，我們的院子就做鬥爭會場……他們想起來就把我提出鬥一鬥……有天夜裡，那個農民會長就是我們那個打頭的，偷偷來把我放了！他說他們決定在明天鬥爭會後把我吊死。當時我又有傷又有病，他把我送到我們家東的高粱地裡，又偷偷給我送水送飯，將養三天，我才自己能走……唉！想起來，又感激他又替他擔心……」

聽父親說罷，我也把在長春遇到黎經理的事說說。

「是的，我聽說他逃出來了，也聽說他到了瀋陽，但我到他有買賣來往的櫃上去打聽，他們說他已經去天津，所以沒有碰面。」父親忽然轉換話題，對著心竹：「可是，我聽他叔叔說，黎家小姐黎詩彥還在等你，你不能走啊！」

「那有什麼辦法，」心竹像似無所謂地：「我也等她三年了，她一直沒有跑出來，還要我等她到哪年？」

「這話不能那麼講！」父親駁斥他，「她沒有跑出來，不是她不出來，由共黨區向外跑不是容易

事，尤其是女孩子家，我就知道她跟他大妹——我的大女兒，一同逃出兩次都沒成功。這樣吧，」父親轉趨和藹而又認真地說：「你明天先別走，再在瀋陽等兩三個月；我明天回遼陽去辦點事，回頭我再跑趟泰城；我不回鄉下，城裡沒人認識我；我把詩彥給你接出來！不然，她出來你又走，你們什麼時候碰頭？」

「走還是要走的，」心竹很受感動：「因為南方醫院的聘約快到期限，現在不去人家不能等，將來詩彥跑出來，再想到南方找個飯碗都難了……而且你老回去一趟，危險不談，這一路風霜我也不敢擔當！不過，我敢當伯父面前發誓，我一定等她，最低再等她三年。我把通信地址留下，如果詩彥出來，告訴她追我去好了。」

最後，父親表示他明天要起早回遼陽，不能送我們，說我們長大了，要自己照顧自己。

飯後，送走父親，我們便在同澤街上無目的地逛逛，說是不忍驟去，依戀留連也好！這條街敵偽時期叫「春日町」，是有名的夜市街。現在依然沿路邊擺了許多攤子，賣的卻是舊衣物舊家具，大半是要走的人想變賣一點路費，只是沒有人買。光復時也有一次這種景象，那時出賣物品的，都是將被遣送的日僑，買的是中國人，不過當時買的人也很少，因為大家把光復夢做得太完美了，買舊貨做啥？現在買的賣的皆是中國人，雙方都有些神傷……這是大逃難的前夕，大家都像是「爹死媽出門，個人顧個人」的樣子，而個人的前途又如何？誰也不知道！

一抬頭，已經走到文化新邨，我們就順便進去瞧瞧。大廳裡空空如也，寥落坐著幾個人等於沒

有生意。任俠獨自在那裡喝悶酒。

任俠說：「走吧！走吧！能走就走吧！我是不想再走了……抗戰時，我已在後方流浪那些年，我吃夠了流亡之苦……我已走得太疲倦了……我想安息，一天兩天也好！」

「任俠兄，你是不是加入了共產黨？」自從那次他說他到過延安，我就想問問他。

「哈哈！你問得好！我不能騙你，我也不怕你告密，我告訴你，我不是！我只是流浪人歸來，疲倦地不想再走。我對時局雖然失望……但我知道共產黨也是沒有希望的……尤其對我們這種有自我思想的人……」

「那你單身一個人，又何必冒險？」心竹勸慰他。

「冒險也無所謂了！」任俠回答他：「一個人對生存沒有興趣時，對死亡也無所恐懼了。不過，那邊我也認識幾個人，暫時也許沒有問題，我想在這段期間等等，等會一個人，就是上次你幫忙送我們出關的那位小姐。我聽說她也回來了，現在哈爾濱……當初把她帶到延安的那個人已經拋開她……這些年她的感情生活也很不如意，一個又一個地……我知道她不是屬於共產黨型的那種女人，可能當初我們有點誤會，那也怪我……我要等機會見見她……假如她能回頭，原諒我，我想重新開始……重新開始……紀剛兄，記得我跟你說過，就是這個意思……那時候，我再做新的人生計劃……不然，一切都算了！」

這真是一個「雖然惜別終須別」的時候，卻無人能唱出「向那滿天的風沙」那種歌……

36

航空公司通知我們提前去機場，無法跟預定相送的朋友們做正式的握別。趕到機場，起落的飛機雖多，卻都不是我們那一架。

候機時，看到那些空運物資中，竟有人借機挾帶私貨。有人說：「這個時候還要做買賣？」有人說：「這個時候才好做買賣！」大概越是亂世越有機會為利私人，自古皆然，於今不足為怪了。好在問話的，等機的，也都是臨陣脫逃沒有資格批評別人的人！

中午，我們起飛了。

飛經營口，我俯望那無語的遼河，蜿蜒在早春的大地上，仍自渾渾地滾滾地流。為了甄青，我曾痛下決定；現在，看到那遼河無語，我實不敢再對它正視。難道我就真的如此走離？走出我們多年堅守的現地？

遼河仍在渾渾地、滾滾地、無語地流……我不禁也愴然泣下！

「我們……在什麼地方……」甄青忽然發問。

「我們坐在飛機上，我們正在天空中。」

「飛機？哦！我們哪兒去？」

「我們到青島去！那兒沒有戰爭，沒有恐懼，我不再離開你！」

「嗯，」甄青也說：「沒有戰爭……沒有分離……」

飛過海，飛過山，飛抵青島。

一週後，心竹搭船去滬，我被一位老學長收留在他私人的醫院裡幫忙。實際上，完全是他幫我的忙！我不隱諱這些年的工作生活，我表示我對臨床幾乎忘了，我需要從頭學習。老學長卻說：

「不能說那話！你自己客氣不要緊，說那話丟我們小河沿的名聲。誰不知道，我們同學一畢業就有十年以上的臨床經驗，扔下三五年有什麼關係？」

這話也有道理，不全是故意吹噓為我打氣。我們學校歷史最久，學科、臨床向極紮實。這位學長便是一畢業即來青島海校，創設軍醫班，成為海軍軍醫的前驅。抗戰時戰線移向內陸，海軍縮編，他乃退役，勝利後重返青島開設天恩醫院，而海軍的高級軍官仍經常是他的座上客。

甄青的病進步很慢，東北大局卻急轉直下，四平無力收復，吉林主動撤守，長春孤懸，遼西亦醞釀大戰。

夜晚睡夢中，甄青常驚叫而起，口中還喃喃著：「讓我走……讓我走……」白日清醒時，她也要看看報紙，看看中國地圖。她說：「青島也不是個安全地方嘛……」我告訴她：「只要美國的艦

隊不撤走，這裡是沒有問題的！」這是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際，每個寄居於青島的人所常說的話。

我也想早日離開青島，為了甄青的病，為了不便長久託庇於老同學。我曾將此意函知心竹及其他各地的親友。我雖前途無定，但也不願讓父親留在瀋陽，他老不能再被共黨捉去，我懇切請他老也暫先來青。我也再給羅雷一封信，請他早做計劃。因為站在青島看東北，更了然其希望渺茫。心竹的回信表示，既然走出，只有繼續向前走。父親的來信卻說：

我自己決定不走了。你母和你弟妹們不出來，我自己走也沒有意義。我這一生經過多少次動亂，由前清到民國，由日俄打仗到滿洲國的興亡，我都沒有離開家鄉；現在已是風燭之年，還走個什麼呢？還怕個什麼呢？你關心我，我更關心你那未成年的弟妹和生活無依靠的母親。我若遠走，對他們無異和沒了一樣，我若留在這裡，對他們可能還有機會照顧。你大了不再用我照顧；你能走，遠遠走吧！好好照顧你的妻子，將來也要好好照顧你的子女。我們家一代一代傳下來，你們也要繼續傳下去。當我心中想到我們家在外邊還有一股人時，在家鄉再有多大苦難，我都能夠承受了！

父親的手書使我心酸，羅雷的覆信使我生愧，倒是歐凱的來函令我稍覺寬舒。歐凱寫給我，說我呈請辭職事，日前已轉奉內政部核准，結算我應得而未領的薪金，除代歸還市銀行借支部分外，

尚餘東北流通券九百餘萬元。誠如歐凱所說：「此款對兄在異地生活當大有用，惟遵兄囑，已將其分贈與在長流亡同志矣。此為吾兄對過去共同奮鬥之同志最後一次的盡力；今後各人命運如何，皆不可知矣。」

十一月十二日，醫院放假。老學長請我過去，對我說：

「東北又淪陷了，你無法再回家鄉，此地對你是客居，我雖需要人幫忙，也不便勉強留你，你自己有什麼打算，我不知道。不過，最近海總部軍醫處長幾次給我來信，希望我能再出山工作。你知道，復員後陸軍縮編，海軍擴大，特別缺乏軍醫人員。一來我年紀大了，二來這個醫院也不便收拾。你還年輕，你還要為國家做事，所以我想把你推薦上去。以你的經歷和能力，到南京後，不論臨床或行政，都會綽綽有餘。依我看，抗戰靠山，戡亂靠海，你還應開創一番事業。我們同學在海軍裡都有良好表現，若你願意，他們一定歡迎！」

我還不知如何回答，老學長又說：「當然，你也不必考慮旅費問題，命令一到，你可搭海軍便船隨時起身，一個錢也不用花。……」

老學長對世局的觀察，和歐凱所說「父抗日、子抗俄、百年大計」同樣有深長意義。只是這個時候，我已不配再說是為了對國家民族服務，免費坐船實是一大誘惑，而且也合乎心竹所說「走一步算一步」的原則。「好吧！」我說。同時也謝謝老學長對我周到的顧慮。

我填好履歷書，貼上照片，由老學長備函寄去。候等覆文期中，也常到街上幾家和東北有業務

往來的商號探望，看看有否新自瀋陽逃來的熟人，聽聽家鄉最近的消息。很巧，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又遇到詩彥的父親。

黎經理剛剛前一天自上海來，說是要回北平去，我就請他老到家裡來坐坐。

「你成家了？」黎經理很詫異地問。

「是的！」我答。

「什麼時候？」

「去年春天。」

「在長春見面時，你沒有跟我說……」

「那時候她在瀋陽讀書，沒有立家，所以也就沒有機會提。這一次，你老抽空來一趟吧！」我又繼續懇請著。

「去是應該去的，」黎經理忖度半晌說：「可惜時間來不及了，十二點以前我就要趕到碼頭去的。」

「現在還回北平做什麼呢？瀋陽丟後，平津也漸吃緊，大家都向南走，海陸交通日加困難，再出來很不方便的！」

「是這樣的，」黎經理加以解釋：「我在上海時候，聽到一點家裡消息；小蓉姐妹倆，和她媽，已經由泰城逃到瀋陽，現在正由瀋陽逃奔北平。我必須趕回北平去等。我把這裡生意上的錢取出，

控制在手，如果詩彥她們早到，我就帶她們出來再去上海，這些錢剛好做旅費。拖家帶眷逃難是不簡單的……假如她們到達晚了，我也只好挺在那兒，等著和她們會面，我不能再自己先走。在家鄉逃難，她們可以找到親友幫忙，進關後，一無親二無故，再走就更困難了。好在北平地大人多，真有那麼一天，共黨一時也找不到我。等我們全家團聚了，看看情勢再說。也許再逃，也許認了……」

「那麼——」我想搶個機會，但一時如鯁在喉。終於，我強自鎮定地說：「有一件事，就是詩彥的事，我想跟老伯談談。詩彥解除婚約那件事，當時我曾幫她出過主意，現在想起來，我覺得很是罪過！」

「嗯！」黎經理沒有表示態度。

「你老責備我也好，原諒我也好，」我繼續懺悔著：「我自己一直不安！不過，當時我就把詩彥介紹給我的朋友葛心竹葛大夫，他們已經相處很好，後來因為心竹出事，所以耽擱下來。光復後，心竹同我到龍江，就是要去泰城談這事，結果沒有去成。今春我們離開瀋陽時，他表示還在等她……」

「嗯！」黎經理又哼一聲，表示願意詳聽。

「心竹的心情我全知道，詩彥那邊我想也不會變化。心竹現在南昌醫院工作，回頭我就給他寫信報告詩彥的消息和你們上海與北平的地址，讓他直接給北平去信，或到上海去接頭。時局變化太快，無論如何，讓他們聚到一起吧！」

「心竹的事，我也聽你叔叔說過，那時候……不過……」黎經理思考好一會：「好吧！我回去告訴她母親和她商量商量。你不必過意不去，你對雙方總算盡到心力了。當初那件婚事是我的錯，這次我不願再錯下去，假若心竹詩彥都互相願意，我自然了結一份心事。不過，我不能稍加勉強……詩彥那孩子就是有那股扭勁，她不願意的事就是不願意。其實第一次訂婚的對象並不是不好，只因不是出於詩彥的自願，她就彆扭，她寧肯一輩子不結婚也不願遷就。說起來還得感謝你，你幫她解決了第一個問題，又給她介紹這個機會……這次……唉！不知他們有否緣分，也不知詩彥能不能改改扭脾氣……」

說話期間櫃夥過來說，要趕船的老客都準備走了，請黎經理一同動身。黎經理隨即從手提箱中取出一件料子，是織錦的，塞給我說：「這本是預備給詩彥買的，怕她們逃出來沒有衣服。我沒有時間在此地現買，就把這件送給姪媳婦，算我補個禮吧！合適不合適，喜歡不喜歡，我不知道……」

我誠懇地推謝。黎經理卻說：

「若在家鄉泰城，這一點東西是拿不出手的！現在流亡在外，一切不能講究了……而且……若是不能再見面時，也當做個紀念……今後，我們彼此珍重吧！」

黎經理去後，我立即致函心竹，叮囑他按著黎經理留下的地址主動聯絡，不可再誤良緣。信寄出後，我心中甚覺輕快，甄青的病也似乎穩定得多。我已經把話對黎經理說得清楚，等於是對詩彥當面交代。自從長春護校隔窗遙望至龍江電話中斷，幾次未能說出的心內隱衷，至此稍得舒伸。我

總算把話說明了，他們雖然尚未會面，我卻先獲得了「公私善後均告圓滿」的預感諧和。

於是，我有勇氣再把羅雷的信取出展讀。

紀剛大哥：

我給你寫這封信我很難過。幾次來信，你都勸我們離開，我們也幾次受感動想聽從你的建議，現在只有違背你的好意了。

在我寫此信之前，我們幾個尚能見面的覺覺團的弟兄們曾在一起聚談。我們有幾點共同的意見，現在報告給你：

一、我們都是劫後餘生，對於生死存亡已不再十分注意。如果只為逃命而無目的無限期的流浪異地，實在沒有意義。而且，人離鄉賤，謀職求生亦是一大困難。在中國歷史中任何大變動期，也不能人人都背井逃亡。這一次，大多數同胞仍像「九一八」時期一樣，必須被迫留在現地，面對新的命運，我們又何必走離？

二、我們想，我們自從立志革命至覺覺團成立以至參加現地抗戰組織，其目的無非在救國救民。我們雖非虔誠的基督徒，但我們多年在教會學校讀書所受的宗教薰陶，加上我們固有文化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博愛思想，使我們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都敢於背起十字架。抗戰時期我們已經背過一次，我們自己的弟兄姐妹也和許多同志一起在十字架上流血犧牲。勝利

後，我們的希望卻落空，我們的一切奮鬥成果，也都為這不幸的歷史所淹沒。這一歷史的不幸，固由於以赤化世界為目標的蘇俄與中共所造成，但我們自己以及英美盟邦都不能推卸責任。

時至今日，談論責任已成廢話。揆諸當前局勢，共黨勢必要來了。我們知道，現在「解放」區已普遍展開清算鬥爭，將來也許不容我們再生存；但只要我們生存一天，我們就會有生存一天的意義。

三、實際上，我們不願被殺，我們也不願殺人。按照我們覺覺團弟兄們一貫的思想觀念，我們所關心的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和群眾的生命。我們在人生的目標和信仰上，絕不會變節。記得你在〈遼河頌〉裡曾以遼河為我們的自喻，我也套用原詞在此明確地重述一次：「我們從不訴說我們遍體的創傷，我們永不改變我們飛躍奔騰的方向」。只是，我們自己不訴說可以，我們對歷史對死難的弟兄姐妹，必須有所交代。不管以後的變化如何，以前那一段應該有所記錄。我們曾想共同執筆，各擬題目先在《東北公論》上分別發表，然後彙編成冊，可惜我不會寫，學校的課業又忙，你可以寫，你卻忙著為別人抬輸，之後《公論》停刊，這項計劃自成泡影。若是仲直仍在，他可以分擔此項責任，今後的希望則完全寄託於兄了。我們留在家鄉的，不知如何適應新的環境，你生活在政府區，你總可尋覓一個角落來做這件事，而且青嫂康復後也大可助你。如果有機會完成，無論何時何地，都不

是沒有價值的。

海天遙望，不勝依依。希望我們再見！但願我們再見！再見！

再見！

羅雷敬書於瀋陽　三十七年九月十八日

重讀羅雷這封信，我覺得我應該立時負起這個責任，雖然診餘的時間我大部分須要陪伴甄青，但不影響我在腦海中設思構想。我想，就以「滾滾遼河」為書名，記錄這一代青年奮鬥的歷史。這「覺覺團」的故事，只是其中千萬分之一。東北，苦難而偉大的東北，自從俄大鼻子和日本小鬼先後侵略，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交叉成一個不祥的十字後，東北同胞便開始了十字架上的苦難命運。但，我不記錄他們的悲傷，我不訴說他們的痛苦，我要報告他們永恆不息的奮鬥。我要讓全世界知道，這是一塊不容侵略的土地，在這土地上生長著不可奴役的人民！

我不必編造，也無需隱諱，我要忠實地寫下我們的奮鬥生活和我們心靈深處的感受。我要寫我們的理想，寫我們的抱負，寫我們團結服務奮鬥犧牲最初也是最終的目的。這些，勝利後由於某種心理，我們都不約而同地閉口不談，但地下工作的血淚史不應永久被冰封。何況我們雖不惜犧牲小我，卻又不是否定人生的人。我們勉勵自己，一定要有所作為，不然，我們的人生便是空白！我們已經有所作為，如果不予記錄，那一段的奮鬥也就等於空白！我們的青春和汗水可以使其空耗，我

們許多同志的生命和鮮血豈可任其白流！

在構思寫作大綱時，我仍一陣陣自感慚愧。我們都經過一個用生命寫歷史用血寫詩的時代，我們也曾經用自己的生命寫過歷史、用自己的血寫過詩，而現在的我，卻只能用拙劣的文字寫故事，實在是無情的諷刺！

老學長一言九鼎，海總部很快來了命令。我隨即收拾起簡單的行李，扶護著甄青，登上中海號運輸艦，去南京報到。

海總部暫時核定我的官階恰與艦長同級，執行官特別把一個官艙臨時讓給我，看樣子這次旅程是相當神氣的，一點沒有由瀋陽飛出時那種脫逃的意味。

出海後，我到艦長室去做次禮貌性的拜訪。艦長隨後交給我一封信，說是上船前他到天恩醫院辭行時順便帶來的，因為此信剛剛寄到。

我以為是心竹寄來的。一看發信地址和筆跡，啊——我立即衝到甲板上……我急急把信看過……我幾乎昏厥落海！海，我無所懼；假若沒有甄青，我必定跳海回去……我是多麼喜歡看到詩彥一封信，我卻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一封。為了甄青不堪再受打擊的心靈，我不能讓她看到，我自己也不想再看它，甚至企願我根本就沒有看到它！

我咬緊牙根將這封信撕碎，然後將那些碎屑遠遠地拋入大海……

海在翻動，船也在翻動……驀回頭，甄青正踉踉蹌蹌地走向我，我立即伸手拉扶她。

「你出來做什麼？」

「找你……你……把什麼丟掉？」

我說不出我這時的感覺，只有更拉她向我靠牢，然後回答她：

「沒什麼！」

甄青沒有再說話，懵懵懂懂地與我並立船舷。

船在加速行進，奔騰的海浪迎面來襲。

我凝視著、凝視著，凝視著那波濤洶湧無邊無際的大海，海、忽然變成一張大紙，一個浪變成一個字：

「……」

「從泰城逃出後，我時時在想：想我們一朝見面時，你會說些什麼？我要說些什麼？我自然要問：我那一點不夠格，為什麼當初你不讓我參加工作？我還有許多話要問，最主要的——你心裡明白，我愛的是你，你為什麼將我向別人身上亂安排？」

「記得你到龍江時，葛大夫說要和你一同回泰城看我；我還以為你自己不便傳話。後來雖說也想把我調去，但回泰城你都有些迴避，我去龍江，對你更不方便了。我也以為那個階段工作最緊張，環境最惡劣，確是不該考慮兒女私情的時候。你不談，我更不談。唉！我又何必倔強？我為什麼不在那個時候向你傾訴？而你那時候，為什麼還要繼續錯弄？」

「其實，你也許未錯，因為你早就看清了我的命運。你說過，我要想擺脫一個世俗的束縛，就要接受那更大的痛苦。所以我今天毫無怨艾……」

「很可笑！勝利後，我很為我相信你定能生存的信念而驕傲！我還曾為慰撫你長年工作的辛勞，暗中給你描繪一幅幸福生活的圖影，只是我不曉得，在你幸福的生活中沒有我的份！大嫂一定是位更可愛的人，你們現在也一定在幸福中生活著，一想到你生活在幸福中，我也就沒有痛苦了！」

「我給二老添過不少憂煩，現在我該向他們懺悔贖罪了。他們若南行，我會跟著；只是不會去南昌。他們若留下，我也留下……我就抱著一份崇高而美麗的記憶，永久陪伴著爸和媽，去迎接那未來的不可知的人生吧！」

（全文完）

十年血淚一部書（代後記）

《滾滾遼河》見於報端時，我曾深深地噓出一口氣；這冰封了二十餘年的往事，畢竟公諸於世了，我不能不有些輕鬆之感。但當書中的「負責人」，對著幾位昔日同志面前幽我一默時，我卻油然升起無限的愧赧！

「負責人」說：「我看我們這些老朋友，當年出生入死冒險犯難所做的地下工作，完全是為你寫小說的材料做的！」

事實確是：沒有那些人、那些年、以那種火的情感、鐵的生活，做那種種血的工作，自然不會有《滾滾遼河》這本書。而且若真能以那十年多血淚生活做材料寫書的話，應該是一部更廣袤更森羅更雄偉更豪邁的作品，絕不止是現在這樣的一冊《滾滾遼河》。

但我限於時間才力，只寫出這樣一部東西。

回想來臺時，不出半年，大陸整個沉淪，我懷著滿腔悲憤，立志記下這段經過。寫出二十萬字後，先拿給一個朋友「看看」。誰知他未屑一顧地說：「第一，古往今來被埋沒了的歷史多得很，何

惜乎我們那一點點？」所以他勸我不必寫。「第二，」他說：「我們那一段地下工作，是一種『角力式』的鬥爭，觀眾喜歡看球賽或武打，沒有人愛看雙方僵持形態的角力。」所以他推測我寫出來也不會有人看。

我倒不是因他的好言相勸而停筆，但他第二項觀點卻給我提示了寫作上應有的警惕。那二十萬字便成了一份原始的資料。民國五十五年秋，我下決心要完成這項宿願。終於在診療的暇隙，用二年不分晝夜的時光，病歷與稿紙齊飛地寫出了現在這部《滾滾遼河》的初稿，共四十一章，計四十五萬字。之後即依序送請一正、惜冰、春陽、尹生、大愚、朱紀等人輪流斧正。又一年期間，除了當面研辯外，相互討論的信件彙集成冊已超過十五萬言。最後又經我書中刪章，章中刪節，節中刪句，句中刪字地刪存三十六章，三十五萬字。五十八年春，清稿付郵，直寄《中副》。

《滾滾遼河》是以感情故事為興趣線，穿織敵後抗戰奮鬥史。因地下工作是「角力式」的，為了忠實，不能在工作故事中妄加「動作」；而那工作又是極嚴肅的，更不能用感情故事「粉」飾「劇情」；且時至今日，敵我已締交為友，我只能寫我們如何奮鬥，不便再說敵人如何兇殘；關於勝利後不幸局面的促成，亦本乎中國傳統的恕道，只對自己稍加檢討，而未多指摘當世的盟邦。所以構成小說應有的衝突情節，我只能用小我感情如何被壓縮、割裂、與扭曲來製造高潮，進而用這些個人悲苦悽慘的命運，來反映那個時代環境的殘酷與不仁。誠所謂「功不唐捐」，假若沒有十五年前所記下的那些原始資料，我就記不清那麼多工作史實，也就喚不起那麼多青年時期的情愫。看來，一

切似有天數。

張一正兄是當年《東北公論》的總編，《葬故人》曾經他親手宰割，這次仍請他優先核閱。套一句武俠小說的術語說，他不愧為武林高手，雖然二十年息影江湖，一出招依然是威力驚人。原來我擬的書名是「滾滾的遼河」，一正兄在整部原稿中只砍掉書名中那個「的」字。一字之差，關係至大，不僅讀起來生動有力，而且別具創意。不過如此一改也有缺點，因為許多粗心的朋友常把書名看做是「遼河滾滾」，如果仍用原名的話，也許沒有人會誤為「遼河的滾滾」了。一正兄畫龍點睛後曾不忘鼓勵地說：（一）這本書一定要出版，因它代表那一代青年的思想，甚至是到今天我們的思想。（二）這本書可能是當代文壇的偉大作品之一，因它具有文藝創作的新風格——革命文學作品的風格。

惜冰小姐對文藝欣賞力極高，對小河沿的風風雨雨記憶尤詳。所以她不僅指點了那個地方的場景細節，也糾正了感情故事中的一項重大遺誤。

《蒼天悠悠》作者李春陽先生，與我早不相識，我想請他以當年工作的「圈外人」及當前文壇的「圈內人」立場，看看這篇東西像不像「小說」。他躺在外科病床上仔細看過，而且下了評語：「不平凡的故事，在沉穩地陳述下，顯得特別雄渾健邁。這是我們鐵打的遼陽所特有的熱力，再度發射光芒。兄以燃燒著的血肉生命，執長鞭拷問那個時代，成為一部血淚凝結的史詩！」

尹生就是當初反對我以地工故事寫書的那位朋友。時過境遷，這次竟「舉雙手贊成」。他的理由

卻是：「舉世皆罪人，有誰不犯第二誡？既已嘔出心血十升，獻上心香一瓣，何妨印它一冊也算對得起神明。吾兄舞文弄墨半生，豈可不留雪泥鴻爪？因之印它一冊也算對得起自己。友儕中惟吾兄得天獨厚，多愁善感，有一肚皮物可寫，更有本領寫之成物，所以印它一冊也算對得起朋友。」這話我雖不便駁正，但下面的析評我卻不能不首肯。他說：「日本投降前這一段寫得最成功，可謂完全沒有用二十年後的心境，論二十年前往事的毛病。光復後至東北再淪陷，寫得也沒失敗；雖大洩氣，但非虛假，且哀而不傷，責人不失忠厚，也算派司了。」

關於人物刻劃，他認為：「最巧妙處是將『負責人、書記長、社長』，與『一堆人』分開處理。前者偏重描寫其革命人格，抽象代表組織精神。後者則具體刻劃其聲音笑貌；處處顯露其短處，其短處又恰為其可愛之處。譬如羅雷，這位仁兄滿腦袋反抗權威，而表現上處處尊重權威；紀剛一味唯負責人是瞻，被他譏為大逆不道，他自己在負責人面前則一切問題煙消，只有唯唯諾諾的份；他口口聲聲稱你小子長，你小子短，但沒有紀剛這小子一言之諾，卻急死也不敢去偷會姚薫。」

羅大愚先生以當年工作「負責人」的立場，特別提示本書必須向讀者負責所述歷史的真實，雖小說家言，讀之亦不啻讀史。大愚先生與內子朱紀對本書原稿修改出力最大，前者置重點於地下工作的探討，後者多建議於感情故事的推敲。我們交換意見的範圍最廣，對同一事做觀點不同的爭論亦最劇。可以說沒有他們的高見指正，這本書不會有現在這麼「好」，或者也可說，若沒有他們最後的同意，這本書根本就無機會應市。其中為了一個情節的取捨，我一度有把它擱置三十年的計劃。

箇中辛酸，由尹生信中摘錄幾段，可窺一斑：

吾兄虛己，八方請益，風度之佳，令人欽佩。但往來函件成集後，結果必十人而百意見，有者參差，有者衝突，誠不知吾兄將如何處理。吾兄對此稿有「成器」打算，當然越鍛淬鋼質越純，略遲問世無妨，擱置三十年就太嚴重了！

看起來，寫工作報告易——吹而已；寫歷史紀事亦不難——忠實而已；寫小說就不簡單了。尤以吾兄非為寫小說而寫小說，是為有所交代而寫小說。有此細綁，雖可藉小說人物的巧安排將「工作故事」寫活，但絕不可寫假；於「感情故事」、亦同……

至於故事內容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弟所知不過略優於一般讀者，大愚先生則不然。觀尊稿新保對仲直口出穢言段，大愚先生所為之眉批，其心情之沈重可想而知。在道義上，負責人重擔終身難釋，此情吾兄當最能體察。蓋於「工作故事」，大愚先生為特殊讀者，正如於「感情故事」，朱紀姊為特殊讀者。作者筆下對特殊讀者留情至何種程度，關係小說成敗。此一重擔，只有由兄自承了。

據仲父先生函告：「《滾滾遼河》於《中副》連載期中佳評如潮，讀者不僅對作者的文筆表示讚賞，對覺覺團弟兄們的愛國血誠，亦致以崇高的敬意！」

其公開見諸報刊者，有孫沖霄先生的讀者投書，以「止不住心頭的激動」為題，道出其對《滾滾遼河》的感受，並自謙其於魯南山區從事游擊戰的奮鬥，亦不若東北地區地下工作的艱苦。作家幼柏女士認為這部作品「充塞活躍的生命力」，「其文字帶有濃重的民族氣質與感情」，「它的故事，在整個中華民族青年愛國運動史上，自有其繼往開來的重大意義」。語和委員因公赴美，見到我留美學界人士搶奪《中副》爭閱此文的情況，曾以「《滾滾遼河》在美國」為文介紹。三屆亞洲作家會議馬來西亞代表黃美之女士海外來信中有謂：「看《中央日報》上的《滾滾遼河》，才知道臺灣尚有筆是觸及那有血有淚的題材」，發表在《純文學》上。方家陳克環女士亦曾於《華副》「筆陣」中，以「紀剛先生以醫師出身，寫下了《滾滾遼河》」這句話，來為她「作家是寫出來的，不是教出來的」立論作證。我自己的一些新朋舊友，平時未見過我的文章，更不知我此次的寫作過程，讀到《滾滾遼河》及各方反應後，都認為我似乎是一夜之間躋入了「名作家」之林，好像我竟成了「天才」。但當我今天把以上情形公開後，或有人認為我幾乎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才寫出這樣一本東西，又不免要說我是「笨匠」了。

其實，世上容有天才，而我不是！人間或有笨匠，我亦不是。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人，只因曾親歷一個偉大的時代，追隨一夥偉大的人群，參與一次偉大的鬥爭，仰賴　神所賜給的劫後歲月，再次以地下工作精神，不計成敗地為那個時代作記錄。我作了。我一點沒有創作什麼，我只是一個誠拙的記錄者。任何成就與榮譽，都要歸諸於燃那種火的情感，啃那種鐵的生活，幹那種血的工作的

那一群人——或存或亡，而不是我。

我曾用「季剛」這個筆名登過文章，但當《滾滾遼河》刊出前夕，因讀仲父先生談筆名的一篇方塊而改用本名發表，以示負責。誰知如此給我帶來許多困擾，因我的職業已給我的姓名定了型，此人怎可「寫報」？而本書又用第一人稱筆法，歷史的真實又被小說的真實所強化，許多讀者偏要在書中捕捉作者的什麼。於是印單行本時，為了擺脫作者與我的關係，為了滿足讀者的某種心理，便借用書中人物的姓名當作者掛牌。這一招確也有效，因報紙連載已成過去，到書店買書的朋友再沒有人聯想到我。這些陳述足以說明一個事實，即本書的文學價值尚有待文壇先進的評論，其歷史價值似乎是已被讀者承認。評論家應未遲即曾以「歷史的證人」為題，在《西子灣》上引述說：「文藝應為歷史作證，作家即是歷史的證人。《滾滾遼河》及其作者，可當之而無愧。」國史館柳長勛纂修更認為本書是一部活的歷史，要我將書中人物故事，無論工作方面或感情方面的，都要詳加註釋，連同本書原稿送國史館一併「典存」。他說這是他修史的新構想新形態。若然，千百年後將可免去什麼學家考證《滾滾遼河》，一若今日之考證《紅樓夢》者。

《純文學》主編林海音女士為本書出版時，依出書慣例，希望我寫個頭言或尾語，之後也將有此種要求的讀者信件轉給我過目，也有朋友們做同樣的建議。本來有人主張作品是一切，作者不應在作品外再贅蕪詞，但也有人認為序跋之類有如國畫的題詞或署印，也構成作品的一部分。因情應

勢，權以此文代替後記，連同一部分反應文字及《中副》評審意見，共錄書後，以便讀者對本書有一綜合的了解。

六十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錄

心靈的契合

王　藍

紀剛先生：

恕我冒昧給尚無一面之緣的您，寫這封信。

「讀了一本感人的書，忍不住抓起筆給原作者寫信」這種事，小時候我幹過。這些年——已經很多年了，未曾再有。

您的大作《滾滾遼河》在《中央日報》連載時，曾斷續地拜讀；昨天讀了《純文學》出版的單行本，一口氣開夜車讀下去，快天亮了，才讀完，中途實在放不下手，非讀到全書最後一頁不可，這就是好書的迷人魅力。讀後，還竟忍不住要給您寫信——一個近五十歲的人了，仍有這份「衝動」，或許正是保有童心的可喜現象。

我不想堆砌任何形容詞，讚美您這本書；我只要告訴您：我太喜歡這本書。

為何太喜歡？為了這本書讀來太親切。

抗日初期，我曾於平津從事地下抗敵工作（在重慶出版的拙著《一顆永恆的星》、《美子的畫

像》、《鬼域記》等，寫的均是親身經歷；在臺灣出版的《藍與黑》與《長夜》中亦有若干描述），所以對於您筆下的愛國青年們在東北的抗日情景感到特殊的親切。「親切」二字實不足表達這一種強烈的感受。那應是一種「熱」——一種令人熱血沸騰的「熱」；應是一種「愛」——「同志愛」，一種最虔誠最深厚最堅實的愛（可惜，這種愛，而今越來越淡薄，越缺乏，也越發珍貴越發難得了）；更應是一種「滿足」——一種由於「心靈的契合」而換得的無限的無上的精神上的滿足。

近年來，以「地下工作」為題材的小說，亦屢見不鮮；但令人嘆息洩氣的，竟多是寫成了「間諜香艷打鬥」。難怪，那是「閉門造」出來的。說嚴重點，那真是侮辱了當年我們那些冒險犯難、犧牲奮鬥、忠勇義烈的男女同志。您的《滾滾遼河》，清清楚楚地，活生生地，告訴了世人，甚麼才是「地下工作」。

或許有人指說：大作太像報導文學，太不講究結構，太不耍技巧。但，這絲毫不能掩蓋自作品靈魂深處放射的光芒。我從不重視只耍技巧而內容（情感與思想，給人的啟發與影響）貧乏的小說。您的書——出生入死，出死入生的真實生活體驗，是用鮮血寫成的。現在（尤其是未親身經歷浴血抗戰的青少年）和將來的中國人，都該好好地讀讀這本書。

又前幾天，碰到孫如陵先生，聽他談起您原稿尚有十分之一，描寫勝利後東北接收，有些政府官員昏庸誤國之形形色色，應為全書極精采之部分，惜未發表。我敢相信，您的描繪絕對出於極端愛國的熱誠與情操，如能發表，對國家只會有好處。由拙著《藍與黑》中，您也可以看出我對當年

某些大員及貪官污吏毫無顧忌地痛斥。您必同意：一個忠愛國家民族的作家，應該勇敢地把這些寫出來，加以檢討的。

寄上我的兩本小書，如您有機會到臺北來，讓我有機會當面請教——痛痛快快地談上一夜！

祝福

王藍　五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歷史的證人

應未遲

本文原發表於高雄新聞報《西子灣》，五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在臺南執業醫師二十餘年，開設「兒童專科醫院」的紀剛先生，窮三年之力，將他在淪陷於日本十四年的東北從事地下抗戰活動經歷，寫成三十萬言的巨著《滾滾遼河》，自在《中央副刊》連載，並由「純文學」出版社印行單行本後，立即引起海內外文壇的一致重視，擁有難以數計的廣大讀者，這從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單行本迅即發行至五版可獲證明。陸續見於報刊的書評和讀後感之類，更可看出這一代的青年人，對於《滾滾遼河》給予了最高的評價。這並不完全是由於《滾滾遼河》的文筆優美，情節動人，故事真實；而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從《滾滾遼河》了解到同一時代的先驅者，曾經為民族獻身，為國家流血，為信仰犧牲生命；受過烈火的鍛鍊，受過監獄的磨折，

受過人所難堪的苦難。《滾滾遼河》是一部血淚交織的歷史紀錄，雖然它所紀錄的只是一個片斷，只是東北一角，但所予青年人的衝擊力量，仍是無可比擬的。

無庸諱言：當前文壇充斥黃色和灰色作品，虛構的故事雖然極盡詭異離奇之能事；但如論其內容，則千篇一律，不外畸戀、亂愛，以及其他不正常的男女關係，除去色情，還是色情。在這類作品的感染之下，青年人要想免於消沈、陷溺、墮落，幾乎是不可能的。實在很難得有一部像《滾滾遼河》這樣的健康寫實之作，指引一般青年人認識時代，正視現實，激勵志節，從而以全心全力，奉獻於苦難的國家。

紀剛先生自大陸來臺後，即寄寓臺南，懸壺濟世，不求聞達，與文藝界尤素無交往。此次竟能以其處女作《滾滾遼河》，贏得本（五十九）年度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的文藝創作獎，亦足證明作品之深具份量，評審之公正無私。

日前紀剛先生自臺南來北，特邀同與以《藍與黑》一書飲譽文壇，亦為中山文藝創作獎評審委員的王藍先生小敘。王藍先生在席間盛讚《滾滾遼河》寫作成功，認為文藝應為歷史作證，作家即是歷史的證人。《滾滾遼河》及其作者，可當之而無愧。

評審的實例

——賀《滾滾遼河》得獎

仲父

本文原發表於《中副》，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紀剛先生的《滾滾遼河》，榮獲中山文藝創作獎。消息傳來，我們不僅「與有榮焉」，而且「感同身受」，原因是這個長篇，從去年八月十二日起，是在《中副》連載的。《中副》發表的作品，得中山獎的已有三部，似乎《中副》的作品具有中山獎候選的資格，那也許是我們在評審方面比較認真吧？

我在資料室服務的年限很長，有一種重視資料的習慣。當資料室主任的三年間，每天寫工作日誌，同事們的工作情形，一一實錄，我自己「曠職」，也秉筆直書。日誌天天放在辦公桌上，人人得

而指出其不當。到年底考績，據以下評語，總離事實不遠，所以沒有人說閒話。到了《中副》的崗位上，開會有紀錄，茶會有計劃，剪貼展覽的設計，長篇小說的處理，剪貼簿的研究發展，都有第一手的資料。今天發表的「《滾滾遼河》的創作過程與評審意見」，便是保愛資料的結果。我相信那些資料很有價值，所以利用這個機會，一齊發表，揭開評審之幕的一角，讓大家得知「文章好看，評審難為」。

從公開的資料可以看出，《滾滾遼河》曾經初審、複審和三審，不過三審換了一個方式，是編者和作者往來的函件，或面對面的討論，商得了原則，然後請作者將原稿攜回，自己刪節，自己整合。國內的文藝獎，評審皆以嚴格著稱，但評審沒有「三級跳」的，故《中副》獨以嚴密自矢，勉為其難，所以在這裡發表過的作品，再參加文藝獎，縱不能穩操勝算，至少也有三分自信。

上星期一，我在「世新」講「副刊的讀者、作者與編者」，曾提到向《中副》投稿，和參加聯考一樣難，有時猶有過之，因為聯考的題目是人家出，投稿的題目是自己出；聯考不准帶書，投稿可以翻書；聯考三取二，投稿十取一。現在還要加一項：聯考只經過一次評閱，投稿卻要經過三次。然而，操場上的稍息立正越嚴格，戰場上的克敵致果越輝煌。像《滾滾遼河》這種以血以淚寫出來的作品，自然經得起考驗，那是最高的榮譽，最大的安慰！投稿的朋友請別以評審的嚴密為嫌，各位從「《中副》小簡」看得出來，我們還有第四級的評審，那就是我們的讀者，他們的評審比我們嚴密得多，要求也高，我們不能不在他們面前低頭！

紀剛的寫實小說《葬故人》

劉介民

《葬故人》為《滾滾遼河》的大陸版，一九九五年二月，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

「非其人不知其事者不能寫，知其事而身為其人者又不便寫或不屑寫，因而形成一段文化真空。」

這是紀剛在小說《葬故人》（《滾滾遼河》一至二十八章大陸版）附錄中寫的一段話。此言確是為了解、研究、分析抗戰文學、淪陷區文學，以及所謂「滿洲國」文學所提出的一個大問題。何為抗戰文學？敵我何辨？何判忠奸？一些研究者和讀者往往用先入為主的印象和觀念強加在這個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敏感的問題。紀剛的這部長篇小說，情思綿邈、雄渾陽剛、氣壯山河；既實錄、又虛構，烘托出一幅東北人現地抗日，以生命謳歌、以熱血繪製的歷史畫圖。對上面提出

的問題做了客觀、冷靜、公正的分析。使我們對那些不分青紅皂白、籠統地以「漢奸」、「日寇」、「滿洲國」文學諸如此類的「帽子」扣在抗戰時期在地下從事抗日活動的人身上的做法，不能不認為是不公道、不寬容的，乃至形而上學的。紀剛在另一篇文章繼續寫道：「……且時至今日，敵我已締交為友，我只能寫我們如何奮鬥，不便再說敵人如何凶殘。」小說如此，學術文章更應該如此。基於此種認識和態度，對用鮮血寫史實、用生命寫詩的世界華人文學名著《葬故人》做些評析和研究，也許是很有意義的。

《葬故人》的時代背景

《葬故人》寫東北愛國青年有組織的地下抗日活動事蹟，所涉及的重大歷史事件如「一二三〇事件」、「三省黨部事件」、「五二三事件」等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劉心皇的《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李瑞騰編《抗戰文學概說》以及《羅大愚回憶錄》、《東北抗日五二三蒙難四十周年紀念文集》得到指示。小說以史實為經，以感情為緯，穿梭組織，以個人經歷的時代背景鋪敘而成。

書中的主角是當年的紀剛，原是「盛京醫科大學」的學生，參加「覺覺團」秘密組織，與兩位佳麗孟宛如、黎詩彥發展著工作關係和感情關係，然而紀剛卻要「擺脫家庭，切斷社會關係」去「秘密機關」工作，小說就如此地展開了故事的序幕。這樣的開頭，沒有流於艷情小說的思路，兩人一

出現，作者馬上烘托環境，揭示時代背景。「一二三〇事件蒙難的黑龍江負責同志，最近殉難了……需要調幾個人參加總機關，專任督導工作」，使得以後情節的推演，與那個動亂的時代，與「覺覺團」的地下工作密不可分。直到抗戰勝利這個動人的故事才算暫時落幕。

這一部長篇小說，誠然是以「九一八」瀋陽事變，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作為時代背景，寫出偽滿統治下的形形色色。自九一八事變起，東北淪入異族之手，日人的武力侵略，東北人民忍受屈辱淪為只能從事下層勞動的亡國奴。七七事變以迄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更以東北作為戰爭後勤基地，壓榨搜刮更殘酷到難以承受的地步。東北人領悟到不自救不能生存，便有了現地抗戰的具體行動。正如小說中說：「東北人不先圖自救，還等待誰來救我們？」切膚之痛引發的慷慨決死之心，使東北青年發揮了高度冒險犧牲精神。位於瀋陽小河沿的盛京醫科大學也成立了「覺覺團」的秘密組織，取自覺覺人之義。在組織層層領導下，凡道德感高昂、戰鬥志氣旺盛的青年，皆默默挺身投入此一反滿抗日運動。他們以「覺覺團」為核心，以「中國之命運」為武器，面對日滿警憲實施的大彈壓，捨生忘死艱苦鬥爭。他們表現了民族精神，實踐著中國傳統文化，這部小說反映的時代把各種形態的人物連接起來，表現出國家與個人關係非常密切。

《葬故人》是作者經過對社會的某一層面的親身體驗和主觀介入所創作的事實與虛構相結合的小說作品。它的主要特徵是：現實性、親歷性、主觀性。現實性或說現時性，它限定了小說題材的時間範圍，即寫現在時態所發生的事物或問題。這就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東北人抗戰的史實。親歷是

小說的主要動作線索，作者紀剛和被敘述者一起成為作品的主人公，作者的親歷線索、動作線索是小說的主要線索。

優秀的文學作品，除了顯示時代精神，更要表現真實。《葬故人》的作者在出書之前就已經認識了這一項特別性質，他說：「我以當年的東北從事抗日地下工作的親身經驗，寫下了這本《遼河》，其中自然包括了小我與大我兩方面的情感和兩方面的心願。」又有「生命寫史血寫詩」和「革命誤我我誤卿」的告白。「生命寫史」是工作故事的歷史見證，「革命誤我」是感情故事的自我暴露。應該說這是寫作的要求和原則，是作者親歷而「寫實」的。

《葬故人》的創作模式

比較來說，《葬故人》故事性並不很濃，不是單純寫人，也不是單一的寫事，而是人與事的綜合。它把握了九一八事變到日本侵略者投降這一段的東北史實，以地下工作者的言行和思想加以鋪敘，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完成了社會寫實的任務。紀剛採納了部分舊小說的格局，選用自出機杼的模式，其內容技巧，有它受人喜愛的理由。

在日偽統治時期的東北都市，是地下工作者最活躍的地方。然而，人們卻稱那是「大地的瘡，原野的潰瘍」，「因為潰瘍裡有戰鬥的犧牲，有壞死有新生，有入侵的細胞，也有抗敵的白血球；正如城市裡有善良有罪惡，有黑暗有光明，有敵人和它的爪牙，也有愛國民眾和革命分子一樣。」在

偽滿洲國的東北社會，雖然各種類型的人物都有，對於國事也有著各種主張的看法，但是，要求抗戰，表現高度愛國熱忱的占絕大多數。成千上萬的東北青年就憑著「東北淪亡了，做亡國奴的是東北人，東北人不先圖自救，還等待誰來救我們？」這幾句話而熱血沸騰，奔走拚命。他們不顧一切的犧牲奉獻精神，都充分顯示了對國家的責任與民族的大義。如書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 我們受訓完畢，像是在慶祝節日夜晚所發放的煙火，於夜空中爆烈後，火光一閃，流星四散。那真是極美麗的圖案！敵人從長春——（偽都新京）——發號施令、控制全滿；我們從瀋陽——（昔日東北的軍政中心）——指揮戰鬥，做收復東北，再建東北的艱鉅工作。

這是真正的抗戰主張，不計利害得失，於國家民族著想，就是靠著這種決心和信念，激起了全民抗戰的巨大浪潮，中國沒有亡，東北光復，獲得了勝利的果實。

小說寫瀋陽萬泉河北岸的小河沿，盛京醫科大學的秘密組織「覺覺團」。覺覺團的弟兄，受徵召而放棄學業，脫離偽職，擺脫家庭，開展鬥爭。以紀剛的行動為主線，相關人物出場後，往往插入憶述來交代人物背景。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便於心理描寫和抒發議論。感情線以孟宛如、黎詩彥為兩大支系，也敘述工作同志的感情形態。

小說由紀剛見宛如，道出他奉命要去哈爾濱工作之事，由宛如提及詩彥，交代情節；再由紀剛

對心竹的友誼情感，道出負責人提醒的「青年同志應加戒慎的，是在工作中鬧情感問題。」預示理智與情感、理論與實踐的矛盾衝突是小說糾葛的動力。也使小說在感情、工作故事中並行鋪展。除了嚴肅的現地工作，也有輕快的情感交流，如宛如交付詩彥信箋；以心竹為紐帶，上接紀剛之思緒，下連會晤任俠，並補敘心超與嚴姐堅貞的愛情，布局是頗費心思的。接著詩彥登場，以紀剛與詩彥探討「解除不合理的婚約」，發展了他們的感情關係，寫得靈活、生動。在這段感情故事中，作者沒有忘記將情感滲入那特殊的時代，他們談論的話題仍然是「滿洲文壇」、「愛國抗敵的宣傳」，以及紀剛的劇本和《出埃及外記》等。這就把情感和工作融合在一起，並達到了烘襯工作主線的作用。

此書對民族意識的闡述，除正面以青年抗日呈現，也善用老輩的寬諒和支持來烘托。紀剛要去哈市從事地下工作，行醫的叔父就體諒，還為他準備旅費；李庸的父親是個義不帝秦而無職業收入的人，雖遭喪子之痛，還要省下生活的錢「送給國家」，並提供掩護場所；仲直的父親做生意，謹慎而機警，見面塞了紙包就走……當國難臨頭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會無條件的奉獻，都會表現出愛國的熱情。

小說中為適應時代環境，適當應用了一些日語和日語語法造詞。在特殊的情境和人物適度使用，如「奉天驛」（瀋陽車站）、「留置所」（拘留所），敵偽覺得「殘念」（遺憾）等。

從《葬故人》的整體布局和創作模式來說，表現抗戰和地下工作的嚴肅而沉悶的氣氛與情感寄託的浪漫故事的有機結合，使作品顯得輕快、活潑，迴腸蕩氣，感情受工作的牽制，以致延宕而疏

淡，或感壓抑而積深。小說以藝術形式「切實描寫在偽滿統治下的中國人深刻的苦惱，和非在那兒呼吸不可的青年男女的哀愁」，為歷史留下了逼真的畫圖。作者處理的雙線情節，跨越轉移，不著斧痕，具有相當完美的現代小說結構。成功地以綿邈的柔情，烘托了氣壯山河的雄渾歷史篇章。

由此可見，小說創作模式基本以它的政治性、社會性、歷史性、藝術性發展起來。反映東北人地下抗戰的題材，自然有它存在的價值；反映東北社會的各個層面，具有鼓舞人心、警惕人心的教化作用；巨細不捐地記錄歷史真相，具有可靠的原始史料；文學藝術的素質，使作品渲染性強、煽情性高、說服力大，具有寫實主義的特點。

當然，小說也不乏缺欠與不足：平鋪直敘介紹性、解釋性文字有之，情緒化亦感亦泣亦恨的語言有之；報告自己的行蹤經歷，似傳記、報告文學；偶有實錄性質的「通告」、「綱要」，雖可理解，但覺冗贅，此乃美中不足之處。

滾滾遼河，萬古不滅

讀罷《葬故人》，心潮起伏。想當年浴血奮戰的將士若不留下苦戰的第一手紀錄，生死之際的獨特經驗；飽受日寇蹂躪，嘗盡顛沛流離之苦的民眾，若不留下刻骨銘心的慘痛回憶，則在歷史的長河中仍然是過眼雲煙。一代人的奮鬥犧牲，都將成為時間和空間的附屬物。時過境遷，後世子孫在模糊的史影中所能見到的，只是一堆竄改歷史者的謊言。這樣的創痛，還要沉默？只怕一代之去，

寂寞無聲，一代人的努力未留踵跡而令人浩嘆。

滾滾遼河，萬古不滅，它將是「歷史的證人」。

海外感應

——摘錄自《羅大愚先生紀念集》

紀　剛

本文曾刊於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八、九日《中華日報》副刊，該集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出版

四月二十九日，我與朱紀啟程赴歐，出席於瑞士召開之扶輪社國際年會，兼作環球之遊。行前，曾與一正兄同往榮總探望大兄，當時大兄看到我們顯得十分激動，似乎要轉動身軀，惜已無力言語。我們走上前去，握握他那瘦削的手。就醫師經驗言，在瞬間我了解——這可能就是最後一次的握別，但多年來戰鬥與生活上的友情願望，驅散我那瞬間的「了解」，我心想我回來時，我會再見他，或在其家或醫院。

由香港而曼谷，由曼谷而雅典，由雅典而羅馬，在那段晨夕變化而又緊迫的旅程中，曾把對大

兄健康的懷念與憂慮，深深地壓在心底，可是在義大利的那波里斯那晚，我突然從夢中驚醒，夢境清晰而餘心悸。

環球旅行，對我們這歷經變亂的人而言，自知機會不多而極珍惜，何況足跡所踏之處，都是在初中地理課本上曾背誦過的那些古老而又神往的地方。所以每日除旅行社排定的節目外，早晚自由時間，或在旅舍樓頭貪戀夜色，或在湖濱漫步欣賞朝陽，都儘量縮減睡眠，故而十分困倦。但，這夜夢醒後，無法再行入睡。

照理遠行時應該向大兄報告平安，至少要向郁中嫂作書問候，但得此夢後，就無法提筆了。之後，經過水都威尼斯，乘國際列車前往奧京維也納，沿途青山白雲，綠水深林，多彩農舍，大野牛群，風光更臻佳境；可是我的思緒視野中，總是茫茫然，默默然，抹上一層濃濃的沉悶。一直忍到瑞士，我不得不寫個明信片給尹生兄，從側面一吐我對大兄的疑問：

啟程前，在臺北曾滯留二日，因匆匆趕辦出國手續，未得與兄晤面一談，歉甚！五月九日晚，弟在那波里斯做一惡夢，是關於大愚兄者，不知彼近況若何？念念！弟在瑞士洛桑開會一週，夜宿於山谷勝地湖間城，仰望湛湛藍天與積雪皚皚的阿爾卑士山峰，心中所想者，仍為故國故土故人故事耳！兄家還居臺北，一切均已安適為祝。

六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會後，由日內瓦飛馬德里，再飛里斯本，二十三日飛抵倫敦。次日旅英同學朱國慶打電話告訴我，他已在報上看到羅先生的逝世消息，並訂於五月二十三日舉行公祭等等。至此，心中的懸石落底，疑慮變成肯定，不願接聽的消息也聽到了。但一個星期以後才能寫出下面幾個字：

郁中嫂！祝你好！

在倫敦聽到大兄離我們而去的消息，心中十分難過，想立時寫信問候你，只是想不出合適的話語。其後經過巴黎、阿姆斯特丹，直到斯德哥爾摩，胸頭總是抑鬱。尤其是停身巴黎那晚，站在凱旋門前，想起追隨大兄為國事奔走的那些日子，更是感慨萬千……

「心靈感應」這事可能是有的。弟在義大利的那波里斯做了一夢，夢到大兄的那一刻，驚醒時正是十日清晨二點鐘，加上時差，不知是臺灣的什麼時間。

我們將於七月初回臺，不知大兄有什麼交代的事於弟，念念。

願你保重。

辰光、朱紀　五月三十一日於瑞典

大愚兄是否對家人與朋友有個別的交代，我不知。但就涉眾方面，或就他個人的願望而言，我知道的有兩點。第一是寫在他懷念昔年老友的〈沁園春〉詞上：

吾何顏？惟老兵不死，重整戎裝。

在大愚兄形同長期隱居生活中，從未熄滅的希望是重整戎裝。而我們這些往昔曾共同浴血奮鬥，來臺後已經「工作無聯繫，生活少過從」的朋友，只若有他重整戎裝的日子，大家均將應召而起，應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便是他的工作回憶錄了。

大愚兄決心要完成他的回憶錄，是在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會後，我立志重新寫《滾滾遼河》也是那個時候。無疑的，大愚兄的回憶錄，我是他所期望的眾多助手之一，遺憾的是我並未如他所願地那樣著手。回想我在青島流亡時，辭去各項公職，重新走回診療室，便想利用診餘時間寫個小說來記錄那段非凡的生活，他知道我這個心願，便從南京寄個長函予以「嘉勉」，同時也給予許多「指示」，供我參考。來臺初期我因生活所迫並未按寫作計劃進行，大愚兄也未追問。但這次我們同時動手寫作，大愚兄卻說：

「寫小說忙什麼，先把回憶錄弄好再說吧！」

就寫歷史性的記錄與文藝性的小說言，由於責任觀點與個人志趣，他是重視回憶錄而輕視小說的。當我把《滾滾遼河》的完成稿拿給他看時，他卻把回憶錄放下，用整個心力時間來精批細閱。他特別提示「本書必須向讀者負責所述歷史的真實，雖小說家言，讀之亦不啻讀史」。在此原則下對

小說殺伐頗重，許多重要情節均有爭論。在小說與歷史矛盾的地方，最後必須在他看來雖是小說筆法，但不違歷史真實；而在我看來，雖用歷史事實但亦合乎小說要件下方能定案。在這段爭論過程中，最有資格發言的應是社長士嘉兄，惜當時他正遊學海外，無機審閱原稿；其次是一正兄，但他正奉獻於醫療傳道，不願分神置喙；幸有尹生兄安居花蓮，生活美滿，工作輕閑，能心有餘緒地仗義執言。記得有一晚，為了幾個在書信上久久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到臺中去當面討論，行前曾向尹生兄作書求援，尹生星夜發一快信為我助拳。大愚兄很嚴肅地拿著尹生的信說，「這事尹生他不知道！」是的，有些事尹生不知道，有些事我亦不知道，但當時我亦有許多難言之隱，大愚兄也不知道。夜深了，大愚兄先去睡覺，我卻思前想後的泛起一切委曲，整整哭到天明。

我記這段事，是要說明在批閱《滾滾遼河》時，大愚兄是十分重視這小說的，也可以說他是以寫回憶錄的精神處之的，態度認真而嚴肅。在今天言，假若《滾滾遼河》算是一部小有「成就」作品的話，假若「成就」的要素是因它活現了當年歷史的真實的話，那麼這小說也應該算是大愚兄回憶錄的另一章了。尹生兄在致大兄函中曾有「見樹未見林」之語，以自謙其對當年工作所知者少。實則，假若大愚兄回憶錄中對各個人事物地，都有詳盡的描寫，使讀者有機會看到各個的「樹」，而《滾滾遼河》對當年工作的品質，氣勢與風貌，該使讀者有見「林」的感受吧！

六月六日，我們從柏林直去紐約，建仁兄到機場來接我去住。盤桓兩日，談了許多事，竟未談起大兄。我是故意不談，事先與朱紀約定，假如他們不知道就不告訴他，以免他精神受激。第三天，

我忍不住了，乘地下鐵時試著向他說：「我出來的時候，大愚兄的病很重，現在……」他聽出我說話的用意，立時接著說：「已經不在了，我怕你旅途情緒不好，所以不想告訴你！」原來他早已接到消息。他說他得到消息後，幾個禮拜都沒心做生意，天天算錯帳……

回國途中，路過東京，會晤日本文化人山口於新宿龍門閣。山口說：

「我譯《滾滾遼河》時，很受感動，尤其對書中的負責人特別欽佩。很想到臺灣旅行時去拜見他，可惜沒有機會了！」

原來山口任職於NHK的華語部，早從《中央日報》上看到報導。「幸好，」她說：「我也是五月十號那天，把《滾滾遼河》全部清稿送到出版社，這也算完成了我對這位偉人的一份崇敬！」

山口和子女士是位誠篤的佛教徒，精研哲理，隨緣說法，在她看來，這已經不是一般平凡人所說的巧合了。

三尊神與一堆人

──《滾滾遼河》的書中人物

紀剛

本文原刊《東北文獻》七卷四期，六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轉刊《讀書人》〇四五號

《滾滾遼河》書中人物，依其命名式的不同，可大致區分為四等類。無姓無名者為第一種人，有名無姓者為第二種人，有姓有名者為第三種人，有姓無名者為第四種人。

第一種人等同「三尊神」，即書中所謂負責人、書記長、社長。其他三種可統稱之為「一堆人」。所以用這種區分加以命名者，一是要照顧歷史的真實，一是基於小說的需要。二者不可兼得時，也有自亂規章的地方，在這種節骨眼兒上，不得不選些可「名」可「姓」的字，加以權變運用。如讀者所深知者，《滾滾遼河》是以東北地下抗日的工作故事與紀剛、詩彥、宛如等青年男女的感情

故事，雙線併行編織著。文藝評論家王集叢先生曾發掘出《滾滾遼河》的書中書《葬故人》，是此大小說中的小小說。在寫《葬故人》時，筆者純是以「小說」的構想來處理這份題材的，所以把感情故事與工作故事寫到「一起」去了。把方儀與詩彥寫成一個角色，當「她」埋身荒塚後，那身當抗戰勝利而心處於革命低潮期的「他」，才有「革命誤我我誤卿」的悲憤與感喟。寫《滾滾遼河》時，筆者為尊重歷史的真實，所以嚴守「工作故事」與「感情故事」的分野。但有些人物畢竟介身於兩種故事之中，所以其命名也就倍受斟酌。

以讀者的觀點言，有人重視《遼河》中的工作故事，有人卻偏愛那些感情故事。以筆者立場言，二者是不分軒輊的。只因依一般價值標準：大我優於小我，公義先於私情的原則，將工作故事中的主體人物列為第一種人與第二種人，將感情故事中人物與歷史背景人物列為第三種人，其他則列為第四種人。

有姓無名的第四種人：如充當偽「首都警察廳」看守的曹大麻子，如掩護心竹避難隱身農莊的義軍連長錢當家的，他們作為小說的配角，故事不多戲不重，此處亦不多談。

有名有姓的第三種人：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蘇聯紅軍長春衛戍司令加爾羅夫少將，為了標示歷史真實，他們都用本身分本姓名出現，其活動時地也未加更改。感情故事中人物，都給予全名全姓，宛如讓她姓孟，詩彥叫她姓黎。宛如一直是感情故事中人，讓她列身第三並不委屈，詩彥最後雖也參加了工作，但在小說中她是感情故事的重要角色，所以仍列為

第三種人。若單就感情故事談，除紀、詩、宛、心竹的不成形四角關係外，方儀與仲直、心超與嚴姐、木莎與捷夫，亦均各成一局。而李哥為宛如而死乃另一型式，鍾鳴下嫁特務又涉及另一層次，非本文所宜討論，暫亦從略。

有名無姓的第二種人：都是工作故事中的主體人物，也是《滾滾遼河》中排出最多者。戲多的如紀剛、羅雷、仲直、方儀、心竹等十餘名覺覺團弟兄姐妹們，戲少或只列陣助威的在第十章裡一口氣出場有三、五十名之多。這些人都是省方幹部。「省方」是地下總機關的化名，因各地同志對總機關的稱謂不同，有人稱之為核心機構，有人稱之為現地中央，組織為避免誤會與物議，通令以「省方」稱之。省方幹部通常都使用兩個字的化名而不冠姓，大家多半是被通緝的黑人，彼此原不互知姓名，每個人又因不同的任務持用不同的身分證，遇有警憲臨檢，不待主人介紹，概由客人自示身分以應付。這點妙用曾被一位聰明的敵特由統計而發現，在「五二三」案件審問的時候曾說：「你們都是兩個字的英雄！」他所謂「英雄」意即「要犯」，都是要判處十五年以上徒刑者。

在《滾滾遼河》中對這些二個字人的處理，為了做個歷史紀念，其本人來臺而事蹟在書中並未小說化者，一概翻出底牌採用其本名：如（汪）漁洋、（姚）彭齡、（吳）尹生、（史）惟亮等。殉難者亦然，如荘公謀、高雲龍等。不便採用本名或仍身陷大陸尚須隱諱者，則使用其原化名，如時鑑、穎川、仙石、澄波等。至覺覺團幾位弟兄，由於其故事有些小說化，且為小說情節的需要，不能利用原化名，故不得不擬些模稜兩可的字眼兒。如紀剛可視為一個雙名，亦可視為姓紀名剛。方儀、

仲直亦然，心竹還得另加一個「葛」姓。這樣才能使他們在小說裡適用於工作故事中，亦可適用於感情故事中。

無名無姓的第一種人：只有三位，前已列舉。「負責人」是地下工作的總負責人，又稱第一負責人。「書記長」主持經濟建設委員會，又稱第二負責人。「社長」即東北公論社兼東北通訊社的社長。這三位都是以職稱接頭辦事，所以就變成無名無姓高度神祕的人物了。

關於這四種人物的刻劃，在討論修稿階段，尹生致大愚先生函中有謂：「作者最巧妙處，是將負責人、書記長、社長這『三尊神』與『一堆人』分開處理。前者偏重描寫其革命人格，抽象代表組織精神，後者則具體刻劃其聲音笑貌……」作為書中「負責人」的大愚先生用硃筆把「三尊神」三字劃去並加批註。意謂「不要這樣狂妄吧！就文稿看只有作者是神，他能呼風喚雨，對負責人書記長等，也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大愚先生謙沖，也不願筆者狂妄，所以在《遼河》後記中引用此函時，也未敢將「三尊神」字樣留用。但筆者寫作《遼河》時，對這三位人物的描述，確實是以「神格化」方式處理的。一因地下時期，全體同志對這三位人物的心態，只若一提稱呼便都肅然起敬，其尊威有若神明。一因地下工作本質是有神祕性的，任何「人格化」的領導人命名，都會減損其神祕感。何況《滾滾遼河》是以覺覺團的弟兄為演唱主角，其超級人物自不便出場，若真出場可能成為舊劇中的某些帝王，倒成為配角兒了。

當然，負責人、書記長、社長，是地下組織中三位領導人實際的稱謂，筆者在工作故事中照樣

援用，正保留了所謂「歷史的真實」。至抽象的解釋，不僅代表地下工作者的革命人格和組織精神，還可以代表中央的領導，政府的指揮和統帥的命令。而這種寫法在小說上卻是虛筆，不付予姓名以免落實，使之成為空靈人物以便未來處理。不然，即將發生「請神容易送神難」的問題了。

《滾滾遼河》，就感情故事言，是一部完整的書。就工作故事言，以抗戰勝利為分水嶺，地下抗日與政府接受的歷史背景不同，工作性質變易，成了一盤質量不等的雙拼。就小說言，人物出場不能突然，下場也應有交待。「負責人」等是工作故事中的人物，按著工作故事的開展與需要，他們一尊尊被請出來領導地下抗敵大業，這時他們也實際地代表中央、代表政府、代表統帥。勝利後，東北有關機關正式建制成立，他們所代表的權責便立時轉移消失。若點明了他們「實際人」的去處，對歷史真實了，對小說可能是大敗筆。但他們應如何下場？他們不能突然沒了！這曾使筆者大費心機。

三尊神中最先退場的是「書記長」，筆者於初稿中原寫他在「五二三」事件中「壯烈成仁」。由於此一安排，在勝利後的篇章中曾演繹了許多悲憤情節。「書記長」如此結局遭大愚先生強烈否決，他認為如此知名中央與地方的重要人物不可寫假，他特別提示本書必須向讀者負責所述歷史的真實，如此寫法則一假百假，本書的歷史價值全消。雖然書記長的真實結局並不比死難強些，但「五二三」事件時他確未死，所以只好寫到他持械拒捕，中敵彈而生死不明，從此未再提他，等於在地下時期就把他以不交待的方式交待了。

關於「社長」，勝利後也未再正式出場，在同志們的間接口述中曾若隱若現了幾次，等到東北公論社被搗毀，《公論》停刊，也就等於請他鞠躬下臺。

至於「負責人」，在日本投降政府尚未接收那段政治真空期間，他自然還要負責一段時日，待他從重慶回來，政府已正式接收瀋陽長春，他就無責活動了。這時的紀剛還繼續一段「收攤」工作，也是奉命「辦理善後」的，是要把地下抗敵工作的人與事轉移到復員建國的工作上。他所奉的「命」是來自地下工作時期「負責人」的，也可說是來自接收時期有關當局的。後來紀剛到瀋陽要找「負責人」報告工作，才正式宣佈「負責人不在」了。那時是民國三十七年初春，富豪新貴正紛紛南飛，方面大員已五日京兆，這時提出負責人不在，不僅淡去了書中的負責人，也預示了東北大局的命運。

《滾滾遼河》刊出後，除經兩家廣播公司製作「小說選播」外，影劇單位也曾擬議將其推上銀幕或螢光幕。小說與戲劇不同，如何改編如何上演是影劇專家的事，小說作者不便置喙。然若真能接受建議的話，筆者願提出：對那「一堆人」如何劇化，悉聽其便；對這「三尊神」型亦實亦虛的人物，似應留在幕後。僅僅這一點，對演出的風格與效果，可能有很大的影響。

欣見冰封的故事解凍

——摘錄自《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尹　生

該集於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出版，本篇為編後記之一

東北愛國青年有組織的地下抗日活動，在當時是一件震撼敵人的大事。這事關係著日本軍閥所謂「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成或敗，以及偽滿洲帝國統治權的存或亡。敵人自不惜任何代價，不擇一切手段，以求探知此事，打擊此事，消滅此事。雙方絞盡腦汁，激烈搏鬥，將近十年之久。卻因雙方都不肯對外張揚，各自保持祕密，以致極熱鬧的場面沒有觀眾；極動人的故事沒有讀者。「一二三〇事件」、「三省黨部事件」以及「五二三事件」都是這事的暴露部份，也由於上述原因，都未能構成新聞，傳誦一時。

日本投降後，東北雖立即陷入另一場混亂，但在三十七年十月棄守之前，各主要地方尚維持過一段相當安定的小康局面。姑不論世俗所謂的「教忠教孝」目的，就算茶餘酒後用作談助，這事也該廣被流傳。假如有好事者，蒐採此一題材，以生花之筆為文描述，當其時也，也必膾炙人口，紙貴瀋陽。但實際上並沒有；且一直沒有。我們從未見到像本文集所載作品，在該時東北的任何刊物上出現過。我們朋友們那時在東北各地也曾辦過幾份報紙和雜誌，就從未刊載過此類作品。這裡面一定隱藏著一個問題：是誰？封鎖了這個故事。是什麼緣故？使這個故事凍結了二十年，直到今天才解凍。造成這個問題的理由，當然不止一個。「無暇」是個理由：像本文集中孫寶珊兄所說：「悄悄地展開了新的工作……日以繼夜地工作，緊張嚴肅地工作，怕的是勝利的果實遭受劫掠，怕的是可愛的家鄉再度淪亡。」「持重」也是一個理由：像篤實兄，三十四年冬在錦州所說：「不寫！寫出來讀者不會相信這事是真的。」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理由，該推辰光兄所說的：「恥於訴說」。三十五年《東北公論》某期，曾刊有辰光兄的大作，題目已失記，他開口便喊：「我恥於訴說……」。那是一篇屬於罵世的文章，但罵得相當含蓄。文中並未指明應受責備的人是誰？也沒清楚告訴讀者：他恥於訴說的是什麼？但，自家朋友卻人人看懂，心照不宣。

大家總該記得：勝利不久，「地下工作者」一時如雨後春筍。有些人物，搖身一變，大有真假難辨之勢。我們永遠不屑指明：他們都是何許人也。只說：他們品類太雜。我們當時雖然都年輕，修養不到家可能是真的；但尚不至缺乏容人之雅。只怪這類人物揣摩錯了權貴的癖好。他們這番做作，

並未發生功勞簿或贖罪券的預期作用；反而糟蹋了「地下工作者」這一坦純無私的頭銜。他們使這個頭銜應有的光彩全失，轉變成一個恥辱的符號；這才觸犯了我們朋友的大忌。正如張鴻學兄在本文集內所說：「他們生前不為利祿，死後也不求揚名。」試問：生命都可拋棄的人；拋棄一個頭銜又有何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時散在東北各地的朋友們，乃不約而同，閉口不談往事。牛脾氣發作，不談就不談。對外不談，對內也不談；對家人父子照樣不談。朋友相見，彼此什麼都談，就是不談這個；更遑論筆之於書？

二十年了！世事物換星移，原始情況早都不復存在。只剩下純真的友誼，還禁得住考驗，未受外力所動搖，若隱若現，若續若斷，相繫如網結；在人情澆薄的今日社會裡，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今天，大家單純地為了「紀念」的動機——紀念死難者，紀念失去自由的友人——刊行這本集子；將之呈獻於每一在臺友人之前。雖然記述的都是些過時的、平凡的、片斷的往事；但料將仍不失其二十年前冰藏當時保有的新聞價值。就因「五二三」前後，每個人都做了何事？遭遇些什麼？大家彼此原即互不知情也。

抗戰時期東北地區的文學活動

紀　剛

本文為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文學組論文報告。一九九五年八月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發表

「要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史，關於敵偽時期淪陷區文學的一章，則幾乎是要交白卷。」這是徐訏先生為《夢回青河》寫序時，曾說過的一句話。實則有煙的地方就有火，有人生的地方，就有文藝。文藝是人類生活的反映和思想觀念的表現，但在帝國主義侵略地區，不能自由表現時，有關文藝或文學活動，勢將分途發展。所以要研究抗戰時期東北地區——或說偽滿時代敵偽地區的文學活動，必須從公開的和祕密的——或說地上的和地下的兩方面來著眼，方能得觀全貌。前者包括敵我雙方的作家及作品，後者則涉及一切愛國份子和團體所從事的文化抗敵工作。這兩方面，本來都「很」有成就，可惜勝利後給人以「無知」與「偏見」，用一個「偽」字和「漢奸」一詞就全部抹殺了。三

十年前，筆者曾以親身體驗與當時所掌握的資料，寫了一篇簡要的《文壇滄桑外一章》，刊登在臺灣的《文壇》雜誌上，做為對徐文的回應與糾正。

今日中國之東北，原為遼、金同胞發祥，集居生息之地，故古有遼東之稱，有清崛起，又號滿洲。而一般人所說「抗戰八年」乃自一九三七年「七七」算起，東北地區則應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據東北，成立偽「滿洲國」開始，歷時十四載。「七七」以前的東北，已是完全受敵偽控制的社會，一切抗戰活動都是祕密地下的，城鄉同質的。「七七」以後的華北等地淪陷區，則是敵我相間的社會，無論是公開或祕密的抗戰活動，都類似游擊形態；上海孤島亦然，故可採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方式，當工作遭受破壞情況緊急時，工作人員可以得機撤離，遁入鄉村或遠走大後方。「東北抗戰機構」曾以「現地抗戰」為號召，嚴格要求同志不以任何理由任何情況逃離東北現地為紀律，用以堅凝從敵人內部打擊敵人的鋼鐵隊伍。事實上，「滿洲國」也畢竟是個「國家」形態，有嚴密的國境邊防，想逃離也是十分困難的。所以說抗戰時期的東北，是個特殊時代的特殊地方，抗戰文學活動亦呈特殊現象。

東北地區的中國傳統文學，有清一代已極豐盛，民國鼎革以及五四後的新文學，因受軍閥割據影響，並未迅速開展，但自東北易幟，響應革命，河山一統，人心振作，新文學活動亦即有一番蓬勃奮發之朝氣，不幸「九一八」後，我軍政黨務機構，相繼內遷，因日寇侵略激盪而興起的各形各色的抗日武裝力量，亦次第瓦解或撤離入關，闡發國家思想、民族意識，敵愾情緒的文化活動，亦

隨之消聲斂跡。當時在文壇上已露頭角，稍有名望的文化人，有者遠走他鄉，有的封筆轉業，人們在大難臨頭的時候，也就不惶為文了。所以這個時期的東北文學現象，就像東北的地理環境一樣，由初春跳入深秋，繼而冰封雪掩，一片荒涼，進入中國文藝的冬眠期。

在此時期的作家們，因敵偽統治次第加嚴而出走內地者有二蕭、端木、舒群、孫陵等人，因係來自東北淪陷區，故而名揚滬上；留在現地者如劍嘯等人，不久即遭敵偽毒手；其他的新生代寫作群仍在爬行階段，尚無若何成就。若舉一例代表那個灰色年代的，當首推《盛京時報》的穆儒丐，他寫了一部章回小說《昭福創業記》以嘔歌偽朝，其次是吉林師大教授陶明浚所編擬的《紅樓夢別傳》，遠離政治，一般的則都是些談酒經茶道，鬼狐神仙，言情武俠等類文字。總之，若不歌頌敵偽，便只有逃避現實了。

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曾說：「文藝是苦悶的象徵。」作亡國奴該是東北人最大的苦悶了，所以九一八後方始入學的一代青年，許多人很自然的走上文藝之路。他們讀，他們寫，他們抑苦悶於胸中而焦灼摸索，因之就有人摸索到或開拓了抗敵愛國之路。

抗戰軍興，舉國同仇，東北同胞，更形歡慶，大有敵偽政府指日傾覆，祖國王師即將天降之感。當代有為青年，基於國家民族意識，紛紛於各大專院校裡，自動自發組成各型團體，從事祕密抗日活動。重慶中央政府與延安邊區政府，亦均選派人員前來東北，從事聯絡、吸收，發展各種地下抗敵力量。其中組織龐大，基礎雄厚的「東北抗戰機構」，首倡以推廣文化活動，為喚起民眾的橋樑；

以深入文教團體，為開展組織邁向起義的階梯。一時許多青年志士，投身教育界，滲入文化界積極開展活動；爭取吸收已成名的文化人，加入抗戰行列。此類機構，除公開設立書局、出版社、雜誌社做為工作憑藉外，更祕密組建「東北公論社」、「東北通訊社」、《東北人民報》等等，刊行祕密書報，開展地下文藝活動。

當時經過多年的寫作磨練，在「滿洲文壇」上已成名的作家計有：古丁（徐長吉），山丁（梁夢庚），疑遲（劉玉璋），爵青（劉佩），小松（趙孟原），戈禾（張我權），袁犀（李克異），楊野（楊維興），田賁（花喜露），田兵（金純彬），金音（馬驤弟），柯炬（李正中），王秋螢，關沫南，陳隄，王光逖以及梅娘、白琅、也麗、石軍、吳瑛、吳郎、呆杳、勵行健、杜白雨等一百餘人，都有豐富的創作與單行本、專集問世。

這些作家們，有的尚棲身於象牙之塔裡，孤芳自賞；有的內心反抗卻行動踟躕。參加地下工作而躋身文壇直接作戰者，有姚彭齡設「博智書局」於瀋陽，以掩護印製祕密刊物。陳蕪、駝子等人打入《營商日報》，擴大滲透宣傳。王覺於長春創立「新時代出版社」，出版忠義叢書及畫刊。楊野、田兵等人於瀋陽創辦「作風刊行書」，發行以詩、木刻、翻譯為主的《作風》雜誌。張輔三、王天穆等滲入長春偽「協和會中央本部」，參與《青少年指導者》的編務。季風以鋒利的雜文與精湛的理論，繼前一階段金劍嘯所開拓的《夜哨》停刊後，爭得長春《大同報》副刊的筆政。在這些刊物上不知發表了多少篇有關戰鬥性的作品，鼓動了多少人的抗敵意識，一時風雲際會，蔚為壯觀。

《華文大阪每日新聞》半月刊，當時受日本軍部支持，行銷中國整個淪陷區，及之後之東南亞日軍佔領地，也以一半篇幅刊登「滿洲」及「新中國」作家的文藝作品，其中有因徵文入選而知名的長篇連載《大地的波動》，作者田瑯，本名于明仁（男）。另一位為中篇小說《安狄和馬華》的作者但娣，本名田琳（女），就文論文，都有較高的可讀性。閱讀這類作品，要有採礦學的眼光或宏觀與微觀併用，才能淘濾：何者已說出，何者未說出；何者為假話，何者為真言；但在社會形貌的描寫上，這些作品都能給那個時代刻劃出明顯的線條，供後人研究參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日本稱之為「大東亞聖戰」的太平洋戰爭開爆：敵偽為安定後方，加控內部，自該月三十日起，在東北各地發動廣範圍的檢舉，造成長春地區的「一二三〇」讀書會事件，哈爾濱的「一二三一」左翼文學事件，以及其他地區的「貞星」事件等等。

在此等事件中，我文藝工作者亦多遭不幸，有關刊社，均告封閉，范紫等人脫走入關，楊野、季風、光逖、關沫南、陳隄等，相繼被捕，王覺、王天穆、張輔三等刑死獄中，一般文化人也都如驚弓之鳥，噤若寒蟬，此時，地上的文學活動如遭大風雪，又淪入一個冬天。

先於太平洋戰爭前夕，敵偽為切斷東北文學與中國文學之歷史血緣及民族文化的關係，曾公佈「藝文指導綱要」，要求「滿洲藝文」必須以「建國精神為基調，從事八紘一宇偉大精神之顯現，要以移植於這一國土的日本藝文為經，以原住諸民族固有藝文為緯，吸取世界藝文之精華，組成渾然獨自的藝文。」此時為強化控制，集中管理，乾脆將敵偽原有各地的中文報紙，統一改組為《康德

新聞》，造成一國一報的奇聞，並徹底將易滋是非的副刊「取消」了。所以這個時期的東北文學，表面上呈現了死滅狀態，不過，日文報紙並不在此限。

然敵偽為配合其「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略戰略要求，又不能不役用文化人為其做文字宣傳，乃於東京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指選古丁、爵青、小松、吳瑛等人為「滿洲」代表。這個有政治性的頭銜，反倒貶低了他們在文藝界的形象，其後古丁辭去偽職，與小松等人在長春開設「藝文書房」，出版《藝文志》，刊印藝文叢書，快讀文庫等等，均具水平，倒不失為一個文化人不便為文時的正當下場，有些不堪停筆之苦的其他作家，有人也自辦刊物，做為發表文章的園地。

在「一二三〇」等類事件中，東北抗戰機構遭受嚴重破壞，尤以青年部門為甚。長春一地區的偽滿大學中，即有二百餘名學生遭受株連，有者逃亡，有者被捕。判決時，當時偽高等法院次長柴田健太郎任審判長。（華人院長為傀儡，而次長握實權）公設辯護律師筒井太郎，是長春法大前身的法學院長。筒井的辯護詞說：「這一群九一八時的兒童，並未受過中國教育，在接受了完整的日滿協和教育，卻都起來反滿抗日！為什麼？」他自己解答道：（一）民族意識是天生的，自然的。（二）滿洲建國原是由於日本的軍事行動；建國後，在滿工作的日本人，又以征服者的姿態造成反感與敵視。（三）這些青年的罪行，大部份應由在滿工作的日人分擔。所以他以日本人的立場，對不起天皇；以教育者的立場，對不起學生。因此請求庭上，量刑從輕。言時聲淚俱下，聞者動容。話雖如此說，陳隄、楊野等人，仍分別被判處十年、十五年或無期徒刑。但筒井的辯護，亦有其效果：

長春地區的抗日青年犯，沒有一個被處死，而審判長柴田，也自動辭去高院職，轉任法政大學校長。

東北抗戰機構受了歷次案件教訓，一切活動採取更嚴格更祕密的方式。文化部門以《東北通訊》為主，由高士嘉、張一正、史惟亮、李季風等人參與工作，祕密出版綜合性《東北公論》月刊，《時事週報》、《抗建文庫》，及文藝性的《黑白叢刊》。其單行本有《火舌集》，《夜行人》，《虹霓》，《三女性》，《如是我想》等等。此外各地方的刊物，如瀋陽的《拓光》，《公理》，《大地》，營口的《渤海潮音》，長春的《新血輪》，哈爾濱的《江流》，康平的《柳邊》，通遼的《駝鈴》，齊齊哈爾的《先鋒》等，不勝枚舉。總之，此一時期的東北文學，地上的重歸枯萎，地下的卻茁壯蓬生起來。

文藝雖貴乎象徵，但在敵偽官方或民間刊物上，能公開發表「保衛祖國文化，爭取民族自由」等有思想性的作品，當時稱為滲透宣傳性的文章，因行文有所顧忌，影射又加隱喻，讀起來總嫌有些吞吞吐吐，而地下刊物流傳在地下工作人員及其外圍團體中，其作品明示其抗戰性格，閱讀時則感痛快淋漓。例如季風新作「風吹著，我們走；風不吹著，我們也走！」是一篇小說中女主角的兩句話。這兩句話正代表了這支文化隊伍，孤軍奮鬥時的誓言。楊野在《夢與裝飾》裡，曾有詩句「不願沉默地生，也不願沉默地死！」這時又從獄中傳出一首詩，詩題是《我是王》。他自喻為一頭猛虎，最後兩句：「虎入牢檻，虎仍是虎！」最足以吼出他被囚時的心聲，也振奮了檻外同志的勇氣。假若有所謂戰鬥文學的話，這些作品，可說是真正的戰鬥文藝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敵偽發動最後一次大檢舉。各地文藝工作者亦大部入獄，連同其他部門以及受株連的社會人士總計有三千人之眾，此即震驚整個東北的，也為敵偽敲起喪鐘的「五二三事件」，「東北公論社」同仁在長春監獄中，集體創作一首蒙難紀念歌。歌詞凡三闋；大家晨夕吟唱，最能表現蒙難人士的堅貞信仰與革命氣概。最後一闋為：

黑山白水，久遭塗炭，收復事業鉅，
武裝的流血，祕密的鬥爭，十餘年前仆後繼，
打破枷鎖，拿起武器，
大眾奮勇殺敵，重見青天白日。

這歌聲曾獲得偽「首都警察廳」敵特們衷心的讚佩。作戰如賽球，雙方都是勁旅，打來才有興趣。

當然，抗戰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那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也在東北各地區，祕密的，廣泛的流行傳唱。也就是說，地下抗戰的東北文藝工作者，是用生命寫歷史，用血寫詩的一群。

關於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學活動，除筆者做以上的區分陳述外，尚可另舉三端用為參考。

一、大陸作家黃玄（王秋螢）在其《東北淪陷期文學概況》中，亦劃為三期。第一期(1932–34)，標題為「淪陷初期的文學活動」，內分為兩小題：⑴以哈爾濱為中心的北滿文學。⑵遼南文藝和初期的文藝社團。第二期(1935–38)，標題為「迂迴發展到逐漸繁榮」，此期未分小題。第三期(1939–43)，此期無標題，但以三小題作內容，豐富而複雜的評述。三小題為：⑴文藝界的分化和後期社團組織活動。⑵圍繞《藝文志》派的廣泛論爭和批評。⑶日偽末期報刊和雜誌的文學活動。綜觀黃玄先生的《文學概況》，是以今日大陸的觀點，以左翼作家的活動為主；「文學」資料豐富，而「概況」不清，有「見樹不見林」之弊。正如鐵峰先生對編寫《東北現代文學史的幾點看法》所說，似乎有點將文學史落入「作家及作品與評論的匯編」性質。至於為何將此時期漏掉四四、四五兩年？若就其全文內容而言，此二年正可劃為第四期，其第⑶小題正可移為本期標題。如其文末所說：「從一九四四年開始，報刊雜誌都縮了篇幅，不僅紙張粗糙，油墨失色，刊物內容幾乎全是大東亞聖戰必勝，成為敵人滅亡前的哀鳴！」正是本期的結論。

二、美國華文學者葛浩文教授，於臺北抗戰文學研討會上，關於《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學》報告中，也是劃分三期：一、二兩期時間與黃玄同，第三期將黃遺漏的二年納入，延至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他是第三國人，拋開交戰雙方的敵我立場，純從歷史觀點，著眼於當時文學人物集散的地區，以及作品刊物興衰的質量，也就是以文壇自身的變化為立論基礎，所以他提到「滿洲國」，絕不使用一個「偽」字，認為那是個歷史的存在，真實的存在；就連那個括號也是勉強加上去的，因此在報

告現場，對大多數民族意識強烈的與會者，曾激起不大不小的波動。

三、日本作家大內隆雄氏，九一八前即來滿洲工作，任職於日帝侵略東北的前鋒機關——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他於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滿洲文學二十年》，是以九一八為界，將「滿洲文學」分為建國前後兩期，且分日文、滿文兩部，前期評述東北受辛亥、五四影響，在舊文學傳統風氣中，滋生出一些新文藝作家及其未成熟的作品，後期則包括本文所記各期人地事物，其日文部是指在滿的日本文學者，滿文部則指中國的作家及作品。以大內隆雄的資歷、背景，想必曾參與「藝文指導綱要」的草擬與制訂，其後擔任「滿洲文藝家協會」審查部長，亦即負責綱要的執行任務，綱要的目的在建立有獨特色彩的滿洲國文學，期能割斷與中國文化的淵源，不過，還沒有達到其預期效果，已引起一系列的文學論爭與中國作家的心理反感，無論如何，大內氏的評述雖具「敵眼」，其內容史料卻足可取。

葛浩文教授的論文中，還提出「如何辨敵我？」與「何判忠與奸？」兩個問題，關於前者，我們並無困難，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奮起抗戰，「敵」「我」是明顯易辨的。倒是判「忠」「奸」比較複雜麻煩，且有許多可爭議的空間，這是因大家對「抗戰文學」的定義不同與事實真相不明的原故。譬如徐訏對淪陷區的文學活動「無知」，因而認定它是一頁空白。當葛浩文前往東北研究「滿洲國」文學時，一位大陸來美的訪問學者，竟以「啊，漢奸文學！」五個字表示不屑，則是「偏見」。

劉心皇於臺灣出版的《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中，對「落水作家——即投降敵人依附漢奸政

權的作家」，有如此的釐定：(1)曾經擔任敵人及漢奸政權的職務者；(2)曾經擔任敵人及漢奸政權的報章、雜誌、書店經理、編輯職務者；(3)曾經在敵偽的報章、雜誌、書店等處發表文章及出版書籍者；(4)曾經在敵偽保障之下出版報紙、雜誌、書籍者；(5)曾經參與敵偽文藝活動者。以這樣廣泛的、機械的、平面的為「漢奸文學家」定義，若在其他淪陷區、游擊戰區，人們都有相當大的生活選擇空間，或有幾個、幾十個百分點的意義。若在無處可逃，非在那裡呼吸不可的東北同胞，則均應效法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上；不然，在敵偽高壓統制下尚可苟延殘喘生活著的人，當祖國抗戰勝利，東北光復之際，則宜全體自殺以謝忠貞國人了。

蘇光文在大陸發表的〈抗戰文學概觀〉，曾經對「什麼是抗戰文學？」有下列答覆。(1)或曰，抗日戰爭的文學——直接描寫我國軍民的英勇抗戰故事和英勇壯烈鬥爭的場面（如蕭軍《八月的鄉村》），(2)或曰，抗戰時期的文學——描寫抗戰時期多方面的社會生活，反映接近抗戰時期的現實，（如蕭紅《看風箏》）(3)或曰，抗日民主鬥爭的文學——直接或間接反映和推動抗日民主鬥爭生活，（如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4)或曰，新民主主義的文學——為新民主主義而鬥爭的文學，就是抗戰文學，（如端木蕻良《爺爺為什麼不吃高粱米飯？》）。

以上回答下的括號內，是葛浩文所加上的四例引證，其中俱是東北籍作家的作品，除蕭紅的《看風箏》於出走前發表於哈爾濱外，餘則均發表於上海等地，就此回答而言，前兩答尚屬民族對外抗敵的抗戰文學，後兩答則屬於國內黨派的政治文學或曰「解放戰爭」的戰鬥文學了。誠如葛浩文所

了解，中國的抗戰文學，應用作家的意志與作品的內容而定，不該由年代或地域而定。因此他也說：「淪陷地區和政府區的文學，就很難相提並論，而關外的東北與其他淪陷區——如華北、上海孤島、香港、臺灣等處，更大不相同，確實有『國』與『區』的區別。」

葛浩文所說的「國」，即是他歷史觀中的「滿洲國」，也就是我所說的「特殊時代的特殊地方」，因此若談到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學活動，就該另立觀點，別定準繩。一般來說，被日帝侵略或佔領地區的民眾，約分下列三種選擇：（一）反抗；（二）適應；（三）走離。反抗者有公開、祕密兩類，適應者亦分誠心適應，表面適應兩類，誠心適應者或因求取個人利益而助桀為虐，進而走上漢奸之途；表面適應而內心不服者，或將走上反抗之路。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而又不能適應，不願適應者，則相繼走離。走離者中，有人以正大光明的理由奔向祖國，且可搏得「忠義」的美名，有者純以私人原因，或失戀或逃婚，但仍以正大光明理由而自耀。

基於以上分析，偽滿時期的東北作家，亦可約分三類：

（一）少數「漢奸」分子：

「漢奸」應是政治性的狹義的特定名詞，漢奸的作品是否是「漢奸文學」亦應另作別論。例如《盛京時報》的名作家穆儒丐氏，原是滿族後裔。他以滿清開國太祖太宗的豐功偉績，寫成一部《昭福創業記》，以期末代皇帝溥儀有所興發，因而榮獲該報文學獎，也是「理」有應得，偽「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氏，本為閩省漢人，由於身為「帝師」，故而想襄輔「故主回故土」以重振祖業，亦

可謂大清朝的末代忠臣，他所撰擬的〈滿洲國建國宣言〉及「新滿洲」國歌，固可稱之為漢奸文學作品，但他別具一格的書法藝術，則與奸、偽無關，不過，他以痴忠妄想向日本掌權者說，日滿本為兄弟之邦，現在弟弟長大，哥哥應該放手讓弟弟自己走路，因而遭受掌摑抑鬱而死，則顯示其愚昧無識了。

是否因鄭之言，促使日人警覺，認為「兄弟」有鬩牆之虞，故而迅即安排偽帝做第二次訪日，迫使其拜日皇如父母，稱日本為「親邦」，迎日本「天照大神」為滿洲開國之神，並建廟祀之，不得而知。但從此改偽「國歌」為〈神光開宇宙〉，正式定「日語」為「國語」，稱中文為「滿文」，完全與中國割斷關係了。

(二) 地下抗敵文藝工作者：

韓汝誠先生在《滾滾遼河》大陸版——《葬故人》的序介詞中說：「當年敵偽統治者很清楚，所謂的滿洲國實際是座待噴的活火山，腳下湧動著兩股洪流：一股是延安系，一股是重慶系。」更詳確地說，還有無數涓流直通地心熔岩的自動自發的愛國抗敵人士，至於何股熔流波瀾壯闊，不在此論。地心熔岩即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人生概可分為：個體、家庭、社會、國家、民族、世界、宇宙，等等層界，因之做人亦有不同位格與層界意識，所有中國人抗戰行為的動力，都是源於高層界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黨派主義與政治信仰次之。所以本文在文學現象分期中，採取綜合論述，不做黨派列舉，惟應需加特提者，則有以下三人：一、姜學潛，二、金劍嘯，三、羅大愚。

姜學潛，本名姜興，原於瀋陽主編《新青年》月刊，後轉任長春偽「協和會中央本部文化部長」，主持該部《青少年指導者》，後改名《青年文化》的編務。這個刊物原是敵偽的宣導工具，但姜興所主編出的東西，卻時時使讀者興起故國情，民族愛，對當時青年影響頗巨。這當然與張輔三、王天穆等參與編務有關。日本憲兵隊曾因此等文字，數度將其傳詢，他均以日滿協和精神與大東亞共榮理念相辯脫，故仍能安於其位。姜雖未參加地下組織，但是一位有力的協助工作者。有人疑問姜以學潛為名，是否亦為某方面的潛伏人員？迄今尚無資料可查證。

金劍嘯，原名承載，號培之，又名健碩，筆名巴來、劍嘯等等。遼寧瀋陽人，早年加入共產黨，「九一八」後，受東北抗日聯軍楊靖宇，亦即中共滿洲省委之命，在哈爾濱從事文藝抗日活動，當時集聚於北滿地帶的蕭軍、舒群、白朗，以及其後的陳隄、光逖等人，亦均與其有活動關係或受其影響。二蕭等人走赴上海後，他仍留在東北，繼續以長春《大同報》之文藝副刊《夜哨》，以及在哈爾濱《國際日報》開闢《文藝周刊》，作為活動基地。他不僅寫小說、散文，且是一位詩人、畫家、戲劇編導等等，堪稱是全方位的文藝工作者。他寫的長詩〈興安嶺的風雪〉，傳頌抗日聯軍的堅苦、慘烈、英勇的戰鬥生活，是一篇劃時代的史詩。不幸一九三六年「六一三」事件被捕，八月十五日在齊齊哈爾市以二十七歲的英年，慷慨就義。

羅大愚，本名羅慶春，字澤南，遼寧遼陽人。大學時代，即立志以「現地抗戰」為理念，從事救國救鄉的抗敵工作。最初，假留學東京之便，奔走於日本各地聯絡同志，返回東北建立據點後，

即潛赴重慶請命與國民政府接通關係，再歸瀋陽組織「東北抗戰大聯合」，後強化為「東北抗戰機構」。他所用的工作化名甚多，以「魏中誠」一名最知名於同志。嚴格說，他不是一位文藝工作者，但這個機構在青年，文化部門的工作成績最為出色，所以偽「首都警察廳」以歷年偵捕抗日分子的研究經驗所出版的《重慶派國民黨、抗日團體對滿之攻勢》中，對他有這樣的評斷：

「這一系統的工作者，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秉賦與氣質，不畏艱險，無視生死，以民族復興為己任」。「他們既無個人政治慾望，也無崇拜英雄心理，純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抱負」。「他們猶如基督教初期傳教士一樣，個個具有殉道者的精神。誠為可敬的敵人！」

（三）大多數以純文藝相標榜的寫作群：

這些作家的作品，在當時能夠被容許「寫」與「印」，是他們都以純文學相標榜。他們得獎受表揚由於此，他們被讀者購閱敬仰也由於此。但純文學這東西並不是絕對存在的。文學離不開人生，人生離不開現實，而政治是現實生活中最現實的部分。他們的作品，儘管在這一點上力求逃避，但豈能脫離這現實生活的核心？況文藝又是人類心靈的活動，從事心靈活動的人，也必時時觸及其良知。他們寫個人修養，寫愛情婚姻，寫經濟生活，稍一深究亦必觸及社會現狀和政治背景，也就是立即碰到國家民族的大問題。最後，他們若不走上抗敵的戰鬥行列，便將自動地開始沉默。

例如當時執文壇牛耳的古丁先生，本名徐長吉，吉林人，北大畢業，任職於偽國務院。曾以「平沙」一書獲偽「民生部大臣賞」，擔任「滿洲文藝家協會」審查部副部長，又被選派為「大東亞文學

者大會」的滿洲代表。從表面上看，他應屬「漢奸」分子，但在敵人的心目中他仍是個敵人——是個面從腹背的敵人。「面從腹背」是日文中的漢字成語，有「陽奉陰違」、「口是心非」、「同床異夢」等等的意思。

在日本人尾崎秀樹近年出版的《殖民地文學研究》中，透露出他們對古丁觀感的幾段故事。據北村謙次郎《回想記》中憶述，某日他邀當時任《藝文志》編者的古丁，在新京——長春的某酒店喝酒，同席還有其他的日本作家。不知什麼動機，一位日本作家說：「新京有那麼多的高樓大廈，真是壯觀偉哉！」表示日本在當地的建設，實際是加惠於中國人，不然東北不會如此進步。那時似已喝醉，又像假寐的古丁，忽然冷笑地對大家說：「那些大樓我們都要，你們不用掛心！」同時痛快地將侍者送來的冰水，一口喝乾。北村記載說：「我聽到這句話，當時很感吃驚，古丁是算命者還是預言家？為什麼說所有大樓他都要呢？日本在東北創立滿洲國，實在用了很多腦筋；如何才能安撫民眾實現協和政治；如何才能一心一德與漢民族共存共榮；但滿洲人對這點誠意一點也不理會，他們都相信，中華一定會復興。」

尾崎的《殖民地文學研究》，對滿洲部分也是分兩方面。一方是在滿日本人的文學活動，一方是中國作家群的文學寫作。敵偽曾想用政治力量，把兩方面捏合起來，共同創造「滿洲文學」，最後終於發現「滿洲作家」的胸底，藏有「抵抗性的異和感」，這和他們心目中所要求的「協和精神」完全不同。

《藝文志》同仁王則，在〈滿日文學交流論〉中，曾明確指出：「日本有文學，是滿洲人都不否認的。但滿洲也有文學，好像日本人最近才知道……」同時更進一步表明：「日本文學與滿洲文學是一對一的存在，滿系文學家是繼承東北地區先驅文學者的重任，而不是日本文學的一個支流。」尾崎研究中還記載日本文學家淺見淵，旅行滿洲時曾與古丁會面，古丁也是借著酒意以強烈的口吻對他說過：「淺見先生，你是大和族的後裔，我是黃帝的子孫，為了祖先的光榮，大家好好幹吧！」

日本戰敗後不久，人民政府成立，古丁未遭受日本人的毒手，卻死在中國人民的監獄中。不像當年日本文化人，無視「滿洲國」內中國作家的存在與心靈感受，尾崎今天終於承認「滿洲國」的「滿系作家，大部份是中國『五四』文化革命，和受『五三』慘案事件影響下所蘊育出的世代……他們以文學創作為基礎，培養了民族意識是事實。」三十年前，我在〈文壇滄桑外一章〉中，對大多數以純文藝相標榜的作家們所作的總結，由此也得到了印證。我寫道：

「平心而論，其未直接參加地下作戰的文藝工作者，姑不論其在偽職上的言行如何，但在敵偽統治下，透過種種環境上的限制，仍能寫出許多被人爭誦的作品來，有意無意地，在敵偽摧殘消滅中國文化政策下，作了中華民族本位文化的守衛者，作了中國新文學的播種耕耘者，使東北青年，在殖民地的教育中，仍能接受純正國語文的薰陶，這不能不說是他們最低的貢獻，尤其是在他們的作品中，雖不時使用些日語的名詞和句法，但由於是吸收再創造的關係，並未造成不倫不類的協和語，反倒豐富了中國文學寫作上的詞藻和語彙。」

黃玄論及東北淪陷期文藝界的分化與組織活動時，曾列舉《藝文志》和《文選》兩個重大派別的廣泛論爭與批評。《藝文志》派以古丁為代表，《文選》派以梁山丁為代表，他們間的爭論除了文學風格與理論不同外，自然也有政治觀念的差異，像當代東北作家潘薰先生的研究，他認為「古丁偽滿時，雖與城島舟禮，大內隆雄等日本文人私人關係密切，但他所有的文學作品，尚沒有媚敵之作。」而韓汝誠也認為，古丁作品裡「透露出濃厚的文化氣息和文字功力，語言簡練而筆鋒犀利，有種學者氣派，其藝術成就，現在讀來也令人佩服。」

以上兩人的觀感，也與筆者前面的總結相吻合，近聞遼寧春風出版社，即將出版《東北淪陷時期作品選——古丁選集》，幾已包括其全部作品，歷史曾將存在過的沙石泥土淘汰淨盡，歷史也會將有價值的礦產留存下來，做為世代的標誌。

關於抗戰勝利的果實，海峽兩岸各有說辭，一方面說：「我們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偉大舵手。」另一方面說：「我們有抗戰建國綱領和英明領袖。」但從日本的反省檢討文件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們沒有敗於國民黨，也沒有敗於共產黨，他們是敗於全體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是文化的本質，文學是文化的表現，所以要研究一個特殊時代特殊地方的文學活動，可以從地上的文學現象，辨識一個時代的風貌，從地下的文學活動，可以窺測一個民族的生機，因此談抗戰時期東北地區的文學活動，其「活動」的意義與價值，也就不止是「文學」了。

話說從頭

——《滾滾遼河》手稿哈佛珍藏記

紀　剛

花甲安渡，正值隨心所欲之年，我已好久不哭了。不料，當我準備出席南紐英倫科技交流會的前夕，當我飛往波斯頓長程航行的途中，竟連續哭了兩次，真是從何說起!?

春初，張鳳女士過洛來訪，曾談及《遼河》手稿的保存事。她現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任職，得知館方選藏圖書及作家手稿——如前代的魯迅與當代的趙淑俠等人的條件極嚴；而一個中國人的文化智慧結晶，是否應保存在外國，也是要考慮考慮。話說過也就算了，因為哈佛尚未選藏《遼河》，何須我來考慮？數月後，張鳳忽通知說，館方經數次檢討，已經決定收藏《遼》稿了，希望我就開會之便隨身帶去，倒使我開始彷徨猶豫。照常理說，中國人的手稿，應該是保存在中國，可是《滾滾遼河》的內容，迄今仍不能通過大陸中共的框框，出書尚有困難，手稿收藏更無館來擔當。又想此書寫作出版在臺灣，得獎成名在臺灣，理應由臺北的中央圖書館來收藏，可是一朝獨立起來，極端偏激的臺灣主張者，可能將此「外來文化」的作品，傾入垃圾場或加以火葬。再回想到軍閥時

代的土匪士卒，曾將故宮的珍藏掠劫，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小將，曾將無價的國寶砸爛，所以就文物的歷史性與世界性的價值而言，只若能保存，保存在什麼地方，也就無可厚非了。何況《滾滾遼河》不只是我個人的文字作品，還是我們那些年、那些人、那種種鐵的生活、火的情感、血的工作的生命記錄。

話說至此，使我想起一件舊事。那一年，中興大學舉辦一場「巨浪淘金——《滾滾遼河》研討會」，邀我出席備詢，不要我「講演」，只要我回答問題以供解剖。最後有位同學很嚴肅地問：「紀剛，這些年你都在哪裡？」我回答說我是個自開診所的醫生，醫師是面對面的工作者，無人能夠代替，所以我很少離開診療室到外面來活動，因此報紙上也看不到我的消息。他雖然輕緩地坐下卻拋下了一句話：「我以為你早已移民美國去了呢！」面色仍然凝重。

那些年，臺灣常常舉行國建會，許多「歸國學人」在國事建言外，也常常對社會現象發些批評。幾個大報的副刊，也都爭刊「海外作家」的作品。可是國內的學人與作家則有不同的感受；他們掩壓了他們的光彩，他們搶佔了他們的地盤。這位同學對身居海外而又回來說三道四的人，表現了強烈的反感。我也就機稍加舒解說：「我們在東北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曾主張『現地抗戰』，因為日本侵略東北，我們首先做了亡國奴，我們若不首先奮起反抗、還等待誰呢？同時還要求每位同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逃離東北現地。因為一個人在後方參加抗戰只是一兵一卒的力量，在敵後工作，一個人可發揮十百千人的力量」。如此說，一個人似乎是不應該離開他的本鄉本國，但抗戰時期也有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和「屯積物資、發國難財」的人；今日身在臺灣者，是否都為保衛臺灣建設臺灣而貢獻力量？那些貪污枉法作奸犯科者，是否因他們仍身在臺灣而給予肯定？所以評論一個人，我們不能只問他在哪裡？更重要的是要問他在那裡做什麼!?

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可以說是一座書的帝國，書的王宮。《遼河》原手稿，平常也只是放在我書房一角，三年五年也不瞄她一眼，可是一朝選入帝宮、從此宮門深似海，要想再看她一面也是很難的了。所以當我把她從書架取下，拂去灰塵，裝入行囊準備次日帶往波城時，便不禁哭了，是泫然泣下尚未敢唏噓出聲。

波城鄰近康崗，是美國獨立戰爭放響第一槍的地方。那地方也是美國早期文學名人薈萃之區，像郎費羅、梭羅、霍桑、施考特、愛默生等等，都曾生活、安息在那裡。自己也算是個文學愛好者，對這些曾經仰慕過的異國前賢，也想借機遊訪追蹤一番。正好行前兩天，《世界副刊》刊出一篇沈鵬年的〈康崗之戀〉，當時無暇閱讀，隨手放入資料夾中以便飛航途中得閒欣賞。沈為大陸學人，半世紀前的中學時代，曾與同學三男一女共組一個「康崗讀書會」。大家都是文學青年，也都是革命愛國者，對美國文風薈萃及革命聖地的波康，都有一番嚮往，因此約定畢業後皆來此地留學深造。誰料抗日戰爭爆發，大家都被時代擊散。一位下落不明，一位喪命於文革，那位女生又是作者青梅竹馬的初戀的人，也犧牲於抗日前線。唯一倖存者只有他自己。他找不到那女孩的埋骨之處，只有將她濺過青春之血的戰地之土，誠敬地裝來一小瓶藉訪美之便，傾灑在康崗。一圓他們少年時的憧

憬，青春期的夢！

「康崗讀書會」的故事，自然不同於《滾滾遼河》，但那個時代背景和他們處理個人生命和小我感情的方式，似乎與覺覺團的弟兄們同出一轍。《康崗之戀》引爆我少年時期的回想，行囊中的《遼河》原稿，也是我們當年「生命寫史血寫詩」的生活記錄，正由我親身帶往哈佛去埋葬。思前想後，我不禁又哭了。為避免鄰座洋客的驚疑，我緊對身側的機窗向外瞭望，那應該是藍天白雲，晴空萬里吧!?可是我——什麼也沒有看見！

激動過後，我不免嘲笑自己，反問自己：真的老了？感情脆弱了？為什麼這麼大的人，竟忽然小孩子起來!?經過幾十年歲月的修煉，自以為已達到「太上忘情」境界，卻又如老子這小子所說，「道者，反之動」而「復歸於嬰兒」？

提到嬰兒就想起我身為小兒科醫師的經驗。現代醫院制度，嬰兒一離開母體，便劃歸為小兒科的責任。我們經常要到產科手術房去接駕。只見婦產科醫師護士們，刀光鉗影屏氣凝神，產房外的親友也都坐立不安或焦慮地踱步。忽然，哇地一聲小兒哭，大家卻心情輕鬆地呼出一口氣，原來一個有生命的活人降臨了。哭是生命的第一部進行曲，因此我給我的哭找出理論根據。不過，我已活過了古稀之年，不必再用哭來證明我的存在。那，為什麼還要哭呢？原來我還有積累數十年未曾宣洩的感情。

中外學術界都說，文、史、哲不分家，一部偉大作品，都包有文學藝術層面，歷史社會層面和

哲學思想層面。《遼河》當然不夠偉大，但它也包有這三種層面的內涵。今年南紐英倫科技交流會的人文藝術與社會科組，同康州其他團體合辦，在波城、哈埠兩地擴大舉行三天八場的研討會。主講人除杜維明、傅偉勳、梁燕城等大師外，其他也都是各方名教授，每人的學術地位至少是一個博士。我個人在人文科學方面是個不學無術的人，能有機緣前來報告《遼河》思想層面的「群我文化觀」，真是難得的求教機會。其文學與歷史層面的事，則由張鳳女士以一魚兩吃方式，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聚會廳，為南紐英倫華文作家協會的文友們，另作一場專題報告。而且就以一個有感情的活人做開場白。

《滾滾遼河》是一部有高度歷史性與地理性的長篇文藝小說，由抗戰時期東北青年的地下抗日「工作故事」，與這些青年男女間的「感情故事」雙線編織而成。從工作故事言，感情故事是它的興趣線，從感情故事言，工作故事是它的時代背景；只有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才有那種典型的感情故事。

假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能順利地接收復員，人民能安居樂業，我仍在家鄉東北，是不會動筆寫作《遼河》的。我們的工作事蹟為廣大的社會所週知，烈士遺族的善後撫恤，也有有關機關負責照顧。可是時局變了，「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們這一群愛國家愛民族為國家民族犧牲奮鬥的人，被「敵偽政府」視為敵人，要將我們逮捕殺戮；被「人民政府」視為反革命的罪人，要將我們

追緝鎮壓。我們那一段曾自以為是光榮的歷史，反倒成為被屠殺的罪狀。像書中的「書記長」張寶慈先生以及其他未得走出的同志們，均被集體鎮壓而就地掩埋在瀋陽南湖湖畔。南湖原名長沼公園，地下抗日時期，我們曾在湖邊花叢樹蔭下開祕密會議。大陸改革開放後，我曾返鄉探親重遊那地方，見湖畔的花卉開得特別燦爛特別紅，想必有那些殉難同志們鮮血的成份。

我是在抗戰烈火中身心俱受燒傷而生命尚存的未亡人。假若當年死了，死在敵偽黑獄中，死在抗戰火線上，我們是求仁得仁，死也瞑目。不幸勝利後，國家又演內亂，人民續遭塗炭，我雖然倖存卻活得很不甘心，我一定要為此一不幸歷史作見證。其實這些史實，我們曾以工作報告方式呈報當局，且蒙批覆「同志等……實堪嘉勉；件存」。從此件歸檔案也即將被歷史遺忘。我們那些年那些人那種種鐵的生活、火的感情、血的工作，也就等於是一段「空白」了。我們青春的汗水可以使其空耗，我們許多同志生命的鮮血豈可任其白流!?於是當負責人羅大愚先生要我們共同撰寫工作回憶錄時，我個人卻暗自用這段歷史寫小說，因為讀《三國演義》的人，總比讀《三國志》的人多多。我原想用「最長的一日」與「六壯士」的方式，只以地下工作故事推展小說，沒有一點男女感情故事做潤飾，越寫越沒有興趣，當然也就沒有人有興趣來讀，所以寫了二十萬字便停滯不前了。

王藍先生在《藍與黑》開頭便說：「一個人一生中只戀愛一次是幸福的，我很不幸，剛剛比一次多了一次」。其實，我比王藍所說的更不幸，不是比一次多了一次又一次，而是連一次也沒有。以一個沒有一次戀愛經驗的人，要寫一部以感情故事為興趣線的長篇小說，而且要載負記錄歷史的使

命，當然是個有高難度的工作。感謝上帝的啟示和成全，使我將幾位當年站在感情邊緣的同志、朋友，推之入海，同時加枝添葉深雕濃描地塑造了幾枝感情的花朵。一是仲直與方儀——「此情只應天上有」的聖潔型。二是嚴姐與心超——「人間那得幾回聞」的堅貞型。三是鍾鳴「為愛捨身」的取義型。四是李哥「單戀致死」的情痴型等等。最後以詩彥、宛如、紀剛、心竹「四角空懸」的兩誤型，做為貫穿全書感情故事的主幹。地下工作畢竟是嚴肅的，或由於這些多少有些彩繪的感情描述，獲得廣大社會人群的愛護，使《遼河》當時成了一部暢銷而又長銷的書，也因此為我帶來面對讀者所提出的尷尬問題。為了避免尷尬，我曾自訂——談話三原則：

一、談書不談人，談作品《遼河》，不談作者我。

二、談書中工作故事，不談感情故事。

三、必須談及感情故事時，只從文學層面談，不從歷史層面談。

表面上看，這三不談似乎在迴避我個人的尷尬問題，實質上是我在保護那仍留在大陸上當年工作過的同志。一九四九年後，海峽兩岸頓成幽明兩界，隔絕經年，音訊渺茫，時間越長，越是思親憶鄉。《遼河》在《中副》連載時，是用我本名發表的。因想《中央日報》必為北京當局列為內參資料，假若有什麼親友看到我的名字，輾轉傳到我父母的耳中，讓他們知道這個抗戰時期為家庭惹麻煩，解放後為他們留禍患的不肖之子，尚在海外「活存」，也許在他們連遭各種迫害的痛苦生活中，感到一絲溫暖。但《遼河》竟意外地在海內外暢銷，假若按圖索驥追查起來，豈不為留在大陸

而僥倖存活的當年同志們增加新的黑資料？何況那些年正值文化大革命！說起來真是矛盾，我原來用意是要記錄歷史，發表後又不得不盡力淡化說那是虛構的小說。

《遼河》出版後，我算完成了一件心事，但又心想這一輩子恐怕回不去大陸家鄉了，而臺灣太小，幾十年也呼不出一口大氣，於是我便開始到世界各處去旅行。我曾在香港新界的落馬洲國境展望臺眺望中國大陸，我曾在西柏林圍牆邊觀察過東德鐵幕。一次到板門店的特別訪問時，聯軍的引導兵准許我們在南北交界的會議廳中，在劃著三十八度線談判桌的北韓那邊站立一分鐘。我正好排在隊伍後面，距離開向北韓的門只有一步。我忽然血壓突升心肌痙攣起來。只要我衝出那個門，便可奔入社會主義天堂，搭火車過鴨綠江，回到我的家鄉瀋陽。可惜我實在太懦弱，沒有勇氣邁開那一小步，構成當時一條國際大新聞，而只是我個人禿突土兔地心悸板門店而已！

而今大陸改革開放，我也可公開直說，《遼河》的歷史真實度在九十九個百分點之上。而真正感動讀者的，也並不是那些感情故事而是那個工作故事。齊邦媛教授在文學評論時，即直接指出《滾滾遼河》的主角是那個「時代」。國史館柳長勛編纂，在《中副》連載時便認定《遼河》是一部活的歷史，經由孫如陵主編找到我，邀請舊日的工作同志各寫一篇回憶，編成一部《東北現地抗日史狀》，做為他修抗日戰爭史的一個獨立單元。《遙遠的祖國》——《滾滾遼河》日譯本出版後，日本文評者岡部昭彥先生用「不可讓人不知的革命史實」做標題，教育新聞社的社評則直接標為：「中國青年們的抗日運動史」。

要將「歷史」寫成「小說」，卻不是一部「歷史小說」，是要它從歷史層面看是歷史，從文學層面看是小說，首先就遇到「觀點」的選採問題。當時在東北從事敵後工作的，也有其他組織，有的是自動自發，有的是政府遣派。我們原是自動自發的一群，後來也與政府發生聯繫取得名義。我們自稱為「東北抗戰機構」，包有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與長春、哈爾濱，駐日本等地區六個單位。黑省負責人王鴻恩同志首先犧牲了，因而由我來接替。我們的工作發展迅速，組織龐大，幹部眾多。我們以辛亥革命精神為號召，個個以七十二烈士為榜樣，我們也以「西南是國民革命發源地，東北是國民革命復興地」相期許。

為了閱讀效果，使人容易產生親切真實感，我採用了第一身觀點「我」來作為敘述者。正如文學理論家所規誡，用第一身觀點寫作時，「我」不應該是主角；「我」若是主角時，則不應該是英雄；「我」若是英雄時，也應該是受難的英雄。不然，那自詡自耀自己過五關斬六將的作品，讀者會立時掩卷而去的。我不僅在書中將紀剛寫成一個無論在「工作」上或感情上，兩方面都是受挫折的幹部，同時也將其他位領導層人物都超越化了，抽象化了。我曾用「三尊神與一堆人」為題，在成功大學作一場關於《遼河》書中人物如何處理的報告。

《遼河》書中人物，依其命名方式，大致分為四等類，無名無姓者為第一種人，即書中的三尊神。有名無姓者為第二種人，即書中用二個字為稱呼的工作幹部。有名有姓者為第三種人，即書中

有關時代的背景人物與感情故事中的角色。有姓無名者為第四種人，即書中出場較少的幾位臨時演員。所謂「三尊神」，即以職稱代人稱的負責人、書記長和社長，乃抽象代表大智大仁大勇的三種革命精神。其他三等類，則統歸於「一堆人」。所以用此區分命名者，一是要照顧歷史的真實，一是基於小說的需要。二者不可兼得時，就不得不選些可名可姓的字，加以權變應用，方能介身於「工作故事」與感情故事之間，如羅雷、仲直、紀剛、伊正等等。大時代中的小我命運並不相同，書記長張寶慈，勝利後曾被選為瀋陽市議會議長及國民大會代表，未死於日寇之手，卻被中共鎮壓於南湖之濱；負責人羅大愚曾選任立法委員，壯志難伸，不幸早逝於肺癌，葬身於臺北陽明山之麓；社長高士嘉先生得天獨厚，幾次大案件均能「逍遙」獄外，任教中興大學，退休後，現正安享天年。

我雖將紀剛在書中從領導階層寫成一般幹部，但有些蛛絲馬跡卻未能全部消除，只是對我們的信仰立場和單位名稱則從未標出。前面說過當時同在東北從事地下工作的尚有其他單位，我們曾將我們化稱的「東北抗戰機構」，簡稱為「核心組織」，各地方同志卻不約而同的稱我們為「現地中央」，這稱謂多少有些逾越，不免遭受其他單位的物議與不滿，於是我們便另擬一個雙稱代名而靈活運用。我們對各地同志公稱「省方」，在核心內部則祕稱「處方」。地下組織與公開機關不同，在抗戰時期的政府區內，甲省的公務員轉職乙省，或甲縣人民遷居乙縣，則改歸乙省乙縣指揮管轄。地下工作只有縱的領導，沒有橫的聯繫，原在遼寧工作的同志轉到吉林時，不能打開橫的關係轉入吉林地區，仍需由原領導關係前往聯絡。如此則發生工作體制名義上的混亂，一個遼寧省的工作員為

何到吉林省來工作？但如果只說是由「省方」來的，這個「省方」在吉林則指吉省，在遼寧則指遼省，而且「省方」二字也比「現地中央」合乎身分。至於我們有關六個單位為工作需要所組成的聯合辦事處，也就是原來的核心組織，則仍祕稱「處方」代替。所以讀者在書中可能常常看到「省方」「省方」，而處方則從未露面。勝利後全國各地都有黨政糾紛，為了我的《遼河》不受歷史糾紛的干撓，我將其他單位的名稱都公開提出宣揚，我們自己則仍用「我們」。如此一來，「我們」二字實際也包括了他們，他們也歸入於我們，因此皆大歡喜而無異議。不僅如此，連政府的文工人員也用《遼河》做過文宣資料。他們說「抗戰時期，政府決定長期抗戰，全面抗戰，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大家都要參加抗戰。那時候，不僅前方後方一致奮起，就連淪陷時間最久，距離陷都最遠的東北地區，我們還有龐大的地下抗敵工作。不信？你們看看那《滾滾遼河》？」

燕京圖書館收藏《遼河》原手稿，除了基於其文學性外，當然也兼顧到其歷史性。我亦補綴一份書中人物索引表隨原稿併存，以備千百年後研究《遼河》者的參考。所謂原手稿，在此稍加解釋。平常我寫初稿時，都是十分匆草，經過兩次修刪調整重抄後，方成定稿原稿送出發表。《遼河》不是為我個人寫小說，乃是為大家寫歷史，於是我把自己認為定稿的原稿視為初稿，分裝六巨冊，送請負責人大愚先生及尹生、一正二同志，審閱工作故事。感情故事則稱請一正夫人惜冰女士及吾妻朱紀給予卓裁。大愚先生說感情故事是個人的，是真是假是有是無，他都沒有意見。工作故事是大家的，不許我隨意編造，必須向讀者「負責所述歷史的真實」。但他卻認為感情故事太薄弱，不夠寫

小說的材料，所以曾建議我將工作故事與感情故事寫在一起，也許小說較易成功。若是那樣就違反了他當年訓誡我們的原則。他說過抗戰是一小階段的事，戀愛是一生一世的事。為了工作，青年同志最好暫時不做戀愛夢，我們覺覺團的弟兄們都堅守了這個原則，沒有人在工作中談戀愛，也沒有人用戀愛做工作。即使我這自作多情的人，也未在感情邊緣超越一步。所以在《遼河》中，我也將工作故事與感情故事嚴格分開。感情故事的編織，朱紀給我許多合理的建議。多年後我才明白，感情故事越合理就越像真實，越像真實就越傷害了她，但她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我真是虧負了她。中國傳統夫妻很少在口頭上說那個「愛」字，但我在心裡，從來沒有不愛她。

這個原手稿，由於審閱者有太多的良好意見，只見有眉頭批示、行間夾議、足底註釋，或乾脆就原文塗抹刪削以及另行加頁做長篇評論。大愚先生用綠色鋼筆水，以端莊的蠅頭小楷，一筆不苟地寫上他的指正。尹生同志則用紫色原子筆，龍飛鳳舞地畫出他的卓見。任何一頁都是五彩繽紛，嘆為觀止。說實在的，若沒有當年那些人那種種的工作，根本就沒有這本《遼河》，反之若沒有這本《遼河》，也就等於沒有那段工作了。就此意義講，《遼河》應視為一部集體創作，我只是一個誠拙的記錄者，所以當任何人對我個人加以讚譽時，我都有一種獨自竊享共同榮光的愧咎。

《遼河》書中，我沒有寫過一件反面的事，因為一件反面故事，將使九件正面工作失去意義。在此我想特別加寫一件使人灰心喪志的事，以補闕如。勝利後，全國人民都要求民主法治，以無產

階級「專政」為目的的中共的喊聲，最高也最響，其社會群眾運動也最烈最狂。因此當時政府也就急急趕辦行憲大選。選舉是要靠民眾力量的。我們在東北與東北同胞共渡過十四年亡國奴的悲慘歲月，我們的犧牲奮鬥也為各地方的父老兄弟所周知讚許，因此成為他們甘心樂選的人物和左右選舉的力量。一天，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特別邀見負責人，先是慰勉一番大家地下工作的辛勞，再詢及地方選舉準備的情況，然後從辦公桌裡取出一疊卷宗給大愚先生看，原來都是控告他的資料文件。其重要者，一是殘害無辜同胞，二是擅發國家幣券。地下時期，我們曾爭取偽滿國軍，把握地方武力，以便展開游擊戰策應政府反攻，勝利後也發揮了協助政府接收東北的功能。但在政府遲遲接收期間，曾與中共搶先到達東北所組織的「人民解放軍」發生衝突，兩方皆有傷亡。其實甲方戰死者未必是國民黨，乙方傷亡者也未必是共產黨，都只是大混亂時期的悲慘歲月、悲慘地區、悲慘人民的悲慘命運。可是政府接收後便有人告到官裡，羅大愚就成了為首殺人的重犯。地下時期，為了籌措工作經費，我們曾發行愛國公債。這份公債，我們原想勝利接收後，回到家鄉賣幾畝農田也就自行償還了。大多數人認為他們買過公債，也是一種愛國表現，都要留做紀念而不要求償還。不知什麼人反以此做為攻擊我們的憑證，控告我們破壞國家幣制。負責人稍加解說後，熊主任便說：「沒啥事，我瞭解了。」在那人治、法治不分的年代，熊主任說沒事就是沒事，說有事就是有事。但熊主任收回那些卷宗後，又隨手拿出一份名單交給負責人，說：「這些人都是中央支持的候選人，也多是我的朋友，你們在地方有力量，希望選舉時幫幫忙！」負責人回來看那名單中，竟有一位粵籍

人士要競選東北區商業團體的立法委員。於是我們都無言的哭了。如果不照單幫忙，我們便將立時被收押法辦，一年半載後，也許是無罪開釋，但我們所凝聚的民主法治的社會力量，將完全崩潰。若照單辦理，我們將如何向早已安排候選的同志勸退？又如何向地方父老說情？但我們總得照單做了一部分，於是我們當時被同志譏為逢迎官僚的「反革命」了。

尹生當時就感嘆地說：「現在城外是共產黨，城裡是貪官污吏，我們是守城的人？我們是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假若我把這些事都寫在《遼河》中，讀者將有何種感覺？後世青年是否還有人肯為國家民族犧牲奮鬥？我們也將成為鄉愿們眼中的一群傻子，我寫《遼河》還有何意義？至於《遼河》原稿在《中副》連載時曾被勸刪去三萬多字，我在一篇〈臨水溯源——談《滾滾遼河》的去脈來龍〉的講辭中，已有所說明，在此不贅。

從文學層面說，小說成敗的關鍵與語言的密度有關。小說的語言，自然無需像詩的語言那樣精密，一個字就有多重意象。但小說中的一句話，除了其本身含義外，至少還須有或是承先或是啟後的作用。若一句話語只有字面上的意義，則如清水淡而無味了。如果有三重含義以上的文句越多，則小說的深度與廣度也越大。這樣的作品，文字簡練情意濃郁，話外有話前後呼應，餘音繞樑閱後難忘。《遼河》中密度最大的語言，就是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我恥於訴說」中的那個「恥」字。我曾四次撰寫《遼河》，都是用這一句話開始。許多讀者朋友問我「有何可恥」，我都未得解釋。現

在說這個恥字至少有四重含義。一是不值得說，即所謂好漢不提當年勇的意思。二是不屑說，如前所言，勝利後許多由監獄裡出來的宵小竊盜、詐欺毒犯，也都自稱是地下工作者以掩飾其個人的劣行，且更招搖過市。一時假做真時真亦假，我們就不屑再談了。三是不忍說，地下工作使我們每個同志都災情慘重，得不償失。正如〈弔古戰場〉文中所述：「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因此也就不忍再談，一談起來就血淚泉湧。四是不敢再談，這是一正同志，五十年後於《聖經》的啟示中所獲悟的答案。《羅馬書》五章三節記載著說：「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我們大家在長春監獄中，還都意氣昂揚地同唱蒙難之歌，可是勝利後，我們喪失了當年奮鬥的盼望。一群喪失盼望的人，也就沒有臉面，沒有勇氣再談當年了。

從歷史層面談，以抗戰勝利為分水嶺，《逭河》的前一部分是中華民族奮起圖強的階段，我們的目標明顯單純，理直氣壯。勝利後的一部分，是國共內戰階段，是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鬥爭，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選擇，可是朝野兩黨互爭政權，彼此醜化，人民是非莫辨只有盲從。直到經過數十年的「實踐檢驗真理」後，人民才覺悟到中國到底是該何去何從。《逭河》雖然在海外暢銷長銷，在大陸卻遲遲不得出版，但東北青年的愛國事蹟，不宜長久被冰封，於是有人建議抗日階段的二十七章的工作故事全部保留，由我另寫一篇二十八章，將感情故事做一濃縮結束，改以《葬故人》書名，在大陸出版。也好，這個書名更有文藝氣氛，也是我初寫《逭河》時所用過的篇名。

不過當時用「葬故人」的原意，不是埋葬別人，乃是埋葬了我自己過去的感情以便尋求新生。今天再用這個書名，可能擴展了它的涵義。祈盼國共兩黨都能埋葬了過去歷史上錯誤的鬥爭恩怨，重新開始，真誠合作，共同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做出貢獻。

《遼河》出版暢銷後，我並未乘勝追擊再寫小說，因為書中有幾個問題折磨了我的後半生。那就是：「為什麼辛亥革命成功，又有軍閥割據？為什麼北伐統一全國，又有外敵入侵？為什麼抗戰勝利又有國共內亂以致國家分裂？」近百年來，中國青年為國家民族犧牲奉獻的鮮血與生命，夠多夠多夠多的了，國家民族為什麼依舊是殘破、混亂、貧困？原來是「現代中國人」出了問題，因為「現代中國文化」出了紕漏。於是我用心重讀中國古籍，瀏覽東西經典，得知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崩潰後，歐美學說湧進而氾濫成災。中華國土雖未完全陷於殖民地與次殖民地，中國人的頭腦卻大部份都喪失了主權。為了恢復民族自信，重建中華文化，我曾以我個人的特殊生命體驗與現代人所共有的生活常識，建擬了一個「群我文化觀」，並試以此種觀點寫了許多篇「談人論事評古鑑今」的小文，均蒙《華副》蔡文甫、《聯副》瘂弦、《人間》高信疆、《中央》胡有瑞等主編惠予發表。尤以胡有瑞女士，她本來要我再寫一些短篇的抗戰故事，以激發現代青年日趨衰沉的國家民族觀念。我表示那些故事的作用，一部《遼河》也就夠了；真正問題是要他們如何愛國，愛那個國家民族，現在我只想寫這類理論性的東西。她說「好！你拿來！」於是從《幾重天地幾重人》起，便〈經〉三篇、〈傳〉若干篇地，密集的一系列地在她主編的《晨鐘》版裡刊登出來，也不知是否有些晨鐘

暮鼓的作用。這些位主編們不一定贊同我的主張，但他們肯定了這些文章內容也算是「言之有物、持之成理」。受了他們的鼓勵，我把這些篇章都輯印在《諸神退位》的散文集裡。「諸神」者，乃指像「五鼠鬧東京」式的禍亂中原的各種主義學說。表示這個理論主張可能有民間信仰所謂的「太公在此，諸神退位」的避邪與辟邪的作用。

《諸神退位》出版後，曾引起為推行「第六倫」而成立「群我倫理促進會」的李國鼎大老所注意，特別經由祕書安排接見我，囑我寫一篇〈從群我文化觀談倫理重建〉，在該會開年會時印發各會員，並請王鎮華教授在大會中作闡明報告。這篇東西被文建會貴賓發現，認為它是對中國文化一個既傳統而又現代的觀點與說法，比「子曰子曰」什麼的，易為現代青年所接受，要我將其鋪展為一冊大眾化的讀本，由文建會列為人文思想叢書之一出版，書名定為《原來如此》。

其實群我文化觀就是發源於《遼河》，多年前陳映真先生過訪，提出一個問題。他說他是研究西洋文學的，他看法國的沙特在二次大戰時，也是從事地下抗德工作的，但他出獄後的作品都是向人性的下限發展，最後以赤裸裸的個人面對極權暴力，因而開拓了存在主義。他問為什麼《滾滾遼河》的主角群——覺覺團的弟兄們，卻是向人性的上限發展，把他們個人的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更大的群體上？這兩種人生取向的不同，有什麼文化上的差異？我想，陳先生的問題既是由《遼河》而來，答案也許就在《遼河》裡。當我退出「作者」身分，改以「讀者」、「研究者」的立場，再重新

閱讀《遼河》時，忽然有兩段話對我發射出啟示的光芒。第一段在《遼河》二一〇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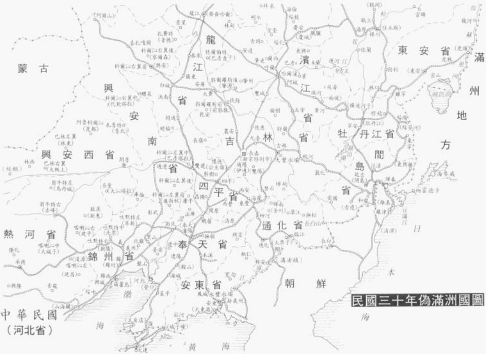
「我感覺我的動力似乎是一個『群』字。國家民族是個大群，那個大群太大了，有時也像仲直所說的大得空虛與遙遠。但對於覺覺團，對於我們這一個小群，永遠感到緊密切近；我們的理想希望是一致的；我們的憂傷煩惱也是一致的，我們在心理上、感情上，都成為彼此的一部分……比這個小群再大一點的群便是現地抗戰組織——負責人所領導的在東北現地從事革命抗敵工作的全體同志。」這是紀剛與仲直在明德里所做的一次反省剖心的談話。第二段是在二四一頁上：

「這一系統的工作者，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秉賦與氣質，不畏艱險，無視生死，以民族復興為己任……他們猶如基督教初期傳教士一樣，個個具有殉道者的精神。誠為可畏可敬的敵人。」這是偽警務總局特高科，在研究東北青年為何都誓死抗日的檢討報告。

我寫《遼河》，只是誠拙忠實地記錄下來我們的思想和工作，並未有意地灌注些什麼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我以為我們只是為「群」而奮鬥，敵人卻認為我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踐者、殉道者。當我把「群」與中國傳統文化核心思想的「仁」字放在一起研究時，就「爆」出群我文化觀的火花來。最初我以許多篇幅發表這個觀念時，只是說出我「個人」的拙見。獲得李國鼎先生「群我倫理促進會」的重視時，可以說是達到「社會」層界的肯定。文建會為它出版專書時，用大陸上的術語說，似乎是被擢升為「國家級」的一種人文思想。我這次到南紐英倫科技交流會來報告「讓群我文化觀陪你走入新世紀」，就是想向多位知名國際的世界級的專家學者懇請教益。

記得在長春囚居敵偽監獄時期，日本特務命令我們每位被捕的同志，都寫一篇「思想推移之過程」，以備他們研究如何侵略中國統治東北的對策。我這一篇〈話說從頭〉，也就是向大家報告報告我這些年，自我潛研和我各處拜山訪師的經過。

話說回頭，當我將《遼河》手稿帶往燕京圖書館那天，恰巧吳文津館長公出臺北，由賴永祥副館長代表接受。賴先生在百忙中還親自帶領我們參觀館內各處，尤其是特別開放了三樓的珍本書庫，准我見識欣賞，當然也讓我看了那座宮中宮——深藏各家手稿的保險箱。感謝賴先生的好意，感謝張女士的關心，更感謝上帝的恩典給我一段劫餘生命，在塵世客旅生活中，還做了一些微末的小事。


蒙古
興安南省
興安西省
龍江省
濱江省
吉林省
牡丹江省
東安省
滿洲地方
間島省
四平省
通化省
熱河省
錦州省
奉天省
安東省
朝鮮
中華民國
（河北省）
渤海
黃海
日本海

民國三十年偽滿洲國圖

滾滾遼河，是一部有思想性的長篇歷史愛情文藝小說，以抗戰時期東北青年的地下抗日工作故事與感情故事雙線編織而成。內容不僅具有情感性，亦富歷史性，作者從描寫小我感情如何被壓縮、割裂、與扭曲來製造高潮，進而用這些悲苦的命運，反映出那個時代環境的殘酷與不仁。

ISBN 978-957-14-6086-4 (857)

NT. 450

9 789571 460864

三民網路書店
www.sanmin.com.tw

《滾滾遼河》再版說明

《滾滾遼河》自民國六十九年第一次出版，近四十年間刷行數十次，累積無數讀者，記錄著一代壯闊激昂的歷史。

回首近代中國，是一連串的烽煙與戰火，民國在革命中成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又起，《滾滾遼河》就在這樣的背景中誕生。在廣袤的東北大陸上，抗日志士們為民族自由奉獻了青春、生命，紀剛先生筆下，沒有隻身而成英雄者，只有全體成就之家國功業，這種「群我文化觀」，正是中國傳統思想中「仁」的體現。除了國族大愛，書中也有令人喟然而嘆的情感紀實，大時代下的小兒女，任由命運捉弄，天各一方漂泊，正如書中所說「革命誤我我誤卿」，令人動容。

本書被譽為四大抗戰小說之一，並獲中山文藝獎。書中以八年抗戰為背景，抗戰歷史雖舉

世皆知，但其背後的辛酸與犧牲，在《滾滾遼河》中更見深刻。那一段中國人對抗異族入侵的悲壯血淚史，讀之便不能忘懷。儘管歲月荏苒，時光流轉。如今那動亂的年代已不復見，然而情感的感受卻是古今皆同，書中人物的性格與情思依然深刻鮮明；那一段歷史也宛然在目，不曾褪色，《滾滾遼河》已成經典。

本局一本讓經典傳世的初衷，也為感念紀剛先生著作此書的辛勞與功績，將《滾滾遼河》重新編排出版。期能為那段中國人以「生命寫史鮮血寫詩」的偉大歷史，留下印記。經典，本該永遠流傳。

三民書局編輯部　謹誌

出版說明

紀剛先生以抗日戰爭時期與其同代青年，於東北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的實際生活經驗，寫成本書；發表於報端時，即感動海內外萬千讀者，委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時，書未上市，即蒙讀者預約至第四次印刷；當年即獲中山文藝獎。繼之，被選為廣播小說，製作電視連續劇，籌拍電影，出版日文翻譯本，成為三十年來長銷暢銷書，已超過五十六次印刷等等，可見本書流傳之廣，影響之鉅。

本書是一有高度歷史真實性的文學作品，對大時代的抗敵工作者遭受日寇之追緝、刑獄、屠殺之慘烈，以及抗戰青年小我感情被壓抑、扭曲、撕裂的痛苦，都有巨細無遺的描繪。作者以劫後餘生的二十餘年歲月，完成此書，將過去完成式的歷史故事，用現在進行式的筆觸，立即引讀者墜入時空隧道，使讀者與書中人物同憤慨、同悲楚、同流血、同流淚，豈止是「感同身受」而已。書中「生命寫史血寫詩」的歷史見證，「革命誤我我誤卿」的情感告白，亦將永久刻烙於讀者心頭。

據由書外資料得知，作者原是一個被時代洪流沖激而起的一般抗戰青年，終因工作激烈，犧牲慘鉅，乃次第被擢拔為幹部，踏著先行者的血跡，最後接任為參予全面工作領導群的負責人之一。

裴有明先生，曾以其在遼陽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經驗，寫作一部《太子河畔》，由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其工作關係與工作精神相同，工作事蹟只限於一個地區，雖寫得聲色動人、感人肺腑，但有見樹未見林之憾。紀剛先生以其參與東北全面工作之經歷所寫得的《滾滾遼河》，則兼有見樹亦見林的風貌與氣勢。全面抗戰，即人無分男女老幼黨派，地無分東西南北前後方，即連淪陷時間最久，距中央政府最遠的東北地區，也有我們一大片的地下工作。不信？請看《滾滾遼河》！

國史館主修抗戰史的柳長勛編纂，即認《遼河》為一活的歷史，並以書中人物有關的工作回憶錄，輯成一部《東北現地抗日史狀》，列為史乘，以昭永存，並撰序文曰：

> 東北現地抗日是一種高潔而純真的愛國行為。完全出於這一代人對中國文明捍衛的熱誠和自覺。他們給近代中國史譜下最清白、最悲壯、最辛澀、也最感人的一章。讀他們底行傳，令人憤惻，令人零淚！
>
> 當年奉獻生命，奮身投入這股挽救民族危亡的時代洪流底：有公府將吏，有社會大眾，有政黨成員。惜乎瀋變突發，遼松陸沉。萬里關河，音書阻絕。俟長洋鮫竄，倭虜乞降，而政海波翻，京華覆沒。史料散佚，人物凋零。文案既鮮載登，簡冊更無撰錄。坐使垂天正氣，隨龍江之宿霧而同消；亙古精忠，與銀漢之流星而俱熸。言念及此，能不愴憾？
>
> 用特檢可信筆述數綴，輯成〈史狀〉。雖橫戈躍馬的風雲懋績難昭；但亦可為志士英姿留鴻

影，並對日寇罪行存控訴。

就小說寫作筆法言，以第一身觀點寫作的，「我」不應是主角；「我」是主角時，亦不宜是英雄；「我」若是英雄時，亦不宜自述其過五關、斬六將的英勇事蹟，若然，鮮有不被讀者所摒棄。紀剛先生深諳此理，將自己在書中寫成一個在工作上遭挫折，在感情上受蹂躪的工作幹部，或者說是一位受難的英雄吧！所以才被廣大的讀者所同情所接受。但歷史真實很難完全掩飾，細心的讀者，仍可處處窺見其蛛絲馬跡。

學術界有謂：文、史、哲不分家。一部偉大作品，常包有文學藝術層面、歷史社會層面、哲學思想層面三者。《遼河》的文學藝術面與歷史社會面，讀者俱可由文本中研賞得知，其哲學思想面則溶於字裡行間故事中，隱而不顯。關於後者，作者曾於允晨出版社出版的《諸神退位》中，分別揭露其端倪，近則完成一部《群我文化觀——做一個完整的人》，由文建會列為人文思想叢書出版，有一個完整的系統的發揚，實際是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價值體系。就文本言，上列雖為三書，就作者生活體驗言，仍是一貫的一部著作。是以讀者若能同時參閱《諸神》及《群我》二者，將對《滾滾遼河》有更深更廣的領悟與收穫。

緣於純文學出版社結束營業，敝局幸有將本書重新排版問世之機會，自當在版本、校對、印刷、裝訂諸方面，力求完美，俾使此一抗戰文學之經典名著恆久流傳。

臨水溯源
——談《滾滾遼河》的去脈來龍

紀剛

本文為華美經濟及科技發展協會一九八七年年會，中國近代文學組講辭。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於舊金山。後並刊載於《聯合文學》四卷六期

一

《滾滾遼河》這本書，很僥倖地被大家所喜愛，我因此也常常被讀者或記者們，問到一些尷尬而難於回答的問題，所以我就訂立了談話三原則：

一、談書不談人。也就是談作品《遼河》，不談作者我。

二、談書中的工作故事，不談感情故事。

三、必要談及感情故事時，也是從文學層面談，不從歷史層面談。

如今我奉大會邀召，飛越重洋，到舊金山來做報告；我不僅要打破我自訂的禁條，而且要公開承認：這本書的內容，無論是工作故事或感情故事，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實性。唯有一點需要說明的，那就是「書中的紀剛」，是當年的我，而非現在的我。

我以當年在東北從事抗日地下工作的親身經驗，寫下了這本《遼河》，其中自然包括了小我與大我兩方面的情感和兩方面的心願。所以動筆以前就想好了兩句話，預備出書時印在書前的扉頁上。那就是：

謹以此書
獻給那
使我終身感到遺憾的一位少女；
紀念那
將被歷史無情遺忘的一代青年。

這兩句話本是一隻很好的故事鉤，可以鉤住小說讀者的閱讀興趣。但是，由於現實生活中的一點顧慮，我沒有敢寫出來，自然也沒有印在書本上。因為小說家言，到底是真話假說，還是假話真

說，讀者是很難分辨的。惹來麻煩的話，作者也是很難分辯的。

這兩句話，雖然沒有寫出來、印出來，在書中卻以另兩句話做了代替。一句是——生命寫史血寫詩，一句是——革命誤我我誤卿。「生命寫史」是工作故事的歷史見證，「革命誤我」是感情故事的時代告白。

二

我寫《遼河》，前後分四個階段：最早是「葬故人」，其次是「滾滾的遼河」，再次是「愚狂曲」，最後是「覺覺團的故事」。發表時，選用「滾滾遼河」為書名。

一九四六、也就是民國三十五年春，抗戰勝利不久，東北雖然尚未完全接收，但大局看好，遠景光明。關於工作方面的事，都存在於東北同胞的耳目之中，社會證實它，國家肯定它，一切犧牲奮鬥，都有方法來善後。只有感情方面的事，許多青年同志們，都有「斯人獨憔悴」的困境。紀剛那似曾愛過而又未嘗愛過的兩個女孩子，一位是宛如，已經琵琶別抱，一位是詩彥，又讓給了朋友。所以我寫「葬故人」，把她倆捏在一起寫死了，讓她們在紀剛的心中死了，以便他能走出過去，追求新生。那時，我就用「革命誤我我誤卿」給女主角做碑文、做墓誌銘。「葬故人」寫了一半便因故停筆，我在《遼河》書中說：「土埋半截，便沒有下文了」。其實這是一隻伏筆，是一句賣關子的話——土埋半截便是故人未死，故人未死當然還有下文。

一九四九年，我與內人雙雙來到臺南，物質生活雖然艱苦，小我感情卻十分平靜，可是每一想到東北又再遭巨變，我們那段奮鬥史，即將被另一個時代所淹沒，心中實有未甘。於是我立志寫《遼河》，寫大我的故事，以便為「那些年、那些人、那種種鐵的生活、火的情感、血的工作」做紀錄。當時我是用「六壯士」、「鐵流」、「最長的一日」等類似的筆法，只以「工作故事」推展小說情節。可是由於我文學功力不足，越寫越沒有勁道；加上個人的職業變動，生活忙碌，便又告停筆。

一九五六年，我從臺南到臺北的臺大醫院進修小兒科，一時又回到見習醫師的身分。臺大醫院的建築格式，又太像我母校的實習醫院。走在中央走廊上，那些從身邊滑過去的年輕漂亮的小護士們，又個個像我的小宛如。正當我墜入時光隧道精神恍惚的時候，又聽到了詩彥的最後消息。這消息給我的刺激太大，我一個人承受不了，便找來兩位朋友，在總統府旁的一間小咖啡館裡，向他們訴苦。其中一位是已過世的民族音樂家史惟亮先生，在書中我用了他的本名。他對我很感動地說：「天下真情不過一兩，老兄何幸獨得三分！」另一位是對我寫小說一向大澆冷水的吳尹生先生，在書中的角色，他是「伊正」的一部分。這次他又冷笑三聲對我說：「談什麼真情一兩？簡直是愚蠢與狂妄！有人愛你的時候，你竟渾然不覺，是何等的愚蠢!?一個人只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愛，沒有權力決定別人的愛，你們竟在長春背地裡把人家給平分了，又是何等狂妄!?」我原希望他也能給我一點同情，卻不料反遭他一頓痛罵。於是我就決定用他罵我的話，寫「愚狂曲」向他申辯，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們申辯。難道說，這種大時代裡小我的大不幸，這種「革命誤我我誤卿」的無奈與悲情，

竟然只是一曲愚狂？

「愚狂曲」是以感情故事為主體，工作故事為陪襯。由於構想的結局太悲慘，可能給我帶來另一種不幸，所以寫了十萬字，就不敢往下再寫了。因為書中三位女主角，都有一句要命的話。宛如說：「大哥，你活著回來，不如你死去！」詩彥說：「我愛的是你，你為什麼把我向別人身上亂安排!?」甄青說：「跟你含辛茹苦生活了許多年，還不如你心中的一條影子!?」甄青說完這句話，便舊病復發。在現實生活中，為了一部小說，寫瘋了一個人，那可不是普通的愚蠢！

一九六五、也就是民國五十四年，我們來臺的抗日地下工作同志，曾舉行一次「五二三」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會。當時曾照相留念。當我面對團體照片的時候，心中常有一種奇特的感觸。先是感覺到：「有的人實在死得太早，空落得個烈士之名；有的人實在死得太晚，不然也獲得個烈士之名。」後來又感覺到：「在當前整個大時代裡的中國人，有太多的人死得實在太冤枉，有太多的人活得實在太窩囊。」在這種無限滄桑和奇特的感觸下，我又發狠，寫「覺覺團的故事」。這一次是「感情」與「工作」同為主題：就工作故事言，感情故事是它的興趣線；就感情故事言，工作故事是它的時代背景。這一次總算寫完寫成了。

這一次的原稿比較更小說化，工作故事比較誇張一點，感情故事也更渲染一點。可是經過兩位特殊讀者的審核和其他朋友的建議，加以大殺大砍後，才推出現在這本《滾滾遼河》。

三

一般作者寫小說，常常是苦於資料太少，在如何虛擬人物、構想故事方面大費心血；我寫《遼河》，反倒是苦於資料太多，在如何選擇人物、虛化事實方面大傷腦筋。因為工作故事寫假了，工作負責人不同意；感情故事寫深了、寫重了，另有人感到不舒服。我寫《遼河》，本來是想寫成一部小說，不是一篇散文、一首詩或一則報導文學；寫小說的目的卻是想記錄一段歷史，而且「向讀者負責所述歷史的真實」。《遼河》發表後，它的歷史性被接受、被肯定了，它的小說性文藝性，似乎尚有待研究。因為許多反應性的文字，都是讀者對抗戰生活的感性感言，很少有理論家對它做文學性的批判。所幸今年七月，為紀念抗戰五十週年，在臺北舉行的兩場文學的研討會裡，都討論到《遼河》。師大張素貞教授提出一篇〈從浪漫到寫實——談《未央歌》與《滾滾遼河》的創作模式〉。在這篇論文裡，她對《遼河》做了許多文學性的分析，是我這個閉門造車者，多年來很少聽到的「知己的聲音」。高陽先生在另一場講評裡，特別指出《遼河》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等三章，關於紀剛在獄中三次自殺的心理描寫，是本書最成功、最有價值的地方。可是，在我修稿時，有人建議將這三章完全刪去，因為這三章裡沒有一點點感情故事，怕讀者沒有興趣讀下去。可見作品的評價，也常是見仁見智，差距很大的。

《滾滾遼河》推出後，許多文壇先進和熱心讀者，都鼓勵我、期待我的第二部作品。可是我沒

有。我也常常反省，《遼河》雖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我自己卻不是一個純文學的人。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有人說我是——無怨無尤而有所堅持的人；有人說我是——大時代的大不幸中，一個小小的幸運者；有人說我是——不自量力，妄想爬大山的人。我自己想，這些批評，我可能都有一點。

我出生在遼寧省遼陽縣鄉下的一個農家，按著我們大家庭的家規，男孩子小學畢業後，就要下地種田或放豬放牛。剛巧我小學快畢業那年，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後，東北有一段無政府時期，鄉下盜賊蜂起，地方混亂不寧，有田地有財產的人，都把小孩子和婦女們送到縣城裡來避難。在城裡，我無田可種無豬可放，只好就便升學。可以說「九一八」事變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卻給我變出一個升學讀書的機會；不然的話，我現在可能還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莊稼漢。

在瀋陽讀高中的時候，我對人生發生了問題，很想讀心理學或哲學。可惜「滿洲國」當時不設立文史哲科的綜合大學，只設立農工商等專科學院。我選讀了遼寧醫學院，一方面是基礎醫學課程，可以使我先獲得關於人的生理學的知識；一方面也符合我家長對子孫的期待。因為學醫比較有職業保障。所謂「此處不養爺，還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回家開藥舖。」「七七」以後，我們就在東北參加現地的地下抗戰工作。當時青年同志們的心理，沒有人想到還能夠活下來，所以在獄中我還對審訊的敵特做了一首打油歪詩，以明心志：「年年南北走風塵，敢將大業寄此身，頸上頭顱任君取，沖霄壯志萬古存」。不幸，當年沒有機會做「烈士」，卻在海外偷生的日子裡，做了個浪得虛名的「文士」。

《遼河》的原稿雖然幾經修改，在報紙發表時，我仍接受「仲父」的建議，把勝利後對政府接收工作的批判部分，又刪掉了很多。出書的時候，林海音先生說她的出版社不怕什麼，希望我把刪掉的部分再加進去。王藍先生也勸我，要我拿出道德勇氣，把應該說的話都說出來。但，報紙發表後，我心中已沒有寫稿時那樣的悲憤，而當時正好看到一部美國西部片，片中描寫西部農民為反對修築鐵路而用武力抵抗。鐵路公司請來聯邦騎兵隊加以「鎮壓」。農民們看到騎兵隊那面星條旗，便自動撤退了。他們說：「我們當年曾為這面旗犧牲流血，今天，我們怎能對它開槍!?」這句話使我深受震動。我想，政府由南京撤退到臺北，已經承受了「歷史的裁判」，我不願別有用心的人，在它痛定思痛，復興圖強的時候，利用我的文字做為他們攻擊的武器。

其實我所刪掉的，只是些情緒性的言語，那些真正檢討批評的意見，都像一支支的鋼針，仍保留在藏針的針插裡面，粗心的讀者或鈍感的官員，感覺不到它的刺痛而已。

四

關於抗戰勝利後中國歷史的大不幸，我們當代的中國人都有責任檢討思考。《滾滾遼河》裡有幾句話問道：「為什麼辛亥成功反遭軍閥割據，北伐完成引起強鄰入侵，抗戰勝利又有國家內亂?」這些話在書中，只是前後文間的一段小過門，卻是我個人二十年來晝夜思考的問題。據我自己粗淺的結論，其主要的原因是現代的中國人出了問題，是現代的中國文化出了問題。怎樣拯救現代的中

國人和中國文化呢？正當這個時候，有一位雜誌社的代表來訪問我，問我一個極有深度的問題。他說：「同樣是從事地下抗戰工作的抗暴文學作品，為什麼《滾滾遼河》裡的青年，那些覺覺團弟兄們的思想，都是向人性的上限發展，把一切個人的理想希望，都寄託在國家民族的大群上；而法國沙特的作品，卻是向人性的下限發展，退縮到以赤裸裸的個體，面對非常的暴力？」這位代表，以前我不認識，他給我的名片印的是另一個名字。事後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久已聞名而今天也應邀在座的陳映真先生。

陳先生走後，我想他的問題既然是由《遼河》而來，我也就跳出作者身分，改以讀者或研究者的立場，重新閱讀《遼河》。我一口氣，連看了三遍。啊哈！在《遼河》的第十六章裡，我不僅為他的問題找到了答案，也為我自己晝夜思考的問題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不一定正確，但陳先生的問題，實在問得太好。今天是我第一次公開這段往事，所以也藉機在這裡公開向他說聲謝謝。因為在臺灣，我們等於沒有再見面。

我寫《遼河》，只是忠實地將那個時代青年的「思想言行」記錄出來，並沒有故意把什麼「意識觀念」包裝進去。當我以研究者的立場分析《遼河》時，才發現覺覺團弟兄們的行為動力——一方面是歷史環境的驅使；一方面是中國文化的實踐。他們所實踐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精神，中國文化的真精神是：「小我與大我的合一，個體與群體的共命」。換句話說，是「個體生命與群體生命的兩相關注」，或者說是「個體生命與群體生命的交互界定」。再換句話說，就是「內聖外王，互

為主體」。所謂內聖外王，用現代的語彙就是「自我充實」與「服務社會」。自我充實為的是服務社會；服務社會為的是自我實現與自我完成。至於「個體生命」自然是指獨立存活的生物個體，而「群體生命」則有家庭、社會、國家、民族、世界、宇宙等等層界的劃分。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龍骨，是龍的文化的中樞神經系統。我把這點用個人生命所體驗到的一點心得，寫成一篇〈諸神退位〉，最初發表在《聯合報》副刊上，今年七、八月份，又經《光華雜誌》所轉載，當然這期間，我已有許多補充和修正的地方。就我個人來說，滾滾遼河是已經流過去了，如何高舉「龍的文化」敕令「諸神退位」，是我現在面對的課題。這當然是一件「不自量力、妄想爬大山」的工作。

我曾看過一部實驗電影的立體動畫，片名為「階梯」。描繪一個人在千山萬谷中找方向、找目標、找理想。經過徬徨嘗試後，他終於選擇一座很高很大的山。那些山，都是階梯式金字塔的造型。開始的時候，他是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最後筋疲力盡了，則手腳並用地向上爬，爬到山頂時他已站立不起來，便俯臥在山頂上吐出最後一口氣，剎那間，他的身體化成了另一層階梯。這時鏡頭忽然向遠處拉，原來在四周在遠處，還有更多更高更大的山。

我知道我所爬的山，未必是最高最大的，甚至說我的努力，還未必能給任何一座小山增加一層階梯。好在有人說過，人生的意義是在乎「做什麼」，不在乎「能做出什麼」，更不在乎「別人認為我們在做什麼」。正如當年我們在東北從事抗日地下工作一樣，雖然是一群有臉的人，卻不是一群想要露臉的人！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滾滾遼河 / 紀剛著.－－二版一刷.－－臺北市: 三民,
2016
面; 公分－－(三民叢刊:144)

ISBN 978-957-14-6086-4 (平裝)

857.7 104020966

© 滾滾遼河

著作人	紀 剛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97年4月
	二版一刷 2016年3月
編號	S 85354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6086-4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